

古代史 前言

中国与日本的关系自古以来十分密切，经常被形容为“一衣带水”。在两国关系中，既有如文化和人员交流这样积极的方面，也发生过战争和侵略这样的不幸。2006年12月启动的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古代史研究，在全方位地思考中日两国古代史中以中日交流为核心的各种问题的同时，也致力于全面理解中日两国在东亚史和世界史中的地位和影响。

在共同历史研究进行过程中，胡锦涛主席于2008年5月访问日本，与福田康夫首相会谈，双方发表了《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指出“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实现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双方还表示“决心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双方将不断增进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扩大互利合作，使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与世界发展潮流相一致，共同开创亚太地区和世界的美好未来”。双方还在联合公报中明确表示：“积极评价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发挥的作用，同意继续开展这一研究。”

在得到两国首脑高度评价的时候，古代史组的两国学者认为最重要的经验是研究过程中的坦率与公正，我们始终本着谦虚的态度而为此努力着。当然，这并不排除双方学者对某一问题具有不同关注点和处理方法。而在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和评价出现分歧时，我们遵循了唐代史家刘知几提出的“他善必称、己恶不讳”的主张¹。也就是说，古代史组的双方学者为了使共同研究更具价值，在东亚史和世界史的层面上对中日两国的历史进行了多角度的审视，致力于挖掘对方的长处，同时不掩盖自己的缺陷。这种宽广的视野与上述《中日联合声明》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也是新时期中日共同历史研究能够取得相应成果的基础。

无庸讳言，历史过程中始终存在积极与消极两个侧面，双方学者在选择叙述和分析侧重面的时候，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分歧和差异，学者强调个人的认识也是正常现象。在分析历史事实的时候，我们力图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双方学者均认为：历史就像黑暗的世界被无数盏灯照射着一样，尽管有的地方很清晰，但仍然有光线照射不到的模糊不清的地方。在古代史这一史料有限的领域内，对于这些模糊不清的地方，当然不能满足于主观推测和判断。古代史研究就是在挖掘史料以消除疑问、进而在提高判断准确性的过程中达成一致的认识。

为完成本报告，双方学者在互相理解对方历史认识的基础上进行了认真、坦率的讨论，并就相同题目撰写论文，积累了前所未有的宝贵经验。这是一项极其有益的工作。古代的中国作为世界史中巨大的文化中心，向四方传播文化，或影响周围各国的文化，或刺激新文化的形成。古代史组的日方学者十分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中方学者对日本文化的独特

¹ 刘知几在《史通》（卷七《曲笔篇》）中说：“古者诸侯并争，胜负无恒。而他善必称，己恶不讳。”

性与创造性给予充分的评价，双方学者共同高度关注两国文化相互影响与相互激励的历史进程。

德国出生的犹太人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Arendt,Hannah）认为，欧洲所谓的世界史最初根源于希腊人的理解天分，他们不仅具有自己直接观察世界的的能力，而且能够理解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因而具有间接理解的能力（《思索日记》I）。或许可以说，尊重“与自己的意见相左的意见”正是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的古代史研究能够取得成功的条件。这恰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立足于这种精神的本报告虽然仍有不足之处，但它是中日两国历史学者两年来共同努力的结果，期待得到读者的理解。

序章 古代中近世东亚世界中的日中关系史

山内昌之 鹤间和幸

前言-友好两千年再考

众所周知，日中之间有两千余年的外交史。自距今两千年前的公元 57 年倭奴国向后汉光武帝遣使朝贡并被赐与金印，日中外交史就开始了。在这两千年的历史中，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是近代。除近代 160 余年的历史外是友好，这是两国的一般性见解。

“友好往来两千年”这句话，常常与日清战争以后的近代的“不幸的历史”形成对比，并成为日中双方谈论友好关系时的外交上的套话。1972 年的《日中联合声明》说：“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切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¹，而将“悠久友好的历史”与“不正常状态”加以对比。汉语“一衣带水”，即虽然被海隔开，但这是像一条带子般细窄的海，以此来象征两国的友好关系。

在 1992 年天皇访华时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欢迎词中，也对近代的“不幸历史”而强调了“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两国人民有两千年以上友好往来的历史”，特别指出了“在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人类的东方文明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对此，作为与“对中国国民造成巨大苦难的不幸的时期”的对比，天皇具体讲述“交流历史”如下。“尤其通过在七世纪至九世纪派遣遣隋使、遣唐使，我国留学生长年客居中国，热心学习中国文化。两国的交流就这样自古以来长期和平持续着，我国国民多年来对贵国的文化抱有深切的敬意和亲近感。”²这样作为友好交流的象征而提出了遣隋使、遣唐使。

1998 年江泽民主席在早稻田大学进行的《以史为鉴 开辟未来》的演讲中，从秦汉、南北朝、隋唐、宋至清代追述了一衣带水的邻国的两千年悠久史。³这可能是依据中方的中日交流史学界的见解而形成的内容。并强调了日本人民是在各个时期学习外来文化，并由此创造出新文化的伟大民族。即秦汉时代从中国大陆传入农耕生产技术和工具，日本从绳纹时代进入弥生时代，在南北朝时期称为“渡来人”的中国移民传来了养蚕、绢织、制铁技术，再到隋唐时代，遣隋使、遣唐使学习了中国的古代文化典籍，从宋至清则存在贸易关系。其中指出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以及历尽苦难至日的鉴真和尚是为中日友好交流做出贡献的人物。

2008 年 5 月，胡锦涛主席也是在早稻田大学进行讲演。他谈及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的历史，特别强调了相互性。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为东亚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从中可以看到面向亚洲和世界发展日中关系的强烈愿望。

现在我们要立足于日中两国历史研究者的议论更加深入地探讨两千年友好的时代意义。需要充分地理解前近代友好、近代不幸这种概括的意义，面向未来实实在在地发展友好关系。我们应依据具体的史料冷静面对前近代友好时代的历史事实。

一 共同研究题目的设定及议论经过

本次日中共同历史研究分成两个组。日方称为古代·中近世史分科会和近现代史分科会，中方称为古代史组和近代史组。在中国，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的时代称为古代。之所以采取古代、近代的二分法，是源于从秦汉到明清的皇帝制诸王朝都属于中央集权的封建制时代

¹ 竹内实、21 世纪中国总研编《日中国交文献集》，苍苍社，2005 年。

² 同上。

³ 同上。

这一认识。欧洲史的时代划分为古代、中世、近世、近代，中世定位为封建制时代。但在中国，皇帝也是一个封建领主，其封建制（feudalism）与欧洲不同而采取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在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中，对近代以前（前近代）也采取古代、中世、近世的时代划分。与其说从秦汉至明清反复出现了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不如从社会体制的变化中找出历史发展的阶段。1955年以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团长的访日学术考察团已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议论过时代划分问题，双方的观点明显不同。⁴

在日本的研究者中间，有古代结束于后汉至魏晋时期及唐代末期的不同观点。将古代下限定于十世纪的观点，更接近日本或朝鲜的古代，为欲从东亚世界把握中国史的日本研究者所独有。相对于中国近世是十世纪宋代以后君主独裁政治时代的观点，也提出了对照日本和欧洲而将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看作近世的观点。⁵

日本的所谓京都学派的东洋史学者内藤湖南和宫崎市定设想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史，认为位于“中心”的中国的历史发展与位于“周边”的日本等国的历史发展当然存在时间差距。⁶前田直典则尽可能排除这一时间差的幅度，而强调东亚历史发展的相互联系。⁷这也是在强调东亚的时间同步性，欲将日本史在古代、中世、近世、近代这一时代划分与之在时间上、内在上联系起来。此后，关于中国史时代划分的争论在1970年代停止了⁸，关于日本和中国的古代、中世、近世的相互联系及奴隶制、封建制等社会发展阶段的议论几乎没有了。

但是，必须承认日中的研究者之间在时代划分上毕竟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认识。当然，在日本人的中国认识中也不是没有大致二分为前近代和近代的观点。以1894年的日清战争、中国称甲午战争为契机，日本的中国观发生了变化。即尊崇前近代的传统的中国同时轻视近代中国的观点，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扭曲的日本人的中国观。⁹

在时代划分方面的历史认识的差别，与其说是从不同角度观察同一个事物，不如说是源于观点的不同。日本研究者欲从相互联系的东亚地区的世界史中加以把握中国史和日本史，中国研究者则欲将中国史定位为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史，而将对外关系史定位在其外缘。这一差别比预想的大，但在相互直率交流中开辟了理解双方立场的道路。

2006年12月，日中共同历史研究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在共同历史研究中如何进行交流，如何设定研究题目，首先介绍了各自的专业领域并自由地交换了意见。依次在2007年3月在东京召开了日中共同历史研究第二次会议。会上中方始终主张在已有研究积累的中日交流史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共同研究，而日方则主张在东亚世界中比较日中的外交、文化交流及其社会结构。开始时其分歧比预想的要大，但中方对日方的提案从大局出发表示出理解，日方也从共同研究的性质出发以灵活的态度回应了中方的意见。

在两天的交流中，分科会的总题目定为“古代中近世东亚世界的日中关系史”。东亚世界是日方主张的历史框架，日中关系史是中方着力的视点。总题目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是国际关系，第二部是文化交流，第三部是相互认识和政治社会结构比较。归纳成以下的结构：

第一部 东亚国际秩序与体系的变化

第一章 七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形成

第二章 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的东亚国际秩序与日中关系

第二部 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日本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的诸方面

第一章 思想、宗教的传播与变化

⁴ 铃木俊、西岛定生编《中国史の時代区分》，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

⁵ 岸本美绪《東アジアの「近世」》，山川出版社，1998年。

⁶ 内藤湖南《支那上古史》《支那近世史》，《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筑摩书房，1969年。宫崎市定《東洋における素朴主義の民族と文明主義の社会》，平凡社，1989年。

⁷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古代の終末》，铃木俊、西岛定生编《中国史の時代划分》，东京大学出版会，1957年。

⁸ 谷川道雄编《戦後日本の中国史論争》，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1993年。

⁹ 安藤彦太郎《中国語と近代日本》，岩波书店，1988年。

第二章 人与物的移动

第三部 日中两国的相互认识和历史特点之比较

第一章 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相互认识

第二章 日中政治、社会结构比较

第一部不仅仅是认识日中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是要在认识东亚世界的国际秩序中思考日中关系。第二部文化交流，不是要单方面地、不平衡地对待中国向日本的不对称的文化传播，而是要尽可能地主张在日本产生的文化的独自性。第三部在比较日中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加入了双方如何认识的课题。

日中历史认识的差异，不仅在近代史，在前近代史也是明显的。这对进行共同研究决不是负面因素，而是进行交流的十分重要之点。因为以往的日中之间的历史学研究的学术交流，日中的中国史研究者同行进行得很活跃，但日本史研究者参加学术交流的机会不多。在中国史的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宋史、明清史所谓断代史，日中双方的研究会之间交流活跃，其中日中之间的历史认识的差异不成为问题，而是进行个人层面的学术交流。但可以说，在深层次上涉及日本历史如何超越中国历史和外交史或文化交流史，议论这方面的机会几乎没有。日本的古代（律令制国家时代）与中国的古代（秦汉~隋唐、公元前三世纪~十世纪）、日本的中世（镰仓幕府·室町幕府、十二世纪~）与中国的中世（宋元）、日本的近世（幕藩体制）与中国的近世（明清），不仅仅是时代共有，具有何种结构性的关系尚不明了。尤其中国的研究者一律以封建制概括，未看到古代、中世、近世这样展开的论述。

在日本考古学或古代史领域，因为稻作·青铜器·铁器·都城等大陆的先进技术或各种思想对日本列岛的历史给以大的影响，所以比日本中世史或近代史交流活跃。不仅共有古代这个时代，而且认识到结构性的联系。日中考古学者联合发掘了汉长安城¹⁰，测量调查了汉代皇陵，进行了唐长安城大明宫的复原事业（大明宫含元殿遗迹保存环境整備计划得到日本的文化遗产无偿援助），保存修复敦煌莫高窟壁画（东京国立文化财产研究所与敦煌博物院的日中共同研究“敦煌莫高窟壁画的保存修复”）等，日中共同研究的事例很多。隋唐律令和城市制的结构通过遣隋使、遣唐使输入到日本，日本建设成律令制国家，这必然使日本研究者的眼光转向中国。¹¹近年发现了作为遣唐使入唐而被埋葬在当地的留学生井真成的墓志，这成为再探遣隋使、遣唐使意义的契机。¹²还有，1999年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发现的所藏北宋天圣令抄本，包含有至今不知的唐代开元令条文，使日本古代史研究者和中国研究者的交流活跃起来。¹³在此日中之间没有国界的障碍。仁井田升的《唐令拾遗》（东方文化学院、1933年）和池田温主编《唐令拾遗补》（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这一由日本人进行的中国研究的国际性成果再次受到注目。面对这样的新史料，与其说日中之间的历史认识的差距成为问题，不如说日中之间的研究者合作从学术上阐明新史料，出现了向前看的态势。

但是，一旦历史认识成为问题，则往往非常欠缺对对方的理解。对中国而言，前近代的日本在外交上是一个国家，其存在仅是单方面接受中国文化，反之则没有左右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力。对于位于亚欧大陆东端的中国，不言而喻，与陆地相连的北方游牧地区、朝鲜半岛、西域、东南亚的关系比隔东海相望的日本重要。所以，将中日交流史作为中外关系史之一进行研究就足够了。但另一方面，日本一方认为，接受中国文化对日本这个国家、文化给以多大的影响不可估量。大陆文化大部分以单方面的形式从朝鲜半岛及中国沿海地区进入日本列岛。所以，回顾日中的历史时，必须从分析日中之间的不平衡关系出发，所以不能仅止

¹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编著《汉长安城桂宫 1996-2001 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 年。

¹¹ 西岛定生编《日中合同シンポジウム〈古代宮都の世界〉奈良・平安の都と長安》，小学馆，1983 年。

¹² 专修大学、西北大学共同プロジェクト编《遣唐使の見た中国と日本：新発見「井真成墓誌」から何がわかるか》，朝日新闻社，2005 年。

¹³ 大津透《北宋天聖令の公刊とその意義—日唐律令比較研究の新段階—》《东方学》第 114 号，2007 年。

于说明日中关系史或交流史的层次。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是在东亚世界这个国际世界中展开的，在此之中有人与物的流动，思想与宗教的传播。可以说我们的日中共同研究是从首先理解这一日中历史认识的差距开始的。

日方并不是主张将国家或文化的大小差别做为问题。的确，从人口之多、地域之广看，中国历代王朝尤其秦、汉、隋、唐、北宋、元、明、清这类统一王朝是真正的大国，日本是位于其周边的小国。例如，八世纪末日本人口仅有 600 万左右¹⁴，同时期唐王朝的人口在玄宗的天宝十四年（755 年）达到 5293 万人。所以说小国没有必要特意谋求与大国的对等关系。重要的是，应充分认识中国和日本都是在相互关联中发展历史。相互关联不仅仅是日中之间的直接的外交、战争和交易，也与朝鲜半岛、东北亚、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区的发展动向相关。认识东亚共有的文化不难。汉字、儒教、汉传佛教、律令等中国文明发出的文化传播到了东亚世界。但如果仅止于将此认识为共有文化，则还没有达至双方的真正的认识。为达到日中相互理解，首先应做的就是互相认识日中双方的分歧。

起初，共同历史研究委员的专业偏向也是产生日中之间认识分歧的原因。中方委员的专业是中日关系史、日本史，而另一方日方委员除国际关系史的山内昌之外均为中国史专业。中国的日本史研究者重视中日关系史，日本的中国史研究者不得不从东亚世界中认识中国或日本的历史。

双方专业的这一偏向，由外部执笔者参加加以弥补。中方有日中文化交流史、日本古代史的研究者参加，其后总论部分执笔者有考古学、日本文学，第三部第二章有隋唐史、元史的研究者 9 人参加。中方共有 16 人，表达了在重视已往的中日关系史的同时，也要积极论述中日国家、社会差异的强烈欲望。尤其积极推进上述日唐律令比较研究的核心成员也参加了进来。

日方有日本古代史、中世史、思想史、绘画史的 5 名研究者参加，共有 10 人。日中都集合了各领域的研究者。日中双方以这样的成员就共同的题目撰写论文，理解并讨论双方的历史认识，这是未曾有过的重要工作。

2008 年 1 月，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外部执笔者也参加了会议。在第三次会议上，双方阅读了对方的论文，互相阐述了自己论文的主旨及对对方论文的意见。日方提出，不仅要研讨日中古代中近世史，还向中方提议超越日中关系史的框架，而深入研讨由“独自性和受容力”所代表的日本社会的历史特点，强调双方理解他人是重要的，要超越仅仅源自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认识产生的误解，接受对方为对等的对手。在东亚范围内观察日本、中国的社会或国家时，在重视共同点的同时，也有必要着眼于区别之处。例如日本古代律令制近似于成为其规范的中国古代唐代的中央集权制，但在社会、村落、家族的形态方面当然存在差异。认为日本中世封建制与中国相比更类似于西欧，而与宋代中央集权制的中世不同。

2008 年 3 月，在福岡九州大学医学部讲堂古代中近世部会单独召开了第四次会议。双方根据史料修正事实误解，重视对方立场，痛快地修改应改之处。一行人访问了九州大学总长室，拜见了郭沫若手书“实事求是”，再次确认了共同历史研究的基本精神。“实事求是”本是清朝考证学者的话，毛泽东评价了这种精神。1955 年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为访日学术视察团团长挥毫这四个字。在福岡停留期间我们还访问了对马。日中之间虽说一衣带水，实际上被大海相隔。但对马与朝鲜半岛仅隔 50 公里。在二千年日中交流史中，在至七世纪时的古代，从山东半岛、朝鲜半岛渡朝鲜海峡、对马海峡成为主要途径。对马在中近世的重要性是作为国境之岛成为通朝据点。在对马藩宗家菩提寺万松院，行走在大杉包围的墓地，思忖着连系大陆与日本的对马的历史，在覆盖着海神社的森林中体会到与大陆相连通的自然景观，重新认识了日本决不是与大陆隔绝的世界。

¹⁴ 鎌田元一 《日本古代の人口》《日本の古代別巻日本人とは何か》，中央公论社，1988 年。

二 克服一国史史观

首先应该认识到在被认为是友好时代的前近代日中之间也发生过战争。在近年出版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著的《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星球地图出版社编制、2007年）中，选取了《唐与高丽、百济之战（644~668）》和《明万历抗倭援朝战争（1592~1598）》两个与日本有关的战争。在第一部“东亚国际秩序与体制的演变”中特别选定“七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创立”和“十五世纪到十六世纪东亚国际秩序与日中关系”也是因为认识到七世纪和十五、十六世纪是日中关系在战争与外交中具有了密切关系的时期。

在七世纪，倭为救援灭亡后的百济，与唐和新罗联军作战，大败于白江（白村江）。《旧唐书》卷199上东夷列传有简单记述，认为这场战争对唐而言并不那么重要。虽说新罗介入，但这是古代日中之间交战的少数事例之一，应充分认识战争的意义。从唐朝来说，不过是与高句丽战争的延续，而与新罗结有同盟，并不是与隔海而望的倭直接对峙。由唐观之，正如镇将刘仁轨所注意到的，认为不过是在溃败的百济军400只船中混入了“倭众”救援军。这场战争后日本退出朝鲜半岛，不如说日本一方受此战争的影响更大。但是，唐将刘仁轨借新罗、百济、耽罗（济州岛）、倭四国使者回国，唐高宗带着这些东亚各国的使者加上突厥、于阗、波斯、天竺等周边酋长或使者行泰山封禅。¹⁵不仅是东亚，扩展到唐周边的地域来看，东方战争的胜利不容否认对唐也具有重大意义。川本芳昭的论文不想着眼于大国唐与小国倭的关系，而是将唐与倭放在同一个斗技台上。即唐也是继承了位于中华之外的五胡北朝的谱系的王朝，在东亚构筑以自我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倭也从东夷脱离而出，争取以自我为中心的“中华”。两者在这样的动向中发生了战争。

在蒙古的对外战争中，《中国战争史地图集》没有选取跨越东海的战争。十三世纪发生了日本所称的元寇（文永之役、弘安之役），尤其在第二次的弘安之役（1281年），忽必烈灭南宋之后组织10万江南军派到北九州。其规模超过了同时从高丽出发的4万东路军。但与其说江南军是武装部队，不如说更接近移民团¹⁶，所以元寇始终是蒙古与日本的战争这种意识强烈，而没有与原南宋人战争的意识。这次第三部第二章第四节对元寇有所涉及。将元与日本的交战定位为骑马民族蒙古与日本武士的战斗，是骑马文明之间的对决。中国的元史研究者将同时代的镰仓时代的武家政权与元政权联系起来考虑有新意，但骑马文明史观存有疑问。虽然有池内宏、旗田巍的研究从东亚世界中定位元寇，但日本的蒙古史研究强调忽必烈追求将大海纳入视野的国家。¹⁷

十六世纪，在日本侵略朝鲜半岛的文禄、庆长之役（壬辰、丁酉倭乱）时，朝鲜的宗主国明朝派出援军，同日军作战。统一了日本国内的丰臣秀吉也欲出兵明朝，派出大军至朝鲜。这时仍不是日中之间的直接战争。村井章介的论文指出，这是秀吉的统辖中国、朝鲜、日本的“三国组合”构想遭遇挫折的过程，以及秀吉的动向与女真努尔哈赤联动，向中华帝国明朝的挑战。在此需要理解超越日中两国而将东亚整体纳入视野。

前近代日中之间的战争，囿于日中关系史的范畴就不能理解。应置于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世界之中。而且发生过战争这一事实也不应隐藏在“二千年友好”的阴影中。

在日本与中国有日中交流史这门学问，其潮流现在仍在继续。辻善之助《增订海外交通史话》（1930年、1942年，内外书籍株式会社）、石原道博《明末清初日本乞师之研究》（富山房，1945年）、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富山房，1955年）这一潮流，被藤家礼之助《日中交流二千年》（东海大学出版会，1977年）、大庭修《江户时代唐船持渡书之研究》（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1967年）、《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受容之研究》（同朋舍出

¹⁵《西嶋定生東アジア論集 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第三卷，岩波书店，2002年。

¹⁶ 杉山正明《疾駆する草原の征服者》中国的历史08，讲谈社，2005年。

¹⁷ 杉山正明《モンゴル時代のアフロ・ユーラシアと日本》，近藤成一编《モンゴルの襲来》日本の時代史9，吉川弘文馆，2003年。

版，1984年）、《古代中世日中关系史研究》（同朋舍出版，1996年）、松浦章《清代海外交易史》（朋友书店，2002年）、《江户时代唐船日中文化交流》（思文阁出版，2007年）所继续。

木宫的著作被译成中文¹⁸，对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现在仍具有重大影响。1995年出版的日中文化交流史丛书10卷，是日方大庭修、池田温、中西进等，中方周一良、王晓秋、刘俊文、王勇等编委推进的巨大成果。涉及历史、法律制度、思想、宗教、民族、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典籍、人物，由大修馆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在日中同时出版。日中之间有大量的物与人的交往是事实。日中交流史或交易史的研究成果究明了日中之间人与物是如何具体交流的。尤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之大不可估量。

如果以近代日本与中国的国家为前提谈日中关系史，应注意单纯用国家的框架追溯过去。近代国家是历史性形成的，不能无视此前之历史过程。二千年前没有称作日本的国家，日本这个国号至少是在七世纪才出现的。严密地说，倭奴国王向后汉光武帝派出朝贡使节，这并不是日本同中国的外交。奴是位于北九州北端的小国，倭也不是指整个日本列岛。

从现在的日本追溯的历史是日本史，但我们必须从时间系列上观察以被大海包围的日本列岛为舞台的历史。同样，所谓中国史是发展到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一过程的历史，要从王朝变迁的历史发展来认识。二千年前中国的国家是汉，七世纪与日本开展外交的是称为唐的国家。与日本史一样，应将中国史看作以由黄河、长江代表的大河注入东海的亚欧大陆东端地区为舞台的历史。

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人无抵抗地接受了所谓东亚世界这一历史性世界观。中国的汉字、儒教、佛教（汉传佛教）、律令等文化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成为同一个文化圈，这是东亚世界论的出发点。但是，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的历史超越一国的范畴，在东亚世界这一更大的框架中如何发展过来，对此不明点尚多。

近代历史学原本是从国民国家的历史出发的，不易摆脱一国史的框框。一国的内与外的关系，尤其在前近代历史中，以外交、交易为外，以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史为内而区分开来。其结果，往往在对国内形势有无影响的层次上谈对外关系。尤其海围四方的日本，只有渡海才与外国发生关系，因此，一国史观点的束缚更强。

日本的东洋史学者提出了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的新问题。西岛定生继承了前田直典提起的问题，从日本的东洋史、中国史的研究者立场展开了东亚世界论。¹⁹西岛也不是要拼集中国史、日本史、朝鲜史等各国历史，而是要在世界史的体系中定位中国史、日本史、朝鲜史。要超越以往的日中交涉史（遣隋史、遣唐史、日宋贸易、日明贸易等）或比较史研究（日中律令制的比较、均田制与班田收授法的比较等）而探求东亚大陆史与日本史之间一体性的历史结构。这就是称为册封体制的国际秩序。西岛的册封体制论的出发点是六至八世纪的东亚。这个时代的日本是隋唐帝国册封体制之外的朝贡国，是在其中主动摄取中国文物制度构筑律令体制的时期。而且，阐明了在从汉王朝至十九世纪的前近代，作为自我完成的地域世界而设定了东亚世界，并融入一体化的世界史的过程。册封体制论是主张东亚世界自律性的理论。西岛并不认为册封体制贯穿了前近代的整个东亚世界。唐王朝或明王朝是政治性册封体制的中心，但宋王朝未能维持册封体制，代之发挥了东亚交易圈的核心作用。

日本中世史研究者也提出了超越一国史框架的新观点。网野善彦提出了自己的历史学，不是将视点置于“日本国”的国制的历史，而是置于列岛的自然与社会，与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东北亚、东南亚等列岛以外地区的交流。²⁰对于西岛以东亚国际秩序为问题，从外部观

¹⁸ 木宫泰彦著、陈捷译《中国交通史》，民国20年，1931年，上海商务。

¹⁹ 《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古代東アジア世界と日本》岩波现代文库，2000年；《東アジア世界と冊封体制》西岛定生東アジア论集第三卷、《東アジア世界と日本》同第四卷，皆为岩波书店，2002年出版。

²⁰ 《列島社会の多様性》，网野善彦著作集第15卷，岩波书店，2007年。《「日本」とは何か》日本历史

察日本，网野作为日本史研究者欲从内部排除一国史、一民族史的约束，阐明日本向东亚世界扩展的多种姿态。这当然应与中国史的多民族、多样性的议论联系起来。网野还主张，在近世以后国民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此前以海为媒介的列岛与列岛以外地区之间的自由奔放的活动受到抑制。从十三世纪后半期以后至十五世纪，列岛社会进入了大的转变期，以连接列岛内外的交通发达和稳定为背景的人与物或钱币的流通大大改变了社会的存在方式。第二部第二章樱井英治的论文《人与物的移动》认为，十二世纪以后至十七世纪前半期近 500 年时间，日本一下子进入中国钱币的时代，这与中世这一时代划分重叠，而且要从与中国的距离和对外紧张程度减弱中寻求所谓专制中国与分权日本的中世异质国家体制的差异。

网野提出的列岛与周边地区史的观点，成为新的时代划分而登场。²¹ 以往的古代、中世、近世的时代划分是一国史的观点，而试将亚洲中的日本史的时代划分分成 10 个时期。但古代时期分成 1、“中原统一与周边地区的觉醒”（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三世纪），2、“中原分裂与周边国家形成”（三世纪至六世纪末），3、“律令制国家群登场”（六世纪末至八世纪中叶），因划分过细，尚未充分看到大陆中国与列岛的相互关联。古代、中世、近世这一时期划分，作为整体观察超越一国史的地区世界史的变化时的基准，至今仍是有效的。在近年出版的宫地正人编《新版世界各国史 1 日本史》（山川出版社，2008 年）的前言认为，从与东亚地区世界的关系记述日本历史的发展，这是形成超越以往外交史类型的日本史的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

日本史研究者的面向海域的观点，正与中国史、东南亚史研究者对海域的关心产生互动。桃木至朗编《海域亚洲史研究入门》（岩波书店，2008 年）将海域亚洲时代划分为中世（九世纪至十四世纪前半期）、近世前期（十四世纪后半期至十七世纪初期）、近世后期（十七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期），阐明了时代特征，总结了以往的海域史成果，并试图进行新的展望。要将中世看成亚欧大陆规模上的亚洲海域交流活跃的时代，近世前期是大航海时代开始的世界一体化的时代，后期是回归传统社会的时代。要从超越东亚世界的世界史的大范围看海域史。不是仅以一国史分成内与外的外部海域的联系，而是以纳入一国史自身的地区世界史为目标时，海域提供了什么样的视角，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三 历史教科书所见日中关系史

比较日中的历史教科书，双方的历史认识的差异显著。在推进日中共同历史研究时，有必要知道在两国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如何记述对方国家日本或中国的。²²

历史教科书的执笔由历史研究者发挥重要作用，所以对历史认识的差异，研究者也有责任。中国的初中、高中教科书在日本也有翻译，受到民众关心。²³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述日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如何记述中国，还有，中国教科书关于日本的记述对日本史研究的新水平反映到什么程度，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对中国史的新成果表现到什么程度。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记述的中国史也有问题。在日本高中，作为日本史和世界史科学习历史，两方的教科书中关于中国的记述很多。但日本史科和世界史科关于中国或日中关系的记述的内容不同。原因是日本的日本史研究者和中国史研究者的视点相违。在日本史的教科

00，讲谈社，2000 年。

²¹ 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 I アジアと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 年。

²² 经掘越启介（2008 年 9 月东京大学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综合学术大学院东亚研究硕士课程）协助，确认了他收集的 8 种 2007 年通过全国审订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中的 6 种（人民教育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四川教育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的内容，本文加以反映。所余岳麓出版社、中华书局版未见。据他所言，因 1980 年代开始实行教科书多种类制度，逐渐能看到各种记述，对近现代日中关系的记述也出现了变化和多样性，但对前近代日中关系的记述则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²³ 《中国の歴史》中国中学历史教科书，明石书店，2001 年，小島晋治等译《中国の歴史》中国高中历史教科书，明石书店，2004 年。

书中是日本史研究者写中国史，在世界史教科书中则由中国史研究者写日本史部分。即在日本史教科书中，以日本为视点书写与朝鲜和中国的交涉史，在世界史教科书中，以中国为视点记述东亚的日本和朝鲜。这也与日本的日本史研究者和中国史研究者对东亚世界的把握方法不同有关。

史料原本由日中各自的世界观来书写。历史研究者动辄被单方面史料的性质和内容所左右。中国史研究者以中国史料为中心思考国际关系，日本史研究者以最近的日本史料为中心思考国际关系。不经过双方的对接作业而写出各国史（中国史、日本史）或世界史教科书，这种做法应予以反省。在八世纪编纂的日本史书《古事记》《日本书纪》出现之前，对日本来说，《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宋书》《隋书》成为依据。²⁴现在日中教科书关于日中交流史的记述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似因为对正史记述的读取方法不同。

倭或日本被记述为中国历代正史的东夷列传中的一项。例如，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有东夷列传、南蛮西南夷传、西羌传、西域传、南匈奴列传、乌桓鲜卑列传六个外国传，并列了位于中国周边的蛮夷戎狄四夷。在列于首位的东夷列传中，有扶余国、挹娄、高句丽、东沃沮、马韩、辰韩、弁韩依次记述，在韩的东南海中的倭最后出场。比《后汉书》早成书的《三国志》在北宋时将《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并为一书。其《魏书》有外国传，合而为一乌丸鲜卑东夷传。但西晋陈寿在编《魏书》时依据的鱼豢的《魏略》逸文残留有西戎传，所以明白了在三国魏时，与西方、北方并列有东夷世界。《隋书》中，正好整理成东夷传、南蛮传、西域传、北狄传。在其东夷传中，在高句丽、百济、新罗、靺鞨、琉球最后加入倭国。从在中国地域树立的各王朝看，只关心陆地相连的世界，当然政治、文化关系深厚。从中国来看，倭不过是隔海的朝鲜之外的一个世界。更在《旧唐书》中，加入了突厥列传上下、回纥列传、吐蕃列传上下，继续保留了南蛮西南蛮列传、西戎列传、东夷列传、北狄列传。突厥、回纥、吐蕃定位为四夷之外国。《新唐书》则有北狄列传、东夷列传、西域列传上下、南蛮列传上中下，东夷列传中高丽、百济、新罗、日本、流鬼并列。关于日本的记述决不多。在此才见到天皇系图，中国正史由倭完全替换为日本。《宋史》将倭国和日本国并列于八个外国列传的第七个，在此也记录了历代天皇的年代纪元。《元史》仅有三个外夷列传。其中一个在高丽、耽罗（济州岛）之后加入日本。《明史》在九个外国列传的第三个单独记述了日本。这是第一个独立的日本列传。仅此即说明日本对明的重要性。

中国历史教科书所见有关倭与日本的记事，多引自上述历代正史的东夷传。现代历史教科书也记录了传统正史的风格。例如，中国历史教科书的隋唐史，分别叙述了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友好的对外关系。在讲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时讲述了突厥、回纥、靺鞨（渤海国）、南昭、吐蕃的历史，在讲对外友好关系时，记述了从新罗、日本、东南亚、印度、中亚、西亚到欧洲、非洲的广阔世界。

但传统正史的华夷思想与现代的多民族史观（中华民族史观）的确存在差异。靺鞨、渤海在《旧唐书》《新唐书》归入北狄列传，现代历史教科书纳入唐的版图加以说明。这解释为中国史不是汉族的历史，而是多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思想不仅是中国的。日本古代尤其八世纪大宝律令以后也自称中华、无册封，视唐为邻国，新罗或渤海为藩国。²⁵

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对也是八世纪登场的两个人物的处理方式既是对照也是象征。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或朝衡）作为遣唐使的留学生渡唐，在玄宗皇帝治世成为安南节度使，他的事迹主要记述于世界史教科书中的唐代，另一方面奈良时代渡至日本传授戒律的鉴真的事迹则在日本史的教科书中记述。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中，对 17 岁渡唐滞留 50 年没有回国的

²⁴ 和田清、石原道博编译《新订魏志倭人传、后汉书倭传、宋书倭国传、隋书倭国传》，岩波书店，1951 年。历史学研究会编《日本史史料》[1]古代，岩波书店，2005 年。

²⁵ 石井正敏《東アジア世界と古代の日本》，山川出版社，2003 年。

阿倍仲麻吕和第六次才完成渡航没有回唐的鉴真和尚作为日中友好交流的象征性贡献者而并列登场。也有些教科书以吉备真备或空海取代阿倍仲麻吕登场。

在遣隋使、遣唐使之前的五、六世纪，古代日本通过朝鲜半岛接受中国文化。虽然向中国南朝、隋唐派出外交使节，但最早接受中国文化的通道是通过来自朝鲜半岛百济的渡来人。汉字、儒教、佛教、医、易、历等文化都是从朝鲜半岛的百济传过来的。王仁传来《论语》《千字文》，百济的五经博士、易、历、医博士也渡海至日。百济以外还有高句丽僧昙徽传来纸张。这些在日方的《日本书纪》中有记述，日本史教科书也有反映。韩国的历史教科书言及与中国南朝交流的百济将佛教传至日本。然而看一下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完全缺失了中国文化传向东亚世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关于东亚的记述。从倭奴国向后汉朝贡突然转为隋唐时期的日中交流史。中国的教科书重视记叙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还强调佛教兴盛对西方文化更加关心。关于中国南北朝向东亚的文化发送则完全没有记述。日本史的教科书虽言及倭向中国南朝派出外交使节，但没有涉及到从南朝接受了中国文化。

中国的教科书说，南宋时经海对外交流旺盛，中国的绢织、陶器、茶叶等输出到日本，进出日本的商船频繁。这以宋代造船技术高超为背景，也发现了航海的沉船。

中国将元朝描绘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且言及元朝与日本的关系，进行了经济文化交流，佛教和饮茶风习盛行日本，但对日本史重要的元寇完全没有记述。在《元史》外夷列传一的确记述了元世祖通过高丽向日本送国书，其后至元十一年（1274年）七月九百艘船、1万5千士兵远征日本但失败，至元十八年（1281年）再次派10万人至日失败。但是，传统正史外国传关于日中关系的重要记述没有活用在教科书中。不采取将元定位于中国史上的征服王朝的观点，也未提到高丽服属和远征日本。十三世纪的东亚史以元的活动为中心，不应忘记高丽服属、南宋灭亡、二次派遣日本远征军，这些都密切相关。

关于十三至十六世纪的倭寇，日中两国的历史教科书的记述不同。顺便而言，这些与韩国的教科书也不同。日本的日本史教科书记为，倭寇是在朝鲜、中国沿海活动的海盗和商人集团，十四世纪前期的倭寇主要是日本人，十六世纪后期的倭寇主要是打着倭寇旗号的中国人集团。王直（？—1559）是代表后期倭寇的中国系海盗的领袖，以日本的松浦等地为根据地袭击中国本土。李成桂是击退倭寇的武将，推翻高丽建国朝鲜。中国的历史教科书言及戚继光取得了抗倭斗争的胜利，但也有的教科书未触及东南沿海的不法商人勾结倭寇，甚至没有举出王直的名字，也没有触及倭寇对明的影响之大。但《明史》日本传的倭寇记事详细，可看到命令日本国王义持（足利义持）取缔之等等。明代的《筹海图编》记述了安徽出身的王直聚集了越境的人们，以五岛、松浦为据点，掠夺浙江、福建沿海城市。中国的历史教科书完全没有积极评价海域商业活动的视点。²⁶海洋始终只是禁止中国人贸易、限制外国人贸易的世界。

四 中国文明与东亚之海

前述日中声明中有一段是“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国，具有友好传统的悠久历史”。一衣带水原本是说像一根衣服带子一样狭窄的河流，是远至隋文帝时的语言。²⁷这成为形容日中之间所隔之海的语言。其文意即两国虽因海而隔，但此海像带子一样狭窄，因而具有了悠久的友好的历史。但一衣带水是象征性的语言，并不表示对现实之海的关心。

对日中之间所夹的现实的东亚之海的认识，发生了历史性动摇。尤其进入近代，领海只有3海里（5.55千米）的时代没有发生围绕海上国境的纷争，但1970年以后领海变成12海里（22.2千米），还有200海里（370千米）的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权和海底资源的开发

²⁶ 村井章介《境界をまたぐ人びと》，山川出版社，2006年。

²⁷ 《南史》陈后主纪。

权主张，因此事关领海等的海洋问题成为国际间摩擦的起因。²⁸

从被海包围、散在海上的列岛的视点回视日本这个国家形成的过去的历史，其周边的东亚世界就是东亚之海。另一方面，认为中国文明原本是内陆文明，与海洋无缘，这种认识很强烈。中国人自己也有从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对比中把握中国的观点，在自我反省中华文明的早熟性和近代后退的“河殇”中，海洋文明象征着外在的欧美工业文明。²⁹反之，也有从脱亚的立场议论日本与欧洲的海洋文明的优越性者。³⁰

从四方围海的日本看中国时，不能单纯地看做内陆文明，而应看到内陆与沿海并存的中国多样化历史环境。同样，从面向大陆东端海域的中国看日本时，也应认识日本列岛社会的多样性。而且应认识双方的多样性文化与历史，在双方共有与关联的历史环境中产生。

在日本与中国乃至东亚世界，考虑古代、中世、近世的共有和关联时，应将视点置于成为东亚世界史舞台的东亚海域，这一立场是重要的。近年日中共同历史研究日方委员、东京大学的小岛毅主持的文科省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特定领域研究“东亚的海域交流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有百名以上的研究者参加，笔者也主持了“东亚海文明的历史与环境”这一日中韩三国间的共同研究课题。³¹

中国东方的海岸线达 32000 余公里，面临四个海（中方称渤海、黄海、东海、南海），有 6500 个以上的岛屿。与四方围海的日本列岛的海岸线 33889 公里、岛屿 6852 个相比，中国决不应称为内陆国家。中国地形西高东低，源自西部的西藏高原的两大河流黄河和长江流经 6000 多公里注入东之海。可以说中国文明的起源是黄河和长江的中下游平原地带。³²黄河也曾以河南省郑州或开封为顶点北至天津附近南经淮水到达长江。黄河自海拔 100 米以下形成一个面积广大的扇型地，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连。华北平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相连，被称为东方大平原。³³从北端的北京至南端的杭州，京杭运河贯通了这个平原。隋炀帝时开凿的运河是其基础。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秦汉隋唐以内陆的长安或洛阳为据点统治东方大平原，但北宋以后的统一王朝在大平原的开封（汴京）或北京建都。元明清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距渤海只有 150 公里。中国中央部的中原正在大平原上，在这个平原上的城市国家间的兴亡诞生出中国文明和统一帝国。应认识到日本与中国的交流，不仅仅是海港城市间的交流，也是与这个广大地域的交流。海港城市是海域网络的据点，此网络也向内陆扩展。至少在隋唐以后，水上交通网从沿海扩展到内陆大平原。

回顾东亚海域的历史时，以往注目连结海港与海港的航线。前期遣唐使当初取北路如唐，即从难波津、博多津出发，从朝鲜半岛进入山东半岛的登州。但八世纪以后的后期遣唐使因与新罗关系恶化而取南路，即直接横渡东支那海进入扬州或明州（宁波）。一行到港口时多在地方城市等待，一部分走运河北上长安。³⁴圆仁的《入唐巡礼行记》记录了仔细观察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区中原的状况。

中国古代的水上交通之发达超过想象。是战时输送士兵和粮食、向长安、洛阳等内陆首都圈输送粮食使水上交通发达。秦为进行与匈奴和百越的战争从山东溯黄河向北输送 30 万士兵的军粮，南修筑运河灵渠搬运 50 万士兵的军粮。不久，运河连接了黄河和长江。隋为将江南的谷物运送至首都圈，开凿了通济渠和广通渠，为对南朝的陈或高句丽采取军事行动，在南部开凿了山阳渚，在北部开凿了永济渠。1999 年在安徽省淮北市发掘出隋唐时代

²⁸ 山田吉彦《日本の国境》，新潮社，2005 年。

²⁹ 苏晓康编、鹤间和幸译《黄河文明への挽歌 「河殇」と「河殤」論》，学生社，1990 年。

³⁰ 川胜平太《文明の海洋史観》，中央公论社，1997 年。

³¹ 鹤间和幸编著《黄河下流域の歴史と環境 東アジア海文明への道》，东方书店，2007 年。

³² 鹤间和幸编著《四大文明 中国》，NHK 出版，2000 年。

³³ 历史地理学者邹逸麟使用华北大平原、黄淮海平原的用语。《椿庐史地论稿》，天津出版社，2005 年。

³⁴ 王勇《唐から見た遣唐使 混血児たちの大唐帝国》，讲谈社，1998 年。古瀬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国》，吉川弘文馆，2003 年。

沉没在通济渠的 8 只船。最大者是总长 24~27 米的大型船。³⁵黄河、长江下游流域发达的水上交通网，扩展了两大河流入的东亚海的航线。

中国发生政治混乱时，居住在大平原的许多人渡过东亚海，传来大陆的文化、技术。徐福传说是其象征。徐福到达日本列岛的传说只能追溯到十世纪。内陆国家秦统一了中国，东方六国中除中原的韩、魏、赵以外，燕、齐、楚是海域国家。将统一天下换称为四海合并，也是因为充分意识到海域。古代东亚各国一旦产生，则有外交使节和留学生渡海访问中国。推定渡唐的遣唐使船总长 30 米，宽 9 米，载重量约 150 吨。一艘船载一百数十人，除水与粮食外，还要装载运往中国的土产品。

十三、十四世纪南宋、元代的交易船满载中国制瓷器沉入东亚之海。其海下遗迹广至渤海、黄海、东支那海（东海）、南支那海（南海）。扩展至长崎鹰岛冲、韩国新安冲、中国辽宁省渤海沿岸绥中县、福建省泉州湾、同福州市平潭县碗礁、广东省川山群岛冲、西沙群岛。³⁶近年海洋考古学的发展探明，中国龙泉窑、景德镇窑生产的青瓷、白瓷作为交易品渡海。东亚之海成为新的海上交易的舞台。沉船显然与古代船不同。新安冲的船，长 28 米，宽 6.8 米，船体内部隔为七个仓，将瓷器或胡椒装入今天的集装箱一样的木箱，装载得很整齐。船联结海港，而装载的商品有力地联结着地域。

现在我们开始充分认识到，在这种东亚的自然现象中没有国界。黄砂这一自然现象再次教育我们，日本列岛与中国大陆成为一个连锁、连动的地域。黄土高原因砍伐森林造成的环境变化，也影响了黄河水量的增减或出现洪水。黄河出现洪水时，在东方大平原如龙一般大大改变流径。黄河下游历代的河道变迁，也对东方海域的环境造成影响。黄河长江下游与东亚海之环境，才刚刚开始研究。仅黄河和长江，分别每年流入海里 12 亿吨、5 亿吨淡水和泥沙，这必然对海水温度和水产资源带来大的影响。将环境纳入视点，就能明白围绕东亚海的地域正应是共存的世界。历史学者的地域认识好像迟于自然科学者。现在，古代、中世、近世这一时期划分，不是寻求社会发展阶段的共有。由于同一时代的物或人的流动而共有时代，这才是重要的，有必要首先搞清楚这一历史。

结语~对共有前近代历史认识的展望

在此谈一下日韩共同历史研究作为日中共同历史研究的参考。日韩共同历史研究在 2002 年 5 月开始，经过 3 年时间的热烈讨论，于 2005 年 11 月提出报告书 4 册。³⁷古代史的第一分科选题是四至六世纪的日韩关系史，讨论了“广开土王碑”、《宋书》倭国传、《日本书纪》等史料的性质。第二分科选题伪使（赴朝鲜王朝的伪装成正规使节的使节）、文禄、庆长之役（壬辰倭乱）、朝鲜通信使，在整理研究史的同时日韩双方发表了专门论文。前近代的日韩关系比日中关系直接的军事冲突更多，达成共识难，但认识到确认双方历史认识的不同具有的意义。

参加者之一滨田耕策说，不是将关系史作为与对手的一对一的关系，而是组合多方面的关系进行考察，这是不可缺少的。滨田还反省道，应研究古代东亚日本与韩国在国家形成、经济、社会、文化形成方面结成了什么样的相互关系，提议不是将视点置于中国或日本，而是构想立足于古代朝鲜半岛各国的国际关系史。做出这样的反省，是因为古代日韩关系比日中关系更直接，日韩研究者的认识差距更大。

日韩两国由日韩共同历史教材制作组出版了《日韩共同历史教材 朝鲜通信使 从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到友好》（明石书店，2005 年）等。历史教育研究会（日本）、历史教科书研

³⁵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淮北市博物馆编《淮北柳孜运河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2 年。

³⁶ 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编著《西沙水下考古 1998~1999》，科学出版社，2006 年。碗礁一号水下考古队编著《东海平潭碗礁一号出水瓷器》，科学出版社，2006 年。

³⁷ 日韩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日韩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财团法人日韩文化交流基金，2005 年。

究会（韩国）编《日韩历史共同教材 日韩交流的历史 从先史至现代》（明石书店，2007年）、历史教育者协议会（日本）、全国历史教师之会（韩国）《日本与韩国、朝鲜相向的历史 前近代编上》出版，切实推进超越国家的历史认识。

我们充分认识到将东亚历史分为日韩关系史和日中关系史从而失掉了整体性。近年日中韩三国之间有编写东亚共同历史教科书的动向。2005年日中韩三国共同历史教材委员会《开拓未来的历史——东亚三国近现代史》（日本：高文研，韩国：韩教联新闻出版部，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分别出版）在三国同时发行，历史教育者协议会编《东亚世界与日本》（青木书店，2004年）也是东亚世界中的日本通史。《开拓未来的历史》以记叙近现代史为目的。关于前近代，仅在序章“开港之前的三国”简单涉及。其成员也没有前近代史专家加入。对欲把握具有固有传统和文化的三国友好及战争的历史，应予以评价，但更期待个别的具体的记述。还有东亚历史教育研究会（代表东海大学名誉教授藤家礼之助）也与三国的历史家合作，1996年以来争取撰写东亚共同历史教科书《东亚的历史》即将公开其成果。由东亚世界成立的基础、东亚世界的形成、东亚传统社会、东亚世界的新生四部分组成，三部分是前近代。据说代表藤家礼之助要超越一国主义史观，整体把握东亚，将“国家”相对化，降低国家权力的屏障，争取写成未来的“东亚共同体”通用的教科书。³⁸

东亚历史上国家兴亡，其领域不见得与现在的国界重叠。古代国家高句丽跨越中国的东北三省和北朝鲜和韩国，渤海也跨越中国的东北三省、北朝鲜和俄罗斯。中国古代的统一王朝是以中原为中心而小于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日本现在的领域是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明确形成的。把握形成现在的领土的历史当然是重要的，但如果被现在的国境线或一国史观所约束，就不能动态地把握过去的历史。

日本的世界史教科书中说明，将高句丽史既不是作为中国史也不作为朝鲜史，而是作为东亚世界的地域史对待。秦汉帝国崩溃后，中国南北分裂的时代，朝鲜半岛迎来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时代，日本列岛的大和政权也深深与之相关。在此需要超越国家框框的地域世界史的观点。

现在我们两国的历史研究者进行的共同历史研究，讨论二千年日中两国的历史的意义，其成果总会作为共同历史认识对撰写教科书发挥作用吧。

我们提议，在东亚世界乃至世界史整体之中重新观察日中历史。以日本的日本史研究或中国史研究学界取得的成果为根本，与中国研究者展开讨论，构筑新的历史像。我们历史学者追求尊重相互的历史文化的平衡的历史认识。

³⁸ 藤家礼之助 《『国家』—中国大陆と西太平洋における戦争の時期に少年時代を過ごし、いま歴史学という専門分野に携わるものとして—》，《唐代史研究》第10号，2007年。

第一部 东亚国际秩序与体系的演变

第一章 七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创立

川本 芳昭

引言

7世纪的东亚以隋朝远征高句丽为发端的动乱拉开序幕，不久便如隋朝的灭亡、唐朝的建国和扩大以及与之相伴的朝鲜半岛各国兴亡般眼花缭乱地变动、展开。其变动不久便随着新罗对朝鲜半岛的统一、日本古代国家的完成、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构筑而逐步形成。

这样形成的国际秩序与以前秦汉魏晋时代的国际秩序相当不同。究其原因，7世纪的国际秩序具有下述性质，即建立在后汉末、魏晋以降出现的东亚各民族自立化动向以及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各民族融合的基础上。

因此本章首先论述标题所揭示的7世纪东亚国际秩序通过何种过程出现，其次在此基础上阐述7世纪东亚国际秩序的实际状态。另外，鉴于共同研究的性质，本章的考察将主要焦点放在日本与中国的关系上。

1 倭国“自立化”的过程

通常认为公元100年前后倭国诞生，¹ 107年倭国王帅生等向后汉王朝遣使是为向后汉告知此事。其后239年卑弥呼向曹魏派遣使节，并接受亲魏倭王的称号。此时作为倭国王的卑弥呼抓住曹魏向辽东扩张的时机遣使，是其对辽东公孙氏政权被曹魏消灭事件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作出的冷静判断。² 结果其接受亲魏倭王的称号，按照册封体制的逻辑则意味着其成为当时魏明帝的臣下。

现存魏晋时代倭国与中国间政治性交涉的史料，没有266年（《日本书纪》神功皇后纪66年条中所引《晋书》起居注）以后的记载。即在266年以后的倭五王时代，倭国与中国的外交往来断绝（但266年后的3世纪下半叶有可能继续往来），³ 再度恢复则是东晋末413年以后的事情。⁴

东晋末再度开始向中国遣使的倭国在南朝宋时期，中国南朝宋皇帝赐予倭国王称号，其后到宋末的478年为止，不断派遣使节。其事可从《宋书·倭国传》的记载中看到，此时倭国王明确认识到是中国皇帝的臣下，例如在478年倭五王最后之王的倭王武向宋顺帝送呈的上奏文中向顺帝称“臣”。⁵

但日本关东埼玉县的稻荷山古坟以及九州熊本县的船山古坟出土、认为是倭武王（获加多支鹵即 wakatakeru）时代的5世纪下半叶铁剑及铁刀中刻有各种铭文，其中有“治天下”的记述，⁶ 表示5世纪下半叶的倭国王也是治理“天下”的王。许多研究者赞成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文抬头的辛亥年是公元471年。也就是说，《宋书·倭国传》中倭王武向顺帝送呈上表文的478年之前的471年，倭王武称“治天下大王”，治理“天下”。

众所周知，天下意味着依四海区划的世界，有时也是称呼中国的词汇。⁷ 正如478年倭王武“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祚，躬擐甲冑，拔涉山川，不遑宁处。东

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所示，倭王武将自己治理的倭国理解为属于天下的区域，将平定不服从自己的“毛人五十五国、众夷六十六国、海北九十五国”之事与宋的“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相连。

换句话说，倭王武在上述上表文中将倭国平定“毛人五十五国、众夷六十六国、海北九十五国”看做是扩大“畿”（宋朝皇帝的支配领域），从中显示了将宋的区域、倭国的区域以及毛人国等区域作为“天下”的认识。

但如前所述，在日本国内出土的铁剑、铁刀铭文中可见“治天下”的表记。在中国的政治思想中，治理天下的只有接受天命的唯一天之子——皇帝。乱世中乱立数人天之际，他们以非正统攻击对手，以统一天下为目标，无非是为向天下显示只有自己是接受天命的正统统治者。从这一点来看，5世纪阶段的倭王武对内称“治天下大王”，对中国皇帝称臣，使用双重标准的政治姿态。⁸

2 4~6世纪朝鲜、中国出现中华意识

前述古代日本的天下意识很快发展为将日本作为中华的意识，同样的动向即在中国看来是“夷狄”的所建王朝标榜为中华的动向在同时代的朝鲜和中国也不断出现。下面按朝鲜及中国的顺序来分析。

三国时代的魏消灭占据辽东的公孙氏势力后，为确保新领土，244年派遣将军毋丘俭赴辽东，并征讨辽东背后的高句丽。通过这次攻击，在朝鲜北部扩张的高句丽虽然蒙受国都陷落、国王亡命等严重打击，但三世纪下半叶魏晋交替、晋国力衰退等，中国在辽东的势力衰弱，高句丽趁机再次开始扩张其势力。终于在313年占领前汉以来历经多年、作为中国王朝支配半岛的据点而发挥作用的乐浪郡，成功地将生产力丰富的西北朝鲜及其居住的汉人置于治下，其威势急速增强。

其后与在朝鲜南部扩张势力的百济展开激烈冲突，具有历史上著名好太王之称的高句丽王称“太王”，甚至使用永乐年号。采用这样的年号等明确显示高句丽在其国家的形成中将中国的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模范。

好太王去世后，继位的其子长寿王在414年建造了称颂其父功绩的著名好太王碑。好太王碑的第一面记载了高句丽的由来，“惟昔始祖邹牟王创基，出自北夫余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剖卵降世。· · · · · · 言曰：‘我是皇天之子’”，重要的是使用了“皇天”词语。因为其“天”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而是“以高句丽为中心的天”。另外，好太王碑记载了高句丽始祖邹牟王作为天帝和河伯女郎之子由卵而生等，也显示了高句丽所具有的独自神话世界。正因如此，碑文中“天”的内容，可以理解为与高句丽神话没有关系的中国“天”之内容的差异。

但在另一方面，必须注意高句丽神话世界使用了源自中国的“天帝”、“皇天”等用语加以叙述。因为高句丽神话世界通过中国思想这一过滤器加以讲述，从中可以看到高句丽自身接受中国文化，并用中国话语讲述自己神话的曲折侧面。

另外，在好太王碑的第一面有“百残新罗旧是属民，由来朝贡”，在第二面有“跪王自誓，从今以后，永为奴客。太王恩赦”等字样，因而高句丽的政治体制是以高句丽王为中心的“朝贡、跪王”的体制。⁹

从高句丽使用“跪王”、“奴客”等独特的用语来看，不能认为中国“朝贡”政治用语的

实际情况与当时高句丽“朝贡”实际情况完全相同。不过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建立好太王碑时的高句丽与百济臣服势力的关系用“朝贡”词语来表现。在以前的好太王碑研究中，使用这种词语认为很自然，但不可思议的是没有探讨“朝贡”这个起源中国的政治用语为何使用在并非中国的朝鲜之意义本身。但这个词语的使用显示了当时高句丽尽管存在着“跪王自誓”等独特的臣服礼仪，但仍以中国的政治思想为基础，将自己与百济、新罗等的关系看做是“朝贡”关系。

另外，在好太王之子长寿王时代北扶余地方官牟头娄墓中发现的墓志上，也有“天下四方”的表述。也就是说，这种基于中国政治思想的高句丽国家、高句丽社会形成的动向在好太王之子长寿王时代也得到继承，也接受了“天下”概念（但这个“天下”概念的接受或许在该时代以前）。

5世纪末位于朝鲜忠清北道中原郡、高句丽入侵新罗领地的纪念碑中原碑中，有“东夷寐锦（根据当时方言称呼新罗王的称号）”、“赐寐锦衣服”等表述。称新罗为“东夷”并赐予衣服等行为，不能理解为因高句丽本身接受中国将其看作东夷（东方的夷狄）的看法对同为东夷并臣服自己的新罗采取的相同行为。如前所述，高句丽使用年号、天下等用语，并将自己定位为接受夷狄朝贡的存在，即“中华”。换言之，因为此时高句丽将自己定位为“中华”的立场，所以将新罗看作本国东方的东夷（东方的夷狄）。

从中国政治思想出发而采用年号、“朝贡”并具有“天下”认识等方面来看，高句丽先于古代日本开始形成以高句丽为中心的“中华”意识。

由于篇幅的关系，不能详细分析上述“中华”意识形成的动向，但其并非仅产生在倭国和高句丽，也产生在古代朝鲜的百济和新罗。¹⁰ 然而，如果比较包括倭国在内的各国“中华”意识的形成，高句丽是各国中最早产生中华意识动向的国家，因为好太王碑建立在5世纪初，而且有高句丽独自的年号，其他国家其动向较晚。那么，高句丽形成这种中华意识的渊源是什么呢？

高句丽和倭国出现中华意识时代，与所谓五胡乱华体现的东亚动乱时代重叠。正如该时代骑马文化传来那样，其影响也波及朝鲜、日本，是文明圈范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时代。其动乱中心在中国华北，胡族和汉族之间展开激烈冲突。

在五胡十六国时代初期，汉族认为“自古以来，没有戎人成为中华世界之帝王者。有成为名臣或建立功业者……。”换句话说，胡族不能成为中华世界的帝王，最多成为被汉族支使的奴仆——名臣，当时出现这种歧视性言论。另一方面，胡族为对抗其言论，认为“为何成为帝王者是固定的呢？中国以前的圣天子禹和文王不是也出自夷狄吗？能否成为帝王取决于其志向和能力。”主张胡族也能够成为中华世界的帝王（《晋书·载记》）。

虽然当初在胡族君主中也有对冠皇帝称号犹豫者，但大多数还是倾向采用皇帝称号。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出现这种采用皇帝称号的趋势显示了他们接受中国政治理念，具有将自己定位为中华世界正统的意识。

因此，即使胡族也将自己视作中原正统、中华的动向也以下述形式得到体现，即用“王师（天子的军队）”称呼自己的军队（即胡族军队）（《晋书·载记》）。5世纪初，后来建立南朝宋的刘裕作为东晋将军，攻打在山东半岛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北燕，史书记载南燕皇帝慕容超引见群臣商讨如何抵御东晋军队。此时南燕官僚公孙五楼说：“因吴兵（东晋军队）敏捷果敢，所以应先发制人，攻打他们”。但慕容超没有采纳该建议，而是采用“笼城策”。此时慕容镇对韩諝（南燕尚书）说：“主上决定笼城策。……今年我国灭，我必死此战。你们

中华之士将再度文身。”（《晋书·慕容超载记》）该记载典型地体现出身为夷狄的慕容鲜卑已将自己视为中华。

此处所见“文身”是指南方野蛮人（南蛮）的风俗“被发文身”，其意识将定都江南的东晋当作南蛮，而且将南燕统治变为东晋统治看为从“中华”陷入“文身”境地。

出现这种表达可以显示鲜卑族慕容镇及其国家尽管是胡族建立的南燕，但将自己定位为“中华”，将汉族王朝东晋定位为“南蛮”国家。

这种动向在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其他国家也可看到，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显示出更为发展的形态。

记录北魏时期洛阳状况的《洛阳伽蓝记》有这样的记述：“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

这条史料记录了鲜卑拓跋部所建北魏迁都洛阳后设置“四夷馆”和“四夷里”，正如归正、归德、慕化、慕义等用语体现的那样，周边的四夷因慕北魏的正义和帝德或者王化而来到其都城洛阳，在此观念下命名其馆和居住区。即显示从鲜卑式汉民族中华思想来看，不过是“夷狄”的种族所建的北魏将自己定位为中华。

另外，记载北魏历史的《魏书》将南北朝时代与其对峙的南朝建国者称为“岛夷（住在岛上的夷狄）刘裕”、“岛夷萧道成”、“岛夷萧衍”等，将长江以南视为一个岛，将南朝各朝建国者称为居住其中的夷狄，这种现象与南燕将东晋当作文身之国一样，是中华意识的一种体现。

将这些事例与前述事例加以比较，即在古代日本形成以己为中心的天下、中华意识，同样的动向也出现在高句丽、百济、新罗等国，从使用年号和太王号等来看高句丽是其动向先驱等，尽管五胡所建在华北各朝中华意识的形成与古代朝鲜和日本其意识形成期也有时间上的重合，但显然其动向要早于古代朝鲜及日本。

然而，在成书唐之后北宋时代的《乐府诗集》（横吹曲辞条）及记录唐代之事的《旧唐书·音乐志》（北狄乐条）中，记有根据鲜卑歌形成的隋朝以后的横吹乐。即隋鼓吹部 32 曲以及继承其系谱的唐鼓吹部 15 曲，在隋唐时期是根据源自鲜卑歌《簸逻回歌》、《真人代歌》的鲜卑语歌辞演奏，并用为皇帝行幸时的卤簿行列和夜警曲，显示隋唐时期在皇帝权力的最近之处演奏五胡之一的鲜卑音乐。换言之，是向官僚、民众宣布隋唐政权的最早根源来自鲜卑族。即隋朝确立的鲜卑系鼓吹，到宪宗元和初年（806）礼仪使高郢建议废止为止（《唐书·仪卫志下》）经历二百多年，姑且不论能否作为权力的遥远根源与显示正统性，但为官僚和民众不断传唱。¹¹ 这一点与《资治通鉴》胡注中所述现象一致，“呜呼！自隋以后，名称扬于时者，代北之子孙（北方民族的子孙）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卷 108 东晋孝武帝 21 年条）。在《梦溪笔谈》中：“中国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卷 1），与前述五胡各国的天下、中华意识形成事实相应，是分析隋唐帝国性质时应依据的事情。

3 7 世纪初·遣隋使阶段倭国与中国的关系

如前所述，尽管古代日本、朝鲜的天下、中华意识形成与中国五胡各族建立各国时的天下、中华意识形成互动，但其动向受到更大的压力，该压力来自以五胡各国北朝为基础的隋唐帝国，在以“夷狄”为出发点上，隋唐帝国与五胡各国具有相同的性质。本节将探讨其与

遣隋使问题的相关部分。

倭王武 478 年的遣使是其最后派往中国的使节，直到隋开皇 20 年（600）断绝了 120 多年。《隋书·倭国传》中记载了开皇 20 年两国恢复交往时倭国使与隋高祖文帝之间的问答：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

日本著名的遣隋使、遣唐使研究专家增村宏认为倭国使的发言不过是因文帝问风俗而进行的回答。另外，大业 3 年（607）遣隋使小野妹子带来的国书中有“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隋书·倭国传》），将两者连起来考虑，开皇 20 年是皇帝与倭国使之间的问答，应与大业 3 年的国书加以区别。¹²

确实应加以某些区别，但是否可以将倭国派遣使者打破了倭五王最后遣使（478 年）以来 120 多年的沉默、其与重新统一中国的隋文帝之间、即与当时作为东亚世界之王的人物的问答仅仅看作针对风俗的回答吗？另外，能否将外交场合与访问国首领之间的问答仅仅看作为“问答”吗？

自倭王武 478 年遣使以来，时隔 122 年倭国再次遣使是在 589 年隋统一中国、结束西晋崩溃以后近 300 年的动乱、其统一的能量波及到半岛、高句丽与隋之间产生紧张局势下进行的。在如此紧张状况下，难以将外交场合出现的倭国使发言看做是单纯的问答。根据倭国使的回答，倭王是“天之弟”（因当时大王是推古，所以应是天妹），“日之兄”。众所周知，“天子”并不仅仅意味着“天之子”，还意味着受天命统治地上世界、君临天下的皇帝本身，“日”在中国是暗示皇帝的用语。¹³ 另外按照中国的家族制度，从身为天子的中国皇帝来看倭王为“天之弟”，则倭王相当于中国皇帝叔父、叔母地位的尊亲，如果从暗示“日”为中国皇帝的立场来看倭王为“日之兄”，则倭王是中国皇帝的兄长。¹⁴

也就是说，上述逻辑成为文帝说“此太无义理”的原因，于是如前引《隋书·倭国传》记载之末所见，文帝应对为“于是训令改之”。

从上述意识分析开皇 20 年（600）7 年后的大业 3 年小野妹子带给炀帝国书中所见“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记事。虽然以前的研究大多将这份国书的内容理解为显示倭国寻求平等外交的姿态，但从上述清楚的事实来看，可以进一步将其看作在大业 3 年派遣隋使时，倭国接受文帝的训令，进行了一定的让步、修正。因为大业 3 年小野妹子携带国书的内容，即使从炀帝看来十分傲慢，但以“日出处天子”、“日没处天子”的形式称呼双方为“天子”，没有将自己称为“天之弟”、“日之兄”。开皇 20 年将双方比喻为叔姪、兄弟般家族关系，但此时将倭王置于皇帝之上的姿态消失。在外交问题性质上，如果大业 3 年作为遣隋使到中国的小野妹子没有意识到 7 年前遣使之际文帝对倭国使说“此太无义理”并训令其改变天弟、日兄的主张，就不可能导致事关国家地位升降的外交事件。因此，小野妹子携带国书中“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表述是倭国依据文帝“于是训令改之”的命令而作成。

但根据前述《隋书·倭国传》所记，见到小野妹子携带的国书，炀帝：
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

其状态与开皇 20 年文帝与遣隋使问答时指出其不合理的情形类似。文帝“训令”修改其不合理性，但是否以文书的形式将“训令”交给倭国使尚不清楚。

在《隋书·倭国传》中记有小野妹子归国之际、与其同行至倭国的裴世清会见倭国王的

情景：见到裴世清的倭王非常高兴，“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裴世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¹⁵

另一方面，据《日本书纪·推古纪》的记载，裴世清来日时带来炀帝的国书，¹⁶另外《隋书·倭国传》记有会见、递交国书给倭王之后的事情：

其后遣人谓其王曰：“朝命既达，请即戒涂。”

虽然这些记载表明裴世清来日目的是为向倭国宣谕，但根据现存的《隋书》和《日本书纪》等史书，其中并没有“训令”之意，即炀帝认为“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的措辞无礼而“训令”倭国王。

据《隋书·倭国传》记载，文帝针对倭国使的回答说“此太无义理”。炀帝则是“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直接表明不快之情。将文帝和炀帝的反应相比较，炀帝不快之情表达更强烈。

那么，炀帝的“不快之情”是如何传达到倭国的呢？难以认为对小野妹子携带的倭国国书“不快”仅对遣隋使（小野妹子）表达而不需要向倭国中央传达。

但以往的研究完全没有分析这一点，即，尽管炀帝感到“不快”，但仍派遣裴世清是因为当时隋朝在对高句丽关系上，重视其背后的倭国。然而，这样的理解仍然不充分。因为文帝与炀帝相比，其对倭国的不快程度较轻，尽管具体状况不清，但如同《隋书·倭国传》所记，以某种所谓“训令”的形式表现出来：

高祖（文帝）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

与该问题相关，《日本书纪》也记载了应加以分析的事情。即《日本书纪》中一个奇怪的记载：在炀帝给倭国的国书中，除裴世清携带的国书之外，还有一份委托给小野妹子携带的国书，但小野妹子归国时在百济被盗。《日本书纪·推古纪》记载了推古天皇 16 年（608）6 月裴世清一行到达难波津时陪伴他们到达倭国的小野妹子上奏之事：

爰妹子臣奏之曰：“臣参还之时，唐帝以书授臣。然经过百济国之日，百济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于是，群臣议之曰：“夫使人虽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国之书哉。”则坐流刑。时天皇勅之曰：“妹子虽有失书之罪，辄不可罪。其大国客等闻之，亦不良。”乃赦之不坐。

从这个记载中并不能得知小野妹子了解炀帝委托的回书具体内容，虽然在此省略具体论证，¹⁷但不能不认为前面假定存在、来自炀帝的“训令书”。如果小野妹子携带的炀帝文书中没有训令，则非常难以理解当初炀帝为何将回书分别托付给裴世清和小野妹子的原因。虽然唯一可以想象担心丢失国书而将同样文书委托给本国使节和对象国派遣使节两个人，但笔者寡闻，尚不知在中国的外交上曾发生过如此事例。因此，难以认为这种假定实际存在。换句话说，裴世清和小野妹子携带的文书，其内容不同。如果不同，小野妹子携带的文书则包含了“训令”的内容。

如前所述，《日本书纪》所载小野妹子携带文书在百济被盗。关于发生这种事情，虽然有多种说法，但现在并不深究其详。¹⁸在百济被盗之说可以成立，也可以认为小野妹子和倭国中央废弃其书，但小野妹子肯定知道炀帝委托其文书中写有什么内容。另外，如果小野妹子知道文书内容，作为使节的使命，自然以某种形式将其向倭国中央进行传达，因而倭国中央也会知道其内容。也就是说，与国书是否遗失无关，可以认为小野妹子所携炀帝文书的内容传达到倭国中央。

否则，难以理解大王亲自下达救命推翻群臣对小野妹子失书所定的流罪，将其赦免。另外，《日本书纪·推古纪》中记有裴世清归国时事情：

唐客裴世清罢归。则复以小野妹子为大使。

不可理解的是，尽管小野妹子犯有丢失炀帝文书这种外交大错误，但不仅以破例的形式免其罪，而且在裴世清归之际，再度被任命“遣隋大使”派往中国。也就是说，圣德太子等倭国中央肯定意识到小野妹子所丢炀帝文书的内容是隋的“训令”。

4 倭国与唐朝“争礼”

前述记录裴世清归国时情形的《日本书纪·推古纪》继续写道：

唐客裴世清罢归，则复以小野妹子为大使，吉士雄成小使，福利为通事，副于唐客而遣之，爰聘唐帝。其辞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使人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至，久忆方解。季秋薄冷，尊如何。想清念。此即如常。今遣大礼苏因高、大礼乎那利等。谨白不具。”

从其中“天皇”、“皇帝”、“谨白”等表达可以看出，在这封国书中，倭王将隋朝皇帝视为前辈或兄长，再次主张其与隋朝皇帝的对等性。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首次使用了作为日本政治领袖的“天皇”称呼。¹⁹也就是说，天皇称呼首先使用在外交文书中，与过去的大王或大君在国内通用，且不久便在律令中作为天皇称号固定下来。

换言之，倭国基于本国以前形成的天下意识，派遣遣隋使之初采取“天弟、日兄”的立场，接受文帝的训令后，冠以较为缓和、与隋天子对等的“天子”称号。但其后再次受到炀帝的“训令”，利用“谨白”等表达、将隋朝皇帝视为前辈或兄长处理其问题，在接受“训令”的过程中，到达使用“天皇”用语的阶段。

从中可以看到对结束南北朝混乱、重新统一中国的隋朝，倭国表示一定的让步，同时贯彻自我强硬的主张。从要求朝贡国遵守臣礼的中国立场来看，这种自我主张的贯彻是难以容忍的姿态。前述炀帝的不快也是从相同渊源政治理念中产生的。

因此，在这种形式下回国的裴世清可能再度引起隋朝方面的反感，但包括《隋书》在内的当时有关史料中并没有相关记载。虽然存在史料纷失的可能性，但可以想象与隋朝在征服高句丽的混乱中灭亡有较大关系。

另外在唐朝建国后的一段时间内，倭国与唐朝之间没有进行政治交涉，再度开始政治交涉已是唐建国十多年以后的事情。

《旧唐书·倭国传》中贞观5年（631）的记载：

（太宗）遣新州刺史高表仁，持节往抚之（倭国）。表仁无绥远之才，与王子（其他相关史料“王子”均为“王”）争礼，不宣朝命而还。

其“礼”是什么呢？其后的《大唐开元礼·嘉礼》皇帝遣使诣蕃宣劳条：

执事者引蕃主迎使者于门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使者称有诏。蕃主再拜。使者宣诏讫，蕃主又再拜。执事者引蕃主，进使者前，北面受诏书。……

在《开元礼》中，皇帝的使者出使蕃国时，使者对蕃国方的再拜不必回应，宣读皇帝的诏书，蕃国面北接受诏书。631年时与此相差不大。据《隋书·倭国传》，608年来日的隋使裴世清接受大礼哥多毗率领二百余骑的迎接进入飞鸟都后：

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

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

与倭王会面时，倭王自称夷人，裴世清回答宣谕。另外同样在《隋书·倭国传》中记载裴世清与倭王会面后的事情：

其后遣人谓其王曰：“朝命既达，请即戒涂。”

也就是说，裴世清已经传达朝命、即炀帝的命令，所以要回国。显示裴世清此时认为完成了作为使者传达“朝命”、即向倭王“宣谕”的任务。在前述《旧唐书》中高表仁其后得到“无绥远之才”的评价，并非在“争礼”之前，而是高表仁本人在“争礼”时尚未传达朝命。尽管如此，对于高表仁来说，引起“争礼”是在传达“朝命”之前针对倭国存在某些“非礼”行为的应对措施。从其作为唐使来日的角度看，难以认为其“非礼”仅仅是对使节个人的待遇如何，不得不考虑有关唐朝体面的问题。因此，与倭国产生纠纷，未传达“朝命”回国，《旧唐书》在此基础上将其作为“无绥远之才”。这样一来，如果特别注目《旧唐书》所述之事，其记为“高表仁坚持事关唐朝体面的‘礼’而引起纠纷，结果未传达‘朝命’就回国，因为其没有绥抚夷狄才能，对夷狄的绥抚有必要慎重考虑。”

但是，遣唐使在 630 到 894 年的 260 年间，计划有 18 次，其中实施 15 次。在 15 次的遣唐使中，归国时携带唐朝皇帝旨意的敕使一起来日的只有两次，即 632 年的高表仁和 778 年的赵宝英。也就是说，唐使赵宝英来日（但赵宝英遇难，实际来日的是其部下孙兴进）是高表仁之后一个半世纪。此时应以什么样的形式迎接唐使引起争论，与唐使一起归国的遣唐使判官小野滋野主张应以诸蕃国（新罗和渤海等）的礼仪接待，中纳言石上宅嗣则主张以蕃主迎接皇帝使者的礼仪迎接。

前述《日本书纪》和《隋书》中有关遣隋使的记载相互矛盾点较多，其真实情况如何不明之处也不少。²⁰ 但从这些矛盾以及上述唐朝使者赵宝英来日时的争论中可以看出，高表仁来日时的争礼是与开元令所说嘉礼有关，其中存在两者的体面问题。

5 唐、高句丽、百济、新罗的动向与白村江之战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时，开始以明确形式显示其方向性的北朝重新统一中国，虽然因北魏末年的动乱其动向一度受挫，但北周灭北齐统一华北后，其动向再次加强，直到由北朝最后的王朝隋统一中国。

中国重新统一前夕，隋取代北周建国（581），担心其强大的高句丽和百济强化与南朝陈的关系。当时隋朝在东亚保持压倒性的国威，但高句丽、百济出现其动向是因为面临来自强大隋朝的威胁。

589 年，隋平定陈，百济、新罗向隋朝遣使，成功地与隋朝建立关系。但与其相反，面临隋朝重新统一中国的威胁，高句丽努力增加军备，强化国防。

汉武帝设置朝鲜四郡以后中国对朝鲜半岛的统治在 313 年断绝，高句丽占领此前其统治朝鲜的据点乐浪郡。隋朝在经过 300 年混乱后实现中国重新统一，借其时机，对虽为藩国却不进行既定岁贡的高句丽予以惩罚的议论高涨。另一方面，598 年高句丽率靺鞨万余骑入侵辽西，607 年发现高句丽与隋朝北面牵制隋的突厥有联系等，隋与高句丽的关系急速恶化。

另外，朝鲜半岛的情况也从 5 世纪以前军事力量压倒百济、新罗的高句丽优势转为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以及无休止的对抗阶段。当初从三韩之一的马韩兴起的百济在其国王近肖古时期（371 年）具有攻占高句丽领土平壤的势力，但在阿华王时遭受挫折，作为前

述的“奴客”向高句丽太王下跪（396年）。接下来，475年遭到高句丽的攻击，濒临亡国的紧急关头。其后改革体制，495年百济王向南朝齐遣使，要求像对待高句丽、倭国那样对待自己，并要求赐予中国王朝的将军号和王爵等官爵，此时百济重新恢复势力。

另一方面，曾为高句丽属民的新罗（好太王碑第一面）6世纪初，如同在503年建造的迎日冷水新罗碑记载中至都卢葛文王称为智证王、在524年建造的蔚珍凤坪新罗碑记载中牟即智寐锦王称为法兴王那样，均为中国式、佛教式的称号。并且在法兴王23年（536），新罗创建自己的年号，称建元元年。此时，新罗在朝鲜半岛上构筑坚固的基础，并不断扩张其势力。

隋朝建国时，半岛的情况为三国之间展开激烈竞争但在中国则是朝着隋唐统一、扩张的方向发展。这一时期的中朝关系相互影响，历史逐渐演变为7世纪隋朝征讨高句丽、隋朝灭亡、唐朝建国、唐朝征讨高句丽、百济灭亡、白村江之战、高句丽灭亡、新罗统一半岛的结果。

612年，隋炀帝派遣号称二百万的大军征讨高句丽。从隋朝来看，其性质是惩罚企图与突厥联手的高句丽，同时也是回应来自新罗、百济讨伐高句丽的请求，两国与高句丽的关系趋于紧张。但高句丽在困守辽东城以及乙支文德指挥的醜水（清川江）之战中，成功击退了隋军。其后高句丽再三击退隋军的入侵，618年隋朝内部出现叛乱，唐朝建立。

其后朝鲜三国之间的抗争进一步激化，唐朝为构筑东亚国际秩序加强对半岛的干预。受其影响，泉盖苏文在642年弑高句丽荣留王，拥立宝藏王，完善临战体制，645年以后，高句丽曾五次成功击退唐朝进攻辽东。但665年泉盖苏文去世，其子之间产生对立，导致高句丽的战时体制发生混乱。结果，唐朝趁此机会攻打高句丽，经过隋以来60多年的战争岁月，668年成功消灭高句丽。

亦应称为古代日本国家形成之契机的白村江之战带有下述形态，即唐对高句丽作战的南部战线之战。

与唐朝情况不同，隋朝三度远征高句丽并进攻百济。但唐朝远征高句丽则带有冲击高句丽南方百济的侧面。其首先体现在643年唐太宗对前来寻求救援的新罗使者说：虽然百济恃海，但朕能以水军数万袭之（《新唐书·高丽传》）。但太宗时期唐朝的主要敌人始终是高句丽，虽然逐渐倾向与新罗联合，但未达到敌视百济的阶段。相反，唐朝在进行高句丽战争时，劝诱百济参加唐朝一方，该方针到太宗治世结束时也没有发生改变。

但新罗的金春秋完成与唐的同盟关系，并进行唐朝式的制度改革，甚至到高宗时期，新罗采用高宗的永徽年号，并引入唐朝制度，情况发生较大变化。

百济与倭国一样，南北朝时代与南朝保持密切关系，与北朝几乎没有交流。因此，处在不可能与作为北朝继承国家隋唐建立完全意义上的亲密关系的历史状态下。隋朝远征高句丽时，虽然表明支持隋朝，但并非出自本心，而是出自观望局势。另外隋朝讨伐高句丽结果自己灭亡，也对唐朝远征高句丽时百济的应对措施产生较大影响。即，百济认为唐朝进攻高句丽也非易事，可以利用这个时机讨伐宿敌新罗。可以认为，百济在这一时期停止对唐朝贡是上述意识发挥作用。

面对这种情况，唐朝宣告明确改变对百济方针是在永徽2年（651）。其记载见《旧唐书·百济传》中高宗给百济王玺书，其中一段为：

王若不从进止，朕已依法敏所请，任其与王决战；亦令约束高丽，不许远相救恤。高丽若不承命，即令契丹诸蕃渡辽泽入抄掠。王可深思朕言，自求多福，审图良策，无贻后

悔。

从中可以看出此时唐朝已经认识到百济与高句丽的勾结。

其发展的结果，百济在 660 年被唐朝消灭，众所周知，白村江之战是此时消灭百济、正在百济故地的唐军以及支援唐军的新罗势力与企图复兴百济的余丰以及支持他们的倭国军队之间的战役，倭国的军队在这场战役中蒙受毁灭性打击。在此次战役中，百济、倭国蒙受毁灭性失败的原因，研究者之间存在着对立的见解。倭国军队是杂牌军，没有充分统制，甚至反对统制的军队；比起救援百济来，倭国更希望趁此机会夺取新罗领土等。²¹ 但无论如何，此次战败使倭国自身也面临唐朝锋锐所及的深切威胁是难以改变的事实。

唐朝在其后的 668 年成功消灭高句丽，在其都城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但在高句丽遗民的复兴运动以及统一朝鲜半岛的新罗之间的战争中失败，676 年将安东都护府迁到辽东。

反过来看，唐朝远征高句丽是结束对高句丽的旧有遗憾，以恢复中国旧有领土等为其目的，但其目的中最重要的是构筑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新罗、百济甚至倭国最初就没有构筑以本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意图，当时这些国家的最大目标是扩大、保持自己在半岛的权益。因此，7 世纪各国间的抗争以新罗统一半岛终结。尽管如此，对唐朝来说，新罗是承认唐朝国际秩序的册封国，在此范围内是有利的结果。

另一方面，随着新罗统一半岛，来自唐朝的威胁减轻，倭国在临战状态下成功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律令体制，并制定了新的国号“日本”。

6 世界秩序的变化——魏晋南北朝与北朝隋唐

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可以广泛看到下述现象，即与中国建立册封关系（朝贡关系）的周边各国首领不仅得到中国王朝的爵位，还接受其官职，成为中国王朝的臣下。倭国王除得到王号外，还得到将军号和都督号，典型地体现了其现象。该时代中国王朝权力弱化以及中国王朝在其背景下进一步努力将周边各国纳入其体制的意图进一步推动了上述现象。

但在另一方面，从以胡族为首的各民族角度来看，其与各民族独立的趋势并行。后汉后期已经出现这种情况，例如匈奴、鲜卑等五胡移动、入侵，其后演变为五胡十六国成立、北朝出现，担心北朝扩张的南朝企图形成封锁北朝的国际性包围圈。450 年，北魏世祖太武帝发动 50 万大军攻打南朝宋，到达长江北岸时致书宋太祖，其中有“顷关中盖吴反逆，扇动陇右氏、羌，彼复使人就而诱劝之。……彼往日北通柔然（在蒙古高原），西结赫连（建立十六国之一夏国的匈奴赫连氏）、蒙逊（据有河西地带的匈奴沮渠蒙逊）、吐谷浑（在中国西部青海省之地的鲜卑），东连冯弘（十六国之一北燕之主）、高丽（高句丽）。凡此数国，我皆灭之”（《宋书·索虏传》），可以看出南朝宋时期的那种动向。但这种包围圈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渐崩溃，上述 450 年北魏南侵到长江北岸也对这种情况的产生起到较大作用。

现在引用具体事例分析以南朝为中心的体制衰退过程。在包括倭国在内的东夷各国向南朝派遣使节中，倭五王时代的山东半岛作为中继地发挥了极大作用，而且从 413 年起倭国开始向南朝派遣使节也与东晋将军刘裕消灭其地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南燕（410 年）并占有山东之地有关，不过山东半岛在 469 年正月以后成为北魏的领地。²²

北魏占有曾为南朝领地的山东半岛后立即开始建设。即在翌年（北魏皇兴 4 年）新设光州，五年后的延兴 5 年（475）设置军镇，进一步强化其统治。其后北魏以此为基地，严密监视向南朝朝贡的东夷船舶。

因此,甚至出现东夷各国派往南朝的使节和南朝派出的答礼使被在山东沿岸巡航的北魏船舶扣留之事。另外在皇兴3年(469)2月,柔然、高句丽、库莫奚、契丹等北亚、东北亚各国相继朝贡北魏,大概在东北亚地域各国向南朝朝贡时起到中心作用的山东于上个月陷落推动了派遣使节。反过来看,也显示了山东半岛成为魏的领地对东夷各国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另外,高句丽在2年后北魏孝文帝即位时,将贡品数量增加两倍也与山东陷落有关。

换句话说,在5世纪后半期,南朝希望在国际联合下封锁北朝的政策,其包围圈在东部战线被打破。

那么,其西部战线发展如何呢?当时在联结西部吐谷浑与河西走廊势力以及北方柔然势力上发挥较大作用的是长江上游的四川,但该地区在长期的南北斗争之后、即南北朝后半期进入北朝势力之下。西魏废帝2年(553)江南处在从北方前来归顺的胡族将军侯景引起的动乱中,当时作为征西大将军在四川的梁武帝第八子武陵王纪于552年8月率军东下,图谋湖南之地。在湖南的是武帝第七子湘东王绎(后来的元帝)对此十分担心,向北方的西魏求救,请求其从背后袭击四川。西魏决定派将军尉迟迥征讨四川,并在翌年3月出兵。虽然武陵王努力防守,但8月成都陷落,四川归北朝的西魏所有,南朝丧失了对抗北朝的国际战略重要据点四川。

在这一背景下,南北朝时代最终以北朝最后的王朝隋重新统一中国而告终。从南朝的立场来看,意味着以南朝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崩溃。

北朝的扩张、隋唐帝国的出现不仅对南朝产生影响。正如前述北魏世祖太武帝给宋太祖的信那样,以前与南朝联系或者处在其势力下的柔然、吐谷浑、云南爨蛮(在云南的南蛮势力)、高句丽、百济等势力到唐代相继灭亡。另一方面,在这些势力背后逐渐积蓄势力的突厥、吐蕃(在西藏兴起)、南诏(在云南兴起)、渤海、新罗、日本等发展起来。本章涉及的高句丽及百济灭亡、新罗统一半岛是典型事例。其动向是东亚范围内的动向,例如南朝时期担任南朝宁州刺史等并以昆明、曲靖为中心统治云南东部的爨氏势力与以大理为中心形成独立势力的张氏白子国势力在隋唐攻击下灭亡,南诏取而代之迅速兴起。

因此,倭国通过派遣遣隋使、遣唐使,实施国家制度的大改革,以白村江之战的战败为一个主要契机实现古代律令制国家,称“日本”国号,其动向不应仅在国内问题或者朝鲜半岛动向的范围中把握,而应在上述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动向中加以理解。

从身为夷狄的五胡中出现的北魏拥有表示与南朝同为正统王朝的北朝称呼,也为中国的士大夫所承认,注目继承北朝的隋唐成为中国正统王朝的逆转现象、隋唐文化及国家制度中呈现胡俗文化影响时,该时代的历史极其富有启示意义地展开,即从秦汉传承至魏晋的中国史核心至此一变,以前非正统之处产生的核心成为正统。

另外,在本章中笔者从中华意识形成的观点考察古代日本历史的发展,并将其轨迹与发展到五胡、北朝、隋唐的中国史相比较,从秦汉魏晋的秩序来看,虽然同为夷狄,但在各自成为“中华”这一点上(“从东夷的倭到中华的日本”与“从五胡到中华的变化”)两者呈现出相似的轨迹。在上述的基础上可以说这种类似的轨迹决不是偶然产生的类似,即五胡、北朝、隋唐和古代日本是具有相同侧面的国家群,即以秦汉帝国为母体,以接受其册封的形式在魏晋南朝体系中成长,在摧毁其体系的同时得以出现。从宏观视角把握时,7世纪东亚的国际秩序就是在这种过程中形成的。

- ¹ 参照西嶋定生《倭国の誕生》（东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 ² 参照大庭脩《親魏倭王》（学生社，1971年）。
- ³ 266 以降の 280 年，西晋灭吴，统一天下。其后到 4 世纪初的八王之乱爆发，西晋虽然中央不断产生混乱，但仍繁荣。因此，在 266 年至 300 年之间，具有倭国使者朝贡的可能性。
- ⁴ 该年高句丽也向东晋遣使。此时高句丽与倭国处在交战状态，所以也有说法认为这一年的倭国使是陪同高句丽的倭国俘虏。
- ⁵ 《宋书·倭国传》载：“顺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国偏远，作藩于外。自昔祖祚，躬擐甲冑，拔涉山川，不遑宁处。东征毛人五十五国，西服众夷六十六国，渡平海北九十五国。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叶朝宗，不衍于岁。臣虽下愚，忝胤先绪，驱率所统、归崇天极。’”
- ⁶ 辛亥年，七月中记。乎获居臣，上祖名意富比埵，其儿多加利足尼，其儿弓已加利获居，其儿多加披次获居，其儿多沙鬼获居，其儿半弓比，其儿名加差披余，其儿名乎获居臣。世々为杖刀人首，奉事来至今。获加多支卤大王寺、在斯鬼宫时、吾左治天下、令作此百练利刀、记吾奉事根原也。（稻荷山古坟出土铁剑铭文）
- 治天下获加多支卤大王世、奉事典曹人、名无利弓、八月中、用大铸釜并四尺廷刀、八十练六十拵三寸上好口刀。服此刀者长寿、子孙注々得三恩也。不失其所统。作刀者名伊太口、书者张安也。（船山古坟出土铁剑铭文）
- ⁷ 参照山田統《天下という觀念と国家の形成》（初发表于一九四九年，收入《山田統著作集》第一卷，明治书院，一九八一年）。
- ⁸ 该倭王天下并非仅指此时已属于倭国统治的区域，也包括前述“毛人五十五国、众夷六十六国、海北九十五国”。关于这一点，参照川本芳昭《漢唐間における“新”中華意識の形成—古代日本・朝鮮と中国との関連をめぐって—》（《九州大学東洋史論集》30号，2002年）。
- ⁹ 参照武田幸男《高句麗史と東アジア》（岩波书店，1989年）
- ¹⁰ 参照川本芳昭《中華の崩壊と拡大—魏晋南北朝—》（讲谈社，2005年）；前引《漢唐間における「新」中華意識の形成—古代日本・朝鮮と中国との関連をめぐって—》。
- ¹¹ 参照渡邊信一郎《隋文帝の樂制改革—鼓吹樂の再編を中心に—》（《唐代史研究》8号，日本唐代史研究会，2005年）；川本芳昭《鮮卑の文字について》（九州大学 21 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東アジアと日本、統括ワークショップ報告書，2007年）。
- ¹² 参照増村宏《遣唐使の研究》（同朋舎，1988年）130页。
- ¹³ 例如《后汉书·李固传》中列举李固的对策，其中记有“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
- ¹⁴ 《史记》卷 110《匈奴传》记：“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米植物各有数，约为昆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二十二史札记》卷 25《宋辽金夏交际仪》中记：“大概两国交际，每重仪节之间。澶渊之盟，宋为兄、辽为弟。”
- ¹⁵ 原文如下：“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
- ¹⁶ 《日本书纪》中所见炆帝国书原文如下：“其书曰：‘皇帝问倭皇。使人长吏大礼苏因高，至具怀。朕钦承宝命，临仰区宇。思弘德化，覃被含灵。爱育之情，无隔遐迹。知皇介居海表，抚宁民庶，境内安乐，风俗融和，深气至诚，远修朝贡。丹款之美、朕有嘉焉。稍暄、比如常也。故遣鸿胪寺掌客裴世清等、稍宣往意。并送物如别。’”
- ¹⁷ 参照川本芳昭《隋書倭国伝と日本書紀推古紀の記述をめぐって—遣隋使覚書—》（《史淵》141 辑，2004 年）。
- ¹⁸ 参照李成市《古代東アジアの民族と国家》（岩波书店，1998 年）305 页。
- ¹⁹ 关于古代日本“天皇”称号的出现，有推古时期出现说和天武时期出现说，现在支持后者的研究者较多。在其意义上，以后者的立场为中心，本文所引用的史料多认为是后世曾加以篡改。本文从外交的角度分析天皇称号的最初使用，因而站在前者的立场上。但这种看法与随着律令制确立、天武时代正式确立天皇称号的看法并不矛盾。另外关于古代的天皇制，参照大津透《古代の天皇制》（岩波书店，1999 年）。

²⁰ 参照前引拙稿《隋書倭国伝と日本書紀推古紀の記述をめぐって—遣隋使覚書—》。

²¹ 参照八木充《百済の役と民衆》(小葉田淳教授退官祈念会《国史論集》, 1970年)、鬼頭清明《白村江の戦いと律令制の形成》(收入氏著《日本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 校仓书房, 1976年)、韩昇《日本と白村江の戦い—政治決定と軍事行動》(九州大学 21世紀 COE プログラム: “東アジアと日本、国際シンポジウム: 東アジアにおける交流と変容”, 2004年)等。

²² 参照川本芳昭《倭の五王による劉宋遣使の開始とその終焉》(《東方学》76輯, 1978年, 收入氏著《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书院, 1998年)。

第二章 十五世纪至十六世纪东亚国际秩序与中日关系

村井 章介

前言

1402年，日本实质上的最高权力者足利义满被明朝建文帝册封为“日本国王”，距478年“倭五王”中最后的武被中国南朝宋顺帝册封为“使持节都督倭、新罗、任那、加罗、秦韩、慕韩六国诸军事安东大将军倭王”已过去900余年。

7世纪以后，日本古代国家的战略目标是实现能与各王朝平起平坐并高于朝鲜半岛各王朝的国际地位，8世纪初编纂的日本律令也是在此框架下构成。但中国和朝鲜均未接受其战略，不过是日本的一厢情愿。日本的统治阶层没有适应东亚国际社会的现实，而是通过拒绝与中国、朝鲜建立正式邦交的方式将保持观念上的原则作为传统的外交姿态。

那么，足利义满打破这一顽固传统的力量是什么呢？同时，在天皇朝廷存在的状态下获得“日本国王”这一地位对内、对外又发挥了何种作用？另外，在15到16世纪，日本与中国都经历了巨大的经济变动，其中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与丰臣秀吉以征服明朝为最终目标的侵略朝鲜战争乃至女真族统治中华是否有关？

本章对以上课题尽可能进行简洁、逻辑性论述。

1 编入册封体制

a 倭寇与“日本国王”

1368年明朝建国之际，中国东海沿岸地区猖獗的海盗成为严重的外交问题。朝鲜和中国称其为“倭寇”，实际上并不都是“日本海盗”，是以日本列岛西部为主要策源地、跨越国境以海域为活动范围的跨国性渔民与商民集团。在13到14世纪的东亚，跨越国境及海域的人、物、信息等交流甚至扩展至民间层次并十分活跃，在中国、日本的内乱背景下出现了倭寇。

在明朝向日本提出的第二封外交文书中，言及山东发生的倭寇事件，强调继承中华正统且谕“倭兵越海之由”，并警告如不能压制则派兵擒国王（《太祖实录》洪武2年2月辛未条）。此时与朱元璋争霸的方国珍、张士诚残党藏匿海岛，并有“勾倭为寇”的动向，明朝为防止沿海居民与“倭”联合而禁其出海（《明史》兵3海防）。这是具有明朝特征的海禁政策之始。对急需稳固政权基础的明朝而言，倭寇问题是与内政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明朝采取强硬姿态，不断对日本发起外交攻势。

当时日本王权分为南北朝的内乱已持续三十多年，传统外交窗口大宰府所在地北九州是与京都北朝、幕府势力对立的南朝征西府根据地。接待明朝使者的征西府怀良亲王（已故南朝创始人后醍醐天皇之子）最初按照传统外交观念拒绝了明朝的要求，但后来大概想采取以明朝为后盾对抗北朝的战略，向明朝派遣臣属的使节。1371年洪武帝封其为“日本国王”。有人认为明朝将不过是地方势力之首的怀良封为“日本国王”是因认识不足带来的错误，¹但元代以来中日之间人员往来非常频繁，明朝对日本应有相当的认识，因而明朝册封怀良为“日

本国王”的主要原因是认为其具备解决倭寇问题的能力。

但是，1372 年北朝的九州探题占领大宰府后，征西府迅速没落。为册封怀良来日的明使为九州探题扣留，立即将交涉的对象改为北朝、幕府，并在第二年到达京都。掌握京都政权实权的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派遣使节到明朝试图建立邦交，但明朝以义满无外交资格而拒绝。九州尚未完全平定，尚不充分具备解决倭寇问题能力也是义满受挫的一个原因。如果明朝军事援助册封为“日本国王”的怀良，幕府将陷入深刻的危机。因此，摧毁征西府、剥夺怀良的“日本国王”实质便成为九州战争的目标。

另一方面，明朝在征西府没落后也没有改变认定怀良为“日本国王”的态度，但 1380 年以谋反罪逮捕左丞相胡惟庸并对胡党分子进行大清洗，6 年后查明胡党分子林贤曾唆使“日本国王”助其谋反，洪武帝遂与日本断交。主流观点认为林贤与“日本国王”的阴谋为荒诞无稽，² 但 1381 年曾有四位日本僧人作为“日本国王”使节到明朝，被捕后流放到云南，其墓现存云南省大理市。³ 胡党分子亦曾试图联合蒙古残存势力“北元”共同谋反，怀良也想参与，并以此借助明朝力量扭转在九州的颓势，并将这一宏大战略称为“博戏”（《明史》外国 3 日本）。

义满在 1379 年再次试探对明建交，被拒绝后暂时专注巩固国内体制，其中一个措施便是平定九州。1381 年九州探题军在肥后大破征西府军。1383 年怀良去世，九州平定大体完成。但九州探题今川氏与本州西端的较大大名大内氏通过此次战争增强了实力，并通过向朝鲜半岛派兵讨伐倭寇或将倭寇俘虏送还高丽等活动独自登上外交舞台。对此戒备的义满在 1395 年罢免九州探题今川了俊，并在 1399 年以谋反罪之名讨伐大内义弘（应永之乱），直接控制九州，几乎全部消灭了可能的外交竞争势力。在此前的 1392 年，和平地将南朝融入北朝（南北朝统一），数次成为反幕势力旗帜的南朝消失。

义满的另一个措施就是迅速升高自己在朝廷的官位。1394 年，37 岁的义满升任为最高职务太政大臣，次年便辞官出家。急速晋升的目的之一是尽快脱离由天皇臣下构成的官职体系，可以避免明朝指责为“陪臣”。出家不是脱离俗世，而是可以超越世俗身份的形式。1401 年再次试探对明外交时，义满以“日本准三后道义”的称号。准三后意味着相当于皇后、皇太后、大皇太后的名誉称号，义满在 1383 年获此称号，道义是其法名。

b “日本国王”称号的意义

在明朝，晚年坚持对外消极方针的洪武帝 1398 年去世，嫡孙建文帝即位，情况发生变化。居北平（后北京）封为燕王的建文帝之叔（洪武帝之子）朱棣第二年叛乱欲夺帝位，明朝分为南京与北平两个政权（靖难之变）。⁴ 在两个政权冲突最激烈的 1401 年，建文帝违背祖父遗命，接待义满派到明朝的使节，并在第二年 2 月派使节到日本，册封义满为“日本国王”。在前一年，册封洪武帝时代被封为“权知国事”（临时治国者）的朝鲜国王。对建文帝来说，与朝鲜、日本建立关系是对抗燕王所不可缺少的基础。但为时已晚，1402 年 6 月燕王灭建文帝后即位（永乐帝）。

同年 8 月，携建文帝诏书的使节到京都，义满烧香三拜后接受诏书。次年，义满以“日本国王臣源”的名义派遣谢恩使与归国明使同行。当时考虑到明朝局势，携带分别写给建文

帝和永乐帝的两封表文，从中可以看出义满熟知明朝局势并灵活制定对策（最初能够抓住时机向建文帝派遣使节也许是收集情报的结果）。到达南京的使节立即变为即位祝贺使，上表永乐帝。永乐帝也即刻封义满为“日本国王”，遣使将冠服、金印等及 100 道永乐勘合送给义满。最早使用该勘合的遣明船在 1404 年到明朝，此为勘合贸易的开端。

支持武家幕府登上国际关系舞台的是人员基础。从南宋至元朝期间，随着中日贸易的活跃，很多日本僧人到中国修学、参观。13 世纪中期以后，中国僧侣也频繁渡日，交流变为双向。其中博多、镰仓、京都等城市建造了直接引进中国风格的寺院，培养了掌握中国文化的僧侣。握有镰仓幕府实权的北条氏与建立室町幕府的足利氏，作为装饰自我的新宗教权威而关注这些僧侣，并在外交方面发挥其能力。特别是与幕府关系密切、带有“官寺”性质的临济宗五山派起到幕府外交机构的功能。⁵

无论在 14 世纪后半期的倭寇时代，还是在 15 至 16 世纪的勘合贸易时代，起草外交文书以及担任外交使节者几乎都是以五山派为主的禅僧。对朝鲜外交也是一样。但有一次明显例外，即 1401 年义满向建文帝派遣的使节，当时起草文书与誊写的是以学问和书法为家业的贵族，正使、副使是义满信任的时宗（净土教系）僧人和博多贸易商人。可能因为当时禅僧是日本知识分子的代表，意外地受到传统对外观的强烈束缚，在义满策划破天荒的路线转换时难以起用这些人。

足利义满是否具有篡夺皇位的野心，近年多为否定性观点。⁶ 这些观点认为不会有这种愚蠢的行为，即不会冲击统治阶级的秩序意识而动摇好不容易建立的政权，从未出现的结果来看也只能以此为结论。

义满非常擅长诱导周围的人主动提出自己希望的东西并加以实现，这一点从其死后贵族们曾想赠予其“太上法皇”称号的事实中可以看出。另外，义满在重要法会上穿着法皇装束出席、为爱子义嗣以亲王的标准举行冠礼仪式等，从这些事实来看，自然认为在其心中已有使义嗣即皇位的计划。

但实现其目的则有难度。有人认为 1393 年后元融上皇死后，义满不仅实质上掌握了朝廷的人事，同时也掌握了形式上的官位叙任权，⁷ 但这是对史料的误读所致。义满不会勉强行事，他很可能采取接受周围进谏的形式以待瓜熟蒂落。但在 1408 年，义嗣的冠礼仪式刚结束，义满患急病去世，其 51 岁的生涯画上句号，没有能够实现其计划。

问题是义满被册封为“日本国王”与篡夺皇位计划是否有关？有人认为脱离以天皇为顶点的秩序体系的义满，希望以超越天皇的权威与明朝皇帝建立关系。⁸ 当时的贵族阶层抱有与中国对等的传统自尊意识，义满向明朝皇帝称“臣”不仅未能赋予其权威，反而刺激传统意识，招致猛烈的批判。尽管看起来义满尊崇中国的性情很强，但对其能够控制朝廷的政权来说，接受“日本国王”的册封只会成为不稳定因素。

通常，接受中国册封的东亚各国国王均明确表示臣服中国皇帝，并在国内统治中使用中国的年号和历书。当然，有时对中国的自立意识高涨时，周边各国也使用独自的年号。但在日本，接受册封本身就是例外，即使在中国化最突出的义满时代，国内也没有使用“日本国王”称号、明朝年号和明历的迹象。

虽然进入册封体系，但以天皇为中心的旧统治阶层并不认同“日本国王”称号为王权的主

体。继承义满的足利家长们（称为“室町殿”）对明朝自称“日本国王”，以日本王权的主体自居，对国内则不公开这种行为，而是承认天皇的存在。⁹ 1471 年朝鲜编纂的日本及琉球地志《海东诸国纪》中所收的“日本本国之图”，在“山城州”中并列标记“天皇宫”和“国王殿”。

2 勘合贸易与地域间交流

a 勘合与勘合贸易

义满死后，其嫡子义持成为名副其实的幕府之主，最初告知明朝继承“日本国王”并延续邦交，但 1411 年却驱逐来日的明使，断绝国交。不仅在朝廷有反对意见，而且在幕府和大寺院中也有批评义满对明臣服路线的势力。在其压力下，义持改变其父的方针。但义持的继承者——其弟义教在 1432 年恢复遣明使，到 16 世纪中期为止，共派遣了 11 次。¹⁰

在上述期间，室町殿对外继续称“日本国王”，但他们与义满一样，并不是将其作为来自中国的权威统治国内，而是继续对内对外两张面孔的做法。应当说在伴随册封的中国承认的“勘合贸易”中，“日本国王”发挥了日本唯一有资格者名义的功能。

“勘合”原本是在中国国内发给赴地方使节的通行证，将放在检验处的底簿与勘合上的印文相对照，以辨别使节的真伪。如前所述，1403 年永乐帝将 100 道勘合带给义满，其使用程序如下所述。¹¹ 同样的制度在日本以外其他周边各国与明朝之间也应存在，但能够了解其中细节的只有日本。

勘合是在特定纸张上加印两个并排的长方形红色印章左半部分，不是那种经常被误解的合符。印章的印文有“日字×号”和“本字×号”两种。在特定纸张上竖放另一张小一些的长方形特定纸张，在骑缝处盖上印章，印章的空格部分按顺序写上 1 到 100 的号码。印迹与墨字的左半部分留在特定纸张上，右半部分留在另外一页纸张上。将后面的 100 页纸张加以装订，称为“底簿”或“勘合底簿”。因为在特定纸张上两次并排按印，所以底簿也有两扇（束）。《戊子入明记》中所收宣德八年（1433）六月的礼部置文记载了勘合和底簿的放置地点：

日字号勘合及日、本二字号底簿两扇收留在此。本字号勘合及日字号底簿一扇，差人带至日本国交付，本字号底簿一扇发至福建布政司收藏（“字”、“此”两字作者根据句意补充）。

日字号勘合 100 道与日字号底簿、本字号底簿各一扇留存礼部。本字号勘合 100 道与一扇日字号底簿送至日本，一扇本字号底簿送至福建（可能是“浙江”的误写）布政司。“日本国王”交付每艘遣明船按编号顺序携带“本字 n 号”勘合一道，遣明使携带的勘合在日本船停泊港口宁波的浙江布政司和南京（后为北京）的礼部两个地方与“本字 n 号”底簿相对照，进行资格检查。日字号勘合、底簿的使用方法后述。

根据发行时期的明朝年号，勘合称为“永乐勘合”、“宣德勘合”等，规定皇帝交替、年号变更时返还未使用的勘合，交付新勘合。1434 年足利义教的遣明正使恕中中誓所持致明朝礼部的咨文（《善邻国宝记》下卷）记录了有关勘合的重要信息。

日本国，今填本字壹号勘合壹道，为谢恩之事，宣德捌年陆月初拾日，准礼部日字壹号勘合咨文，该钦差内官雷春等，赍捧诰命并给赐等物，勘合底簿，钦遵逐壹照数收领。……

今开。壹，谢恩表文壹通。贡缴永乐年号本字勘合伍拾漆通，同日字勘合壹百通底簿壹扇。……

如前所述，义教在 1432 年恢复对明外交，宣德帝接受其请求，翌年将册封义教为日本国王的诰命、恩赐物及宣德本字勘合 100 道、日字勘合底簿一扇遣使雷春送至日本。作为回应，义教派遣的谢恩使正使恕中携宣德本字壹号勘合赴明，同时将义满所得永乐本字勘合中未使用的 57 道与勘合底簿一扇均交给恕中，返还明朝。由此可知，到 1432 年为止，赴明勘合船共有 43 艘（减去 1432 年的 5 艘，永乐年间的勘合船数为 38 艘），同时还可以得知有关制度本身的重要史实。

第一，从明使携带礼部所发“日字壹号勘合咨文”与日字勘合底簿交给日本之事可以看出，日本方面也有对携带日字勘合底簿的明朝船只进行检查的制度。勘合制度不仅是对外国使节入明的规制，除一扇日字勘合底簿留在礼部这一点（其目的、功能不明）外，双方是相互的、对等的。第二，从“礼部日字壹号勘合咨文”这种表达方式上来看，可以认为勘合纸张上记载礼部咨文的文章（反过来说，写着咨文的纸张也用作勘合）。

遣明船由三艘至数艘组成船队一起赴明，正使必须携带“日本国王”写给明朝皇帝的表文。在前述咨文中也有“今差正使，携谢恩之表及进贡方物”。也就是说，勘合贸易仅被承认为伴随“日本国王”进贡的一种朝贡贸易。另外，勘合由“日本国王”保管，在其特定纸张上写有“日本国”呈明朝礼部的咨文，每船各发一道。因此，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即派遣遣明船者必须等待“日本国王”进贡的机会，同时也要从“日本国王”那里得到勘合。

遣明船贸易有 3 种形态，即进贡贸易、官方贸易、私人贸易。进贡贸易的物品由“日本国王”向明朝皇帝的进贡物与明朝皇帝对“日本国王”的回赐物组成，在整体贸易中所占比例较小；官方贸易是指明朝政府购买的货物，主要是刀剑、硫磺、铜、扇、苏木等，苏木是琉球将东南亚之物贩卖到日本后的再出口商品；私人贸易是在宁波、上京沿途、北京等地与民间商人进行的贸易，日本方面以铜、金等矿产品及从官方贸易中得到的铜钱为资金，主要购买生丝、丝织品、陶瓷器、书画等物品。顺利地话，刀剑和铜的贸易利润会达到原价值的 5 倍。公私贸易能够获得多少利润，多取决于使节的才智。《入明记》中记载了使节与各方交涉公、私贸易价格（尤其是官方贸易中的政府购买价格）的状况。

一般认为永乐年间的 38 艘勘合船全部是幕府派遣的“公方船”，但其实际情况因史料缺乏而存在很多不明之处，应当说“公方”以外的派遣主体也参与其中。这个时期的特征是日本遣明船通常与回国的明使一道赴明，归航时也与明使同行，明朝与日本之间存在着使节的往来。可以说，遣明船不只是追求贸易利润，也带有很强的政治性。¹²

“公方船”自 1432 年后逐渐减少，1493 年最终消失。明使到日本也只是在 1434 年，日字勘合的作用可能逐渐变成交付归航的遣明船、防止发生贪污回赐品等不正当行为（桥本雄的观点）。遣明船的派遣主体多为有势力守护大名及较大寺院神社，甚至包括“公方船”在内，实际经营者是商人。1467 年与 1483 年的“公方船”就是细川氏保护下的堺市商人所承包。

勘合船归航后，商人交给派遣者每艘船 3000—5000 贯文的“抽分钱”。抽分钱的计算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在回国后计算进口物资的价值，按照 10% 的比例缴纳；¹³ 另外一种是在出发时估算进口货物价值，预先缴纳 10%。与抽分语义相近的是前者，但后来更多采用后

一种方式。当然，如果采用后一种方式，即使估算额有误，缴纳额也不变。抽分钱之外的剩余是商人的收益，如果能实现预计的贩卖额，通常会达到 25000 贯文以上，利润率大约为 2.5 倍。¹⁴

因为贸易的利润相当可观，许多势力均希望参与，握有勘合的“公方”即使自己不派船只也可以获得“勘合礼钱”。其数额后期为每艘 300 贯文，三艘船总数大约为 1000—1100 贯文左右。

b 海洋亚洲的交流世界

东亚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不仅仅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及其贸易。下面以琉球为中心分析册封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周边各国、各地域组成的独自性交流世界。为什么选择琉球呢？因为琉球与周边国家相比，陆地面积非常小，但为中国、日本、朝鲜、东南亚各国所环绕，处在海路交通的要冲。如果以长江流域为分界线，将欧亚大陆东部划分为北面的内陆亚洲和南面的海洋亚洲，琉球正处在海洋亚洲的中心位置。

琉球充分发挥了优越的地理位置，通过海上贸易获得巨额财富，在未开化地域形成了比较早熟的国家。1458 年，在国王居住的首里城正殿所悬挂的大钟上，刻有如下铭文（冲绳县立博物馆所藏）。

琉球为南海之胜地，集三韩（朝鲜）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日本）为唇齿，是二地之中涌现的蓬莱岛。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之刹。

加速琉球发展的一个良机是明朝以倭寇问题为由制定了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的海禁政策（前述）。海禁的结果使明朝通过中国商人进口外国物产出现困难，结果形成了一个新体制，即在册封关系下，以琉球朝贡方式获得其物产。作为回报，明朝为琉球提供了许多便利，如许可随时朝贡、赐予贸易船、为其子弟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等。琉球与东南亚 8 个国家有邦交关系，将作为朝贡回报而从明朝获得的陶瓷器、丝织品等运往东南亚，交换苏木、胡椒等土特产品，以此作为对明朝的朝贡品，从而形成了一个循环过程。¹⁵ 日明勘合贸易中日本出口的苏木是琉球在东南亚购买并流入日本的一部分。

保存下来的大部头琉球外交文书集《历代宝案》记载了上述壮观的贸易活动。收入其中的外交文书副本按照中国国内使用的公文书样式，并用汉文写成。不仅是文章，连格式都忠实地模仿，是了解明清时代公文格式非常贵重的史料。¹⁶ 收入其中的大多数文书是有关琉球与中国册封关系的两国交涉状况，也有少量琉球与朝鲜、东南亚各国的交涉文书，由此可以窥见海洋亚洲繁盛的交流世界。

尽管在洪武至永乐年间，琉球与朝鲜之间的交往没有中介者，但 1431 年对马客商早田六郎次郎、1458 年吾罗沙也文（五郎左卫门）、1467 年博多商人道安、1470 年新右卫门尉平义重是外交文书的传递者。他们均为日本人，多数来自博多和对马。当初琉球船也积极参加东北方向日本列岛和朝鲜半岛之间的贸易，但倭寇势力逐渐夺取主导权。例如 1470 年通信到达朝鲜时，使节的名字以及所持外交文书的内容都变成完全不同的东西。其后到 15 世纪末，经常访问朝鲜的琉球国王使节都是倭寇势力派遣的“伪使”。¹⁷

另外，在琉球与东南亚各国的交往中，琉球因得到明朝支持而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在

琉球颁布的固定形式文书中明确写道：“为确保对明朝进贡之物品，积载瓷器等赴贵国，愿收买胡椒、苏木等后回国”，对送给贸易对象国的礼物只是附带提及。在交往的形式上，最初是琉球方面主动提出建立邦交，此后也是琉球船只赴贸易对象国，再将复信带回本国的形式占压倒性多数。东南亚各国船只到琉球的事例只有一、二件。

但在《历代宝案》中也有记载明朝册封关系没有直接规定的地域间交流情况之文书，其中琉球与 1428 年开放的旧港（苏门答腊岛巨港）之间关系是颇具启示意义的事例。¹⁸

1428 年，在琉球王相怀机写给旧港管事官的书简中记载了下述事情。1421 年，旧港施济孙派遣的 20 多名使节滞留在博多，“日本国九州官”涩川满赖（九州探题之父）将他们送至琉球，并请求送回本国。¹⁹ 但琉球没有熟悉到旧港海路的船长，于是将这些旧港人托付给赴暹罗正使闍那结制，然后再从暹罗送至旧港。由于一直未能确定是否送归，怀机便让此次赴旧港的使节携带这封书简。由此可以观察到九州探题——琉球国王相——（暹罗）——旧港管事官这些仅次于国王的高级官员相互联系及其人员按其路线移动的情况。

1428 年琉球国中山王在给旧港的咨文中写道“请允许收买胡椒等物，以备回国后向中国进贡”，与惯例一样，以获得进贡物为目的。仅从这一点来看，不过是明朝册封体制框架内的例行公事。

但偶尔保留下来的同日期执照（通行证明）²⁰所反映出的实际状况是：在旧港意图经营瓷器贩卖的“实达鲁”为顺利通过旧港官司的检查，请求琉球王府颁发“文凭”。琉球王府按照其要求，发给国王签署的咨文与执照，组成以实达鲁为正使的使节团……。实达鲁赴海外的主要目的是商业。²¹ 另外执照文中有“义字七十七号半印勘合执照”，琉球在与外国（包括明朝）的交往中以“半印勘合”作为资格证明。每当琉球王更替时，勘合上的字（使用千字文）也会更改，按照顺序从一号开始配发。因此，这种勘合不是明朝赐予，而由琉球自己设定。另外，这种勘合纸张记载的不是咨文，而是执照文（后来又加上符文）。

当时的旧港在形式上从属爪哇国（麻诺巴歇帝国），所以不存在国王，1407 年明朝船队统领郑和任命为“旧港宣慰使”的施进卿之子济孙在 1424 年继承宣慰使的地位。“旧港”国家实体是称为“爪哇国旧港宣慰司”的华侨集团，其首领是世袭宣慰使的施氏。因此，出于礼节上的考虑，琉球国王不出表文，而是由王相怀机与旧港管事官进行文书上的交往。怀机是个来历不明的人物，可能是定居琉球的华侨。这一事例显示了通常在国王间咨文中没有的仅次于国王的有势力者（以华侨等商人中心）之间的相互联系。

以上分析说明，琉球与东南亚各国间关系虽然为以明朝为中心的册封关系所覆盖，但越接近交流和贸易的实际情况，商业要素越占据优势。在交易时，琉球尽量避免同贸易对象国的官方机构进行贸易，而是争取以市场价格进行交易。在《历代宝案》文书中频繁出现这一时期琉球提出的两个口号，即“两平”（互相分享利益）与“四海一家”。

在《历代宝案》文书中，东南亚各国似乎很少主动派遣船只到琉球，但《海东诸国纪》的〈琉球国之图〉在那霸港篇幅中记载着“江南、南蛮、日本商船所泊”。在歌颂那霸港建设的名歌《祈求神佑》中有“唐、南蛮聚在那霸停泊”的句子。此外，还可以从 16 世纪欧洲、日本的史料中发现南九州、琉球与吕宋岛之间的船只往来。这些史料中的“南蛮”船形象在《历代宝案》所述以册封体系为中心的世界另一端变得模糊不定。

c 王权分裂与勘合贸易的变质

在永乐帝治世（1402—1424 年）期间明朝国力取得巨大发展，皇帝亲自到长城以北率军远征蒙古（1410—1424 年之间共五次）的空前壮举以及到达东南亚乃至非洲的郑和大航海（1405—1433 年之间共七次）是其象征性事件。周边各国均向明朝朝贡也是应强调的史实，朝鲜和日本也不例外。郑和航海的目的比起远征来，多为催促“南蛮”的朝贡。²²

永乐帝之孙宣德帝与宣德帝之子正统帝均实施扩张政策，但征服蒙古各势力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瓦剌部的也先通过连接东部明朝与西部帖木儿帝国之间的中间贸易而增强了自身实力，并以统一蒙古族为目标。也先曾要求大规模增加对明朝的朝贡贸易，被拒绝后于 1449 年大举进攻明朝。正统帝亲自率军出击，但在北京以北 100 公里的土木堡大败而成为俘虏（土木堡之变）。慌张的北京朝廷紧急立其弟为景泰帝渡过危机，但随后不久正统帝被释放并返回北京，兄弟之间展开激烈的争斗，1457 年兄长通过政变夺回帝位（天顺帝）。²³

其后的成化、弘治年间（1464—1505）是后代称赞为“盛世”的安定期，但经常受到蒙古势力的冲击，其他周边国家也出现脱离明朝统治的趋势。1411 年在黑龙江下流的帝鲁开设苏鲁刚都司，是负责接受包括阿伊努在内的少数民族朝贡的机构，但很快在 15 世纪中期停止其功能。²⁴ 15 世纪末到 16 世纪初，称为“建州野人”或“海西鞑子”的女真族向辽东地区渗透，威胁到通过辽东赴明朝的朝鲜外交使节安全（《朝鲜成宗实录》25 年 10 月丙辰条）。在山东也出现叛乱，1506 年从日本出发的第 14 次遣明船使节没有允许赴北京，1512 年在南京得到接待。16 世纪 20 年代从福建开始、到 50 年代达到顶点的倭寇骚乱（嘉靖大倭患）也是相同的动向。

同时代的室町幕府，在某些方面似乎走着与明朝相似的道路。幕府权力在义满、义持时代迎来鼎盛期，但实施恐怖政治的义教在 1441 年被臣下守护大名赤松氏暗杀（嘉吉之变）后急速走向衰落。山名、细川、大内氏等强有力的守护大名逐渐提高相对将军的独立性，将军架空在这些大名的联合体之上。

1467 年爆发的应仁·文明之乱持续十年，京都变为废墟，从将军家族和斯波·畠山等足利一门守护大名家族的后继人之争发展成幕府·守护两大体制。1490 年，占据 40 多年室町殿地位的足利义政去世，其侄义植（当时名为义材）成为将军。1493 年，细川政元通过政变驱逐义植，将义植的堂弟义澄立为将军（明应之变），从此将军变成细川氏操纵的木偶。1508 年，大内义兴拥护义植进京重登将军宝座，政元的养子高国与之合作维持政权，但在 1521 年驱逐了义植，将义澄的遗腹子义晴立为将军。义晴（1550 年 40 岁时死去）及其子义辉（1546 年 11 岁时袭将军职）长期占据将军职位，但与义植养子的义晴之弟义维、细川氏家臣三好元长、高国之侄晴元等相继对立，甚至不能在京都居住，义辉在 1565 年被三好义继所杀。²⁵

这种动乱直接影响到遣明船的派遣。1451 年出发的第 9 次勘合船队达到空前绝后的规模，船只 9 艘，人员 1200 名。但派遣者中没有公方之名，而是天龙寺（3 艘）、伊势法乐舍（2 艘）、大和多武峰寺院与九州探题·大友·大内等大名。经受“土木堡之变”教训的明朝，对遣明船的规模膨胀甚为担心，对其加以限制，规定十年一贡、船 3 艘以下、每船人员 100 人以内。这一时期，由于明朝压低购买价格，与使节团的纠纷明显化。

1465年出发的第10次遣明船携带成化勘合，两年后回国，但正值“应仁之乱”最激烈之时，新勘合为与幕府、细川氏对立的大内氏获得。但此前的景泰勘合没有返还，仍继续使用。堺市商人与幕府·细川氏派遣的1467、1483、1493年出发的第11至第13次遣明船均持景泰勘合。由于第13次遣明船新得到弘治勘合，所以在1506年出发的第14次遣明船返还剩余的景泰、成化勘合之前，日本同时持有3种勘合。由此可以看出，明朝并非实施严格的勘合制度，而且日本处在权力分裂状态，勘合的状态趋于混乱。

“明应政变”后的1496年第13次遣明船回国时，流浪越中的足利义植给大内、大友、岛津三人各自一船物资作为兵粮米，命令他们护卫自己进京（《大乘院寺社杂事记》明应5年4月28日条）。这种勘合贸易权力化产生了将勘合作为一种有价证券进行买卖的状况。1501年将军足利义澄的家臣告诉大友亲治有关其后勘合船派遣事宜，即第一次由将军派遣，第二次在义满百年忌（1508年）时将派遣权力给予相国寺，大友只好等待第三次。这是勘合的预约出售。其价格在义澄派遣的第14次遣明船时，3艘船共1100贯文，每艘为300贯文。²⁶

“应仁之乱”后的勘合船逐渐由细川氏和大内氏所垄断，细川氏与将军关系密切，参与勘合的分配，并以堺市商人为后盾；大内氏控制中日交通要地赤间关、博多，以博多商人为后盾。15世纪细川氏占据优势，尽管大内氏希望参加，但在1483年、1493年出发的遣明船中没有大内氏的船。不过第14次赴明船队由2艘大内船和1艘细川船组成，1513年归航时作为将军义植拥立者而掌握权力的大内义兴独得正德勘合。

结果第15次遣明船队3艘船均为大内氏船只，这些持正德勘合1—3号的船只在1523年入宁波港。细川氏与其对抗，派遣1艘船持5号弘治勘合赴明，迟大内氏船数日入港。细川氏船的副使为中国人宋素卿，他利用贿赂手段使细川氏船得到优先接待。对此感到愤怒的大内氏船员，杀细川氏船正使，烧毁其船，追杀逃跑的素卿，并杀害明朝官员（宁波争贡之役）。素卿被明朝官兵抓捕，后死狱中。该事件后大内氏垄断勘合贸易船，并在1538年和1547年两次持弘治、正德勘合赴明。1547年返还两勘合，1550年归国，但第二年大内氏走向灭亡之路，勘合贸易随之终止。

3 世界史的胎动

a 嘉靖大倭患

明朝与朝鲜、明朝与琉球之间伴随册封关系的交往仍在继续，但明朝与日本之间的交往随着勘合贸易的断绝而停止。尽管如此，中国东海上的交流依然频繁。走私贸易取代官方往来，物流的规模甚至更为扩大。嘉靖年间（1522—1566年）的“大倭患”就出现在这一趋势中。

1543年，大概是大友氏派遣的三艘船从种子岛出发，船队在中国东海遭遇风暴，1号船沉没，2号船与3号船返回种子岛（2号船返回种子岛是推测）。尽管第二年赴明成功，但只有2号船进入官方接待港宁波。《铁炮记》将这些船称为“贡船”，《日本一鑑》将使者称为“贡使”。三艘船组成船队是勘合船的形式。这些船似乎携带1501年“预售”给大友氏并很快交付

的3道弘治勘合。²⁷ 明朝以违反贡期为由拒绝接待唯一进入宁波港的2号船，但如果重视日本方面的意图，这一船队也应计算到“勘合船”中。

2号船并未直接从宁波返回，大概去了走私贸易基地——离宁波不远的舟山群岛内双屿，因为1545年其后称为倭寇王的中国人王直就是在双屿乘此船到达日本。没有发现3号船在宁波入港的踪迹，可能最初就是以走私贸易港为目的地。

由此可以看出，该遣明船队扮演了从官方交流到走私贸易这一戏剧展开的主角。另一方面，王直（大概从种子岛经丰后）到达博多，与“博多津倭助才门”一道回到双屿，²⁸ 1546年再次到达日本。《日本一鑑》将其记为“直浙倭患”即“嘉靖大倭患”的开端。

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摧毁双屿走私贸易基地，逮捕倭寇首领许栋，但王直逃走，萨摩人稽天和新四郎也同时被捕。这一事件激化了倭寇与官宪的对立，其行动半径扩大化、暴力化。王直在日本列岛西端的平户和五岛设置根据地，率领众多部下，过着王公贵族般的生活。与其说王直是海盗行为的主体，倒不如说是作为复数倭寇集团的协调者发挥作用，或者与官宪合作消灭对立集团，由此确立了海上霸权。

倭寇对中国社会来说并不是一种外部存在。正如朱纨所说，“去外国之盗易，去中国之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明史》卷205朱纨传）。无论是其首领，还是其成员，多数是中国人，地方有势力者（乡绅阶层）与倭寇勾结，插手走私贸易（“衣冠之盗”）。1549年，朱纨在乡绅阶层的活动下被罢免，进而被逼自杀。1567年，应乡绅阶层的要求，取消了除往来日本之外的海禁，显示出希望自由贸易的沿海乡绅阶层与国家政策间的矛盾是倭寇猖獗的背景。²⁹

1553年后的数年间是倭寇活动最猖獗时期，王直的部下在江苏、浙江各地如入无人之境般恣意暴行，但1557年王直为“许可贸易”这一诱饵所惑而投降官宪，2年后被杀。王直投降时，与从五岛出发的大友义镇使者一道进入舟山群岛岑港，³⁰ 日本的势力也期待许可贸易。同一时期，从王直支配下独立的徐海，以日本的大隅、萨摩等为根据地在江浙一带活动，也在1556年被灭，大隅的辛五郎与徐海的命运相同。其后倭寇活动规模缩小，并转移到福建、广东等地。1561年，漳州府的沿海土豪与倭寇勾结发动叛乱，3年后被镇压（月港二十四将之乱）。1567年的解除海禁消除了倭寇出现的根本原因。

b 与欧洲的接触

现在将时光转到王直与日本开始接触时期。1545年其从双屿来到博多并不是第一次到日本。《筹海图编》卷9所载王直略传中有这样的文章：

嘉靖十九年（1540），时海禁尚弛。直、叶宗满等至广东，造巨舰，将带硫磺、丝绵等违禁物，抵日本、暹罗、西洋等国，往来互市五、六年，资财无数。夷人多信服，称为五峰船主。

1540年王直违反海禁出海，在日本、暹罗、西洋等国进行贸易活动达五、六年。如果这样，1544年其在双屿加入许栋倭寇集团应是在访问日本和暹罗之后。根据葡萄牙史料《各国新旧发现记》，1542年三个葡萄牙人乘一艘中国式外海帆船从暹罗首都逃出奔赴中国，途中遭遇暴风雨，飘到一个属于日本的岛屿，即所谓西洋人“发现”日本的著名事件。另外根据

日本史料《铁炮记》，1543年³¹“西南蛮种之贾胡”乘坐之船到种子岛，时尧买下他们所携带的火枪，这也是著名的火枪传入日本事件，此时船中有“大明儒生，名为五峰者”，帮助双方进行交流。

综合上述中、欧、日三方的史料，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王直（五峰）1540年从广东乘“巨舰”出海赴东南亚，1542年到暹罗。三个葡萄牙人乘其船（中国式外海帆船）赴中国，因暴风雨偏离航路飘流到种子岛。发生了从欧洲来看是“发现”日本、从日本来看是“火枪传来”的事件，为其创造条件的是连接东南亚与东亚走私贸易路线的倭寇集团，王直更是不可缺少的协助者。

根据《铁炮记》的记载，在首次到达日本的第二年，葡萄牙人又到种子岛——葡萄牙人连续两年来到同一岛屿的事情欧洲史料也有记载——传授了密封火枪筒底的技术，因而在种子岛就可以生产火枪。其技术体系传到丰后和畿内，不久普及到全日本，使战争方式产生巨大变化。³² 根据《筹海图编》中“往来互市”的表现方式，如果葡萄牙人只是一次从暹罗到日本就不会用这个词汇，可以推测他们两次乘王直的船到日本。即1542年王直船载葡萄牙人回到暹罗后，1543年再次载葡萄牙人到种子岛，此后又返回暹罗。1544年从暹罗到双屿投靠许栋集团，1545年出现在博多，其后的活动如前所述。

1497年葡萄牙人巴斯科·达·伽马绕过好望角，1498年到达印度的卡利卡特。其后葡萄牙在1510年占领印度西海岸的果阿，建设在亚洲扩张的基地。1511年葡萄牙人控制海上要道马六甲（现为马来西亚领地），1517年派遣使节到广东与明朝接触。因明朝拒绝，建立官方关系的要求受挫，转而参加走私贸易，东进中国南部沿海地区，1540年受许栋等人邀请到双屿，他们将双屿称为利亚波，将其描述为类似在非洲和印度建立的殖民城市。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以中国人为中心的走私贸易集团、即倭寇的成员。前面所述火枪传来的经过也大致如此，他们在最初数年间使用的船都是中国式外海帆船以及明朝人将他们称为“佛朗机夷”，均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1549年耶稣会传教士方济各·沙勿略到达鹿儿岛，开始在日本传播基督教之事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原因。沙勿略以果阿和马六甲为据点，在亚洲积极开展传教活动。1547年，他在马六甲遇到从鹿儿岛来的日本人安吉略，为其聪颖资质所吸引，由此决心到日本。其赴日时乘坐的船是一个绰号叫“海盗”的中国人所拥有的外海帆船，该船在途中时常停靠许多港口，前进的速度十分缓慢，沙勿略十分心急，但对各地进行交易并航行在走私贸易线路上的船只来讲是很正常的。沙勿略在日本传教两年后，将活动场所转移到中国，1552年在到达广东沿海的上川岛后病死，但始终沿着走私贸易的路线展开活动。³³

葡萄牙人在1542年“发现”日本后连续到日本，很快加深了对日本的认识。驱使他们这样做的动力既为传播基督教，也为获得日本的银。正如葡萄牙人迪奥高·道·高特《亚洲史》中所写的那样，在“称为日本的群岛”中，“银是唯一的等价交换物”。在日本，1526年发现石见银矿，1533年引进新冶炼法“灰吹法”，银的产量迅速增加。当时明朝经济规模扩大，同时实施限定用银纳税的税制改革，由此导致对银的需求大增。不仅日本的银，连南美的银（当时称为“墨西哥银”）都被吸引到明朝。西班牙人将墨西哥银从银矿经阿卡普尔科、马尼拉后输入中国。包括葡萄牙人在内的倭寇，将日本银从银矿经平户—漳州（福建省）航路输入

中国。

c 对中华的挑战

使日本银产量增加的灰吹法是从中国传到朝鲜，再经日朝之间的走私贸易路线传到日本。但 16 世纪的朝鲜与明朝是册封关系，为摆脱册封关系下“贡银”的义务，宣称“我国不产银”，并关闭矿山，禁止银的买卖。即使在朝鲜，如果允许民间资本经营矿山，可能出现爆发性的增产，但明朝的压力使朝鲜政府丝毫没有其念头。结果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朝鲜头疼的是不知如何解释来自日本的银通过本国流入明朝。

与此相反，日本通过走私贸易克服技术上的落后，很快实现了增产。其原因第一，形式上是接受明朝册封，但所受限制比较弱，无论生产多少银也不用担心有“贡银”的命令；第二，战国大名努力将矿山掌握在自己手里并鼓励增产。

到 17 世纪前半期，日本银产量已占世界产量的三分之一。这种爆发性增产应归结于统一权力出现带来前所未有的权力集中及其条件下对生产力的有效管理。相同的革命性变化也表现在其他领域，例如在陶瓷业，一改千年落后之势，生产出可与中国景德镇媲美的彩色瓷器；在海运业，形成了环绕本州岛将全国物产运至畿内和江户的日本式木船运输航线。这些均与 16 世纪末丰臣秀吉(1537——1598)发动的侵朝战争有关。

日本的银当初几乎都作为支付进口货物的资金而流向海外，特别是流向中国。后来秀吉将银制成中世纪没有的本国货币，以筹措侵略战争的军费。日本的陶瓷业技术革新是使用秀吉军队从朝鲜带来的工匠，并由北九州大名进行殖产兴业而扎根在日本。秀吉为将军用物资运往战争的基地肥前名護屋城而将各地豪商们组织起来，由此形成了江户时代的木船航路路线雏形。

秀吉在 1585 年第一次公开宣布对大陆的野心时就已经将目标定为明朝。其在 1588 年发布禁止海盗令是将恢复明朝“勘合”纳入计划的外交政策。这种“勘合”不是以室町时代那种皇帝、国王之间的君臣关系为前提，而是由明朝提出希望、日本加以回应这种形式恢复日明关系。

1589 年，琉球使僧在岛津义久的伴随下到京都，在聚乐第谒见秀吉。随后在 1590 年朝鲜通信使在宗义智的伴随下到京都，也在聚乐第见到秀吉。秀吉自认为这些使节的到来是表示臣服之意，在其看来，本来琉球就从属萨摩，朝鲜从属对马。

秀吉完全以自我为中心预测并构想与明朝、琉球、朝鲜的关系。在其主观中，出兵朝鲜的目的是惩罚明朝和朝鲜，因为尽管禁止了海盗但明朝拒绝恢复“勘合”的要求，朝鲜拒绝作为对明军事行动的先导。

1592 年，日军在釜山登陆，仅 20 天左右就占领了京城。在名護屋城收到捷报的秀吉宣布征服明朝后的宏伟蓝图，即“三国分割”构想。第一，后阳成天皇移居北京，以都城周围 10 国为领地。秀吉的外甥、养子秀次为大唐关白，并赐都城周边 100 国；第二，日本帝位由良仁亲王或智仁亲王继承，日本关白则由宇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担任；第三，高丽由羽柴秀胜或宇喜多秀家统治；第四，秀吉自身则定居在“日本船停泊的宁波府”。在此之前，秀吉赐予龟井兹矩“琉球守”称号，因岛津氏的抗议而取消，新赐“台州守”称号。带有浙江地名的

称号已经暗示“三国分割”是具体构想。³⁴

秀吉攻占朝鲜的目的是接受国王投降，合并朝鲜版图，将其作为进攻明朝的基地。但国王很快丢下都城逃往朝鲜与明朝的国境，这是秀吉的第一个误算。为惩罚违背自己命令的对手，不可避免地使战争长期化。朝鲜人民的顽强抵抗与基于册封理论明朝派遣援军，再加上海军处于劣势导致补给困难，日本军队陷入沼泽。

在此次战争中，日、明之间从最初就不断进行停战交涉。到1595年，小西行长与明朝代理人沈惟敬达成讲和条件。结果明朝派遣册封秀吉为“日本国王”的使节赴日，1596年在聚乐第面见秀吉。通常的说法是在这次会见中，秀吉知道自己被封为明朝皇帝的属臣后大怒，遂发动第二次战争。但这是江户时代以后出现的解释，根据同时代史料的记载，秀吉发怒的原因是明朝无视割让朝鲜南半部的要求，反而以完全从朝鲜撤军作为和平条件。³⁵

实际上，在会面中交付秀吉的诰命（册封秀吉为国王的诏书）现存大阪城博物馆，³⁶ 其后的《朝鲜宣祖实录》也可以明确册封本身并没有失去效力，此时恢复“勘合”仍是秀吉的宿愿。尽管小西行长明知自己同意的条件与秀吉的想法不同，但还是将使节带到京都，努力促成媾和。结果其目的没有达到，战火再次燃起。秀吉的获取目标已从以前的征服明朝缩小到确保朝鲜半岛南部的领土。

这样开始的第2次战争连京城也没有成为主要目标，试图确保朝鲜半岛西南部的统治权。即使如此也没有按照预期的那样进行，在战争胶着化的1598年秀吉病死。德川家康等五大老立刻命令日军全面撤退，持续7年的战争结束。战争的结果是朝鲜满目荒废、军费支出导致的明朝财政恶化以及丰臣政权本身的衰亡。

16世纪后半期，建州女真族出现名叫努尔哈赤（1559—1626年）的英雄，在16世纪80年代统一建州女真族，并趁明朝在朝鲜与日军交战之际合并其他女真各部族，在17世纪初基本成功统一了全女真族。

女真族首长阶层将居住地的特产人参、貂和狐的毛皮等贩卖到中国本土和朝鲜，获取巨利，用其购买耕牛和铁制农耕用具。农业生产力提高与转化为富裕的农耕社会成为女真族崛起的基础。³⁷ 这种社会产生了面向中国中心部巨大化的消费社会销售高级货物的武装商业集团是努尔哈赤诞生的基础。当时访问女真族边境地带的朝鲜人目睹了寒村之处集中了来自各地的物资，其繁荣程度超过朝鲜。

1616年，努尔哈赤以“后金”为国号，以“天命”为年号，宣布独立于明朝。两年后提出“七大恨”，向明朝宣战。在其文书中，没有畏惧中华之意，反而充满天命在己的自信，具有以军事行动为前提而编成的规律性社会组织支撑着其自信与自尊意识。

如此看来，努尔哈赤与秀吉的动向均以边境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崛起的强大军事权力对中华主体——明朝的挑战。³⁸ 秀吉的挑战最终失败，但努尔哈赤之孙顺治帝的摄政王多尔袞在1644年成功推翻明朝，新中华帝国清诞生。女真族的“夷”取代“华”，江户幕府的儒者林家将这一事态称为“华夷变态”。对日本和朝鲜来说，是迫使世界观发生变化的深刻事件。

1 佐久间重男：《日明関係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2年，第54页）等。

-
- 2 檀上寛:〈明初の対日外交と林賢事件〉,《(京都女子大学史学会)史窓》57号,2000年。
- 3 向山寛夫:〈明初の訪中日本人僧侶たちの雲南への流謫〉,《國學院雜誌》101卷4号,2000年;《嘉靖大理府志》卷二有“日本四僧塔”,在其所述地方点发现无铭墓塔;另外在1436年编成的诗集《沧海遗珠》中有日本僧人在大理所作的诗句,可以窥知这些僧侶在流放地的生活状态。
- 4 川越泰博:《明代建文朝史の研究》,汲古书院,1997年。
- 5 西尾贤隆:《中世の日中交流と禅宗》,吉川弘文馆,1999年。
- 6 河内祥辅:《日本中世の朝廷・幕府体制》(吉川弘文馆,2007年,第281页以下)等。
- 7 今谷明:《室町の王権—足利義満の王権篡奪計画》,中公新书,1990年。对其批判可参照村井:《分裂する王権と社会》(后掲),第212—215页。
- 8 佐藤进一:《日本の歴史9南北朝の動乱》,中央公论社,1965年。
- 9 田中健夫:《前近代の国際交流と外交文書》,吉川弘文馆,1996年,第73—75页。
- 10 目前有关遣明使的概况还存在若干应修正之处。田中健夫编:《世界歴史と国際交流——東アジアと日本》(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1989年,第90页到96页)所述内容提供了很大便利。
- 11 桥本雄:〈日明勘合再考(大会報告要旨)〉(《史学雜誌》107编12号,1998年)及史学会大学当日的报告。
- 12 桥本雄:〈遣明船の派遣契機〉,《日本史研究》479号,2002年。该文将这一时期遣明船称为“回礼遣明船”,15世纪下半期以后遣明船的特征是“(将军)代理遣明船”。
- 13 《臥雲日件録抜尤》享德4年正月5日条中记有“去岁入唐船归、各出抽分光、命诸商定物价、令出十分一”。
- 14 桥本雄:〈遣明船と遣朝鮮船の経営構造〉,《遙かなる中世》17号,1998年。
- 15 高良仓吉:《琉球の時代——大いなる歴史像を求めて》,筑摩书房,1980年;《アジアのなかの琉球王国》,吉川弘文馆,1998年等。
- 16 《歴代宝案》第一集校订本一、二及译注本一、二(冲绳县)收集了以前的研究;另外边土名朝有《「歴代宝案」の基礎的研究》(校仓书房,1992年)以及《琉球の朝貢貿易》(校仓书房,1998年)。
- 17 桥本雄:《中世日本の国際関係——東アジア通交圏と偽使問題》,吉川弘文馆,2005年。
- 18 小叶田淳:《中世南島通交貿易史の研究》,日本评论社,1939年,增补版,刀江书院,1969年。和田久徳:〈一五世紀初期のスマトラにおける華僑社会〉,《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人文科学紀要》20号,1967年。
- 19 根据日本史料《阿多文書》《御内書案》,这艘使船在1419年经琉球向日本航行时,被萨摩阿多的领主町田氏扣留。第二年,应幕府、探题的要求返航博多。参照注18所揭小叶田书,第465—471页及注17所揭桥本书,第247—248页。
- 20 15世纪面向东南亚的执照仅此一张。现存许多1509到1570年的执照均带有咨文内容。
- 21 也称为“本国头目”的实鲁达作为翻译参加朝贡使节,娶福州女子为妻。1425年作为谢恩使赴明,1427年作为正使赴暹罗。宫田俊彦:《琉明・琉清関係史の研究》,文献出版,1996年,第88—91页。
- 22 檀上寛:《永楽帝——中華「世界システム」への夢》,讲谈社,1997年。据称中国学界有人认为郑和航海的目的为了寻找靖难之变后失踪的建文帝。
- 23 川越泰博:《モンゴルに拉致された中国皇帝——明英宗の数奇なる運命》,研文出版,2004年。
- 24 中村和之:〈十五世紀のサハリン・北海道の交易〉,东北中世考古学会编:《海と城の中世》,高志书院,2005年。
- 25 山田康弘:《戦国期室町幕府と将軍》,吉川弘文馆,2000年。
- 26 注17所揭桥本书,第六章。
- 27 同前,第五章。
- 28 与助才门为同一人的“种岛夷助才门即助五郎”1556年作为与王直齐名的倭寇头领徐海

部下出现（田中健夫：《倭寇——海の歴史》，教育社，1982年，第147页）。1545年，王直与此人一道从种子岛出发，首先赴朝贡船的出发地丰后，后在博多出现。

²⁹注1所揭佐久间书，第二编第二章、第三章。注28所揭田中书，第5章。

³⁰注1所揭佐久间书，第293页。

³¹我认为《铁炮记》中的1543年这一时间应修正为一年前，这里省略论证过程。请参考后揭村井的〈铁砲伝来再考〉。围绕这一件事的最新争论有不同解释。参考中岛乐章：〈ポルトガル人の日本初来航と東アジア海域交易〉（《史淵》142号，2005年）及的场节子：《ジパングと日本—日欧の遭遇》，吉川弘文馆，2007年，第四章、第五章。

³²宇田川武久：《東アジア兵器交流史の研究 一五～一七世紀にける兵器の受容と伝播》，吉川弘文馆，1993年。佐佐木年稔编：《火縄銃の伝来と技術》，吉川弘文馆，2003年。

³³岸野久：《サビエルと日本—キリシタン開教期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98年。

³⁴纸屋敦之：《大君外交と東アジア》，吉川弘文馆，1997年。

³⁵佐岛显子：〈壬辰倭乱講和の破綻をめぐって〉，《年报朝鲜学》4号，1994年。金文字：〈慶長期の日明和談交渉破綻に関する一考察〉，《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人間文化研究年報》18号，1994年。

³⁶大庭脩：《古代中世における日中関係史の研究》，同朋舎出版，1996年，第十三章。

³⁷朝尾直弘：〈一六世紀後半の日本——統合された社会へ〉，《岩波講座日本通史11》，1993年。

³⁸岸本美绪：〈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伝統社会の形成〉，《岩波講座世界歴史13 東アジア・東南アジア伝統社会の形成——16～18世紀》，1998年。

撰写本章时参考的拙作、拙论如下，割爱逐一注释。

著书：《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日本》，校仓书房，1988年/《中世倭人伝》，岩波书店，1993年/《国境を超えて—東アジア海域世界の中世》，校仓书房，1997年/《海から見た戦国日本—列島史から世界史へ》，筑摩书房，1997年/《中世日本の内と外》，筑摩书房，1999年/《日本の中世10 分裂する王権と社会》，中央公论新社，2003年/《東アジアのなかの中世文化》，（放送大学教育振興会，2005年/《中世的国家与地域社会》，校仓书房，2006年/《国境をまたぐ人びと》，山川出版社，2006年。

论文：〈古琉球と列島地域社会〉，《新琉球史・古琉球編》，琉球新报社，1991年/〈鉄砲伝来再考〉，《東方学会創立五十周年記念東方学論集》，东方学会，1997年/〈中世倭人と日本銀〉，竹内实等：《日本史を海から洗う》，南风社，1996年/〈東南アジアのなかの古琉球〉，《歴史評論》603号，2000年/〈鉄砲はいつ、だれが、どこに伝えたか〉，《歴史学研究》785号，2004年/〈鉄砲伝来と大分〉，《大分県立先哲史料館研究紀要》9号，2004年/〈“東アジア”と近世日本〉，《日本史講座4 近世の形成》，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内乱と統一の連鎖—14世紀後半～15世紀前半の日明関係〉，青山学院大学史学会《史友》40号，2008年。

第二部 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日本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的诸形态

第一章 思想、宗教的传播与变化

小岛 毅

前言

东亚自古以来就有不少人跨过当时的国界互相来往，传播着思想和文化。来往不仅通过陆路，也通过海路进行，这样，大陆的高度的文明传播到了四面环海的岛国日本。从历史的角度看，与其说“大陆文化传到日本”，不如表述为“由于大陆的文化的传播才诞生了日本这个国家”更加准确。

如何定义国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也不是本报告的研究对象，因此不予讨论。¹在此我简单地沿用《广辞苑》的定义，即“拥有对一定的领土及其居民进行治理的排他的权力组织和统治权的政治社会。”²日本出现“排他性的权力组织”是开始与大陆交流以后的事，这些组织统一为一个组织，并且称自己为“日本”，也是由于把大陆上的各国视为外国，并试图与它们区别开来。因此没有与大陆的交流，就不会有“日本国。”

《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记载的日本的建国神话是把日本这个国家视为日本独自产生的，与大陆没有关系。但这个建国神话是虚构的。在这个虚构的基础上，历史地形成了“日本的原像”这一表象，而这样形成的虚构的表象又以“国体”、“古层”等表述方式被反复提出³。在这种论说中，强调“日本古来”这一词汇。结果“日本文化中本来就具有与中国、韩国不同的独特性”这样的话语，直到今天依然是一种相当有影响力的观点，在日本社会流传。

以下本章将依据“思想、宗教从大陆传入”的观点，对上述“关于日本文化起源的虚构”一直被讲述至今的原委进行整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这一虚构和神话，依据的正是从大陆学到的思想、宗教等文化资源。我想通过追踪跨越东亚的国境线开展活动的先人们的事迹，对这一点进行重新考察。

一、 国号、王号、元号的制定与六国史的编纂

第一部第一章已经详细阐述了公元7世纪东亚的国际形势以及其中“倭国”的动向，本章从略。正如其中生动描写的那样，在“倭国”阶段和大陆的关系就已经非常重要。到了下一个“日本国”阶段，这一点就更为明显。

关于日本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称为“日本”，众说纷纭，现在依然在继续争论。在日本学界受到学术性支持的观点是，“日本”国号的确定较早估计是在7世纪初期，最晚到7世纪末之前。《日本书纪》（720年成书）如其书名所示，称这个国家为“日本”，记录开辟神话以来的历史。

在这里重要的是，这个国号是（日本）自己选择出来作为对外的称呼的。通说认为，“倭”把它的名称改为“日本”的原因在于厌恶“倭”字具有的表意性，而这个让人联想到太阳升起

¹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自古就有“国家”这一熟语，正因为这个词所包含的内容和作为近代翻译概念的国家相近，所以国家才作为翻译语汇来使用，但本章所言及的“国家”不是史料中的用语，而是近代的概念。

² 新村出主编《广辞苑》（岩波书店，1998年第5版），第976页（第6版计划于2008年1月出版，如果有字句修正，我会修改此处的表述）。《广辞苑》在日本国内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辞典。

³ “国体”一词中国的儒教知识者（士大夫）从很早就开始使用，十九世纪的后水户学（“朱子学被日本化后形成的流派”）使用这个词来强调日本的独特性。“古层”一词是丸山真男自一九七〇年代以来开始使用的关键词。最初的论文为其1972年写成的《歴史意識の「古層」》，收录在《丸山真男集》第十卷（岩波书店，1997年）之后，丸山借用固定低音（Basso Ostinato）这一音乐术语来形容日本文化本来具有的消化、吸收外来文化的能力。

东方的二字熟语中则包含了自己的自豪感。这个说法来源于中国方面的史料《旧唐书》日本传中的说法，外交使节对外国（唐）就是这样解释的。

7世纪选定“日本”作为国号，与同一时期律令的编纂是连在一起的。律令恰恰就是宣布“对一定的领土及其居民进行治理的排他的权力组织”的存在的基本法（相当于现代世界的宪法），而被编纂的该律令所设想的“一定的领土”恰恰就是“日本”这个国家的空间领域。⁴将别人对自己的称呼“倭”这一政治组织确定为自称的“日本”的同时，也确立了排他性的覆盖其空间领域的统治机构。

不过这到底还是制度上、名目上的事情，并没有伴随着实际内容。律令的规定在现实中实践了多少，这一点很早就有争议，还没有定论。尽管如此，还是应该承认律令编纂的历史意义，即意味着在制度上、名目上完善排他性的国家机构。

同一时期也确定了君主的称号。律令中根据场合来使用“天子”、“皇帝”等几种称号，其中也出现“天皇”⁵。关于天皇这个名称开始使用的时间，至今依然有争论，不过大体一致认为是在7世纪⁶。

然后还有元号。一般认为645年“大化改新”时期确定的“大化”就是日本最早的年号。但是，其后也有没有年号的时期，而没有空白时期地使用年号直至现在（平成）始于大宝元年（701）。

这样，到7世纪末为止，在律令体制下，日本这个国号，天皇这一王号和与中国不同的独自的元号这三样都齐全了。710年实现了迁都模仿中国都城设计的平城京，这成为“日本”国的首都⁷。上述《日本书纪》的编纂工作是与这些同时进行，于720年完成的。

在《日本书纪》之前，712年完成了《古事记》。人们经常把两者合起来称为“记纪”，多视之为日本最早编纂的历史书。不过自从两书编纂完成的8世纪以来，直到一千年以后的18世纪，人们一直认为，作为历史书，《日本书纪》的地位更高。《古事记》权威的提高，原因在于本居宣长（1730~1801）的出现以及他带动的“国学”运动的兴盛⁸。

《日本书纪》是用真正的古代汉语（日语中叫做“汉文”）写成的史书。当时还没有假名字，不可能有其它的书写方法，所以律令和各種政治文件也都是“汉文”。⁹这种文体与《古事记》（其原文全都是汉字）有一些区别。还有，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以及祝词（献给日本的众神的祈祷文）书写是用汉字，语法却完全有别于汉语，《日本书纪》与之也大相径庭。这就是说，在“日本”国刚刚建立的政治组织（=国家）中，用于政治、行政的书面语言是汉语，这个国家的历史（其中包含很多神话、传说等因素）也是用汉语写成的。

《日本书纪》以后国家编纂的历史书还有一直编纂到9世纪末的《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合称为六国史。它们的文体都与《日本书纪》相同。这样，国家自己编写自己的历史，以书籍的形式流传后世，意在从时间上讲述自己的正统性。

二、 儒教思想的接受与咀嚼

⁴ 在日本律令的文章中看不到“从何处到何处是日本国”的规定。这只是和唐朝的律令一样。我在这里想说的是，律令是在设想的国郡制的空间领域设定之上编纂的。

⁵ 根据现存的《养老令》（757年实施）、《飞鸟净御原令》（689年）和《大宝令》（710年）中是如何书写的，并不明确，也许是一样的吧。

⁶ 《古事记》《日本书纪》中传承的神话传说性质的记载不是历史事实，如果追求历史研究的严谨性，从其他史料来判断，天皇称号开始使用的时期不可能早于6世纪末期。

⁷ 在时期上主要是以7世纪为对象，而从中国思想文化传播方面论述日本古代都城和王权礼仪关系的汉语专著有王海燕的《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年）。

⁸ 关于《古事记》的学术研究的最前沿成果可以举出神野志隆光的《漢字テキストとしての古事記》（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

⁹ 关于古代的汉字接受，请参照收录这题名论文的佐藤信《出土史料の古代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

以上我有些繁琐地叙述了“日本”的成立过程。这样做是为了阐明：这些观念整体上是依据来自大陆的思想，也就是儒教的影响。

以前人们根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的“应神天皇”（褒田别命）统治时期，王仁（或者书写为和迹）从百济（朝鲜半岛的一个王国）到达日本、带来了《论语》，一般认为这就是儒教传播到日本。¹⁰年代推算工作显示褒田别活跃的时期是5世纪¹¹，这样就认为儒教的传入也是在5世纪。¹²但是近年来的研究表明，这个博士来到日本的传说为后世杜撰，现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教的是“儒教传入的时期是在6世纪”。

把什么作为儒教传入的标志，这个差异会导致传入年代的变动，不能一概而论，不过，无论如何，对于“倭”的国家建设事业来说，儒教的传入是根本性的重大事件。理由在于在这个时期儒教已经成为东亚最有代表性的政治思想。

（被认为是）孔子阐述的本来的儒家思想和汉代完善的儒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质的差异，不过这是本报告范围以外的问题，就不再说明¹³。魏以后的各个王朝，他们的国家统治的基本理念也是立足于以礼和法为两根支柱的儒教思想。在“倭”的建国阶段以及朝着“日本”发展的过程中被作为范本的就是这些儒教国家。倭不仅直接向中国学习，也通过朝鲜半岛的诸“国家”（新罗、百济、高句丽）学习了很多东西。

上述传说中的王仁这个人物，有可能是后世假托出来的来自朝鲜半岛的移民的始迁祖。不过自称是他的子孙的“西文”氏一族，以写作汉文的方式供职于大和朝廷，为“日本”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同样的氏族还有据称是后汉灵帝的后裔“东汉”氏。据推测，他们定居日本以后，可能通过某种网络与朝鲜半岛建立联系，利用其会使用汉字的能力，发挥了把大陆的尖端技术和最新的文化引进“倭”的宫廷的作用。

以前日本习惯上把他们叫做“归化人”，这是事后性的依据儒教思想把他们说成是仰慕日本国天皇之德而迁来并定居的，是一种虚构。实际上他们是“倭”方面从文明先进的大陆各国招聘来的精英集团，或者说他们本身就是“倭”这个国家的统治支配者集团的一员。说句题外话，“归化”这个词汇至今仍然作为日本国的法制用语来使用，鉴于（这个词）在东亚传统的用法（意为仰慕天皇之德而脱离本来的国籍），难免会使对方不快¹⁴。

如上一节所述，“倭”改称“日本”、选定“天皇”作为君主称号是在7世纪。关于“天皇”称号的由来，有的说法认为由来于道教¹⁵。另外唐高宗也用过这个名称，也可以推测是来自他的影响。不管实际开始自称天皇的是哪一个，为确立“天皇”权力立了大功的天武天皇（631—686）和他的皇后持统天皇（645—702）的关系恰好类似于同一时期统治唐朝的高宗和武则天的关系。（严格说来，武则天不是唐朝皇帝，而是“周”的皇帝）。

原来，“倭”的君主用汉字表示法称为“王”或者“大王”，当他变成“日本”的君主的时候却改称为“天皇”，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如前所述，律令中除了天皇以外，还同时记载了天子、皇帝等与唐的君主同级别的称号，表明人们主观上认为天皇是与唐的皇帝是同级别的。日本

¹⁰ 一般认为这时王仁和《论语》一道带来了《千字文》。这两本书是唐朝时学习汉字的教材，可以确认日本在7世纪末也使用了，因此，可以推断前人对其进行追溯而假托王仁创造出这一传承（东野治之《正仓院文书和木简的研究》，塙书房，1977年）。

¹¹ 应仁天皇的在位年代按《日本书纪》，相当于西历3世纪后半叶，但这一年代设定不过是为了将神功皇后（他的母亲）的摄政在任时期和邪马台国女王在世年代相符合而人为设定的，不能认为是历史事实。

¹² 被认为比王仁来日传说更确实的史料是《日本书纪》记载的钦明十五年（西历554年），百济派遣五经博士、僧侣、各种有技能的人的记录。若以此作为正规的儒教传来，那就和百济的佛教传来（有558年说和553年说）几乎是同一时期。

¹³ 沟口雄三、池田知久、小岛毅《中国思想史》（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本章以下关于中国儒教史的记述都依据本书。另外，关于叫“儒教”还是“儒学”这种术语上的问题，日语和汉语中这些术语的用法不同之处，相关的探讨在此省略，本章仅使用“儒教”一词。

¹⁴ 日本的国籍法第四条规定：“非日本国民的人（以下称为‘外国人’）通过归化可以取得日本的国籍”。

¹⁵ 福永光司等《道教と古代の天皇制——日本古代史·新考》（德间书店，1978年）。

主张自己不是唐的朝贡国，而是彼此对等的国家，在这一点上，比只作为唐的朝贡国的新罗（其君主的称号为“王”）要高一个等级。《日本书纪》记载圣德太子（厩户皇子，574~622）派出的遣隋使带去的国书中写着“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一般认为这是和《隋书》记载的称“日出处天子”的书简不同的东西。但是，在圣德太子时不会称作“天皇”，因此也有后世加以润色的可能性。

“倭国”制定了日本作为国号，天皇作为王号，又选定了自己的元号。这也是表明和唐是对等的国家，希望排他性地统治被划定为日本的这一块土地。因为元号就是从时间角度支配它所通用的空间的工具。

中国制定元号制度的是汉武帝。此前在表示某一年的时候都写作“某某王（或者皇帝）某年”，从此以后，改为采用皇帝制定的元号来表示每一年的方式。不仅是由皇帝直接统治的空间，朝贡国的王在与中国交往的时候也使用中国的元号，以此来表达臣从的意思。

某一年具体的从哪一天开始算起，这在制度上也是中国皇帝决定，事实上由宫廷的专家观测天体的运行，制定历法，向中国国内外宣布。据此表示月日，称为“奉正朔”。“正”是每年的第一个月，“朔”是每月的第一天，合起来就是日历的意思。根据儒教的理念，皇帝的终极的状态就是即使皇帝不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区也仰慕皇帝之德派遣朝贡使节，全世界都使用中国皇帝制定的历法。

日本制定了自己的元号，其意图在于表示从唐的皇帝的德中独立出来，形成自己独自の帝国。它又把新罗、渤海作为朝贡国来对待，把虾夷视为夷狄，试图构筑以天皇为中心的世界。（日本国内作为朝贡使节来对待，但是新罗、渤海自身的认识与此不同）。总之，《日本书纪》和律令中描绘的日本以天皇为君主的“国家的形态”（后世称为“国体”）并不是日本自古以来的形态，而不过是依据新传来的儒教思想虚构出来的理想中的政体。

《日本书纪》在“神代”部分讲述的是由日本自身的诸神进行的国家建设，完全排除了中国、韩国的影响。（该书）建构了日本完全依靠自己单独进行国家创建的故事，其意图在于借此显示日本和唐是对等的、同级别的国家。所以，在“生育国家的神话”部分，仅仅涉及日本列岛（除了冲绳等西南诸岛以及北海道、北方领土），根本不讲中国大陆、朝鲜半岛为什么存在。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把一定的区域划定为排他性的统治的对象。这个生育国家的神话显示了日本国作为一个国家所领有的固有领土的正统性之根据。

与此不同，中国的宇宙开辟神话如盘古的例子，讲述的是作为整个世界起源的大地的创生。其中没有“从哪里到哪里是中国”这样空间上的划定。儒教传承中认为禹完善了“九州”（《尚书》禹贡），于是这个范围就是尧舜时代中国的疆域，但实际上它来源于编纂禹贡的战国时代的地理认识和疆域观念。此后中国的范围扩大了。秦、汉直接统治的领域比禹贡九州更辽阔。中国认为这表明“皇帝之德直接所及的范围扩大了”，即通过儒教伦理使之正当化。对此，日本方面，律令所规定的国郡制度的范围（不包括冲绳和北海道等），直到后世一直被看作日本这个国家的疆域。

日本在接受、咀嚼儒教思想的同时，制定了自己的国号、王号和元号，又通过编纂历史书《日本书纪》来使之正当化。在中国，“纪”的意思是以年代记的形式编纂的关于帝王统治的文献。也就是说，《日本书纪》是国号叫做“日本”的王朝的帝王年代记。中国发生王朝交替之后，都要编纂正史，包括以“纪”的形式叙述前一个王朝的帝王年代记，再加上该时代杰出个人的传记的集成——“传”，以及关于国家制度的“表”和“志”（事项的记述）。7世纪唐朝朝廷就编纂了《梁书》、《隋书》等好几个王朝的正史。

“倭国”就是在7世纪后半叶，自己改称“日本”的时候决定仿照中国编纂自己的帝王年代记。另外在韩国被认为是最早的正史的《三国史》（为了和《三国志》区别，称为《旧三国史》），是进入10世纪高丽时代以后，把新罗、百济、高句丽三个国家（的历史）综合起来记载的。就是说这是统一新罗灭亡以后的事情，不是像日本那样，由现在的王朝自己编修

自己的正史。

日本就是这样在 8 世纪初期利用儒教思想的王权理论构筑了一种历史认识，即主张日本自古以来就拥有不同于中国、韩国的独自的历史。《日本书纪》中记载神功皇后“征伐新罗”（不是历史事实），“雄略天皇纪”以后关于和朝鲜半岛的关系方面的记载增多了，又把圣德太子的派遣遣隋使的举措粉饰成和中国的对等外交，这些全都是根据编纂《日本书纪》的 7 世纪末到 8 世纪初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认识。因此，其中不能够原封不动地把记载的内容认定为记载对象时期的历史事实。

还有，正如一百年前那珂通世考证的那样¹⁶，《日本书纪》中的建国纪年（即被认为是第一代神武天皇即位的年代——西历公元前 660 年）是利用来自中国的革命思想（干支为辛酉的年份会发生革命的思想），以西历 601 年或 661 年的辛酉年为基准进行回溯而确定的，这也应该说是儒教思想所赐。而神武天皇即位的日期也是依据 8 世纪从中国传来的历法（该历法在公元前 7 世纪甚至在中国都不存在）制定的，依据这样虚构出来的传说，日本将二月十一日定为节日，名叫“建国纪念日”。

日本就这样，在 8 世纪初期根据大陆传来的知识确定了其国家体制和历史。此后为了直接从中国获得新的知识信息，在派遣遣唐使时，让很多留学生、留学僧随行。关于佛教下一节会系统阐述。在儒教方面，律令制度的完备需要行政上的知识以及文章写作能力。吉备真备（693 或 695—775）和阿倍仲麻吕（中国名为晁衡，698—770）也是其中的一员。仲麻吕虽然没能回国，但在唐朝非常活跃，还做了官僚。

日本国内的教育机构有在平城京设立的大学，728 年建立了文章（史学与文学）、明经（经学）、明法（法学）、算（天文学与历学）等四学科体制。此外，在地方设立了国学。¹⁷到了 9 世纪，由于律令体制的松弛，以及派遣遣唐使做法的中断（最后一次遣唐使是在 838 年派遣的），向唐学习儒教的必要性和机会都消失了，只是依靠博士家的世袭而世代继承。

菅原道真（845—903）也出身于文章博士（纪传道）家。他被任命为遣唐大使，却自己提议停止遣唐使，为日中两国政府间的官方通交的历史画上了休止符。不过近年的研究认为，他的建议并非导致朝廷从制度上废止遣唐使。¹⁸还有人指出对于当时的政治状况，也应该结合新罗、渤海的衰弱带来的朝鲜半岛的政治混乱，不仅从日中两国关系的角度，而且必须从东亚范围的复合的视角来分析¹⁹。

三 佛教者的往来

从八九四年菅原道真建议停派遣唐使之后，到 15 世纪初期足利义满派遣明使为止，这五百年间，中日两国都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²⁰。

然而，在这期间，商人们横渡海洋，并没有让经济交流中断。在 9 世纪的时候，从事贸易的是一些以朝鲜半岛、山东半岛为据点的新罗商人。其代表人物就是张保皋（在日本也写作张宝高，？—846）²¹。

不久，中国商人也开始进入这一领域了，他们以九州的博多为据点，开始在日本长期逗

¹⁶ 那珂通世：《上世年纪考》（《那珂通世遗书》第一卷，大日本图书，1915 年。第一次出版是 1897—1898 年的《史学杂志》第八卷八—十二号）。

¹⁷ 关于律令制下的学校制度请参照久木幸男《日本古代学校の研究》（玉川大学出版部，1990 年）等书。

¹⁸ 石井正敏《東アジア世界と古代の日本》（山川出版社，2003 年）等。

¹⁹ 石井正敏《日本渤海関係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2001 年）等。

²⁰ 虽然怀良亲王在义满之前被册封为“日本国王”，但是他只不过统治九州的一部分，是南朝的征西将军，并不是律令所规定的“日本”全国的统治者。另外，关于怀良亲王时代的九州形势，在川添昭二的《九州の中世世界》（海鸟社，1994 年）等书中有所阐述。

²¹ 滨田耕策《新羅国史の研究——東アジア史の視点から》（吉川弘文馆，2002 年）。

留。因此，当他们前往中国时，反而被当地人称之为“日本商人”²²。因为在当时，并不存在现代的国籍概念、国境观念，或者民族国家等想法，所以用民族的集团区分的方式，将他们归属到日中韩其中的某一个的分类方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而主张应该冷静地看待以东亚海域为谋生场所的贸易商人们活跃的事实，才是日本近年来的研究动向²³。

当时，与这样的商人关系网有关联的，还有佛教教团网。延历寺的僧侣圆仁（794—864），随行最后的遣唐使渡海入唐，在当地遭遇了武宗发动的“会昌废佛”，受了很多苦后才得以回国。而保护、帮助他回国的就是上述的像张保皋那样的新罗商人。圆珍（814—891）比圆仁稍晚，于853年入唐，于858年回国，但是他的赴唐和回国都与遣唐使没有什么关联。他带来的善本经典441部收藏在园城寺（三井寺）的唐院，成为了“寺门”（与指代延历寺的“山门”一词相对）的非常重要的思想遗产，如此大量的书籍，个人旅行是不能运来的，通过圆珍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窥知贸易商人以支持佛教教团的形式而十分活跃的情形。

再向上溯，在遣唐使时代，唐朝的鉴真（688—764）来到日本，传授了戒律，另外，最澄（767—822）、空海（774—835）同时（八〇四年）乘遣唐使的船来唐留学，其后分别传播了天台宗和真言宗。空海新带来的密教，给之后日本佛教史带来了莫大的影响。圆仁、圆珍渡唐，有天台宗要接受、完善密教的目的。

传说圣德太子本人撰写《胜鬘经》、《法华经》、《维摩经》的注释（义疏），作为史实是可疑的²⁴，《日本书纪》等所说的圣德太子保护佛教的政策，在何种程度上是史实，到现在都有疑问，但7世纪确立的律令国家确实重视佛教，想得到其保佑而使日本变得繁荣（镇护国家的思想）。圣武天皇（701—765）取消了远征新罗的计划，而兴建东大寺的大佛，显示出了由佛法守护国家的状态²⁵。

到了平安时代，也是为了牵制东大寺的势力，天台、真言两个宗派在王权的庇护下势力有所加强，这不仅仅有在近代意义的宗教因素，也是期待密教所拥有的科学技术性的知识（医学的和工程学的知识）。即便是现在，传说为空海所建设的灌溉设施一直保存到至今，表明他率领着一个拥有这些技术的集团。佛教寺院拥有着众多庄园，也是经济活动的承担者。在引进唐或百济、新罗的知识之际，起到中心作用的是佛教寺院²⁶。

9世纪末之后，随着唐朝的衰败，在浙江省出现了一个作为自立政权的吴越国。由于地理方面的原因，日本与浙江省的交流很深。与唐朝的首都长安的交流断绝之后，中日佛教交流就完全在吴越国的境内进行了²⁷。最澄上岸的地点在现在宁波附近，其后，宁波（开始称作明州，13世纪改称庆元、14世纪后半期改称为宁波）在法制上也成为中国面向日本的窗口。

北宋再次统一了中国的主要部分，东大寺的僧侣裔然（938—1016）渡宋，在开封谒见了皇帝。他拿去了当时中国已经散佚的儒教经书《孝经》的注释书，从中国方面则得到了使用最新印刷技术的大藏经。²⁸

属于最澄一派的天台宗僧侣们，也就理所当然地把浙江省的天台山视为圣地进行巡礼。另外，以文殊信仰闻名的山西省五台山也被视为圣地。1072年入宋的成寻（1011—1081），让随行弟子将自己的日记和很多书籍带回日本，他本人则在中国圆寂了。该日记被叫做为《参天台五台山记》，显示了两座山的重要性。另外，当时的神宗政府（王安石政权）采取积极

²² 榎本涉《東アジア海域と日中交流——九〜十四世紀》（吉川弘文館，2007年）。

²³ 村井章介《国境をまたぐ人びと》（山川出版社，2006年）等。

²⁴ 1930年代，津田左右吉已经提出三经义疏不是圣德太子撰述的假说，而藤枝晃的“胜鬘经义疏”（日本思想大系2《圣德太子》所收，岩波书店，1975年）在文献学上实证了《胜鬘经义疏》是中国作品。此外，关于圣德太子传说的历史形成过程请参照 大山诚一《<聖德太子>の誕生》（吉川弘文館，1999年）。

²⁵ 保立道久《黄金国家——東アジアと平安日本》（青木书店，2004年）。

²⁶ 新川登龟男《日本古代文化史の構想——祖父毘打伝承を読む》（名著刊行会，1994年）。

²⁷ 藤善真澄（编著）《浙江と日本》（关西大学出版部，1997年）。

²⁸ 关于以遣唐使时代为中心的书籍流通，请参照王勇《書物の中日交流史》（国际文化工房，2005年）。

的外交政策，虽然也呼吁日本进行朝贡，但日本朝廷对此没有理睬。

到了12世纪后半期，从南宋来的贸易船频繁地来到日本，正巧和日本掌握政治权力的平清盛（1118—1181）推行积极的政策相契合，日宋贸易轰轰烈烈地展开了²⁹。日本向宋朝出口金、水银、刀剑、扇子、漆器、硫磺、木材等物品，又从宋朝那里进口了铜钱、丝织品、香料、药品、陶瓷器、书籍等物品。宋钱的流通刺激了日本国内的商业活动，对接下来的13~14世纪的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具体请参照下一章。）清盛在福原（现在的神户）建设了大规模的海港（大轮田泊），带着后白河法皇（一一二七—一一九二）到那里，让他会见宋朝的商人。信奉日本一国主义的朝廷（宫廷贵族）对这种行为评价很差，这也成为了他们对清盛的政治反感的原因。

随着交易的扩大，僧侣来航的也有所增加。重源（1121—1206）自称“入唐三次”（另外，宋代以后，日本还是经常称呼中国为“唐”。江户时代也称中国船为“唐船”）。明庵荣西（1141—1215）也两度来宋，首次将禅宗（临济宗）正式地传播到日本。重源与荣西，也承担了因清盛晚年政治动乱中所烧毁的奈良东大寺的再建工作³⁰。其建筑与以往的佛教伽蓝（在接受唐代样式的基础上成为日本特有形式的样式）不同，采用了其时中国的式样（大佛式，别名天竺式）。重源也拥有着具备最先进的土木工程技术的集团，一般认为他是依靠中国的人脉才得以实现的。

这样，佛教教团并不是现在意义上单纯的宗教势力，它具有文化意义自不待言，也是跨越科学、技术、政治、经济的多方面、综合的存在。这在荣西以后的禅佛教里，表现得更加明确。而且，这不是日本独有的东西，而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所共有的现象。

在唐灭亡之后，将中国主要部分再次统一的宋，像后面所说的那样，开始以儒教为中心，儒教其后在东亚的思想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统治唐的北半部的辽，继续推行尊重佛教的政策。关于辽与日本的交流虽然在文献史料上没有记载，但在日本国内，北方奥州的藤原氏的平泉政权、北海道的阿伊努，有可能与辽、金通交。

通过禅宗的传来，日中之间的交流迎来了新的阶段。这是因为中国的新文化潮流，是以伴随着禅宗的形式大举传来的。³¹

下一节也会阐述，在宋代的 中国，产生了思想文化的大变革。虽然禅佛教其本身已经在唐代确立起来了，但借助宋代的新潮流，实现了社会性的渗透，在思想方面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到了南宋以后，宏智正觉（1091—1157）的曹洞系的默照禅，以及批判他的大慧宗杲（1089—1163）们临济系的公案禅都拥有着势力。由于首都移到了浙江省杭州（临安府），吴越王国时代以来的佛教寺院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在13世纪初期，与教院系统的五山并列，经过出身宁波的宰相史弥远（1164—1233）的提议，杭州与宁波的五个寺被认定为禅院的五山。

禅佛教（尽管有达磨大师的传说，但实际上）原本未必是从印度或西域传来的，而是在中国实现独自发展的思想流派。从日本来到中国的僧侣们虽然都很早以前就有接触禅的机会，但是一般认为，自觉地力图将禅传播给日本的是荣西。他在宋学习了黄龙派的禅，归国后，将自己比较熟悉的天台密教与禅融合起来进行讲说（兼密禅）。他写了《兴禅护国论》，强调将禅引入日本的意义，还得到了新兴势力镰仓幕府的支持，在京都创建了建仁寺。

继荣西以后，圆尔（1202—1280）在宋朝从无准师范（1178—1249）那里继承了杨岐派的法统，归国后得到了朝臣九条道家（1193—1252）的庇护，在京都建立了东福寺。镰仓幕府掌握政权的北条时赖（1227—1263）也很敬仰他，授予他禅戒。圆尔也倡导密教与禅的兼

²⁹ 森克己《日宋貿易の研究》（国立书院，1948年），五味文彦《平清盛》（吉川弘文馆，1999年），高桥昌明《平清盛福原の夢》（讲谈社，2007年）

³⁰ 五味文彦《大仏再建——中世民衆の熱狂》（讲谈社，1995年）

³¹ 广泛地论述这一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汉语专著有李寅生的《论宋元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及相互影响》（巴蜀书社，2007年）。

修。他死后，到了14世纪，花园天皇（1297—1348）授予他日本开国国师的称号（圣一国师）。圆尔门下的无关普门（1212—1291）接受了龟山法皇（1249—1305）的皈依，成为南禅寺的开山。

荣西作为《吃茶养生记》的著者也很有名。他们这些禅僧从中国带来了饮茶的习惯，和后来形成的茶道（茶文化）相联系。同样，和药剂及其带来的医学、建筑连动的土木工程学等，使禅宗寺院拥有了生活文化或科学技术中心的功能。本来，佛教寺院都是起着这样的作用，如鉴真所创建的唐招提寺、最澄创建的延历寺、空海创建的东寺等。即，日本文化是作为与佛教信仰一同从中国传来的文化而形成的。

与荣西、圆尔的兼密禅不同，永平道元（1200—1252）第一次作为荣西的再传弟子到宋朝，在宁波近郊的天童寺接触了宏智系统的默照禅，归国后开始宣传“只管打坐”（曹洞宗）。

到了13世纪后半期，像兰溪道隆（1213—1278）、无学祖元（1226—1286）等人，临济宗杨歧派的中国僧侣开始到达日本，与兼密禅不同的纯粹禅也通过他们得以弘扬。兰溪创建了镰仓的建长寺，无学也是在镰仓创建了圆觉寺。无学是无准师范的弟子，与圆尔是同门。无学的再传弟子中有梦窗疏石，得到朝廷和幕府的皈依，建立了成为梦窗派的一大流派。梦窗在京都建立了天龙寺。

圆觉寺的建立，是为了对此前的蒙古入侵中的战死者不分敌我一律进行供养。无学是浙江省绍兴人，或许他的立场与蒙古军的士兵相近，建寺也许与此有关。不过，佛教本来就有的“怨亲平等”思想，或许打动了镰仓幕府执掌政权的北条时宗（1251—1284）。上面所说的时赖的儿子，由于在蒙古入侵时将其击退，被视为日本民族英雄。不仅是圆觉寺，近代以前的日本也没有“只祭奠我方战死者，而把敌方排除在外”的宗教传统。

建长寺或圆觉寺，在创建当初都是充满异国情趣的地方。据说在那里是用汉语开展佛教学。镰仓由于屡次发生战争，当时的伽蓝没有留下来。但是，保留当时遗风的圆觉寺舍利殿（本来是别的寺院的建筑物）的建筑式样被称作是“禅宗式”（唐式），引入了也与上述东大寺不同的中国最新式样。

14世纪初期，镰仓幕府模仿南宋的制度在镰仓确定了五山。建长寺是第一位，圆觉寺是第二位。灭亡镰仓幕府的后醍醐天皇（1288—1339），除了参与了京都大德寺的创建，也制定了包括京都的禅宗寺院（南禅寺·建仁寺·东福寺）在内的五山制度。该制度经过足利直义（1306—1352）的改组，由足利义满（1358—1408）确定了京都与镰仓各自的五山（与后醍醐有关系的大德寺，被从五山中剔除出去）。五山之下，又模仿南宋的制度设置了十刹，为了从政治上统治整个临济宗寺院，把僧禄司设置在相国寺（义满创建的寺院）。

五山制度，不仅仅对于佛教界，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等各个方面，对15世纪的日本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遣明使也是五山的僧侣，他们在日明贸易中富裕起来。五山也开展印刷出版事业，奠定了江户出版文化的基础。

特别是五山十刹的僧侣们（也包括被称为“林下”的大德寺等禅宗寺院，即广义的“五山十刹”）所作的汉诗文，被称为“五山文学”，在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³²。虽然他们是出于写政治外交文书的需要才练习汉文的，但模仿宋代诗文写出的大量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放射出璀璨的光辉。他们景仰的汉诗模范是杜甫（712-770）、苏轼（1036-1101）、黄庭坚（1045-1105）、陆游（1125-1210）等。在古代的平安时代敬重白居易（772-846）的诗文。五山文学中模范的风格改变了。

在中国，如同后述所说，禅宗势力在治上已经失势了，而与此相对照，在日本，从14世纪到16世纪，室町幕府与五山寺院相结合统治国家。虽然人们往往认为室町时代的佛教界，在思想、教育方面并没有新的展开，但在中国文化的吸收、渗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由于17世纪的明清鼎革，很多不屑于清朝统治的人士来到日本。隐元隆琦（1592—1673）

³² 玉村竹二《五山文学——大陸文化紹介者としての五山禅僧の活動》（至文堂，1955年）等。

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带来了与临济、曹洞两宗完全不同的黄檗宗。另外，据说他传播了与以往抹茶不同的煎茶方法。隐元豆（菜豆）这个名字显示，他并不是单纯地带来宗教教理，也做出了与日本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贡献。

四 朱子学的传播与日本的特色

在8世纪中期安史之乱以后，中国进入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的一大变革期。由于唐的前半期与南宋在国家的状态方面完全不同，因此该变革被称作“唐宋变革”。朱子学是在唐宋变革中，从儒教中产生出来的思想流派³³。

在宋代，除了朱子学，很多新兴流派也相继登场，批判地继承了汉代形成的旧儒教。而承担这一事业的，是以科举官僚为中心的一群人士。通常称他们为“士大夫”。但值得注意的是，士大夫这个用语在宋以前就存在了。

宋朝的新士大夫们的志向是重建以皇帝为顶点的稳定的政治秩序。经过唐宋变革，一直通用到唐朝的方法，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了。士大夫们为了顺应时代要求，在孔子、孟子时代的儒家思想中寻找其思想资源，他们批判汉代儒家脱离了孔孟儒家思想，他们用自己的解读方式对儒教的经书进行再构成，从而构想理想的秩序，为此他们向周围的人（上从皇帝、同事、友人，下至一般民众）宣传了理想秩序所必需的思想教说。

唐与宋的国家性质本来就是不同的。其最大的理由在于唐是一个世界帝国，而宋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唐宋改革契机——安史之乱，是胡族（使用该词作为非汉民族的总称）的军事指挥官（节度使）发动的。这显示了唐依靠着这样一群人的军事力量。换言之，唐并不是纯粹的汉族国家，它的视线基本上是朝西（不是朝东）的³⁴。

虽同为世界帝国，汉朝成立时，能与汉族（该词本身来源于汉王朝）抗衡的国家，只有匈奴。但匈奴最终也分裂解体，并臣服于汉。然而，汉一衰退灭亡，由胡族模仿汉而建立的国家，就在周围丛生起来³⁵。南北朝的北朝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国家，在朝鲜半岛产生的高句丽、新罗、百济也都是其中的例子。将那些丛生的国家再次以捆绑的形式统一起来而诞生的就是隋、唐。其支配集团包括皇帝在内都是出身胡族，属于实施胡汉融和体制的北朝谱系。

因此，唐衰败之后，可以统治东亚，只有能够收服胡族的势力才能君临东亚。宋是在华北后唐、后晋、后汉等胡族系统的王朝基础上诞生的，与同在唐之后诞生的胡族（契丹族）的辽相对峙，但结果其吸收辽的努力失败了。另外，在西域方面，宋从一开始就没有像汉、唐那样施展权势。11世纪中期，随着西夏自称皇帝，导致囊括该地区的努力也完全失败了。因此，宋不得不成为单纯汉族（虽然国内有很多少数民族）的王朝。

汉的儒教是作为世界帝国的支配原则而形成的。儒教在唐朝所发挥的作用也是一样的。然而，宋代的士大夫们不能使用相同的统治制度。在与辽、西夏进行军事对峙的同时，士大夫们必须展示自己才是孔子以来儒教的正当继承人，由此巩固国内秩序。11世纪后半期，以欧阳修（1007—1073）等人为中心的新的思想文化潮流，就这样诞生了。

欧阳修的下一代人中，最成功的要数王安石（1021—1086）。他是宰相，掌握着政权，不断定新法，努力进行财政改革和确立制度。作为学者，他也是一流的，在经学方面取得了许多业绩，另外也培养了多位弟子。对外采取积极政策，为了牵制西夏，曾出兵青海省一带。要求日本朝贡也是其中一部分。然而，该路线由于后来在与新兴的金联合夹击辽时失败，北宋灭亡（靖康之变，1127年）。

在华中避难并重建的南宋，处理了呼吁与金继续进行战斗的将军岳飞（1103—1141），

³³ 土田健次郎《道学の形成》（创文社，2002年），小島毅《宋学の形成と展開》（创文社，1999年）。

³⁴ 森安孝夫《シルクロードと唐帝国》（讲谈社，2007年）。

³⁵ 川本芳昭《魏晋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汲古书院，1998年）。

在宰相秦桧的指导下，签订了和平条约，积极开展与高丽等国的对外贸易。如前所述，日本在平清盛的时代，发展了上述所说的日宋贸易。13世纪初期，对金的进攻失败，此后发起政变并掌握政权的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史弥远。这时正值朱子学的繁盛期。

朱子学的集大成者朱熹（1130—1200），属于对金主战派（反秦桧派）。支撑他们心性的是华夷思想。即，自己是“华”，虽然与“夷”（=“胡”）相比，在军事方面处于劣势，但是在文化方面则是优越的。并且，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并不是现实的力量对比，而是传承优美卓越的文化，并坚守这一立场。自己一方是正确的时候，绝对不屈服于武力，即便这会使肉体意义上的生命被夺走，在精神上也不能被敌人所降伏。为了这个世界的正确道理（天理）而失去生命的人，史书上会称道其功绩，国家也会缅怀其遗德，永远不会忘却他。与此相反，如果屈从于敌人，其人也将在史书中受到批判，作为恶人被永久记忆。朱子学，就是这样提倡以大义名分论为基础的历史学的。

这样的构想原来在汉代的儒教里就有，借用（据认为是）孔子编纂的史书而称之为春秋学。上述的欧阳修也站在这个立场上编纂了正史（《新唐书》、《新五代史》）。同时代的司马光（1019—1086）编撰了《资治通鉴》，记述《春秋》以后的时代。朱熹将他们的见解进一步发展。比如他主张，三国时代魏是篡夺汉朝的、可憎的敌人，而有志光复汉的蜀汉才是正义的一方。

金是导致北宋灭亡的仇敌，但现实情况却是不得不在其之下甘心忍受求和，在这种抑郁下，产生了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尽管黄河流域、泰山等中华文明起源的故地在现实中都曾被金所统治，他们却依然主张中国正统的继承人是他们南宋。其处境和三国时代的蜀汉、南北朝时代的南朝是相同的。因此，他们认定蜀汉、南朝是正统王朝。就这样，确立了重道理、轻现实的力量对比的历史认识。从这种立场来看，秦桧是难以原谅的失败主义者。借用现代的用语来说，就是屈从于外敌的“汉奸”。他的像在杭州岳飞庙里，以绳捆绑着示人，也诞生了参拜岳飞的人都朝其秦桧像吐口水的惯例。

另外，朱子学除了追求理想的秩序之外，也强烈的批判佛教，特别是禅，认为它们都是邪恶思想。实际上，在思想义理方面，朱子学受到禅非常大的影响，可以推测朱子学反而要通过强调禅佛教的危险性，来增加己方的支持者。虽然这样，但是在话语上，朱子学的立场是与禅势不两立的。

朱子学在13世纪，在士大夫中得到广泛的支持者，1276年，元消灭南宋，将中国南部也纳入统治范围，朱子学随着流入北方，渗透到了北京的宫廷里。从元开始朱子学传入高丽，渗透到了官僚中间。高丽原本因为有辽的影响，佛教的势力比儒教更加强大。这个时期，朱子学使情况发生逆转，不久到了变成朝鲜王朝时期，完全地成为儒教国家。

驱逐了元，统治了中国主要部分的明，因为是汉族王朝，比较尊崇朱子学，指定了朱熹的著书作为科举考试用的国定教科书。就这样，所有的科举考生都要通过朱熹的书籍，学习儒教，朱子学成为了体制性的学问。而且，朱子学所批判的禅佛教，逐渐丧失了它在宋代那样思想上的影响力。（16世纪禅暂时复兴了一段时间。）

与朝鲜一样，无论是越南还是琉球，都在明的指导下引进了朱子学。以后，直到清废除科举（1905年），朱子学都是整个东亚的支配性的主流思想。16世纪成立的阳明学，18世纪的考证学，虽然部分地、尖锐地批判了朱子学，但是其前提却是与朱子学一样的。

朱子学很早就通过书籍传播到日本了。在上述的圆尔于1241年带回来的大量书籍中，朱熹的著作与佛教有关的书混在一起。（参照后来整理“请来书”而编制的《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另外，14世纪，僧侣们在后醍醐天皇的宫廷和足利义满的幕府里讲述朱子学的纪录目前还保留着（怀疑前者可靠性的说法也很根深蒂固）。在五山也作为“唐物”崇拜的一环，学习了朱子学的基础知识。

然而，在日本弘扬朱子学的不是儒者，而是僧侣，且以禅僧为主。在遣唐使时期，职掌

儒学的博士家，还是依然讲授汉代的儒教。由于不存在像中国、朝鲜那种形式的科举制度，因此学习朱子学并不能成为飞黄腾达的手段，也缺乏和佛教不同的知识体系。因此，虽然日本很早就接纳了朱子学，但直到很久以后的17世纪江户时代，朱子学才作为独立的政治哲学发挥作用。

随着室町幕府的衰亡，五山文化也走了下坡路。在日本也发生了相当于唐宋变革的大规模变动。经过称为战国时代、安土桃山时代的国内政治对抗期之后，江户幕府诞生了（1603年）。

幕府任用了林罗山（1583—1657）作为政治外交顾问。罗山作为儒者，是站在批判佛教立场上的，但自己却以僧侣的打扮出仕。中江藤树（1608—1648）这位儒者，批判了罗山这种做法，但在日本，如果想要作为官僚在国家供职，就也不得不象罗山这样做。这是因为佛教是国教（藤树关于朱子学的知识也是从京都的禅僧那里获得的）。

但不久，幕府的将军、大名（封建领主）中，出现了尊重朱子学的有识之士，罗山的子孙（历代称为林大学头）也以儒者的形象为将军服务。其后，17~18世纪，出现了包括山崎闇斋（1618—1682）、伊藤仁斋（1627—1705）、荻生徂徕（1662—1728）等许多儒者。

荻生徂徕提倡古文辞学，模仿明朝王世贞等人的文章，改变了以前的文体。在汉诗方面替换了五山文学重视的《三体诗》，推崇《唐诗选》，以王维（701—761）、李白（701—762）、杜甫为代表的盛唐诗歌为典范加以崇尚。受到这种影响，到19世纪，在相当广泛的阶层中都尝试着作诗文，呈现出和律令时代或五山文学时代完全不同的样态。这意味着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渗透到了普通社会中。

这样，随着半认真的知识接受、引进的进展，萌生了将其活用于笑文化的动向。以荻生徂徕推崇制作诗文为发端，出现了与其说孕育了“道学先生”，不如说孕育了“文人”的倾向，不久甚至有了模仿的滑稽作品。譬如，大田南畝（蜀山人，1749—1823）以《唐诗选》或《论语征》（徂徕的作品）为基础，写出使读者进入笑世界的作品。³⁶

在此之前，明朝灭亡之后，朱舜水（1600—1682）亡命来到日本，最初是在九州，后来终于落户江户。³⁷通过他不承认清朝的思想立场就可以看出，他是个信奉、实践朱子学的华夷思想与大义名分论的人。将军的亲戚水户大名的德川光国（1628—1700），从年少时就憧憬朱子学，他禁止野蛮的殉死，整顿领内的佛教寺院等，又聘请朱舜水，让其住在自己的府邸。朱舜水同上述的渡来僧一样，不单单是思想家，还精通礼法和建筑技术。

光国萌生了在大义名分论的立场上编纂日本史的想法。有一则逸事（实际真伪不详），罗山的儿子林鹅峰（1618—1680）受幕府之命编纂日本史，将日本国的成立从中国的吴太伯到达日本开始写起，这是五山禅僧中很普遍的说法。光国知道了这件事很愤慨，让人修改了鹅峰的这种记述，同时也感觉到有必要编纂一书籍，依据《日本书纪》的记述，让人们知道日本国土是从天皇祖先神天照大神开始的。另外，人们认为他是读了《史记》的伯夷传后，联想到自己的境遇，开始发奋的。

光国开始编纂的书籍后来被称作《大日本史》，从开始编纂到二百五十年后的1906年才终于完成。但是，有一部分在18世纪已经传世了。推进《大日本史》编纂事业的流派，被称作水户学。

《大日本史》在史书形式方面的特征是，以历代天皇为本纪，朝廷的摄政、关白以及幕府的将军、执权以列传形式进行处理。而且，为了明辨大义名分，不承认神功皇后的即位，相反承认大友皇子（7世纪与天武天皇为敌的内乱时失败的人）的即位。另外，对于14世纪日本南北朝时代，则认定南朝（1336—1392）是正统。（这被称为三大特笔）特别是最后这一点，是根据这样的判断：尽管从实力而言，南朝虽然被北朝（室町幕府一方）压倒，但

³⁶ 小島康敬“‘圣人之道’和‘色道’”（《アジア文化研究》别册十六号，2007年）。

³⁷ 除了朱舜水之外，陈元赞（1587—1671）也亡命日本，活跃在名古屋。

道理却在南朝，这显然受到朱子学的影响。而且，表扬服务于南朝的人物忠心耿耿，而把追随北朝的人物视为逆臣统加谴责。朱舜水也被在某个大名的府邸看到的画感动，写了文章盛赞服务南朝的武将楠木正成（？—1336）。德川光国与朱舜水依照朱子学的大义名分论表彰正成为忠臣，这后来被利用，成为鼓舞为天皇而战的思想资源，进而酿成了近代日本“皇军”意识。

这样，光国开启的《大日本史》的编纂事业，成为朱子学的日本形态的一个流派，被连绵不断地继承下来，在其思想影响下，明治时代开展了忠君爱国教育。“日本国是根据天照大神的命令（神敕）、拥有天壤无穷的‘国体’的国家，即便是幕府的将军，也只不过是天皇的臣下而已。”这种逻辑就是由此形成的。进而，严格区别忠臣与逆臣，仅表彰前者，将其作为神（英灵）进行祭拜的逻辑也是这样准备好的。

19世纪中期，阳明学的精神主义渗透到了武士阶层，并与水户学的主张融合，成为以吉田松阴（1830—1859）、西乡隆盛（1827—1877）为代表的尊王攘夷运动的思想上的原动力。西乡倡导“征韩论”，而朝鲜政策的推进者伊藤博文（1841—1901）、山县有朋（1838—1922）是松阴的弟子。他们所主张的“国体”绝对不是日本自古以来就有的教说，而是依据17世纪以后，随着朱子学、阳明学的流入所产生的教说。

五 “三教”观念与道教、神道 附：关于风水

在中国，从5世纪左右开始，与儒教、佛教相并列的道教确立了教团组织，这三者开始被称为“三教”。日本在6世纪从朝鲜半岛吸收了儒教、佛教，但道教却没有流入。

同上所述，“天皇”的称号以及“真人”（684年，给门第最高的做官的人的称号，是“姓”之一）的语源出自道教。也有看法认为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日本建国受到了道教影响。但是，唐玄宗（685-762）想让遣唐使将道士一同带回日本，可遣唐使拒绝了。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接受道教教团是比较消极的。然而，作为知识的“三教”是众所周知的，空海在去唐朝之前，写了《三教指归》，主张相对于儒教、道教，佛教在教理上更加优越。

在中国，虽然三教在制度方面被区别开来，但在实际信仰中，也有混合、融合的一面，佛教的伽蓝守护神以及冥界信仰里，有很多与道教有关的要素。比如，以泰山信仰为基础的十王中，有一个就是阎罗王。阎罗这个名称，是源自梵语的佛教用语，但是在中国，却变为道教式的，被表现为戴冠持笏，身着中国官员服装的形象，这也作为佛教信仰的一环传到了日本，作为“阎魔王”直到现在都被人熟知。另外，也以道教的阴阳五行思想为基础，成立了“阴阳道”，不问身份高低，上至天皇，下至庶民，都广泛信奉。

13世纪以后传来的新的禅宗寺院里的伽蓝神中，也包括道教或民间信仰的神，人们都忘记了其原来的来源，就这样直接传入日本。另外，16世纪以后，印刷出版的书籍——通俗小说开始流入，比如像关羽（关帝）那样被神格化的英雄信仰也家喻户晓，日本神社佛寺的祭祀也用他的像。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没有道教教团，在日本文化中，也的确存在着道教的因素。

在日本虽然没有教团形式的道教，但不久日本独自的三教观形成了。与儒教、佛教相并列还有一个“教”，就是神道。《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所说的建国神话，就是它的思想资源，而神道的宗教教团的形成，则是13世纪以后的事情（伊势神道）。经过16世纪的吉田神道（唯一神道），17世纪的儒家神道（理当心地神道或垂加神道），18世纪形成了复古神道，它与国学运动相辅相成，鼓吹日本自古以来的具有神话性质的历史。这个潮流把皇祖神天照大神定位为最高神，帮助以天皇中心的“国体”观念的形成，也成为倒幕、回归天皇亲政之世的明治维新思想的原动力。

复古神道形成以后讲述神道史时，伊势神道等在与佛教融合、协调（神佛习合）为教义

的方面受到了批判。然而，从历史角度来讲，在接受佛教信仰的时候，其中附带的阴阳道、道教的知识就成为神道的思想资源。神道最初就是从“习合”状态中产生的，认为佛教传来以前就存在纯粹的神道“古层”的话语，只不过是虚构³⁸的。

作为复古神道以前的阶段，儒家神道的历史作用值得关注。如密教、禅宗所象征的那样，以佛教作为国教的体制，在日本是占支配性地位的，儒教作为其附属物而被学习。林罗山、德川光国，以及山崎闇斋（1618—1682，垂加神道的创始者）等人，为了改变这样的风潮，批判佛教，彰显神道，而宣传日本古来的精神风土与儒教具有亲和性的教说。这样，为了与佛教相对抗，儒教与神道站在了同一战线上。

复古神道经历了这样的阶段后，开始主张“即使儒教也只不过是外来的思想”，继承了本居宣长的“汉心”对“大和心（日本魂）”的图式，发展为强调日本的独特性、优越性。标榜“日本独特的信仰体系”的神道就这样成立了。

简而言之，所谓的日本传统精神文化，其产生的源头就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文明，在其压倒性的影响下不断地变形、发展，同时从某一时期有意识地谋求其异化，而为此被人为地、历史地建构出来的观念的产物。

最后，我想就这十年来，在日本急速普及和接受的“风水”思想说几句。

简单地概括风水的整体形象比较难，它的性质是在考虑地理、风土环境的基础上，来确定人类社会的基础（都市、建筑、墓地等）。在这一点上，日本在模仿唐设计都城的时候，就已经注意到广义上的风水思想。然而，未必能说受到了作为巫术体系的风水的影响。和上述的道教一样，虽然在每个要素层面中都传来了风水的知识，但是作为综合的体系的风水论是否在日本得以接受，还无法确定。

从这一点来说，倒是现在正在进行的情况可以说是风水在日本史上首次被广义而正式地接受。但是这种情况（和自古以来的接受相同），与中国本土或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风水是有着微妙的差异的，可以看出，日本的有选择地接受的“传统”到现在还有生命力。

³⁸ 末木文美士《日本宗教史》（岩波书店，2006年）。

1 中世日本的中国铜钱¹经济

1) 古代日本货币史概要

a. 古代的铜钱铸造业

本节的课题是论述以中国铜钱为主要货币而展开的中世日本经济的特质，首先从构成其前史的古代货币史概要讲起。

日本铸造货币的历史是在7世纪后半叶开始的。现在被确认的日本最古老的铸造货币是被称作“无文银钱”银币。²现存出土的有20多件，这是中央穿小孔的、直径2公分左右的银币，因为完全没有铭文，所以就称之为“无文”。这种银币的原料产地、铸造主体、铸造的具体开始时间都不清楚，但我们知道它在天武天皇政府铸造7世纪后半叶最古老的铜钱富本钱时就已经开始流通了。

另一方面，至少在683年以前开始铸造的富本钱是圆形方孔、有着“富本”铭文的中国铜钱式样的铜钱。由于铸造了富本钱的武朝处于663年白江村的战败而对外关系紧张加剧之中，所以这是个强有力地推进中央集权化的、建立了古代律令国家基础的时代。开始采用“日本”这一国号也是在这一时代，此外，认为此前的“大王”在这一时期被叫做“天皇”的说法很有说服力。天武天皇的志向是中国型的专制国家，积极地引进律令制、都城制等中国的制度，而铜钱的铸造也是其中一环。但是，习惯于使用银钱的人们不容易接受原材料价值低的铜钱，第一次铸造铜钱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古代国家第二次铸造的铜钱是708年初铸的和同开珎。直到1991年将富本钱确认为最古的铜钱为止，它长时期被认为是日本最古老的钱。和同开珎被认为是作为面向710年完成的平城京建设的财政手段（对工人的支付手段）而铸造的。和富本钱的时候不同，律令制政府好不容易成功地将其普及，但其后苦于市场价值的下跌，每次都必须靠着发行新钱来弥补。

总之，其后，律令政府到10世纪后半叶的约300年间，包括富本钱、和同开珎在内，不断地铸造了总计13种铜钱，而最后是在958年第一次铸造了乾元大宝，铜钱铸造事业就此中断了。其直接原因是原料铜的主要产地长门国³长登铜山的衰落，而另一个原因是随着对外紧张关系的缓解，古代国家放弃了此前采用的专制国家的大规模财政。由于国家财政大幅度缩减，作为补贴财政手段的铜钱铸造业就没有必要了。

b. 商品货币时代和信用经济的萌芽

政府一中止铜钱铸造业，铜钱就迅速失去信用，在11世纪初，铜钱的流通终于断绝了。此后，到12世纪中叶的约150年间，日本社会经历的是没有金属货币，只是依靠米和绢布（绢、麻布）的商品货币（实物货币、物品货币）时代。说起10世纪后半叶，那正是高丽或越南等东亚各国开始铸造铜钱的时期，而在同一时期日本却放弃了铜钱经济。

米或绢布替代铜钱，乍看也许是返祖的，即逆经济发展阶段而动的，但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商品货币经济，不是像物物交换那样，是物就行，因为其只限于承认米和绢布这样的东西才有货币的资格。

¹ 原文为中国钱。这里的中国钱指的是中国古代的铜钱，为便于理解，译为较通俗的中国铜钱，下文同此一译者。

² 关于无文银钱、富本钱、和同开宝，请参考今村启尔《富本銭と謎の銀銭—貨幣誕生の真相》（小学馆，2001年），此外，关于普通古代货币史，请参考荣原永远男《貨幣の発生》（樱井英治、中西聪编《新体系日本史12 流通经济史》山川出版社，2002年）。

³ 今山口县一部一译者。

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个时代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信用货币（票据），即日本史上最初的信用经济的发展。使用米或绢布这种搬运不便的货币，相反却使作为货币节约手段、运输省力化手段的票据结算发达起来。这样，虽然在世界史上广泛确认的信用经济在商品货币时代才发达的倾向，却不适用于这一时期的日本。⁴

开出这个时代的票据类的不是民间的金融業者，而是中央财务机构的大藏省或负责诸国征税的国守（到这时，所谓遥任，即不赴任国任职而留在京都的例子增多起来）。⁵大藏省或国守接受其他官厅的经费请求后，就发出命令其管内的负责出纳的人予以支付的支付命令书，请求人将这拿到负责的人那里，接受经费的支付。

在国守发出的支付命令书中支付地是地方（外地）的也不少，而在这种情况中，请求人本身去地方要花费成本，为此，也有民间金融業者的“借上”将这些支付命令书收集起来买断，代行在地方的回收业务。这可以说是票据贴现早期的例子。这样，日本最初的信用经济是从10世纪后半叶～12世纪财政体系中产生出来的。

然而，这些票据类的东西在中世入口的12世纪消失了。这也有国守征税能力降低或与此伴随的财政体系改组的影响，但12世纪中叶铜钱经济的复活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可以认为运输能力优良的铜钱的普及使票据结算的必要性下降了。⁶

12世纪后半叶，日本社会再次突进到金属货币的时代。但这不是像以前那样靠自己国家铸造的货币，而是由于中国铜钱，特别是北宋铜钱的大量流入造成的。而对这中国铜钱的依赖一直持续到宽永通宝的铸造走上正轨的17世纪后半叶。

这样，前近代的日本货币史沿着自己国家铸币时代—商品货币时代—中国铜钱时代—自己国家铸币时代这种复杂路线而变迁，其中中国铜钱时代在时代区分上大体和与中世一致。为什么日本的中世国家不自己铸造货币，一直依赖中国供给呢？此外，这种对中国铜钱的依赖对中世经济有什么影响呢？这些在考虑中世日本的国制上是极其重要的问题。

2) 中国铜钱经济的开始

a. 宋钱的流入

北宋（960～1127）在中国历代王朝中是少有的铸造大量铜钱的王朝，北宋铜钱直到明代都在中国国内流通中占居首位，虽然如此，但中国从北宋时代开始就已经为铜钱的短缺而苦恼。原因之一是对周边各国铜钱的流出，铜钱的流出从紧接着的南宋（1127～1279）时代就更严重了。特别是在1199年发出禁止对日本、高丽带出铜钱的法令，可以得知日本被列为宋钱的主要流出对象。

另一方面，看看日本方面的史料，在1150年的土地卖券中，铜钱在隔了约150年后再次登场，1179年宋钱的流通量达到了朝廷研究是否停止使用宋钱的程度。1193年朝廷终于决定禁止宋钱的使用，但尽管有朝廷的禁令，民间使用宋钱一点儿没有衰减，结果是一点点地承认了宋钱的使用。和不管朝廷怎样督促使用铜钱但人们就是不想使用的古代相对照，在这个时期不管朝廷如何禁止使用铜钱，人们也不停止使用。其理由无非如森克己业已指出的，

⁴ カール・ボランニー《經濟の文明史》（日本经济新闻社，1975年，原著1957年），フェルナン・ブローデル《物質文明・經濟・資本主義 15—18世紀 I—2 日常性の構造》みすず书房，1985年，原著1979年），抽稿《中世の貨幣・信用》（櫻井英治、中西聡編《新体系日本史12 流通経済史》山川出版社，2002年），同《借書の流通》（小野正敏、五味文彦、荻原三雄編《モノとココロの資料学—中世史料論の新段階》高志书院，2005年）。

⁵ 关于10～12世纪的票据类，请参考大石直正《平安時代後期の徴税機構と莊園制—解体期の封戸制度》（《东北学院大学论集》历史学、地理学1号，1970年），川本龙市《切下文に関する基礎的考察》（《史学研究》178号，1988年），胜山清次《中世年貢制成立史の研究》（塙书房，1995年），本乡惠子《中世公家政権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佐藤泰弘《日本中世の黎明》（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⁶ 注4抽稿《中世の貨幣・信用》。

宋钱是在民众的主导权下开始流通的货币。⁷

另一方面，12世纪末，在东国⁸建立的武家政权的镰仓幕府在1226年禁止准布⁹的货币性使用，发出强制使用铜钱的法令。幕府和朝廷不同，对宋钱采取宽容的态度，而这个法令也是中世权力明确地出台宋钱的基准货币化的最初的意思表示。而从这时开始，宋钱迅速地获得米、绢布所具有的货币功能。

b. 宋钱获得货币功能的过程

通常提到货币的功能，就是指 1，一般的交换手段（流通手段），2，支付手段，3，价值尺度功能（计算手段·计算货币），4，财富的储藏手段这四种功能。在近代货币中，将这些功能统和而有机地结合起来，但在前近代货币的场合，这些常常是分裂的，按照各种功能使用不同货币的例子也并不鲜见。而中世的铜钱开始时也不是作为这些所有的功能都具备的完全货币而登场的。¹⁰

和作为有关建造都城的国家的支付手段而由国家拓展的古代铜钱相对，宋钱作为一般的交换手段首先是在民众中扩展的，这是其特征。但宋钱到从米或绢布中获得货币功能而作为货币形态完成前，还需要长久的时间。下面，我们按照松延康隆¹¹、大田由纪夫¹²的研究来概述这一过程。

第一个时代划分是宋钱获得绢布作为支付手段的功能的1220年代后半期。在贡租中，以前用绢布等纤维产品缴纳的部分以此时为时代划分而全部变为由钱缴纳了。上述的1226年的幕府法也被定位于其中一环，而同样绢布具有的价值尺度功能也在13世纪中叶前为宋钱所获得。

第二个时代划分是宋钱获得米作为支付手段功能的1270年代。最明显地显示其变化的是这个时期发生的所谓年贡用铜钱缴纳。米的价值尺度也在1300年代大体为宋钱获得，于是，14世纪初，宋钱完成了货币形态。

而在发生年贡变为铜钱缴纳的1270年代，不光是日本，也包括缅甸或越南等国，东亚全领域发生了向中国铜钱经济的转换。这个时期，中国的南宋首都临安于1276年陷落（南宋灭亡），代替南宋统治中国的元朝（蒙古）在翌年的1277年采用纸币专用政策而禁止国内铜钱的使用。结果，在国内失去使用渠道的铜钱从中国大量流出，这就带来了这个时期东亚全领域的使用中国铜钱扩大的共通现象。日本的铜钱缴纳制的普及也明显地是其一环，这个现象用所谓流通经济的发达这一国内的要因是不能说明的。毋宁如大田指出的，这时大量流入的中国铜钱带来了其后日本加速的流通经济的发达，这种看法应该是妥当的。¹³

3) 中国铜钱经济的展开

a. 市场经济的发达和符契的登场

年贡的铜钱缴纳制不单是收取方式的变更，而且对其后经济整体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在庄园当地，和以前将生产物原封不动地作为贡租送到中央就可以的做法相对，在铜钱缴纳

⁷ 森克己《続々日宋貿易の研究》（国书刊行会，1975年）。

⁸ 今日本本州的关东地区一译者。

⁹ 用布来换算租庸调的价值，叫做准布一译者。

¹⁰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卡尔·波兰尼的“全部目的货币”、“特定目的货币”的概念是有效的。请参考注4ポランニー一书，第3章“貨幣の意味論”（原著1957年），以及他的《人間の経済I》（岩波书店，1998年，原著1977年）。

¹¹ 松延康隆《錢と貨幣の觀念—鎌倉期における貨幣機能の変化について》（《列島の文化史》6号，1989年）。

¹² 大田由纪夫《12—15世紀初頭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銅錢の流布—日本・中国を中心として》（《社会经济史学》61卷2号，1994年）。

¹³ 前注大田论文。

制下，必须在当地将这些生产物卖掉、换成铜钱，将由此得到的铜钱送到中央。铜钱缴纳制使作为进行这种卖掉、换钱的场所的定期市场遍布于日本全国各地。

被卖掉的生产物在卖掉的时点转化为商品。一部分在地域内消费，其他一部分给远隔地区的商人，被运送到包括有巨大消费人群的畿内等远隔地区去。从物流的视角出发，以前作为贡租用船运出当地，送给中央的生产物，一到铜钱缴纳制后，就成为商品被船运出，送到中央了。于是，年贡铜钱缴纳制创造出空前庞大的商品流，其结果是，日本列岛从此以后，展开了正规的市场经济。¹⁴而在这一经济发展下，接着平安时代的信用经济发达的第二次高峰到来了。

给这个时代赋予特征的信用货币是符契¹⁵。日本汇票的源流是在 13 世纪前半叶发生的附有他地返还特约的特殊借用证书。这不久就被转用为送款的手段，或者也被作为商业上的结算手段，和江户时代的汇票相联，符契也是作为其中一种类型而发展出来的，这是肯定的。只是符契有着普通汇票所没有的巨大特征。这就是许多符契是有着 10 贯文面值的定额票据。符契常常以一个、两个的个数来数，说一个就是指 10 贯文，说两个是指 20 贯文。

符契定额的理由首先是以不特定多数的人之间反复转换流通作为前提的。因为如果只做一次就结束作用的话，定额就没有必要，像江户时代的汇票那样在额面上有尾数就行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符契具有和纸币相近的性质。

而说到 10 贯文，以今天的货币价值而言，相当于 100 万日元左右，所以是相当高额的货币。这是由批发商开出的，这样合起来考虑，符契肯定是在远隔地之间巨大的商品交易中产生的。

符契的开出地、支付地很多是畿内或其周边地区，常常是经远隔地商人之手带到地方，使用于购买米或各地特产。于是，一旦给了地方生产者的符契，以后就作为年贡贡献的手段再次送往庄园领主的畿内，换成钱。从这种高额信用货币的流通中也能看出中世后期信用经济的发达状况。

b. 14 世纪的铜钱升值和后醍醐天皇的货币发行计划

一进入 14 世纪，13 世纪后半叶的通胀就停止了，日本转而遭到钱荒（铜钱短缺）、钱贵。松延康隆阐明的 14 世纪显著的地价下跌正是表示这种钱荒、钱贵进展的现象。¹⁶后述的后醍醐天皇的货币发行计划很可能也是企图乘着这钱荒、钱贵顺风车来进行的。而在 14 世纪后半叶，高丽·李氏朝鲜或越南自己发行铜钱或纸币的动向也很强，所以 14 世纪东亚规模的钱荒、钱贵在扩展着，其原因无疑是中国铜钱流出的放慢。¹⁷

储蓄铜钱的习惯从 14 世纪后半叶开始在日本各地正规化也和此事并非没有关系。松延推测，储蓄铜钱习惯的扩大，即钱获得财富的储藏功能促使钱的储蓄，这转而又成为钱荒、钱贵的原因，但更可能的是原因和结果的颠倒。似乎应该解释为在长期的钱荒、钱贵倾向中对将来铜钱供给的不安和对钱贵加剧的预测，使储蓄铜钱的习惯扩大了。¹⁸

在这种钱贵倾向中，中世日本只出现了一个考虑发行铜钱和纸币的人物，他就是后醍醐天皇（生卒年 1288~1339，在位时间 1318~1339）。

关于后醍醐天皇的货币发行计划的说明是，他要恢复以往的天皇铸造货币的大权，或试

¹⁴ 关于年贡的铜钱缴纳制和市场经济的关系请参考注 4 拙稿《中世の貨幣・信用》及《足利義満と中世の経済》（《ZEAMI》4 号，2007 年等）。

¹⁵ 关于符契请参考拙著《日本中世の経済構造》（岩波书店，1996 年），关于一般的中世的信用经济请参考注 4 拙稿《中世の貨幣・信用》及《日本中世における貨幣と信用について》（《历史学研究》703 号，1997 年）。

¹⁶ 注 11 松延论文。

¹⁷ 拙稿《錢貨のダイナミズム—中世から近世へ》（鈴木公雄编《貨幣の地域史—中世から近世へ》岩波书店，2007 年）

¹⁸ 前注拙稿。

图向将基础放在货币经济上的国家转换，而《太平记》卷 12，明确记述着货币发行是为了营建大皇宫而计划的。名义货币，即在额面价值超过其材料价值的货币，给发行者带来货币发行收入，而这种利益，发行纸币要比发行铜钱更大。从不仅是铜钱，而且将纸币的发行也纳入视野中，可以得知后醍醐的货币发行计划也被作为为挤出营造皇宫的费用的财政弥补政策来构想的。这一点，是和与营造都城事业有着密切关系而推进的古代律令政府的铜钱铸造业完全相同的想法，我们不得不说，后醍醐的货币发行计划在这一点上依然还停留在古代的想法上。¹⁹

后醍醐的货币发行计划最终没能出笼，而说起后醍醐是从何处引进这一主意的，如果着眼于纸币这一想法的话，那么自然会认为这还是从中国来的。特别是从后醍醐想让铜钱和纸币并用来看，其模式不是采用纸币专用政策的元朝，而是应该从采用铜钱和纸币并用政策的南宋来寻求。²⁰

后醍醐天皇之外的执政者之所以没有进行发行货币的想法，归根结底是因为企图进行像皇宫营造计划那样的大事业者中世只有后醍醐一人。如后述的那样，可以说作为财政弥补政策的货币发行和中世日本那样的“小政府”是无缘的。²¹

4) 中国铜钱经济的终结

a. 明钱的流入和明钱争论

12 世纪中叶由于大量宋钱的流入而开始的中国铜钱经济虽然在途中经历了若干小变动，但到 15 世纪后半叶为止大体上保持了稳定的状态。1368 年，中国建立了明王朝后，洪武通宝（1368 年首铸），永乐通宝（1411 年首铸）、宣德通宝（1434 年首铸）等明钱开始流入，但明钱并没有取代宋钱，流通铜钱的首席依然是由宋钱占居。

然而，一到了 15 世纪末，此前经过 3 个世纪维持的中国铜钱经济也逐渐开始出现了动摇的征兆。其动摇首先出现了仅偏好特定的钱种而拒绝其他钱种的选钱行为，为予以取缔这种现象的选钱令此后由室町幕府或地方权力的战国大名们频频发出。

关于初期选钱应注意之点是，除了老化的钱，当时刚上市的明钱成为规避的对象。西日本代表性的战国大名大内氏在 1485 年发布的选钱令是作为选钱令的第一次出现的史料而为人所知，而这里最令人看作问题的也还是对明钱的选钱行为。对明钱的规避不久也波及畿内，但更牵动研究者关注的是，明钱规避不光是在日本，在同一时期也在中国发生这一事实。

关于中日几乎是同时并行的明钱规避发生的原因，现在提出三种学说。最开始真正研究这个问题的足立启二从 1436 年明政府开始向银财政转换，铜钱变成不是国家的支付手段中寻找中国规避明钱的原因，以此解释日本的明钱规避是受到波及的。²²立足于这一理解，足立提出的中世日本是中国内部货币圈的主张在 1990 年代初的日本史学界引起很大的轰动，但这个学说不久就遭到明朝从银财政以前就采用钞法（纸币专用政策），铜钱和国家财政相联系的事实大体是不存在的这一大田由起夫的批判而退出。代之而起的大田所注意的是明钱铸造量之少，即其稀少性。在理论上也可以确认大量存在是为作为小额货币能被接受的重要条件，但明钱没有满足这个条件，这是大田的解释。²³而近年来提出第三个说法的是黑田明伸。黑田注意到，在北京对永乐通宝的选钱发生在 1460 年代，而其契机是从 1456 年开始江南私铸永乐通宝的流入明显化了，他推测这私铸永乐通宝不久就不以北京为目标，而是转向

¹⁹ 注 15 拙稿《日本中世における貨幣と信用について》。

²⁰ 关于南宋的货币政策，请参考高桥弘臣《南宋江南の貨幣一元朝貨幣政策との関連をめぐる考察》（《史学杂志》105 编 1 号，1996 年）。

²¹ 注 4 拙稿《中世の貨幣・信用》。

²² 足立启二《中国からみた日本貨幣史の二・三の問題》（《新しい歴史学のために》203 号，1991 年）及《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錢貨の流通》（荒野泰典等编《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III 海上の道》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 年）。

²³ 大田由起夫《15・16 世紀中国における錢貨流通》（《名古屋大学东洋史研究报告》21 号，1997 年）。

日本。即黑田认为，北京和日本几乎同时发生明钱规避的原因正在于同一的私铸永乐通宝的流入。²⁴

姑且不论已经被否定的足立说，大田说、黑田说哪个正确，现在也没有结论，此外也不能说今后就没有第四种学说问世的可能性，而在这里我指出的是，这个问题对中日双方的15世纪货币史来说是共通的课题，我期待着今后研究的进展。

此外，稍稍触及一下明钱走过的其后的足迹，在明钱中洪武通宝和宣德通宝最终没能加入精钱（以宋钱为中心的良币）的队伍，与此相对，永乐通宝到了16世纪中叶，逐渐获得了精钱的评价。特别是在东日本，永乐通宝的评价上升，成为这一地区最有代表性的精钱。²⁵这样，永乐通宝从首铸以来经历了约150年，终于在日本获得了市民权，而其背景其实是精钱整体的稀少化这一确实的事态的进展。

b.精钱的稀少化和私铸铜钱

铜钱的流通量只要没有追加供给就会减少。特别是精钱易于收藏，此外，由于自然老化、质量下降而不断地向着劣钱降格，所以在市场上的稀少化速度较之其他钱种要快得多。此外，这时终于成为精钱之一种的永乐通宝大量地流出到获得更高评价的东日本的可能性很大，畿内、西日本精钱的稀少化以极快的速度进展。精钱的稀少化不仅限于精钱，不久将会招致铜钱整体的稀少化。这个时期，起到补充作用的只有私铸铜钱。

私铸铜钱由有在日本国内铸造的和在中国铸造的，特别是后者，由16世纪中叶的嘉靖大倭寇大量带进国内，在量的方面显示出凌驾于精钱的势头。²⁶与此相伴随，民间像开始时那样将私铸铜钱从流通中完全排除的事少了，相反，在给予比精钱低的价值后，使之通用的习惯一般化了。商人们处于精钱本身稀少化中，与其拘泥于难于搞到的精钱，不如选择虽然品位低但充足的私铸铜钱的交易。

但是，以私铸铜钱好不容易维持的铜钱经济也终于迎来破产时期。

特别在西日本，16世纪后半叶在中、高额交易领域使用铜钱失败，1570年前后的使用铜钱向使用米转换，接着从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从使用米到使银，这样的转换接踵而来。²⁷持续了400年以上的中国铜钱经济终于迎来了终结的时刻。

关于这个原因，大概应按照黑田明伸的学说，即从中国的铜钱供给断绝中寻找。黑田指出，第一，1566年~1567年明政府在压制倭寇根据地漳州的同时，解除了一部分海禁（铜钱的走私组织的消灭）；第二随着马尼拉—阿加布尔的定期航线的开设，普特西银流入钱的秘密制造基地的中国东南沿海，同一地区的使钱圈变为使银圈（铜钱的秘密制造组织消失），他认为这些断绝了从中国向日本供给的铜钱。²⁸

中国和日本国内这两个铜钱供给源中失去一个，日本国内铜钱的稀少化的进展就更快

²⁴ Kuroda, Akinobu, "Copper Coins Chosen and Silver Differentiated: Another Aspect of the 'Silver Century' in East Asia", ACTA ASIATICA 88, 2005, 及《東アジア貨幣史のなかの中世後期日本》（鈴木公雄編《貨幣の地域史—中世から近世へ》岩波書店，2007年）。

²⁵ 中島圭一《西と東の永楽銭》（石井進編《中世の村と流通》吉川弘文館，1992年）。

²⁶ 在这里我想对中国铜钱输入的承担者说一句。从中国铜钱真正开始流入的12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中国的朝代是宋朝和元朝）及中国放宽海禁政策的16世纪，包括倭寇势力在内的做走私贸易的是主要的承担者。另一方面，明朝的海禁政策有实效性，实际上从倭寇活动衰落的14世纪末到15世纪，虽然朝贡贸易是中国铜钱输入的主要渠道之一是无可置疑的，但仅此是不能满足日本国内需求的，因此，阐明其他流入渠道迫在眉睫，而最近以琉球为媒介流入日本的渠道被看作是有说服力的（桥本雄《撰銭令と列島内外の銭貨流通—“銭の道”古琉球を位置づける試み》，《出土铜钱货币》9号，1998年）。但其量被推定为远远不及中国铜钱大量流入的13世纪后半叶的流入量。

²⁷ 浦长濂隆《中近世日本货币流通史》（劲草书房，2001年）。

²⁸ 黑田明伸《中華帝国の構造と世界経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4年），及《16・17世紀環シナ海経済と銭貨流通》（《历史学研究》711号，1998年，后再收录于历史学研究会编《越境する貨幣》青木书店，1999年）。

了。西日本从使钱向使米的转换就是其最显著的表现，而这一时期发生的土地制度上的重大转变，即从贯高制向石高制的转换也是伴随这个现象而来的。对年贡或军役基准的土地生产力的计算此前是用换算为铜钱的贯高制，但是从 1580 年代开始向换算为米的石高制的转换在进展，以至江户幕府全面采用。这乍看是返祖的现象也由于将其看作是中国铜钱供给断绝的影响而能够合理地理解。

另一方面，在铜钱比较充足的东日本，基本上没有发生向使米的转换，但铜钱的稀少化在这里也确实进展着。明确地表示这一情况的是低钱（私铸铜钱等劣币）的价格腾贵。在 16 世纪后半叶的奈良，有种叫做铔的低钱在流通，而开始时 100 文=2 升 6 合米左右的价格在 1590 年时暴涨为 100 文=1 斗 6 升。²⁹同样的铔价格暴涨在京都、伊势、越前等地都能得到确认，而这些可以认为都是伴随着铜钱的稀少化的现象。

伴随着铜钱的稀少化而发生的另一个现象是精钱的空位化。和低钱价格暴涨并行，位于流通钱最高位的精钱产生的是实体的消失和计算货币化的动向。³⁰譬如，我们知道在奈良，此前有着 100 文=2 斗米左右的高价的精钱在 1590 年时，失去了实体，转化为被称作“本钱”的纯粹的计算货币。³¹而在东日本获得很高评价，建立起作为“超精钱”地位的永乐通宝不久也走上完全相同的道路。

统治关东地方的战国大名后北条氏虽然原则上以永乐通宝来缴纳各种税收，但是实际上也不得不承认用黄金、米谷、漆、绵等的代缴，东海地方³²此前用永乐通宝缴纳的年贡从 1584 年时起也以永乐 1 贯文=铔 4 贯文的比价逐渐地转变为以铔替代缴纳。³³永乐通宝虽然尚未完全失去实体，但上述事实说明了即使在东日本，永乐通宝的稀少化也在稳步进展。而到了下个世纪的 17 世纪，永乐通宝的空位化终于成为现实。

1608 年，刚建立不久的江户幕府确定了永乐 1 贯文=京钱（铔）4 贯文=金 1 两的公定兑换率，同时禁止永乐通宝的流通，而到此时为止，永乐通宝作为流通钱几乎失去了实体，禁止流通也是对这一现状的追认措施。虽然如此，上述的公定兑换率也将永乐通宝纳入，这是因为永乐通宝作为计算货币还存在着。这永乐通宝的实体消失和计算货币化也不外是中国铜钱供给断绝的影响而已。³⁴

c. 宽永通宝的发行和三货制度的建立

17 世纪前半期，小额货币的短缺变得严重，这是民间、诸藩、幕府被迫分别应对这一事态的时代。民间的应对是进行中世以来的私铸铜钱生产和民间金融业者的纸币（私札）的发行等，此外，作为诸藩的应对，可以举出在藩营工场有组织的私铸铜钱生产或低品位的银币、纸币（藩札）的发行等具体的举动，但从根本上打破这小额货币短缺局面的是江户幕府在 1636 年开始铸造的宽永通宝。宽永通宝开始时铸造的很少，为此在暂时的时期内继续和古钱（中国铜钱及模仿它的私铸铜钱）并用，但 1670 年江户幕府终于禁止使用古钱，实现了向宽永通宝的一致化。大概此前，宽永通宝的铸造已经走上正轨，建成了可以稳定供给的体制。于是，日本确立了仅为本国铸造的货币体系，约达 500 年的中国铜钱经济终于谢幕。

另一方面，其后江户幕府也开始发行高额货币的金银通货。中世是只用中国铜钱的单一通货时代，所以，在这一点上也显示出江户幕府币制的划时代性。

作为中世的高额货币，有如前述的信用货币的符契，但这符契到 16 世纪初突然就消失

²⁹ 毛利宪一《ヒタ銭の価値変動に関する研究》上、下（《日本历史》310、311 号，1974 年）。

³⁰ 注 4 拙稿《中世の貨幣・信用》，注 15 拙稿《日本中世における貨幣と信用について》，注 17 拙稿。

³¹ 注 29 毛利论文。此外，本多博之《战国织丰期の货币和石高制》（吉川弘文馆，2006 年）阐明了毛利氏领国的“古钱”也有着同样的历史。

³² 即东海道，日本古代七道之一，今本州中部、关东沿海一带。—译者

³³ 小叶时淳《日本货币流通史》（刀江书房，1969 年）。

³⁴ 注 4 拙稿《中世の貨幣・信用》，注 15 拙稿“论日本中世の货币和信用”，注 17 拙稿。

了。代之而起出现的新的巨额结算手段是随着矿山开发而产出量增加的金银。只是这一阶段的金银在品位、形状上尚未一定，此外，秤也有地区差异，这些妨碍了远隔地的结算。完成全国统一的丰臣秀吉在统一度量衡、建立全国市场基础的同时，铸造了作为赏赐、赠答用的金币的天正大判，但作为真正通货的金币以江户幕府铸造的庆长小判为嚆矢。另一方面，作为银币除了有各大名在各自领国内流通的领国银外，为了贸易用、远隔地结算，原封不动地使用精炼的、高品位的灰吹银，但不久都被统一到江户幕府铸造的庆长丁银中。这样，江户幕府就确立了金银铜构成的所谓三货制度。

而自 16 世纪以来，日本有东日本主要使用金和相反西日本则使用银的地域性，这一倾向在江户时代也被一成不变地继承下来。

优质的金矿，像甲斐、伊豆、佐渡等大多分布在东日本，与此相对，包括石见山在内的优质的银矿则集中在西日本，于是就产生了那样的配置，但作为西日本银普及的背景，不能忽略通过贸易而向东亚世界范围开放的广大的地理环境。与计数货币的金币相对，银币在此后长时间地继续着秤量货币也是和它是东亚国际通货之事深深关联。不久，江户幕府以锁国政策断绝了和荷兰、中国、朝鲜、琉球之外的交涉，但过去东亚贸易的痕迹的“东使金，西使银”印刻在国内经济中，直至幕末。

5) 中国邻国型国家和边境型国家

日本从 12 世纪中叶到 17 世纪前半叶，将近 500 年间，不自己铸造铜钱，而持续地依赖中国的供给，而如前所述，不能忽略这一期间和时代划分的中世几乎一致的事实。

看看同时期周边各国的状况，朝鲜（高丽 918~1392，李氏朝鲜 1392~1910）、越南（10 世纪中叶后）、琉球（15 世纪后半叶，从第一尚氏王朝到第二尚氏王朝初期）等中国的近邻并受其影响很大的诸国应该说都有自己铸造铜钱的倾向，并且这些国家中很多采用的是和古代日本同样的专制国家体制，这也是很重要的。琉球国制和其他国家稍异，但即使这样，引人注意的是它开始自己铸造铜钱的时期和中央集权化最强的时期是一致的。³⁵

对此，远离中国的爪哇（马甲巴伊特王国，1293~1520 年时）只是使用中国铜钱和模仿它的私铸铜钱，显示出和中世日本十分相象的货币状况。并且虽然爪哇是港口市场国家（努加拉），中世日本是封建制，国家体制不一定相同，但在都是极其分权的国家这一点上是共通的。如果将像朝鲜或越南这样的和中国邻接、建立了中国型中央体制国家群作为中国邻国型国家，相反将像爪哇那样的远离中国、展示出和中国相异的分权样态的国家群叫做边境型国家，那么日本从古代到中世可以说是从中国邻国型到边境型的国家性质的大幅度方向转换。而如已述的那样，在这里可以认为对外紧张的缓和起到很大作用。

所谓中国或中国邻国型国家采用的专制体制是包括古代日本律令体制的、以对外战争的威胁为契机而采用的战时体制，是以人员、物资的大量移动为前提的极其非效率的体制。而是否自己铸造货币的问题也和这财政结构密切相关。

对此，中世日本的政府，不管是朝廷还是幕府，既没有首领住大宫殿的习惯，也没有和异民族作战而财政被慢性压迫的经验。元（蒙古）的侵袭是一过性的事件，即使是国内的会战，原则上也是当时的武士以自筹资金来作战，所以国家有大规模的财政完全没有必要。作为财政手段的货币发行可以说和中世日本的“小政府”是无缘的。

另一方面，对独立经常被威胁的朝鲜或越南等国家而言，独自铸造货币不单单是经济政策，而且也具有作为自主独立象征的意义。朝鲜虽然民间几乎不予以接受，但还是固执于自己铸造铜钱就是为此。³⁶

³⁵ 东恩纳宽惇《南島通貨志の研究（前編）》（《拓殖大学论集》9号，1955年，后再收录于《东恩纳宽惇全集4》第一书房，1976年）。

³⁶ 本节以货币的经济功能为中心进行了论述，但要附加一句，货币除此之外，还有这里叙述的政治、象征

这样看来，在东亚，和中国的距离、对外紧张的强弱是设计国家体制时的重要因子，这是毫无疑问的。分权的国家有在离中国地缘政治距离远、对外紧张相对弱的地区产生的倾向。而将日本作为这种分权国家设计中的一个形态，不是就能够理解中世日本的国制了吗？³⁷

的功能或宗教、咒语的功能。

³⁷ 马克·布劳赫在触及西欧的异民族侵入终结的意义时，这样说：“不管‘最后的入侵’的研究多么富有教训，但为了这些教训，忽略入侵本身终结这一最重要的事实也是不行的。到此时为止，外部来的军队的掠夺和各民族的大迁徙给予西欧历史和世界其他部分的历史以真实的基础。此后，西欧就免于外民族的入侵，但世界其他部分没有这样，或者几乎没有这样。……必须认为，我们和日本之外的几乎所有地区所不共有的这种异例的特权，是在深刻的意义上的欧洲文明的基本要素之一。”（マルク・ブロック『封建社会Ⅰ』、みすず书房，1973年，第56-57页）这段话在理解东亚世界的中世日本的地位上也是至理名言。

- 1 美术史观点的特性
- 2 无制作者参与的人的移动
- 3 美术品的移动和收藏的形成
- 4 选择地接受样式
- 5 对规范性的易接近—从朝鲜出发的视点

1 美术史观点的特性

在这篇小论文中，我想从东亚美术史的观点出发，特别是从中日之间美术交流的人和物的移动来考虑关于中国文化的传播与日本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的诸形态的命题。在论述具体的题目前，我想确认一下讨论的几个前提条件。

首先，我要举出的是关于美术的概念。从1990年前后开始，日本热烈地讨论过美术史学的建立问题，但包括日本在内，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世界的汉字文化圈中，大致没有美术这个词汇或概念。美术是近代从西洋移植过来的概念，在这一概念的优势性下，从近代以后关于近代以前各种造型艺术的概念或思想被重组而至今日。¹

譬如，以造型艺术的种类为例。在美术史中，建筑、雕刻、绘画等被作为主要的种类，但这些美术的种类作为讨论过去东亚世界的框架是不能充分发挥功能的。在汉字文化圈中，近代以前，被最强烈表象的种类是文人的意识形态，被标以最高价值的书画在近代的美术观念下被分为书（法）和画，画作为绘画被重组，书（法）被置于更低的地位而边缘化了。相反，另一方面，建筑和雕刻从来就是专业工匠的手工，不在艺术范畴里，这次却在美术的概念下，被赋予了相当高的价值。从这种小小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知道以近代以后的美术概念为尺度来论述近代以前的古代、中世、近世中日之间的美术交流，自然是有局限的，这是我想事先说明的。

其次，我想确认的是美术品和所谓通常东西的区别。美术品虽然是物理性的东西，但不光是有经济上的价值，而且不可分离地具有和这种经济性对价或资本不能交换的美的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美术品和那些不可分离地具有文化或历史等象征性的、被称为文化遗产或文物的没有什么不同。美术品或文化遗产、文物所具有的象征性就是在赋予方面和被赋予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斟酌其意义或价值的程度。通过建立两者关系的场或结构，每个美术品、文化遗产、文物才会孕育社会性，同时具有意义，在历史中发挥功能。因此，在这种具有象征性的特别价值的东西在中日之间移动时，不要忘了中日双方的力学都在不断地起着作用。

在以上前提的基础上，本稿对给定的命题，规避概论从古代到中世的中日间美术交流全貌的写法。本稿的方法应该说是举出极有特色的事例为论题，同时提示讨论的材料。

2 无制作者参与的人的移动

¹ 关于日本的美术、美术史学制度的讨论以北泽宪昭的《眼の神殿—「美術」の受容史ノート》（1989年，美术出版社）为嚆矢。其他的有：木下直之的《美術としての見せ物》（1993年平凡社）、高木博志的《近代天皇制の文化史の研究—天皇就任儀礼・年中行事・文化財》（1997年，校仓书房）、佐藤道信的《〈日本美術〉誕生—近代日本の「ことば」と戦略》（1996年，讲谈社）等先驱性的业绩。以近代美术史学的言说为问题的国家研讨会的报告有以下作品：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编《語る現在、語られる過去—日本の美術史学100年—》（1999年，平凡社）笔者负责这一国际研讨会第二会议“内なる他者としての東アジア”，将第二会议的讨论归纳为第二会议报告，请参考。

中国美术给日本以影响并传播的不光是一般论及的样式，即除了图像、色料、支持材料等作品中具备的各种形态或材料之外，制作理念或技术、鉴赏法等和美术品相关的人们的营造作为也被包括在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美术对日本的影响和传播及于物心两面，作为和造型相关的各种有形无形的制度长期地在日本被作为规范。在这种可以说压倒性的美术影响传播的关系中，当然，重视数量众多的美术品制作者的作用恐怕是一般的见解。

但是，在中国美术对日本的影响传播中，作为双方中介的制作者的存在是极其淡薄的。在中日之间人的移动中，鲜有制作者移动的事实不是意外地被人们忘掉了吗？据本人管见，越过海洋而在中日之间移动、往还的制作者屈指可数。当然，有人认为中日之间缺少制作者的移动，这可能只是停留在记录上的问题，而记录并没有直接地反映实际状态，这种意见是可以预料的。但是，将同样的现象和在古希腊、罗马美术中追求规范性的近代以前的西洋或和日本同样在东亚世界向中国美术寻求规范性的朝鲜相比较，应该说我们就会更加确信这种无制作者参与移动的事实。可以认为人的移动中的缺少制作者的移动，这是中国美术在日本影响传播的巨大特色。由于是事例很少，所以我想对此进行一下概述。

首先是从日本去中国的制作者的情况。

- (1) 黄文(书)本实
- (2) 栗田家继
- (3) 默庵、铁舟德济、顶云灵峰
- (4) 雪舟、如寄

(1)和(2)是作为遣唐使的一员去中国的画师。在被派往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中有作为技术人员的画师，但其实际情况不十分清楚。

(1)的黄文本实是白凤时代活跃的人物，出自在飞鸟时代的推古十二年(604)规定的画师制度中扮演着古代宫廷画家角色的五大家(黄书画师、山背画师、箕秦画师、河内画师、檀画师)之一的黄书氏。²古代的画师和其他领域中的技术人员相同，都是朝鲜系统的渡来人，但以黄书为姓的本实却是能确认的这种渡来系统的古代画师去中国留学的稀有的例子。本实被认为大概是第五次遣唐使(665—667)中的一员，他在都城长安普安寺将初唐的王玄策在中天竺转抄的佛足石图转抄并传到日本(药师寺《佛足石歌》)。像近来也有论者认为本实可能参与了高松塚古坟或开特拉(きとら，音译)古坟等的造像那样，可以认为这样的画师积极地参与了先进的唐代美术的移植。

(2)的栗田家继在承和五年(838)，作为第19次遣唐使的大使僚从来到中国，但实际上他是画师。根据圆珍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他在扬州龙兴寺定了画佛所，进行佛画或影像的模仿或制作。遣唐使的画师不是在首都长安，而是在中日出入口处的当地港口建造一种工作室，这一事实实际上是很耐人寻味的。³

宽平六年(894)，以菅原道真的建议，遣唐使被废止，去中国的正规航行就消失了，画师或佛师访问中国的机会直到室町幕府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派遣遣明使的应永8年(1401)，中间长达500年是空白期。其间，在13世纪、14世纪，入元(元朝)的禅僧作为支流而在中国画水墨画的事例是我们知道的。

(3)的默庵灵渊、铁舟德济、顶云灵峰是代表级画家，特别是默庵灵渊到近世还被人误解为是中国人画僧，他曾经在南宋首都杭州六通寺画水墨画，被称为牧溪再来，最终未能回国，在中国去世。铁舟德济和顶云灵峰画的是在元朝江南禅林流行的松竹梅岁寒三友或菊竹梅兰四君子等文人式主题的水墨画广为人知，顶云也和默庵一样没有回朝。⁴

² 平田宽“上代の画師・画工”《日本美術全集3__正倉院と上代絵画》(1992年，讲谈社)、平田宽“上代画工研究史料(稿)”《人間文化研究シリーズ》4号(2002年)、平田宽《絵仏師の時代》(1994年，中央公论美术出版)。

³ 平田宽《絵仏師の時代》，前掲。

⁴ 关于默庵，海老根聪郎的“默庵とその時代”《水墨美術大系5__可翁・默庵・明兆》(1974年，讲谈社)

入明（明朝）使在中日之间往来，和遣唐使的情况相同，作为随员的画师很引人注目，但（4）的雪舟等杨和（5）的如寄是能够确认去中国的稀奇事例。可以想象，他们都是禅僧，但也都担负着作为画师的职务。⁵

（4）的雪舟等杨从应仁元年(1467)到应仁3年(1469)约两年时间,作为遣明使的一员在中国旅行，在美术史上，给予后世的影响很突出。雪舟在都城北京以礼部尚书之命，画礼部院的壁画，此外，在宁波除了拜受了天童寺第一座的位置外，和当地文人的交流也很频繁。归国后，自从他本人说的“大唐国里无画师”的有名的逸话收进江户时代初期的狩野永纳写的《本朝画史》以来，作为代表日本的画家而广被宣传。一提起完成海外留学的画师，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雪舟的名字，但将雪舟的中国留学和近代去西洋的日本画家或在西洋的所谓画家留学的现象、事例相比较时，就应该强调由于作为随行入明使的画僧，这位著名的雪舟受到了制约，并不自由。⁶

下面确认从中国访问日本的制作者的情况。

（5） 陈和卿、伊行末

（6） 周丹士（周坦之）

（7） 逸然性融、杨道真、范道生

（8） 沈南苹、伊孚九、张秋谷、费晴湖、江稼圃等（来舶画人）

近代以前，和日本制作者访问中国的机会贫乏一样，从中国来日本的制作者的事例也很少。在古代，实际上我们不知道和遣隋使、遣唐使的归朝一道来日的画师或佛师等事例。日本的古代画师几乎都是从朝鲜半岛来的渡来人的家系，其造型集团从中国来日、移居的很稀少，被人记住的例子是天平胜宝五年（753），通过第六次航行好不容易到达日本的鉴真及其弟子和他们带来的许多技术人员。鉴真在以失败告终的第二次航行时，有85名工匠，而好不容易才成功的第六次来日时，也确实带着相当人数的工匠。鉴真一行中，特别是有一些擅长制作木雕像的佛师，将在唐朝流行的檀像扩大到等身大，制作了和盛唐大理石雕刻相通的有厚重感的一木雕成像。这杰出的作品现存于唐招提寺，形成平安时代一木雕成像流行的一脉。⁷

（5）的陈和卿和伊行末都是担负平安时代末期东大寺大佛复兴事业的，是受到入宋僧重源邀请来日的铸造和石造的专家。两人都是宁波人，很可能居住在博多的宋朝商人援助他们来日。陈和卿参与大佛的铸造，但新铸造的大佛以相貌有不协调的感觉而被迎来，这一事实显示了中日间趣味的不同，意味深长。此外，伊行末是现存的东大寺南大门的石造狛犬、大佛殿石灯笼的作者，并以此知名的石匠，而近年有人指出石造狛犬的材料可能是宁波地区特产的梅园石，这引起了人们的注意。⁸

（6）的周丹士（周坦之）可能是在镰仓时代初期来日的画师。从记录上可以知晓入宋僧俊芿在即将去世前的嘉禄三年（1227）画了他的肖像画（俊芿《泉涌寺不可弃法师传》）。

中有详细论述。关于顶云灵峰，请参见海老根聪郎“頂雲靈峰について”铃木敬还历纪念会编《鈴木敬先生還曆記念中国絵画史論集》（1981年，吉川弘文馆）。

⁵ 关于雪舟的研究极其盛大，发表论文的数量极多。在这里举出网罗了雪舟研究基础资料的最新成果。山口县立美术馆雪舟研究会编《雪舟等楊—“雪舟への旅”展研究図録》（2006年，“走向雪舟之旅”展实行委员会）。关于如寄，有高桥范子“還俗僧萬?集九周邊の畫事について—畫人如寄と雪舟”《松ヶ岡文庫研究報》（1991年）。

⁶ 从中国明代绘画史的文脉思考雪舟的北京学习展览会，2005年在东京根津美术馆举办。请参见特别展图录《明代絵画と雪舟》（2005年，根津美术馆），此外，还有该图录收录的岛尾新“雪舟と明代絵画—亀裂と同調”及板仓圣哲“成化画壇と雪舟”的论考。

⁷ 关于鉴真的传记等，安藤更生《鑑真大和上伝之研究》（1960年，平凡社）的论述最为详尽。

⁸ 关于陈和卿及伊行末为首的东大寺复兴期的造像，请参见以下展览会图录。《特別展—重源上人—東大寺復興にささげた情熱と美》（1997年，四日市市立博物館）、《大勸進重源—東大寺の鎌倉復興と新たな美の創出》（2006年，奈良国立博物館）。其他的请参见冈崎让治“宋人大工陳和卿伝”《美術史》30号（1958年）。

(7) 的逸然性融因邀请黄檗宗的隐元而知名，他明末来日，住在长崎的兴福寺，是杭州的僧人。逸然擅长画技，在长崎培育了渡边秀石、河村若芝等日本画家，被称为唐绘之祖。杨道真是和隐元一起来日的肖像画家，擅长折衷中国画和西洋画的阴影强的肖像画，留下许多作品。范道生是隐元带领的佛师，制作了京都万福寺的群像。⁹

包括(8)的沈南苹的画人们，虽然是暂时的，但都是在长崎滞留过的、航行过来的清朝人。沈南苹享保十六年(1731)来日，在长崎滞留了两年，传来了浓彩写生的新的花鸟画，通过在长崎跟他学习的画人，这崭新的画风在江户流行起来。伊孚九以下四人来访长崎，传来中国的南宗画，成为江户时代南画画人的示范。¹⁰

上面概述了越过海洋，移动、往返于中日间的制作者，而通过他们的活动，给日本传来了新的样式或技术，给当时日本的美术史的动态以不小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如前所述，从中国美术在日本压倒性的影响传播来考虑，在中日间移动、往返的制作者的数量不得不说是极少的。换个视点看，这种少得可以说在中日间无移动、往返的制作者的情况大概也佐证了毋宁说在中国美术对日本的影响传播中，留学僧或渡来僧等将造像活动的整体构想或体系本身带到日本来的知识分子的活动或和这种知识分子的活动、往返一道舶运到日本来的美术品、文物自身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超过了制作者。

重复一下，日本的中国美术的影响传播及于物心两面，作为和造型相关的形形色色的有形无形的制度，长期地在日本被作为规范。但是，这压倒性的中国美术的影响传播不光是制作者的作用，或者可以说是依靠围绕着美术或造像人们的活动或从中国带来的美术品的规范作用才得以形成的。首先在这一点上具有中日间美术交流的巨大特色，我想对此予以确认。

作为带来美术或造像活动整体构想或体系的人物，就像先前说的鉴真就是一个，我可以列举来中国的留学僧或从中国来的渡来僧。但是，这些会成为已经熟知的事例的敷衍，因此在这里，我只想确认这一事实，即在中日间移动、往返的人物中，和美术或造像有着重大关联的许多人是僧人。

3 美术品的移动和收藏的形成

中日间的美术品的移动和人的移动相比，更加庞大且多样。美术品的移动也正是因为在于物上具有美的、文化的价值才成为在中日双方的力学中形成的现象。最清楚地展示这种中日间力学的事例之一大概是作为接受者的日本方面的中国美术收集。今天，在日本有大量的中国美术传进来，并被收藏(现在也还存在)。但是，美术品传进来并现存的和有意收集的，本来是表示不同行为结果的现象，有着应该分别予以论述的性质。从近代以前形成的各种中国美术收藏中除去因有势力的佛教寺院的经典、典籍、佛画、佛像等宗教性活动而传进来的各种产品或伴随着江户时代以来文人趣味流行的广泛的书画文房的舶来品的收集之外，主体性地收集中国美术而形成收藏的事例，即使加上文献上的记录也是很少的。

古代中国美术收藏的代表性事例能够在作为正仓院宝物而现存的各种宝物类中发现。所谓正仓院的宝物是包括配合天平胜宝八年(756)亡故的圣武天皇的四十九日法要，而光明皇后献纳给东大寺卢舍那佛的珍宝类的一连串的献纳品，其内容可以大体分为圣武天皇遗爱的东西和使用于东大寺卢舍那佛开眼供养的器物类。在这宝物类中，虽然已经佚失了，但王羲之草书的拓写本二十卷(《国家珍宝帐》)、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真迹(《大小王真迹帐》)、欧阳询的真迹屏风(《屏风花氍等帐》)等从六朝时代到初唐的著名书法家的真迹或拓本的存在是极其重要的，这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中国得到高度评价的美术品被几乎同时

⁹ 关于黄檗的美术，锦织亮介的《黄檗禅林の絵画》(2006年，中央公论美术出版)有详细介绍。

¹⁰ 关于江户时代日本接受沈南苹带来的新样式的接受，请参照《江戸の異国趣味—南蘋風大流行—》(2001年，千叶市美术馆)

代的天皇家所收集，并珍藏着。

在《国家珍宝帐》中，对大唐勤政楼前观乐图屏风、大唐古样宫殿画屏风等中国绘画也有记载，但没有如书法名家那样的作者名。一般而言，中国书画的价值确定是由作者的品流而分类的，而且在书画的收藏中，每件作品附记作者名是前提，从这一点可以理解奈良时代天皇家周边的书法收藏明显地高于绘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收集中国名家书法是日本中国美术收藏的嚆矢。另外，在尚未发明假名的日本古代的中国美术收藏重视书法，先于绘画成为收集对象，在这一背景中应有其本身的理由，恐怕和这种情况有某种关系，即在完善、加强中国律令的统治体制过程中，与表象王权正统性适合的书体被甄选出来。

平安时代以后，在天皇家或摄关家周边，我们不知道有能和正仓院的珍宝匹敌的收集中国艺术品的事例。另一方面，在佛教寺院，从平安时代到镰仓时代，以畿内有势力的寺院为中心，伴随着去中国的留学僧的活动，带来了中国的舶来品，并积累下来。特别是在包括最澄、空海在内的平安时代的入唐八家的现存“请来”目录中，综合记录着经典、典籍、绘画、雕刻、梵音具等各种舶来品。其中也有空海归朝之际带来的真言五祖像（京都、东寺），这是被判明为在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中都记载着的名手李真画的，是很珍贵的一个例子。但是，如前所述，这种佛教寺院的中国艺术品的传来和积累的现象和在更正确的意义上的收藏是不同的。

因此，我就不一一叙述入唐僧的“请来”目录了，我只想提请注意的是在各种各样的艺术品中，雕刻（佛像）的移动，船载的不那么多。雕刻（佛像）和移动困难的建筑同样，在可搬动这一点上是有局限的。日本船载佛像在造像上基本上是以能成为雏形的小佛像。小金铜佛或檀像，以可搬动性为前提的檀龕中有不少唐朝时代的名品，也反映了这种情况。此外，从基于被称为样的绘画或图像的平面图案开始，在日本，立体制造的造像程序和从平面设计图纸建构的建筑变成同样了，即使不以佛像的移动为前提也能造像，这个侧面也成为佛像移动被限制的理由。¹¹在从中国用船载到日本的佛像中，10世纪末入宋僧裔然带来的京都清凉寺的生身释迦像（优填王像）是有名的，而在日本，这一灵验佛像的接受一度从立体像还原为平面，又从平面模仿制造为立体，在这种反复中，佛像流传开来。我想应该记住裔然在天台（今临海）制造的模刻像本身恐怕就是从平面的样转为立体雕刻的像。¹²

在日本，对中国艺术品主体性收集是相当靠后的时代了。从记录上看，以记录南北朝时代、14世纪的镰仓圆觉寺佛日庵的收藏品的“佛日庵公物目录”等为端绪。¹³在那里表现出当时对“唐物”的强烈憧憬。目录的内容基本上是以具有禅宗寺院所必须的宗教性质的物品为中心，以对包括在中国被赋予价值的世俗画的真正舶来品的爱好为背景的收集还要等到后来的15世纪室町将军家的收藏。

室町时代的将军家反映了当时盛行的“唐物”趣味，从南宋到同时代的明朝，收集了各种各样的舶来品。这些收藏品形成被称为东山御物的一大收藏，历代的将军们将这些放在宅邸中的大厅中鉴赏。在南宋以来的绘画名品中，也有进行模仿中国的盖了鉴藏印的“天山印”（足利义满）、“杂华室印”（足利义教）等作品。¹⁴在将军侧近有叫做同朋众（为将军服务的僧人——译者）的专家，将船载的艺术品从定价到管理、处理委托给他们。在展示当时的

¹¹ 指出在佛教雕刻中，从作为型的样到立体造像的有以下主要的论文。水野敬三郎“宋代美術と鎌倉彫刻”《國華》1000号（1977年）、并收入《日本彫刻史研究》（1996年，中央公论美术出版）。紺野敏文“請来‘本様’の写しと仏師（1～3）”《佛教芸術》248、258、269、270号（2000～2003年）、藤岡穰“仏像と本様—鎌倉時代前期の如来立像における宋仏画の受容を中心に—”《講座_日本美術史2_形態の伝承》（2005年，东京大学出版会）。

¹² 长冈龙作“清凉寺释迦如来像と北宋の社会”《國華》1269号（2001年）。

¹³ 高桥范子“‘佛日庵公物目錄’によめること—宋風の禅文化、鎌倉に到来—”《開館40周年記念特別展_宋元仏画》（2007年，神奈川県立历史博物馆）。

¹⁴ 关于足利将军家的收藏，特别展图录《東山御物—雜華室印に関する新史料を中心に—》（1976年，根津美术馆、徳川美术馆）形成了今日研究的基础。

“唐物”趣味或中国美术收藏的记录中，有“御物御画目录”、“室町殿行幸御饰记”、“君台观左右帐记”等。都是基于作为同朋众能阿弥的著作。特别是“君台观左右帐记”作为装饰房间指南的秘传书，由能阿弥、艺阿弥、相阿弥一家三代相传，记载了当时京都包括陶瓷器、漆器、绘画等综合的中国美术品鉴赏的情况。此外，在“君台观左右帐记”的开头，有中国画人的目录，和画人名字一道记载着其字、出身地、擅长等介绍。这个画人目录以将军家收藏或京都周边寺院收藏的中国画为基础，参照当时在日本被阅读的元末画史书《图绘宝鉴》（1368年，夏文彦自序）等记述而作成的，披露了有关当时中国绘画的综合性知识。《君台观左右帐记》后来到江户时代出版了，作为日本的中国美术鉴赏的指南书，发挥了长久的巨大作用。

15

4 选择地接受样式

在美术品的移动中，如前面看到的收藏的事例那样，对中国美术具有的规范性，日本方面的选择常常起着作用。本节想从下面作品所具有的样式的侧面来确认以绘画为中心的日本的选择性接受的样态。

自古以来，众多的中国绘画被船载来，作为日本造像样式上的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美术的影响传播，大到无视这一点，就不能讨论日本美术样式发展的程度，其重要性就是如此之大。但是，近年在日本的美术史学中，对影响传播的框架本身的有效性提出了不同的论点。特别是当我们看关于近年中日间的美术样式的比较、交流的谈论时，对日本美术中的中国美术的影响传播论说到底还是传播者的逻辑，不能引出接受者的实际状况，对这种日本美术史研究者的批判不能置之不理。像传播者的行为那样，用影响或者传播的语言来讲述的几乎所有内容毋宁说全是接受者对传播者进行某些工作而进行的实践。从这种立场看，主客逆转的影响传播逻辑本身就有矛盾。¹⁶但是，即使从位于东亚世界一隅的地缘政治的条件看，日本美术样式展开的潮流本来也不是和中国或朝鲜无关系而形成的，对影响传播论的批判是让东亚的视点从日本的美术史研究中后退，也可以说孕育着再生产从过去的实际状态乖离的论述本国美术史的危险。

为了消除这种认识差距，在确认从传播者的视点静观影响传播的有效性和局限的同时，一边验证从接受者的视点静观接受论的有效性，一边从多样地选择接受中国美术这一观点出发，使具有东亚广阔性的双向性视点相重合，这是必要的。¹⁷

在近代以前的日本，不言而喻，中国美术的影响或传播已成为广泛的现象，另一方面持续是传播者的中国和持续是接受者的日本的立场几乎没有逆转。中国对日本的影响传播长

¹⁵ 关于君台观左右帐记的各种写本，可参考矢野环《君台観左右帳記の総合的研究》（1999年，勉成出版）。关于君台观左右帐记的中国画人目录作为近代以前绘画史的一个制度而发挥功能的情况，请参照井手诚之辅《日本の宋元仏画》（日本美术418号）（2001年，至文堂）。

¹⁶ 日本的中国美术的影响传播论，关于日本美术史开始编纂的《稿本日本帝国美術略史》（1901年，农商务省）一边注意到美术中的中国历代王朝和日本时代相对应关系，一边积极地展开影响传播论。近年，试图从东亚的视点促使日本美术史再考而撰写的中国绘画史研究者的论述有着显著特色的有以下作品。户田禎佑《日本美術の見方—中国との比較による》（1997年，角川书店）、小川裕充“中国絵画—東アジア国際様式の消長”《日本美術全集12 水墨画と中世絵巻—南北朝・室町時代の絵画I》（1992年，讲谈社）、“中国絵画の古典性とは？—日本絵画史にとってのそれを中心に”《美術フォーラム21》4号（2001年，醍醐书房）。对影响传播论的日本美术研究者方面的批判有从优美论出发的千野相织的户田、小川的批判。千野相织“南北朝・室町時代の絵巻物—新しい光のなかで”《日本美術全集12 水墨画と中世絵巻—南北朝・室町時代の絵画I》（前掲）、“日本美術のジェンダー”《美術史》136号（1994年）、“日本の美術史言説におけるジェンダー研究の重要性”《語る現在、語られる過去—日本の美術史学100年》（1999年，平凡社）、“美術館・美術史学の領域にみるジェンダー論争”《女？日本？美？—新たなジェンダー批評に向けて》（1999年，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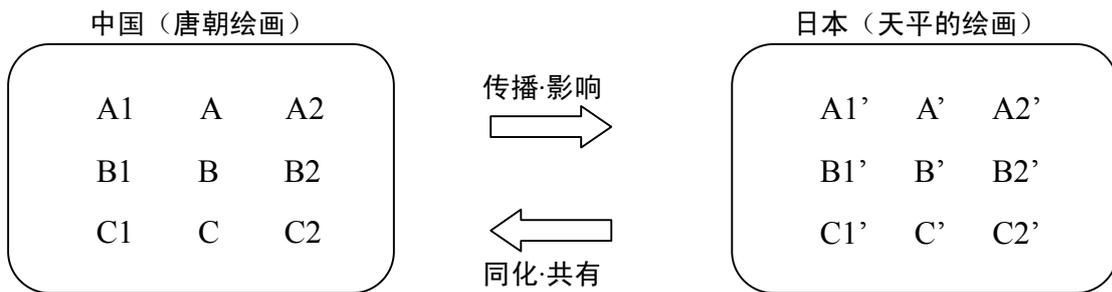
¹⁷ 井手诚之辅“影響伝播論から異文化受容論へ—鎌倉仏画における中国の受容—”《講座—日本美術史2—形態の伝承》（前掲）。本论文的论述也基本是准照这篇论文的。

期保持着有效性，这实际上也是由来自于这种史实。但是，从古代到中世、近世的长期中日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在古代和中世、近世之间，可以认为双方的关系有很大不同。

在承认从传播者到接受者的这一基本的信息流通方向性之上，同时考虑一下双向关系的存在方式，就能够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分出有没有可逆性的两种类型。于是，情况就变为可逆型和非可逆型两个类型了，而我首先是想确认按照这种类型的美术史中的中日间的关系。

(可逆型)

概念模式 I: 可逆型的情况



所谓可逆型是保证接受者信息复原为传播者的信息、有可逆性的情况。这时，信息传达的传播者对接受者的行为能够用影响或传播的用语表示。另一方面，接受者对传播者的行为与同化或共有的用语相对应。将这其间的情况，用可谓可逆型的最典型事例的中国唐代绘画和日本天平时代绘画的关系来显示的话，就是概念模式 I。

虽说是唐代绘画，但是实际上孕育着各种各样的多样性。譬如，既有作为规范制作模式的 A 这一作品，也有像 A1、A2 那样的按照 A 的规范性制作的作品。此外，也存在着和 A 具有不同倾向的 B 或 C 这种规范的作品，还有按照这些作品规范性的 B1、B2 或者 C1、C2 的作品。唐代的绘画大概大体上可以作为具有规范性的母集合 A、B、C...和按照其规范性产生的 A1、A2...、B1、B2...、C1、C2...，我们要从这各种作品群的总体来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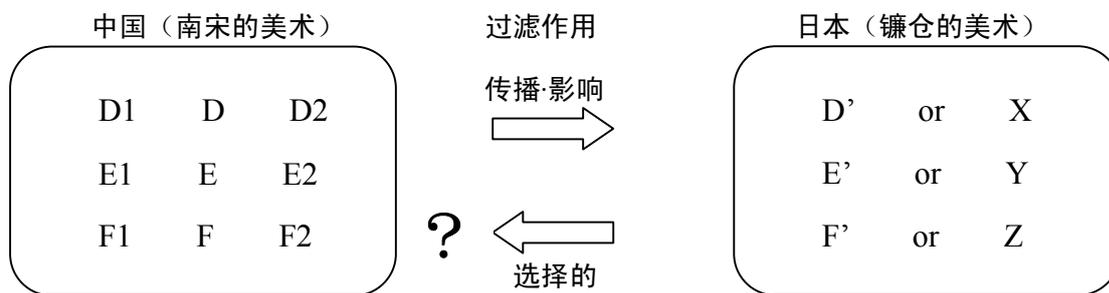
另一方面，由于唐代绘画绝大的影响力，或者以积极的试图同化唐代绘画而树立起来的天平时代的绘画反映了唐代绘画的多样性，但同时也有 A'、A1'、A2'、B'、B1'、B2'、C'、C1'、C2' 这样的按照唐代绘画画的规范性作品。

在中日之间可逆型的关系中，可以看到的显著特色在于这种从信息接受者一方的作品出发可以讨论关于传播者一方作品的内容或传播者一方的绘画史的问题。无论是天平时代的 A' 还是 B1'、C2'，使用这些例子来对唐代的 A、B、C 作品进行论述是完全可能的，实际上这样的事例也很多。作为具体的例子可以举出：譬如，骑象奏乐图（正仓院南仓）和法华堂根本曼陀罗（波士顿美术馆）之间所有崭新山水表现的共通性。

在唐代绘画和天平时代绘画的关系中看到的可逆型接受的情况中，不光传播者中国美术的影响传播论是极其具有有效性的，而且只要接受者的可逆性被保证，在日本制作的每件作品都能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不可或缺的材料。

(非可逆型)

概念模式 II: 非可逆型的情况



所谓非可逆型是指传播者的信息未必能从接受者的信息复原的情况。在这个场合，信息传达的传播者对接受者的行为也可以用影响或传播这样的用语来表示。但是，接受者对传播者的行为应该是选择性的，两者之间存在着各种过滤作用。作为典型模式出现的是宋代的佛画和镰仓时代的佛画关系性，展示其间情况的是概念模式2。

宋代的绘画也和唐代的绘画一样孕育着多样性。宋代的各种绘画也可以作为具有规范性的母集合的 D、E、F...和按照其规范性的 D1、D2...E1、E2...F1、F2...这样各种作品群的总体来把握。另一方面，在接受了宋代绘画的镰仓时代绘画的情况中，作为极其特殊的例子，像 D'、E'、F'那样的作为可逆型接受的结果而出现的作品在逻辑上是可以存在的，但几乎都是向着 D-X、E-Y、F-Z 变化。因此，从镰仓时代的作品 X、Y、Z 等作品不能可逆性地复原到宋代绘画。发生这样的变化，说到底是因为镰仓时代的宋不像天平时代的唐，宋朝绝不是像镰仓时代的宋。这种天平时代和镰仓时代对中国关系的差异可以认为是起因于平安时代国风文化建立前和建立后的差异。作为这种非可逆型的事例可以举出，譬如板绘四天王像（苏州市博物馆）、宅磨胜贺笔十二天屏风（东寺）等。或者可以用检查验证许多船载到日本的宋代宁波佛画和接受其的镰仓时代或南北朝时代的关系来确认日本的选择性接受的样态。在这样非可逆型的场合，影响传播大体上继续保持着有效性。随着宋代新样式的影响传播，毋庸置疑，在日本镰仓时代的佛画中创造了宋朝风格的佛画。

但是，这样的影响传播论不能说明接受者的多样性也是事实。如已经指出的那样，镰仓时代绘画样式中的宋画的影响不光在佛画上，也广泛地波及从水墨画到被认为是日本特有的绘画的大和绘。不管什么类型，都能看到宋画影响力的强弱乃至接受宋画深浅的振幅，而从接受者看到的影响传播论出发预测其振幅的程度是不可期待的。这里说的振幅程度也是因为和正是存在于中日间的过滤作用的干涉深深相关联。宋代的佛画和镰仓的佛画的关系性是非可逆型的。两者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过滤作用。在以这种过滤作用为前提时，对船载到日本的南宋佛画，日本方面的各种选择（模仿、增幅、拒绝等）才变得明确。

我们确认了可逆型和非可逆型这两个日本的中国美术样式接受的类型，但是，这两个类型是因为什么原因截然划分出古代和中世、近世呢？上面叙述过可能起因于平安时代国风文化建立前和建立后的差异，但一般而言，以国风文化的建立来解释日本确立独自选择作用的理由是不容易的。下一部分我想从对中国的规范性的易接近（accessibility）的观点出发，确认东亚世界美术交流中的中日关系和中朝关系的不同，而再次回到这一讨论中来。

5 对规范性的易接近—从朝鲜出发的视点

在美术史的领域里，接受中国美术的日朝间的差异常常被指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是接受中国山水画的日朝间的差异。

中国绘画冠于世界之一的是北宋的山水画，对此大概没有异议。以画满了北宋首都开封的宫庭或官府墙壁的壁画的郭熙为代表的大观山水画是最强烈地表象以皇帝为中心的儒教意识形态的美术，长期被朝鲜作为规范，但日本完全没有接受。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从遣唐使以后的宋商的活跃活动产生的中日间交流的观点很难解释的现象之一。

根据作为北宋后期画史书而为人知的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卷六的“高丽国”条，熙宁七年（1074），访问北宋首都开封的高丽使节为打击大金而锐意购进中国图画，熙宁九年（1076）再一次访问北宋首都开封的高丽使节一行带着数名画工，将大相国寺的壁画全部模写后归国。¹⁸这大相国寺壁画的模写是根据后来访问高丽的中国使节徐兢在宣和六年（1124）完成、乾道三年（1163）刊行的《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画在高丽首都开京（开城）的华严宗中心寺院兴王寺的墙壁上。高丽使节访问开封的时期，正是郭熙的全盛时代，根据收集了郭熙讲话并记录了他过去活动的山水画论《林泉高致集》、《画记》，郭熙的山水画赠送给了高丽。根据其他的文献，在熙宁七年（1074）时，可以认为郭熙的山水画是被当时的神宗皇帝下赐给了高丽使节。北宋李郭派的山水画已经被高丽接受的可能性是以派遣使节和皇帝下赐的方式，从中国直接给予高丽。这种中国画的直接接受的层次恐怕没有正式的使节交流是不能实现的。

为人熟知的日本折叠扇向中国的移动实际上也记录在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的“高丽国”条中，说明了日本的折叠扇是高丽使节偷偷拿进来买卖的。这《图画见闻志》中的逸话可以说是最象征性地展现了美术交流中，日朝对中国关系的差异。

虽然是微小的事例，但这样夹杂着朝鲜的视点来看，没有派遣正式使节的日本长期以来是不能接近以宫廷为中心的最高级的中国美术品的。这种情况也意外地符合中日间往来极其兴盛的南宋和日本的关系，后世，被作为最高级的艺术品和规范的南宋宫廷绘画舶来日本的时间不是同时代的镰仓时代，而是必须等到足利义满派遣遣明使的15世纪初了，应该更对其间横亘着长达200年的滞后时间这一事实予以认识。从对宫廷绘画的至高规范性的易接近的观点来看，废除遣唐使之后，日本自己放弃了这个手段，没有更新以前从遣唐使以来交流中作为规范的唐代宫廷文化。日本赠送给中国的大和(倭)绘屏风被误认为是唐朝李思训的范例的米芾的《画史》的记录述说了针对唐代的规范性，中日之间出现了应该说同根异种的差异。当然，也有前面所说的奄然为了从宋太宗那里得到刚完成的北宋版大藏经的下赐而经入宋僧的参与，好不容易才将最高级文物搞到手，这是不容否定的。但是，就连在这一场合，因奄然是僧人之故，不能接近的还有相当多的刚刚编纂完毕的儒学注释书等典籍，这一事实还是被他们忘记了。

在从对中国这一规范性的易接近的观点进行再次检查验证时，虽然商人介入经济活动的中日交涉很兴盛，但以废除遣唐使为契机，至少在美术或文化领域里持续着巨大的断绝，对这一事实应给予更多的注意。这一事实，幸或不幸大概可以说都自动地给美术中的日本对中国观或文化接受的结构带来了变化。

在前一部分论述了古代和中世之间，可以划分为所谓可逆型和非可逆型的中国美术接受形态，而其理由的一个方面，恐怕也是和从迄今为止看到的宫廷美术这一中国规范性的乖离相一致的。当我们看近年美术史的动向时，不少论者常常以经济活动的中日交流为前提，想积极地检查验证平安时代后期北宋美术的接受。当然，在个别具体的现象上应该承认北宋美

¹⁸ “皇朝之盛，遐荒九译来庭者，相属于路。惟高丽国敦尚文雅，渐染华风，至于伎巧之精，他国罕比，固有丹青之妙。钱忠懿家有着色山水四卷，长安临潼李虞曹家有《本國八老圖》二卷，及曾于杨褒虞曹家见细布上画《行道天王》，皆有风格。熙宁甲寅岁，遣使金良鉴入贡，访求中国图画，锐意购求，稍精者十无一二，然犹费三百余缗。丙辰冬，复遣使崔思训入贡，因将带画工数人，奏请模写相国寺壁画归国，诏许之，于是尽模之持归。其模画人颇有精于工法者，彼使人每至中国，或用折叠扇为私觐物，其扇用鸱青纸为之，上画本国豪贵，杂以妇人鞍马，或临水为金沙灘，暨莲荷、花木、水禽之类，点缀精巧。又以银泥为云气月色之状，极可爱。谓之倭扇，本出于倭国也。近岁尤秘惜，典客者盖希得之。倭国乃日本国也，本名倭，既耻其名，又自以在极东，因号日本也。今则臣属高丽也。”《图画见闻志》卷6“高麗國”条收。

术的接受，但是，对体现中国美术规范性的宫廷美术，日本则不具备接近的手段，这一事实不是应该一起予以论述吗？

最后，代替结论，我想对立足于东亚立场、观点的重要性加以若干论述。

在人们论述日本接受中国美术时，常常举出和汉论。和汉论的观点是作为谈论室町时代以后日本美术史时的关键词来使用的和汉的逻辑结构，对立地谈论的和与汉都是在更大的和的范畴里双重形成的。和中的汉（日本内部收敛的中国形象）与和外面的汉（中国）虽然本来就不是一回事，但在其他的文化、社会行为中，有时也具有相连性。在镰仓佛画谈论中常常使用的宋风这一概念也与在和的外部展开的宋代绘画及在和的内部作为其接受结果而呈现的宋风本来是两回事，而且针对和中的汉的宋风，还有作为和中之和的大和绘，在这一点上，与和汉论的框架几乎是共通的，对这种文化接受的结构也有人追溯到平安时代贵族的意识而进行论述的。但是，和汉论对于中国，在试图均等地一元化之点上，自己就露出了局限性。

在环顾围绕着美术的中日关系时，虽然从中国舶来了，但日本不接受而拒绝佛画的事例不在少数。或者相反地还有虽然更能体现中国规范性的美术，但长期地被置于同时代中日交涉视野外的中国宋代宫廷美术的事例。为了将这种所谓收进日本内部的他者和定位于日本外部的他者放上讨论之论坛上，必须预想到两国之间只是用影响传播论或接受论大概还是伴随着局限性的。在这一意义上，今天我们同一代人，在东亚世界中不是产生了各种视点交错的必要性吗？

关于日本的和汉论的文化接受结构，相反在邻国的朝鲜半岛几乎没有听到同样的主张。譬如，与宋风和和汉论同样的美术史上的概念在现在韩国美术史的谈论中存在吗？请自问一下。与和汉论类似的韩中论、朝中论是否成立，至少笔者在传统的朝鲜半岛的谈论中不知道有这样的例子。应该说，从与日本进行单纯的比较，有这样的感觉，即中国和朝鲜的关系在近代以后的谈论中，是以正统或非正统的立场来讨论的。这种正统、非正统的分类思考，既是日本国学的民族主义相似的现象，但大概也是中世以后彻底地作为儒学文化圈之雄而形成其一翼的邻国的逻辑结构。在这里，日朝双方接近中国文化的差异或近代日朝民族主义的表象也都似乎出现了不同的方式。

譬如，像高丽时代的画家，在宋徽宗朝画院里活跃的李宁，朝鲜王朝时期的15世纪，受到安平大君庇护而活跃的安坚的事例那样，从日本看，朝鲜对中国的接近或其接受更直接，孕育着相当不同的样态。在美术以外的各种文化中，邻国有着将中国的东西更纯化的一面。这种日朝之间对中国立足点的差异，有时在日本是被否定地解释的，这大概也成为在作为更有力地表象中国的一部分上来定位朝鲜的一个原因。

但是，和日本或朝鲜的地域框架对峙来考虑中国这一框架本身，在思考东亚美术或文化上是否有效，对此的讨论很少。日朝双方对中国接近的不同反而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视点，即具有绝大规范性的中国这一框架根据时代或地域不同而向着具有各种样态单位的文脉分节化的视点。中国随着实际情况被分节化，而且被分节化的各个单位再次作为有机结合体而互相作用时，日本和韩国的美术史的未来将会如何相联呢？恐怕日本和朝鲜的美术史的未来也要像中国一样被分节化。在美术史中立足于东亚的立场、观点的实践不单是基于三国间各自地位的确证。应该是在本国领域中的美术史的外和内中扩展的多样性一起开放，我感到在包括中国的整个东亚的视野中再次将分节化的各个单位分别有机地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为此实践，不言而喻，首先要理解他者，并明确自己所依凭的言论或思考的处境、地位，这项工作是不可或缺的。

第三部 日中社会的相互认识与历史特质的比较

第一章 日本人与中国人的相互认识

第一节 古代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

古濑奈津子

引言

古代日本以中国为典范，制定了各种国家制度并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对于古代日本而言，中国就是榜样；而在日本的统治阶级之中，恐怕没有人不会意识到中国的存在。与此相反，要问古代中国有多少人知道日本和日本人，这就很难说了。

本文将对古代日本人的中国观、中国认识进行考察。只是在古代日本，谈论个人的中国观、中国认识的史料极为少见。这种情况，正像吉田孝先生及义江明子先生指出的那样¹，是由于律令国家产生的八世纪，决定日本社会结构的仍然是“氏”的缘故。在日本古代，即使是处于律令官僚制这一体制之下，个人也未必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因为个人尚未从集体中分化独立出来。基于这种情况，我首先探讨一下作为国家的中国观、中国认识，然后再以菅原道真等人为例，探讨一下始于八世纪末的全盘唐风时代、已经从集体中分化独立出来的作为个人的中国观、中国认识。

1、律令国家的中国认识

“日本令”继承了“唐令”，其中可以零星地见到一些有关诸藩的规定。这样一来，对于日本来说，唐也被归入诸藩之列。但实际上，《大宝令》的注释书《古记》规定，新罗属于蕃国，唐属于邻国²。一般认为，在日本的律令制之下，一个小中华思想——以日本为中心，视虾夷、隼人为夷狄，视新罗为蕃国，视唐为邻国——形成了³。在这一观念里，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日本来说，唐与新罗有所不同，不处于日本的支配之下，而是一个特殊的

¹ 吉田孝《律令国家と古代の社会》（岩波书店，1983年）；义江明子《日本古代の氏の構造》（吉川弘文館，1986年）。

² 《令集解》公式令1条〈古記〉。视唐为藩国的史料，除令以外，还有《続日本紀》庆云元年11月丙申条和庆云4年5月壬子条等。另一方面，视唐为中华的史料，则有弁正的汉诗“戎蕃預国親”（《懷風藻》第26）；菅原清公的汉诗“我是東蕃客、懷恩入聖唐”（《凌雲集》第72）；以及《入唐求法巡礼行記》所载圆仁呈递唐朝官司之文书等。

³ 石母田正《日本古代国家論》第一部（岩波书店，1973年）。

国家。但同时，唐属于邻国这一认识，似乎给人一种对等的感觉。那么，日本对唐的这种认识是如何产生的呢？

一般认为，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国家关系，见于《汉书·地理志》，在后汉建武中元二年（57年），倭奴国前来朝贡，其时所赐，就是金印“汉委奴国王”。赐以印绶，表明其已被中国皇帝任命为“汉朝支配下的倭奴国王”，而通过这种任命，日本与中国之间就形成了一种君臣关系。这样一来，中国皇帝通过册书，封周边诸国的首领为国王，从而结成了君臣关系。各国国王向中国皇帝朝贡，皇帝回赐礼物。各国国王由于其地位的正统性得到了中国皇帝的承认，就可以借此在国内强化王权，维持稳定。我们将这种以古代中国为中心而结成的国家关系称为册封体制⁴。

公元3世纪，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向三国时代的魏国朝贡，并被册封为“亲魏倭王”⁵。公元5世纪，倭五王（讚、珍、济〈允恭天皇〉、兴〈安康天皇〉、武〈雄略天皇〉）遣使南朝的宋国，被任命为军事指挥官，从而进入册封体制⁶。

但是，到了公元6世纪，由于中国大陆发生动乱等原因，日本与中国中断了联系。日本与中国重建国家关系，是589年隋灭南朝陈国、统一中国之后。隋统一中国之后，高句丽和百济首先接受册封，接着，新罗也接受了册封。当时日本正与新罗之间进行斗争，为了在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遂决定派出遣隋使⁷。这以后的607年，又派小野妹子为遣隋使⁸。

遣隋使的特点在于，日本虽然朝贡于隋朝，但却没有像以往那样接受中国的册封。在当时，隋朝对朝鲜三国（高句丽、百济、新罗）催逼甚紧，要么接受册封，要么准备打仗，二者择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但却接受了日本的上述做法。究其原因，当时隋朝正与高句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而日本居于高句丽的后方，因而受到隋朝重视，其做法得到了隋朝的认可⁹。日本对于中国这种虽然朝贡但不接受册封的做法，为以后的遣唐使所继承。

612~614年，隋炀帝出兵高句丽，而此时隋朝国内发生了叛乱。其结果，隋朝于618年灭亡，唐帝国成立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于同年迅速接受了册封。

623年，曾经留学于隋朝的留学僧惠日等人经新罗回国，他们高度评价唐朝：“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¹⁰，并建议朝廷，向唐朝派遣留学生并与唐朝建立外交关系。日本遂于630年，派遣犬上御田锹为第一次遣唐使赴唐。从隋朝到唐朝，虽然中国王朝更

⁴ 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東アジア世界》（东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⁵ 《三国志》魏书·东夷传·倭人条。

⁶ 《宋书》倭国传，倭王武上表文。

⁷ 《隋书》倭国传，为公元600年。

⁸ 《日本书纪》推古16年（608）条。

⁹ 吉田孝《日本の誕生》（岩波新书，1997年）。

¹⁰ 《日本书纪》推古31年7月条。

替，但遣唐使却继承了只向唐朝皇帝朝贡而不接受册封这一做法。唐朝之所以容忍日本的这一做法，可能是把日本看成了人迹罕至之地，也由于当时唐朝正与新罗斗争，而新罗背后有日本存在，因而采取了戒备的态度。

日本希望与中国保持一定距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这一做法，在以后也得到了继承。即使到了近代，日本对于西欧列强的态度也是一样。这就是说，与大国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的做法，在遣隋使、遣唐使以后，一直是日本的外交方针。

日本之所以能够采取这种对外方针，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近代地理因素的巨大影响。日本四面环海、远离大陆，几乎没有产生应付对外战争等危机的必要。但是，现在却不一样了，由于科学技术及信息的发达，已经产生了一种有别于前近代的状况。

2、遣唐使的中国认识

遣唐使派往中国的次数，按照通常的说法是 20 次¹¹。按照派遣目的等进行分期，可以将遣唐使分为前期和后期。第 1 次到第 7 次为前期，第 8 次到第 20 次为后期。

前期遣唐使是在朝鲜半岛战火纷飞期间派遣的，其政治折冲性质较强。2 艘船，120 人左右，从博多出发，经过壹岐、对马，再经朝鲜半岛西海岸，渡过黄海，到达山东半岛，再从陆路抵达长安，走的是北路。从白村江之战经壬申之乱，其间有 31 年的中断期。701 年，大宝律令成，遣唐使恢复派遣。

关于后期遣唐使，这一时期是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的稳定时期，一般认为是以朝贡和文化输入为目的派遣的。船 4 艘，成员在 500~600 人之间。由于日本与新罗之间的关系恶化，航路取南路而行。从博多经五岛列岛，一气渡过东海，到达长江沿岸，再经运河向华北，从汴州开始，由陆路抵达长安。

到达唐朝之后，遣唐使一行中大约有一成左右的人直接去都城长安，剩下的人就留在遣唐使船到达之地，等待去都城的一班人马回来。遣唐使到达都城之后，参加外交仪式（宾礼）和元日朝贺仪式，以确认日本与唐朝之间的外交关系。

以延历遣唐使为例，延历 23 年（804）12 月 23 日，第 1 船的一行人马被安置在长安城的外宅。24 日，他们就将国书、贡物交付监使，进呈皇帝。25 日，在大明宫宣化（政）殿举行礼见（皇帝不临朝）仪式，在麟德殿觐见皇帝（对见），得到皇帝“所请并允”的谕

¹¹ 有关遣唐使的问题，请参照石井正敏“外交關係”（池田温编《唐と日本》吉川弘文館，1992年）；东野治之《遣唐使船—東アジアのなかで》（朝日新闻社，1999年）；东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新书，2007年）；古瀬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国》（吉川弘文館，2003年）等。

旨。其后，在内殿设宴，有官赏¹²。延历之例，因行之于唐代后半期，所以情况有所不同，但“礼见”和“对见”等于《开元礼》宾礼中“受蕃国使之表及幣”这一仪式，在内殿设宴则等于“皇帝宴蕃国使”这一仪式¹³。

我们以《开元礼》来看外交礼仪（宾礼）中与唐朝皇帝见面的仪式——“受蕃国使之表及幣”，地点在宫城太极殿。具体仪式是，当皇帝驾临太极殿宝座时，蕃国使从太极门入，就座于殿庭的版位。蕃国使将国书和朝贡品献给皇帝，皇帝下问故国之蕃主及臣下，蕃国使回奏，然后退出。日本遣唐使接受唐朝皇帝下问之例，见于《日本书纪》齐明5年（659）与唐高宗之间的问答。日本的贡品按照《延喜式》大藏省之条记载，有银、水织纆、美浓纆、黄意丝、彩帛、暹绵、纁布、望陀布等，多为绢制品及调庸物等，皆非加工品，而以原料居多。

日本使臣到底有没有随带国书赴唐，现在尚有争论。这是因为，日本与唐朝之间交换的国书现在仅存1通。这1通，即《勅日本国王书》，存于唐朝文人政治家张九龄的文集《唐丞相曲江张先生文集》卷七。唐朝皇帝对外国发出的国书有三种形式，而“勅”这个形式是最低的文书格式。其开头第一句便是“勅日本国王主明乐美御德”。“主明乐美御德”即 *sumeramikoto*（“天皇”的日语发音——译者注），乃“天皇”之意。这个事实意味着，日本对唐朝尚未以天皇称号作为君主称号来使用。有人指出，日本方面很可能期待着唐朝将“*sumeramikoto*”这一天皇的日本叫法理解为日本国王的名字而特意使用的¹⁴。

另一方面，日本给唐朝的国书却未能留下一封。人们推测，日本给唐朝的国书，可能是一种臣下奉于皇帝的上表形式。一般认为，日唐之间交换的国书之所以几乎未存于世，可能是因为这些国书的文书形式及内容对日本来说非常不利，以至于未能在日本国内公之于众，甚至连正史亦未记载¹⁵。

与皇帝的对面仪式结束之后，皇帝赐宴给日本使臣，《开元礼》将其视为“皇帝宴蕃国使”之仪。皇帝就座于御座之后，蕃国使自门而入，就座于殿庭的版位。接着，蕃国使的升殿者升到殿上就座。皇帝干杯，大家举杯共饮。皇帝及其他人用膳，舞人舞蹈。皇帝特意赐酒。蕃国使下殿，就座于殿庭的版位，从皇帝那里接受赠品。

皇帝所赐赠品，是锦、绫之类的高级纤维制品及银器等。另外，在宴会上，还赐予官职。例如，承和年间的遣唐大使藤原常嗣获赐为“云麾将军、检校太常卿、兼左金吾卫将军、员外置同正员”¹⁶。遣唐大使藤原常嗣在日本属于正三位、参议、左大弁、大宰帅，从唐朝

¹² 《日本後紀》延历24年6月乙巳条。

¹³ 《開元礼》卷79，宾礼；卷80，宾礼。

¹⁴ 東野治之《遣唐使船—東アジアのなかで》（朝日新聞社，1999年）。

¹⁵ 東野治之《遣唐使船—東アジアのなかで》（朝日新聞社，1999年）。

¹⁶ 《入唐求法巡礼行記》开成4年（承和6年）2月26日条。

获得的官职亦相当于三品。所谓“员外置同正员”，表示这是正员以外的名义上的官职。名义归名义，可是一旦获得官职，照旧支给告身（任命书）和官服等。延历时期的遣唐使判官高阶远成领受的告身之例，现存于《朝野群载》卷 20；养老时期的遣唐使获赐朝服之后，在回国之后的拜见时穿在了身上¹⁷。

从唐朝皇帝那里获赐官职，意味着这个人已经成为唐朝皇帝的臣子了，但日本遣唐使从唐朝皇帝那里获得的官职，在日本国内并不通行。“告身”为朝廷所收，“朝服”亦未使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在日本国内，官人总是侍于天皇的，获赐于唐朝皇帝的官职并未公之于众。在这一点上，与从唐朝那里获得官职之后、在其国内仍然具有相当意义的朝鲜诸国及渤海国就大不一样了。

遣唐使在外交仪式结束之后，于正月元日参列朝贺仪式。延历时期的遣唐使也在 12 月 25 日的外交仪式结束之后，于延历 24 年（805）正月元日，参列了在大明宫含元殿举行的朝贺仪式。这个朝贺仪式亦见于《开元礼》¹⁸。皇帝亲临太极殿，在京的文武百官、各州的朝集使（都督、刺史）、各蕃之使参列。皇太子和上公代表百官、客使，向皇帝上奏新年贺词，皇帝则向其发布制勅。地方州镇向皇帝上奏表文和表示皇帝之德的祥瑞。陈列于太极门左右厢和朝堂前的诸州、诸蕃贡物，则收入太府寺。

朝贺仪式是宣示皇帝正在统治其领土的一种仪式，这个领土包括由唐帝国的内外官人和诸蕃之使所代表的人以及诸州、诸蕃的贡献物和朝贡品所象征的物。也就是说，外交仪式确认了日唐之间的关系；而朝贺仪式则以耳闻目睹的形式显示了唐帝国的国家组织。可以认为，通过参列朝贺仪式，日本遣唐使亲身体会了唐朝皇帝的权力和权威，认识到日本在唐朝主导的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¹⁹。

综上所述，日本遣唐使与各国使臣一样，都同样地朝贡于唐朝皇帝。从日本方面来讲，正如第一节所述，当时日本正在构想一个以日本为中心的、以新罗和渤海等地为蕃国的小中华思想区域，欲与唐朝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在唐朝看来，日本就是一个臣属之国，居于人迹罕至的绝域，慕皇帝之德，特来朝贡而已。日本也不得不进入以唐朝皇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之中。

因此之故，遣唐使来到唐朝，参加外交仪式，在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中互换国书，进行朝贡，领回官职和回赐品，构筑臣属关系；在朝贺仪式上，认识到日本在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日本与唐朝之间的这种关系，以天皇为首的日本朝廷的统治阶层，通过遣唐使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把这一事实在日本国内公之于众，则对当时

¹⁷ 《続日本紀》养老 2 年正月己亥条。

¹⁸ 《開元礼》卷 9 5，皇帝元正冬至，受皇太子朝贺；卷 9 7，皇帝元正冬至，受群臣朝贺并会。

¹⁹ 古濑奈津子《遣唐使の見た中国》（吉川弘文館，2003年）。

正处于小中华思想顶点的天皇不利，于是才把诸如国书、官职、朝服之类的显示了日唐关系真实状况的东西加以处理，不使人们获得真相；亦不将其记载于正史之中。

综上所述，日本对于唐朝的态度，是有内外之别的。这种情况，東野治之先生称之为“双重标准”²⁰。而这种双重标准之所以能够行之有效，是因为在古代日本，由于地理的因素，唐朝与日本之间并不像日本与新罗、日本与渤海之间那样有着广泛的交流，甚至包括普通人在内。

虽然古代日本作为国家，以双重标准与唐朝开展交流，但知道这一事实的人是极为有限的。可以说，只有实际上去过中国、认识到日唐关系真实状况的遣唐使及通过遣唐使认识到这一现实的日本朝廷的统治阶层，才知道这一点。

3、憧憬中国文化——日本律令国家求诸于中国的是什么？

由于医僧惠日等人奏称：“且其大唐国者，法式备定之珍国也，常须达。”（《日本书纪》推古31年7月条），于是日本开始向唐朝派遣遣唐使。对于惠日等留学于隋朝的学问僧和医者来说，唐朝首先是一个法制完备之国。

这么说是事实根据的。作为前期遣唐使及留学生而派遣的伊吉连博德、土师宿祢甥、白猪史宝然等人参加了大宝律令的撰写工作²¹；在后期遣唐使之初派遣的留学生、请益生中，大和长冈及秦大麻吕曾经在唐学习法律²²，即是明证。也就是说，可以认为，在编纂《大宝律令》及《养老律令》时期，留学生被派到唐朝学习法律。从文化吸收这一观点来看，可知日本求诸于中国文化的，时期不同，其内容亦有所变化。

有人指出，当初是以律令的编纂为中心的，而在养老遣唐使以后，如何吸收“礼”则成为主要内容了²³。养老期间派遣的遣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的《唐礼》130卷，即相当于显庆3年（658）颁发的《永徽礼（显庆礼）》。除了《唐礼》以外，吉备真备还献上了《太衍历经》1卷、《太衍历立成》12卷、测影铁尺1枚、铜律管1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12条、《乐书要录》10卷、弓箭等物以及天文、礼乐兵器等物²⁴。吉备真备根据带回日本的《唐礼》，完善了祭孔仪式²⁵。另外，一般认为，吉备真备作为天平胜宝年间的遣唐

²⁰ 東野治之《遣唐使船—東アジアのなかで》（朝日新聞社，1999年）；東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新书，2007年）。

²¹ 《続日本紀》文武4年6月甲午条等。

²² 《续日本纪》神护景云3年10月癸亥条；天平7年5月壬戌条。

²³ 東野治之“奈良時代遣唐使の文化的役割”（《遣唐使と正倉院》岩波书店，1992年。1979年首次发表）。

²⁴ 《続日本紀》天平7年4月辛亥条。

²⁵ 关于真备完善祭孔一事，请参照弥永贞三“古代の稊奠について”（《日本古代の政治と史料》，高科书店，1989年。1972年首次发表）。

副使再次入唐，并带回了《开元礼》。吉备真备在称德朝荣任右大臣，继续完善祭孔仪式。他仿照中国做法，将称德天皇请到大学，举行仪式。

从正仓院宝物那里，我们可以窥见直接输入中国文化之后的生活状况。在奈良时代后半期，被称为具有唐风趣味的藤原仲麻吕出现了。我们来看一看藤原仲麻吕的中国认识。

藤原仲麻吕是藤原不比等之孙、武智麻吕的次男。他作为附属于叔母光明皇后的后宫官职发展而来的紫微中台的长官，在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之女孝谦天皇执政期间，掌握了政权。他掌握政权之后，以大力推行唐风政策而闻名于世²⁶。

仲麻吕大力推行唐风政策，首先于天平胜宝 9 岁（757）4 月 4 日立大炊王为太子时，为了减轻课役负担，将正丁、中男的年龄提前 1 岁；颁发《孝经》，每家一册。这些都是模仿唐玄宗天宝 3 载（744）12 月的措施而实行的。在这之前，还决定于天平胜宝 7 年正月，改“年”为“岁”。这也是模仿唐朝改“年”为“载”的先例而实行的（武后年间、玄宗年间）。

接着于天平宝字 2 年（758）8 月 1 日，在孝谦天皇让位及淳仁天皇即位之际，奉孝谦为宝字称德孝谦皇帝之尊号，奉光明皇太后为天平应真仁正皇太后之尊号。8 月 9 日，奉已故圣武为胜宝感神圣武皇帝之尊号，这也是模仿唐代武则天及玄宗时期盛行尊号的习惯²⁷。

除此之外，还有天平宝字 2 年 8 月 25 日的官号改易；天平宝字 3 年 5 月 9 日的常平仓、平准署之设置；同年 6 月 2 2 日，将武则天下令编纂的《维城典训》指定为官人必读之书；天平宝字 5 年，编纂《氏族志》等。

被视为仲麻吕之唐风化政策的，以武则天时期、唐玄宗时期所行者最为多见。可以认为，这些政策是天平胜宝时期的遣唐使带回日本的。日本迅速引进几乎是同一个时期的唐朝的政策，以及毫不介意地摄取后世常为人诟病的武则天时期的政策，实在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古代日本或多或少地都参考了一些唐朝的制度、政策，可是仲麻吕对于唐朝的憧憬之情甚为强烈，认为日本唐风化乃最善之策，而付诸实施。

另外，在仲麻吕时期，有关安史之乱的情报首次传入日本，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天平宝字 2 年（758）9 月，遣渤海使小野田守与渤海大使一行一起回国，于 12 月在朝廷做了回国报告。这次报告之后，有关安史之乱的情报才为世人所知。天宝 14 载（755）11 月，御史大夫兼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占领了洛阳。玄宗派兵应战，但到了翌年 6 月，出长安，逃往剑南，7 月，唐肃宗在灵武郡都督府即位。紧接着，幽州节度使史思明也发动叛乱。在渤海，平卢留后事徐归道为讨伐安禄山而请求日本派遣援军；其后，

²⁶ 关于藤原仲麻吕其人其事，请参照岸俊男《藤原仲麻吕》（吉川弘文馆，1973年）。

²⁷ 大津透“天皇制唐风化の画期”（《古代の天皇制》岩波书店，1999年。1992年首次发表）。

安东都护王玄志击败私通安禄山的徐归道之后，又派使节赴日。就这样，有关安史之乱的最新情报不断传到日本。

针对这种情况，仲麻吕命令大宰府巩固西陲边防，派遣迎接入唐大使高元度，跟随回国的渤海使一道出发，以迎接作为天平胜宝之遣唐大使而入唐并正在唐朝滞留的藤原清河²⁸。在参列了天平宝字3年正月元日朝贺仪式之后，2月16日，渤海使和高元度等人出发了。在渤海，由于唐朝正处于战乱状态，遂将日本使节分开，只让高元度等11人与渤海的贺正使一道入唐，其余的人都送回了日本²⁹。这些被送回日本的使节，于10月漂到对马，并于年末进京。

另一方面，高元度虽然入唐，但长期不允觐见皇帝，又不准藤原清河回国。在这种情况下，高元度只好只身于天平宝字5年8月回到大宰府，向仲麻吕复命，并报告了有关情况。高元度等人是与唐朝欢送使一道回国的，他们得到了唐朝赠送的兵杖等物。

此后，仲麻吕计画派遣遣唐使及征讨新罗，但这两个计划都因仲麻吕在政治上失势而未能实现。不过仲麻吕能够迅速应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这一点还是值得注意的。

综上所述，仲麻吕对于唐朝政策的引进、对于安史之乱采取的对策等有着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同时代性强，其对策是现实主义的，这表明了当时的日本对于中国的认识。对于仲麻吕采取的唐风化政策，经常有人说此乃仲麻吕之个人兴趣使然。不过也有人指出，奈良时代后半期，其实是转向唐风化的一个阶段³⁰。

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之后，为了扩大天皇权力和权威，首次模仿中国皇帝，效法中国做法，举行了祭天的郊祀仪式³¹。延历23年，又派出了遣唐使。但是，进入平安时代之后的延历遣唐使和事实上成为最后的遣唐使的承和遣唐使，与宝龟之前的遣唐使稍有不同，这是需要注意的。

所谓不同，就是遣唐使一行中开始包括出身于文章生的人。出身于文章生、文章得业生的菅原清公被选为遣唐使判官，出身于文章生的朝野鹿取被选为遣唐使准录事，橘逸势被选为留学生。遣唐使一行中出现了文章生，表明日本求诸于中国的，已经从明经转为文章了。

一直以来，在大学学习儒家经典之人才是学生。但神龟5年（728）新设直讲4人（含文章学士1人）、律学博士2人、明法生10人、文章生20人，还增设了学习法律的部门和学习历史、文学的部门。文章科是与秀才、进士考试相对应的学科，文章博士的

²⁸ 《続日本紀》天平宝字2年12月戊申条；天平宝字3年正月丁酉条。

²⁹ 《続日本紀》天平宝字3年10月辛亥条。

³⁰ 古濑奈津子“儀式における唐礼の継受”、“唐礼継受に関する覚書”（《日本古代王権と儀式》吉川弘文館，1998年。首次发表于1992年、1991年）。

³¹ 《続日本紀》延历4年11月壬寅条；延历6年11月甲寅条。

官位当初相当于正七位下³²。

到了延历时期，出身于文章科之人开始多了起来，文章科的地位逐渐提高了。其背景是平安时代初期制定了有关入大学就读的强制政策。大同元年（806）规定，诸王及五位以上子孙皆须入大学深造。这项政策虽然到了弘仁3年（812）有所松动，但在天长元年（824）又规定，五位以上子孙之20才以下者须悉入大学深造。这项规定，最终固定在《贞观格》之中³³。

一般认为，这种入大学就读的强制政策是为了灌输儒家思想，但同时也是重组王权官僚制度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在于通过能力主义选拔官吏而不是凭借血缘关系获得晋升³⁴。其结果，这一政策为中下级官人创造了获得提拔的条件。

当时，以嵯峨天皇为中心，以“文章乃经国之大业（魏文帝《典论》）”为口号，写作汉诗文的风气盛行于世。嵯峨天皇（上皇）召集达官贵人，频繁举办汉诗文盛会，“君臣唱和”，大作奉和诗。其成果汇集成三大勅撰汉诗文集——《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

在上述汉诗文中，有皇太弟大伴亲王（后来的淳和天皇）、有智子内亲王、良岑安世、藤原冬嗣等皇族及高级贵族出身者；有小野岑守（嵯峨天皇的侍读、参议、小野篁之父）、菅原清公（文章生、文章得业生、遣唐使判官、大学头、文章博士、侍读、从三位、菅原道真之祖父）、滋野贞主（元榎原造、文章生、少内记、式部大辅、参议、正四位下、女儿是仁明后宫）、朝野鹿取（元忍海原连、文章生、遣唐使准录事、侍读、参议、式部大辅、从三位）、巨势职人、贺阳丰年（文章博士、东宫学士、阴阳头、式部大辅、赠正四位下）、桑原腹赤（后来的都宿祢、文章生、文章博士、大内记、良香伯父）等中下级官人出身者。

中下级官人中，文章生出身者众多。当时把那些文章生中提拔上来的中下级官人称为“文人脉”³⁵。这些人甚至升到议政官这样的高位，他们对高级贵族出身者形成了一个政治势力，这是平安时代前期政治上的一个很大特点。将这些人提拔上来的，是以嵯峨天皇为首的平安初期的天皇们，他们试图模仿唐朝的科举制度，通过重组官僚体制并使之唐风化而谋求天皇权力的专制化³⁶。在唐朝后半期，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即使是贵族出身者，

³² 神龟5年勅之复原件，据古藤真平“文章得業生試の成立”（《史林》74-2，1991年）。

³³ 《日本後紀》大同元年6月10日勅；《日本後紀》弘仁3年5月戊寅条；《類聚三代格》卷7所收天长元年8月20日太政官符。

³⁴ 海野嘉美、大津透“勸学院小考—平安初期の氏の統一”（《山梨大学教育学部研究報告》42，1991年）。

³⁵ 弥永贞三“仁和二年の内宴”（《日本古代の政治と史料》高科书店，1988年。首次发表为1962年）；玉井力“承和の変について”（《歴史学研究》286，1964年）。

³⁶ 古瀬奈津子“令外官と皇帝・天皇権力”（《日本古代王権と儀式》吉川弘文館，1998年）。

如果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也不能做官了。科举官僚发挥了支撑皇帝独裁化的功能。仅从支撑天皇专制的官僚制之唐风化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日本的中国认识具有同时代性。

从象征这个时代的嵯峨天皇及其侧近的贵族、官人所吟诵的汉诗中，可以读出他们对于中国的感情。关于他们的汉诗，有人指出，他们是从中国的《文选》和类书《芸文类聚》、以及盛唐和中唐时期的唐代诗集中摘取诗句，进行创作的³⁷。

其诗题亦是唐朝风格。他们创作了很多诗句，例如吟诵妻子苦苦等待到中国北方边境执行警备任务却从此一去不返的丈夫的闺怨诗，吟诵北方荒凉风景的边塞诗等。《文华秀丽集》卷下的“杂咏”里收录了《河阳十咏》，这些诗把山崎之地比作中国黄河北岸的河阳县，把淀川比为中国的长江而加以吟诵³⁸。三大勅撰诗文集的汉诗表达了诗人们对于中国的憧憬，这是三大勅撰诗文集汉诗的一个很大特点。因此可以说，在平安初期，无论是政治机制还是汉诗，都尽可能地与唐朝风格保持一致。但是，与仲麻吕时期迅速吸收遣唐使带回的唐朝政策及对安史之乱做出的迅速反应相比，现在还无法确定平安初期引进的政策及撰取的汉诗文到底属于中国历史上的哪一个朝代，这反映了日本方面在中国认识上的变化。

4、菅原道真的中国认识

日本在延历遣唐使之后，又派遣了承和遣唐使，这次遣唐使成了事实上的最后一次遣唐使。通常的说法是，平安时代以后，遣唐使的派遣间隔是25年至30年。承和遣唐使之后，过了60年即宽平6年（894）才计划派遣遣唐使，但由于遣唐大使菅原道真上奏，遣唐使之派遣遂被废止。

可是，近年来，有人指出菅原道真上奏朝廷之本意并不是希望废止遣唐使，只是导致了停派遣唐使这一结果而已，这一说法获得了众多支持³⁹。本文打算根据相关史料，对菅原道真的中国认识进行考察。所谓相关史料，就是菅原道真亲自拟定的“奉勅为太政官报在唐僧中瓘牒”、“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菅家文章》卷10·9所收）。

据宽平6年7月22日的“奉勅为太政官报在唐僧中瓘牒”记载，在唐之僧中瓘向皇帝献上了上表文和脑源茶。中瓘在致太政官之“状”里，担心温州刺史朱褒拟遣使日本未必会为

³⁷ 小島宪之《古今集以前》（塙书房，1976年）；小島宪之《国風暗黒時代の文学》中（中）・中（下）IⅡ・下I等（塙书房，1979～1991年）。

³⁸ 藤原克己《嵯峨朝の漢文学》（《菅原道真と平安朝漢文学》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藤原克己《菅原道真—詩人の運命—》（维吉出版社，2002年）。

³⁹ 石井正敏“いわゆる遣唐使の停止について—〈日本紀略〉停止記事の検討—”（《中央大学文学部紀要》史学科35号，1990年）；森公章“菅原道真と寛平度の遣唐使 計画”（《続日本紀研究》362，2006年）；东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新书，2007年）。

日本所接受，但又指出此事不必怀疑。据说朱褒希望日本派遣朝贡使。对此，太政官指示中瓘：“据唐朝商人所报，朱褒在黄巢之乱以降，十有余年，完全处于支配地位，皇帝也喜爱其忠勤。因此，即使天皇，亦不得不倾听其意见。但是，仪式有一定之规，此事未必会朝着人们期待的方向发展，这一点要向使者转达；近年灾害频繁，准备起来很困难，虽说朝议已定，但派遣朝贡使，尚须时日，这一点也要向使者转达。”

根据派遣遣唐使的决定，宽平6年8月21日，任命参议、左大弁菅原道真为遣唐大使，任命左少弁纪长谷雄为副使⁴⁰。

可是，宽平6年9月14日，遣唐大使菅原道真上了一个“请令诸公卿议定遣唐使进止状”，请求公卿重新考虑遣唐使之派遣问题。据此可知，中瓘的记录里，详细地记载了唐朝的凋敝状况。中瓘转达了朱褒询问日本不来朝贡之事，但对日本入唐似乎持反对意见。并进而提出：“查记录可知，历代遣唐使都有在航海过程中陨命者，或者遇到贼人而身亡者。只是到达唐朝之后，却没有发生过艰难险阻或饥寒交迫之类的悲伤事情。但是，据中瓘所报，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可以推想的。所以，请下令公卿、博士，令其决定是否继续派遣遣唐使。这是国家大事，并非本人的私事。”

按照通常的说法，由于菅原道真上了这个“进止状”，于是宽平6年9月30日的《日本纪略》就有这么一句：“其日，停遣唐使”，遣唐使因而被废止。石井正敏先生指出，这个日期是很可疑的，这之后菅原道真等人仍然继续称遣唐使，从这些情况来看，停止派遣遣唐使，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不是一下子就决定下来的。现在多数学者支持这一说法。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待上述菅原道真的中国认识呢？关于温州刺史朱褒，在《新唐书·刘汉宏传》、《吴越备史》卷1里都可以看到相关史料。据此可知，黄巢之乱以后，在独霸江南一方的浙东观察使刘汉宏与后来支持吴越的钱镠之间的斗争中，朱褒以温州为地盘，追随刘汉宏。其后与后梁太祖朱全忠勾结在一起，由唐朝皇帝授予温州刺史，充静海军使⁴¹。可以推断，朱褒担任温州刺史，是中和3年至天复2年朱褒卒这一段时间⁴²。在浙西，由于运河及盐业机构之间的联系，商业发达。以此为媒介，那些被称为杭州八都、十三都之类的城市之间的武装势力便纠结在一起；在浙东，他们通常以独立分散的山间村寨为其活动据点。在这种情况下，朱褒能够统治温州城，是一件很少见的情况⁴³，可见朱褒的势力在浙东一带是一枝独秀的。而且朱褒还进行过水上战斗⁴⁴；在浙东一带尚有海上贸

⁴⁰ 《日本紀略》、《扶桑略記》。

⁴¹ 鈴木靖民“遣唐使の停止に関する基礎的研究”（《古代對外關係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85年。首次发表为1975年）。

⁴²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編》4（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

⁴³ 山崎觉士“唐末杭州における都市勢力の形成と地域編成”（《都市文化研究》7，2006年）。

⁴⁴ 《新唐書》刘汉宏传；《吳越備史》卷1武肃王。

易的痕迹⁴⁵。从这些情况看，朱褒就有可能要求日本前来朝贡。其用意，大概是想利用日本的朝贡使节来加强自己的政权基础吧⁴⁶。

关于菅原道真的两封文书。尽管第一封文书承认被唐朝皇帝封为温州刺史的朱褒所具有的势力，但在第二封文书中，却指出了整个唐帝国在黄巢之乱以后的衰微状况，到达唐朝之后的艰难险阻和饥寒交迫、抵达长安的困难重重。可以说，菅原道真准确地把握了当时的中国及江南的情况。因此，菅原道真请求重新考虑遣唐使的派遣问题，就是一件合乎逻辑的事情。

那么，转达了朱褒要求派遣朝贡使、通报了唐朝情况的僧中瓘，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僧中瓘已于元庆5年（881）10月13日，从唐朝那边报告了高丘亲王薨去的消息⁴⁷。其后，在延喜9年2月17日与朝廷有所联系，并送来了沙金⁴⁸。在承和遣唐使以前，经常是遣唐使捎来“唐消息”，于是朝廷就获悉了有关唐朝形势的情报⁴⁹。但在菅原道真那个很久没有派遣遣唐使的时期，有关唐朝的情报，是由中瓘那样的入唐僧及频繁访问日本的唐朝商人带来的。

上述情报的传递方式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当时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变化。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由于节度使扩张势力及压迫异民族等问题，国力衰微，以唐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也开始紊乱。趁着这一空隙，新罗商人和唐朝商人活跃起来，也开始来到日本。像中瓘那样的僧人也是通过这些商人才得以入唐的⁵⁰。

可以推断，由于没有遣唐使也可以获得唐朝的情报和物资，因此，即使菅原道真没有提出重新考虑遣唐使之派遣这一问题，遣唐使也会自然退出历史舞台的⁵¹。

有关停派遣唐使的外在因素，大致如上所述。除此之外，还应该有一个内在因素。唐朝的凝聚力下降，使得周边各国的文化大放异彩⁵²。如前所述，在日本，平安初期唐风文化盛行，那时候作的汉诗与中国的诗题相同，还把日本的风景比作中国的风景而加以吟诵，字里行间充满了对于中国的憧憬之情。其后，日本的汉诗文出现了一个较大的转折时期，

⁴⁵ 山崎觉士“唐末杭州における都市勢力の形成と地域編成”（《都市文化研究》7，2006年）。

⁴⁶ 东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新书，2007年）。

⁴⁷ 《日本三代実録》。

⁴⁸ 《日本紀略》、《扶桑略記》。

⁴⁹ 东野治之“遣唐使と海外情報”（《遣唐使船—東アジアのなかで》（朝日新闻社，1999年）；山内晋次“遣唐使と国際情報”（《奈良平安期の日本とアジア》吉川弘文館，2003年。首次发表于1994年）。

⁵⁰ 石上英一“古代東アジア地域と日本”（《日本の社会史》1，岩波书店，1987年）；石上英一“古代国家と対外関係”（《講座日本歴史2古代2》东京大学出版会，1984年）；东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新书，2007年）。

⁵¹ 东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新书，2007年）。

⁵² 吉田孝《日本の誕生》（岩波新书，1997年）。

承和年间对于《白氏文集》的吸收、消化就是一例⁵³。白居易的汉诗文浅显易懂，容易为日本人所接受。日本人通过吸收、消化《白氏文集》，不仅可以吟诵中国的事物，还可以吟诵自己周边的事物以及生活中的感受⁵⁴，这就产生了日本独特的汉诗文。其代表性作者，就是菅原道真。

日本求诸于中国的，也发生了变化。前面已经说到，延历遣唐使中可以见到文章生出身者，但是到了宽平遣唐使，大使菅原道真及副使纪长谷雄都是文章生出身，这就很有象征意义。从作为国家支配理念的儒教到文章，日本求诸于中国的，发生了变化。由于日本独特的汉诗文的产生，像平安初期那种尽量接近中国事物的单纯的中国憧憬不见了。另一方面，由于唐朝商人日趋活跃，人在日本，就可以获得中国的东西。这样一来，由于环境的逐渐改善，非去中国不可、不派遣遣唐使不行这一状况消失了⁵⁵。

代结语

对于古代日本来说，中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都处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位置，都是一个不得不加以认识的对象。如何面对中国，对于古代日本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课题。面对中国，就要基于中国认识。古代日本留下了如何面对中国的史料，但对于如何认识中国，尤其在个人史料方面，可以说几乎找不到相关资料。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原本是要研究中国认识的，但现在却变成了一篇记述日本如何应对中国的论文。从整体上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对于古代日本来说原本是一个绝对性存在的中国，由于唐帝国的衰退而产生的国际关系的变化，而逐渐变成了一个相对性的存在。其间，古代日本吸收中国的各种制度及文化，从而构建了自己的国家制度及文化基础，而这一点，也加快了中国的相对化进程。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指出并结束我们的考察：在菅原道真以后平安时代中期，整个前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的框架业已形成。

⁵³ 小岛宪之《古今集以前》（塙书房，1976年）；藤原克己“転換期としての承和期”（《菅原道真と平安朝漢文学》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

⁵⁴ 藤原克己“転換期としての承和期”（《菅原道真と平安朝漢文学》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藤原克己《菅原道真—詩人の運命—》（维吉出版社，2002年）。

⁵⁵ 东野治之《遣唐使》（岩波新书，2007年）。

第二节 江户时期的中国认识

小岛康敬

引言

本节将通过日本江户时期知识分子的言论，考察一下江户时期日本知识分子是如何看中国的。

江户幕府在十七世纪上半期，完成了所谓的“锁国”体制。近年来，在日本史研究领域，学术界对“锁国”概念的重新探讨已经取得了进展，并形成了一个共识：更愿意将锁国视为明朝和李氏朝鲜所采取的“海禁政策”的一个形态，而不是将锁国视为以禁止传播基督教为目的的宗教政策。也就是说，学术界认为，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的真实目的，并不在于断绝日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在于幕府以此来垄断贸易并控制出入境¹。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近世日本并非处于完全的封闭状态，它有长崎、萨摩、对马、松前四个对外窗口，分别与中国、琉球、朝鲜、虾夷构成了贸易圈。这种状况，其实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锁国”这一封闭的印象，通过这“四个窗口”，大量物品和情报被带进日本境内，而人际交流也从来没有中断过。

但是，尽管如此，出国仍在禁止之列，能够亲眼目睹中国之人，除了漂流民之外，恐怕再无其他了²。从这个意义上讲，江户时期的中国认识，主要是通过书籍和情报这一过滤装置形成的。基于此，本节将追溯江户时期的日本知识分子有关以书籍、情报为媒介的“想象中的中国”和“中国的象征（例如儒教）”之言论的变化，并以此为本节研究的课题。

在（1）这个部分，将探讨江户时期的日本儒者是如何认识华夷观念的。按照圣人之教，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当然是“华”与“夷”之间的关系。日本的儒者虽然信奉儒教，但要他们百分之百地接受这种华夷观念，在心理上还是有障碍的。而从这一点出发，日本的儒者对华夷观念进行了诸多对应和解释。而这种对应和解释，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已经完成。这一时期的问题可以通过类型化进行整理。

在（2）和（3）这两个部分里，将以荻生徂徕和国学家（主要是本居宣长）为考察对象。荻生徂徕是一位在整个江户时期最愿意深入理解圣人之教的人，而国学家（主要是本居宣长）却对圣人之教极为反感。荻生徂徕视太古中国的“先王之道”为人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规范，并欲阐明之；另一方面，本居宣长认为上古日本的“众神事迹”才称得上是“道”，并欲阐明之。两者之间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可以说，荻生徂徕通过作为他者的中国而从外部观察日本；本居宣长却在发掘内在日本之前，一直在窥视外在中国的他者性。简言之，荻生徂徕通过认识中国来认识日本，而本居宣长则通过认识日本来认识中国。二者都在中国与日本这一关系性中，深化了思考。

¹ 田中健夫《中世对外關係史》东京大学出版社，1975年；荒野泰典《近世日本と東アジア》东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² 关于漂流民的异国体验的记载，《韃靼漂流記》一书最为有名。在江户时代，1644年越前三国浦的船夫国田兵右卫门等人漂流海上，被带往“韃靼”之都盛京（沈阳），以后又被送往北京，备受优待，第二年回到日本。由于本报告以知识份子的言论为侧重点，从论文结构上来说，很难将这些漂流记录写进论文。本报告只能指出，漂流民的异国体验，也是日中之间相互认识的重要内容。

在(4)这个部分,我们将探讨从江户后期到幕府末期,由于西洋世界的出现,日本对中国的认识和定位所发生的变化。由于洋学家的西洋认识给此前的华夷观念带来了巨大冲击,我们将以此为中心进行考察。

(1) 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前期:对“华夷”思想的应对与变化

江户中期的儒者荻生徂徕(1667—1728)曾经这样说过:在远古,“吾东方之邦”处于无知蒙昧的状态之下。后来王仁传来了文字,吉备真备带来了经典,菅原道真开辟了文章学问之路,而藤原惺窝出来以后,人们才开始谈论“天”与“圣”(圣人)。这“四君子”应世代代祭于学宫,为世人怀念³。荻生徂徕认为,只有从文明之国的中国传来汉字、书籍、学问,并学习消化之,日本才能在文化上走向开化之路。荻生徂徕将藤原惺窝定位在作为统一理解世界与人的思想的儒学在日本的吸收与展开的出发点之上。

藤原惺窝(1561—1619)见到了1590年访问日本的朝鲜使者。他与朝鲜使者之间进行笔谈,还与他们诗文唱和。这一切,给藤原惺窝迄今为止在儒佛一致的传统中形成的思想以相当冲击,并使其转向儒学。藤原惺窝对于儒教及产生儒教的中国的思慕之情日益加深,遂于1596年扬帆出海,“欲渡大明国”⁴。可是,途中所乘之船破损,漂到鬼界岛,其愿望破灭了。两年后,藤原惺窝与姜沆相遇,二人之间开始了密切交往。姜沆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的俘虏,是李氏朝鲜的朱子学者,藤原惺窝一定在姜沆的身上看到了明国的影子。他通过姜沆,吸收了先进的学问——朱子学。

姜沆虽为囚虏之身,但其衣冠整洁,坐姿端正,勤于读书、写字,过的是一种典型的“读书人”的生活方式⁵。藤原惺窝亲眼目睹了姜沆的日常生活,深受感动。因为,他在姜沆的身上看到了儒者这一新型生活方式,那就是严于律己、将“天理”贯彻到现实生活之中。藤原惺窝从姜沆那里学到了祭孔仪式、科举考试制度、经筵讲义等儒家文化,还打算在姜沆的帮助之下,以朱子之注刊行四书五经的训点。

藤原惺窝仰慕中国,据说他曾叹息地说:“呜呼,不生于此邦之上世,而生于当世,可谓生不逢时也。”⁶ 门人林罗山回忆:“先生常慕中华之风,欲见其文物。”⁷ 藤原惺窝在1593年见到了中国明朝的讲和使谢用梓、徐一贯,他当时的提问草稿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他的中国观。在提问草稿里,他盛赞大明国人才辈出。他说:“大明乃昔日圣贤所出之国,以予想象之,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朝鲜亦慕其风、奉其命之国也。”⁸ 其溢美之词并不仅仅是外交辞令。“语脉不通,礼容不同”,障碍是有的,但藤原惺窝依然对“使于四方而不辱使命”的使者表示敬意。在一首似乎是慰劳使者的诗中,他感慨地咏

³ “昔在邃古,吾东方之国,泯泯乎知觉罔。有王仁氏后,民始识字;有黄备氏后,经芸始传;有菅原氏后,文史可诵;有惺窝氏后,人人言则称天语圣。斯四君子者,虽世世尸祝于学宫,可也。”(“与都三近”,《徂徕集》卷27,8丁表)

⁴ “欲渡大明国遇疾风而到鬼界岛”,《惺窝先生文集》卷3,《藤原惺窝集》上卷,思文阁出版,1978年,64页。

⁵ 辛基秀、村上恒夫《儒者姜沆と日本》302页,明石书店,1991年。

⁶ “惺窝答问”,岩波日本思想大系《藤原惺窝·林罗山》198页。

⁷ “惺窝先生行状”,岩波日本思想大系《藤原惺窝·林罗山》190页。

⁸ “明国讲和使に対する質疑草稿”,《藤原惺窝集》卷下(原文为汉文)367页,思文阁出版,1978年。

道：“四海一家非远方，大明高客忽梯航，休云语韵翻还苦，中有赏音同故乡。”⁹ 值得注意的是，藤原惺窝具有“四海”意识，他承认日中两国彼此之间存在着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但他却试图以“四海”意识超越这一差异。

他从宋明儒学中学来了贯穿一切的“理”这一概念，并相信其具有普遍性。在给从事朱印船贸易的角仓素庵（1571—1632）的“舟中规约”中，他如是说：

“虽异域与我国之风俗言语有异，然其天赋之理未尝不同。毋忘其同而怪其异，以至欺诈漫骂”¹⁰。

国家不同，则风俗语言有异。但即便如此，上天赋予的“理”（天赋之理）却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忘记了这种共同，认为与自己的语言风俗有异，而对其轻蔑或漫骂，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藤原惺窝承认国家之间在风俗语言上存在着“异”，但他相信存在着超越这种差异的“同”——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同一性，并告诉人们要重视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同一性。藤原惺窝虽然主张“同”，却并不强迫他人与自己相同，他之所以强调“同”，是因为他确信“理”的普遍性，并基于这种确信，进而祈愿与他者之间进行平等的交流。

“理之在，如天之无不昉，似地之无不载。此邦亦然，朝鲜亦然，中国亦然。东海之东，西海之西，此言合，此理同，南北若亦然。是岂非至公、至大、至正、至明耶。若有私之者，吾不信也。”¹¹

“理”是普遍性的，他强烈地主张，他本人绝不认同“私之者”。在这里，我们可以窥见到他那种超越了日本、朝鲜、安南、中国等国家差异的人类皆同胞的理想。可以说，他不像林罗山那样，将朱子学的“理”的观念视为可以确定等级差别的原理（上下定分之理），而是将其视为平等性的原理，并尽最大努力穷极这一作为普遍思想的可能性¹²。藤原惺窝虽然敬慕中国，但他却远离了以尊卑、优劣来看待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华夷式的思维方式。遗憾的是，像藤原惺窝那样思考问题的儒者少而又少，更多的儒者依然沉浸于华夷观念之中而不能自拔。

中国历代王朝对东亚各国采取的是一种称为“册封体制”的对外政策。周边诸国向中国“朝贡”，作为朝贡的“回赐”（还礼），授予朝贡国“册书”（皇帝的命令书）、“封爵”（王号、统治权）。这样一来，宗主国和藩属国这一关系就宣告成立，而为册封体制提供理论支持的，就是华夷思想。即，中国是位于天下之中央的文明国家（中华），而四方之野蛮国家和民族（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有接受中国之“礼”（文化）的教化，才会变得文明起来。这种华夷秩序观念与儒教结合起来，曾在越南、朝鲜、日本通行一时。对于江户日本的儒者来说，如何理解被“圣人之教”视为“东夷”的自己的国家，如何解释华夷概念，是一个重大问题。由此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下面，我们打算将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前期纳入讨论范围，在参考其他先行研究的同时¹³，试着把这些言论加以类型化。

⁹ “邂逅大明国使”，《惺窝先生文集》卷3（原文为汉文）63页，《藤原惺窝集》卷上，1978年。

¹⁰ “舟中规约”，《藤原惺窝集》卷上126页，前引书（原汉文）。

¹¹ “惺窝答问”，《林罗山文集》上卷（原文为汉文）348页，培利堪出版社，1979年。

¹² 源了圆《近世初期实学思想の研究》171页，创文社，1980年。

¹³ 渡边浩《宋学と近世日本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第二章；泽井启一“〈水土論〉の志向性”（岩波讲座：大贯隆编《歴史を問う3》2002年）。

①言论之一：认为华夷是一个固定的、实质性概念

如果说华夷的区别是通过礼之有无来实现的话，那么从理论上讲，不管是不是“夷”，只要是具备了礼，就能够成为“华”。山崎暗斋（1618—1682）的弟子、对朱子学极有研究的佐藤直方（1650—1719）从正面否定了这样的看法。他指出：“中国之定夷狄，以地形云，非以风俗善恶云。”¹⁴ 也就是说，“中国夷狄之分”，在于“道之行与不行。云中国者，自是至爰一定。”与论证“正统”性时，“无须义与不义、德与不德之考虑”是一样的。中国就是中国，夷狄就是夷狄，没有比这更明白的道理了。有人认为应该将本国称为中国，将别国称为夷狄，这只不过是偏袒本国而产生的对于华夷概念的私自解释而已。佐藤直方说，既然“中国云夷狄者，根本在于圣人之立言”，那么，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都要原封不动地接受这个观念。持这种原教旨主义式的想法的儒者很少，更多的儒者对华夷概念进行了多种多样的解释。

②言论之二：在华夷思想的框架之内，主张“东夷”日本优于其他

熊泽蕃山（1619—1691）在坚持华夷秩序的前提下，极力为日本辩护。中国位于“天地之中央”，是中华；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位于中国的四周。这四夷中，“东夷”（朝鲜、琉球、日本）最为优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国家之间文字相通；而在“东夷”之中，日本最为优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日本有天照大神和神武天皇之“德”¹⁵。在此，熊泽蕃山搬出“神”来，借以提高日本的地位。

林罗山（1583—1657）、林鹅峰（1618—1680）、中江藤树（1608—1648）熊泽蕃山、木下顺庵（1621—1698）等人对于皇祖太伯说——日本天皇祖先乃吴之太伯说——是持肯定态度的。这可以解释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他们承认日本是“东夷”，在这个基础上，通过求日本建国之渊源于中国这一行为，来减少日本的劣势地位¹⁶。

长崎的天文历算家、《华夷通商考》的著者西川如见（1648—1724）虽然也将中心轴置于中国，但他同时指出，日本“在万国之东头，乃朝阳始照之地，阳气发生之最初。”¹⁷ 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日本优于其他国家。即，西川如见搬出了“易”、风水说和阴阳五行说，而将“东方”视为生命发祥之地¹⁸，试图得出位于东方的“日本”最为优秀的结论。西川如见将其地理认识扩大到“地球万国”，认为“唐土之于天地万国，尚不及其百分之一。”在他这里，中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相对化了。

③言论之三：以自己的国家为“中国”

¹⁴ “中国論集”，岩波日本思想大系《山崎闇齋学派》424页。

¹⁵ “集義和書”卷八，《增訂蕃山全集》第1册，199页，培利堪出版社，1978年。

¹⁶ 渡边浩『宋学と近世日本社会』57页。塚原学认为，皇祖太伯说“不应该只是解释为承认对中国的劣势地位，而应该解释为与东方君子国——日本这一主张相通。”“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夷’観念について”，《日本歴史》371号，4页。

¹⁷ 《日本水土考・水土解弁・増補華夷通商考》20页，岩波文库。

¹⁸ 在以后的时代里，水户学的会泽正志斋在其《新論》中，同样赋予“东”以特殊意义。他指出，由于“神州”“位于东方，向着朝阳”，所以，日本优越于万国。

山崎暗斋的弟子浅见綱斋（1652—1711）与同门的佐藤直方之间意见对立，他认为“唐为中国，其外为夷狄而鄙视之”完全是一种无“理”之说。而将自己出生之国视为“主”，将其他国家视为“客”，乃“实理当然”。所以，没有必要“模仿唐国”。从“内外宾主之辨”来看，“日本为中国，异国为夷狄”才是“正理”。山崎暗斋曾说，如果尧舜文武欲“从唐国征服日本”而发动进攻的话，那么，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就是“大义”；即使“以德化征服日本，亦不为臣”才是“春秋之道”。在这里，义理（人之道）是显而易见的¹⁹。浅见綱斋此说似乎与佐藤直方尖锐对立，但在华夷之别与“德”之如何无关这一点上，二者是相同的。二者的差别是以中国为中心还是以日本为中心，而以实际状态看待华夷概念，二者则是相同的。

上述以日本为中心、以其他国家为边缘的日本中心型华夷思想，在德川光圀的言论中亦可见到²⁰，但以山鹿素行最为有名。山鹿素行著有历史著作《中朝事实》（1669年成书）一书，其书名之“中朝”乃日本之意。山鹿素行的主张，并没有停留在无论是哪一个国家，自己住在哪里，哪里就应该是“中国”这一谦虚的本国中心主义上面。我们可以窥见山鹿素行的一种想法，即，由日本取代中国、以日本为中心而重组世界秩序。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着以本国为中心的思考方式，问题是拿什么来论证本国的中心性。朝鲜也有一个被称为“小中华意识”的朝鲜型本国中心主义，即，在明朝为北狄所灭的今天，只有准确继承了儒家文化的朝鲜才配称“中华”这一意识。可是在日本，儒教的礼文化并不像朝鲜那样深深地扎根于习俗这一层次上。于是，山鹿素行举出“神”之建国及其血统统治的连续性、“武”之支配这一事实，以证明日本之所以优秀。对于山鹿素行来说，日本是“武教”国家，而正是这一点，才使日本屹立于世界之林，“礼教”也应该包括在“武教”之内。

④言论之四：认为华夷是一个变化性功能概念

侍于对马藩、在日本和朝鲜之间的外交上贡献甚伟的雨森芳洲（1668—1755）曾经说过，国家的尊卑在于这个国家的道德程度。“国之尊卑，在于君子小人之多或少，在于风俗之善或恶。纵使生于中国，亦不可骄；又，纵使生于夷狄，亦不可耻。”²¹ 太宰春台更鲜明地表达了这种思想。他认为，礼文化之有无才是划分“中华”和“夷狄”的指标。他指出：（之所以）“称四夷为狄，贱于中华，乃其无礼仪之故也。纵使中华之人，若无礼仪，即与夷狄同；纵使四夷之人，若有礼仪，即与中华之人无异。”²² 他的意思是，“华”、“夷”的关系是通过“礼仪”之有无而改变位置、发生变化的。其见解是，不是以地理概念而是以显现“礼仪”的文化概念来解释“中华”这一用语。在某一个国家，只要“礼仪”正在发挥着作用，那么，无论是什么国家，都可以成为“中华”。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超越了民族和地理之类固定观念的、指向某种意义上的普遍性见解。

¹⁹ “中国弁”，岩波日本思想大系《山崎闇斋学派》416~419页。

²⁰ “称毛吕己志（日文“唐土”译音，即中国之意。——译者注）为中华，在其国人之言，乃相称也，而日本不应称之。日本之都应称中华，外国岂能僭称中华！甚无道理。”“西山公随笔”，《日本随笔大成》（第2期）7卷。

²¹ “たはれ草”，有朋堂文库《名家随笔集》下，8页。

²² “经济录”卷2，《日本经济大典》第9卷，432页，明治文献，1967年。

⑤言论之五：视华夷之辩为无用之物

伊藤仁斋（1627—1705）指出：“严华夷之辩，大失圣人之旨。”²³ 其长子伊藤东涯（1670—1736）更明确指出“圣人无华夷之辩”²⁴，认定华夷之辩乃无用之物²⁵。伊藤东涯说，自古以来，日本在吸收中国的制度、文化的过程中，完善了本国的制度。假设情况果真如此，那么，认为儒教是“异方之习”、不适合“我邦”的想法；或者相反，由于过度信奉儒教，认为“中夏乃文明之地，礼乐之所在；本邦僻处夷服，简陋无文”，从而贬低日本的想法，都是错误的²⁶。伊藤东涯认为，吵吵闹闹地讨论华夷之辩是毫无意义的，因而，他致力于在学术上研究“本朝之制”的“其所由”，即中国历代的各种制度及其沿革。其卓越的研究成果就是《制度通》（1724年成书）。

上述②至④的类型所示，从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前半期，（儒者们）发表的言论是，尽管接受了华夷秩序式的思想，但又试图对其加以解释，以便使日本的位置在与中国的比较中相对地提高。这种言论之所以如此强劲地产生，其背景是1644年明清鼎革这一事态的发生，而这一事态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上述言论的发表。侍于江户幕府的儒者林鹅峰称其为“华夷变态”（详见村井报告第二章）。清朝乃夷狄僭越之中国这一看法，已经不限于儒者之间，甚至扩大到相当的阶层之中。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划时代的净琉璃作者、歌舞伎狂言作者。另，剧本《国姓爷合战》作于1715年。——译者注）写了一部《国姓爷合战》的剧本，上演时大获好评。其内容是，以明朝忠臣“郑芝龙”为父、以日本人“小睦”为母的混血儿“和藤内”（原型为郑成功）在中国大陆纵横驰骋，击退了“鞑鞑”。在这部剧本中，近松门左卫门将“大明国”描绘成“垂孔孟之教，五常五伦之道”盛行之国，而将“鞑鞑国”描绘成“既无道，亦无法，……类同牲畜之北狄，俗称畜生国。”²⁷ 明清鼎革，确实降低了江户知识分子对中国怀有的印象。但尽管如此，直到十八世纪前期，对于日本的知识分子阶层来说，中国文明依然高高在上。无论怎么刻意抬高日本，其言论都没有脱离“中国文明之伞下”（这一宏观认识）²⁸。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理解更为深入，一种意欲回归中国古代的言论出现了。另一方面，在这种言论的刺激之下，又产生了另一种言论，即，希望摆脱“中国文明之伞下”（的桎梏），强烈排斥礼文化本身。也就是说，前者是徂徕学，后者是国学。本文在此另设一项，探讨这二种言论所表现出来的中国观。

（2）十八世纪中叶：获生徂徕师徒的中国认识——憧憬中国

A 获生徂徕的中国憧憬

在整个江户时期，比任何人都憧憬中国的上古文明、最努力深入了解中国的，当属获

²³ “論語古義”，关仪一郎编《日本名家四書註釈書全書》第3卷，32页。

²⁴ “聖人無華夷弁論”，《經史博論》卷2，关仪一郎编《日本儒林叢書》第8卷，39~40页。

²⁵ 渡边浩『宋学と近世日本社会』（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51页。

²⁶ 《制度通》1，平凡社东洋文库，11页。

²⁷ 岩波日本古典文学大系50《近松净琉璃集》下，230页。

²⁸ 塚本学“江戸時代における‘夷’観念について”，《日本歴史》371号，10页。

生徂徕。荻生徂徕说：“东海不出圣人，西海不出圣人。”²⁹ 从中国来看，东海即中国东方的日本，西海即中国西部的各国，这些地方都没有出现过圣人。

按照荻生徂徕的说法，所谓“圣人”，并不是宋学所说的具有道德操守的人，而是“道”（礼乐刑政）的制定者之意。“道”并非是“自然”存在的，而是由“圣人”制定的，因此才称为“圣人之道”。人与鸟兽不同，要通过制度、礼法、仪式来调整人际关系，要通过诗和音乐等适当的方法来表达感情，这种人类文化行为赖以产生的系统总称为“道”。荻生徂徕认为，首先是伏羲、神农、黄帝开通了“利用厚生之道”，然后是颛顼、帝喾，再经尧、舜之手，才完成了真正的精神上的“礼乐之道”。所谓“道”，就是这些圣人努力开拓的结晶。即，给曾经过着与鸟兽一样生活的人类带来文明的伟大创造者，才是荻生徂徕所说的“圣人”。

太宰春台（1680—1747）进一步发展了其师之说，并使之更加激进。他指出，日本在圣人教传来之前，“自神代至人皇四十代为止，天子亦可与兄弟叔侄结成夫妇”，也就是说，当时近亲结婚盛行，与牲畜并没有什么两样。这在“记纪”（指公元712年成书的《古事记》和公元720年成书的《日本书纪》。——译者注）中是有明确记载的。日本人开始觉得这种行为可耻，是圣人教传来以后的事情。

“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此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自此，此国之人始知礼仪，始悟人伦之道，不为禽兽之行。今世之贱事，目违背礼仪者有如畜类，圣人教所及也。”³⁰

只有在“中华圣人之道”传来之后，日本才得以沐浴文明之中，人们才开始知道“礼仪”之为何物。太宰春台这种毫无顾忌的言论，极大地刺激了国学家的神经，引起了诸多反驳。虽然荻生徂徕确实没有激进到这一步，但这个言论却是荻生徂徕之圣人制定说的理论归结。

对于荻生徂徕来说，中国是文明发祥之地，是“天下”的中心所在。也正因为如此，才是其憧憬的对象。荻生徂徕在其著作的字里行间，随处阐述中国文明的优越性，深深地热爱着中国文化的一切。荻生徂徕相信：“凡百工之巧，以中华为精”³¹ 当他从长崎的玄界上人那里收到了香炉、笔、墨、纸等物时，因其“皆为中华之物”而心存感激，百般珍重，认为没有比这些东西更可爱了³²。其中国趣味贯穿于生活中的每一个方面³³。文具方面，甚至“非唐纸、唐笔不写文章”；书画方面，其评价标准是多大程度上接近中国风格。他讨厌日本趣味，认为这是“和习”（而拒之）。

不仅是文化方面，即使是中国风景，荻生徂徕也是心驰神往。1707年，在与黄檗山万

²⁹ “徂徕先生学则”，《荻生徂徕全集》第1卷，米米兹书房，1973年，71页。

³⁰ “弁道書”，《日本倫理彙編》6，224页。

³¹ “峡中紀行”，《徂徕集》卷15，31丁表。

³² 吉川幸次郎“民族主義者としての徂徕”，《仁齋·徂徕·宣長》所收，岩波书店，1975年。

³³ 有一幅叫做《藺園諸彦会譙図》的绘画，描绘了藺园学塾的状况。荻生徂徕居于中央，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是安藤东野、万庵、平野金华、服部南郭、宇佐美瀧水、太宰春台、山县周南等7名高足。一般将这7个人称为“藺园七才子”。这个称呼模仿的是明代嘉靖年间（1521—1565）颇为活跃的王世贞、李攀龙等7名文人的结社。他们坐在一起的那个桌子上的器物，就是中国之物，这里也可以窥见荻生徂徕一门仰慕中国文化的趣味之一端。小島康敬“藺園諸彦譙会図”，《藺園社中の基礎的研究——江戸の知的研究体——》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費報告書，2006年3月。

福寺八代唐僧悦峰面会于芝瑞圣寺时，获生徂徕曾用白话询问了西湖的风景³⁴。对于日本人来说，白居易和苏轼所喜爱的风光明媚的西湖，也是一个令人憧憬之地³⁵。其风景之美，经常被画家绘入画中。早期有室町时代的雪舟（1420—1506）和狩野元信（1476—1559）等人，江户时代有狩野探幽（1602—1674）等人，都曾拿起画笔，以此为题，挥毫作画。除了去过明朝的雪舟以外，画家们都没有亲眼见过西湖的风景和中国的景象，那么，他们是怎样描绘的呢？这里有几个样本，是明末清初出版的，后来被运到日本，叫做《三才图绘》、《芥子园画传》、《八种画谱》之类的木版画。狩野派的画师们和南画的画家们根据上述画谱，驰骋想象，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中国³⁶。获生徂徕肯定是通过他所喜爱的唐诗的描绘，再加上这些画谱以及画师根据这些画谱³⁷绘制的作品，才对包括西湖在内的中国风景心驰神往的。获生徂徕对于中国的旺盛的好奇心是没有尽头的，其话题不断，诸如诗的规则、寺院的礼法、音韵的问题等，不一而足。

对于以中国的“圣人之道”为评价标准的获生徂徕来说，他是如何评价日本的“武士之道”呢？日本已有“武道”，为什么还要特意去学“儒道”？对于这些问题，获生徂徕以设问的形式自问自答：

“儒道即武士之道。中华有圣人出，日本无圣人出，故武士之道偏向武之一方。”³⁸

“儒道”本来就是“武士之道”。但由于日本没有产生圣人，武士没有机会掌握“诗书礼乐”之类的文化修养，只好偏向“武”这一边。现在称为“武士道”的，其“大形”不过是“战国之风俗”而已。而“圣人之道以外，尚有与国土相适应之武士道”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的³⁹。武将、武士应该以中国为榜样，转化为“士大夫”或“士”，成为君子才行。所以，获生徂徕劝导说，为武士者，应修习经书。可是，与中国和朝鲜不同，日本没有科举制度，并不是只要学好经书、通过科举考试之后，任何人都可以做高级官僚的。所以，不管怎么鼓励武士们学习经书，都缺乏动力。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为了鼓励幕臣钻研学问，命令“大学头”林信笃和儒官室鸠巢等人分别在昌平坂的圣堂和八重洲河岸的“高仓屋敷”开讲。但开讲之后，却出现“旗本、武士，听者绝无”⁴⁰这一景况。归根结底，

³⁴ 徂徕：“听说和尚您的故乡在杭州，杭州曾是南宋的都城，恐怕文物风俗与其他地方有所不同吧？”悦峰：“忠臣的旧址现在还在。”徂徕：“西湖景色颇负盛名，现在怎么样？听说苏堤、孤山有很多名贤旧址。忠义之人岳飞的旧址，愿闻其详。”悦峰：“岳飞庙历代王朝不断修整，到了今天，已经成了人们的敬仰之地。西湖景色一言难尽。”徂徕：“那是，那是。孤山周围有梅花吗？”悦峰：“梅花甚美。据说孤山自古以来就有王者之气。去年，康熙帝来访，修了一座行宫。”徂徕：“可惜。简直就像秦始皇一样，真扫兴。”“和尚您生于上国，饱览名胜，真叫人羡慕。西湖有多大？”悦峰：“有四里，花与柳树盛开的时最好。”徂徕：“和尚您渡过钱塘江吗？钱塘江有多宽？”悦峰：“宽二里。太宽，很难渡过去。”徂徕：“钱塘潮乃天下奇观，您在中秋节看过吗？”悦峰：“八月观潮，满潮时就像大山一样，真是天下第一景观。”石崎又造《近世日本に於ける支那俗語文学史》56～57页，弘文堂书房，1940年10月（原文为汉文）。

³⁵ 金文京“西湖と不忍池”，和汉比较文学丛书16《俳諧と漢文学》，汲古书院，1994年。

³⁶ 开馆20周年纪年展《中国憧憬—日本美術秘密をさぐれ—》，町田市立国际版画美术馆，2007年4月。

³⁷ 《芥子園画伝》是王概在李笠翁的山水画集的基础上增补而成的绘画摹本。元禄年间传入日本，宽延元年（1748）开始模刻，给包括南画在内的江户时期的画坛以相当影响，池大雅和与谢野芜村等人也曾参考作画。另，大日本近世史料《幕府書物方日記》五记载，幕府“书物方”曾拿《芥子園画伝》与徂徕之弟获生惣七郎（获生观）持有的善本《笠翁画伝》进行交换（享保九年六月十一日之项）。

³⁸ 《訓訳示蒙》，《获生徂徕全集》第2卷，米米兹书房，1974年，437页。

³⁹ 《太平策》，岩波日本思想大系《获生徂徕》，454页。

⁴⁰ 《政谈》，岩波日本思想大系《获生徂徕》，439页。

学问只停留在“艺事”之上，而自由度却增加了⁴¹。

荻生徂徠说，中国文化的优秀性，在语言上也可以得到佐证。在他看来，汉语是一种简洁而浓密的语言，一词一句蕴含着诸多语义信息（“密”），而“夷”的语言则是一种粗陋而松散的语言（“疏”）。他指出：

“中国之词文，而夷质；中国之词密，而夷疏。”⁴²

基于这种认识，荻生徂徠提倡古文辞学，并要求弟子们也学习中国语言。当时的人们对于荻生徂徠的学说，皆“喜而习之”，其盛况简直“如狂信”一般。享保年间（1716—1735），徂徠学曾“风靡”江户的知识世界。

B 古文辞的学习与黄檗宗

为了阐明中国古代的“圣人之道”，荻生徂徠提倡古文辞学，以此作为研究学问的方法。其内容大致有以下几点：“圣人之道”保存在“六经”之中，因此，大前提是学习“六经”。但是，“六经”属于中国古代的修辞性语言，也就是说，是以“古文辞”记录的，所以就必须学习“古文辞”。而要学习古文辞，仅学习古典是不够的，自己也要用古典语言进行著述。而提醒我们这么做的，是明代的李攀龙、王世贞。他们首倡拟古主义文学论，认为应该模仿古人使用的句子和表达方式来写作诗词、文章。荻生徂徠学会了这一方法并使之发扬光大，不仅在诗词、文章领域有所建树，还发展到古代经典领域，使其成为一种学问方法并普及到一般层面上。

荻生徂徠提倡古文辞学，力图排除后世的注释、解释，返回古典文献本身，以正确地把握古典真意。在这一点上，与伊藤仁斋首倡的“古义学”有相通的一面。但荻生徂徠的原典主义更为彻底，他主张排除历来的训读式的汉文读书法，而以原来的中文句法直接阅读并加以理解。因为，汉文训读即使获得了文章语义，但句子整体所蕴涵的丰富多彩的事实却容易漏掉。荻生徂徠要求打开一个与母语有别的另一个语言通道，以便能够按照外语原来具有的句法处理外语。这个主张是重要的。因为，训读割裂了人们对中文、甚至对中国本身的真正理解。要明确地认识到，“此方自有此方言语，中华自有中华言语，其性质原本有异。”⁴³ 荻生徂徠说，不要觉得将汉文变成日文就完事大吉，而应该认识到，汉文就是汉文，要认真对待汉文的他者性质。

在这种认识下，荻生徂徠的私塾“蕺园”对汉文采取了直读方式，而不是训读方式。但是要想直读，就必须学习“唐音”，于是他开始师从长崎出身的“唐通事”学习中文的日常会话。鞍冈元昌（苏山）、中野摺谦（1667—1720）、冈岛冠山（1674—1728）等人都是蕺园弟子学习“唐话”的师父。特别是冈岛冠山，他被聘为荻生徂徠主持的译社的译

⁴¹ 在日本江户时期，孔子与儒家经典《论语》常被当作笑料而在坊间流行。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一是《聖遊廓》（作者不详），是一部异想天开的游戏之作，描写孔子与释迦牟尼、老子一起去妓院游乐。其二是有人利用荻生徂徠的《论语》注释书《论语微》与妓院之街吉原町谐音（日语“微”与“町”发音相同。——译者注），写了一本《论语町》（作者是大田南亩）的书。这本《论语町》是一部诙谐的书，它在注释时，以吉原妓院的艳事比附《论语》和经书的章句。这种公开调侃儒家学说、接受滑稽文化的行为，在整个社会深受儒家礼文化影响、颇具知性氛围的李氏朝鲜，是不可想象的。小岛康敬“‘聖人の道’与‘色道’”，《アジア文化研究》别册16号，国际基督教大学，2007年3月。

⁴² 《訓訳示蒙》，前引书，438页。

⁴³ “訳文筌蹄”，《荻生徂徠全集》第二卷，米米兹书房，1974年，547页。

士。冈岛冠山编著了很多外语教科书，诸如《唐话类纂》《唐话纂要》等。《唐话类纂》的卷头，荻生徂徕、安藤东野、太宰春台等人名列其中，可见冈岛冠山与荻生徂徕一家的关系之深。他还被看作是《水浒传》在日本的第一部翻译书《通俗忠义水浒传》的译者；他还模仿罗贯中的《三国志演义》，将日本的《太平记》敷衍成中国白话小说式的《太平记演义》并付梓出版。

仅就荻生徂徕师徒热衷于学习中文并倾倒于中国文化而言，还可以看到其与黄檗宗之间的关系。长崎建有兴福寺、福济寺、崇福寺——唐三寺，是由旅居长崎的中国商人创建的。兴福寺的逸然受四代将军德川家纲的委托，成功地把福建省福州黄檗山万福寺的住持隐元隆琦(1592—1673)邀请到了长崎。1654年，隐元不顾63岁高龄，率领数十名弟子和工匠来到日本。据说，此举超过了八世纪鉴真来日时的规模。隐元深得后水尾法皇及德川幕阁的尊崇，遂成为京都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的开祖。这以后，黄檗僧人陆续来到日本，黄檗宗日益发展，遂在江户芝白台开紫云山瑞圣寺。据说，到了1745年，日本已有897家黄檗寺院了⁴⁴。在黄檗寺，读经使用唐音，仪式作法也是明代风格。在万福寺山门之内，中文简直就是寺内惟一通用的语言，甚至留下了一诗首：“人出山门外，始见日本国，欢唱采茶歌”（菊舍尼，1753—1826）⁴⁵。黄檗寺院俨然成了日本的国中之国。荻生徂徕就曾赞叹黄檗寺里的中国风格的仪式。他说：“黄檗派之法事，与日本法事不同，仪式正规，有条不紊。是亦异国礼法面影之写照也，故如此。”⁴⁶ 荻生徂徕师徒与刚才谈到的悦峰及黄檗僧侣之间交往频繁，其中国趣味在很大程度上深受黄檗文化的影响。

荻生徂徕师徒就像荻生徂徕所宣扬的那样，大力使用中文，“吾党学者，虽睡中寐语，亦不颠倒。”⁴⁷ 他们还把自己的名字起成三个字的，按照中国风格互相称呼。例如，荻生徂徕叫做物茂卿，服部南郭叫做服南郭。地名也是一样，如将长崎称为“崎阳”，将山城称为“洛阳”等，都是按照中国风格起名的。荻生徂徕师徒如此倾倒中国的生活方式，在外人看来，简直就是沉迷于中国趣味，令人生厌。荻生徂徕曾经说过：“中国乃人之人，夷狄乃人之物。物不能思，惟人能思。中国礼仪之邦，乃其能思之故也。”⁴⁸ 对于荻生徂徕这种过激言论，有人表示愤慨。荻生徂徕自称“东夷之人”，他在赞美孔子像时，曾自署“日本国夷人物茂卿”⁴⁹，这一点也颇为后世诟病。但我们认为，荻生徂徕之所以有这么一系列言行，是他自己采取的不可缺少的一种自觉行为。因为他认识到，只有这样才能排除“和习”。那么，我们要问一下，为什么摆脱“和习”如此重要？

荻生徂徕在很小的时候，父亲被赶出江户城，他只得跟随父亲在南总地区的一个偏僻乡村里生活。他的父亲被赦免之后，时隔十几年回到了江户，可是江户城完全变了模样，这让他很吃惊。在其著作《政谈》中，他回忆道，如果他一直住在江户的话，可能就发现

⁴⁴ 中野三敏《十八世紀の江戸文芸》，岩波书店，1999年，73页。

⁴⁵ 石川九杨《書と日本人》，新潮文库，2007年3月，81~82页。

⁴⁶ “政談”，岩波日本思想大系《荻生徂徕》，397页。

⁴⁷ “与江若水”，《徂徕集》26卷，6丁表。“吾党学者，虽睡中寐语，亦不颠倒。”

⁴⁸ “護園隨筆”卷4，《荻生徂徕全集》第17卷，米米兹书房，1976年，299页。

⁴⁹ 吉川幸次郎在其“作为民族主义者的徂徕”一文中，是这样解释的：荻生徂徕之所以自称“夷人”，是由于他认为，正因为自己是“夷人”，才能够把握正确的传统，这是荻生徂徕表达自信的一种方式。《仁齋·徂徕·宣長》，岩波书店，1981年，240页。

不了这种变化。出了江户这个“围城”之后，才清楚地看到了江户的全貌。这个体验促使他产生了一种认识，那就是必须从日本这个“围城”之外观察日本才行。可是，在锁国体制之下，即使是跨出日本一步也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在日本制造出一个近似的中国好了。荻生徂徕及其门徒的中国向往，不能说没有这种意识。

荻生徂徕师徒以唐话学为武器，他们是当时日本的中国学中心。荻生徂徕翻译了明洪武帝旨在教化民众而颁发的《六谕衍义》⁵⁰，又著《明律国字解》。荻生徂徕之弟荻生观（北溪，1670—1754）侍于将军德川吉宗，校订了《大明律》三十卷并加以标点（《官准刊行大明律》1723刊），还利用《大明会典》和《大清会典》等典籍，对明朝与清朝的各种制度进行比较，试图客观地分析“华”之明朝为什么崩溃，“夷”之清朝为什么获胜⁵¹。当时，最为通晓中国各种制度的人，大概只有北溪和《制度通》的作者伊藤东涯了。在诗这方面，服部南郭刊行《唐诗选国字解》，该书成为畅销书。而诗社则在各地出现，其文人趣味即使到了江户中期，仍然可以持续扩大。

他者认识同时也是自我认识。当荻生徂徕把凝视中国的视线转向日本内部时，他发现，中国在秦朝以后消失殆尽的“圣人之道”却在日本得以保留。按照荻生徂徕的说法，日本的雅乐乃圣人所作之“乐”，日本的“神道”乃周王朝以前的古老形态之“道”传到日本之后遗留下来的。“吾国神道”虔诚地信仰“天”和“鬼神”，并在信仰的基础上，以政教一致为统治之根本，这完全是“唐虞三代之古道”。“吾邦之道，即夏商之道也。”（《论语微》）而在中国，秦朝“以郡县代封建，以法律代礼乐”，至此以后，遂失去了“圣人之道”⁵²。当代的德川王朝属于封建治世，这就符合了“圣人之道”。在中国，“圣人之道”消失了；而在日本，“圣人之道”却无处不在。在这里，一直是承认中国优越性的荻生徂徕，却也在鼓吹“日本之优越”⁵³。

“三代以后，虽中华，夷狄亦猾之，非古之中华也。故徒慕中华之名者，亦非也。”

54

夏、殷、周之“古中华”与秦汉以后的中国之间的明确划分，在荻生徂徕的中国认识中逐渐明确起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其中国憧憬开始逐渐局限在“古中华”之上了。在其晚年的著作《政谈》中，他一贯将秦汉以后的中国称为“异国”。

不过，即便如此，以“古中华”为价值标准、认为日本的神道来源于“圣人之道”的徂徕学说，还是深深地刺痛了国学家之心，激起了国学家对于儒教的强烈批判。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国学是如何批判儒教的。

（3）十八世纪后期：国学家的中国认识——批判“汉心”的言论

贺茂真渊（1697—1769）在《国意考》中，对荻生徂徕之“道”乃圣人所传的学说，采取了反其道而行之的办法，主张“皇国”优于“唐国”。他指出：儒者以“唐国之道”

⁵⁰ 德川吉宗为了利于庶民教化，当初曾下令幕府儒官室鸠巢进行翻译。但由于这是用明代口语体写的，室鸠巢未能全部解读，于是又重新下令荻生徂徕进行翻译。

⁵¹ 川胜守《日本近世と東アジア世界》，吉川弘文馆，2000年，253页。

⁵² “復水神童 又附答問”，《徂徕集》卷24卷，12丁里。

⁵³ 吉川幸次郎《仁齋·徂徕·宣長》240页。

⁵⁴ “復柳川内山生”，《徂徕集》卷25，15丁里。

为“治国之道”，那么，天下因此太平了吗？看中国的历史，实际情况难道不是王朝之间反反复复的篡夺吗？“地位卑贱之人，出而弑君，自称为帝，而世人皆垂颈而从”。不仅如此，明明“视四方之国为夷狄，百般鄙视”，但“其所称之夷国”（清国）一旦“称帝于唐国之时，又恭顺礼拜，甘心顺从”，这就正好说明，“儒之道，乃乱国之道”。一位儒者（指太宰春台，本文作者注）说什么在儒教传来之前，日本没有“仁义礼智”之类的词汇，于是就断定日本没有仁义礼智之教，这种论调真是浅薄至极。为人者，大凡都“有慈爱之心、愤怒之情、明辨是非之力”，这实在是当然之理。日本就是在“天地固有之心”之下而得到“长治久安”的，甚至没有必要特意巧立名目进行什么说教。任何事情，“以人心为之，其错必多”，日本“素来乃人性耿直之国”，在“天地固有之心”之下才得以国泰民安，本不是什么“性理之所致”。可是，儒教一经传来，立即发生了“天武朝之大乱（指“壬申之乱”，本文作者注）。在奈良时代，又搞什么衣冠和日常生活等改革，“尽仿唐国之风”，结果是，外观上倒是雅致起来了，而“邪心”却多起来了。因此之故，日本应该恢复到儒教传来之前的“我皇国之古道”上。

贺茂真渊主张，要否定自作聪明的人为之举，而回归悠然自得的自然状态。老子主张无为自然之说，以对抗儒教，这二者之间存在着类似性。事实也是如此，贺茂真渊对老子的学说产生了共鸣，他指出：“老子其人云，天地万物，自然为之，实合乎天下之道也。”⁵⁵ 在唐国，动辄称人为万物之灵，以人为贵”，但是，“凡天地之际生生不息者，皆虫。”人类正是因为偶有“智慧”，才会产生“种种不良之心”，世道才会如此动乱不堪。“在鸟兽观之，人最恶，切勿似彼。”对于秉持朴素的自然主义人生观的贺茂真渊来说，中国并不因其是礼文明之国而得尊贵，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中国是礼文明之国而应予以否定。本居宣长（1730—1801）接受了其师之说，更加激进地反儒、反华。

本居宣长在京都学习期间，有儒生主张，人无“礼义”，形同禽兽，所以要学习“圣人之道”。对此，本居宣长是这样回应他的：那么说来，你是打算学习“圣人之道”“而后免为禽兽”了？“异国人”大概如此，“吾神州”则不然。上古之时，君民同信“自然之神道”，而通过这种信仰，身不修而自修，天下不治而自治。修身治国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圣人之道”⁵⁶。本居宣长并不认为“圣人之道”是人类普遍的教义，而将其看作不过是特殊中国的一个文化规范而已。本居宣长为了与“圣人之道”相抗衡，在初期，曾经说过“我邦之大道”就是“自然之神道”之类的话。但随着他的“记纪”研究的深入，他最终将“自然之”这一修饰语去掉，而改口说“神道”了⁵⁷。这是因为，此时本居宣长开始意识到，比起自然的作用来，那个处于这种作用之根源位置的“神”的主体性更为重要。他最终将其思想发展到这样一种认识：世间的一切皆非“自然之事”，而是“神之所为”。

这样一来，本居宣长就对“神之道”一说加以阐释。他认为：“神之道”既非“天地自然之道”（这时候，老庄思想应该浮现在他的脑海中），亦非“人力创制之道”（这时候，儒家特别是获生徂徠应该浮现在他的脑海中），而是上古日本诸神留给后人的事迹。因此之故，欲知“神之道”，前提是必须正确解读记载着“神之道”的《古事记》。本居

⁵⁵ “国意考”，岩波日本思想大系《近世神道論·前期国学》，382页。

⁵⁶ 《本居宣长全集》17卷，筑摩书房，23页。

宣长的这种对于构想和方法的认识受到了荻生徂徕的影响。荻生徂徕为了阐明中国古代的“圣人之道”，鼓励人们学习“古文辞”，从而迈进“六经”的世界；同样，本居宣长为了阐明日本古代的“神之道”，通过研究古代日语而迈进了《古事记》的世界。本居宣长在阐明“神代”和“古代”时，以《古事记》为蓝本，没有依据正史《日本书纪》。这是因为，《日本书纪》“慕唐土书籍之体裁”，以“润色过多之”汉文撰写之故。本居宣长说，只要人们尚有“故作聪明、诸事模仿唐风之心”⁵⁸，那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神代、古代。

本居宣长对于儒教的批判是严厉的。在此，我们将其整理成三点，并具体考察其内容。这三点是：①世界的生成；②人生观；③政体观。

①关于世界的生成

按照本居宣长的说法，儒教以“阴阳、八卦、五行之类的道理”来解释世界的产生，这不过是“圣人”随便炮制出来的“空话”而已。认为可以在任何方面合理地解释世界，这是“人智”的虚妄之处。其实，世界处于诸神的控制之内，而诸神超越了“人智”。《古事记》是惟一准确记载世界之始的典籍，按照《古事记》的说法，这个世界是由“产灵之御灵”（天地万物肇始之神——译者注）创始的。由于日本是“光照四海万国之神照大神”所生之“国，故为万国之本、世界之源”⁵⁹。本居宣长并不将“神之道”视为仅限于日本的“道”。他认为“神道”即“真之道”，而“真之道，在天地之间，无论何国，皆同而为一”，主张“神道”具有世界普遍性。这就出现了文化相对主义所无法完全涵盖的“皇国”民族主义的逻辑。也就是说，对于日本独特性的认识，直接跃升到日本优于世界、举世无双这一主张上来了。本居宣长卒后，其门人平田笃胤(1776—1849)发展了本居宣长在这一方面的理论，并构建了一种具有国粹主义性质的理论形态。

②关于人生观

中国不是“神之国”，所以恶人多，因而就产生了严格规范善恶的“国之习惯”。“圣人”教导人们应该如何生活，可是在此之前，人们不得不如此这般生活，才是“人之常情”。“人之真情者，犹如女童之未熟且愚也。而如男人之毅然且聪明者，非真情也，乃装饰外观之饰物也。”⁶⁰男人应该如此这般，女人应该如此这般，这只是受到了“汉心”污染的看法而已。心爱的孩子先于父母而去，母亲泪流满面，样子实在难看；而父亲此时毅然挺立之状，叫人看了佩服。可是，男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必须顾忌脸面而装出来，归根结底，他是在心里撒谎而已。失子之痛，父亲也好，母亲也好，都是一样的。母亲的“娘娘腔”才是“不加掩饰的真情”。受到“汉心”污染之人，以繁琐讨论人的善恶为最高境界。这样的人，直到最后也不会知道什么是“恬静风雅之趣”。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知道物之哀”。惟知“物之哀”，人才会推量事物的本质和人心的细微之处，才会深深

⁵⁷ 相良亨《本居宣長》，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

⁵⁸ “石上私淑言”卷2(53)，《本居宣長全集》第2捐，筑摩书房，1968年，144页。

⁵⁹ “玉くしげ”，《本居宣長隨筆》第8卷，311页。

⁶⁰ “紫文要領”，新潮日本古典集成《本居宣長集》，202页。

地对此发生共鸣。本居宣长为了对抗儒教的道德主义人生观相，在此提出了主情主义的人生观。

③关于政体观

对于因“德”之有无而发生政权交替即易姓革命，本居宣长认为，这完全是那些篡夺王位之人为使自己的行为正当化而找出的理论依据，他对此是坚决否定的。有“德”之人可以就其“位”，或许会有人认为很“宝贵”，其实这是一个“恶风俗”。“异国尊德之俗，虽曰庶人，只要有德，即为贵。而人每有侮上之心，终致篡夺之祸。”⁶¹ 这已经为中国历史所证明。近者，清朝篡夺明朝王权，就是明证。以前贱为“夷狄”之人，今日却高居“天子之位，不知耻至此，国何以堪”。而皇国就不一样了，“其贵贱不以德分，只以种论”⁶²。所以，“虽万万年之末代，君臣之位，仍岿然不动。”本居宣长试图以“种”即“皇统”（血统）而不是以“德”的原理为根据，来论证日本的优秀性。这必然导致以“礼”、“德”为标准的儒教式华夷观念解体，同时又重新构建了一个以“种”这一原理为依据的尊卑观念。对于自己和他人，不是以平等而是以优劣来定位这一点，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

上述本居宣长对于中国的反感和对“汉心”批判，在逻辑上还存在着越级和混乱之处。首先，本居宣长没有区分儒教和中国之别，所以，其儒教批判就直接与厌恶中国连在一起。他厌恶的是被儒教这一过滤器过滤过的中国，当然不是现实的中国本身。其次，他的“汉心”批判，既是对“汉心”本身的批判，也是对那些无条件信奉中国所有事物的日本人之“汉心”的批判。对于二者的批判，他总是放在一起进行的（本居宣长的焦虑似乎主要集中在后者），其论调极为感情用事。如此看来，其中国认识还是有问题的，但他对于中国，却绝不是无知之辈。恰恰相反，其青春时期的求学笔记《在京日记》⁶³显示，他曾广泛涉猎汉籍，并将其仔细地摘抄下来。他对汉籍的知识和理解并不是一知半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本居宣长以古典中国为反射板，使日本的主体性获得了形象化。本居宣长的“大和心”、“神道”之类的概念，大多以“汉心”、“圣人之道”为反射镜，经反复推敲而成。对于本居宣长来说，中国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巨大存在，这一意识，他一直萦绕于脑际。其实，他对中国的超乎寻常的抵触情绪，正好说明了他对中国抱有的自卑感是多么的强烈。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本居宣长对于中国的一切事物都表示反感，却对白居易这位给平安时代文学以巨大影响的人抱有特别的亲近感⁶⁴。《白氏文集》中，“多情”一词频繁出现，感伤之诗不在少数。有人问本居宣长“知物哀”是什么意思，他引用《白氏文集》一篇题为“刘家花”的作品中有关“多情”一词的用法加以解释⁶⁵。也就是说，本居宣长是

⁶¹ “くず花”下卷，《本居宣長全集》第8卷，154页。

⁶² “くず花”下卷，《本居宣長全集》第8卷，153页。

⁶³ “在京日記”，《本居宣長全集》第16卷。

⁶⁴ 诸田龙美“多情と物のあはれ——白居易の宣長の共鳴”，《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科学编》第20号，2006年。本文受这篇论文的启发甚多，以下论述请参照这篇论文。

⁶⁵ 诸田龙美“多情と物のあはれ——白居易の宣長の共鳴”，《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人文科学编》第20号，2006年。37页。

将白居易视为“知物哀”的诗人而高度评价的。白居易对儒教伦理观持怀疑态度，创作了大量以“长恨歌”之类的男女情爱为主题的艳诗。由于这个缘故，他的作品被男性批评为女人腔，却获得了女性的支持。爱好《源氏物语》、视人性本质为“女人腔”的本居宣长，其感性不可能不对白居易之“多情”产生共鸣。本居宣长特别强调日中两国之间在国情和文化上的差异，但另一方面，他又确信“人情”具有普遍性，走到哪里都不会发生变化。“人情者，从古至今，从唐至天竺乃至日本，皆不变也。”⁶⁶ 汉诗也好，和歌也罢，都是根植于普遍性的“人情”之上的产物，“歌与诗，心本相同。”⁶⁷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本居宣长“知物哀之心”与白居易“多情”之心，在“人情”这一共同基础上，跨越国境而实现了相互之间的“共鸣”。视“汉心”与“大和心”为水火不容之物的本居宣长，这时候却意外地将视线转向了剥去文化衣裳之后的赤裸的人性上面去了。本居宣长不是以理性、而是以感性来理解这种超越了国家与文化差异的普遍的人类本质的。

④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前期：以洋学家为中心的中国认识——中国的相对化

十八世纪后期，兰学日益兴盛，人们对西洋有了进一步了解，开始通过来自西洋的视角重新思考中国的地位。翻译《解体新书》(1774 刊)的中心人物前野良泽(1723—1803)，根据来源于希腊自然哲学的四元素说，认为儒教的阴阳五行说不过是“支那一区之私言”而加以否定。他还说，在中国，自古以来就认为大地是一个类似于四方形的像棋盘一样的东西，可是到了后世，从欧洲那里传来了天文学，才开始称之为“地球”⁶⁸。前野良泽的翻译伙伴、一个叫做杉田玄白(1733—1817)的人，根据这个地球球体说指出：“地球者，一大球也，万国配居于此，所居皆中，何国不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⁶⁹，以此来将中国相对化。这里面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大地是球体，由于是球体，所以从地理上讲没有什么中心存在。令人饶有兴趣的是，他将视点的轴心置于西洋，而从西洋看中国，其定位就十分明显了：“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支那”这个说法，最早是新井白石(1657—1723)在其《采览异言》(1715)中，根据西洋语言的发音，将中国这一发音记述为“支那”的。兰学者们有意摆脱中华世界观，而以荷兰语译的“支那”(China)一词来代替“中华”、“中国”，之后就常用起来⁷⁰，并得到了普及。

从地球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并将其相对化，这个方法，亦为杉田玄白的门人大槻玄泽(1757—1827)所继承。而大槻玄泽更进一步无情地批判了拘泥于华夷观念的中国及追随中国的日本。他说：“汉土称本国为夏华，称域外为蛮夷，以此为尊，以彼为卑。其实乃系私称，并非公称。华夏之中有得失者，蛮夷之中亦有得失者。”我国自古以来，无论何事，“历以汉土为师，已成国俗，皆仿此称海外诸国为蛮夷”⁷¹，实在是大错特错。对于大槻

⁶⁶ “あしわけをぶね”，《本居宣长全集》第二卷，筑摩书房，1968年，46页。

⁶⁷ 本居宣长说，在咏叹“幼稚真情”这一点上，日本的和歌与中国的诗本来都是一样的。只是到了后世，中国的诗受到了“汉心”狡智的毒害，已经堕落了。

⁶⁸ “管蠡秘言”，岩波日本思想大系《洋学》上，133页。

⁶⁹ “狂医之言”，岩波日本思想大系《洋学》上，230页。

⁷⁰ 渡边浩《東アジアの思想と王権》，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170页。据佐藤三郎在其“有关日本人称中国为‘支那’的考察”一文中研究，到了十九世纪，日本使用“支那”一词的例子多起来了。在这些例子中，有一些蔑视中国的微妙含意（《近代日中交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34页）。

⁷¹ “蘭訳梯航”，岩波日本思想大系《洋学》上，375页。

玄泽来说，“道正而术精”才是“华夏”，“道不正而术粗”才是“蛮夷”。令人意味深长的是，大概玄泽不仅以“道”（道德）而且以“术之精粗”来作为衡量华夷的标准。当他说“术”时，西洋的“术艺”概念当然已在其脑海之中了。这样一来，可以说，大概玄泽认为最精于“术”的西洋才最符合“中华”之名。这里，我们就可以窥见“作为中华的西洋”这一想法了。

司马江汉（1747—1818）认为，由于“兰画”使用远近法、明暗法等手段作画，因此在“真写实物”这一点上，“兰画”比“和汉之画”不知胜过多少倍。也正是这个司马江汉，著有《地球全图略说》（1793）等书，致力于普及地球球体说和地动说。他站在这个立场上指出，称“支那为中华”也好，称“吾邦为苇原之中津邦”也罢，都不过是以本国为中心看待事物的方法，根本就是井底之蛙才会有的见解⁷²。司马江汉似乎在运用天文学和地理学知识，力图摆脱带有中华意识的思维方式。

日本有一种倾向，那就是容易以功能概念来认识华夷问题，所以，当看到西洋文明胜过中国文明时，就会重新认定西洋才是“中华”⁷³。作为中国统治阶层的文人官僚阶层对于积极引进西洋的科学技术，是有抵触情绪的⁷⁴。这些文人官僚，是经过科举制度选拔上来的，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儒教文明的正统传承者，所以在他们看来，实用的技艺之学是卑贱之学。更是因为，引进西洋文明本身，就意味着全面否定整个中华文明。与此相反，作为知识阶层的日本武士，例如佐久间象山那样的典型人物，一旦认识到西洋在军事、科学技术方面优于日本，就立即打算积极摄取这些“西洋艺术”。这是因为，他们不像中国的文人官僚那样，深受来自于中华意识的正统性观念的重压。他们很容易将文明的榜样从中国转换到西洋，就像明治时期的“脱亚入欧”那样。

还有一些人认为，不仅在学术、技艺方面，就是在政治、社会制度方面，西洋也已经实现了中国古代的理想统治。松江藩士荻野信敏（1716—1817）就认为，尧舜禹“三代之治”现今已经存在于荷兰⁷⁵；熊本藩士横井小楠（1809—1869）则评价说，西洋已经“废君臣之义，一向公共和平”，其政治制度“几乎符合三代之治教”⁷⁶。

1842年，清国在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这个事实对于日本的知识分子来说，是极具冲击力的，它迫使日本的知识分子改变了迄今为止的中国观和西洋观⁷⁷。以此为契机，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决定性地恶化了。幕府昌平校的儒官古贺侗庵（1788—1847）最早分析到，清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并不单纯在于军事力之差和海防之不备，而在于其根深蒂固的“夜郎自大”的中华意识已经成为“支那之病根”，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果。其弟子盐

⁷² “和蘭天說”，《司馬江漢全集》第三卷，八坂书房，1994年，36页。

⁷³ 植手通有《日本近代思想の形成》，岩波书店，1974年，242页；渡边浩《東アジアの思想と王権》前引书。

⁷⁴ 当然，我们不能忘记著有《海国图志》、力陈“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这个人的存在。但是，《海国图志》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引起重视。而在日本，则于1851年引进此书之后，于1854年予以翻刻，到1856年，已有20余种翻译本刊行于世（鲇泽信太郎、大久保利谦《鎖国時代日本人の海外知識》乾元社，1953年），由此亦可看出，日中两国对于西洋的危机意识之差异。

⁷⁵ “題蘭学階梯首”，岩波日本思想大系《洋学》上，323页。

⁷⁶ “国是三論”，岩波日本思想大系《渡辺崋山・高野長英・佐久間象山・橋本左内》448～449页。

⁷⁷ 关于鸦片战争的情报对于日本的冲击，王晓秋《近代中日启示录》北京出版社，1987年（日译本：《アヘン戦争から辛亥革命—日本人の中国観と中国人の日本観》，小島晋治监译，东方书店，1991年）一书中，有详细的论述。

谷宕阴指出：“清人以华自高，不索外藩之情”，批评清朝自以为是⁷⁸。不仅如此，佐久间象山（1811—1864）、安积艮斋（1791—1860）、横井小楠、福泽谕吉（1834—1901）等人也批评中国从不愿意向别人学习的独善态度。并警告说，日本要以中国“自大之病”⁷⁹为殷鉴，切勿重蹈覆辙。这样一来，将清朝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尊大的中华意识这一见解，在幕末期日本知识分子之间形成共识，对中国的否定性印象从此固定下来。

1862年，幕府为了考察中国，将贸易船千岁丸派往上海。高杉晋作（1839—1867）也随船前往。他看到了英国、法国、美国租界的扩张，亲眼目睹了半殖民地上海的现状。他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感慨：“详观上海，支那人尽为外国人使役。英法之人步行街市，清人皆退避让道。上海之地虽实属支那，然云英法之属，可也。”⁸⁰ 清朝之凄惨状况，就在眼前。

5年后，日本实行“大政奉还”，成立了作为近代国家的明治政府。这个近代日本作为亚洲同胞，对于正被欧美列强蚕食的中国之苦恼和伤痛，不但不予以理解，还与欧美列强一道，加入了瓜分中国的行列。

代结语

下面我想谈二点代替结语。

其一，日本文化是在摄取大陆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这一事实很重要。小岛毅报告（第2部1章）指出：“从历史上看，正确地说，并不是‘大陆文化传到了日本’，而是‘由于大陆文化的传入，日本这个国家才得以诞生’”，这个提法是很重要的。获生徂徠认为日本的“神道”是太古时代由“圣人之道”传来的。这一说法，如果追溯到在遥远的古昔就已经移居于日本列岛的人们的历史来源的话，决不能说是荒唐无稽之语。设想“日本”、“日本人”具有纯粹无暇的DNA的日本文化论，只是一个幻想而已。本居宣长认为，将外来文化的衣裳一件一件地剥下来之后，就可以找到不受外来文化污染的纯粹“日本”，但这只是与剥掉洋葱的外皮来寻找洋葱的芯一样，不会有什么结果。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应该把吸收了各种各样外来文化的总和视为日本文化，然后再去考察其发生变化的特征。其实，即使是本居宣长的“大和心”，也可以认为是以“汉心”为否定媒介而产生出来的。

其二，如何克服至今仍然束缚着我们的华夷秩序式的思维方式（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中心——边缘的序列化”）。关于这个问题，江户后期的昌平校教授佐藤一斋（1772—1859）的一段话，颇有启发意义。试引用之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茫茫宇宙，惟此道一以贯之。人视之，有中国，亦有夷狄；天视之，无中国，亦无夷狄⁸¹。

⁷⁸ 前田勉《近世日本の儒学と兵学》培利堪出版社，1996年，433页。

⁷⁹ “唐人往来”，《福泽谕吉全集》卷1，岩波书店，1958年，14页。

⁸⁰ “上海淹留日录”，《东行先生遗文》下卷（原文为汉文），1916年，民友社，79页。

⁸¹ “言志录”，日本思想大系《大塩中斋·佐藤一斋》31页。

第二章 日中政治社会构造的比较

菊池 秀明

前言

本章将就日本与中国的政治、社会构造，从历史学的视角进行比较研究。在切入话题之前，关于为何我们要设定这样的主题以及对日中两个社会进行比较会有怎样的效果等问题，主要想从日本方面的情况开始说明。

一般来说，日本人拥有两种不同的中国形象。一种是对中国的古老文明的憧憬以及亲近感，例如表现在对《三国演义》的英雄人物的兴趣和对李白、杜甫的汉诗关心。另一种是对近代以后不幸的日中关系史的消极形象，不少人对日中战争时期的史实以及1949年以后的中国现代史或是知之不多或是根本就不关心。可以说这两种互不关联的对华观，至今尚在众多的日本人中存在着。1972年日中恢复邦交以后的一段时期，前者的形象和回答“对中国有亲近感”的人员增加，而2003年日中关系恶化时，后者的形象和而对现代中国抱有否定的观点增强，这是很好的例子。¹

形成上述两种相反的中国观的理由是什么？首先容易发现日本的正面、反面的中国形象分别以截止于唐代（日本的平安时代）的古代史，以及近现代史为基础形成的事实。换句话说也就是对从宋朝开始直至明、清（平安后期至江户时代）的中国形象淡薄。当然，从日本史的角度而言，其原因在于——在遣唐使被废止后，虽然日本强调了社会独自性，经历了数次战争也有过活泼的经济贸易，但在交流史上没有造成唐代以前那样的强烈影响。

正如在前一章第二节小岛康敬论文所分析的那样，江户时代知识分子之间对中国的认识作为认识日本的线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尽管在现代日本的世界史教育中，从宋朝至明清时代的中国史的内容相当多，但是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的印象仍然稀薄。虽然成吉思汗的传记受到人们欢迎，拍摄了电视剧《郑和西征》，但实际上这些还是不能与有关项羽、刘邦之争，唐玄宗、杨贵妃的命运等日本人熟悉的故事相比。

那么上述历史空白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宋代（平安后期）以后，日中两国虽然也保持了密切的关系，但发展成了特性相异的不同社会。日本的中国史学界将从唐代到宋代的中国的社会变动称为“唐宋变革期”，认为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等，对以后的中国社会直接起到了打基础的作用。同时日本的“国风文化”、室町时代的“东山文化”等以及现代日本文化的原型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成型的。但是与诸如这些重要的变化相关联的情报，至少没能给日本人的中国形象带来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妨碍了对日本和中国之间是异种文化的理解。

进一步说，缺乏将对方视为异种文化的观点，也给近代以后的日中关系带来了负面的影响。日清战争后，中国出现了留日热，在日本也出现了与之呼应的、以争取同中国提携为目

¹比如说根据内閣府官房政府广告室的调查，日中两国开始正式交流的1980年5月时回答“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人有78.6%，在反日游行后的2005年10月时的调查降低到了32.4%，反之回答“不感到亲近”的上升到了63.4%（家近亮子著 <日中關係の現状>，家近亮子等編『岐路に立つ日中關係——過去との対話・未来への模索』晃洋書房，2007年）。

标的“亚洲主义”。²但是上述的动向是受“因为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所以理应容易相互理解”这一简单的想法所支持。一旦这种设想破产，明白了日本和中国是个性不同的“他者”时，两者之间反而发生了深刻的对立和抵触情绪。

另一方面中国的情况又如何呢？自古以来，对于中国来说日本是“东夷”，虽然也有过被视作一个神秘的异国的时期，多数场合不过是一个位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周边的“东方小国”。将日本文化视为中国文化的分支的想法根深蒂固，清末留学日本的学生对于日本吸取的欧洲近代文明虽然抱有强烈的兴趣，但是对日本文化基本上不感兴趣。也就是说中国也缺乏将日本作为一种异文化的视角。

1972 年日中两国恢复国交后，再三强调“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许这可以作为跨越近代两国不幸的关系的第一步的重要认识。仅从本报告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内容来看，也痛感日中关系、特别是从古代日本的方面来看中国的存在如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将视角转移到 21 世纪的日中关系时，我们发现有必要深入理解，日本和中国是有着共通基础的同时，各自的社会如何发展个性。应该考虑到正因为是近邻，所以要互相尊重不同的文化，认识到这种差异是确立长久的友好关系所不可缺少的。

在现阶段的日本的历史学界，有关日中两国社会不同文化的比较研究，虽然也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部分，但很难说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同时，在中国近年来虽然以科研骨干、年轻的研究人员为中心，开始对上述课题进行了考察，但仍处于研究过程中。³本章将参考一部分先行研究，作为假设而提起问题。笔者原本以明清社会史为专业，对于中国古代史和日本史是外行，难免发生错误，希望大家给予批评和指正。

一、关于王权与政治制度的比较

(A) 关于王权的比较——皇帝制度与天皇制

在近年的日本的历史学界，围绕日本的王权即天皇制的历史特征的议论非常流行。众所周知，在中国，皇帝制度自秦始皇以来一直延续着。本节想就这两种王权以及他们的统治体制进行比较。

首先是关于中国的皇帝制度。在战国时代的中国，虽然有支配各地的王，但是没有支配天下的权力者。公元前 221 年统一了中国的秦王政，命令大臣们考虑出合乎中国全境的统治者的称号。结果大臣们提出了代表着比天地诸神更为尊贵的意味着天帝的“泰皇”称号的方案。但是嬴政执着于其君父昭王所用过的“帝”字，将之与泰皇的“皇”字结合，决定用“皇帝”的称号。其含义为“光辉照耀的帝王”。相对于镇坐于天庭中心的天帝而言，将自己放在了君临地上世界的权威的位置上。⁴

此后，虽然伴随始皇帝的去世，秦朝也灰飞烟灭。但是皇帝所用的自称“朕”、下达命令

²菊池秀明『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近代中国』中国の歴史 10、講談社、2005 年、第 123 頁、130 頁。

³比如说王敏指出：近来中国人已经开始对日本文化跟中国文化的差异进行了研究。（王敏著「日中相互認識のずれについて」『アジア遊学』七二号、2005 年、第 7 頁）。另，王勇说，2005 年浙江商工大学日本研究所对中国人进行舆论调查的结果，回答“日本具有独特文化”者达到 44.5%（王勇《对日本文化的观点—在模仿与独创之间》，第 45 頁）。

⁴司馬遷《史記》始皇帝本紀。鶴間和幸『始皇帝—史実と伝承のはざま』吉川弘文館、2001 年、第 82 頁。梅原郁『皇帝政治と中国』白帝社、2003 年。

时所用“诏”等用语被历代的中国王朝所继承。值得一提的是，皇帝的称号并非从一开始就固定下来。因为刘邦（高祖）所建立的前汉延续了两百多年，他为皇帝制度的确立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金子修一氏的研究，皇帝的即位仪式能否被臣下接受至为重要，即位仪式本身是很简单的事情。同时，作为王权正当化的象征，虽然都知道在日本有三种神器，但是，在中国的皇帝制度中，与之相当的玉玺并无大的意义。金子氏推断认为它与中国的官僚制度的发达有关。⁵

其次，关于日本的天皇制。关于日本的国王（大王）采用“天皇”称号的年代，主要有七世纪初的推古天皇时代说和七世纪后期的天武、持统天皇时代说。虽然有一段时间七世纪后期说占主流地位，但是近年堀敏一氏、吉田孝氏主张“还是在七世纪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中产生这个称号”。其根据是608年第三次遣隋使的使节小野妹子所带的国书中所云“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谨白”⁶的内容。

日本的读者都知道圣德太子为寻求对等的外交关系而向隋炀帝所送的国书“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否”⁷的内容。但是，这部国书是在607年，第二次遣隋使时所用，与出现“天皇”号的前一国书并非同一文书。虽然起初对日本的国书不满予以否定，但是隋炀帝因为重视高句丽的问题还是派遣了裴世清作为使者出使了日本。608年送裴世清回隋的遣隋使的“敬白。。谨白”的文体，比上一年的国书表现得郑重。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天皇”一词呢？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国的皇帝具有绝对的地位，周边各国的支配者作为比皇帝低一级的“王”被从属性地编入了“世界秩序”中。这被称为册封体制。日本的大王至少对外不许使用皇帝的别名“天子”。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为了保持对新罗等朝鲜半岛各国以及成立于八世纪的渤海国的外交优势，开始探索超越“王”的称号。虽然说“天皇”一词与其说是受到道教神仙思想的影响，不如说来自皇帝称号候补的三皇（天皇、地皇、泰皇）。但是从608年的国书中第一次出现了天皇称号之事上，可以看出日本不接受隋、唐的册封，而试图在东亚国际秩序中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⁸

那么，皇帝制度与天皇制的相异之处在哪里呢？可能会有各种议论，笔者认为首先重要的一点就是支撑着中国的皇帝制度的“天命思想”未被日本所接受。

天命思想是中国独特的政治思想，也就是上天任命有德之人统治天下的想法。如果皇帝失去了“德”，天会另赋有德之人以天命而将失德之人“放伐”。或者也有将帝位让给有德之人的事(称之为禅让)。不管怎么说因为皇帝被别姓者取代，所以称为“易姓革命”。实际上在中国，诸如618年隋（杨氏）灭亡后，唐（李氏）朝建立了，王朝的交替不断重复着。同时天命与身份或民族的不同无关，所有人都有可能。在十四世纪元末动乱中，乞丐僧出身的、在与对手的激烈竞争中取胜从而成为明朝的创立者的朱元璋就是其典型的事例。还有根据宇宙生成理论五行思想对王朝交替（特别是禅让）的合理性的说明，宋朝以前的诸王朝都将循环

⁵金子修一著「古代中国の王権」(网野善彦等編『岩波講座・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 一、人類社会の中の天皇と王権』, 岩波書店, 2002年、第165頁)。

⁶『日本書紀』堀敏一著「日本と隋・唐両王朝との間に交わされた国書」(『東アジアの中の古代日本』研文出版, 1998年。吉田孝著『歴史の中の天皇』岩波新書, 2006年、第6頁)。

⁷《隋書》第八一卷、東夷伝倭国条。吉田孝关于这个国书推测：如同从隋朝到日本的国书一样，小野妹子在途中将它们都加以了撕毁，結果也没有将它交给隋朝(『歴史の中の天皇』, 第6頁)。

⁸本位田菊士著「天皇号の成立と東アジア」(荒野泰典等編『アジアの中の日本史 II、外交と戦争』, 東京大学出版会, 1992年、第63頁。大津透著『古代の天皇制』岩波書店, 1999年。吉田孝著『歴史の中の天皇』, 第10頁)。

的木、火、土、金、水五大要素与自己的德性相结合。⁹

但是，日本在接受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拒绝接受这种天命思想。从七世纪后期开始，日本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体制，但是并没有采纳以王朝交替为前提的条文。比如唐律规定，前王朝的子孙犯罪时，可以通过特别审查而予以减刑，但是日本的律令则删除了这一条。¹⁰

同时，中国的皇帝与庶民一样具有姓氏，五世纪日本的“倭五王”也从中国南朝得到了“倭”的姓氏。但是，此后日本脱离了册封体制，天皇就没有了姓氏，对成为豪族及臣子的王子赐以姓氏，但自己到现在也没有姓。这就说明从大王的时代开始，天皇就被认为是超越一般人的社会规范、是从始祖继承了特异灵威的存在。主张“只要具有德性，谁都可以承担天命”的天命思想，与这种天皇观是不相容的。

关于天命思想的差异，给予了日中两国的王权何种影响呢？传说，984年宋朝的第二代皇帝太宗，听日本僧侣说“日本的国王为一姓世袭、其臣下亦皆世袭”之后，叹息地对丞相说道：

“他们虽然是岛国的夷人，国王却能永久世袭，其臣下亦能继承祖业而不绝。此正为古人理想之道。但是中国自唐末以来战乱不绝，王朝交替频繁，大臣、名家之中能保持延续者少。朕之德性虽然劣于古之圣君，但是日夜不敢怠惰，欲为后世之楷模。这既是为了子孙，也是为了让诸大臣的后代能世袭禄位。”¹¹

从上述的话语，不难看出中国的皇帝如何羡慕因为没有接受天命思想结果成为“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制。但饶有兴趣的是太宗所云：为了使自己的王朝实现“万世一系”，努力“日夜不敢怠惰，欲为后世之楷模”之处。本来天命思想既是皇帝实行统治的理论依据，也能成为谏议、批判皇帝过失的思想。因为任何人都不能证明天命授予了谁，所以皇帝权力的正当性仅仅是基于天下的众人对他的服从这一“事实”。换句话说皇帝经常需要臣下们对他的承认，承认他是具备完美道德并有能力制定法律制度的人。

最强烈感到在天命思想下的皇帝与社会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是异民族王朝的君主们。特别是以末代皇帝宣统帝溥仪闻名的满族王朝清朝，它是在明代围绕东北的国际交易的激烈竞争中取得胜利的军事集团，进入华北（称为“入关”）后，皇帝们又经过与满洲豪强的斗争后才确立了权力。

为此，康熙帝每年都前往内蒙古巡猎，以此证明他是游牧社会的首领（可汗）。同时在北京的紫禁城里皇帝又从大清早就起来学习儒家学问，得到了汉民族社会传统来看也无不可之处的皇帝的评价。而且他还对欧洲的学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熟稔从天文学、数学到地理、

⁹小島毅著「天道・革命・隱逸」（『岩波講座・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 四、宗教と権威』，岩波書店，2002年，第69頁）。根据本书所述，因为朱子学否定了根据五行思想的五德終始之说，就不能再经过禅让而进行和平的易姓革命了，传到日本的朱子学反而成为了彰显万世一系的国体的理论支撑。

¹⁰吉田孝著『歴史の中の天皇』，第56、229頁。当然天命思想以及易姓革命的思想也并非对日本完全没有发生过影响，道镜篡夺皇位的事件就是其中一例（同书第73頁）。壬申之乱时大海人皇子（天武天皇）将自己比喻为汉高祖之事，也是将天命思想利用于建立天皇权威的例子。而且桓武天皇为了推进唐朝的风习，在长岡京郊外也曾经举行过两次祀天的郊祀之礼。大隅清陽氏将此称为“直接引进的天命思想”（大隅清陽著「君臣秩序と儀礼」，大津透等『古代天皇制を考える』日本の歴史08，講談社，2001年，第31頁）。

¹¹《宋書》倭国传。王勇著『中国史のなかの日本像』農文協人間選書，2000年，第130頁。此时访宋的是东大寺僧人奄然，他献上的『年代記』等日本情报，对于中国人改变关于日本的认识发挥了作用。

音乐的领域广泛的学问。¹²当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像他一样努力学习，沉溺于奢侈而不顾政务的皇帝也不在少数。但是可以认为，对任何对手要保持优势的多民族国家的君主康熙帝所持有的紧张感，正是天命思想内部具有的竞争原理的产物。

另一方面，没有接受天命思想的日本的天皇制又是如何呢？首先，在不存在王朝交替可能性的皇位继承理论在日本，从天照大神（始祖神）处所继承的灵威，是维持天皇（大王）的权威性的依据。同时在天皇被视作“天神御子”天孙降临的神话的特色是，支撑朝廷的畿内贵族们的始祖也包括在天孙之中。但这些神话与中国相比民族、语言、文化的差异小，只有在后述缺乏社会流动性的日本社会才是有效理论。此后以畿内为中心的支配体制扩展到了全国，近代又获得了台湾、朝鲜殖民地，如何说明天皇的权威性就有了困难。

还有，日本虽然没有王朝的交替，但是天皇并非一直能正常行使其政治权力。日本读者不用说，在平安中期，藤原摄关家作为外戚掌握了实权，院政（上皇即退位天皇的政权）以及武士政权的产生使天皇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江户幕府在 1615 年制定了《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通过京都所司代，加强了对朝廷的统制以后，天皇除了火灾等意外的情况，不能离开京都御所外出。对于天皇的存在，除了京都及其周围的人们尚有所知以外，地方上的百姓几乎都不知道了。¹³

不能亲自使用权力，而将征夷大将军的称号授予各时代的实际掌权者，天皇被利用为权威的源泉。石井良助氏接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津田左右吉与和辻哲郎的先学者的学说，指出了天皇“不亲政”的历史特性。¹⁴对此，吉田孝氏提出了疑问：江户时代的天皇确实可以称为“不亲政”，但是，是否直接能说天皇制从古代到现代为止一直具有相同的性质？

为此不妨重新审视日本的王权。239 年遣使于魏的女王卑弥呼的邪马台国，是男王与其姐妹及女儿一起组成的“复式王权”。平时由男性的国王主持国政，卑弥呼执行祭祀。但因为战乱不能再立男王时，卑弥呼及其宗女（父系一族的女性）壹与成为了国王。此后的大和政权也同样具有大王和畿内豪族联合政权的特性，大王和豪族们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这与中国的皇帝与贵族、官僚势力的紧张关系有着明显的差别。

顺便说一下，古代日本经常所见的女帝也与这种王权的形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例如，推古天皇虽然是女帝，但是具体的国政是由其外甥圣德太子担当的，从中可以确证卑弥呼时代的复式王权。同时，其他的女帝也通常是或先前天皇的配偶、或是未婚的皇女即位，这是通例。也有为某特定候补者（如此后的圣武天皇）继位作为衔接者而立的女帝（元正天皇）。这与中国的则天武后经过激烈的斗争而夺取权力的过程有着本质性的不同，大和政权明显表现出是天皇与豪族的联合政权的性质。

再随着 1192 年镰仓幕府的成立，日本真正进入了武家政权的时代。但是这个武家王权，完全没有否定已往的天皇（或是院政）的王权，采取了重叠并存，却相互主张着自己占据上风。¹⁵当然，中国也并非没有发生过诸如南北朝时代以及五代十国等诸多王权并立的情况。

¹²岸本美緒著「皇帝と官僚・紳士——明から清へ」（网野善彦等編『岩波講座・天皇と王権を考える 二、統治と権力』，岩波書店，2002 年，第 241 頁）。岸本美緒・宮嶋博史著『世界の歴史 一二、明清と李朝の時代』，中央公論社，1998 年，第 302 頁。ブーヴェ、後藤末雄訳『康熙帝伝』，平凡社東洋文庫，1970 年。

¹³吉田孝著『歴史の中の天皇』，第 165、192 頁。

¹⁴石井良助著『天皇——天皇の生成および不親政の伝統』，山川出版社，1982 年。

¹⁵吉田孝著『歴史の中の天皇』，第 19、57、67、124 頁。

但是在中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中这些是缺失“大一统”的、非正常的时代，都希望出现英明的皇帝，使帝国再实现统一。至少没有出现过日本那样的，直至江户末期的数百年间，由多数王权存在而形成的“双重政权”长期化的状态。

如此考虑可以总结为，日本和中国围绕王权的差异在于——中国是以“一君万民”体制的集权为王权的目标，而日本则是实行复合型的王权、从而自然地接受了双重政权的形式。当然这并非是这两种王权哪种更有高度或是更具优势的问题。中国的皇帝为了取得社会的承认、得到君临天下的权威而进行了种种努力，但是因为有天命思想的竞争原理的原因，发生了激烈的权力斗争，在每一次王朝交替时都将国土和民众卷入了毁灭性的战乱。而另一方面的日本，因为它的王权具有多重性，权力所在常不明了的缘故，政权交替伴随的社会成本被成功地压缩到了最小的限度。

进一步而言，围绕王权的日中之间的特性的差异，对于两国之间的文化也给予了重大的影响。在多民族社会的中国，为了强调王权的正当性，将自己的主张向别人进行明确表述的文化发达。与此对比，在日本没有必要急迫地说明王权的正当性，个人的意志能在与他人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共同感受和理解。崔世广氏将中国的文化称之为“意”的文化，日本的文化称之为“情”的文化，¹⁶但是这种差异不仅源自于日本对儒教的理解方面，也能看到日中两国的王权的存在方式的影响。

(B) 关于古代的政治、统治制度及其影响的比较

在此就日本和中国的政治、统治制度进行比较。关于日本的古代史，众所周知，日本接受了唐朝的司法、行政制度即律令，在 701 年制定了自己的大宝律令，建成了国家统治体制。因此，日本将此时期的政治制度特意称之为“律令体制”。

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称呼。正如 1975 年在湖北省云梦县发现的秦代律文，中国的律令有着悠久的历史，特别是作为刑法的律直至清代末期为止一直发挥着作用。而按照日本史的一般说法，律令制在十世纪结束，但是作为行政法的令，在以京都为中心的朝廷里依然保留，在形式上一直存在到江户时代。与此对照，在中国因为各王朝的政治组织大为不同，尽管唐令也由宋代的天圣令等继承下来，但至少对明清时代已没有影响。¹⁷虽然是相同的律令，在日中之间长期发挥作用的部分不同，这一事实令人深感兴趣。

还需强调的一点是，在这一时期，日本编撰律令在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意义。在日本历史上，接受唐朝的制度、文化，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制定大宝律令可视为达到了一个目标点。为此，石母田正氏等推测 702 年，日本时隔 32 年派遣遣唐使，使者的使命是通知唐朝，日本制定了大宝律令之事。¹⁸

¹⁶崔世广著「「意」の文化と「情」の文化」（王敏編著『〈意〉の文化と〈情〉の文化・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研究』，中公叢書、2004 年，第 196 頁）。

¹⁷氣賀澤保規著『絢爛たる世界帝国』中国の歴史 06，講談社，2005 年，第 138 頁。唐代史研究会編『律令制——中国朝鮮の法と国家』，汲古書院，1986 年。池田温編『中国礼法と日本律令制』，東方書店，1992 年。还有，关于唐令，仁井田陞和池田温根据日本的『令義解』着手加以复元，其研究成果有中村裕一著『唐令逸文の研究』，汲古書院、2005 年。再有，1999 年在宁波天一阁发现了包含唐开元令条文的宋天圣令，引起两国学界的关注（大津透〈北宋天聖令の公刊とその意義——日唐律令比較研究の新段階〉，《東方学》114 号，2007 年）。

¹⁸石母田正著「天皇と『諸蕃』」（『石母田正著作集 四、日本古代国家論』，岩波書店，1989 年，第 29 頁）。此说得到鈴木靖民和青木和夫的支持，看法略有不同（鈴木靖民「日本律令の成立・展開と対外関係」『古代対外関係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館，1985 年，第 22 頁。青木和夫『日本の歴史 3・奈良の都』，中央公論社，1965 年，第 6 頁）。

对于种议论，坂上康俊氏则反论道：日本并未积极地向中国介绍大宝律令。原本律令是君临天下的中国皇帝必须制定的帝国大法。接受册封的各国被要求使用唐朝指定的国号和唐朝的年号。比如新罗没有编撰和执行过系统的律令法典。而日本因为没有接受册封，诸如年号等小问题，以“绝域（未被王化的的遥远的外国）”的理由而被默认了。但是如果制定了律令，则能主张天皇与皇帝是对等的关系，不仅中国方面不会容忍，认为派遣使节是进行“朝贡”的日本方面也不会这样做。¹⁹

这个论争表明，唐代律令制度的比较，可能成为与在接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同时力争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立性的日本的关系上的课题。同时也有人认为，在唐朝周围的各国诸如突厥、维吾尔等游牧、畜牧为主的社会，并没有接受律令制度。而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农耕社会中，因为社会性质一致，律令制度就具有普遍性。²⁰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因为篇幅的关系无法进行详细解说，下面就以日本的班田收授法与中国的均田制为例，对当时两国民众的生活状况进行比较。

班田收授法与均田制都是建立在土地公有的理想基础上的制度。国家将耕地均等地分配给农民、保障他们进行再生产活动。作为回报，让农民则负担各种税役。班田收授中，分给良民的成年男子的口分田为两段（约 23 公亩），女子则能分到其三分之二。与此相比隋唐的均田制，成年男子可得到 100 亩（约 580 公亩），即便女子不给田，它的面积与日本相比还是要大很多。而且正如 100 亩之中的口分田为 80 亩，农民家里可以代代相传的永业田为 20 亩那样，均田制的土地并非全部都是要求给予和返还的。

其次再看税制，其基本为租、庸（劳役）、调。这一点日本和中国并无差别。日本的租为征收每段两束两把（约四合）的稻。唐代的均田制为粟（带壳谷物）二石。中国的国土广大，种植的谷物也因为地域的不同而相异。而当时的日本也并非只是种稻吃米。将口分田的收获缴租后的剩余，一天只有 400 克左右，作为主食肯定不够。可以想象人们的食物除了大米以外，杂谷当然占了大的比重。

再次，调是缴纳实物的税负担，唐朝决定的税为绢两丈和棉三两（或布二·五丈和麻三斤）。日本则以地方行政单位——郡为单位，缴纳纤维制品或是当地的特产。当时的日本没有普及根据令的规格制作纺织品的工具和技术，因此需要在当地的行政官郡司的主导下进行统一生产。还有对于庸，唐朝的规定为劳役 20 天或是和此等值的绢、布。日本则为征收与劳役 10 天等值的布两丈六尺（7.7 米）。

征收这些税的基础资料为户籍。户籍的制定虽然在唐朝为三年一次，日本是六年一次，但实际上日本的郡每年都制定作为课税账簿的计帐（严密地说是“历名”）。这是记有每户的构成人员的名册，其中不仅记录名字、年龄，连黑痣等身体特征也记载在案。而唐朝的户籍多因战乱而散失，但是在丝绸之路的据点敦煌、吐鲁番等边境地区仍然还保存有这类文书。这些文书不仅详细地记录了家庭成员的结构，对其所拥有的土地面积相应的资产额度分为九等（户等）加以记载。同时家庭成员的构成从 3 名到 5 名，一对夫妇加两个孩子和一个老人

¹⁹坂上康俊著「大宝律令制定前後における日中間の情報伝播」（池田温・劉俊文編『日中文化交流史叢書二、法律制度』，大修館書店，1997年，第49頁）。濱田耕策关于新罗的律令只是指出“参考唐朝的律令而对国政的基本法典加以了改编”，没有说过制定了独自的律令等（同『新羅国史の研究——東アジア史の視点から』，吉川弘文館，2002年，第337頁）。

²⁰石上英一著「比較律令制論——序論」（荒野泰典等編『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 一、アジアと日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81頁）。

的事例众多。由此可见，在当时也很难实行儒教所推崇的大家族主义。²¹

以上，对唐朝和日本的土地及税收制度进行了简单的比较，不难看出两者的内容有着明显的区别，唐朝的均田制允许个人拥有永业田并允许对其进行买卖，但是日本没有接受永业田的制度。而相对唐朝的口分田是表示可受田面积的最大限度（限田说），日本则是实际上授予的面积，二者有很大区别。如果农民占有超过授予面积的土地或进行新的开垦时，上述制度则无法进行对应。为此，有人认为日本的班田收授制并不是采纳了均田制，而是要原封不动地实现中国古代的井田制理想。对于班田收授制的特性，渡边晃宏氏指出：当时无视中国制度的深奥，只是强求律仪的制度化，结果制定出不能变通的体制。²²这个问题表现为 743 年的承认开垦地永久私有化的“垦田永年私财法”和庄园、公领制的发展。

同时，对这些税进行征收的过程明确表现出了日中两国政治体制的特点。例如日本的租起源于将最初的收获供奉于神的“初税”仪式，进而演变为对地方首领的贡纳。为此，被征收来的稻子不能运往中央成为其财源，律令政府只能在地方建造仓库，派遣国司掌管钥匙。同样，账目的制作也是如此，中央无法命令除了畿内以外的各国提交个人名册。

如上所述，日本的大和政权是天皇与畿内的豪族联合组成的政权，在畿内以外的各国，成为了郡司的旧酋长们依然保留着很大的影响力。律令政府对畿内以外的诸国并不能进行完全的统治，表现为在稻米处理问题上中央和地方的较量。而对于均田制，有研究者认为它并没有在唐朝统治的主要区域实施过，制定了法规但未施行，只是一纸空文而已。以敦煌和吐鲁番的事例来看，超出规定范围的内容诸多，可以确定均田制并未在全国统一实施，可以说这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多样性。

附带而言，日本的调、庸是中央的财源，运送它们的劳役被称为运脚。在中国和日本都有被称为杂徭的地方政府劳役，原本是作为救济贫民和解决饥荒的对策而设置的公出举（出借稻米、日本），义仓（唐朝）也成为了实际上的税金。而兵役也是当时的民众所服劳役的一种。

唐朝的军事制度被称为府兵制，士兵要自己负担武器和粮食，因而民众的负担非常沉重。但实际上他们也有晋升为将领的可能，而且他们的家人也有可以为此而免除租庸调的好处。防卫北方边境的士兵被称为防人，日本也是如此。663 年日本在白村江战争失败后，为了防止唐军的进攻，而设置了警备九州北部的防人。他们中的大多数被从远离九州的东国征用，最终没有能与家人再次见面而丧身异乡。对外战争会让民众付出极大的牺牲，这一点任何时代都不会改变。²³

而这样的古代的政治、统治制度对其后的日中两国的社会给予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日本直至 1960 年进入高速发展时代为止，还存在着以为实施班田制而制定的土地区划——条里制而形成的田园区划。但是，中国的均田制具体执行到哪种程度，其结果不明，加上此后反

²¹渡边晃宏著『平城京と木簡の世紀』，日本の歴史 04，講談社，2001 年，第 50 頁。氣賀澤保規著『絢爛たる世界帝国』，第 153 頁。堀敏一著『均田制の研究——中国古代国家の土地政策と土地所有制』，岩波書店，1975 年。同『律令制と東アジア世界——私の中国史学（二）』，研文出版，1994 年。

²²渡边晃宏著『平城京と木簡の世紀』，第 69 頁。吉田孝『飛鳥・奈良時代』，岩波ジュニア新書，1999 年、77 頁。

²³関晃『大化改新の研究』上・下（『関晃著作集』一・二，吉川弘文館，1996 年）。渡边晃宏『平城京と木簡の世紀』，第 70、76 頁。氣賀澤保規『絢爛たる世界帝国』，第 157 頁。池田温『敦煌文書の世界』，名著刊行会，2003 年。谷川道雄「府兵制国家と府兵制」（『律令制——中国朝鮮の法と国家』，第 423 頁）。

复出现的战乱，很难从中找出痕迹。现在中国的农村调查，不如说能确认到明朝里甲制度的影响。

而在日本，律令政府制定的政治、统治制度对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是“瑞穗之国”，即以水稻耕作为基础的、均衡的农业社会，在那里生活的日本人产生了一种单一农民的民族意识。在日本史研究上，网野善彦氏将这种认知日本的方法称之为是一种建立在“想当然”基础上的幻影，而加以批判。

网野氏作出如下的论述：综合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来考虑，日本社会自古自东及西（或是南北），是一个人种、语言、文化都具有多样性的社会，在中世时代活跃着从事稻作以外行业的各种职业者和女性。但是日本的历史学家们，在对形成国号“日本”的七世纪实施的律令制度的研究过程中，将日本描绘成一个天皇对全国实施统治的，对所有的人给予口分田，由耕作水稻的班田农民（特别是男性）组成的均等的“岛国”社会形象。他们认为以旱田耕种为主的东部日本，比以稻田耕作为主的西部日本处于落后发展阶段，将非农民从研究对象中排除出去，将与上述形象不符的史实放在从属的地位，或是作为一种例外而加以抛弃。²⁴

网野氏提起这一问题，是对迄今为止已经作为共识的日本史的大胆的挑战。从中国的读者来看，或许会为国土面积狭小的日本实际上有多样的习惯、并非是一单一社会这一事实而感到新鲜。而在日本的古代史的研究者也有人提出了不同主张：不能认为律令国家成立后日本全体就成了一个划一性的社会，应该进一步解明日本是如何成为一个既有多样性又在总体上具备共同特色的社会的。²⁵

那么从日中比较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如何看待网野氏的这个论点呢？首先回到日本的古代史，东西日本的差异可与天皇和畿内豪族的畿内政权对全国进行统治之重叠形态。比照中国历史，可以联想起作为古代各朝首都而繁荣的华北地区（或称之为中原）和伴随汉民族的南迁而新开发的地区的华南的差异。

十一、十二世纪的西日本生活着被称为神人、供御人的人们。他们被授予前往各国自由通行的特权，他们虽然是直属天皇和神佛（寺院）的职业民，但是在他们的背后存在着某一特定官职的亲族集团（或是世家）的世袭继承制度“职业体系（官职承包制）”。这种职业集团延续了古代姓氏制度的谱系，在律令时代政治制度的变迁中出现，但无论如何，这是做为畿内政权基础的西部日本的制度特征。

与此相对，东日本的“职业体系”极不发达。这一地区的主流是被称为惣領的一族之长成为将军的御家人的主从制。其背后则是支撑东国武士团体的同族结合。在中国这样的同族结合，在新开发的华南比古代中国文明中心的华北更多见。因为在得不到王朝政府的庇护和服务的状况下，为压制先住居民的抵抗、推进殖民和开垦事业，需要人们高度团结。其结果，从江苏、浙江到福建、广东等的广阔的地域中出自父系集团的宗族组织得到了发展。

同时，新开发地区并不意味着经济的落后。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开始进行开发的江浙三角洲地区到了宋代已经成为了被称之为“江浙熟则天下足”的粮仓地带，并且随着时代的推移又

²⁴网野善彦著『東と西の語る日本の歴史』，1982年（講談社学術文庫再版，1998年）。同『「日本」とは何か』，日本の歴史00，講談社，2000年。

²⁵天津透著「「日本」の成立と天皇の役割」（『古代天皇制を考える』，日本の歴史08，第8頁）。吉田孝『日本の誕生』，岩波新書，1997年。

作为商品作物的生产地发展起来。而日本，东部的庄园、公领比西部日本的规模大，从律令时代的行政单位演化而来的郡、条、院多被照搬成为了庄的单位。同时对比西日本被称为“本百姓”、“长百姓”的有势力百姓的横向联合强盛，东日本则采取了由成为郡司、郡地头的有力豪族承包区域的经营，将自己的族人及随从配备于郡内各地，采取了通过同族和主从关系对全郡进行管理的体制。这种东国社会的特征可以看作为伴随开发新地区形成的结果。在中国，江浙和台湾的开发也是由拥有巨大资本而垄断耕地的商人推进的。

也就是说，东西日本的这种差异——东日本的以主从关系和同族结合为基础的“竖式”“家庭”社会，西日本以诸如年龄阶梯制的村民联合为基轴的“横向”、“村庄”社会，至今依然存在。在网野氏的论说中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即被差别部落的问题。在生活着各类职业民的西日本生存着以为人去除污秽物为工作的、被称为“非人”“河原者”的人们，十七世纪以后他们被认定为被差别民，而在东日本则少有这类人。²⁶

在中国有过长期的奴仆制度，在广东还有船民“蛋家”等被差别民。但是，在社会变动幅度大的中国，在制度上将某一集团设定为贱民、让他们受到世袭性的差别对待的事例并不多。其人口比例不满百分之一。²⁷就是在中国应占多数的汉族，也不见得一直对周围的各民族处于优势的地位。根据贾敬颜氏的研究，在唐代和五代十国的时候，“汉人”是作为一种骂人的话来用的。现在的“痴汉”、“恶汉”、“大食汉”等，用“汉”来表现的语言，包含贬义的时候多，就是因为受到了当时的影响。²⁸

二、关于身份制度和社会流动性的比较

(A) 关于武人政权与科举制度、知识分子的处世方法的比较

唐朝灭亡后，经过五代十国而成立宋朝的十世纪，对于东亚各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变动时期。日本的古代律令国家迎来转机，朝鲜半岛则是新罗灭亡而高丽代之。另外在东北亚渤海灭亡，东南亚则是越南（吴朝和丁朝）从中国的统治下独立了出来。再说一下，在蒙古灭亡的十四世纪，明（中国）、室町幕府（日本）、李朝（朝鲜半岛）成立，在十七世纪又变成了清（中国）、江户幕府（日本）。这些事实说明当时在东亚世界，各国相互影响密切，并且在一个共同的循环中互动着。

十世纪东亚社会变动的一个特征，是武人政权的出现。在中国，其原型就是为护卫边疆而设置的节度使。在安史之乱（755-763年）后内地也设置了该职位，同时兼任观察使掌管军事和民政。这被称为藩镇，他们在黄巢之乱（875-884年）以后成为军阀而相互争战。其中的宣武节度使朱全忠在907年灭唐而建立了后梁。其后各地自立的国王们虽然其出身各异，但都是以亲军、禁军等军事力量为其背景实施统治。960年建立宋朝的赵匡胤（太祖）

²⁶网野善彦著『東と西の語る日本の歴史』，第148—186頁。同『日本の歴史をよみなおす』，筑摩書房，1991年，第80頁。大津透在「近江と古代国家——近江の開発をめぐる」(『律令国家支配構造の研究』，岩波書店，1993年，第94頁)一文中指出：在畿内政权统治力强大的近江，是在畿外新开发的殖民地。

²⁷ Ho-Pingti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何炳棣、寺田隆信訳『科举と近世中国社会——中立出世の階梯』，平凡社，1993年，第34頁)

²⁸贾敬颜著《〈漢人〉考》，(費孝通編《中華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69頁)。还参照西泽治彦等译《中華民族多元一体構造》，風響社，2008年，第257頁。

也是这样的一个武人皇帝。

次为日本，迄今为止，武士被视为是地方豪族以及有实力的农民，为了保护开发的土地而进行武装后的当地地主。但是根据近年来的研究，他们的起源已经被认为是，或是因为镇压天庆之乱（939-941年）有功，被视为具有特殊“武”的能力之人而被任命为都城的警卫的皇亲的后裔（源氏和平氏），或是追捕犯人及镇压反叛的国衙军制出身的世袭战士。²⁹毫无疑问，在武士们增强其政治实力方面，院政、平氏政权以及镰仓幕府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幕府成立的初期，武士政权跟京都的公家政权相比还是处于劣势，两者取得对等地位的时期，则是在1221年的承久之乱以后。

如果离开日中比较社会史，武人政权之事例，也可举出十二世纪在高丽成立的武臣政权。这是出于对文班（朝鲜的特权身份、两班之一）官僚独享权力的一种反抗而产生的政权。他们时常发动政变驱赶文臣，经过武臣之间的斗争后，崔忠献就任相当于武臣首领的“教定别监”。还有，对蒙古进攻高丽进行了顽强抵抗的三别抄就是这个武臣政权的直属军队。

上述三种武人政权有什么不同之处呢？高桥昌明氏指出：高丽武臣所拥有的私人武装——都房，可以与日本的平氏及源赖朝的御家人组织进行比较。但是，武臣与都房之间无法确认是否进行过源赖朝和御家人之间的那种相当于“御恩”的给予土地的事实（本领安堵和新恩给与）。而且相对镰仓幕府吸取平氏政权失败的教训，制定了不再介入除军事警察以外的朝廷政务原则，武臣政权包揽了军事以外的所有的政务。其结果，在教定别监之下有众多的文官效力，反而使受到旧门阀——文臣排挤的武臣及地方乡吏出身的有能力的知识分子有了一展身手的场所。

而关于中国的节度使和藩镇政权，他们在亲军和禁军的将士之间，通过建立干儿子、义子等虚拟的父子关系加强了团结。但是，以这种私人关系为基础的君主的权力是不稳定的，在进行世代交替的时候，新旧家臣团之间发生内讧，从而招致王朝从内部发生崩溃。镰仓幕府的御家人虽然也是忠诚于源赖朝的私人兵团，但是他们通过参加大内的警卫活动即京都大番役等的“奉公”，也具备了作为公家军事组织的性质。他们还设立了侍所等自己的政治组织。为此在源氏将军的断代后，以“镰仓殿”为中心的主从体制并未动摇。

还有，在节度使和藩镇之下有着被称为幕职官的文官，武人皇帝诸王朝也原封不动地继承了原有的官僚机构。905年朱全忠杀死幸存的唐朝贵族并将他们投入了黄河（白马之祸），但门阀贵族被淘汰的结果是，武人政权的国家运营只能越来越依靠新兴的儒教知识分子（文人）。而武人皇帝中也出现了积极地与文人交往、学习儒教的规范、从而被评价为有德性的君主。而且他们既没有形成武人的共同意识，也没有形成足以得到社会评价的固有规范。相比之下，日本的武士则拥有“兵之道”那样的独自的价值规范，并通过诸如追犬骑射等大规模的武功锻炼，宣扬其存在感。³⁰

宋太祖为了加强皇帝的权力，夺回了节度使的军权并制定了文官官僚体制。文官官僚的来源是官吏录用考试的科举制度，但是日本没有接受科举制度，这对日中两国成为不同性质

²⁹川尻秋生著「武門の形成」（加藤友康編『摂関政治と王朝文化』，日本の時代史六，吉川弘文館，2002年，第134頁）。下向井龍彦著「国衙と武士」（『岩波講座日本通史』六，岩波書店，1995年，第175頁）。高橋昌明著『武士の成立——武士像の創出』，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

³⁰高橋昌明著「東アジアの武人政権」（歴史学研究会・日本史研究会編『日本史講座 三、中世の形成』，東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第131頁）。服部英雄著『武士と荘園支配』，世界史脚本二四，山川出版社，2004年。

的社会起到了大的作用。

在此对科举制度作一简单介绍。科举始于隋代，唐代的则天武后统治的时代，包括通过作词等修养考试的进士科的合格者，多被作为官僚起用。但是，唐朝的贵族势力依然强大，科举真正发挥其作用还是从宋代开始的。太祖将迄今为止的解试（地方考试）、省试（中央礼部的考试）加上皇帝亲自举行的殿试，建立了最终合格者由皇帝决定的体制。此后，科举的形式虽有所改变，除了元代有一段时间中止以外，一直延续至清末的1905年为止。³¹

其次，想探讨一下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以及日本与之的差异。科举在原则上是对所有人都敞开大门的，只要考试合格就可以“升官发财”即成为官僚而取得财富。当然，在当时教育机构尚未发达的情况下，长期的考试和学习需要巨额费用，不是有实力者的子弟很难有合格的希望，而且至十八世纪为止奴仆等贱民阶层的人们没有资格参加考试，因为考试时需要身份担保人，也会有与当地有实力的人物没有关联的移民（比如说广东西部的客家人）不能参加考试的情况。

但是，除恩荫制度外，取消了权力世袭。根据考试的结果采用官僚的以实力为本的制度，大大推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这与进入武家政权时代，确立了根据“家庭”进行职业承包，经过下剋上时代后再次强化了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的日本社会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也适合多次经历王朝交替的中国和未接受天命思想的日本的关于王权差异，两国在身份及社会流动性上出现了大的距离。

同时，科举制度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在政治上拥有平等机会的共同幻想，因此产生了激烈的竞争。人们集结在开拓新地的主体宗族组织周围，设立了教育设施(私塾)，还建立了对有才能的人员进行资金援助的(义庄)制度。因为在贵族失去了世袭特权的情况下，对于拥有实力的人们来说，为了维持政治、社会发言权，不断产生科举合格的人士是不可缺少的。³²

当然，宋代的科举考试对于几十万的考生来说，能够合格的只有几百人，是狭窄之门，而且随着时代的推移，竞争变得更加激烈。合格者的平均年龄在宋代都已是36岁。明清时代即使最著名的宗族也会有连续八代未能产生出科举合格人士的事例。³³同时科举制度对于失败者缺乏救助的措施，激烈的竞争不只是消耗了人们的精力，也对社会造成了巨大压力。对科举放弃了幻想的学生们或是在当地行使一定的影响力，或是充当其他官僚的幕僚以求出路。其中也有像发动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4年），试图推翻王朝的洪秀全那样的领导人人物。

关于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最后必须提及的是，以儒教的规范为基础而实现了帝国的统一及价值观的一元化。在中国的边疆诸省生活着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各异的少数民族，王朝政府鼓励他们参加科举考试，特别是清朝还设立了被称为苗学额等的少数民族专用

³¹平田茂樹著『科举と官僚制』，世界史劇本九，山川出版社，1997年。宮崎市定著『科举——中国の試験地獄』，中公新書，1963年。村上哲見著『科举の話』，講談社現代新書，1980年。

³²井上徹著『中国の宗族と国家の礼制——宗法主義の視点からの分析』，研文出版，2000年，第63頁。Freedman, Maurice “Chinese Lineage and Society: Fukien and Kwangtung”.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Monographs on Social Anthropology, no33. London: Athlone Press (M・フリードマン著、田村克己・瀬川昌久等訳『中国の宗族と社会』，弘文堂，1987年)。关于不允许客家参加科举，片山剛「清代中期の広府人社会と客家人の移住——童試受験問題をめぐって」(山本英史編『伝統中国の地域像』，慶応義塾大学地域研究センター叢書，2000年，第167頁)。

³³何炳棣、寺田隆信訳『科举と近世中国社会——立身出世の階梯』，第170頁。

的科举名额，试图通过科举考试让少数民族接受汉族文化。³⁴

众所周知，日本的阿倍仲麻吕，在唐代时取得了科举考试的合格并成为了高级官僚之事。科举制度具有对于只要接受和学习儒教规范而不论考生的出身民族及人种的包容性。历代王朝将科举制度作为吸引周边民族的手段，为形成巨大的版图和实现其稳定的统治发挥了的作用。

但一方面科举还将国家公认的观念形态儒教(明代以后为朱子学)渗透到了人们的内心，发挥了以一元价值观统治社会的作用。特别是通过科举制度将学者和官僚、儒学与权力密切结合起来后，使科举精英知识分子具有了承担国家责任的强烈的义务感，还使中国文化形成了与政治不能分离的特性。

另一方面日本的情况如何呢？在未接受科举制度的日本，人们既没有参与政治并在其中进行竞争的机会，儒教也没有渗透到社会。江户幕府统一天下以后，为了稳定秩序，采用朱子学说、设立了昌平坂学问所试图振兴儒学。但是，除十八世纪初期施行正德之治的新井白石等少数例外，日本的儒学者没有得到参与政治的机会。江户时代的儒学者，他们的出身也是多种多样的，而他们的学问也只是作为“游艺”即一种教养而被接受的。

在政治上不受重视的日本的儒学者，因为他们的学问没有必要去追求特定的“正统”性，故而呈现出多样性。既有专心于阳明学、考证学的人，也有试图寻找与当时的日本的一般道德意识进行接轨的人。并且儒学的多样化还引导出国学、兰学等儒学以外的思想潮流，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水户彰考馆的儒学者们提出以天皇为政治统一中心的“尊皇攘夷”思想，主张按需要学习欧洲的技术的“和魂洋才”的背景，就与上述学问的多元化有深刻的关系。³⁵这是在近代化改革进程中，与对儒学“正统”思想坚信不移的中国洋务派官僚的大不同。

但是，在本节的前半部分提及的有关“武”的问题，其后又是发生怎样的变化的呢？在中国自宋代以后施行的是以科举官僚为中心的文治统治，军人们被置于文官的领导之下。明代的武官是世袭制，而清代虽然实施了武艺及考问最低限度知识的武科举制度，他们的地位并不高。正如“好铁不当钉、好人不当兵”那样，军人是被社会疏远的群体。³⁶这是科举制度所产生的一元化价值观带来的弊端之一。

与此相比，在日本武家政权至 1867 年江户幕府灭亡为止持续了 650 年以上。在社会上“武”的优势地位明显。但是大多数的日本人都认为自从丰臣秀吉实行收刀、兵农分离后，在庶民的层面跟“武”、特别是与拥有和使用刀、枪之类武器变得无缘。也就有了所谓“手无寸铁的民众”的形象。日本人的这种自我认识，与近世、近代初期中国人的日本观因为受到倭寇以及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等的影响，而认为日本等于一个崇尚武力的危险国家的形象有着很大的差距。

那实际上又是如何呢？根据藤木久志氏的研究，十六世纪的日本人不分武士和庶民都身带大小刀具（长刀和腰间插刀），男子带刀是为了证明已经成人，村民为了驱赶鸟兽以及维

³⁴菊池秀明著「明清期、広西チワン族土官の漢化と科举」(『広西移民社会と太平天国』，風響社，1998年，第125頁)。

³⁵渡辺浩著「儒者・読書人・両班——儒学的「知識人」の存在形態」(『東アジアの王権と思想』，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第115頁)。

³⁶宮崎市定著『科举——中国の試験地獄』，第168頁。Lloyd E. Eastman, *Family, Fields, and Ancestors: Constancy and Change in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1550-194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ロイド・イーストマン著、上田信・深尾葉子訳『中国の社会』，平凡社，1994年，第268頁)。

持治安而使用武力称为“自检断”，是广为认可的。丰臣秀吉的收刀令原则上仅限武士有带刀权利，但不禁止村有武器，百姓以及町人仍被允许腰间插刀，同时火枪的数量随着时代的推移反而有增加的倾向。

但是，当时的日本人自己对这些武器的使用加以了限制。起因是丰臣秀吉颁布的禁止打架令（1587年前后），经历了战国时代残酷的内战和武力较量的人们，不再依靠武器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而且，德川幕府以及诸藩政权也对这一新习惯表示尊重，在百姓起义时，只要起义方不使用武力也不开枪。总之，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是武士时代，但也是对武器的使用采取了自律态度的社会。³⁷

从日中两国社会比较的角度来看，上述事实再次说明，日本是一个社会变动幅度小，容易取得一致的社会。自近代以前日本即是虽没有明文化规定，但是依然存在各种社会规范，要求对此加以遵守的社会。这些不成文的规定具有“对内”的性质，也就只是针对日本人的，“对外”不一定适用于外国人。中国人难以跟日本社会打交道，可以说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看不见的规则”。

（B）关于迁移和社会结合、大众宗教的比较

至此，本章针对日中两国社会的特性，围绕身份和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的不同之处，进行了比较。本节将围绕空间流动性、也就是迁移问题的差异展开话题。

如前所述，中国社会正因为有了汉民族对周边地区的迁移才得以扩展疆域，特别是对于华南诸省的迁移和开发而言，每一次的背景都是因为华北地区发生了王朝交替或由于北方民族的入侵造成了混乱。比如江浙地区的开发始于魏晋南北朝的时代，五代十国时候的诸王朝在扬子江下游流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伴随着时代的推移，汉民族又将其迁移的方向转向福建，在明代又对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了开发。迁移的浪潮波及到了内陆的各省，明清时代从江西发展到了两湖（湖北、湖南、）四川及云贵（云南和贵州）等地。

促成这样迁移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口的增加。原本中国的人口长期保持在 6500 万左右，16 世纪才好不容易超过了一亿。但是在气候温暖以及政治稳定的十八世纪，人口从 1 亿 5 千万倍增到了 3 亿，吸收这些人口的地方主要是原先未被开发的山区和边境的少数民族地区。同时，在已经开发到了极点的、苦于人口过剩的广东和福建地区，人们试图利用在开拓新地时养成的智慧移民海外。以东南亚为首，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侨的大多数都是出生在这些地方的。³⁸

而日本又是如何？根据历史人口学的研究成果可知，十六世纪日本的人口为 1500-1600 万。十七世纪由于新土地的开发以及城市的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到了 3000 万。但是日本的人口在中国人口爆炸型增长的十八世纪，虽有所增减，但一直保持在 3000 万的水平。³⁹从迁移的角度来看，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也因对都市及乡村的奉公行为而盛行人口流动，但至少没有出现过中国那样的大规模迁移活动。

这样的差异是如何产生的呢？除了因为两国的国土面积的差异以外，首先可以联想到的是由于财产继承制度的差异。在江户时代的日本，特别是在东日本家庭的财产为长子（一子）

³⁷藤木久志著『刀狩り——武器を封印した民衆』，岩波新書，2005年。

³⁸斯波義信著『華僑』，岩波新書，1995年，第55頁。ロイド・イーストマン著、上田信等訳『中国の社会』，第13頁。

³⁹鬼頭宏著『文明としての江戸システム』，日本の歴史19，講談社，2002年，第70頁。

所继承，作为后嗣的长子要继承大部分家产，以保证直系家族的“家”的存续。其余的儿子们或出走奉公，或新设家屋“分家”，与嫡系“本家”结成从属性关系。⁴⁰

但是，在作为奉公对象的城市，特别是十八世纪的江户，是男性过剩的社会（男性 32 万人、女性 18 万），他们很难得到结婚的机会。而且因为卫生条件不好的城市死亡率高，收入少等原因又出生率低，都市就如同被喻为“蚂蚁地狱”一样吸收着农村的人口，起到了压制整体人口增长的效果。同时，在分家后留在农村的人们拥有的耕地少，与其他下层农民（无耕地者或是佃农）一样断绝了家系的人很多。还因为结婚年龄推迟，因为贫困多人为地限制生产（间苗、返子）。⁴¹其结果导致了农村的剩余人口常被淘汰，不能形成大规模的迁移。

相对于此，中国则是推行了彻底的平均分配的继承制度。在中国，孩子们结婚后虽然也是同样跟父母分开单独生活，并将此称为“分家”，但是在进行财产分割的时候不分嫡次，对耕地以外的财产以及自立之前的教育费用等细致部分也进行均等的计算与划分。各自独立出去的家庭——“房”之间也是平等的关系，诸如日本那样本家具有特别的发言权之类的事情并不存在。⁴²当然虽然是平均继承，但随着世代的增加，每一家族的继承财产就会减少，也就是说，中国的继承制度给以他们通过经常迁移而获得新的耕地的义务。

在香港的新界进行实地考察的文化人类学者濑川昌久氏曾经意味深长地指出：在广东的宗族中，即使是长期去海外打工的人，也不会失去作为宗族一员的资格。⁴³他们往往将家属留在故乡，通过从海外寄钱的方式履行对宗族的义务。一般来说中国的宗族的规模远远超过比村落的规模。

与此相比，日本的同族的范围极为狭窄，只是限定在同一村落里长期生存、作为本家和分家之间构筑了庇护和服务关系的人群之间。离开了村落，在其他的村落里建立了家庭的人员就不再被视作同族的一员。原来在日本“村”即村落组织的团结性很强，入会地是共有土地，诸如用水的管理、婚丧嫁娶、宗教仪式等都是以村落为单位进行的。而且在日本还有“村八分”的制裁制度。在村落里丧失社会关系是最忌讳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日本父系原理的扩大由于居住范围而受到限制，一旦离开了家乡就被剥夺了同族成员资格，再也不能回头。与中国相比，日本是迁移风险极大的社会。⁴⁴

日中两国有关迁移问题的如此差异，对人们建立社会关系以及行动方式以大的影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中国人的迁移活动多数依托宗族或是说相同方言的同乡网的帮助。移民们在迁移地设立会馆、公所等同乡团体，在相互帮助的同时通过对特定的神灵的崇拜加强了团结（横滨中华街的关帝庙就是其中一例）。而且会馆还是一个具备垄断特定行业的工商业行会性质的组织，移民们通过会馆得到身份保证，从而能得到关于商业活动以及移民事业的有关情报。⁴⁵

⁴⁰福田アジオ「アジアにおける家と村落」『アジアのなかの日本史 一、アジアと日本』，第 191 頁。

⁴¹速水融著『江戸の農民生活史——宗門改帳にみる濃尾の一農村』，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88 年。同『歴史人口学の世界』，岩波書店，1997 年。

⁴²未成道男著「社会結合の特質」（橋本萬太郎『漢民族と中国社会』，民族の世界史五，山川出版社，1983 年，第 267 頁）。菊池秀明著『広西移民社会と太平天国』，第 515 頁。

⁴³瀬川昌久著『中国社会の人類学』，世界思想社，2004 年，第 209、220 頁。同『中国人の村落と宗族』，弘文堂，1991 年。同『客家——華南漢族のエスニシティとその境界』，風響社，1993 年。同『族譜——華南漢族の宗族・風水・移住』，風響社，1996 年。

⁴⁴福田アジオ「アジアにおける家と村落」。

⁴⁵斯波義信著『華僑』，第 65 頁。

而且在中国，移民们扩展了取得成功的机会，为了避免失败的危险而选择从事多样化的经营。罗香林氏对于移民，特别是对于客家人的特征以他们“兼营农工商学仕兵等多种不同业务”为例，作了如下的结论：“必须说客家的家庭是一种复合式的组合，他们没有专门的家业，很难找到一两家纯粹的商家、工匠或是官僚的家庭”。⁴⁶产生这种情况的理由是，因为科举制度的影响，社会阶层趋于流动，故而人们无法保持特定的职业身份。像这样充分利用关系网络所形成的牢固的社会关系及其灵活的行动方式，可谓是中国社会的一大特征。

与此相对，日本在十六世纪海外贸易繁荣，在东南亚有很多日本人街。但是当十七世纪江户幕府宣布禁止日本人前往海外以及不让他们回国后，到近代开始往夏威夷移民为止，往海外的迁移几乎断绝。同时，在江户时代，士农工商的身份在原则上已被固定，职业也多世袭化。原本用日语来说这就是“职业气质”，也就是说手工业者等对自己的职业有一种自豪感，对其技术进行磨练被视为一种职业伦理。这种意识为包括农民在内的多数日本人接受，后来鲁迅评论道“日本人的长处在于，不管干任何事，的确都有不要命的认真劲儿”。⁴⁷这也培养了日本一丝不苟的社会风气。

但是将日本与中国的社会进行比较时，不能忽视民众的反叛以及民间宗教性质方面的不同。在中国，自秦末的陈胜、吴广之乱以来，王朝末期多有巨大的反乱发生。特别是后汉末期的黄巾之乱的太平道、元末红巾之乱的白莲教等，发生了以宗教结社为母体的反乱。

与此相比，日本从室町时代开始到战国时代为止，虽然也有过土一揆、一向一揆等与宗教组织有关的反乱，但是，在江户后期成立的天理教、丸山教等民间宗教的大部分，跟百姓一揆以及改世民众运动没有直接的关联。当然，在现在的中国与将“农民战争”评价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相比，强调反乱的破坏的一面更多。但是，在中国的历史上多次发生过这样的反乱是事实，在比较日中两国关系时可以进行冷静的讨论。

再探讨一下发生反乱的原因。如本章所述，围绕社会的流动性的差异而带来的重大的影响是不能否定的。根据小島晋治氏的观点：中国与日本相比地缘结合较弱，不具备以村落作为“共同体”的各项物质条件。而且由于土地买卖盛行，均等的财产继承使农民容易向下层分化。再加上中国的国土广阔，自然灾害严重，没落农民成为大量流民的事例屡见不鲜。⁴⁸

最能显示中国这些下层民众面对的不稳定的生活状况，就是白莲教等民间宗教所说的末劫思想。这是一种佛教的终末思想，在日本的十一世纪，末劫思想也伴随净土教一起传播，但是中国的末劫思想伴随以悲剧性的描写有鲜明的真实感。譬如说《龙华经》中有一节如下的描述“山摇地动，黄河泛滥，众人溺死，蝗蔽天日，大雨倾盆，家毁身亡”，“人们互以为食、饿死，即便是夫妇亦不相顾”。⁴⁹对于每次经历王朝交替都要体验激烈的社会动乱的中国民众来说，这些内容绝非虚构。

对比之下，在日本的民间宗教里，几乎没有终末思想的言说。在中国救济劫末悲剧的是弥勒佛转世（乃至下生）。在日本的微观信仰中没有“弥勒转世”之说。同时“微小之世”的说

⁴⁶ 羅香林著『客家研究導論』（廣東，1933年，台北衆文圖書再版，1981年）第七章、客家的特性。

⁴⁷ 内山完造著『魯迅の思い出』，社会思想社，1979年。菊池秀明『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近代中国』中国の歴史10，第372頁。

⁴⁸ 小島晋治著「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中葉の民間宗教、民衆宗教の思想——日本と中国」（『太平天国運動と現代中国』，研文出版，1993年，第145頁）。

⁴⁹ 澤田瑞穂著『校注・破邪詳弁——中国民間宗教結社研究資料』，第一書房，1972年，183頁。

法在江户时代的日本虽广泛流传，但是其含义为“丰作之世”几乎丧失了宗教的内容。⁵⁰其背景是，1615年丰臣氏灭亡、战乱结束（元和偃武），由于江户幕府的农村统治政策，人口以及社会的流动受到抑制。

同时，白莲教认为转世后的弥勒佛并不直接成为地上的统治者，而是辅佐与清朝皇帝不同的“真命天子”的新王朝（复兴后的明朝）。为此在白莲教造反时出现了冒称皇帝的人物“牛八（将明朝皇室的朱姓加以分解）”，同时白莲教以外教派也经常对会员给予高官厚禄的政治许愿。

但是，在日本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因为日本既没有接受过天命思想也没有接受过科举制度，不存在可能进行王朝交替的逻辑，同时因为也没有超越身份制度的限制转换阶级的想法。事实上在日本发生百姓一揆时，农民即便有减免年贡等经济要求，也没有想过要提高身份成为大名或是武士。反而是中国的民众在反乱时，几乎没有农民为保持农民的共同意识，要在制度上改善农民地位，以及为此而确立政治权力的动向。小島晋治氏称：正是因为如此，无法将中国的农民反乱与德国的农民战争放在相同的“农民战争”的框架内进行评价。⁵¹

最后想通过这些末劫思想里的救济言论，对人们所持的乌托邦的差异进行探讨。在中国的前近代和近代的一贯理想是儒教的大同思想。所谓大同就是要求人们排除一切“私心”相互帮助，组成一个和谐社会的思想。近代的康有为、孙文、毛泽东等改革家、革命领导者多数都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也是这种大同乌托邦的表现，那里面写道：所有的男女都能平均地分到土地，“让所有人都享受到丰衣足食”。⁵²

现代中国对1950年代的大跃进政策以及人民公社制度失败进行反省后，将这样的社会建设计划称为平均主义或是农业社会主义加以批判。其理由在于，因为平均乌托邦是站在狭隘的小农经济视野的“落后”的思想，缺乏进行商品生产的意识，从而对社会带来了破坏性的影响。但是，正如孔子所云“不患贫，唯患不均”，在中国的传统思想里原本就缺乏通过发展经济而实现富裕的想法。而且，主张平均主义的往往是知识分子，如果只是将此批判为“小农思想”，则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在中国会反复提出这样的乌托邦设想的。

1833年有一个安徽的读书人向北京的都察院提交了一份社会改革的计划书。他认为发生反乱的原因在于土地的集中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要求国家将耕地加以收购以后恢复井田法，将土地平均地分配给每个人。对于经费的来源，他主张借鉴交钞制度，发行约定支票。在收税时慢慢将其回收。上述事例虽然只是说明了平均乌托邦思想拥有广泛的市场，但是作为一种特征现象的“井田被毁不得复活，游民日益增多”⁵³，明显表达了对于中国社会的流动性之大所持的不安心理。

井田法是唐代的均田制和日本的班田收授法都想追求的社会蓝图。产生这种复古主义的

⁵⁰宮田登著『ミロク信仰の研究』新訂版，未来社，1975年。安丸良夫『日本の近代化と民衆思想』，青木書店，1974年。

⁵¹小島晋治著「平均主義の歴史的な性格とその社会的基盤」「太平天国運動の性質」（『太平天国運動と現代中国』，第165、131頁）。

⁵²『天朝田畝制度』（西順藏編『原典中国近代思想史 一、アヘン戦争から太平天国まで』，岩波書店，1976年，第319頁）。

⁵³金銘館封章、道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軍機檔 65314号、台湾故宫博物院藏。以及菊池秀明著「洪秀全の挫折と上帝教——檔案史料から見た太平天国前夜の広東社会」（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编《东洋文化研究》十号，2008，第137頁）。

乌托邦像的背景是中国社会的现实，王权和社会阶层的上升、没落反复交替，以及人们不断地在松散的关系网络中迁移。在日本“微小之世”意味着丰收之世，而在中国成为伴随世界的末日而来的“弥勒转世”，其理由之一是围绕身份及社会流动性的差异。总之，大同思想之超稳定乌托邦，是中国社会与日本相比具有竞争激烈、流动性强的特征而产生的一个反作用。

小结

如果对本章进行简约概括，主要有以下的内容。围绕日中政治体制，首先提出的是对皇帝制度和天皇制的比较。同时本章指出，相对于中国皇帝的“一君万民”的集权性质的王权，日本的王权则是复合式的，长期以来一直是双重政权。产生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对天命思想的接受不同。中国的皇帝因为要直面易姓革命的竞争，与社会保持着一种紧张关系，他还必须在与对手的激烈权力斗争中，时刻主张自己拥有正统性。与此相比，日本的天皇拥有作为神话根据的灵威而带来的权威性，而且他与豪族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样的特征即使在武家政权的时代也被继续保持着，因为日本的王权具有重叠性质，所以在发生政权交替的时候所伴随的社会成本也能成功地加以抑制。

其次，本章围绕日本和唐代，试就古代的行政、司法制度进行了比较。日本的班田收授法和唐代的均田制都是源自于中国古代的井田法。在中国，均田制虽因为国土面积过于广大而未能在全国得以推行，但是永业田保留了私人土地，得以有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与此相比，日本的班田收授法为了实现土地公有的理想，反而使体制变得僵硬。而且实施律令体制给以后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以极大的影响，使日本形成了“耕作稻田的均质单一民族的岛国”的形象。但实际上东西日本与中国的南北一样，伴随新区域的开发，成为拥有各自不同特征的社会。然而，与中国相比，在社会变动的幅度较小的日本，与社会的多样性相比多强调了均质性。

另外，本章就产生现在两国社会的差异的直接原因，对十世纪以后日中两国社会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探讨。日本、中国、朝鲜半岛都出现过武人政权。但是只有日本产生了牢固的政治组织和武人固有的社会规范，在中国因为科举制度的发展，在皇帝之下构筑了文人官僚的统治体制。同时又因为科举制度不再承认权力的世袭，故而它又推动了社会阶层的流动，给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带来了激烈竞争的原理。这是与确立了以“家”为单位的职业承包制、在江户时期又固定了士农工商身份制度的日本社会的最大差异。

基于儒教规范的中国科举带来了帝国的统一和价值观的一元化。特别是朱子学成为国家公认的价值观而被渗透到社会阶层以后，在使知识分子具有肩负国家重任的强烈自负的同时，使中国文化具有了与政治密不可分的性质。而江户时代的日本，儒学者没有参政的机会，儒学只是被人们视作一种教养。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学问不必固执于特定的“正统”而显出多样性，这与幕末产生新思潮的宽松程度相关联。

中国由于科举而形成社会阶层的流动化的同时，空间流动高也是其特征之一。特别是当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爆炸，经济发达地区的富余人口向边疆各省和海外迁移。这种迁移之所以能成为现实，主要是由于家族及财产继承的不同，在长子继承的日本，其剩余的人口作为村落里的分家或都市里的奉公人最终被吸收或淘汰，所以没有形成需要大规模迁移的人口群

体。与此相对，中国彻底地实行了均分继承的制度，为补充因世代增加而减少的财产继承，有必要继续获得新的耕地。而且在中国即便长期在外生活的人，也不会失去在故乡宗族的成员身份。这与只局限在村落中的同族集聚的日本相比，他们的迁移风险要小。这种不同的社会习惯，最终导致了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人华侨与日本人移民的不同。

最后，本章就这种社会流动性所见两国社会的不同之处，对于人们的思想意识，特别是对于民间宗教思想所给予的影响进行了考察。中国的民间宗教的末劫思想对于悲惨结局的描写与日本的民间信仰相比，具有甚至不可相比的现实感，显示出中国的下层民众所面临的生活的不稳定。同时，在中国还有转世弥勒佛辅佐“真命天子”的新王朝的想法，造反的宗教领袖或是自称为皇帝，或是向会员们封官许愿。这种事例常见。但是，在没有王朝交替以及超越身份的阶层间移动的想法的江户时期的日本，参加造反的人们没有想过要建立新的政权，或是上升为武士身份。而且中国的革命以及改革运动的理论支柱大同思想，也是流动性大的中国社会的特征。人们被严酷竞争和巨大社会变动折磨的反作用，是追求平均主义的超稳定的乌托邦。

这样思考的话，就能明白日本和中国虽然是“同文同种”的邻居，但是两个社会其实有着很大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并非是先验的存在，而是在两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演变出来的特征。同时，越追溯古代，律令制等相同的地方事实上就越多。可以认为，日中两国是在东亚世界这样一个主干上分枝而成的两个社会。至少可以通过本章的分析是否可以明了这样的事实，日本和中国是两个各自具有值得尊重的个性的社会。

现在言及日中关系的时候，会经常听到首先应该“舍小异求大同”的声音。这作为一种对应方式自然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本章将日中两国的差异作为问题进行论述，其本意不是想给两国的友好关系泼冷水。这是能得到理解的。就像每个人的面孔都不相同一样，日本和中国这两个社会也具有各自的特征。因为要面对频繁的社会流动、激烈的竞争而变得行动敏捷的中国人，因为受到身份制度的影响而执著于某一职业伦理、对任何事情都认真对待的日本人……当然必须要注意避免将问题过于一般化地进行认识。但是，只有理解两国人民的性格区别才能确立真正意义的友好关系。如果日本和中国都能了解对方的长处，并将其充分利用起来的话，建立双赢的格局决非是不可能的。

原上海总领事杉本信行氏在回顾其漫长的中国生活时，往往对中国社会的多面性和多样性表示惊讶，他指出在日本，对于中国人的性格充满恶意的片面理解过多，有关中国的认识重要的是，不能只是根据各种数据资料唯心地看中国，应基于排除书本理论的现实来理解中国。如果日中双方都能正确认识对方，对两国的利益都有益处。他还充满信心地断言“日中两国一定能够相互理解”。⁵⁴就中国的现实问题，本章谈论的深度究竟如何，只能由读者加以判断。但是我希望在这里谈论到的问题能够为加深日中两国的相互理解做出一点贡献。最后在本章结束之前，再次对支持我的中国历史研究、在中国社会方面的理解给予我宝贵教诲的两国友人表示感谢。

⁵⁴杉本信行著『大地の咆哮——元上海総領事が見た中国』，PHP 研究所，2006 年。

近现代史 前言

近现代中日关系历史是经历了激烈战争的时期。由于关于近现代历史的记忆至今仍然鲜活地留在中日两国民众的心中，而对于遭受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伤害的中国民众来说记忆更为深刻，所以相对古代中日关系历史来说，中日两国民众在战争性质与战争责任的认识上取得相互理解相当困难。

中日两国的学者首先从与近代西方列强的接触来思考亚洲近现代历史的开端。虽然对于这一开端的原因在何种程度上来自外部的冲击，在何种程度上来自内发的因素，学者们的认识未必一致，但对于同西方遭遇这一点的重要性，双方学者达成了共识。如果西欧各国不涉足亚洲，无法想像中日两国会踏上其后的道路。中日两国受到西方冲击的时间与接受方式并不相同，在中国开始于鸦片战争，在日本则开始于佩里的到来与明治维新。对于这些基本问题的判断，双方学者的意见是一致的。

在确定研究题目方面，近现代史组的思考方式同古代与中世纪史组有所差异。近现代史组的学者按照时间的顺序把近现代的历史划分为不同阶段，对各个阶段中日关系发展变化再依时间顺序分为不同时期，对各个时期的历史过程进行综合性的研究。换言之，我们并没有确立特定的题目，而是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就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撰写论文。具体来说，近代史组以1931年到1945年的战争为界，确定了战前、战争中与战后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各自打开国门到20世纪20年代；第二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第三阶段为战后至今的历史。每一阶段依然按时间顺序设三个时期，即共三个阶段九个时期，分三章撰写论文。为了使双方学者围绕同一时期的研究内容大体对称，双方学者共同确定了每一时期若干重要的、必须涉及的问题点即关键词，规定双方的论文必须包括对这些问题点的分析，避免发生一方认为重要的问题而另一方完全不予理会现象。考虑到两国学者对上述历史发展的基本进程的认识可能存在分歧甚至是较大差异，因此我们并不追求在这一阶段就所有的认识都能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而是确定先由中日双方学者围绕各个时期以各自的视点撰写论文，然后双方对论文进行对照比较，互相交换意见，进行充分讨论。在接受了认为妥当的对方意见并修改后，仍然以双方论文并存的形式发表。也就是“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

近代史组分组会除全体会议外，2007年11月于日本福冈、2008年1月于中国北京、2008年3月于日本鹿儿岛、2008年5月于中国济南共召开了四次会议，进行了意见交换。此外中日双方委员还各自召开了数次会议，分别进行了实地视察和研究。

近现代史组的两国学者始终是在认真、坦率和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共同研究的。从研究与讨论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对于大部分历史史实，双方学者的了解程度与认识角度是相同或接近的，因为双方学者均严守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学术规范，尊重史实、实事求是，这是共

同研究能够顺利进行的基本原因。而在研究方式与认识方法上，双方学者间存在差异：中方学者重视近代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一系列问题的原因与本质，日方学者倾向于探究那一问题发生的过程。当然，在长时间的共同研究中，双方学者对于上述差异也达成了一定的相互理解：日方学者理解了中方学者高度关注侵略战争对中国产生巨大伤害的原因，而且注意到尽管那样并没有使他们的学术研究流于情绪化；中方学者肯定日方学者实证研究的成果，也注意到日方学者并未因此否定加害的责任。双方学者在历史研究方面如何摆脱简单化和重视复杂性，如何面对在同一历史事件面前的不同解释，今后还将继续进行讨论。但是，双方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对方的看法，则是迄今为止近现代史组共同研究取得的重要进展。

第一部 第一章 近代日中关系的开端

北冈伸一

前言

直至 19 世纪中叶,东亚一直拥有一种有别于当时西方的国际秩序。西方列强以这种国际秩序不便为由,以其优越的军事实力为背景,要求变更此秩序。面对西方的这一挑战,东亚国际秩序不得被迫做出根本性的转变。把东亚的转变完全看作是对西方冲击的反应未免过于片面,但是没有西方的冲击却绝不会有东亚的这种变化。

面对西方的冲击,日本和中国的对策截然不同。这种对策上的差异,对其后的日中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本和中国,在各自不同的历史和传统背景下是如何应对西方冲击的?近代以前有限的日中接触,又是如何在其中形成并深化的?本章将就以上两个问题进行阐述。因此,本章不同于近现代史分科会论文集的大部分内容,不是对两国关系进行单纯的叙述和分析,而是采取了用比较史的角度来阐明两国关系史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鉴于笔者的专业,论述重点将侧重于日本。

第一节 西方的冲击与门户开放:日本和中国

1. 近代西方国际秩序与东亚国际秩序

直至 19 世纪上半叶,在东亚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多数周边国家受中国册封,向中国朝贡。由此,一方面各国承认中国在政治、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统治者也从中国获得对其统治地位的承认与庇护,同时享受朝贡带来的贸易利益¹。

这其中几乎只有日本一直强调与中国的平等地位。虽然在古代,或者说中世纪的足利义满等分别从国内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以“王”的身份对中国采取了臣下之礼,但那只是极个别的例外²。

为此,对中国来说,日本倒成了一个相对遥远的国家。当时的清朝虽然希望比较详细地了解朝贡国的情况,但是对于日本的了解,却相当缺乏³。相反,日本对清朝的情况却非常熟悉。在江户时代两国间已经开始有了贸易交流,而日本从中国进口最多的货物之一就是书籍。如此在与清朝有限的接触中,日本在深受清朝影响的同时,又由此产生了抵触心理,而形成

¹关于这一体制的名称有多种学说,但在以册封和朝贡或进贡为中心,以文化的优劣关系为核心这一点上,并没有大的出入。对其特征的详细探讨,可以参考西里喜行的著作《清末中琉日關係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2005年,第13-18页。

²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第三章。另外,在《万历会典》(1587年)中,日本虽然被叙述为朝贡国,但在《嘉庆会典》(1818年)中,日本则被放在了互市各国之中。同上书,第84-87页。

³例如《瀛环志略》(1866年)一书中,就在原封不动地引用古籍的基础上,将日本的三大岛,记作北方的对马、中部的长崎、南部的萨峒马(SATSUMA)。参见佐佐木扬:《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iii-iv页。

了其独特的文化和民族认同。

可是反过来看，西方的世界秩序在世界史中也是非常独特的。在这一秩序中，世界由主权国家和殖民地构成，形式上所有的主权国家都是平等的，国家对国内以及殖民地内部的所有事务都负有全责。反言之，对不能完全承担其责任的土地，就不能主张拥有其主权。依此类推，所有的土地必然只属于某一个国家。不仅没有同属于两个以上国家的土地，而且原则上也没有无属无主的土地。

这种国际关系，在世界史上也是很罕见的。在多数文明圈中，国家之间不是平等的，更多的是有一个中心国，而其他国家多根据与中心国的关系分别位处不同的地位。由于国家与领土的关系也不是绝对的，既有属于两个以上国家的土地，也有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土地。

即使是在传统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如前所述，国家之间也不是对等的。宗藩关系中的从属国，虽然并非如西方主权国家一样独立，但也并非像西方的殖民地般处于附属地位。而像琉球那样既属于日本又属于清朝的国家也是存在的。同样在日本，对北海道的领土观念在俄国侵略之前也是很淡薄的。

对处于这种国际关系中的日中两国而言，与西方的接触是一个艰难的事情。尤其是中国，因为不能顺利适应西方试图引进的近代国家体系，损失严重。相比较而言，日本则没有经历太大的失败，而顺利克服了这一难题⁴。

2. 中国的门户开放

1661年清朝发迁界令，施行大陆封锁政策。但是在1684年，清朝又宣布解除“海禁”，开放澳门、宁波等四个港口，设立海关进行贸易。可是在1757年，清朝将与外国船只的贸易又限定只在广东（广州）一地。从18世纪末到整个19世纪广东贸易极其繁荣，多时甚至达到一年中约有150艘外国船只驶入。其中最活跃的就是英国。但英国当时被定位为朝贡国，中英贸易是以极为有限的一些中国商人（广东13行）为媒介，在各种严格的限制下得以存续的（广东体系）。

但是，18世纪末以来，随着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大量增加，英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为了阻止这一趋势，英国开始向外出口鸦片。很快鸦片流毒在中国扩散，吸毒人数激增。为了重建财政并肃清国民中的鸦片毒害，1839年，林则徐开始实施没收鸦片、禁毒等措施。因而引起了鸦片战争的爆发。虽然当时在英国也有人认为这次战争属于非正义的战争而强烈反对，但还是在1840年5月，包括战费支出等各提案，全部获得了上下两院的支持。

战争开始后，清朝不敌英国，终于在1842年缔结了《南京条约》。条约规定除广州之外，再增开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开放港口，并割让香港岛给英国。1843年，美国提出同样的要求，根据一视同仁的理论，清朝对英国以外的各国都给予了最惠国待遇。

⁴不过，此处的“成功”、“失败”，仅是从当时与西方的接触和保持独立的观点上而言的。一般来说，一项任务的成功条件却常常会导致下一个任务的失败，这种例子也是屡见不鲜。在思考东亚历史时，这也是一个不可忘记的要点。

尽管如此，在清朝看来，根据条约实行的口岸贸易只是朝贡贸易之一的广东体系的扩展而已。同时不但口岸数量有限，集中于南方，而且都只是一些乡下渔村。把这些偏僻的土地提供出来，被（清朝--译者）看作是其对西方人施加的怀柔政策。

但是，西方列强在开放的口岸租借土地，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完善行政制度，创造出不同于传统中国的空间。这就是租界。尤其是上海，西方建筑鳞次栉比，景观为之一变。同时，基督教也开始传入中国。租界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中国。

在上述这种清朝逐渐衰败的过程中，受基督教影响，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中国陷入极度混乱中。太平天国运动从 1850 年一直持续到 1864 年，据说有 2000 多万人丧生。镇压这次运动的主力，不是清朝的正规军，而是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等乡勇，还有戈登的常胜军等外国雇佣兵。太平天国运动本身不仅严重打击了清朝，在其过程中传统的以满族为中心的统治体制的软弱无力被呈现出来这一点尤其重要。

其间，由于一些偶然的原因，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 年 10 月，清朝官宪对注册为英籍的中国船只亚罗号进行临时检查，并以海盗嫌疑逮捕了 12 名中国船员。事情发生时出现了被指为扯落英国国旗的事件。实际上，这艘船的船籍登记已经过期，清朝方面的行动也并非违法。但英国为了获得在《南京条约》中没有得到的诸多权利，遂邀请其他列强共同出兵。法、俄、美三国中，对英国做出积极响应的，是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推行积极对外政策的法国。1857 年末，占领广东后的英法联军开始向天津进发。疲于应付太平天国运动的清朝做出了让步，1858 年 6 月签订了《天津条约》。

但是，英法联军撤退后，反对之声在北京逐渐高涨，次年与前来互换批准书的英法之间发生冲突，战争再度爆发。1860 年 10 月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毁坏了圆明园与颐和园，并大肆掠夺。

1860 年清朝与英法缔结《北京条约》，除确认了《天津条约》的内容有效，又添加了更多的负担。其内容是：①开天津、汉口、南京等 11 个口岸为开放口岸，给予在各开放口岸居住的外国人（在中国国内--译者）旅行的权利。②承认基督教的传教权、鸦片贸易的合法性。③允许外国使节常驻北京，禁止对西方人使用“夷”字。④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等等。同时对参与调停的俄国，也割让给其至此一直（中俄--译者）杂居的沿海州（乌苏里江以东至海之地（包括库页岛和海参威在内）--译者）。

综上所述，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清朝存有野心，依靠其军事实力，制造各种借口以逐步达到目的。而清朝对西方诸国的军事力量及其野心的警惕不足，总是不经意地给了对方以借口。很多情况其实原本只需稍加警惕就可以避免、或减少损失的。

3. 日本的门户开放

相较而言，日本的门户开放则没有出现较大的混乱。

1853 年 7 月，佩里舰队来日，请求建立邦交。同月佩里曾一度离开，但 1854 年 2 月又再度来日，与日本缔结了《日美和亲条约》。其结果是（日本--译者）开放了函馆、下田 2 个港口。但是，这还仅是锁国政策中的一个例外，并非真正的门户开放。英、荷兰、俄、法纷

纷效仿此法。但是，到了 1856 年，哈里斯作为美国驻下田领事从美国赴日，要求缔结通商航海条约，日本被迫面临做出最终抉择的局面。缔结通商条约就意味着明确放弃锁国政策，是远比和亲条约更为严重的事件。

在当时的幕府内部，渐进的门户开放论和传统的锁国论两种意见针锋相对。一方认为门户开放不可避免，主张引进西方的军事技术、整顿外交机关、征求大名的意见获得舆论支持然后门户开放，同时还主张拥立一桥庆喜（1837-1913）为下任将军；另一方保守派虽然对于同西方的冲突甚感畏惧，但是在对改革军事外交制度以及征求大名和其他人士的意见问题上表现消极。他们拥立虽然年幼却在血统上更为符合将军身份的纪州的德川庆福（1846~66）为下任将军。

佩里舰队来日以来，主持幕府工作的一直是老中（在幕府中直接隶属于征夷大将军统辖国政的常设职位--译者）阿部正弘。阿部在 1857 年去世，继承其职位的是堀田正睦。阿部、堀田二人都对西方文明比较了解，认为门户开放不可避免。问题在于采取什么方法。他们没有采取幕府专断的方式，而是准备征求众多大名的意见，并在取得朝廷同意的情况下签订条约。但是，条约敕许问题跟将军的继嗣问题竟意外地纠缠在一起，使问题变得复杂化，幕府争取朝廷敕许的计划失败。堀田由此下台。南纪派的井伊直弼就任大老（在江户幕府中作为辅佐将军的职位，被临时设置在老中以上的职位--译者），签订条约并决定由德川庆福继任将军。接着，许多反对派被处死（安政大狱），从而引发了对此事件的反感，最终发展成井伊直弼被暗杀（樱田门外之变，1860 年 3 月）之事态。

从安政大狱及樱田门外之变开始，攘夷运动在日本越发激烈。但是若不计个别的袭击外国人事件，与西方的军事冲突其实仅限于 1863 年 6 月长州藩炮击外国船只、1863 年 8 月萨英战争以及 1864 年 9 月发生的四国联合舰队攻击下关这几件事情。与中国相比，混乱程度要轻。

这里有几个原因。

第一，西方列强的主要关注对象是中国。与幅员辽阔的中国相比，日本只是邻近的一个小国。并且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系列过程中列强也没有余力去真正花费精力去对付日本。这也是在日本门户开放问题上是由美国而非英法占得先机的原因之一。另外下文也将涉及到的列强对朝鲜的压力要小于对中国的压力也是基于相同的原因。

第二，正因为如此，日本得知清朝战败后，有了准备应对列强的时间。尤其在鸦片战争这种非正义的战争中，清朝战败对日本打击很大，日本由此了解到西方列强的邪恶意图与可怕实力。这一时期，西方船只不断出现在日本近海、琉球等地，荷兰也来迫使日本门户开放。虽然日本也没能做出自行门户开放的决断，但确相对有了一定的准备。

第三，至关重要的是，武士是日本的中坚，原本就比较重视军事。武士们马上就认识到日本无法战胜西方的事实。参与过接待俄国使臣普提雅廷（Evfimii Vasil'evich Putyatin），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非常活跃的川路圣谟曾高度评价穿越万里波涛而来的普提雅廷（Evfimii Vasil'evich Putyatin）为“真豪杰”，慨叹其远非包含自己在内的承平已久的武士所能及⁵。

⁵佐藤诚三郎：《川路圣谟》，载佐藤诚三郎：《<死の跳躍>を超えて》，都市出版社，1992 年，

相较而言，清朝的价值中心则是“文”而非“武”。虽然有如同林则徐那样出色的官员，但是他的判断并没有能够充分被传达到北京，也没能获得重视。

朝鲜的价值中心也是“文”。尤其在李朝时期，自明代之后，只有朝鲜才是继承了儒教正统的国家——这一观念广为流传。关于鸦片战争的信息，传入朝鲜的比日本还要多，但是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应。到 1845 年，朝鲜对清朝情况的判断依然是“无事矣”。此时，魏源的《海国图志》已传入朝鲜，但与日本不同在朝鲜并没有引起海防思想的勃兴。甚至也没有把太平天国运动当成是重大事件。对发生在江南的事件，朝鲜的关心程度非常低。据说朝鲜的警惕心开始高涨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最终波及到华北之后⁶。

即使在日本，在以文为中心的京都朝廷内，也只有少数人能够理解事态的严重性，极少有人去认真地探讨能否战胜列强这一问题。

第四，应该指出的是日本社会在经济上已经完成了高度统合的事实。江户时代，在日本就已经形成了全国单一市场，各藩通过沿海航线运输物资往返于大阪。所以几艘“黑船”的出现，并不是地区性的危机，而立刻成为全国性危机。

与之相比，在中国，南方的危机很难成为全国性危机。在朝鲜半岛也看不到高度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统合。沿海航线并不特别重要，所以危机感也小得多。

第五，可以说教育的普及和民族一体感上日本是最强的。自 17 世纪初开始的长期和平的环境中，识字率上升，对日本文化的再认识也日渐兴起，早期的民族主义开始萌芽。对天皇的关注高涨，所谓日本从未负于外国的不败传统被一再强调。

第六，作为大前提，日本通过长久以来与中国的交流充分了解到有比日本更优越的文明的存在。日本人的世界观，不是本国中心主义。即便看起来像是本国中心主义的思想，也不过是一种逞强的、抗拒中国优势地位的本国中心主义。因此，承认西方比日本至少在几个领域上优越，并不那么艰难。

江户时代兰学的普及也与此有关。1862 年福泽谕吉在欧洲旅行时与中国留学生唐学埶结识，问其在清朝能解读西方“横文字”的人数时，得到回答为 11 人，甚为惊愕⁷。虽然该数字未必可信，福泽对此恐怕也是半信半疑。尽管如此，相对于日本有约 500 人左右的兰学家和洋学家，与西方有着漫长交往历史的大国清朝竟然只有这么少的人数之情况，让他感到非常吃惊。

估计大多数中国人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传统上优于自己的国家的存在。中国的本国中心主义，其渗透之深已经达到了即便被人点拨都绝不会醒悟的地步。

第 133 页。

⁶上述内容，参见原田环：《19 世紀の朝鮮における対外的危機意識》，载《朝鮮史研究会論文集》第 21 卷，1984 年 3 月。

⁷石河幹明：《福澤諭吉伝》第一卷，岩波书店，1932 年，第 330—333 页。

第二节 明治维新与脱亚入欧

1. 幕府的倒台与新政府的成立

下决心门户开放的日本，面对的下一个课题就是摸索建立新的政治体制。

佩里舰队来日时，对应该由德川幕府担负接待外国的中心责任的问题是无人会置疑的。幕府的石高据说为 800 万石（幕府直辖领地 400 多万石、御家人（一万石以下的幕臣，无资格谒见将军者--译者，下同）300 多万石），远远超过了处于第二位的加贺前田家（102 万石）和萨摩岛津家（77 万石）。

加之许多藩的经济困难毫无余力。长期以来除了后叙之萨摩、长州等处以外，他们在德川家的长期统治中逐渐形成了自觉的家臣意识，自己治理自己领土的观念逐渐淡薄。

但是幕府也有弱点。石高是以农业收入为基础的，但是对于江户时代发展起来的商业并无稳定的税收体系。农业在江户时代的后半期开始停滞不前，幕府的财政同各藩一样也十分困窘。

幕府的军事力量也在日久承平中变得陈腐。若引进新的军事技术马上就会陷于从零开始竞争的命运。而且，幕府的家臣多为习惯了和平、安于特权的旗本（一万石以下的幕臣，有资格谒见将军的直属家臣--译者，下同）和御家人，缺乏为了获取新技术而接受严格训练的热情和灵活性。

同时，幕府统治的正统性也很脆弱。幕府能够统治全国是因为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可以说是极度依赖于朝廷任命的。在身为朝廷家臣这一点上，将军和其他大名是平级的。前述围绕门户开放而产生的混乱，也是起因于幕府没能得到朝廷的敕许。而且，当身为征夷大将军的幕府如果不能征夷，其正统性也就随之大打折扣了。

与幕府相比，萨摩与长州这两个藩是在 17 世纪初德川家全国称霸过程中的败者，封地被削减，它们带领众多家臣，经受困苦，反而维持了尚武的风气。

话说回来，幕府首脑是谱代大名（1600 年的关原之战以前一直追随德川家康的大名--译者，下同）日清修好，都是小藩藩主。幕府政治是把外样大藩（1600 年的关原之战以后才为幕府所用的大名--译者，下同）、亲藩（与德川家有血缘关系的藩领--译者，下同）排除在外才得以实行的。不过始终有一股强烈的意见认为应该让这些有实力的藩一起加入，全国一致应对外来危机。这也正是一桥派和南纪派对立的焦点。

希望维持传统的以幕府为中心的统治体制的井伊直弼在樱田门外之变中被暗杀后，全国一致的体制经历了各种形式的摸索，最终以公武合体论——幕府与朝廷合作的基础上强藩参加——的形式展开。1862 年，天皇妹妹下嫁将军（和宫下嫁），在岛津久光建议下一桥庆喜成功出任将军后见职（幕末时期的幕府官职名，在将军在未成年时，辅佐将军的官职--译者，下同）、松平庆永（越前藩）就任政事总裁职（幕末时期的幕府官职名，总裁政治--译者，下同），1864 年 2 月，在京都成立了由一桥庆喜、松平庆永、伊达宗城（宇和岛）、松平容保（会津、京都守护职（江户幕府末期的官职名，有指挥京都所司代、大阪城代、附近大名的权力--译者，

下同))、山内丰信(土佐藩)、岛津久光(萨摩藩)⁸组成的参预会议。强藩中被排除在外的,只有当时明确表明攘夷态度的长州藩。

但参预会议因为内部的对立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所谓内部对立则包括希望维持专权的幕府与试图分权参政的强藩间的政治上的对立,也包括独占贸易利益的幕府与希望分享利益的强藩尤其是萨摩藩之间的对立。

那时,作为拿破仑三世积极的海外扩张政策之一环,新任法国驻日公使罗休(Roches, 1864年4月到任)主动与幕府接近,由此幕府中形成了亲法派官僚。结果幕府又重新回到强化自身权力的路线上来。而此时,英国正力图与萨摩藩建立亲密的关系。这是因为英国认为萨摩在开放贸易方面更加积极,而且决策体系也比较果断并富于灵活性⁹。

幕府的亲法路线让萨摩感到了威胁。在幕府开始进行第二次征伐长州前,萨摩努力与长州交好,结成萨长同盟(1866年3月)。在萨摩的支援之下,长州在7月开始的战争中击退了幕府。萨摩把从上海走私购买的武器弹药提供给长州。当时,中国业已门户开放,通过中国已经能够与西方进行贸易,这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实施方式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¹⁰。

在幕府的绝对主义强化路线与萨长同盟的倒幕路线之间,从公武政体论和幕府雄藩联合体制论发展而来的大政奉还论再度显露头角。它的主要提倡者是土佐藩,主张废除幕府,使德川家成为单纯的一个大名,在诸侯会议上讨论国事,这意味着土佐藩也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

若这一建议得以实现,是否能够形成以德川家为中心的体制呢?德川家拥有德川庆喜这一非常有能力的领导人,同时还有擅长实际事务、有与外国交往经验的官僚、同事还得到了法国的援助。1867年11月9日,德川庆喜实行大政奉还,成为一般大名,正是因为他有即便如此也能领导国政的自信。同时土佐藩也应该能在其中确保其有利的地位。

但这是萨长所不能认可的。他们认为即便允许德川家继续存在,也必须是在给予其一次军事打击之后。萨长主张对德川进行处罚,遂又提出王政复古。即在天皇的指导下施行国政。这是1868年1月3日的事情。

1月27日,心怀不满的德川与萨长之间爆发战争。虽然战争初期朝廷一方一度占领上风,但德川庆喜却在战局未明时撤兵返回江户,并放弃了抵抗。这场被称作戊辰战争的战争,始于鸟羽伏见之战,终于1869年6月函馆的五稜郭陷落。并未形成以德川家为中心的有组织的战争。可以说实际上是一日之内即大势已定。

德川方面并非没有在军事上取胜的希望。但是承平日久,习惯了和平生活的日本人并不希望战争的延续。德川方面担心如果彻底抵抗,有将日本分割为两部分,并导致日本成为殖

⁸ 岛津久光并非藩主,而是藩主的父亲,身份是陪臣(因此,与其他任命相比迟了两周左右)。这一事实也表示,本次会议是真正具备实力之人的一次会谈。

⁹ 在1863年8月的萨英战争中,面对英国,萨摩不仅英勇善战,在讲和谈判的过程中,还提出从英国购买武器并派人到英国留学的要求。其灵活的态度,给英国留下深刻的印象。

¹⁰ 1862年,幕府已经派千岁丸(幕府贸易船的船名--译者)赴上海寻求贸易(佐藤三郎:《近代日中交渉史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1863年函馆奉行所也曾派健顺丸(船名--译者)到上海。

民地的危险，所以对是否应该彻底抵抗的问题上游移不定。另外，对已经投降的一方施以宽大处理是日本的文化传统，这一点也为萨长方面所理解。

英国的调停作用也很大。英国为的是贸易利益，稳定的秩序正是其所希望的。江户城的和平开城，虽然是胜海舟与西乡隆盛所做的决断，但对他们施加压力的却是英国的驻日公使巴夏礼（Sir Harry Smith Parkes）。

虽然如此，但是有着 260 年统治历史的德川幕府倒台，也着实让人吃惊不已。幕府与萨长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萨长联盟，不拘传统采用下级武士控制藩政中枢，而幕府一方却没有如此。此不同之意义在新政府的统治中立刻得以显现。

2. 新政府的门户开放

当时一般都认为萨长领导的新政府必将实行攘夷路线。福泽谕吉等人以近乎绝望的心情迎来了新政府的统治。但是，出人意料的，新政府却没有实行攘夷路线而是采取了明确的门户开放路线。

1868 年 2 月 10 日，新政府发布告宣布与外国友好亲善。戊辰战争期间，日本各地都发生了与外国人的冲突事件。萨长的首脑知道攘夷不可行，已经开始自律。不过因多数人都认定萨长将会采取攘夷路线，所以对这一布告都深感意外¹¹。

随后，天皇又于 4 月 6 日发布《五条誓文》。其中第四条“破旧来之陋习，秉天地之公道”，意义虽然广泛，但主旨则是否定锁国、陋习，实行门户开放。

新政府进而一改各藩地方割据的制度，目标直指中央集权化。在函馆五稜郭陷落，戊辰战争结束后还不到一个月的时候，1869 年 7 月实行了版籍奉还，将藩主的行政权收归新政府。因原则上是把各藩主重新任命为知藩事，所以表面看起来并没有大的区别。但是，到了 1871 年 8 月，新政府厉行废藩置县，废除各藩行政而设县，行政官员由中央任命县知事担任。命原藩主移居东京。许多西方人都认为这是一场革命，一个奇迹。

此举之所以能够成功，是由于大部分藩已经陷入经济凋敝的状态。另外，在幕府的长期统治下，藩主与自身领地的关系，在很多藩中都已变得淡薄。没有中央集权就无法对抗外国的思想也广为接受。当然，即便如此，这依然是一个令人出乎意料的举动。福泽谕吉曾回忆道，自己与有志于洋学的好友大叫“得见此一盛事，死而不悔”的往事¹²。当然，对此反感的人也有很多。原萨摩藩事实上的藩主岛津久光，对废藩置县就颇为愤怒，不能饶恕西乡和大久保。

1871 年 12 月，新政府又派岩仓使节团赴欧美各国考察。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包括了半数政府首脑的使节团，断然实施了历时一年半的游历欧美之行。刚刚经历了革命之后的新政权，长期空巢而出，这应该是按常理所无法想象的。如此可见他们想看欧美

¹¹冈义武：《維新直後における尊攘運動の余炎》，载《岡義武著作集》第 6 卷，岩波书店，1993 年。

¹²福泽谕吉：《福翁百余话》，载庆应义塾编：《福泽谕吉全集》，第六卷，岩波书店，1959 年，第 419 页。

的迫切之情。

通过这次考察，他们切身感受到与西方文明的巨大差距，下定决心全力以赴追赶西方。同时他们还注意到富国要比强兵更为重要。

在完善国内体制方面，值得注目的是制订了征兵令。政府在 1872 年 12 月，发布征兵诏书，并于 1873 年 1 月制定征兵令，决定完备以普通国民为基础的军事力量。

虽然新政府的领导层是武士，而且也不需要那么多的兵力，但是实行了此决。制定此方针的，正是长州的大村益次郎。大村虽然在 1869 年底被暗杀，但其路线被长州的山县有朋所继承。大村益次郎原为乡村医生，山县有朋本是个下级武士，二人都曾参与过奇兵队，拥有作战经验。在长州他们了解到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武士居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意识高涨的普通老百姓却比较勇敢善战。

之后，政府进而开始废除武士的身份。支付武士的俸禄，已经成为政府财政的重负。首先于 1873 年，奖励秩禄（家禄和赏典禄）奉还，并向奉还的武士支付一部分现金和一部分公债。然后又于 1876 年 8 月，决定发行金禄公债，废除了家禄制度。其间，颁布废刀令，禁止带刀（1876 年 3 月）。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由此武士阶层的身份特权和经济特权都被废除。明治前半期，曾多次爆发动乱，考虑到由于实施这些急进政策引起动乱也非难以理解。反而让人感到如此情况居然都没能摇动新政府的基础。

如此，江户时代的这种封建领主割据，幕府位于其顶点的制度从根本上被改变了。首先，萨长打倒了幕府，由萨长的下级士族组成的官僚废除了包括萨长在内的藩，然后又自己废除了武士。这些变革，都是以天皇的名义来进行的。萨长官僚们并未利用藩的威望，而是充分利用了天皇的象征作用，推进了这次变革¹³。

就这样，当初高呼尊王攘夷而发起的运动，在新政府掌权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政府并没有尊重天皇的意见，攘夷也一变而为门户开放。但是可以这样将概念替换解读：尊王的象征不是尊敬天皇，而是中央集权；攘夷不是抨击排斥外国人，而是建设可与外国并立的国家¹⁴。这二者也是近代国家的内在和外在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明治维新首先应该是一场国家主义的革命¹⁵。

清朝自 1860 年缔结北京条约以后，也开始了变革。1861 年 3 月，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把长久以来的“夷务”也改为“洋务”。终于建立起总管外交的机构。

1861 年 11 月，同治帝即位，西太后和恭亲王掌握了实权。其间开始了改革运动。即同

¹³在日本的传统中，天皇是文治的象征，但是，在此，其作用则转向军事领导。之后，又作为大元帅被置于统帅权的中心位置。天皇象征的利用，在这一阶段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功，但是，后来当老谋深算的元老以及政治家逐渐从天皇周围消失时，成为军部滥用的对象，引发了严重问题。

¹⁴北冈伸一：《日本政治史：外交と権力》，放送大学出版協会，1989 年，第 32 页。

¹⁵一般认为，最早指出这一点的是冈义武：《明治維新と世界情勢》（1946 年）载《冈义武著作集》，第一卷。

治中兴、也叫洋务运动¹⁶。

同治中兴，意如“中体西用”字面所言，是在引进西方的近代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的同时，强调经世儒学的思想。从着手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起，曾国藩、李鸿章等在镇压叛乱方面广有功绩的官员们就开始接受欧洲的技术。尤其是，为了自己制造机械化的军备设施，以上海创办的江南制造总局为代表的武器制造工厂和造船厂纷纷在各地建设。除此之外，还新设了如电报局、造纸厂、制铁厂、轮船局、陆海军学校、西洋书籍翻译机构等。

他们的口号正是“中体西用”。这表明了将传统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作为主体，把西方的机械文明作为枝叶加以利用的态度。由于中国的国力远超日本，所以这些改革的规模巨大，时期也较明治维新要早。例如在日清战争（中国称为“甲午中日战争”--译者）以前，中国北洋舰队（北洋水师）的规模和水平都在日本海军之上，是亚洲当时最大的舰队。

尽管如此，洋务运动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成效。

原因之一应该是实行者的问题。洋务运动的中心并非设在北京的政府，而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中心人物——地方大员、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并且没有形成全国上下一体的运动。最初，这些企业都是半官半民官督商办，官方实行最小限度的监督，而由出资的商人掌握经营的实权。但是，因没有足以支持这些企业稳定的银行等机构，每当发生危机，官方的力量就被加强，逐渐使这些企业变成官员的私产。这也导致再无法筹措民间资金。

另一个原因在于“中体”的观念。作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官被派往英国的刘锡鸿，曾经对西方文明的丰富甚为惊叹。但是，他回国后却反对修建铁路。理由是，铁路建设会破坏墓地的风水等等¹⁷。总之，在中国，儒教可以说已经成了一个巨大障碍。

这与福泽谕吉形成很大的对照。福泽至少在明治初期就已经持有彻底排斥儒教伦理的观念了。因为福泽明白那是接受西方文明的巨大障碍，所以才全力抨击¹⁸。

第三节 日清修好条规的签订

对已经门户开放的清朝，日本也希望能与其开展贸易、建立邦交。如前文所述，幕府在1862年曾派千岁丸赴上海提议开展贸易。众所周知，高杉晋也在其中。

另一方面，中国人渡海来到日本的更多。其实在锁国时代，就有很多中国人航行来到长崎。开港后，支撑西方各国到日本来的还是中国商人。其中，有不法吸食鸦片者，需要加以取缔。另外，日本也希望能扩大对清贸易。

¹⁶关于洋务运动，日本方面比较详细的研究有铃木智夫的《洋務運動の研究》，汲古书院，1992年。

¹⁷ 菊池秀明：《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近代中国〈中国の歴史 第10巻〉》，讲谈社，2005年，第68—69页。

¹⁸但是，也不能说福泽从根本上就是反儒教的。从《文明论之概略》起，福泽就没有忘记对儒家的关心，从明治10年起，尽管他开始强调武士气质，但至少与儒教的关系是和睦的，并没有向功利主义一边倒。参见丸山真男：《福泽谕吉の儒教批判》（1942年）载丸山真男著：《福泽谕吉の哲学》，岩波书店，2001年；北冈伸一：《独立自尊：福泽谕吉の挑戦》，讲谈社，2002年。

1870年8月，日本政府派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到清朝。目的是协议通商以及为建立邦交作预备协商。当时的清朝，镇压太平天国已告一段落，同治中兴带来了暂时的小康。尤其是在外交关系方面，清朝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试图打破传统的外交关系，推行新的外交。

但是，柳原没有得到进京许可。9月，柳原在天津同李鸿章会谈，递交了外务卿给总理衙门的信函。信中对互为邻邦而无外交关系表示遗憾，提议近期应开始外交谈判，为此首先希望就通商事宜进行协商。

对此，总理衙门认为“大信不约”，答曰无需条约。但是柳原再三要求，李鸿章认为应该接受并将其意见上奏。总理衙门同意。按照总理衙门的说法，与西方各国交往而唯独拒绝日本违背了“一视同仁”的原则¹⁹。

但是，也有反对意见。安徽巡抚英翰就认为对外国新的通商要求不应许可而坚决反对。即外国乃犬羊之性，唯利是图、欺软怕硬，他们注视着中国的强弱，伺我疲弱之机为不逞之举。日本本为“臣服朝贡之国”，与缔结条约之国不同，如许可，则诸臣服之国会做出同样要求。日本昔日为倭，明代的倭寇更是不下于今日英法之患。因此，不可徒增忧患。与以下李鸿章的言论相比，这种说法错误既多，且陈旧不合乎时代。但当时持此种认识的人尚为数不少²⁰。

李鸿章没有采纳上述意见，他认为，日本自元代以来，不行朝贡，亦非中国属国，自清以来与中国一直维持着和平的关系。另外，日本已与西方诸国缔约谋求自强，“笼络之或为我用，拒绝之则必成我仇”，因此支持与日本缔约。还主张，日本距离中国较近，人员往来也比较多，缔约条约以后，为了加强管理在日中国人以及侦查日本的动静，应该派遣官员常驻东京或者长崎。^{21 22}

1871年9月，签订日清修好条规（在中国又称为《中日修好条规》-译者，下同）。该条规是被迫与欧美各国签下不平等条约的两个国家之间所缔结的平等条约。条规规定了两国互派外交使节与领事常驻各国，相互承认有限制的领事裁判权等，具有双边互惠的性质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该条规并不包含最惠国条款。这是清朝所注重的。曾国藩和李鸿章都支持与日本缔结条约，但是也都强烈反对在条规中加入最惠国条款。李鸿章认为，外国人进入中国内地通商是最大的弊害，加上日本人穷且贪、撒谎成性，与中国相近交通方便，相貌文字皆同，所以弊害必然更甚。为了堵住其在内地通商之道，李鸿章主张，绝对不可加入最惠国条款²³。

另外，该条约中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条。该条写着“两国既经通好，自必互相关切。若他

¹⁹坂野正高：《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岩波书店，1970年，第243—244页。

²⁰同上。

²¹同上。

²²李鸿章是最熟悉日本“自强”活动的人。比方说，他对从生麦事件发展到萨英战争的经过以及萨摩在萨英战争中的全力力战的情况，据说从《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上知道的。佐佐木扬：《清末中国における日本観と西洋観》，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第12页。

²³坂野正高：《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岩波书店，1970年，第246—247页。

国偶有不公及轻藐之事，一经知照，必须彼此相助，或从中善为调处，以敦友谊。”或许两国没有完全理解条约用语，但是这一款却包含了日中提携对抗第三国的可能性，因此也有可能引起西方列强的关注。事实上，英国和德国就表示了强烈质疑。

在日本，认为为了对抗西方势力有必要进行日清合作的人，当时确实为数不少。1875年2月，右大臣岩仓具视在奏折中指出，外国之中，最可怕的乃是俄国，若清朝为俄所吞并，则日本之独立亦岌岌可危，因此应与清国结亲善之交，互相帮助，以图“两立两全”。其后，1882年因壬午事变而日清关系紧张时，他还向外务卿井上馨上书，陈述：今日之亚洲，能保持独立者惟日清两国，若两国不互相提携相助，则“西力东渐”之势不可阻挡。这种思想也得到民间的广泛支持²⁴。

如前所述，最初日本请求缔结该条约时，李鸿章认为，由于日本不能单独抵抗欧美诸国，所以，清朝要援助日本，使欧美不能控制日本。可见，出于对欧美的戒备，主张日中相互合作，共同应对欧美各国的思想在两国都是存在的。

按照《日清修好条规》，两国开始交换并长期派驻外交使节。据王夔生统计，中国商人居于横浜者约有2000余人，居于神户者有数百人，居于长崎者有1000余人²⁵。李鸿章在1876年2月的奏折中指出，要警惕日本，即便是为了探明其情况，也需要派遣使节常驻。

1877年1月，清朝决定由翰林侍讲何如璋出任驻日公使、张斯桂任副职、黄遵宪任书记官。由于日本国内正处于西南战争时期，所以他们于12月才到任，略微推迟了些²⁶。

这应该是日中关系史上的重要一页。何如璋是个非常优秀的文人，很多日本的汉学家为此请求与其结交，在日本掀起了不小的热潮。

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80年）是一部共40卷的大作。书中称赞日本的进步神速，严厉批评了清朝对日本缺乏了解。何如璋命其属下黄遵宪起草并送给从朝鲜来日的修信使金弘集的著名的《朝鲜策略》（1880年8月2日），是一部分分析当时国际形势的杰作。

不过，他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如此。何如璋后来对日本的发展确实有了准确的认识，但在最初，他却有着轻视日本、过高评价本国的倾向。摆脱儒教式的中国式认识框架并非易事。这期间，日中两国之间，接二连三地发生了各种问题。

第四节 出兵台湾与琉球问题

1. 琉球归属问题

日清修好条规缔结之后不久，围绕领土问题日本与清朝陷入尖锐的对立中。

其一是冲绳·琉球问题。冲绳或琉球原本同属日清两国。其名称本身有两个起源。即冲绳（uchiina）是共享广义日文·假名文化的冲绳人，相对大和（yamato）时的自称。而琉球，

²⁴冈义武：《国民的独立と国家理性》，载《冈义武著作集》，第6卷，第248-250页。

²⁵王夔生（波多野干一、长野勋编译）：《日中外交六十年史》，（建设社，1933年。1987年，龙溪书舍复刻）第一卷，第168页。

²⁶张伟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国初代駐日公使団の異文化体験》，柏书房，1999年。

是 14 世纪明朝为对付倭寇敦促当时的中山王朝贡，作为回礼赐予的国号²⁷。

但是，自 17 世纪以来，实际控制琉球王国的是萨摩藩。也就是说，自 1609 年岛津家久征讨琉球以来，岛津氏就控制了琉球。但是与清朝的册封·朝贡关系相比有利于贸易，所以一直维持了这种关系，在风俗上也避免日本化，使琉球整体得以保持了自身的风俗习惯。清朝也知道琉球实际上处于萨摩藩的控制之下。如此，一直存在着较为复杂的国际关系。

然而，两属关系在西方近代国际关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冲绳/琉球只有成为清朝的一部分、或者成为日本的一部分，再者就是独立的三个选择。而独立则极有可能会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佩里舰队就曾途经冲绳与之缔结条约。在这之前英国、法国也都曾经来到琉球寻求贸易往来，试图以此作为向亚洲发展的跳板。日本的政策则是排除其他选择的可能性，明确使冲绳归属日本。

1871 年 8 月，明治政府断然实行废藩置县，将琉球置于鹿儿岛的管辖之下。之后又于 1872 年 1 月，派鹿儿岛县官奈良原繁等赴琉球告之本土的政治改革与岛治改革。

然而 1871 年 11 月，发生了漂至台湾的宫古八重山的 69 名渔民中有 54 名被杀的事件（3 名死于事故）。1872 年 6 月，从回来的 12 人口中得知这一事件的鹿儿岛县建议出兵罪。

日本政府慎重地讨论了处理办法，逐步累积起琉球确属日本的事实。1872 年 10 月，琉球国王尚泰被任命为琉球藩王，成为华族。即获得了与以前的大名同样的待遇。同月，日本政府从琉球接收外交权，把以前琉球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如 1854 年《琉美修好条约》）以及外交事务收归外务省管辖，并在那霸设置了外务省的办事处。另外对清朝实施隔年朝贡，对此清朝方面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然而 1873 年 3 月，又发生了漂流到台湾的 4 名小田县（现在的冈山县）民被抢劫的事件。于是日本政府派外务卿副岛种臣为特命全权大使赴清朝进行交涉。清朝以杀人者属“生蛮”，乃“化外之地”，为清朝政教所不及，不承认相关责任。

因此日本政府于 1874 年 2 月 6 日决定出兵台湾。任命中将西乡从道为实际主管（台湾事务都督）。但在欧美列强对此表现出批判态度之后，出兵一度被中止。然而西乡明确表态即使没有政府的同意也要出兵，所以政府决定再度出兵。5 月，西乡率军从长崎出发，征服了台湾原住民。

1873 年 10 月曾强烈反对征韩论的大久保决定出兵台湾，其最重要的理由就是畏惧萨摩动乱。早在 2 月 1 日，前任参议江藤新平掀起佐贺之乱。许多人认为此举若牵动萨摩，政府就会面临垮台的危机。通过出兵台湾，政府试图将萨摩士族对外扩张的力量转移至国外。事实上大部分进军台湾的士兵都来自萨摩，首领也是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从道。不过反对征韩论的另一位有力参议木户孝允则为反对出兵台湾而辞职。其二是因为考虑到出兵台湾同征韩相比，军事上的危险性要小。第三是因为考虑到清朝把台湾看作化外之地，不担负责任，因此或许可以得机对其主张领土主权。在这次出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美国人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就持这种意见²⁸。但是，大久保压制了这一论调，作为使琉球日本化的一环

²⁷ 平野聪：《大清帝国と中華の混迷》，讲谈社，2007 年，第 287 页。

²⁸ William L. Newman, *America Encounters Japan: From Perry to MacArthur*,

出兵台湾。

1874年10月，大久保到达北京，与清朝进行交涉。在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的斡旋下，清朝承认日本的出兵为“保民义举”，与日本达成协议支付抚恤金50万两(67万日元)。这表示清朝承认了琉球为日本的一部分。西方各国原以为日本的主张不会实现。然而看到这样的结果后，都认为是日本外交的胜利，高度评价了日本的外交手腕²⁹。而大久保原本是把让对方承认出兵的合理性作为交涉的重点，赔偿金打算日后再还给清朝³⁰。

负责交涉的大久保回国以后，于12月建议有必要将琉球完全编入日本领土中。因此当1875年3月波索纳德(Boissonade)(法国的法学家，曾任日本外务省顾问等职--译者)提议为了完善日本的统治权应废止琉清交往关系，7月，访问琉球的内务大丞松田道之就下令废止隔年朝贡、派遣庆贺使以及在福州的琉球馆。虽然琉球当局恳求继续朝贡，但没有获得日本政府的批准。于是琉球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清朝。

1877年2月琉球密使抵达福州，闽浙总督何环与福建巡抚丁日昌遂提出应保护琉球。1877年9月，李鸿章向驻清公使森有礼质问日本迫使琉球停止朝贡之事。这也是该年年末就任驻日首任公使的何如璋的第一个重要工作。

1878年5月，何如璋提出三个方案。第一、与日本交涉的同时，派军舰赴琉球追究朝贡终止之事。何将之视为上策，认为以强硬态度示日，日必慎重以对。第二，以理交涉，若日本不让步，承诺必将援助琉球抵抗日本的合并。若日本攻击琉球，则清出兵与琉球一同夹击日本。清必胜而和平可得。何认为这是中策。第三，反复以理交涉，或引用国际法请各国公使调处。日本自知要求无理，琉球或可存续³¹。

此时何如璋对日本评价尚低，认为日本政治不稳、经济贫弱、军备增强毫无成效、军舰虽称铁甲而实不过铁皮而已。但李鸿章则反对这种评价，认为日本军舰钢板厚度已达4寸，不可小觑。后来，有曾访问日清两国的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评价说，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及日本，由此可知李鸿章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对于一旦与日本交战必须负全责的李鸿章而言，倾向于慎重判断也并非不能理解。

1879年3月，日本断然实行废藩置县。接收首里城。4月，废除琉球藩，通告全国设置冲绳县。原藩王父子6月离开冲绳赴东京。

而此时，何如璋的意见也开始发生变化。他在1879年底的意见书中论述道，日本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陆海军训练的成果也逐渐显现，所以清朝即使远征琉球也很难取胜。琉球屡次派出使节秘密赴清请求援助，但清朝并无响应的迹象。

1879年7月，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在环游世界的途中路经中国访日。格兰特受清朝政要委托就琉球问题进行调停。格兰特劝告日本政府，相互让步以解决问题。

此时日本做出的提案，即1880年琉球分岛案。提案中，日本将琉球诸岛中的宫古、八重

Baltimore: M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3, ch. 9.

²⁹清泽渊：《外政家としての大久保利通》，岩波文库，1993年，原版1942年。

³⁰勝田政治：《〈政事家〉大久保利通》，讲谈社，2003年，第182—183页。

³¹张伟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国初代駐日公使団の異文化体験》，柏书房，1999年，第96页。

山两岛割让给清朝，作为补偿，要求以在试行期内修正或者追加日清修好条规的形式，获得与欧美人相同的在中国内陆的通商权。这被称为分岛改约或者是分岛增约。这一方案因清朝的断然拒绝最终没能实现。

如上所述，日本虽然慎重但非常坚决地推动了琉球处分。对此琉球虽然进行了抵抗，但是这种抵抗是以琉球的统治阶级为中心的，对民众而言，与萨摩控制的前近代相比，琉球处分显然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变化³²。而清朝则应对缓慢，逐渐接受了日本的主张。不过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则是直到甲午战争才得以完成。

另外，当时清朝洋务运动兴起，独立须自强的思想正广为传播。

第五节 朝鲜问题之起因³³

另一个大的问题是朝鲜问题。文禄·庆长之役（朝鲜称之为“壬辰倭乱”，在中国称为万历朝鲜之役——译者，下同）让日本与朝鲜一度绝交。德川家康寻求修复双方关系，朝鲜也做出回应，从1607年到1811年共向日本派遣了12次通信使。通信使在日本国内旅行到江户，其间与日本的学者文人相交。

不过，在外交方面，两国尚存在各种难题。朝鲜是中国的朝贡国，但日本却主张与中国平等。这就变成朝鲜国与德川将军平级，而德川将军之上的天皇与清朝皇帝平级，日本变成比朝鲜高一级别地位。但这对朝鲜而言应该是不能接受的。

负责这一艰难外交使命的，是对马的宗氏。宗氏一手承担对朝外交，通过不时地篡改国书等方法维持着日朝关系。宗氏在釜山还拥有跟长崎的出岛相当的草梁倭馆这一特殊区域。

然而幕府末年即1864年1月，朝鲜高宗即位，但是掌握实权的却是高宗的父亲——兴宣大院君（以下称大院君）。

大院君的政策，一言蔽之，是进行复古性质的改革³⁴。1865年朝鲜王宫景福宫的重建就是一例。景福宫自从在文禄·庆长之役中被烧毁，250年来一直保持着原样。大院君以正式王宫不能任其那样消失为由遂于1865年着手再建。

随之而来的是对外攘夷政策的强化。

先是俄国在得到沿海州以后，边境与朝鲜接壤，于是在1864和1865年两度访问国境上的町庆兴，要求进行贸易，都遭到了拒绝。

³² 关于“琉球处分”，有认为是侵略性统一的观点（如井上清），也有认为是近代性统一之一环节的观点（如下村富士男）。最早的琉球·冲绳研究专家伊波普猷，将“琉球处分”大体定性为“解放”，指出“琉球处分，虽然使所谓的琉球王国灭亡了，但琉球民族加入了日本帝国之中从而得以复活”（我部政夫：《明治国家と冲縄》，三一书房，1979年，第一章）。还需指出的是，在琉球处分中，没有发生将民众卷入其中的大规模的抵抗，以及由此而发生的流血镇压。

³³ 关于日朝以及日韩关系的研究，田保桥浩的《近代日鮮關係の研究》，朝鲜总督府中正院，1940年，依然很重要。还可参照彭泽周：《明治初期日韓清關係の研究》，塙书房，1969年。

³⁴ 木村幹：《高宗·闵妃》，ミネルヴァ书房，2007年，第48页。

1866年，大院君镇压基督教，数千人受到迫害，9名外国传教士被处以死刑。因首要人物是法国人，所以法国于1866年10月派舰队登陆江华岛，攻陷江华府。但是由于兵力及补给不足，法军于11月撤退。朝鲜取得了胜利（丙寅洋扰）。

在此之前，1866年美国商船谢曼号为寻求贸易，沿大同江向平壤上溯航行途中触礁被烧。为追究此事，1871年5月美国舰队进攻朝鲜，并在江华岛登陆。但是江华岛的防备已加强，美国占领江华岛不成，只好撤退（辛未洋扰）。

就这样，在中国和日本接受门户开放的同时，朝鲜断然施行了攘夷政策，并在短期内取得成功。但是，维持攘夷需要巨大的费用，并不能够长久坚持，反而更加大了西方列强大规模介入的可能性。

1869年1月，明治政府命对马藩主宗义达通知朝鲜政府日本已实行王政复古。但是，朝鲜政府以该通告中带有“皇”、“勅”等只有中国皇帝才可使用的称谓，拒绝受理。

日本政府将对韩交涉移交外务省，1870年派遣佐田素一郎、森山茂去探明情况。又于同年10月派吉冈弘毅、森山茂等前往递交外务卿书函，遭到拒绝。

废藩置县后，宗氏被废，新政府为与朝鲜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决定派遣外务省外交官驻扎倭馆。

1872年9月，外务大丞花房义质率军舰春日号来到韩国，接收了草梁倭馆。对此，韩国拒绝提供食物给草梁倭馆，并在馆前张贴布告侮辱日本为“无法之国”。

这种情况下，所谓“征韩论”在日本国内开始高涨。内容各式各样，从出兵以惩罚其无礼，到派遣特使不惜武力进行强硬交涉都有。但派遣特使是其最大公约数，其于1873年8月在政府内部被决定下来。由于事态重大，本来决定等当时身在国外游历的岩仓大使等回国后再做正式决定。10月14、15日，征韩论在内阁会议上被讨论。但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由于过于烦闷突发急病，由岩仓具视代理再次进行讨论，最终决定停止征韩。尽管支持征韩的参议占多数，反对的参议人数很少，但还是做出了这一决定。

日本国内秩序的不稳定是征韩论最重要的一个背景。从攘夷到门户开放的转变、藩的废除以及其他许多的改革，都积蓄了很多不满，形势一触即发。当时认为对外冒险可以使这些不满得以一时释放。

江华岛事件与日朝修好条规

征韩论政变两个月后，朝鲜以李太王亲政为名停止了大院君的执政，由王妃闵妃一族掌握政权。大院君的攘夷政策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动摇了国政。在新政权统治下，顽固的对日政策也终于出现了发生变化的可能。

1874年5月，日本的大久保政权断然出兵台湾。8月，清朝向朝鲜京城派遣使臣，警告朝鲜要提防日本征台之后可能的征韩动向。朝鲜政府很重视这一事态，更换了对日政策负责人员，并准备改变政策。

自1874年9月开始，朝鲜方面开始与从6月就一直呆在草梁倭馆里的日本外务省官员森山茂接触，开始协商恢复两国邦交事宜。这是明治政府与朝鲜政府官员间的首次接触。

但是由于两国交涉触礁，森山提议以测量为名派日本军舰进行威吓。1875年，日本军舰云扬号等被派到朝鲜东岸进行测绘，其后又在西岸进行测量活动。9月，驶近江华岛以诱使朝鲜方面开炮射击，接着展开报复性攻击。

此时波索纳德（Boissonade）在意见书中以“朝鲜并非完全臣属于支那，亦非完全独立之国。而处于一个中间位置”派使节向朝鲜问罪，但是在此之前首先向清朝派去使节，表明要尽量将朝鲜作为独立国来处理的方针。

同年11月，森有礼被派任北京公使。12月9日森有礼到达北京，10日至总理衙门访问恭亲王开始交涉。当时清朝答复：“朝鲜虽隶中国藩服，其本处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该国自行专主，中国从不与闻。今日本国欲与朝鲜修好，亦当由朝鲜自行主持。”于是日本将其理解为清朝承认朝鲜为独立国，以此判断与朝鲜的交涉可以在不与清朝协商的情况下，在日朝关系的范畴内处理。清朝注意到这次失言，做出说明：“高丽属于中国几千年，何人不知？”³⁵就这一点，王夔生谴责道：“其后朝鲜问题一切纠纷皆此一语所祸。不谨慎一语可谓贻祸甚深”。

1875年12月，日本派黑田清隆作为特命全权办理大臣出使朝鲜。交涉曾一度进展困难，一时之间日本国内甚至开战言论喧嚣，但1876年2月27日，缔结了日朝修好条规。第一款内容即是：“朝鲜国自主之邦，保有与日本国平等之权。”但是在条规的后半段内容中，却含有朝鲜承认日本的领事裁判权并否定自己的关税自主权等典型的不平等条约的条款。这是为了切断朝鲜跟清朝的宗属关系。

但是，这还不是与清朝立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矛盾。清朝担心日朝的对立会引发战争，劝告朝鲜要采取灵活的姿态。这样，日朝、日清、清朝关系在刚好能够互相妥协的地方得以成立³⁶。

壬午事变

但这种平衡很快就开始崩溃了。1879年3月的琉球处分，成为打破这一平衡的契机。

1879年7月，李鸿章致信朝鲜高官李裕元，建议为了牵制日本而对列强门户开放。并同时建议加强其对清朝的依赖。同年9月，驻日公使何如璋向正在日本访问的金弘集递交了由黄遵宪起草的《朝鲜策略》。《朝鲜策略》将俄国视为最大的威胁，提议朝鲜应该“亲”清、“结”日、“联”美——西方列强中最友好的国家。两者意见存在着非常有趣的共通点和差异。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如何看待日本问题上。

1881年2月，朝鲜问题被规定不再由一直负责处理属国问题的礼部，而由北洋大臣和驻日公使分别与朝鲜直接进行协商。于是，李鸿章所劝之与西方各国的缔约，首先以美国为对象展开了。朝鲜的条约草案在与清朝协商以后，从1882年4月开始与美国海军准将舒菲尔特、驻清临时代理公使赫尔克姆在天津举行磋商。这一事实本身，是与朝鲜的“独立”不相符的。

³⁵王夔生（波多野干一、长野勋编译）：《日中外交六十年史》，（建设社，1933年。1987年，龙溪书舍复刻）第一卷，第128页。

³⁶冈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間：近代清韓關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第33页。

况且草案中插入了一条意为“朝鲜为中国的属邦”的条款内容。最终美国没有接受这一条款，因此这句话成为给美国总统亲笔信中的内容。尽管如此，清朝的意图已经很明确了。

1882年9月，缔结了对清朝贸易商人极其有利的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虽然该章程是在壬午事变之后签约的，但具体着手准备则是在此之前。章程明确规定不能给予其它条约国最惠国待遇。宗主国清朝的地位与他国不同，即朝鲜的从属地位用其它措词来进行了表述。另外，相关改订则由北洋大臣与朝鲜国王进行交涉，并在获得清朝皇帝许可后实行。在这里，李鸿章变得与朝鲜国王处于同等地位。接着，李鸿章将其心腹袁世凯派到朝鲜。

清朝是为了把对朝鲜的控制权落实。但是，双方交涉之中，李鸿章的部下马建忠发现，朝鲜变得比较自主，已经不再从属于清朝³⁷。而日本的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

也就是说1877年日本派花房义质担任公使，说服了朝鲜加强与日本的往来。1881年，高宗决定向日、清两国派遣留学生。并再度派金弘集作为修信使出使日本。同年5月，朝鲜王朝决定聘请日本公使馆武官堀本礼造为军队教官。这支被称为别枝队的军队由两个班共80名子弟组成。

1882年7月23日，朝鲜旧军队的士兵反抗政府，举行大规模的暴动。这就是壬午事变又称壬午军乱。事件的直接起因是军队的不满。与拥有新式装备的别枝队相比，旧军队的待遇明显差很多，且13个月没有发给军饷。

先前因闵妃政权而被迫隐退的大院君认为这是重掌政权的良机，于是利用此次军乱，再度执政。

军乱中，士兵们杀害了日本教官，并袭击了日本公使馆。花房公使从朝鲜京城艰难脱身，逃到仁川。26日，被英国船救助，终于回到日本。这次事件有极大可能动摇日朝关系。

获悉此事的清朝，及早便介入其中。8月4日派出三艘军舰，8月13日又决定派遣陆军。派遣军队人数多达数千人。26日将本次事件的中心人物大院君逮捕并送往天津。

这一举动与以往的宗藩关系做法明显不同。清朝向更为直接地统治朝鲜的方向转换了政策。

这对日本来说可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状态。日本希望是将朝鲜与清朝分离，使其成为独立的国家，进而强化日本的影响；而清朝则通过将从属关系实质化希望强化自己的影响力。在日清两国的对立中，清朝的力量却得以加强。

最终，缔结了济物浦条约。从而日本拥有在朝鲜京城的驻兵权。而清朝也派兵驻扎，两国在京城形成对峙局面。

甲申事变

壬午事变虽然从朝鲜除掉了排日巨头大院君，但是，清朝的影响力也得以加强。在朝鲜内部，重视与清朝关系的事大党与亲日以实现近代化的独立党之间对立起来。

日本的评论家，同时与朝鲜问题关系密切的是福泽谕吉。1881年，朝鲜留学生开始来到福泽的庆应义塾。金玉均就是其中之一。对福泽而言，为打破锁国枷锁前来留学的这些学生，

³⁷ 同上，第69页。

宛如 20 年前自己的身影。通过与他们的交往，福泽开始深刻关注朝鲜问题，对这些近代化派，给予了超出政府政策范围的支援。1882 年，壬午事变发生，对此福泽进行了自我批判，认为自己以前没有充分主张增强军备是个错误，开始主张增强军备不可避免。

这些独立党期待日本的支持而发动的军事政变就是甲申事变。1884 年 12 月 4 日，认为清朝正因中法战争无力东顾的独立党成员金玉均、朴泳孝、洪英植等在竹添进一郎公使的支持下，发动了武装政变。

高宗曾一度接受了独立党的运动，政变似乎已经成功。但是事大党立刻向清军求助转而进行反击，兵力处于劣势的独立党和日本军战败。金玉均、朴泳孝等人逃亡日本。当时北洋舰队拥有压倒日本的实力，清朝陆军也有 3000 人，这相当于日本的十倍。

1885 年 1 月 9 日，缔结汉城条约。各方达成协议：不问事变责任与否，朝鲜向日本谢罪、赔偿 11 万日元给日本受害者、并支付 2 万日元用于重建被烧毁的公使馆等。尽管事件与日本有牵连，但可以说其解决方式却对日本十分有利，原因就在于事件被当作朝鲜内政问题来处理的³⁸。

接着又签订了天津条约。因为在事变过程中，清军曾向日本公使开枪，并在战斗中造成了日本人的伤亡等问题。虽然谈判进行得很艰难，但在英国公使巴夏礼（Parkes）的调停下，4 月 18 日，伊藤博文与李鸿章在天津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两国军队在 4 个月以内撤退、双方都不派遣军事教官、如将来发生内乱则须相互行文通知（行文知照）等。并认定了清军一方在事件中曾有过一些疏忽的行为。这也是超出人们想象的对日方有利的内容。这是正与法国交战的李鸿章妥协的结果。而日本方面，只要面子上过得去，也没有打算继续与清朝对立。

但是无论如何，甲申事变明显是独立党、亲日派的失败。福泽谕吉的《脱亚论》写于 1885 年 3 月，即甲申事变结束，天津条约谈判开始之前。文中，福泽认为应当拒绝与“东洋之恶友”的交往，不应“因邻国”而特别对待，应进行一般性交往。这是一篇很短的评论，脱亚一词除标题以外没有再使用，当时也没有引起关注。这篇文章是一直以来对朝鲜学生庇护有加的福泽谕吉对由亲日派所进行的朝鲜改革失败了告白，并非主张实行较为强硬的亚洲外交。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其后日朝合作、日清合作等要素不再被重视。从明治初期就存在的日清或者日清韩合作论的大前提，是在朝鲜和清朝里有希望与日本合作的势力的存在。但是，这种想法显然是错误的。在朝鲜，日本与清朝尖锐对立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事实。

但是，认为日清从此走向 1894 年的甲午战争尚显轻率。朝鲜内部有一股反对清朝介入的力量。为了抑制清朝的影响力高宗转而亲俄。英国不满俄国的介入，于 1885 年 3 月出兵占领了巨文岛。对此俄国也发声明表示对抗，李鸿章费尽心思进行斡旋，最后两国达成一致，双方都妥协表示不占领朝鲜的领土。使英国于 1887 年撤出巨文岛。围绕朝鲜的国际关系复杂，日本还必须防备俄国，所以对清朝的报复和较量并没有成为当时外交路线的中心³⁹。

³⁸木村幹：《高宗·闵妃》，ミネルヴァ书房，2007 年，第 175 页。

³⁹高桥秀直：《日清戦争への道》，东京创元社，1995 年，第 186—200 页。

但是军力的增强也并没有得到迅速发展。对 1880 年代的日本而言，军备扩张确实是个重要的课题，这与以上所述之朝鲜的局势有关。实际上，到 1882 年为止，日本的军费预算都未达到全部预算的 20%，但是从 1883 年开始高于这一比例。其中心内容就是增强海军力量。这是因为许多人认为当时最为迫切的是发展能够与北洋海军相抗衡的海军力量。不过，由于财政方面不能允许持续这种军扩，1885 年，尽管日本在甲申事变中失败，而清朝又增加了当时最先进的两艘战舰（定远、镇远），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还是修改了军事扩张的路线⁴⁰。1885 年，陆军修订了镇台条例，1888 年又废除镇台制而引入师团制，但是当时的军队还不具备可以进行大陆作战的实力。在训练方面，也多以击退敌方登陆的训练为主⁴¹。

1885 年日本内阁制度成立时，日本的对朝鲜政策，是依据与清英协调让朝鲜中立的路线占有优势。与此相对应，军备扩张可以说是较为稳健的。虽然在当时也存在叫嚣快速扩张军备以及主张与清一决高下的力量，但他们并不在政府的中心⁴²。

结语

中江兆民 1887 年出版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作为近代日本政治论、外交论的经典广为人知。其中登场的三个人物是洋学绅士君、豪杰君、南海先生。洋学绅士主张积极接受民主政治，在对外政策上，他认为不管怎么努力都不可能追上西方诸国，反而不如在争取世界舆论的支持下，采取非武装政策。而豪杰君则认为世界的发展趋势乃弱肉强食，日本若维持目前状态则将成为列强饵食。不能单独对抗西方列强的日本，应该割占近邻之老大国。

文中最后发言的是南海先生。南海先生认为洋学绅士与豪杰君都有一个共同的不足，即“过虑”。世界既不是如同洋学绅士所言的理想主义式的发展，也并非绅士君所言的单凭武力取胜的情况。并且，日本也并非那么弱小无力。对日本而言，稳健、渐进地推进民主化，在外交上和周边国家深化友谊，具备不能轻易就被人侵犯的军备则是可行的。

可以认为此三人都是中江兆民的化身。中江兆民既考虑到了如绅士君主张的民主化，也考虑到了豪杰君路线的可能性。但是，最终他还是认为只有南海先生的政策是可行的。这也是明治 20 年那个时代的日本民众最为支持的意见。在 19 世纪后半期，采取绅士君所述的路线首先是不可能的。因此，选择只有在豪杰君和南海先生之间择其一。换言之，日本的前途以及日中关系的未来在那时并不确定，而是取决于其后的日、中两国各自不同的政策、以及西方诸国的政策。这就是明治 20 年，日本在朝鲜半岛战败后、国内走向设立议会这一时刻的姿态。

⁴⁰ 同上，第 208—212 页。

⁴¹ 户部良一：《逆説の軍隊〈日本の近代 9〉》，中央公论新社，1998 年，第 107—114 页。

⁴² 包括朝鲜中立计划在内的日本各项朝鲜政策、军备政策，参见大泽博明：《近代日本の東アジア政策と軍事》，成文堂，2001 年。

日清战争（在中国称为甲午战争—译者，下同）与下关条约（在中国称为马关条约—译者，下同）、三国干涉还辽、日本留学热及近代日本文化对中国的影响、义和团事件与八国联军、日俄战争、辛亥革命

从日清战争到辛亥革命这一时期，既是日中关系极为紧密的时代，又是拥有共同经历的时代，同时也是发生转折的时代。但这一转折并不是即刻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战争相连而发生变化，依然是一个蕴藏着多种可能性的时期。

首先，笔者想就这一时期日中关系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构筑了极为紧密的关系方面加以说明。这段时期，两国直接的人员交流激增，而且清朝的王族和高层官员、留学生大量到访日本，甚且，东京还成为在中国无法进行的革命运动或立宪运动等政治活动的场所。另外，中国正式开始近代化国家的建设，在认识并参考明治维新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各项制度的改革等，日中双方同时在体验近代国家的建设，并一起参与海牙保和会等，作为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社会成员之一构筑起了对外关系。日中两国通过“近代”而被连结，在接受西方文明、国家建设，以及民族主义、形成自我认同等层面上拥有相同经历，也孕育了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

其次，本文将就近代日中两国之间关系的转折来加以分析。第一，两国体验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其结果是，两国关系从基于日清修好条规（在中国称为中日修好条规—译者，下同）的平等关系，变成处于以下关条约为依据的对日本有利的不平等条约体制之下。第二，日本作为列强之一，参与到了围绕着中国的国际政治之中。在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中，日本称为一个晚到的列强。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的基本架构，包括 1858 年的天津条约、1901 年的北京议定书（在中国称为辛丑和约—译者，下同）、1921 年的九国公约，日本是从 1901 年的北京议定书才开始加入的。第三，日清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其后于 1910 年日韩合并，日本成为拥有殖民地的帝国。其结果是，与台湾与中国、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一样，两国之间还滋生出了关东军驻扎的旅顺、大连等日本租借地及各地的日本租界与中国的关系，日中关系不再是简单的东京和北京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多元的日中关系。

在本章讨论的从日清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时期，既是日中两国关系走向多元化、紧密化的时期，同时又是政治外交关系多元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开始出现敌对局面的时期。但是，这种敌对关系并非决定性的存在，不容忽视的是，这是一个不论是两国各自的未来，还是日中关系，都还存有各种可供选择的时期¹。

1. 围绕朝鲜半岛的对立与日清战争

■围绕朝鲜半岛的日中对立 19 世纪下半叶，在日中两国各自向着近代国家变迁的过程之中，

¹ 川岛真：《關係緊密化と対立の原型—日清戦争後から二十一カ条要求まで》，载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编著《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东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

两国划定了国界。日本试图画出比旧有的幕藩体制下的国家更为扩大的国境线，将冲绳和北海道也编入了都道府县中。相比而言，中国并非扩张型，而是在既有省份的基础上在新疆等藩部和台湾等边缘地区设省，以此来确立国土²。日中关系从琉球桥梁关系及因长崎贸易所形成的互市关系，转变成通过日清修好条规而形成的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在东亚向主权国家关系演变过程中，日本否定了琉球的外交权，把琉球与中国的关系，作为日中关系的一环来看待。

在此情况下，中国基本上是在继续维持着与周边各国原有的册封和进贡的关系的同时，病将其在对西方诸国及日本的各种关系中来加以调整和改变。虽然在以琉球为首的、基于册封和进贡关系的周边各国与中国中止了此种关系，但朝鲜与中国却仍维持着这种关系。正是朝鲜成为东亚的国际政治、日中关系的最大焦点。1876年，日本以不平等条约的日朝修好条规迫使朝鲜打开国门，但此事并没能立即改变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另外，从1880年清朝驻日公使馆参赞官黄遵宪的《朝鲜策略》中所提及的“亲清、结日、联美”之阐述可知，中国并不忌讳朝鲜“开国”³。中国对朝鲜的基本态度是“既为属国，也有自主”的双重标准。一方面，中国与朝鲜之间维持着宗属关系，另一方面，朝鲜作为自主之国可与外国建立对外关系⁴。对于这样的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英国等国并非一直持否定态度，但是，日本批判这样的关系，在要求朝鲜“独立”的同时，也致力于在朝鲜内部培养亲日派势力。

朝鲜国王高宗的外戚闵妃一族力图与日本保持亲密关系，而支持反对闵妃一族的大院君的势力，于1882年发动叛乱(壬午事变)。此次叛乱虽然归于失败，却推动了闵妃势力与中国的合作。同年，缔结了中朝水陆贸易章程，使中朝贸易制度化，其后在朝鲜半岛也开设了中国的租界。1884年，金玉均等人的独立党依仗日本而发起武装政变，被袁世凯率领驰援的中国军队所镇压(甲申事变)。1885年，日中两国缔结天津条约，从而撤军，且约定以后出兵之际则需双方互相通告。在朝鲜问题上，中国占有优势，将被软禁的大院君带回朝鲜的袁世凯，以通商大臣暨朝鲜总督的身份，取得了对朝鲜的内外政策，比以前更大的影响力⁵。

后来，在说明日本侵略亚洲的脉络上著名的脱亚论，于1885年刊载在对朝鲜政策立场较为强硬的《时事新报》上。但是，最近的研究说明了当时福泽谕吉的言论并未特别受到重视⁶。而且，在日中韩关系上，中国占有军事上的优势，1886年发生的长崎清朝水兵事件等事，在日本将此视为中国军备扩张的威胁，但是并未立刻引起两国的对立，日中之间还进行了海軍军舰交流等，避免了直接冲突⁷。

■从日清战争爆发到议和 1894年，在朝鲜半岛发生了以农民为主的东学党之乱，中国应朝鲜的要求而派兵，并基于天津条约通知日本，因此日本方面也派了兵。随着两国的派兵，朝

² 茂木敏夫：《変容する近代東アジアの国際秩序》、山川出版社，1997年。

³ 关于《朝鲜策略》的言论，与以俄国为威胁的对外观，和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的围绕琉球问题的对日强硬论调相关。关于《朝鲜策略》的内容，可以参考平野健一郎：《黄遵宪“朝鲜策略”異本校合》，载《国際政治》129号〈国際政治と文化研究〉，2002年。

⁴ 冈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ー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

⁵ 田保桥浩：《近代日支鮮關係の研究ー天津条約より日支開戦に至る》京城帝国大学，1930年；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年。

⁶ 远山茂树：《日清戦争と福沢諭吉》，载《福沢研究》6号、1951年11月；平山洋：《福沢諭吉の眞実》文艺春秋社，2004年；酒井哲哉：《近代日本の国際秩序論》岩波书店，2007年11月。

⁷ 1891年军舰交流之时，采取了不让船员上陆等措施，日中双方努力防范骚扰发生。《在京清国全權公使李經方丁憂帰国ニ付汪鳳藻臨時代理公使任命并清国北洋水師ニ於テ我國艦隊ヲ優待セントスル挙アル件》，载《公文類纂》明治二十四年第九卷。

鲜政府与叛乱势力和解，两国军队已无镇压叛乱的必要，朝鲜要求两国撤军。但是，日本方面提出了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对此，朝鲜和中国均反对，因日本政府为了在朝鲜成立亲日政权等这些作为，激化了日中两国的对立，7月25日展开了丰岛海战等，自7月底开始便进入了交战状态，8月1日两国宣战。其间，日本于1894年7月16日缔结日英通商航海条约，成功废除领事裁判权(1899年生效)，关于朝鲜派兵，日本也从英国得到了实质上的支持⁸。

开战之后，在日本国内，议会也同意与战争相关的预算和法案，将相当于国家年度财政收入两倍以上经费投到战争上。战局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日本将中国军队驱逐出朝鲜半岛的同时，还占领了辽东半岛和北洋海军根据地的威海卫。另外，向台湾方面派兵，这并非战争一开始时的计划，而是在战局趋向于有利情况下所采取，并于讲和交涉开始之后得以进展的行动。1895年3月26日，日军占领澎湖，把割让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讲和的条件。

1895年4月，日中两国全权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和李鸿章签订了下关条约。其结果是，中国承认朝鲜的独立自主，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支付赔偿金2亿两，并约定开放苏州、杭州等四个港口。同时，根据第六条第四项，认可外国企业在通商口岸和市场经营工厂。带来了外国企业积极对华投资的结果(最初是以英国的棉纺织业为主)。日本获得与在中国的列强相同的特权，由此，日中关系变为基于不平等条约下的关系。

日本虽然成为战胜国，却并没能直接享受其战果。特别是关于辽东半岛，李鸿章从曾任驻华德国公使的巴兰德(Max von Brandt)处得知有干涉日本的可能性之后，才在条约上签了字⁹。中国的地方大吏也有要求归还辽东的论调，认为：“辽东半岛不可弃，无辽东半岛则无东三省，无东三省则无我王朝”。另外，驻俄公使许景澄也积极鼓动俄国方面¹⁰。实际上，俄、德、法三国于1895年4月23日对此进行了干涉，日本于5月8日表示接受，由中国方面向日本支付了三千万两的报酬。包括战争赔偿金在内日本得到的金额共为二亿三千万两(约合日币三亿五千六百万两)，并把这些作为赔偿金特别经费，用于军备扩张费用等方面，也成为金本位制和产业发展的基础。除三国干涉之外，关于因苏州、杭州等通商口岸的开放而要求设置的日本租界，经与中国方面的黄遵宪等交涉的结果，被设置在了较偏僻的地方，实际上并未成为日本商业据点¹¹。

另一方面，中国丧失了主要的朝贡国朝鲜，失去了所谓“属国与自主”双重标准中的对外关系之标准。同时，中国为了筹集军费和赔偿金，向列强借了许多贷款，给此后的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在朝鲜半岛上，中国的影响力受到了限制，1897年大韩帝国成立。并且，由于1899年缔结了(原则上)平等的清韩修好通商条规，因此就使与朝鲜也缔结了不平等条约的日本占有优势的国际关系得以形成(在朝鲜中国租界等仍得以维持)。

■日中两国围绕日清战争的定位的讨论

关于如何理解日本干涉朝鲜以及其后走上日清战争过程这一点，在日本学界中也存有分

⁸ 在美国驻华公使田贝(Denby Charles)的回忆中叙述到“日清间的战争，就连一开始持敌对态度的日本方面也绝非基于确定的判断来挑起战事的。当然，清朝是连想也没想到会与日本发生战争。清朝处于妄自尊大的位置上，根本没想过“倭人”竟然会大胆地攻击过来”。提示了对于战争必然性的怀疑。Denby, Charles, *China and her People: Being the Observations, Reminiscences, and Conclusions of an American Diplomat*. Vol.I; pp.122-126, L.C. Page & Co.,1906.

⁹ 坂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东京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414页。

¹⁰ 《江督刘坤一奏请饬密商俄国促日还辽予以新疆数城为谢片》，载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六日《清季外交史料》一一五卷，二一，关于许公使的动向，参考许同莘：《许文肃公(景澄)遗集》，民国七年铅印版。

¹¹ 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租界 重慶・漢口・杭州・上海》，御茶之水书房，2006年。

歧¹²。一般的说法是，到日清战争为止的日本，只能在要么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要么沦为殖民地的二者中选一，因此，其结果也就是不得不选择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也是日本一直将侵略朝鲜、对华战争作为目标的见解。最近加强此项见解的研究成果是齐藤圣二的《日清戦争の軍事戦略》（芙蓉书房出版，2003年）。另一方面，高桥秀直的《日清戦争への道》（东京创元社，1995年）认为从松方通缩期到初期议会时期的明治政府实行的是“小政府”路线，缺少明确的朝鲜政策。这是表明日本还有选择第三条道路的能性的见解，这个方向性抑制了日本的对朝鲜政策（财政方面及军事上的准备不足）¹³。另外，大泽博明的《近代日本の東アジア政策と軍事》（成文堂，2001年），则对上述的一般见解持批判的态度。

在中国，将明治以来日本的对外侵略统统视作违反国际公法，也有不少批评陆奥宗光的言行的论著。关于开战时间，连同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一起，中塚明的向于7月23日日本占领朝鲜王宫的论点，获得的肯定评价则较多。藏于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由参谋本部编写的《日清战争史》草案是中塚使用过的，在中国也翻译了此草案，依据此项史料的文献，和将其作为日本自明治以来就持有侵略中国意图的证据而进行的论文也开始出现。同时，关于日本获得的赔偿，有分析认为不止于赔偿金二亿两、辽东半岛归还报酬金三千万两、威海卫占领费一百五十万两这个数目、再加上日本所掠夺的舰船、机器等，达到了三亿四千万两的观点也出现了。

关于日清战争时期的中国与朝鲜之关系，在日本有冈本隆司的《属国と自主のあいだ》（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在中国也有关注中朝关系的王如绘的《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年）和《甲午战争与朝鲜》（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等著作，着眼于中朝关系的问题点、从朝鲜来看中国方面的问题点等，显示了中国的新的日清战争研究的取向。但是，关于日清开战，并未采用1894年7月23日的说法。

关于日本是在何时就开始打算与清朝开战并正式对此进行准备的问题，仍然是一个焦点所在。日本方面的讨论综合地参考了陆海军各自的动向、并结合与议会的关系等论调等，相对于此，在中国的论调中，认为自明治元年以来日本存有一贯的“大陆政策”，而关于日清战争则关注山县有朋、认为日本从较早时期便开始准备对中国战争、走上军扩路线等的见解相当突出。在日本，也存在诸如山田朗的《軍備拡張の近代史—日本軍の膨張と崩壊—》（吉川弘文馆，1997年）那样关注天皇军队的创设与1888年采用陆军师团制的见解，但是，更应该注意的是，1889年第一次帝国议会中山县总理的“主权线、利益线”演说等所揭示的路线，从1891年开始的作为军扩路线而付诸实行之事。此次的扩张军备，虽然在议会上也引起争议，却因当年的天津事件和俄国舰队来到长崎等事件使海军的扩张正当化，1893年2月10日的建舰诏书更进一步推进了海军的扩张。加上还有1893年山县有朋的《军备意见书》，主张在财政上可以负担之时应该扩张陆海军备的气氛和走扩军路线之主张也随其高涨起来。

¹² 参考佐佐木杨：《最近10年間の中国における日清戦争史研究》，载《東アジア近代史》第11号，2008年3月。

¹³ 也有反对高桥见解的意见。例如神山恒雄从财政史的观点，主张松方通缩期绝不存在小政府的讨论（神山恒雄：《明治経済政策史の研究》，塙书房，1995年）。但是，在政策层面上，积极地推进朝鲜政策的倾向并不具有连续性。

2. 义和团事件与围绕中国国际政治的变迁

■日清战后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 日清战争后，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发生了几个巨大的变化。第一，日清战争后，以李鸿章为首的中国领导阶层与俄国的接近。1896年3月，作为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仪式的贺使而被派遣到圣彼得堡的李鸿章，缔结了中俄密约¹⁴。此约约定给予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的铁路建设权和经营权，但是约中第一条记载“日本国如侵占俄国在亚洲的东方领土，或中国领土，或朝鲜领土，应立即照此约办理。如有此事，两国约明，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至军火、粮食，亦尽力互相接济”，这是一个以日本为假想敌的军事同盟条约¹⁵。但是，日清战争后，日本方面并没有立即侵略中国的意图¹⁶。

第二，由外国资金所主导的铁路建设更加活跃，加上矿山的开采权益等，发展成划定势力范围的局面。这些动向由英、俄、法、德等主导，没有充分的力量对华进行投资的日本，在这方面的参与是有限的。但是，关于划定势力范围方面，日本也在1898年4月与中国缔结不割让福建省的换文，将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划为其势力范围。

第三，与租界不同，出让主权形式的租借地，主要是因军事目的而在中国沿岸各地相继设立。1898年3月，自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开始，其后旅顺和大连(俄国)、威海卫(英国)等也陆续成为租借地。日本并未参与争夺租借地的竞争，但随后因日俄战争而从俄国取得旅顺和大连租借地，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攻击、占领了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

第四，美国开始积极展开对华政策。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获胜的美国，占有了菲律宾、关岛，合并了有许多华人移民的夏威夷，在菲律宾、夏威夷也开始应用限制中国人移民的《排华法》。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向英、法、俄、德、意、日各国发布门户开放宣言。这是为了使在各国划定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中有效执行中国的关税税率，并且不妨碍各国经济活动的宣言。这不仅对作为迟到帝国的美国来说是有利的内容，对俄国租借大连持戒备心理的英国来说，也是可以接受的内容，各国原则上对美国的宣言都做了响应¹⁷。对中国而言，美国作为未持有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帝国而出现之事，不管在当时和在历史上都是具有很大的意义(其实美国曾经试图在福建省开设租界，但后来放弃了)。此后，在原则上，美国提倡维持中国主权与统一，通过文化交流等方式，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界带来了很强的影响力。另外，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都是因美国的周旋而达成议和的，这也是值得注意之事。

■戊戌变法与日本 在下关条约的交涉过程中，可以看到如康有为等人第二次上书中拒绝议和的请求，同时也可以看到许多请求变法(政治、制度改革)的意见书¹⁸。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

¹⁴ 矢野仁一：《日清役後支那外交史》，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7年；佐佐木扬：《日清戦争後の清国の対露政策——一八九六年の露清同盟条約の成立をめぐる——》，载《東洋学報》59卷1、2号，1997年10月。

¹⁵ 《专使李鸿章与俄外部大臣罗拔户部大臣德微订中俄密约》，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96年5月22日)，载《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二，1-2。

¹⁶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初版，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香港版，立生书店，1954年，第96页，认为此密约的缔结是中国的失策，日俄战争、二十一条要求、满洲事变(在中国称九一八事变，下同)等皆因此约而生。

¹⁷ A.W.Griswold, *The Far Eastern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38, pp.36-86.

¹⁸ 《康南海自编年谱》，载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四册。

主导的戊戌变法否定“一统垂裳之势”，主张“列国并立之势”等，在对外关系上提出了与先前的双重标准不同的新观点。在内政方面，主张改革国家制度、富国政策、培养人才等。但是，英国、日本等国，却未必赞成这个新政。英国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虽然肯定 1898 年 6 月 11 日的《定国是诏》是根本性的改革，但是认为“期待皇帝的训诫能够深深打动中国官僚之心的理由几乎不存在”，且提出了“实际上发生效果的上谕，几乎一个也看不到”¹⁹的意见。戊戌变法被认为是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范本，但是，却并未得到包含日本在内的列强的支持。结果，这个新政仅三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²⁰。

康有为和梁启超因日英两国公使馆的保护而流亡日本，1899 年 6 月 13 日于横滨组织保皇会，此后，梁启超在日本发行《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日本扮演了中国反政府派避难所的角色。日本政府依清朝政府的要求，监视反政府派，取缔他们的活动。但是，在日本国内也有许多支持、支援反政府派活动的人，这些和反政府派间的“个人”交流与在政治军事层面上的对立成为对照，作为民间的“友好事迹”，在日后的日中关系史研究上被予以强调²¹。

■义和团事件与北京议定书(辛丑和约) 有分析认为戊戌变法后，中国变得极端保守，但这种见解并非定论。中国在 1899 年参加了第一次海牙保和会²²。其后，在伯恩公约、万国邮政公约会议等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上的日中关系，发展成与在东亚的两国关系不同的形态。

但是，从那个 1899 年起，排外的宗教结社和团以山东为中心开始活动，一开始采取镇压态度的清朝中央，转而认可从山东移向北京周边的义和团，1900 年 6 月 21 日发布了宣战的上谕，与所有列强进入战斗状态，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区域曝于危险之中，日本公使馆员也投入了战斗²³。如 6 月 20 日，德国公使克林德（Klemens von Ketteler）遭到射杀等，外国人也出现了牺牲者。8 月 14 日，含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联军的总数约二万人，据说日本军约占了半数²⁴。当义和团事件发生时，山东巡抚袁世凯、两广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并未遵从宣战的上谕，而是将义和团看成是叛军，努力与列强进行协调(东南互保)²⁵。另外，义和团事件发生时，以成为“文明国军队”为目标且重视纪律的日军保护了总理衙门的档案的事情也广为人知。外务部司员王履咸证言：“前年京师变乱之际，其它各衙门档案被烧失无踪，幸本部(=总理衙门)档案因日兵封守之故，未有遗失”²⁶。另一方面，日本陆军将取自户部等地的马蹄银和钓钟等物作为战利品带回日本，银缴入国库，

¹⁹ 坂野正高：《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岩波书店，1970 年，第 306—307 页；林权助：《わが七十年を語る》第一书房，1935 年，第 78—103 页；王树槐：《外人与戊戌变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5 年。

²⁰ 关于戊戌变法的经过，参考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

²¹ 关于在日本的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活动，向来多参照冯自由的《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世界书局，1954 年，但是近来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等人依据日本外务省记录等与之进行比较检讨的史料批判结果，对冯书的可信度产生了怀疑。

²² 唐启华：《清末民初中国对“海牙保和会”之参与(1919-1928)》，载《政大历史学报》，23 期，2005 年 5 月；川岛真：《中国外交における象徴としての国際的地位》，载《国際政治》特集・天安門事件後の中国，145 号，2006 年夏。

²³ 服部宇之吉：《北京籠城他》，平凡社、东洋文库，1965 年。

²⁴ 佐藤公彦：《義和団の起源とその運動：中国民衆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誕生》，研文出版，1999 年；齐藤圣二：《北清事変と日本軍》，芙蓉房出版，2006 年。

²⁵ 李国祁：《张之洞的外交政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 年。

²⁶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年)三月二十八日，外务部司员王履咸呈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外务部档案，02-14，14-2，“各项条陈”。

而钓钟则赠给靖国神社²⁷。

1901年9月7日缔结的《辛丑和约》(北京议定书)以及其后的中英《马凯条约》(Mackay Treaty)等,是继1858年的《天津条约》后,成为围绕中国国际政治的基本条约。日本以此成为列强一员,此后,日本在辛丑和约的框架下一边与列强合作,一边参与到中国事务中来(二十一条要求则超出了这个框架,在华盛顿体制下,日本再度摸索与列强的协调关系)。在《辛丑和约》的框架下,抑止了所谓的“分割中国”,列强在支持北京政府的同时,还推进其近代化的发展,在财政方面,也帮助中国政府能够顺利偿还借款。《辛丑和约》规定中国支付4亿5千万两,是日清战争两倍以上数的赔偿金。赔偿金以发行公债的方式,用40年岁赋来偿还,用金币汇率来计价。赔款的配额以俄国最多(29%),其次是德国(20%),日本与美国同额(7%)。另外,在设置公使馆区域的同时,中国也被迫承认了各国的驻军权。

从日清战争到义和团事件期间,在日本,虽然有着质疑中国一统与统治能力的言论,同时也看得到日中合作和保全中国的言论,不过大多还是必须由日本来主导拯救中国这一类的言论²⁸。

3. 围绕“近代”的日中交错

■光绪新政与中国留学生的留日 经过义和团事件后,变法路线再度被采纳,在缔结《辛丑和约》之前的1901年1月29日,中国颁布了预备变法的诏书(《新政诏书》),开始摸索立宪君主制的可行性²⁹。和戊戌变法不同的是,这次的变法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也获得了支持。7月,取代总理衙门,设置了中国最早的正式外交机关外务部。义和团事件的讲和交涉过程中,北京公使会议和清朝方面的全权代表谈判时,外务部的蓝图设计者是日本的小村寿太郎和美国的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³⁰。在人才培养方面,改革科举制度,由各省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对于修得学位者给予举人或进士资格。而1905年决定废除科举制度之后,更是加速了海外留学的进程³¹。

海外留学风潮,为日中关系带来了新的发展。因为许多的留学生来到了日本³²。日本从明治初年由外务省向中国派遣了进修汉语的留学生(如小田切万寿之助、濑川浅之进等人)³³,中国也派了隶属公使馆的留学生到日本来。但是由于光绪新政中重视法政的风潮,再加之面临科举废除后以外国留学作为仕途资格的情况,日本作为留学的国家而被看中,因为去日本最为简便、且能够以低廉费用留学、还有能够使用汉字等这些优点。在此阶段,中国留学生由于日中经济实力的关系,虽存在个人差异,总体来说在日本过着比较优越的生活³⁴。并且,从

²⁷ 明治37年5月《経理局 北清事変の際獲得したる戦利品処分の件》(陆军省大日记,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所藏,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参考号码C08010342000)。

²⁸ 例如大隈重信:《支那保全論》,载早稻田大学编辑部编:《大隈伯演説集》,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07年。

²⁹ 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

³⁰ 川岛真:《外務の形成—外務部の成立過程》,载冈本隆司、川岛真编著:《中国近代外交の胎動》东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³¹ 如同任达(Douglas R. Reynolds)的《黄金十年》所叙述的,这个时期的留学生多半到日本留学,当时留学生与日本人之间的交流也大多以“友好交流”的肯定笔触被描述。但是将留学生数目多寡本身作为指标,以友好、非友好的二分法来描述日中关系史的作法是否恰当,还是有所疑问的。Douglas R. Reynolds, *China, 1898-1912: the Xinzheng Revolution and Japa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³² 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

³³ 《清国へ本省留学生派遣雑件》(日本外务省保存记录,6.1.7.1)。

³⁴ 张玉法:《中国留日学生的经历与见闻(1896-1945年)以回忆录为主体的探讨》,载卫藤沈吉编著:《共生か

1903年到1906-1907年为止,许多学习法律和政治的学生来到日本(人数最多时一年有一万人。在留学生人数方面,战争时期则是较多的)。在主要培养了众多法政人才的同时,东京也成为亚洲各地青年政治活动的据点³⁵,他们在东京发行许多杂志,抒发了自己在政治、思想上的观点。于是,接触到近代国家概念与民族主义的海外华人社会的政治运动等,又反馈到了中国本土。不仅只是康有为和梁启超,还有孙文、鲁迅等人也是这个时期来日本留学的,蒋介石也进入了陆军的高田连队。从这一点来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各界要人都拥有日本经历。但是,1905年12月,由于日本加强了留学生取缔规则³⁶,再加上中国政府也将日本教育机构在短期内就颁授学位等作法视作问题,随即逐步推广留学欧美(在内容上是理科、技术方面),因此,到日本的留学生也逐渐减少了。另外,美国以庚子赔款充当培养人才和赴美留学的经费(设立清华大学堂),也成为促进欧美留学的要因。

■日中“文化”交流的进展

日本的大都市中居住着数千人的中国青年,这在日中关系史上是未曾有过的事。他们大多不是对于日本本身,而是对于日本从西洋引进的近代文明持关心的态度。不过,通过这些交流,为将日本所接受的西方学术传播到中国创造了机会,社会、经济、社会主义等在现代中国广泛使用的词汇从日本传到中国³⁷。日本从欧美语言译成的汉字和用语传入了中国。另外,日本的中国论也传到中国,影响了中国的中国论³⁸。

并且,还可以看到从19世纪末以来,在日本长期保存的汉学典籍再被引进中国的现象³⁹。此外,在中国出版了以留学生生活为题材的中文小说,而接触了众多中国留学生的日本社会,对于中国的距离感也急速缩小,创作了许多以中国为题材的小说等书籍⁴⁰。

■日中双方的“近代”与民族主义 将目光转向两国的内政,这个时期的日本把基于立宪君主制度的议会制度扶入轨道,迎来了桂太郎与立宪政友会的西园寺公望互为首脑的桂园时代。另外,因为在日清战争开战之前缔结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为废除治外法权奠定了基础,关税自主权于1911年恢复,在财政上,也以日清战争的赔款为基础,确立了金本位制,日本银行开始发行兑换券等,终于能够作为近代主权国家而踏上了“自立”的进程。在经济方面,于日清战争后正式确立了资本主义,1900年遭遇了首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恐慌。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绵丝与生丝的生产增加,成为主要的出口商品。出口中国和朝鲜的绵丝数量急速增长,到了1897年,出口量超过了进口量。生丝是幕府末期以来日本最大的出口商品,因机械制丝业的发达,到了1909年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生丝出口国。在重工业方面,1897年设立了八幡制铁所,日俄战争后,其生产也步上了轨道。

在中国方面,如前所述,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努力推进近代国家建设,在构想法律和制度的时候,许多地方参考了同样采取立宪君主政体的日本的各项制度,而留学生们也将日

ら敵対へー第4回日中関係史国際シンポジウム論文集》, 东方书店, 2000年。

³⁵ 实藤惠秀:《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日华学会, 1939年; 大里浩秋、孙安石编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の現段階》, 御茶之水书房, 2002年。

³⁶ 文部省令第十九号《清国人ヲ入学セシムル公私立学校ニ関スル規程》, 这个规则引起了中国留学生的抗议, 陈天华于1905年12月5日在东京的大森海岸跳海自杀。

³⁷ 吴玉章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 1978年)中描写了在日本留学时, 通过幸德秋水等人的著作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情形。

³⁸ 刘建辉:《日本で作られた中国人の「自画像」》, 载《中国21》, 22号, 2005年6月。

³⁹ 王宝平:《清代中日学术交流の研究》, 汲古书院, 2005年; 王宝平编:《日本文化研究丛书 中国馆藏和刻本汉籍书目》,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7年。

⁴⁰ 严安生:《日本留学精神史—近代中国知識人の軌跡》, 岩波书店, 1991年。

本吸收的西方知识传回中国。在外交方面，因 1903 年缔结的中英通商条约(马凯条约)，以厘金为首的内地税收全部废除等，在通商方面形成了新的规则，同时也促成近代法制的整备工作，双方约定一旦完成法制整备，则废除领事裁判权。日本、美国也与中国缔结了以此中英条约为指南的通商条约。1903 年 10 月 8 日缔结的日清通商航海条约(中国称中日通商行船续约，下同)第十一条中规定“中国深欲整顿本国律例，以其与日本及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日本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日本即允弃其治外法权”⁴¹。从这一点看来，在外交方面，日本对中国展示了修改条约的进程，光绪新政和宣统时期，中国急于编纂新的法典和设计新的制度，也是与已经踏上了修改条约的进程有关⁴²。

向近代主权国家发展的志向，在国民舆论和政治思想层面上，也蕴含了民族主义兴起的要素⁴³。20 世纪最初的十年，日本通过日俄战争而强化了民族主义，中国也通过关于俄国从东北撤兵问题的拒俄运动、涉及美国移民问题的抵制美货运动⁴⁴、与日本有关的人类馆事件和第二辰丸事件等，发生了强烈意识到民族性与国家的政治运动⁴⁵。所谓人类馆事件，是指在大阪举办的第五次内国劝业博览会上的学术人类馆中，获知“展示”了吸食鸦片的汉族和缠足女性的中国留学生，在《浙江潮》等留日学生的刊物上，抗议与同样被展示的印度、马来、爪哇、非洲人等遭受到“同等待遇”。反美运动也是因为以针对华人移民的人种歧视为根据的移民限制而发生，实际上移民人数不多的地区也卷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另外，在 1890 年代后半期，收回出让给外国的铁路和开采矿山的权益⁴⁶，开设自开商埠等，由中国来主导经营通商口岸的动向也得以增强。

在这些政治运动中成为凝聚核心的，与其说是清朝，不如说是“中国”。“中国”在这个时期逐渐作为国名而确定下来。梁启超在 1901 年的《中国史叙论》一文中提到：“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唐和汉是王朝名，支那是外国人使用的称呼，说中国、中华虽然未免有自尊自大的味道，但在各有缺点的三者之中，“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⁴⁷。梁启超认为“中国”的称呼是超越王朝兴替的称呼。当然所谓“中国”的概念古来有之，在各个时代中又重新被诠释下来。梁启超应该是打算在“主权国家”的脉络下，对“中国”进行重新定义的⁴⁸。

41 关于中英条约参考田涛：《清朝条约全集》，第二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1193 页、日中条约参考同上书第三卷，第 1263 页、1270 页。另外，中日条约第六款和中美条约第十三款中，还有中国应努力制定“国家一律之国币”(统一货币制度)的条文。

42 宣统元年八月初一日《考察宪政大臣李家驹奏考察日本司法制度并编日本司法制度考呈览折》，载《宣统政纪》十九卷，一叶。

43 吉泽诚一郎：《愛国主義の創成一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岩波书店，2003 年。

44 张存武：《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潮的风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6 年。

45 坂元ひろ子：《中国民族主義の神話—人種・身体・ジェンダー》，岩波书店，2004 年。

46 李恩涵：《晚清的收回矿权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 年。

47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文集》六，中华书局版，1960 年，日文译文依据岸本美绪：《中国とは何か》，载尾形勇、岸本美绪编：《中国史》，山川出版社，1998 年。

48 日本在正式使用“中国”的称呼上，犹疑推迟。辛亥革命后，任驻华公使的伊集院彦吉向日本外务省提议，不再用“清朝”，日本也有必要使用超越王朝的 China 称呼，建议公文中使用“支那”，外务省接受了这个提议。参考川岛真：《“支那”“支那国”“支那共和国”—日本外務省の対中呼称政策》，载《中国研究月報》571 号，1995 年 9 月。

3. 日俄战争与满洲问题

■**日俄战争与日中关系** 围绕辛丑和约后中国的国际政治，形成于将中国的分割止于义和团事件之前状态的前提之上。列强希望维持能够保障列强在华权益的中国中央政府的存在，维持所谓保留分割意义上的现状之下，试图扩大自己的权益。中国政府也利用列强的这个动向，欲推进外资主导型的近代化政策。

但是，俄国在义和团事件时向满洲派遣的军队，即使在推进对俄关系的李鸿章于1901年11月病世之后，也没有要撤兵的迹象。俄国在1896年与中国缔结的密约中，获得满洲的铁路建设和经营权，又于1899年缔结的英俄协定（穆拉维约夫协定）中，英国也认可其在满洲的铁路权益。1900年的英德协定（扬子江协定）中，与在山东确立了基础的德国联合，虽然有防范俄国南下的考虑，却并没走上反对英俄协定的路线上去⁴⁹。但是，俄国在义和团事件后还不从满洲撤兵，对此，即使是英国也被迫陷入必须作出艰难抉择的地步⁵⁰。1902年1月30日，日本与英国缔结日英同盟。在此条约中，日本承认英国在中国的特殊权益，英国承认日本在朝鲜和中国的特殊权益（special interests）。在日本国内，也有如伊藤博文主张的，与俄国进行“满韩交换”的日俄协商论调，但是桂太郎内阁选择了与英国同盟。总体而言，中国也对日英同盟持善意的看法。

受到日英同盟的影响，俄国决定从满洲撤兵，于1902年4月8日与中国缔结了交还满洲的条约（中国称《交收东三省条约》-译者），开始进行第一期撤兵。但是，俄国并未实行第二期的撤兵，反而向中国提出了七个项目的撤兵条件。在日本，对于三国干涉还辽被视为“卧薪尝胆”，强调了对俄国的国民感情。在中国，反对俄国占领满洲而引起的“拒俄运动”，在全国范围展开。这个运动以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为开端，还扩大到了留日中国学生⁵¹。

■**日俄战争的爆发与中国的中立** 日俄战争是围绕朝鲜半岛的日俄两国冲突，以及俄国不履行归还满洲条约为由，于1904年2月7日爆发的。中国于2月12日宣布局外中立⁵²。根据Michael Hunt的研究，袁世凯与张之洞在1903年11月2日被召见，讨论了东三省问题（关于中立决定之意不详），之后的两个月间，袁世凯就中国是否应该在运输和粮食上援助日本之事，与驻华英国公使萨道义（Sir Earnest Satow）进行商讨，结果，袁世凯因为难以估量日本对于满洲的野心程度，而未执行支援日本的政策⁵³。关于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四日（1903年11月2日）

⁴⁹ 美国也基本上默认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围绕着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由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与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的文书往来中也可以看出美国的这个立场。Mr. Hay to Mr. Conger', Department of State, Washington, January 3, 1903, *FRUS*, 1903, pp.46-47.

⁵⁰ L.K.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⁵¹ 在北京，以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为中心，发起了“拒俄上书运动”，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间，也以汤尔和、纽永建等人为主，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关于拒俄运动，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主编、王学庄、杨天石著：《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不过，这个“拒俄运动”的内容（包含要求俄国撤兵等）虽然与外务部的庆亲王和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方针有相似之处，但中国政府并未加以利用或以此运动作为后盾。谈及这一点，我们就会想起汤尔和、纽永建为了抗议和运动而回国时，袁世凯拒绝接见他们的事实，以及清朝的驻日公使认为此运动：“名为拒俄，实则为革命运动”，而加以取缔的事实。参考吴玉章：《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第18-21页。

⁵² 川岛真：《日露戦争与中国の中立問題》，载军事史学会编《日露戦争（一）国際的文脈》，锦正社，2004年12月；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と西洋国際社会》，汲古书院，2007年。

⁵³ Michael H. Hunt, *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 Manchuria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1895-1911*,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84-87. 另外，Hunt也讨论了日俄战争时期的中美关系，参考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Special Relationship: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o*

的召见，*Hunt* 的依据是《张文襄公年谱》⁵⁴。此后，据说张之洞谈到“俄日有役，我局中固难，局外似亦不妥”，而袁世凯则提到“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分陆军扰我西北”⁵⁵ 的观点。因史料上的限制，很难掌握清朝宫廷内部的政策决定过程，但依据能够阅览的史料来分析其经纬，应该可以说中国方面有收回东三省主权的目标，另外从战局来看，虽然认为比起附俄，附日是比较有收回主权的可能，但是不管参加哪一边，都有遭到敌人攻击的可能，参战也是不利的。

中国国内的官僚似乎也是支持中央政府的此一政策的。于 1928 年出版、由蔡元培等人主编的《日俄战争》一书中，有以下的整理：(1)首先，在当时俄国的侵略是明显的，而日本尚未及俄国明显，在此前提条件下，有识者一面预见日本的胜利，一面采用所谓的“以暴还暴”的方针，并以此作为中国的自强之策。而一般人的想法则只是单纯地依赖日本而已。另一方面，(2)也存在将俄国视为“北狄”，而感到恐怖的倾向。所谓越往北方越强盛的历史理解，与俄国的强大相重迭，遂形成了俄国是最大的敌人的印象⁵⁶。

中国紧急签订了迟迟未签的海牙保和会各项条约，希望以遵从国际规则的方式实行局外中立⁵⁷。从“局外中立条规”内容⁵⁸可知，对于在满洲部署了军队的俄国而言，包含了许多苛刻的内容。禁止中国人参加战争，也禁止了用铁路运兵、贩卖军事相关产品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的中立与其说是严正中立，不如说是对日本持善意的中立。实际上，中国的地方大吏中，有不少以个人身分协助日本方面，在战争结束后从日本获得勋章的人⁵⁹。

中国在面对日俄战争之时，究竟又是如何看待 1896 年的中俄密约的呢？根据当时外务部

1914, Colo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⁵⁴ *Hunt* 依据的版本是胡钧纂辑的《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1939 年，但笔者依据的是东洋文库所藏的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商务印书馆，1944 年，第 176 页。其中，在年谱记事之外，作为注记，记载了：“关于东三省交涉之事，俄国于光绪廿九年三月向外务部提出七项条件。俄国企图独占东三省权益。中国并未遵照俄国所言，没有设立通商口岸。关于聘用外国人，如果执行的话，因为中国的权限不能扩及北方，因此外务部拒绝了[俄国的要求]。日本宣言已经做好开战之准备，庆亲王与美国公使进行调停商谈，但是，美国公使拒绝接受。九月，东三省之事愈加炽热，据传闻奉天将军被放逐。公(张之洞)与袁督(袁世凯)同日受召见”。

⁵⁵ 《直督袁世凯致外务部日俄开仗我应守局外祈核示电》，光绪廿九年十一月初九日，载《清季外交史料》，一七九卷，第四叶。

⁵⁶ 吴敬恒、蔡元培、王云玉主编、吕思勉撰述、朱绍农校阅：《日俄战争》，新时代史地丛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年，第 92-93 页。

⁵⁷ 中国正式批准了因义和团事件而迟未批准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作为海牙保和会的成员国，对于日俄战争表明欲中立。中国与荷兰交涉，关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及其它各约，经由皇帝裁可后，以委托荷兰的方式，于 1904 年 11 月 21 日批准。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廿五日发《练兵处文》，外务部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藏，02-21，12-1。关于此项批准，日本方面也于翌年年初，从驻日荷兰公使处获得确认的通知。明治三十八年一月十八日发，小村外务大臣致内阁总理大臣《清国ニ於テ海牙万国和平會議ニ關係セル条約及宣言ノ批准書ヲ寄託シタルノ件》(日本外务省保存记录 2. 4. 1-2《第一回万国和平會議一件》第八卷)。

⁵⁸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日俄战争中国局外中立条规》，《清季外交史料》，181 卷，20-23 叶。但是，关于局外中立条规，当时担任直隶总督袁世凯顾问的坂西利八郎，在名为《清の日露戦争への局外中立》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幸好支那给予我国善意的中立”，并说“支那的局外中立宣言，是支那方面让我坂西写的”。关于中俄密约，坂西说“因为还有中俄密约，所以要小心别让俄国抓到违反中立的证据”，袁世凯也是“为了不被抓到表面上违反中立的证据，处处小心注意”。坂西利八郎：《その頃の日本と支那》，载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参戦二十将星 日露大戦を語る》，东京日日新闻社、大阪每日新闻社，1935 年。

⁵⁹ 梅溪升编：《明治期外国人叙勲史料集成》，思文阁出版，1991 年。关于袁世凯，明治四十年九月十六日《清国直隸總督袁世凱叙勲ノ件》，第 380-381 页。此外，明治四十一年，担任陆军翻译的中国人和吴佩孚等北洋军的军人也得到勋章(第 525-529 页)。

尚书那桐的日记可知，1904年6月11日，外务部的干部曾经把中俄密约从库房中调出来阅览⁶⁰。但是，并没有因为密约的存在，而对是否应该附俄进行讨论。另一方面，在同样翻阅过密约的邹嘉来的《仪若日记》中，也没有关于这个密约的记载⁶¹。从这一点来看，大致上可以认为：日俄战争之时，作为知识，清朝的外交当局者认知1896年缔结的中俄密约的存在，但是清朝并未据此来采取外交态度，而俄国也没有基于此项密约进行要求。但最重要的是，外务部的干部在1904年6月11日确认过中俄密约这一事实的存在。清朝宣布局外中立是在1904年2月12日。由此，至少可以确认的是，在决定局外中立的过程中，外务部的干部们并未把中俄密约放在心上。

■朴次茅斯条约的缔结与“日俄战争在世界史上的意义” 日俄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满洲。一开始，战场是受到限制的，但是逐渐扩大，而关于中国的中立，也渐次受到来自日中双方的批判⁶²。另一方面，在中国一开始可以看到许多对日本持善意言论的想法，但随着日本取代俄国开始占领统治满洲时，人们才认识到这场战争只不过是俄国的权益转移到日本之手，因此，渐渐地在中国批判日本的言论也逐渐凸显出来⁶³。

战局在日本攻下旅顺要塞，全歼波罗的海舰队等之后，往日本较为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在日本海海战之后，战局陷入僵持状态。结果因美国从中周旋，于1905年9月5日以《朴次茅斯条约》（又称日俄《讲和条约》）结束战争。中国曾试图参加和平会议，但没有达成目标。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日本以获得中国政府的承诺为条件，继承俄国在南满洲的各项权益。这虽然明确了中国对于满洲的主权，但同时也显示出日本做为列强之一，更进一步的干涉有关中国的国际政治之事。俄国在南满洲的权益，包括了旅大租借地、南满铁路、矿山开采权等。不过，日本并没有从朴次茅斯条约中获得赔款，日比谷暴动等事件则反映了长期以来不堪忍受加税的国民的不满。但是，在此必须注意的一点是，不能单纯地认为，在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变得更加强硬。

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各种形式发现了战胜意义。这也与日中关系有所关联。其中，“针对专制的立宪之胜利”、“黄色人种对白色人种的胜利”等，也受到亚洲各民族的欢迎，影响了各地的民族主义与立宪运动。在中国，从孙文的言论等便可看出，对日俄战争的胜利赋予了权威性的讨论。的确，可以在《东方杂志》中看到关于黄色人种战胜白色人种的讨论⁶⁴。这样的言论，与日俄战争前后盛行的黄祸论也有所关联。另外，关于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与亚洲民族运动的关联性，孙文的大亚细亚主义演讲（1924年）词被频繁引用，这也成为了支持日本亚洲主义的根据。下面应该是孙文于1905年6月11日从马赛向东出发，7月初抵达新加

⁶⁰ 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一日（1904年6月11日），载《那桐日记》，北京市档案馆所藏。

⁶¹ 光绪三十年五月十一日己（己）丑（1904年6月11日），载邹嘉来：《仪若日记》，东洋文库所藏。

⁶² 关于中国的中立政策，因日清战争的记录而著名的W.F.Tyler评价道：“中国丝毫完全没有理解到近代中立国家应尽的义务”。“Extracts from Memorandum on China's Neutrality in Russo-Japanese War,” Presented by Capt.W.F.Tyler,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at The Hague, in 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vol III,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18, P.478.

⁶³ 井口和起：《日露戦争の時代》，吉川弘文馆，1998年。1998年，特别是在“战场—朝鲜与中国”、“西方霸道的猎犬”中，井口指出：“满洲的民众在被国家舍弃的情况下，展开独自的反俄斗争”，即使战争发生，“对中国东北地方的民众而言，侵略者不过从俄国换成日本罢了”，因此可以确认对当地的中国人来说，未必对日本的胜利持肯定的态度。另外，关于日本的占领统治，参考佐藤三郎：《日露戦争における満州占領地に対する日本の軍政について》，载《山形大学紀要（人文科学）》第6卷第2号，1967年。

⁶⁴ 《论中国民气之可用》，载《东方杂志》，第一期，1904年4月25日。

坡，在旅途上发生的插曲⁶⁵。孙文说道：“日本打败俄国之事，在东方的亚洲人或许不太重视，也或许不太感兴趣。但是在西方的亚洲人，或住在接近欧洲的亚洲人，经常受到欧洲人的压迫、饱尝苦痛，而且因为他们所受到的压迫比在东方的亚洲人更大，其苦痛更加深刻，他们听到这个胜利的报道而高兴的程度更甚于我们东方人”⁶⁶。这是说受俄国压迫的西方诸民族，对于日本的胜利比起东方人更为高兴，而并非是直接叙述中国人自己的喜悦之情。于1905年8月13日在东京举行的欢迎会上，孙文明言“中国不适合立宪君主制”⁶⁷。一周之后，孙文等人在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11月26日刊行机关报《民报》，提倡三民主义。

■ “满洲”问题的发生 日俄战争是以在朝鲜半岛上的日俄对立，以及俄国的满洲撤兵问题为直接原因而爆发的。从战争期间，日本就加强对朝鲜侵略，于1905年缔结第二次《日韩协约》，剥夺了大韩帝国的外交权，设置了统监府。关于满洲权益，基于朴次茅斯条约，日中间于1905年12月22日缔结了《北京条约》（关于满洲的条约）⁶⁸。日本于1906年在旅顺设置了统治关东州的关东都督府，在大连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作为在日俄战争中付出庞大牺牲的代价，日本获得了南满洲的权益。此后，在南满洲的权益成为日本的生命线，如果从维持这个权益的理由来思考满洲事变的发生，则日俄战争成了规定日后的对华政策、日中关系的框架。

围绕满洲各项权益的日中交涉，并非只因缔结了“关于满洲的条约”就得以结束。这个条约不过是规定了大框架，其后仍在继续交涉详细的内容。小村寿太郎外相，将新民屯—法库门间铁路、大石桥—营口间铁路、抚顺、烟台煤矿、安奉铁路、满铁沿线矿山以及京奉铁路的延长等所谓的满洲五悬案，加上间岛问题，作为满洲六案件，试图将这些问题一起进行处理。将间岛问题也一并来处理，应该是考虑到在间岛问题上让步，以利于其余五项的处理。关于与朝鲜比邻且有众多朝鲜人移居的间岛的问题，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结果，在1909年9月缔结了关于间岛的日清协约（间岛协约—译者，下同），以及关于满洲五案件的日清协约。以此决定了北京条约的内容，并划定了中朝间的国境。另外，关于在满洲朝鲜人的领事裁判权适用问题，仅限于日本领事蒞临旁观的有限程度⁶⁹。

在确定日本的满洲权益的过程中，提出异议的是担任调停日清、日俄两次战争的美国。1905年，有铁路王之称的哈里曼(Edward H. Harriman)提议共同经营满铁，但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1909年，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也曾试图使满洲的铁路权益中立化。但是1910年7月，日本商（中国称第二次《日俄协约》—译者，下同），反而将南满洲整体都划入了权益范围内。实际上，日俄之间是以在第一次日俄协商（中国称第一次《日俄协约》—译者，下同）中划定的分界线作为权益的界线。因此，日俄战争的战区，即辽河以东是日本势力范围的西边界线，但因为美国围绕铁路权益的提议牵涉到日本的权益，故在第二次日俄协商中，将日本的权益扩大到南满洲全体区域⁷⁰。日本与满洲的关系在经济方面也变得更加紧密。向满洲出口的绵布，以及从满洲进口的大豆渣，是日本的主要贸易商品。

⁶⁵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中华书局，1991年，第337页。

⁶⁶ 外省调查部编：《孙文全集》，1935年，原书房复刻1967年，上卷，第1135-1136页。

⁶⁷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编：《孙中山全集》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227-283页。

⁶⁸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四卷，大公报社，1932-34年。

⁶⁹ 李盛煥：《近代東アジアの政治力学—間島をめぐる日中朝關係の史的展開》，锦正社，1991年。

⁷⁰ 北冈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 1906-1918年》，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

4. 日俄战后的日中关系与辛亥革命

■ **围绕中国权益之协商关系的形成** 比起其它国家日本较为强烈地要求俄国从满洲撤兵。其原因有二，一是基于扩大本国在华权益，二是为达到与列强步调一致的原则。在《大阪朝日新闻》的论调中，从1900年到1903年一直强调对俄强硬论，但在开战后，也为了应对黄祸论，即使胜利也“主张满洲开放与保全清朝领土”。从1905年3月的奉天会战时开始，由于黄祸论的收敛，论调又转变成“公然主张日本对于满洲有着与列强不同之特殊地位的立场”，“让清朝和列强承认这个观点，已成为日俄战后日本外交的一个支柱”⁷¹。

战争的结果，因俄国获得满洲北部，日本获得满洲南部，列强再次调整了关系。首先，在日法之间，日本在巴黎发行公债，1907年6月，缔结了约定法属印度支那安全的日法协商（中国称《日法协约》—译者，下同）。接着，为了再次确定满洲权益，缔结了第一次日俄协商。这两个协商，与英俄协商（中国称《英俄协约》—译者，下同）互相形成对德国的包围网。在东亚存在的问题是，于1890年代登场的德国和美国，究竟对于英法俄的协商关系采取什么立场？而中国又如何置身其中？日本并不是只与英法俄形成协商关系，也表现出欲与美国形成协商关系（虽然存在着移民问题）的意图⁷²。

1908年，中国奉天巡抚唐绍仪访美。日本方面认为唐此行与威廉二世提议的中德美联盟案有关，遂积极向美国提议日美合作。结果于1908年11月缔结了高平—罗脱协定。在此，确认了在太平洋区域维持现状、自由通商以及中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领土保全等原则。由于此项协定的缔结，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围绕满洲的日美之间的摩擦，也因此，日本在南满洲的权益几乎完全确定下来了⁷³。

同时，1900年代后半期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因为日俄协商的形成，为日本合并韩国创造了有利的环境。1910年，日韩合并之际，废除了朝鲜半岛上的中国租界，事实上取消了中国在朝鲜半岛上的权益。另外，日韩合并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很大的冲击，更加深了他们对于亡国的危机感。

■ **立宪君主制的尝试与日中关系** 1905年11月25日，中国设置了考察政治馆（其后改称为宪政编查馆）。这是一个以考察各国政治体制为目的的机构，日本也成为其调查的对象。1907年，沈家本等人担任修订法律的大臣，起草了有近代性质的刑法法典（最终未被采用）。1908年8月27日，发布了《预备立宪之诏》。明示在九年之内制定宪法，召开议会⁷⁴。在此完备法律及向宪政转型的过程中，有不少模仿日本的地方。在政府组织改革方面，1909年设置的军諮处模仿的是日本的参谋本部，而1911年设置的弼德院则以枢密院为模型。另外，关于人员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制订近代的各种制度时，可以认为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地方上，1909年10月4日，在各省设立了相当于地方议会的咨议局，这也是模仿当时日本地方选举的间接选举，议员之中有不少日本留学人士。同时，1910年10月3日，在中央设立了资政院，决定于1913年设立正式的议会。

⁷¹ 伊藤之雄：《立憲国家と日露戦争—外交と内政 1898—1905》，木铎社，2000年，第271页。

⁷² 川岛真、千叶功：《中国をめぐる国際秩序再編と日中対立の形成—義和団事件からパリ講和会議まで》，载川岛真、服部龙二编：《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7年；千叶功：《旧外交の形成 1900—1919》，劲草书房，2008年。

⁷³ 寺本康俊：《日露戦争以後の日本外交—パワー・ポリティクスの中の満韓関係》，信山社，1999年。

⁷⁴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

尽管中国参照日本模式进行了近代国家机构和制度的建设，但并不能说日中关系就是良好的。关系的紧密化未必能够带来良好的日中关系，也产生了许多对立的局面。

在1907年举行的第二次海牙保和会上，作为中国代表的陆征祥公使，特别地警惕日本⁷⁵。实际上，在围绕选出国际裁判所法官的问题上，一般认为日本曾阻止中国获得一等国待遇的请求⁷⁶。日本质疑中国的近代化程度，陆代表则要求本国政府尽快确立宪法及其它法律制度以确保主权⁷⁷。如此，必须通过完备宪法和法制来确保国际地位的见解，在当时的驻外使臣中是共通的想法，他们担心“如不整備法制，下次保和会时中国不知将降至何等地位”⁷⁸。

1908年，日中之间发生了第二辰丸事件。在澳门附近，由于走私武器的嫌疑，第二辰丸号被中国官吏抓获，并将日本国旗卸下，在围绕此事件的交涉过程中，因中国方面的对日交涉未得到民众的支持，导致演变成发展为排日运动的事件⁷⁹。

■辛亥革命 1908年11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去世。宣统帝继位，成立以皇族为中心的政权，在此新政权下，袁世凯失势。1911年5月，中国成立了内阁，总理是庆亲王，十三名阁僚中，有五名为皇族（亲贵内阁）。各省咨议局联合会抗议亲贵内阁，但其抗议并未被接受。在宣统年间，此种中央的朝廷与地方的咨议局间的对立，更加明显。特别是铁路成了争议的焦点。1911年5月，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宣布铁路国有化，而其国有化则是以外债构筑，对此，在各地引发反对运动，甚至到了出动军队的地步。

另一方面，受到孙文等流亡海外的革命家强烈影响的革命运动，断断续续发起武装事变。辛亥革命，即是在上述的中央与地方之争与流亡活动的相继而起中发生的。以1911年10月发起的武昌起义为契机，宣布脱离清朝而独立的各省，以中南部为中心，不断增加，但是，他们的独立仅是针对中央政府的自立，并非是作为国家的独立。此时，孙文不在中国国内，但归国后，于1912年1月1日成为临时大总统，在孙文的带领之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临时首都南京成立。但是，2月，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问题再度浮上台面，以清朝皇帝的退位作为条件，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首都移往北京。

辛亥革命前后，迎来了日本对华政策的一个转折点。在强化满洲权益、向南方侵略或是强化对中国政府的影响力等的几个选择之中，第二次西园寺内阁难以抉择其方针，而采取静观其变的方针。获知武昌起义时，在日本，例如山县有朋，将之与1910年的大逆事件联想在一起，意识到“皇帝制度”崩溃的可能性。德富苏峰对其评论道：“黑死病是有形之病，共和制则是无形之病”⁸⁰。

其后，西园寺公望内阁的内田康哉外相于1911年11月28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在与英国协作之下，促成中国政府采取非共和制也非清朝专制、而是立宪君主政体的制度，因此打

⁷⁵ 光绪三十年三月十三日收，驻和陆公使致丞参信，外务部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02-21，2-2。

⁷⁶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收，驻和陆大臣文《密陈保和会前后实在情形并近来世界大势》外务部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02-21，4-1、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初二日收，驻和陆大臣信一件，外务部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02-21，10-1。

⁷⁷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收，专使陆大臣等致本部电，外交部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03-34，1-1。

⁷⁸ 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五日收，专使陆驻俄胡、法刘、比李、和钱大臣电，外交部档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02-12一，2-3。

⁷⁹ 关于辰丸事件的既往研究，参考菊池贵晴：《第二辰丸事件の対日ボイコット》，载《歴史学研究》209号，1957年7月。

⁸⁰ 德富苏峰：《对岸の火》，载《国民新聞》1911年11月12日。另外关于辛亥革命的日本舆论动向，参考野泽丰：《辛亥革命と大正政変》，载亚洲史研究会中国近代史部会编：《中国近代化の社会構造—辛亥革命の史的位置》教育书籍，1960年。

算对清军与革命军进行调停⁸¹。但是，为保护自身权益而期待强有力的统一政权的英国已经开始调停南北双方，因此日本的要求被决绝了。在 12 月 22 日的内阁会议上，关于辛亥革命，日本政府作出听任革命发展的决定⁸²。

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文成为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在领域上，基本继承了清朝的版图，作为包含藏族、蒙古等多民族的国家，提倡五族共和⁸³。一开始，袁世凯也似乎有以此作为契机来修改条约的意图，但结果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清朝与列强缔结的各项条约⁸⁴。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朝皇帝发布退位上谕，事态趋向终结，孙文于 14 日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15 日，南京的参议院全场一致选出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3 月 11 日，制定了《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作为规定政治基础的法律，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大总统的权限。这也被认为是日后袁世凯总统想当皇帝的背景。

日本政府在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向临时政府提供了以汉冶萍公司作为担保的借款，在以袁世凯为中心来收拾局面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也和俄国一起参与了四国借款团。1913 年 4 月，与英、法、德、俄一起提供 2500 万英镑的善后借款，支持袁世凯政权。在这一点上，日本努力与列强合作。同年 10 月，日本对北京政府进行了政府承认。此后，虽然发生了二次、三次革命以及广东政府的成立等情况，但是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为止，日本一直都是支持北京政府的。

其间，俄国积极展开对蒙古政策，甚至到了外蒙宣布独立的地步。日本与俄国进行交涉，将第一次、第二次日俄协商所定的满洲分界线延长到内蒙古。因此，内蒙古的东边归为日本的势力范围，西边则是俄国的势力范围。由此，因内蒙古东部也被视为是处在日本的势力范围之下。“满洲问题”变成了“满蒙问题”。

结语

从日清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的时期，应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日中关系极为紧密，在世界史上拥有共同的时代经历。这方面可以举出中国政府意识到明治维新而摸索立宪君主制、许多留学生为了学习法政而来到日本、在经济和贸易上的关系也极其紧密化等事项来。还需附带说明的是，在人员的交流方面，当时不需要护照即可往来。第二，虽然日中间的整体关系逐渐紧密，但是，在政治、外交、军事上也是开始产生敌对局面的时期。伴随着日清战争和义和团事件这两次通过宣战方式而开始的战争，以及以中国为战场的日俄战争，可以频繁看到日中关系所处的敌对局面。第三，日本与中国缔结了不平等条约，加入到了围绕中国的国际政治的列强之中，并且在各地获得权益的过程中，日本从一开始的与列强共同参与干涉中国的状态，逐渐转变成作为地区性国际政治的行为者(actor)来进行行动。

在近代的日中关系史中，日清战争被看做是一个转折点。形成了对日本有利的不平等条约体制，在日本国内也产生了蔑视中国的倾向等，的确可以明显地看到与此前不同的倾向。

⁸¹ 千叶功：《旧外交の形成—日本外交 1900—1919》，劲草书房，2008 年，第 213 页。

⁸² 白井胜美：《辛亥革命と日英関係》，载《国際政治》58 号，1978 年。

⁸³ 片冈一忠：《辛亥革命時期の五族共和論をめぐって》，载《中国近现代史の諸問題—田中正美先生退官記念論集》国书刊行会，1984 年。

⁸⁴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 年，第 86—87 页。

但是，在这个时期，也遗留许多政策上的可能性与抉择，将其说成是从友好朝向敌对的转折点的说法并不恰当。不如将之视为近代日中关系进程的一个部份来理解更为妥当，1910年代二十一条的提出及在其后的开展中日中敌对关系被视为显著化了。本章描述的这个时期，日本对于中国，基本上是在北京议定书的框架下一边与列强合作，一边对中国加以干涉。但或许因为这也是中国民族主义形成的时期，因而也可从各处看得出日中间的对立局面。

前言

在近代日中关系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满洲事变（中国称九一八事变—译者，下同）无疑是很大的转折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战的日本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曾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顾及与各国关系的日本，在二十一条的问题上走到了与中国单独对垒的道路。另外，满洲事变使得日中关系恶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尽管如此，日中关系并不是直线形从二十一条走到满洲事变的。在那期间，有被称为华盛顿体系的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时期，同时还有被称为“东方文化事业”的文化交流的努力。

因此，本章试图分析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31年满洲事变爆发前，这一期间日中关系的起伏。这一时期的日中关系，可以说是分四个时期演变而来。第一时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巴黎和会。第二时期笔者希望定为从巴黎和会后经华盛顿会议，到建立华盛顿体系为止。第三时期，是从北京政府末期到北伐时期，这在日本正是第一次币原外交时代。第四时期，为国民政府成立到满洲事变爆发前，那时在日本是田中外交和第二次币原外交时代。

笔者将依据这四个时期的划分，在下文中追溯近20年来日中关系的轨迹。分析的重点侧重于日中间的外交关系，但也会适当地谈及各国的动向。这是因为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北京关税特别会议等已经表现出，日中关系受国际政治制约的部分甚多的特点。而在“结语”部分，笔者还将从日中关系的角度对被称作华盛顿体系的1920年代的国际秩序进行分析。

1. 第一次世界大战

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对华二十一条

1914年6月28日，在萨拉热窝，奥匈帝国皇储夫妇被暗杀。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契机，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向塞尔维亚宣战，开始了德、奥同盟国方面与俄、英、法协约国方面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驻日英国大使葛林(William Conyngham Greene)，为了攻击在中国近海出没的德国伪装商船巡洋舰而寻求日本的支持，向大隈重信内阁的外相加藤高明要求出动日本海军。葛林的对日要求，仅限于保护英国商船的范围，但加藤却以此为契机，推动日本全面参战。

日本以日英同盟为根据，于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不仅要求德国军舰立刻撤出或解除武装，而且要求暂先将胶州湾租借地交给日本以备归还中国。通牒的答复期限是一个星期，因德国没有回应，日本于23日向德国宣战，正式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27日，日本海军第二舰队封锁了胶州湾。9月2日，日本陆军久留米第十八师团，开始从山东半岛北岸的龙口登陆，占领了山东铁路。11月，日军攻下青岛要塞，迫使德军投降。英军也小规模地参加了青岛作战¹。

1915年1月，日本向中国提出5号21条要求。此要求没有经中国外交部，而是由驻华

¹ 斋藤圣二：《秘 大正3年日独戦史 别卷2 日独青島戦争》，ゆまに书房，2001年。

公使日置益直接交给总统袁世凯。这就是被称为对华二十一条的要求，其主要内容如下：

- 第 1 号：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4 条)
- 第 2 号：大连、旅顺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 99 年为限等等，扩充了日本在南满洲、东部内蒙古的权益(7 条)
- 第 3 号：汉冶萍公司改为日中合办 (2 条)
- 第 4 号：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1 条)
- 第 5 号：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顾问等(7 条)

虽然要求甚广，但加藤外相的重点则在第 2 号的满蒙问题，其目的是为延续其既得权益提供条约上的依据。另外，“二十一条”的第 5 号，作为“希望条款”在交涉的最后阶段被置而不论。即使如此，日本还是在 5 月 7 日发出了最后通牒。中国答复接受此最后通牒的 5 月 9 日，被认定为国耻日。5 月 25 日在北京，缔结了两项条约和十三份换文，关于山东省的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的条约、关于汉冶萍公司、胶州湾租借地、福建省等的换文²。

其中，在关于山东省的条约中第 1 条，规定中国政府将德国在山东权益的处置，委交于日德之间的协议。与这个条约同时交换的关于胶州湾租借地的换文中，明确标记了以开放胶州湾为商港、设置日本专管居留地为条件，而将胶州湾租借地归还中国的条款。再加上 1918 年 9 月 24 日，日中间交换了以日本借款建设济南—顺德铁路、高密—徐州铁路的换文。另一方面，英、法、俄、意在 1917 年 2 月至 3 月间，陆续向日本传达：作为日本参战的报酬，将支持日本取得山东半岛和南洋诸岛的权益。特别是山东问题，在后面的巴黎和会等部分还将论及。

石井菊次郎在加藤之后继任外相，而在中国，袁世凯则宣布将要称帝。不过，日本和英国、俄国一同劝告袁世凯停止恢复帝制。大隈内阁对于袁世凯的态度是强硬的。大陆浪人川岛浪速等，援助中国的政治社团宗社党，企图进行满蒙独立运动，日本的参谋本部也打算支持这一活动。反对帝制的第三次革命扩大后，袁世凯取消了帝制，于 1916 年 6 月骤逝。于是，日本转而改变方针支持黎元洪大总统，满蒙独立运动逐渐收缩³。

2) 从西原借款到新四国借款团

1916 年 10 月寺内正毅内阁组成之后，在寺内首相授意下，西原龟三在北京与段祺瑞国务总理等会面，决定通过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等，向中国借款。这就是所谓的西原借款。西原借款与段祺瑞政权之间签了 8 个合同，借款总额达 1 亿 4500 万日元。这些借款分别是：第一、二次交通银行借款、有线电信借款、吉会铁路借款预支款、吉黑两省森林金矿借款、满蒙四铁路借款预支款、山东两铁路借款预支款、参战借款。

中国方面决定接受西原借款的，除国务总理段祺瑞以外、还有交通总长曹汝霖、中华汇

²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上卷，原书房，1965 年，第 404—416 页；白井胜美：《日本と中国——大正時代》，原书房，1972 年，第 61—89 页。

³ 北冈伸一：《日本陸軍と大陸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 年，第 181—193 页；櫻井良树：《第 2 卷 解題 大正時代初期の宇都宮太郎——参謀本部第 2 部長・師団長時代》，载宇都宮太郎关系资料研究会编：《日本陸軍とアジア政策 陸軍大将宇都宮太郎日記》第 2 卷，岩波书店，2007 年，第 4—5 页。

业银行董事长陆宗舆等人。西原借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下经济繁荣的日本把外汇投资于中国，以培养段祺瑞等皖系为主的亲日派，企图建构“日中提携”。但重视国际合作的外务省等部门猛烈抨击西原借款，“日中提携”的尝试因而受挫被中止。关于西原借款的偿还，有1亿2000万日元成为呆账无法回收⁴。

1917年3月，中国与德国断交，8月对德奥宣战，正式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此时的日本正试图与存在感大增的美国就对华政策形成共识。寺内内阁特派原外相石井菊次郎赴美，11月与美国国务卿蓝辛(Robert Lansing)达成换文。在石井——蓝辛协定中，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特殊利益”的同时，规定日美两国支持作为主义的门户开放和机会均等⁵。

其间，俄国发生革命。1918年，向革命后的俄国派兵的问题成为悬案。一开始对于共同派兵持积极态度的是英国与法国。而原本态度消极的美国威尔逊政权，1918年7月，向日本提议共同出兵海参崴（又称符拉迪沃斯托克），名义是为了救援捷克军队。8月起，日美开始共同派兵，日军达73000名。9月成立的政友会原敬内阁，是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内阁，对于派兵西伯利亚，实行了削减兵力和限制派兵区域的措施⁶。

同时，美国的威尔逊政权向日本、英国、法国提议组成新四国借款团。一般认为是由美国提案，由日美英法共同向中国进行贷款。在谈判过程中，原内阁接受了所谓的“列记主义”，即只限于有条约根据的既得权益，可以将满蒙除外。这是因为英美方面不允许日本将满蒙作为区域除外的“概括主义”⁷。但是，北京政府对新四国借款团持怀疑的态度，日本也单独签订了与新四国借款团协议内容相抵触的南浔铁路延长借款和四洮铁路借款合同。

3) 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1919年1月到5月举行了巴黎和会。为了参加巴黎和会，原内阁任命西园寺公望为首席全权，枢密顾问官牧野伸显、驻英大使珍田捨巳、驻法大使松井庆四郎、驻意大使伊集院彦吉为全权代表。西园寺在会议开始以后才抵达巴黎，所以实际上发挥首席全权作用的是牧野。另一方面，中国代表团是以前外交总长陆征祥为首席全权，驻美公使顾维钧、驻英公使施肇基、王正廷为全权代表。

原内阁在巴黎和会上与英国合作，以继承旧德意志帝国的权益为主要目标，其它的问题则顺应大势。日中关系上，最大的问题是山东悬案。如前所述，在提出对华二十一条后的1915年5月，日中两国间缔结了关于山东权益的条约。据此规定，中国政府将德国保有的山东权益的处置，委交于日德之间的协议。1918年9月，日中之间又达成了以日本借款建设山东铁路的换文。

因此，牧野于1919年1月27日，在由日美英法意组成的五大国会议上要求将旧德意志帝国权益对其进行无条件转让。而中国代表团则强烈反对把旧德意志帝国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中国方面负责这个问题的顾维钧，被允许在次日28日的五大国会议上发言。此时，顾维钧发表了大战时的山东问题相关协议“只是临时暂行之办法”的一贯主张，要求直接归还山东权益。围绕山东问题，日中双方的看法如此明显互不相容。2月以后的会议是以创设国

⁴ 森川正则：《寺内内閣期における西原亀三の対中国『援助』政策構想》，载《阪大法学》，第50卷5号，2001年，第117—146页。

⁵ 高原秀介：《ウィルソン外交と日本》，创文社，2006年，第61—102页。

⁶ 细谷千博：《ロシア革命と日本》，原书房，1972年，第85—104页。

⁷ 三谷太一郎：《増補 日本政党政治の形成——原敬の政治指導の展開》，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第334—344页。

际联盟的讨论为中心，山东问题被束之高阁直至4月下旬⁸。

结果在巴黎和会上，日本的要求作为山东条款写进《凡尔赛和约》的第156条到158条。据此，德国将铁路、矿山、海底电线等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以不服此决定为由，中国代表团，没有参加6月28日《凡尔赛和约》的签字仪式。但是，中国在对奥议和的《圣日耳曼和约》上签了字，通过批准该和约，中国加入国际联盟，此后利用亚洲议席，曾多次当选国际联盟的非常任理事国⁹。

其间，在中国发起了以民众为主体的五四运动。因此，北京政府在6月10日罢免了成为运动抗议目标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輿。13日，国务总理钱能训也宣布引咎辞职。即使如此，以山东问题为开端的抵制日货运动，在此后的将近一年内都没有停息。无法消除对日不信任的中国，认为单独对日交涉不利，故而在巴黎和会后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将之留给了华盛顿会议。

同一时期，在满洲，张作霖实现了称霸东三省的夙愿。1920年7月张作霖在被称为直皖战争的北洋军阀混战中，支持直系，提高了自己的地位。张作霖取代了因此次内乱而没落的皖系，在北京政府中获得发言权，原内阁表现出希望与张作霖发展亲密关系的态度。1921年5月原内阁举行东方会议，明确了支持东三省的张作霖这一方针。但是，当奉系与直系在1922年春天陷入所谓第一次奉直战争的混战之时，虽然日本陆军的驻外机关主张应该支持张作霖，但高桥是清内阁的外相内田康哉等还是拒绝向张提供武器与财政支持。

2. 华盛顿体系的形成

1) 华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

从巴黎和会后到1920年，驻华公使小幡酉吉不断向中国呼吁交涉山东问题，要求取缔排日运动。但是，北京政府在1920年5月作出答复，拒绝就山东问题进行直接交涉。日本虽然提出了解决山东问题的条件，但中国认为单独与日本交涉不利，没有同意与其直接交涉。1921年1月，交换了废止日中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公文。

在美国，1921年3月共和党的哈定(Warren G. Harding)政权诞生。哈定政权提倡“回归常态(Return to Normalcy)”，试图从战时体制中转变过来。在哈定政权的呼吁下，华盛顿会议于同年11月开幕。华盛顿会议召开之前，原敬首相被暗杀，日本成立了与原敬同是政友会总裁的高桥是清为首相的内阁。高桥内阁让原内阁的所有成员留任，在对外方面也继承了原内阁的路线，但在内政上则向裁军方向转移。

华盛顿会议从1921年11月一直持续到次年的2月。华盛顿会议的主要成果有，关于中国的九国公约、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五国条约、关于太平洋问题的四国条约。在日中关系上，《九国公约》占有重要地位。所谓《九国公约》，是指于1922年2月通过的与中国相关的条约，除日本与中国外，美、英、法、意、比、荷、葡九国在该条约上签字。苏联没有被邀请参加会议。另外，日、美、英、法缔结《四国条约》，在其第4条中明文规定废除日英同盟。

日本的首席全权是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但与中国相关的部分则由驻美大使币原喜重郎全权负责。另一方面，北京政府会议期间在向国内征求意见的同时，在代表团中涵纳各派，

⁸ 服部龙二：《東アジア国際環境の変動と日本外交 1918-1931》，有斐阁，2001年，第20—46页。

⁹ 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第249—265页；另见唐启华：《北京政府与国际联盟（1919—1928）》，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

以塑造统一的形象。关于远东问题，作为中国首席全权的驻美公使施肇基，于1921年11月提出十项原则。在施肇基的十项原则中，包含了保护中国的领土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等项目¹⁰。

对此，美国全权鲁特(Elihu Root)提出维持现状性质的“鲁特四原则”。所谓四原则是，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中国政治发展，支持中国政府的巩固、维护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均等、各国不能在中国谋求特权，伤害他国权利等。因为采纳了鲁特四原则，所以既尊重了中国的主权，又在原则上维持各国的既得利益的方式，在各国之间达成一致。鲁特的路线也可以说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实行的对日协调政策。“鲁特四原则”，被载入《九国公约》第1条。因此，虽然《九国公约》的第3条规定了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但是在第1条却采用了维持现状的规定¹¹。

与此相关，美国国务卿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提出关于门户开放原则的决议案，作为门户开放原则的调查机关，拟议将“咨议会”的设立写入议案。依照休斯方案，“咨议会”能够对各国的既得利益从门户开放原则的观点来审议。从而，很有可能再次引发既得利益是否适用于门户开放原则的问题。但是，日本全权、驻美大使的币原喜重郎反对使既得利益成为“咨议会”的审议对象。因此，既得利益从审议对象中被排除，虽然关于门户开放原则的议案被采纳了，但可以说是缺乏具体成效的。

2) 山东问题与对华二十一条相关条约的修改、废除问题

在华盛顿会议上，也磋商了山东问题。日本与中国在1922年2月，签订了关于山东悬案的条约。条约中规定，以15年期的国库券赎回日本的铁路财产，在国库券的偿还期间，各安排1名日本人担任车务长和会计长，矿产由日中合办等。在山东问题的日中交涉过程中，来自美、英的马慕瑞(John Van Antwerp MacMurray)与蓝浦生(Miles Wedderburn Lampson)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为已陷入停滞的日中交涉打开了局面。这与巴黎和会把中国逼到拒绝签字的情形大不相同。

在华盛顿会议上，也缔结了关于中国关税的条约。同意中国增加征税的该条约的缔结，直接关系到此后的北京关税特别会议的召开。此外，华盛顿会议还讨论了西伯利亚撤兵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等，但是，关于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和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并未达成共识。

另外，1921年12月顾维钧全权提议收回在中国的租借地。对此，埴原正直全权坚持按《南满东蒙条约》已将关东州租借权延长为99年的立场。即，埴原解释为根据原内阁时期新四国借款团的交涉日本的特殊权益已获得美、英、法承认，还援引鲁特四原则作为维持在华权益现状的规定。英国也表示理解日本的立场，将关东州与英国的九龙租借地相比拟，而拥护埴原的主张。

即使如此，王宠惠全权还是提出废除与二十一条相关条约的要求。但是，不但日本对此持反对态度，美国和英国也态度冷淡。英国代表团支持日本的立场，认为讨论既成条约是不合理的。美国的休斯认为与二十一条相关的条约的修改、废除问题与山东问题密切相连，将其审议延期至山东问题解决之后。

¹⁰川岛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年，第266—318页。

¹¹麻田贞雄：《両大戦間の日米関係——海軍と政策決定過程》，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128—132页。

因此与二十一条相关的条约的修改、废除问题首次付诸审议，是在即将闭会之前的1922年2月2日。虽然日方的币原批判了中方的主张，但还是在三个条款上给予了让步。让步内容包括：除“列记主义”的南满特殊权益范围以外，将南满东蒙借款的优先权提供给新借款团；放弃在南满聘用外国人顾问的优先权；在此基础上撤销保留中的二十一条第5号。但是，这些让步不过是在1921年10月原内阁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的，预先计划好的形式上的让步而已。休斯也没有支持王宠惠的提案¹²。

另外，记者石桥湛三，在华盛顿会议召开之际，主张“做好放弃一切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说石桥认为，日本应该放弃满洲权益，承认台湾与朝鲜独立而与中国合作。石桥在东洋经济新报社成立了太平洋问题研究会，国民党议员铃木梅四郎、田川大吉郎、植原悦二郎以及知识分子等也都参加了这个研究会¹³。

3) 华盛顿体系的形成及其后

在日本学术界，通常以华盛顿体系的概念来讨论1920年代的国际秩序。即，所谓的华盛顿体系是日、美、英三国的合作外交体系，中国被置于其下，而苏联则被体制排除在外。体制的起点，正是从1921年到次年所举办的华盛顿会议。

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公约，对北京关税特别会议、北伐、1929年的中苏冲突、中国“革命外交”等事件的应对，成为体制的试金石。而使华盛顿体系崩溃的则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关于体系的另一个支柱《五国公约》，虽然在1930年第一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上，增强了对辅助舰等的军备限制，但是，日本在1936年1月宣布退出第二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海军的限制军备遂成为无条约状态。

日中两国间，外交总长王正廷与驻华公使小幡西吉于1922年12月签订了《山东悬案细目协定》以及《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关于山东铁路，以4000万日元的中国国库券作为交换，日本将铁路归还中国。同月，在青岛设立了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青岛守备军撤退¹⁴。

即使如此，在中国收回国权的运动依然继续高涨。其中，还有以收回日本租借地旅顺、大连为首的，对教育权、商租权及铁路权益等进行的国权收回运动。其中的商租权是指在南满洲的土地租借权，依据的是1915年日中之间缔结的《南满东蒙条约》。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旅顺、大连的回收运动。将二十一条的相关条约视为无效的北京政府，向日本主张关东州租借地的期限是到1923年3月。但是，由于中国的主张没有得到日本的承认，在中国各地引起了示威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

此时的日本，对中国打出所谓的“对支文化事业”的文化接近策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的赴日本留学生降至二、三千人左右，留学美国成为主流。把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文化事业的构想，自寺内内阁同意宽限中国因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暂停偿付赔款后便已出现。1922年6月，当外交总长颜惠庆通过驻华公使小幡请求将庚子赔款的偿付延长两年时，日本政府就将文化事业构想具体化了。

1923年3月日本政府制定了以“对支文化事业”为基础的特别会计法，外务省对支文化事务局事务官冈部长景和受外务省委托的东大教授入泽达吉进行了实地考察，试图推动奖

¹² 服部龙二：《東アジア国際環境の変動と日本外交 1918-1931》，有斐阁，2001年，第89—112页。

¹³ 增田弘：《石桥湛山》，中公新书，1995年，第73—81页。

¹⁴ 本庄比佐子编：《日本の青島占領と山東の社会経済 1914-22年》，财团法人东洋文库，2006年。

励留学日本、设置研究所和图书馆，通过东亚同文会在中国进行教育等事业。除庚子赔款的余额以外还把山东悬案解决时对山东铁路的赔偿金拿来作为此类事业的财源。同年4月，北京政府派遣江西教育厅长朱念祖等人到日本去。

1923年12月，再次赴日的朱念祖和驻日公使汪荣宝一起，与对华文化事务局长出渊胜次等人进行谈判，其成果就是1924年2月达成的备忘录。出渊·汪备忘录的内容是：在北京设立图书馆和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然后讨论设立博物馆、医科大学及医院，成立日中双方人数相等的评议委员会，会长由中国人担任等。由此可知，这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方面的意向。名称也从“对支文化事业”改为“东方文化事业”。尽管如此，其后与以东三省为中心的教育权收回运动相呼应，中国方面批判“东方文化事业”是文化侵略的声音接踵而至，1928年济南事件（中国称为“济南惨案”——译者注，下同）发生后，中国委员退出¹⁵。

3. 北京政府“修约外交”与第一次币原外交

1) 5.30事件（中国称为“五卅惨案”——译者注，下同）

1924年2月出渊·汪备忘录成立时，日本的首相是清浦奎吾。清浦是山县有朋的嫡系官僚，清浦内阁的内阁成员是以贵族院的研究会等为母体的，在政党关系上只以政友本党作为执政党。对于这样的清浦内阁，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的护宪三派批判其不合时宜。总选举中护宪三派大胜，6月，以宪政会总裁加藤高明为首相的护宪三派内阁诞生。加藤内阁在外交上实现了与苏联建交，也通过了男子普通选举法，政党内阁一直延续到1932年的5.15事件为止。

加藤内阁的外相是币原喜重郎。在1924年7月的议会上，币原公开主张：对中国坚持不干涉，在机会均等主义下加深两国国民的经济关系，依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建构国际秩序。币原在加藤内阁之外，还在第一次若槻礼次郎内阁、滨口雄幸内阁、第二次若槻内阁等宪政会—民政党系的内阁中，总计当了5年以上的外相。

币原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和郭松龄事件等中国内乱中，贯彻实行其不干涉的立场，但是却经常被日本陆军的高层和少壮派乃至外务省的驻外机关批判为无能。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日本陆军的驻外机关通过内部工作，导致冯玉祥的武装政变。冯玉祥的武装政变后，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举行会谈，由段出任临时执政。在郭松龄事件中，关东军武断地宣布，在满铁附属地30公里以内禁止战斗。此时的关东军认为：被苏联操纵的冯玉祥和国民党企图接近郭松龄，以赤化东三省。因此，与冯玉祥被迫流亡苏联相比较，张作霖却强化了在关内的影响力而最终作为大元帅君临北京。

此时，日本的棉业资本在中国设立了纺织工厂。在中国的日系纺织工厂被称为在华纺。原本在华纺的中心是上海，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华纺也发展到青岛和天津等地。日本的对华棉丝出口，以1914年为颠峰而后减少，由于工资高涨等因素，日本的纺织业在竞争力下降的情况下，为了掌握中国的棉丝市场，有必要打入当地经营纺织业¹⁶。但是，1925年

¹⁵ 阿部洋：《「对支文化事業」の研究——戦前期日中教育文化交流の展開と挫折》，汲古书院，2004年；山根幸夫：《東方文化事業の歴史——昭和前期における日中文化交流》，汲古书院，2005年。

¹⁶ 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綿業と中国》，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第107—132页。根据商工省贸易局：《日華貿易ノ概況》，1931年5月，第11—13页，日本对华贸易额发展情况如下(单位：日元)：90,037,354(1910

2月上旬，内外棉株式会社、大日本纺织以及日华纺织等上海主要的在华纺发生罢工。罢工也波及到青岛的在华纺，4月，大日本纺织的约2500名职工因要求调高薪资和改善劳动条件举行罢工。面对罢工，日本方面要求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予以取缔。

当时已经与德国和苏联缔结对等条约的北京政府，成功地从德国获得中国外交史上首次的赔款，与各国之间也试探着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目标的“修约外交”的机会。所谓“修约外交”，狭义指当不平等条约到期之际，要求修改、废除；广义上则包含1912年以来由北京政府进行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全部外交。

1925年5月30日，以英国为中心的租界警察，向在上海的示威队伍开枪，造成多人死伤。因此，6月以后，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活动。6月1日起，北京政府外交总长沈瑞麟三次向由日、美、英、法、意、荷等国公使组成的驻华公使团强烈要求释放被逮捕的学生等，防止事件的再度发生。6月24日，北京政府还向驻华公使团提出，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与各国的友好关系，是5.30事件的原因之一，以中国的国际地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还要低下等为理由，要求改善领事裁判权和租借地的情况。因此，5.30事件与不平等条约的修正问题直接相联。

关于5.30事件，中国的舆论最为批判的是主导镇压的英国。而以“日英美三国合作”为基本路线的币原外相采取的方针是，以解决5.30事件本身为先，如处理警察负责人、抚恤牺牲者等，对于没有直接关系的修改条约问题，则认为不需审议。北京政府外交部派遣的交涉员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就解决罢工的条件进行了谈判。在经过了对承认工会（依照劳动组组法）、支付罢工期间的薪资、调高薪资、禁止无理由的任意解雇等问题进行的协商，日中两国最终达成妥协。

2) 北京关税特别会议

在华盛顿会议上，1922年2月签订的中国关税条约规定：税率尽快改订为5%，为了废除地方政府征收的通行税——厘金，在条约实行后的三个月以内举行特别会议，在特别会议上规定2.5%的增税。也就是说，提出了承认总计7.5%附加税的方针。其后，中国的关税税率虽然改订为5%，但因法国批准的延宕，关税会议迟迟未能召开。法国终于在1925年8月批准条约，北京政府随即向各国呼吁于10月召开关税会议。政权基础薄弱的北京政府，竭力使会议成功而确保财政，提高政权的正统性。

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于1925年10月26日召开。中国派出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黄郛、蔡廷干等全权参加会议。日本代表团以日置益为首席，次席是芳泽谦吉，再加上佐分利贞男、重光葵、堀内干城以及日高信六郎等随员。外交总长沈瑞麟致开幕词，执政段祺瑞致欢迎词。王正廷全权要求恢复关税自主权，提议以5%到30%的等差税率作为暂行办法。对此，日置全权阐述了日本准备原则上承认关税自主权。这个原则性的承认方案一旦得到共识，获得关税自主权之前的暂行办法将成为会议的最大焦点。

年)、88,152,792(1911年)、114,823,727(1912年)、154,660,428(1913年)、162,370,924(1914年)、141,125,586(1915年)、192,712,626(1916年)、318,380,530(1917年)、359,150,818(1918年)、447,049,267(1919年)、410,270,497(1920年)、287,227,081(1921年)、333,520,262(1922年)、272,190,662(1923年)、348,398,787(1924年)、468,438,956(1925年)、421,861,235(1926年)、334,183,608(1927年)、373,141,991(1928年)、346,652,450(1929年)。

1926年3月，日美英三国从2.5%到22.5%的等差税率共同妥协方案被采纳之后，焦点移到了增收的关税是否要抵充债务整理的问题上。英国因为提出无条件承认2.5%附加税，所以即使抵充债务整理问题没有解决，也打算让会议就附加税提前实施达成共识。但是，注重债务整理的币原不赞成这个附加税提前实施方案。因此，会议在没有获得任何成果的情况下，于7月之后无限延期。币原的秩序构想，总体来说还是局限于华盛顿会上议决的框架之内的¹⁷。

由于北京关税特别会议毫无成果就结束等原因，对北京政府外交的普遍评价不高。但是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并非毫无具体成果。1926年11月，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顾维钧执行了被称为临时办法的暂行协议，使《中比友好通商航行条约》被迫失效。此外，北京政府在1920年代前期，收回了德、奥、苏联的天津租界。并且，1927年北京政府在与比利时交涉新条约时，双方达成了收回天津租界的共识。因此，保有天津租界的国家，只剩下日、英、法、意四国¹⁸。

3) 北伐与南京事件

其间，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¹⁹。并且，在广州的国民政府中，蒋介石于1926年6月成为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国民革命军朝向中国的再次统一，对北方展开了军事行动。伴随北伐的进展，1927年1月，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国民革命军又于同年3月占领了上海和南京。其间，1926年1月，加藤首相去世，日本成立了与加藤同属宪政会的若槻礼次郎内阁。币原外相留任于若槻内阁中，原为大藏省官僚的若槻把外交事务委任给币原。

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之时，在南京的日、英领事馆和外国人等受到中国国民革命军的袭击。由美国教会创办的金陵大学也遭受损害。对此，英美两国以军舰炮轰南京城。但是，日本因居留民的要求并未采取报复行动。若槻内阁的币原外相，反对就此事件制裁中国，反而高度评价蒋介石，计划以蒋为交涉对象。因此，币原被指责是软弱外交。

3月25日，南京事件发生后第二天，第六军第十七师师长杨杰拜访了南京领事森冈正平。对南京事件，杨表示遗憾，然后说“掠夺是由在南京的共产党员煽动、引导匪兵所造成的，将即时彻底取缔，在设置外交部的同时，也接受赔偿的交涉”。如此，杨将南京事件的责任推卸给共产党，这一说法通过森冈的电报，也影响到了币原的中国观。不仅如此，蒋介石也通过黄郛开始向日方表示南京事件是共产党所为。

在此情况下，币原向矢田上海总领事训令：对蒋介石等人“促其深刻反省与下定决心”。也就是说，币原暗示希望蒋介石对“共产派”采取断然处置。从支持形成中国新秩序的观点出发，币原持续采用“外交的和平的方法”，并认为应该由“像蒋介石这样的中心人物”来收拾局势。如此判断的根本原因中，存在着重视经济利益的国家利益观。4月12日，蒋介石

¹⁷ Akira Iriye,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57-88; 白井胜美:《日本と中国——大正時代》，原书房，1972年，第196-254页。

¹⁸ 服部龙二:《東アジア國際環境の変動と日本外交 1918-1931》，有斐阁，2001年，第156-169页。

¹⁹ 关于这一时期前后的孙文，最近的研究有：田嶋信雄:《孫文の『中独ノ3国連合』構想と日本 1917-1924年——『連ソ』路線および『大アジア主義』再考》，载服部龙二、土田哲夫、后藤春美编:《戦間期の東アジア國際政治》，中央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52页。

石在上海发动了反共政变。

除了以蒋介石为交涉对象外，币原的方针还有一个特征，就是配合英国和美国的步调。在南京事件中，日本一度与英、美、法、意共同发出通牒，但是，其后与各国间的协调变得困难。特别是，英国主张向中国再发通牒，但是美国反对这个主张。因此，与中国的交涉，由各国分别进行²⁰。

此外，1927年4月3日发生了汉口事件。根据日本外务省的调查，在汉口日本租界的日本水兵遭到中国群众的袭击是导致事件发生的契机。此时，日本派遣海军陆战队登陆以确保租界，但是称币原是软弱外交的舆论在日本依然高涨。另一方面，发动反共政变的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汪兆铭率领的武汉国民政府，也在9月与南京国民政府合并²¹。

4. 国民政府“革命外交”与田中外交、第二次币原外交

1) 第一次山东出兵、东方会议、山本——张铁路协约

若槻内阁于1927年4月20日下台，随后成立了政友会的田中义一内阁。政权更迭的主因是金融危机，但是政友会也不满币原的外交政策。当北伐从华中推进至华北时，田中内阁于5月下旬，为了保护居留民而出兵山东，向山东省派遣了日本陆军的一个旅团。国民革命军从山东省撤退。作为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的妥协案，蒋介石在8月下野，其后第一次北伐中断。虽然来到日本的蒋介石于11月到田中的私邸去拜访，但田中与蒋之间的鸿沟并未消弥²²。

其间的1927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田中内阁召集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人，举行了一个大规模会议——东方会议。在此，作为整体性的方针，田中训示了“对华政策纲领”。对田中而言理想的是，有反共倾向的蒋介石与张作霖将中国一分为二南北分治。田中一方面认可由蒋介石来实现统一，另一方面却让张作霖回到东三省以谋求作为地方政权的稳定。

不过，田中本并没有把日本外务省和陆军的政策构想融汇到一起。可以说是东方会议总结的《对华政策纲领》中，有很多繁杂的主张，在前言中提到了“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不得不对中国本土和满蒙有不同的取向”，在第6项中又主张：“通贯满蒙南北，均依照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促进内外人等的经济活动”。《对华政策纲领》中，自相矛盾之处不少²³。

与东方会议相关，还有一份被称为“田中奏折”的奇怪文件。这个“田中奏折”，被认为是田中首相向昭和天皇上奏的文书。其内容是依据东方会议作出的侵略中国的计划。但是，

²⁰ 服部龙二：《幣原喜重郎と二十世紀の日本——外交と民主主義》，有斐閣，2006年，第110—112頁。但是，关于南京事件的原因，现在的学界并未断定为“共产派”，也有北军阴谋论等说法。关于这一点，参考栃木利夫、坂野良吉：《中国国民革命——戦間期東アジアの地殻変動》，法政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59—262頁。

²¹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I、第1部、第1卷（外务省，1989年），第660—666頁；家近亮子：《蒋介石と南京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的権力浸透に関する分析》，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55—136頁。

²² 佐藤元英：《昭和初期对中国政策の研究——田中内閣の対滿蒙政策》，原书房，1992年，第23—76頁；小林道彦：《田中政友会と山東出兵——1927-1928 (1)(2)》，载《北九州島市立大学法政論集》，第32卷第2、3号、第33卷第1号，2004-2005年，第1—33、1—52頁。

²³ 佐藤元英：《昭和初期对中国政策の研究——田中内閣の対滿蒙政策》，原书房，1992年，第77—164頁。

“田中奏折”的奏文，与实际的东方会议大相径庭²⁴。

田中内阁很重视在满洲的铁路政策。田中内阁于同年10月，透过满铁社长山本条太郎，与张作霖签订了满蒙五铁路协约。这个协约被称为山本——张铁路协约，是田中外交与张作霖关系的一个支柱。并且，田中内阁交涉了以敦化—老头沟—图们线、长春—大赉线、吉林—五常线、洮南—索伦线以及延吉—海林线5条铁路的承包建设为骨架的山本——张铁路协约细则，1928年5月缔结了除吉林—五常线之外，其它各条铁路的承包建设合同。

2) 济南事件与张作霖被炸事件

当蒋介石于1928年4月重新开始北伐之后，田中内阁第二次出兵山东。在济南担任保护居留民任务的日本军队是，中国驻屯军临时济南派遣队与第6师团。但是5月3日，日军与国民革命军在济南发生冲突。日本驻青岛总领事藤田荣介报告“三日上午十时左右，接获日本人家内有中国兵掠夺之报，因赶赴救援的我军四名遭枪击受伤，我军不得已应战”²⁵。但是，与很多事件的情况相同，关于济南事件的起因日中双方史料存有分歧。

济南事件发生之际，田中内阁决定了第三次出兵山东。尽管列举准确的数字是困难的，但济南事件中导致了中国方面比日本方面更多数的死伤者。这时吉野作造论述道：“以本次此种方式与中国作战，对我国来说是一大丑闻。”²⁶围绕济南事件事后处理的日中交涉进展困难。

即使如此，经过在济南的日本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井石根与张群之间的交涉、在南京的驻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与外交部长王正廷之间的交涉、在上海的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与外交部长王正廷之间的交涉，以及新任驻上海总领事重光葵与外交部第二司长周龙光之间的交涉，终于在1929年3月，由芳泽公使与王正廷外交部长签订了解决济南事件的文书，其内容有发表内容为“将伴随该事件的不快感情，从记忆中一扫而空，期望将来两国国交益加敦厚”的共同声明、通过共同调查委员会的损害调查向双方进行赔偿、国民政府保证保护日本人、以及日本的山东派遣军在两个月以内撤退等，如此济南事件得以解决²⁷。

另一方面，田中首相于1928年5月，为了实行对东三省治安维持而进行全面积极干涉的内阁决议，向芳泽公使训示：若奉军早期撤回东三省，则阻止国民革命军对其追击，但若是因交战状态而撤退的话，则要求两军都解除武装。田中意图使奉军尽早撤退，把解除武装仅设想为最后的手段。

国民政府一方面批评田中内阁的政策是干涉内政，一方面向日本表示奉军撤退时不加追击，由阎锡山负责京津地区的治安。而张作霖也对町野武马顾问传达了要向奉天出发的想法。

²⁴ 驻华临时代理公使重光葵向曾国民政府外交部指出“田中奏折”的根本性错误，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对于日本的希望对其进行取缔的请求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回应。因此，国民政府外交部知道“田中奏折”是伪造的可能性并不小。其史料根据，参见服部龙二：『田中上奏文』と日中関係，载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民国後期中国国民党政権の研究》，中央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55—493页；服部龙二：『田中上奏文』をめぐる論争——実存説と偽造説の間，载刘杰、三谷博、杨大庆编：《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日中対話の試み》，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84—110页；《満州事変後の日中宣伝外交とアメリカ——『田中上奏文』を中心として》，载服部龙二、土田哲夫、后藤春美编：《戦間期の東アジア国際政治》，中央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99—275页可供参考。

²⁵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I，第1部，第2卷（外务省、1990年），第344页。另外，作为北伐战争时期日中关系的中方学者的研究，有邵建国的《北伐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研究》，北京：新华出版社，2006年。

²⁶ 吉野作造：《吉野作造选集》第九卷，岩波书店，1995年，第345页。

²⁷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昭和期I，第1部，第3卷，外务省，1993年，第501—507页。

可以看出，虽然田中首相的构想表面上受到批判，但实际上逐渐获得了中国南北两方势力的理解。

对田中构想的激烈批判，反而是来自日本陆军方面。陆相白川义则从一直以来的援助张作霖的论调转变为主张张作霖下台，而第一部长荒木贞夫也热心主张向满铁附属地外派兵以解除奉军的武装。陆军中央是与村冈长太郎司令官率领的关东军的立场接近的。

但是因关东军的阴谋而在6月4日发生的张作霖被炸死亡的事件（中国称：皇姑屯事件——译者，下同），实际上葬送了田中首相的构想。当张作霖从北京向奉天出发，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等人，就将张作霖连同列车一起炸掉。张作霖被炸死亡事件，在当时也被称为满洲某重大事件。因为这个事件，田中内阁失去了作为满洲政策支柱的张作霖。张作霖死后的满洲，由其子张学良掌握实权。

张学良政权于同年12月，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合并。此事意味着中国的再次统一。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东北易帜。当张学良政权将满洲问题的外交权移交给国民政府后，田中内阁所重视的满洲铁路政策就此停顿。

3) 国民政府“革命外交”

从被正式承认之前，国民政府在中国南方，已经开始展开了积极的对外政策。其方法是不惜诉诸武力也要强制执行的收回国权的政策，这经常被称为“革命外交”。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典型应该算是1927年1月收回汉口、九江的英国租界。而最初倡导“革命外交”的是陈友仁。陈友仁曾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后为武汉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到了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黄郛和王正廷，使欧美各国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让欧美各国承认关税自主权，是国民政府初期外交的主要成果。在通商条约的修订、等差税率的暂定实施、对外资企业出口征收附加税，以及陆路优惠关税的废除等通商问题上，国民政府也开始收获成果。但是，这些外交上的成果，不应只归功于黄郛和王正廷等的政治指导。美国等国的倾向中国的应对，早因北京政府末期的“修约外交”而有一定程度的准备，还有国民政府的通商政策大致上也是继承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缘故。对于中国这样的方针，日本也被迫应对。在承认关税自主权上慢了一步的田中内阁，在等差税率和出口附加税的问题上，摸索了和英国保持共同步调的方法，但并没有成功。

田中内阁成功阻止了国民政府接收汉冶萍公司和南浔铁路，但是被迫趋于守势，而在满蒙铁路的交涉上，也受到挫折。这是因为张学良政权在易帜之时将中国东北的外交权移交给了国民政府²⁸。多年之后，王正廷回忆说：“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国国民，经常向中国表示宽大的友情”，而驻华英国公使蓝普森也曾回忆说“对于富有智慧且多才的，又在追求完全平等的中国，是持同情态度的”。另一方面，王正廷则提到“在对日政策上，一直十分谨慎小心”²⁹。

²⁸ 久保亨：《戦間期中国〈自立への模索〉——関税通貨政策と經濟發展》，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23-49页；服部龙二：《東アジア國際環境の變動と日本外交 1918-1931》，有斐阁，2001年，第218-226页；小池圣一：《満州事變と対中国政策》，吉川弘文馆，2003年，第115-127页；后藤春美：《上海をめぐる日英關係 1925-1932年——日英同盟後の協調と対抗》，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98-99、154页。关于“革命外交”也参照了李恩涵的《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²⁹ 服部龙二编：《王正廷回顾录 Looking Back and Looking Forward》，中央大学出版部，2008年，第131-

如此田中外交逐渐陷入束手无策的状态。关于从 1928 到 1929 年的国民政府“革命外交”与田中内阁的对应，请参见下表。在日本国内，在野党的民政党加强了对田中外交的批判。得知张作霖被炸事件真相的田中首相，曾一度向昭和天皇承诺严惩。但是，因陆军压力的增大，最后仅止于对相关人物进行了行政处分。结果，河本大作被停职，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被编入预备役。在昭和天皇斥责田中背叛后，田中内阁于 1929 年 7 月总辞职。民政党的滨口雄幸内阁诞生，币原复职担任外相。

国民政府“革命外交”与田中内阁的对应（1928-1929 年）

“革命外交”的三 种类型	内 容	田中内阁的对应
不平等条约的修 改方法	恢复关税自主权	留待下届内阁解决
通商政策	缔结新通商条约	同意交涉
	暂定实施差等税率	承认引入差等税率的基础上追求将其抵 充整理外债，最后失败
	对外资企业出口征收 附加税	阻止征收的工作失败
	废除陆路特惠关税	因抗议而延期
重要产业接收政 策	接收汉冶萍公司	进行抗议使放弃接收
	南浔铁路国有化	成功地保持了债权

（出处）服部龙二：《東アジア国際環境の変動と日本外交 1918-1931》，有斐閣，2001 年，第 222 页。

4) 奉苏战争与经济关系

1929 年的下半年，中苏之间发生纠纷，起因是中国的收回中东铁路政策。因为最初中国方面的当事人是张学良政权，所以这次中苏纠纷也被称为奉苏战争（中国称中东路事件——译者，下同）。在日本，在滨口内阁中币原复任外相，在其后的第二次若槻内阁中，币原也作为外相留任。关于奉苏战争，币原分别与驻日中国公使汪荣宝以及驻日苏联大使托洛雅诺夫斯基(Aleksandr A. Troianovskii)会谈，努力斡旋中苏之间的直接交涉。

币原的想法是，只要苏联的要求是恢复原状，中国方面则不得不认可这个要求。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打算由日、美、英、法等非战公约的批准国组成委员会。但是外交部长王正廷不认为史汀生的尝试是有效的。不久，张学良表示了将中东铁路恢复原状、立即释放检举者等几乎全面接受苏联方面要求的意向。如此，以哈巴罗夫斯克作为舞台的中苏交涉，迅速迈向终结。东北政权与苏联政府于 12 月在关于中东铁路恢复原状的议定书上签字，国民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也签订了同样的议定书。奉苏战争终于结束³⁰。

132 页。

³⁰ 土田哲夫：《1929 年の中ソ紛争と『地方外交』》，载《东京学艺大学纪要 第 3 部门 社会科学》，第 48 集，1996 年，第 173-207 页；土田哲夫：《1929 年の中ソ紛争と日本》，载《中央大学论集》第 22 号，2001 年，第 17-27 页；服部龙二著，雷鸣译，米庆余校正：《中国革命外交的挫折——中东铁路事件与国

1929年11月，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在箱根的旅馆离奇身亡。于是，日本任命小幡酉吉为继任的驻华公使。可是中国表示难以接受（Agreement）小幡。Agreement是指，大使或公使任命之前，赴任国的国家给予的承认。以过去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时，小幡是驻华日本公使馆的一等书记官为理由，国民政府表示难以接受小幡。而且，王正廷外交部长以接受小幡作为交换条件，向日本提议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但是，小幡在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之后的1918至1923年曾担任过驻华公使，其后也担任过土耳其大使等职务。币原外相把中国的交换条件作为无理的要求而驳回。结果，中国拒绝接受小幡。

滨口内阁高举着解决经济不景气的政策目标，由藏相井上准之助果断执行解除黄金出口限制政策。不仅如此，对中国的经济扩张，也是重要课题之一。1930年1月，币原命驻华临时代理公使重光葵负责关税自主权的交涉。在中国，积极推进《日中关税协定》的是试图使财政安定化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正廷则把关注点放在争取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上。因此，重光与财政部长宋子文进行关税自主权的交涉。《日中关税协定》于5月签订，其换文中规定：棉产品和海产货的现行税率维持三年不变，关税协定实施四个月后废除特惠关税等。

其次在日中关系上，废除治外法权问题和整理外债问题成为中心课题。外交部长王正廷强烈要求立即废除治外法权，但是对于此事，各国的步调并未一致。与废除治外法权同时成为焦点的是，如何使中国偿付外债的问题。日本保有西原借款等未经担保的债权，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进行关于整理外债的交涉。在国民政府内部，宋子文希望恢复与外国的信赖关系以活跃其对中国的投资，但是，王正廷公开表示拒绝偿还西原借款。这是因为在中国西原借款作为利用军阀之间内争的资金而臭名远扬。所以，重光努力与宋子文和蒋介石合作。但是，1931年9月，满洲事变爆发，整理外债的交涉就此停顿³¹。

5) 在中国的日本人社区

最后，笔者希望谈一下在中国的日本人社区问题。根据日本外务省亚洲局的调查报告，到1930年底，在中国的“本国人”有903311人。所谓的“本国人”是把“内地人（日本本土人一译者，下同）”、“朝鲜人”和“台湾人”合起来的概念。903311人中包括：“内地人”283870人、“朝鲜人”609712人、“台湾人”9729人。“内地人”的分布是：关东州116052人、满洲112732人、“中国本部”53212人、香港1868人、澳门6人。因此，在中国的“内地人”约28万人之中，约有23万人居住在关东州及满洲。

“内地人”居住于“中国本部”的53212人之中，将近半数的24182人住在上海。24182人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有18607人、在法租界的有392人、在“附近中国街”的有5183人。上海以外，青岛11211人、天津5760人、汉口2137人、济南2048人、北平1208人。

际政治（1929年）》，载米庆余主编，宋志勇、藏佩红副主编：《国际关系与东亚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94—308页。

³¹ Edmund S. K. Fung,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 1924-1931* (Hong Kong,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84-189; 久保亨：《戦間期中国〈自立への模索〉》，东京大学出版会，1999年，第51—71页；服部龙二：《東アジア国際環境の変動と日本外交 1918-1931》，有斐阁，2001年，第263—278页；小池圣一：《満州事変と对中国政策》，吉川弘文馆，2003年，第127—218页。

“朝鲜人”609712人之中，605325人居住在满洲。另外，关东州的中国人口是820534人³²。

其中，在满洲日本人的居住地，有九成左右是集中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上。在满洲的日本人将近半数是满铁公司员工和关东厅官吏及其家属，其他有日本企业分公司的相关人员、贸易业者、以及面向在满洲的日本人营业的工商业者和服务业者等。因此，满洲的日本人社会以满铁公司员工和关东厅官吏为中心，其周围有一些向日本人提供服务的工商业者和服务业者。1920年代，在满洲日本人的经济活动因满铁整顿裁撤公司人员而低迷。日本人的居住地，逐渐固定于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张学良政权与日本之间，也曾因“满铁包围铁路网计划”和土地租借问题起过争执³³。

1930年代初期，约有24000名日本人居住在列强各国权益集中的上海。他们大多居住在公共租界的北部。在上海的日本人，大致可以分成：以追求更好的生活主要从西日本移居的“定居派”与在公司和银行的分店、纺织公司等工作的“公司派”。因此，上海的日本人社会与上海的英国人社区等一样都是阶级社会。1931年7月，因万宝山事件抵制日货运动高涨时，上海的日本居留侨民并不指望上海总领事馆，而是期待日本海军的保护。在日本外务省和日本海军之间造成了意见沟通上的障碍³⁴。

在天津，从1898年以来设立了日本租界，作为在中国的日本专管租界，是最大的一个。居留日本侨民人数仅次于满洲、上海、青岛。与上海、汉口等同样，在天津也设立了居留民团，负责自来水和电力等的行政工作。租界的运作，由决议机关的居留民会和执行机关的行政委员会负责。在天津的日本人以贸易业为中心。天津日本人社会的上层中，有大企业的分店店长、贸易商人、运输和通讯业者、金融业者、医生、律师等，其下有中层的当地商人，更下层则有小规模的杂货商和餐饮业者等等。1920年代晚期，在天津的日本人为了应对中国的抵制日货、废除治外法权、收回租界等运动，曾打算结合在中国各地的居留民团和商工会议所向日本政府请愿，但并未成功³⁵。

如此，在中国各地的日本人与中国之间，存在着不少的摩擦。满洲事变后，日本外务省在留意李顿调查团的基础上，整理了关于权益损害的报告书。外务省的书报中，记载着中国各地抵制日货等事项³⁶。其后的李顿报告书也未支持中国方面所谓中国的抵制运动是合法进行的主张³⁷。

³² 外务省亚细亚局：《支那在留本邦人及外国人人口统计表(第23回)》，1930年12月底现在，载木村健二、幸野保典解題：《战前期中国在留日本人统计》第4卷，不二出版，2004年，第1、96、106、108、110—111、119—120页。

³³ 塚濑进：《满洲の日本人》，吉川弘文馆，2004年，第46-51、120—121、161—170页。

³⁴ 上海居留民团创立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编纂委员：《上海居留民团创立三十五周年纪念志》，上海居留民团，1942年；高纲博文：《西洋人の上海、日本人の上海》，载高桥孝助、古厩忠夫编：《上海史 巨大都市の形成と人の営み》东方书店，1995年，第123—131页；后藤春美：《上海をめぐる日英関係 1925-1932年》，第45—48、217—243页。根据上海居留民团创立三十五周年纪念志编纂委员：《上海居留民团创立三十五周年纪念志》，上海居留民团，1942年，第1101页的记载：“在居留侨民之间出现了所谓定居派与公司派的区分，并且有相当激烈的竞争，民会似乎也有纠纷。”“定居派”与“公司派”的对立不只是在上海，在天津和汉口也同样存在。

³⁵ 白井忠三编：《天津居留民团三十周年纪念志》，天津居留民团，1941年；小林元裕：《天津のなかの日本租界》，载天津地域史研究会编《天津史——再生する都市のトポロジー》，东方书店，1999年，第185—207页。另外，关于重庆、汉口、杭州等租界，参考大里浩秋、孙安石编：《中国における日本租界——重慶・漢口・杭州・上海》，御茶の水書房，2006年。

³⁶ 服部龙二编：《満州事変と重光駐華公使報告書——外務省記録「支那ノ対外政策関係雑纂『革命外交』」に寄せて》，日本図書センター，2002年。

³⁷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 满洲事变》别卷（外务省、1981年），第227—229页；加藤阳子：《満州事

结语

在本章，追溯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满洲事变爆发前的日中关系。主要的争论点有对华二十一条、西原借款、新四国借款团、巴黎和会与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公约与山东条约、“东方文化事业”、5.30事件、北京关税特别会议、北伐与南京事件、出兵山东、张作霖被炸身亡事件、奉苏战争、拒绝小幡使华、日中关税协议、中国废除治外法权问题与整理外债问题、日本人社区等。而1920年代东亚的国际秩序是华盛顿体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日本的失策是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非常强硬地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这一过分的要求。但是这并不是说明从此日本开始了一系列大陆扩张的冒进。重要的是加藤高明、币原喜重郎等人尝试努力从二十一条这个经历中汲取经验。后来当上首相的加藤把外交交给币原外相，将宪政会置于体制内，日本迎来了政党政治的时代。

包括原内阁在内，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总体来说是在坚守与英美合作的框架。贯穿整个1920年代，在日本外交中发挥中心作用的是币原，币原不仅作为驻美大使参加了华盛顿会议，还担任了五年以上的外相。最能体现华盛顿体系的只有币原。以华盛顿会议精神为基础的币原外交，对走向统一的中国表示理解。然而，尤其是南京事件后，在日本国内攻击其为“软弱外交”的声势高涨。实施了出兵山东的田中外交也并非想脱离华盛顿体系，但是关东军却违反田中的本意炸死了张作霖。

而中国在此期间，由北伐与东北易帜实现了再次统一。虽然袁世凯死后，政局一度混乱，但可以说，通过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和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等，中国一直在追求政治上的稳定和收回国权。日本与中国之间所进行的包括“日中提携”构想、文化交流等在内的各种各样可能性与尝试，也是这个时代的重大特征。

成为1920年代国际秩序的华盛顿体系不仅包括了与中国相关的内容，也包含了海军裁军、太平洋等多方面的内容。关于日中关系，华盛顿体系具备了两个方面。第一，基于华盛顿会议的精神，日本以与英美合作为基轴，相对抑制了日本的大陆扩张。第二，各国的在华权益根据华盛顿会议得到基本维持，日美英的合作正是以维持在中国的现状为前提的。对中国而言，华盛顿体系虽然在承认不平等条约方面有不利的一面，却在抑制日本方面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这也可以说是华盛顿体系的双重性。

如此华盛顿体系并非固定不变，而在逐渐发生变化。在应对中国收回国权与走向统一方面，日美英之间没有达成充分的共识。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得以开展“修约外交”与“革命外交”，使得日美英的步调混乱、分化其秩序构想。特别是田中外交时期的日本，在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构建上落后了。不久，在满洲事变中，币原外相也在与中国的直接交涉中受挫，而逐渐向陆军中央主导的傀儡政权构想妥协。应该说由于币原外交的变质与崩溃，最终是由日本拉下了华盛顿体系的落幕。

変から日中戦争へ》，岩波新书，2007年，第141—142页。

1.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译者，下同)

1) 柳条湖事件

1931年9月18日晚，在奉天郊外的柳条湖，满铁铁路线被炸。该事件是主谋者作战参谋石原莞尔与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的计谋¹。负责守备铁路的关东军将此推为中国军队所为，以自卫名义，迅速占领了奉天。

柳条湖事件发生的数月前，在陆军省部(陆军省与参谋本部)的课长级别间，就一旦在满权益受到重大侵害就动用武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²。他们本来设想，在发动武力之前，为得到国内外的理解与支持，需要进行1年左右的舆论工作，因此柳条湖事件发生得过早了。但是既然关东军断然行使了武力，支持关东军的行动就被视为理所当然。作为日军动用武力的背景之一，是日方希望达到让张学良政权停止实行“排日”政策，维持与增进日本的在满权益的目标。因此，在满洲树立取代张学良政权的亲日政权之事，也在其考虑之中。

但是，对于主谋石原和板垣而言，发动武力并不仅仅是为了单纯的自卫和保护权益。他们是试图占领包括北满在内的整个满洲(中国东北——译者，下同)。如此，满洲的武力行使是违背了日本政府和陆军指导部的基本方针而发动的。首先，石原与板垣等陆军激进派军人认为，中国在民族主义激进的背景之下所实行的“革命外交”，致使日本的满洲权益濒临危机，而币原外相的对华外交又丝毫未见成效。因此激进派军人们试图通过策略挑起日中间的冲突，通过强行动武来一举解决满洲的“危机”。

第二，他们还认为在满洲的军事行动也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满洲的危机，同时也是出于日本国防上的考虑。看到苏联在1929年奉苏战争(中东路事件——译者，下同)中的行动，石原等人判断苏联的军事威胁正在逐步复活。为对抗苏联的军事威胁，他们计划将满洲全土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他们认为，若控制了满洲全土，则在对苏国防上会得以处于有利形势，同时，可以确保满洲的丰富资源，以构筑日满一体的自给自足圈。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自给自足圈的构筑也是少壮派军人学到的总力战(动员全国国力发动的战争——译者，下同)之前提。

第三，他们也期待通过发动武力造成围绕日本的国际关系紧张，形成对外关系的危机，从而能够引发日本国内政治改革的气运。激进派军人认为，政党政治埋头于“党利党略”而忽视国防，也不顾国民的利益和要求。他们的目标是打倒“腐败堕落”的政党政治，为了总力战而进行国家改造。因此，在满洲发动武力，也被他们视为改造国家的契机。

于是柳条湖事件在石原等人的周密计划和构想下发生了。事件之后，占领奉天的关东军更进一步推进，占领了安东、营口、长春等满铁沿线的要地。并且以保护居留民为名义，又进入到远离满铁沿线的吉林，并以南满洲的防备因此而人手不足为理由，向日本朝鲜军(在朝鲜的日本军队——译者，下同)要求援助。

接到事件报告，在东京的若槻(礼次郎)内阁，于9月19日决定了不扩大事态的方针。陆军领导层承认了关东军的行动，向政府提出允许日本朝鲜军越境(进入满洲)的要求，但因违反不扩大事态方针而未被批准。但是，向来与关东军幕僚之间有着派遣援军默契的

¹ 关于柳条湖事件的阴谋，参考秦郁彦：《柳条湖事件の再検討》，载《政治経済史学》，第183号，1981年8月。

² 《满洲問題解決方策の大綱》，载小林龙夫、島田俊彦编：《現代史資料7・满洲事变》，みすず书房，1964年，第164页。

日本朝鲜军，不耐烦于陆军指导层迟迟无法得到政府的认可和天皇的裁示，于 9 月 21 日专断地越过了国境鸭绿江。若槻内阁不得不在其事后对日本朝鲜军的增派进行追认。未得到天皇裁示而独断越境，本属违反军法，应成为被处罚的对象，但是，和柳条湖事件的阴谋一样，此事在若有若无地的情况下不了了之。而此后，不断重复着一旦部分在华军队突然行动，在东京的陆军领导阶层和政府则随后追认在华军队行动的模式。

而媒体的态度也是十分强硬的。各报直接采用关东军的说法，向读者解说事件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行动，在说明关东军采取行动的 background 时，则说明是由于屡次发生排日行为以及日本的权益不断受到侵害，把关东军的行动作为行使自卫权而加以正当化。围绕事变，报纸陆续展开了活跃的报导战，利用事变来扩大发行量。而这种强硬论则起到了煽动国民的作用³。

日本国民对关东军行为的支持，基于政府的说明，即动用武力是为了自卫和保护权益。然而，正如上所述，关东军的石原等人的目的已经超过了自卫和保护权益，而是计划占领整个满洲。但是，甚至连陆军指导层的激进份子也没有同意占领满洲的方案。因此，石原等关东军又把设想改为在满洲建立独立国家，但是这一设想也没有得到积极的支持。支持关东军发动武力的人，多是基于自卫或保护权益的理由。即使陆军中坚层的强硬论者们所期待的，也最多不过是希望建立一个可以取代张学良政权的新的亲日地方政权罢了。

2) 中国的应对与国际联盟

关东军的军事行动基本得以按照计划进行。其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方面未尝试武力抵抗。事变发生时，张学良带着 10 万大军滞留在北平（北京），在满洲有二十几万东北军的大军，而关东军的兵力还不满 2 万。但是，在事变前，蒋介石就命令张学良不可刺激日本，而张学良也指示奉天的部下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

事变爆发之后张学良也继续不抵抗方针，是因为他认为日本政府应该能够恢复对关东军的控制。其中，也牵涉到张学良作为军阀的考虑。他担心如果东北军和关东军作战而损耗兵力的话，将会削弱自己的权力基础⁴。同时，蒋介石也没有命令张学良进行武力抵抗⁵。最初，中国政府也期待通过日本政府控制关东军。9 月 19 日，财政部长宋子文对驻华公使重光葵提议，由日中两国对事件进行共同调查，也正是因为还对日本政府抱有此种期待⁶。但是，及至关东军陆续占领了南满要地，中国不得不放弃通过与日本的直接交涉来解决问题的想法。

当时，国民政府正与以江西省为根据地的共产党势力进行军事对峙，与同年 5 月成立的广东政权也存在对立关系，没有对日本进行武力抵抗的余力。因此，国民政府希望通过采取以下两种方法来抑制日本的行动。即抵制日货运动和向国际联盟控诉。柳条湖事件以后，抵制日货作为反日抵抗运动，其规模和激烈程度都有所增加，但却仍然无法抑制关东军的行动。

另一方面，国际联盟也没有按照中国所期待的行动。英法等大国，在将国际秩序的动摇限制在最小程度的同时，把日本的行动视为维护权益与自卫措施，在这种情况下，采取

³ 池井优：《1930 年代のマス・メディア》，载三轮公忠编：《再考太平洋戦争前夜》，创世记，1981 年，第 177-185 页。

⁴ 宇野重昭：《中国の動向（1926～1932 年）》，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太平洋战争原因研究部编：《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 2 卷，朝日新闻社，1962 年，第 274 页。

⁵ NHK 取材班、白井勝美：《張学良の昭和史 最後の証言》，角川书店，1991 年，第 123-127 页。

⁶ 关于柳条湖事件之后国民政府内部的对日直接交涉的论证，参考加藤阳子：《満州事变から日中戦争へ》，岩波新书，2007 年，第 107-111 页。

的是在顾虑日本立场的同时，要求其自制。另外，他们也对向来主张合作维持国际秩序的币原外交有所期待。币原主张通过与中国的直接交涉来解决事变带来的问题。对此，中国则反驳，应该首先解除关东军对重要地区的占领，即关东军撤回到铁路附属地区内才是先决条件。9月30日，国联理事会决议，日军应尽早撤退，但却未对撤退规定期限。而中国方面关于派遣撤退监视员的要求也遭到拒绝。

但是，关东军还是不顾国联的要求而采取了冒进行动。在日本国内，10月中旬，发现了参谋本部的中坚将校主谋的政变计划（十月事件）。政变虽以流产告终，却给打算抑制陆军的政府则造成了无形的压力。10月8日，关东军轰炸了张学良作为收复东三省根据地的位于满洲西南部的锦州。并且，因为担心刺激苏联而被陆军指导层压制住的对北满地区的进攻，也付诸行动，于11月19日占领了要塞齐齐哈尔。参与在满洲成立新国家是被日本政府所禁止的，但是关东军无视政府方针，在背后促进在满洲各地建立独立于国民政府的地方政权，并以阴谋制造骚动，将预定作为新国家首领的废帝溥仪从天津带到了满洲。

于是，日本所谓为了维护权益的自卫行动的主张开始失去说服力，国际联盟对日本的不信任感逐渐增强。10月24日，理事会提出了日军限期撤退的劝告案，但因日本一国的反对而遭到否决。结果，理事会在征得日本的同意后，于12月10日决定向当地派遣调查团，把问题的解决推迟到调查结束之后。由于日本的主张，调查对象不仅于满洲的事态，而把中国的全体状况（排外运动和政府的条约义务履行能力等）也包含在内。

3) 解决事变的摸索

在国际联盟推迟解决问题的期间，日中两国在暗中进行了以直接交涉来解决事变的尝试。这个尝试也与日中两国的政权更替有所关联。

在中国，为了对抗日本，南京国民政府与广东政权合并。作为合并的条件，12月15日，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军总司令的职务而下野。取而代之的是，由孙科就任行政院长，国民政府的领导层则被广东政权的要人所占据。就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从广东政权时代以来，一直主张以日中间的直接交涉来解决事变的问题。虽然只是一时性的，但是中国在孙科政权之下，是倾向于直接交涉的。

另一方面，在日本，为了对抗军部势力的抬头，出现了由两大政党组成合作内阁的动向，围绕此次合作内阁运动，民政党的若槻内阁因招致内阁内步调不一致而总辞职。取而代之，政友会的犬养(毅)内阁上台。从明治时期以来一直支持孙文和黄兴等中国革命家的犬养首相，企图通过派遣密使到中国以解决事变的问题。他对解决事变的构想是，以在满洲的中国主权为前提，树立拥有广泛权限的地方政权，以日中对等的条件实施经济开发等内容。

被起用为密使的是和犬养同样曾为中国同盟会同志的萱野长知⁷。在孙科政权诞生前就到达中国的萱野，会见了居正、孙科等人，摸索基于犬养构想的事变解决之可能性。孙科等人提出了，设立作为特殊行政组织的东北政务委员会、承认日本的商租权，以实现日中对等的经济开发的构想。但有观点认为其目的在于，驱逐张学良势力，以便实现国民党进入满洲的目标⁸。

但是，萱野的工作遭到犬养内阁的主要阁僚和军部的激烈反对。正因为是一直批判币

⁷ 关于萱野的和平工作，参考时任英人：《犬養毅と満州事变》，载《政治経済史学》，第209号，1983年12月，第50-55页。

⁸ 黄自进：《満州事变と中国国民党》，载中村胜范编：《満州事变の衝撃》，劲草书房，1996年，第360-361页。

原外交的政友会，所以犬养内阁中以书记官长森恪为首，存在许多强硬论派人物。他们强烈反对国民政府的统治扩大到满洲。在此种情况下，1932年1月上旬，犬养不得不命令萱野回国。陈友仁因为与日本直接交涉受挫，加上国内反日舆论的推波助澜，转而主张对日断交。

犬养首相在与中国试探秘密交涉的同时，起用荒木贞夫为陆相，试图恢复对陆军的控制。但是，在这一点上犬养的期待也落空了。对于关东军，陆军指导层的统制没有恢复。关东军得到陆军指导层的谅解，以讨伐反满抗日份子必须打击其根据地作为名义，于1月3日，占领了锦州。此前一直期待币原外交的美国国务卿史汀生（Henry L. Stimson），由于反对日本占领锦州，对日通告其不承认政策。通告的大意是，违反《九国公约》和《非战公约》、任何侵害美国国民权利的状态和协定都不予以承认。2月5日，关东军甚至更进一步攻击以往被禁止出兵的哈尔滨，并成功将其占领。

4) 上海事变（一二八事变——译者，下同）与满洲国建国

满洲事变爆发后，上海成为了日益激烈的反日抵抗运动的中心。这就激化了日本居留民的反感高涨，以致发生了冲突事件。1月18日，在上海传教的日本僧人遭到中国人的袭击，作为报复，次日日本人攻击了中国人的工厂。据说这是公使馆附属陆军武官辅佐官（驻上海）田中隆吉为了将各国的注意力从满洲引开，应关东军板垣的要求所策划的阴谋⁹。

上海的居留民团群起抗议，为此，总领事向上海市长提出了处罚犯人并且限期立即解散抗日团体的强硬要求。在不安定的气氛中，日本海军为保护居留民，向上海增派了舰船和陆战队；在中国方面，上海周边的十九路军强化了警备。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与过去在江西省和共军作战过的强悍的十九路军发生冲突，开始了上海事变¹⁰。

日本海军就本身的战斗能力来说，无法与十九路军对抗，因而不得不要派遣陆军。对于向上海派兵，虽然犬养首相和藏相高桥（是清）强烈反对，但结果还是被以保护居留民为由的陆海军的主张所压制。被派遣的陆军部队也陷入苦战，随后派遣的兵力增加到3个师团，编成了上海派遣军。

日本政府将满洲事变和上海事变切割、分别作为个别事件处理，采取非必要不扩大事态的方针。派遣军则以打击中国军以显示日军威力优先，在3月初的攻击中达成目的之后，加上国际联盟的牵制，开始采取自制的行动。

另一方面，在中国，1月1日正式成立的孙科政权不到一个月就瓦解了，汪精卫就任行政院长，蒋介石也重回政府。认为中国尚不具备与日本作战实力的蒋介石，反对陈友仁的对日断交方针，一方面将嫡系部队投入上海战线以支持十九路军的抗战，同时，探寻与日本之间的妥协之路¹¹。

积极推动停战斡旋的是英国。在各国的牵制与斡旋之下，3月中旬，实现了事实上的停战，5月5日正式签订了停战协定。停战协定的要点是，日军撤退，设定不允许中国军队驻屯的非武装地带。在中国方面，也有评价认为，不割让土地、也不支付赔款就能让外国军队撤退，这是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大的胜利¹²。

⁹ 参考田中隆吉：《上海事变はこうして起された》，载《別冊知性—秘められた昭和史》，1956年12月。

¹⁰ 关于上海事变及其停战交涉，参考岛田俊彦：《満州事变の展開（1931—1932年）》，载《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2卷，第5章。

¹¹ 黄自进：《満州事变前後における国民政府の対日政策》，载《東アジア近代史》，第5号，2002年3月，第22-24页。

¹² 黄自进：《満州事变前後における国民政府の対日政策》，载《東アジア近代史》，第5号，2002年3月，第24—25页。

在上海的军事纠纷，正如关东军的板垣所企图的，使得各国视线离开了满洲。其间，在满洲，正按部就班地进行着独立的准备，终于在3月1日，宣布成立以溥仪为元首（执政）的满洲国。在国际联盟调查团（李顿调查团）进入当地之前，造成了既成事实。

受当地事态的紧急发展所迫，陆军领导层已经承认成立新国家。犬养首相对承认满洲国是采取否定态度的¹³，但同年5月，他在以海军青年将校为主的恐怖袭击事件（五一五事件）中遭到暗杀。继任首相，起用了海军元老斋藤实。这是由于前一年发现的军人流产政变（三月事件、十月事件）和相继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沉重打击了政党政治，就继任首相人选受到天皇咨询的元老西园寺公望认为，应暂时中止政党内阁，通过被称为“中间内阁”的非政党内阁来度过危机，以缓和陆军对于政治的压力。

但是，强硬的不只是陆军。例如，关于满洲国的承认，相较于政府，议会和媒体方面更为积极。6月，众议院通过了满洲国承认决议案。柳条湖事件时担任满铁总裁，并协助关东军的行动，而后就任斋藤内阁外相的内田康哉，在议会答辩上说，日本“即使国家化为焦土”也要贯彻主张，强烈表示应该承认满洲国。9月15日，日本签订日满议定书，正式承认了满洲国。这是在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结束当地调查，刚在北京完成报告书之后的事。

10月2日公布的李顿报告书，不承认柳条湖事件后关东军的行为属于自卫范围之内，也不认为满洲国是由当地民众自发的独立运动而产生的。但是，报告书也没有提到希望恢复到事变前的原状。报告书提议的是，以中国主权和领土保全原则为前提，驱逐军阀，成立顾及日本在满洲权益与历史关系之自治的地方政府。这是顾虑到满洲地区特殊情况的妥当的解决构想，如果是在事变之前，在日本也应该能得到一定的评价。但是，在事变一年以后发表的报告书，在日本已经到了无人问津的状态了。

5) 满洲国的实际状态

满洲国歌颂着所谓“王道乐土”、“民族协和”的新国家建设理念。日本居留民中也不乏对此理念产生共鸣，而热衷于从奉天军阀暴政中解救满洲居民、建设理想国家者。满洲的地方势力和中小军阀中，也有反感张学良或为了自保，而与新国家合作之人¹⁴。

当然，积极参加建设新国家的当地民众还是为数甚少。反满抗日的游击活动，也是屡禁不止。为此，承担满洲国防和维持治安的关东军，对游击活动进行了彻底而残酷地镇压，也发生了如1932年9月的平顶山事件那样，甚至虐杀了被视为勾结游击活动的民众之情形。

而通过币制改革统一货币可以视为满洲国统治的政绩之一。事变之前，满洲的地区金融系统已经朝统一货币的方向在发展，满洲国继承这一方向，强力地促成了统一货币的实现¹⁵。统一货币促进了满洲经济的近代化，到1934年为止，满洲已成为中国工业化最为发达的地区¹⁶。满洲国也致力于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从1933年到1944年为止，建设了总长约6350公里的铁路新线。从1932年到1939年，修建完成了总长度为15480公里的国

¹³ 时任英人：《犬養毅と満州事变》，载《政治経済史学》，第209号，1983年12月，第56-57页。

¹⁴ 关于参与满洲国建国的中国人，参考浜口裕子：《日本統治と東アジア社会》，劲草书房，1996年，第2章、第3章。

¹⁵ 安富步：《「满洲国」経済開発と国内資金流動》，载山本有造编：《「满洲国」の研究》，绿荫书房，1995年，第239-246页。

¹⁶ Nakagane Katsuji, “Manchukuo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eter Duus,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95-1937*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34.

道¹⁷。在矿工业方面，煤炭、电力、钢铁、铝等的生产量都大幅度增加¹⁸。

但是，这些产业基础和矿工业的发展并不是为了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许多情况下，促进开发和近代化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矿工业的发展也向军需方面倾斜。特别是在日中战争扩大以后，这样的倾向更为明显，满洲成为了日本的兵站基地。进入太平洋战争时期以后，满洲国也强化了战时体制，以日本进行战争的要求为首要优先课题。战争末期，经济、金融的平衡崩溃，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¹⁹。满洲国最终未能成为“王道乐土”。

“民族协和”也仅止于口号上的宣传。实际上控制满洲国的是关东军。中央政府与地方(省)政府的实权由日本人官僚(日系官吏)所掌握，占据中央政府机关的日系官吏的比例，从 1934 年的 53% 增加到 1940 年的 69%²⁰，日本人对权力的独占不断地增强。在各个方面，日本人与其它的满洲国民之间的差距也不断扩大。最初的宏大的建国理念与现实之间的背离日益扩大。

6) 热河事件与退出国际联盟

满洲国由奉天、吉林、黑龙江东三省加上热河省，合而为其版图。但是，热河省长汤玉麟受到盘踞于华北的张学良军队的牵制，始终采取暧昧的态度。热河是张学良企图动摇满洲国而渗透游击部队的主要路径。因此，关东军计划排斥汤玉麟，通过实力掌握热河²¹。但是，进入 1933 年，当对热河行使武力提上日程时，斋藤首相、内田外相和天皇却对此表示了强烈担忧。因为当时国际联盟正在审议基于李顿报告书的事变解决劝告案。

对宣布承认满洲国的日本而言，已经不可能接受基于报告书的劝告案。但是根据国联规定，当纠纷当事国的一方接受了纷争当事国以外的全会一致的劝告，而因另一方不服导致开始新的战争之时，国联将对该国采取制裁。因此，政府首脑和天皇担心，当国联劝告案通过后，一旦日本对热河行使武力并波及到华北的话，国联有可能发动制裁。最终，日本政府在 2 月 20 日决定，如劝告案通过的话日本就退出国联。一旦不是国联成员，接受制裁的法律根据也就不存在了²²。2 月 24 日，国联总会通过了劝告案，3 月 27 日，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因害怕国联制裁而对“讨伐”热河的顾虑，已失去了意义。

另一方面，在中国，热河被认为是与所谓的满洲东三省不同的地区，因此，如果关东军打算用军事力量完全掌握热河的话，将被视为是日本新的“侵略”。因此，针对关东军进犯热河的动向，国民政府严命汤玉麟和张学良防卫热河。张学良派出超过 20 万的东北军进入热河，但是 1933 年 2 月，关东军以两个师团开始热河作战，张军不到两周就溃逃了。正在指挥剿共的蒋介石对事态的急转直下大为震惊，将华北的东北军和西北军共 25 万大军投入了长城防卫战。

抵达长城线的关东军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展开了激战，同年 4 月，终于击败中国军队。越过长城线侵入关内的关东军，在陆军指导层的反对之下，一度撤退到长城线以

¹⁷ 西泽泰彦：《「满洲国」の建設事業》，载山本有造编：《「满洲国」の研究》，绿荫书房，1995 年，第 392 页、407 页。

¹⁸ 参考 Ramon H. Myers, “Creating a Modern Enclave Economy: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Japan, Manchuria, and North China, 1932-1945,” in Peter Duus, Ramon H. Myers, and Mark R. Peattie, eds., *The Japanese Wartime Empire, 1931-1945*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¹⁹ 塚濑进：《满洲国》，吉川弘文馆，1998 年，第 190-198 页；塚濑进：《满洲国の実験》，载山室建德编：《日本の時代史 25 大日本帝国の崩壊》，吉川弘文馆，2005 年，第 130-132 页。

²⁰ 塚濑进：《满洲国》，吉川弘文馆，1998 年，第 44 页。

²¹ 关于热河作战，参考内田尚孝：《華北事変の研究》，汲古书院，2006 年，第 1 章、第 2 章。

²² 关于国际联盟与热河作战的关系，参考井上寿一：《危機のなかの協調外交》，山川出版社，1994 年，第 1 章。

外，但 5 月，又重新突破长城线进入关内。关东军进入关内的理由是，为了满洲国的防卫，必须消灭在华北的张学良的权力基础，以解除其威胁。

张学良军队败北的“热河惨败”对中国造成了巨大打击。同时这正发生在上海的抗战看出有成功希望的时期，因而两相对比之下的打击是很大的。另外，与共产势力的作战也依然没有结果。蒋介石基于所谓御外之前先平定国内之敌的“安内攘外”方针，准备与日本妥协。蒋的考虑是，与其持续抵抗迫近到北平近郊的日军，再丢掉更多土地，不如暂时委屈图求和，以备将来收复失土²³。

于是，1933 年 5 月 31 日，在天津郊外的塘沽，日中两国军事当局签订了停战协定²⁴。关东军撤回长城线以北，作为交换，长城以南设定广大的非武装地带（战区），中国军队不得驻留该区，而以警察部队（保安队）担任维持治安的工作。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的国民政府虽然知道《塘沽停战协定》不利于中国，但是他们更加重视的是，避免承认满洲国，防止再失去更多土地，特别是确保平津（北平与天津），使得关东军撤退到长城线以北等等。

2. 关系稳定化的摸索与挫折

1) 战区接收与善后协定

《塘沽停战协定》的签订使得满洲事变暂告一段落。但是，华北的形势还是动荡不安的。特别是对中国来说，满洲国当然不能承认之，但当前如何处理其存在的事实，不得不大费苦心。处理这个困难问题的是黄郛(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以他为中心的华北地方机关，一边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指示，一边与代表满洲国的关东军进行交涉。

交涉的第一个案件是，关东军向关内撤退与中国方面的战区接收。虽然关东军仍然占领着长城线，撤退得不够彻底，但是中国方面大致上完成了战区行政权的接收。接着交涉的是，关于中国与满洲国联络的各项问题。首先关于铁路联络，就设立了日中合办的民间公司，从 1934 年 6 月达成了由该公司运营奉天、北平间列车的共识。困难的是，与国家承认相关的通邮问题。不过，由于国际联盟通过了，在邮政机构之间持有关系并不等于承认满洲国之议案，因此同年 12 月，得以达成了关于通邮的协议。随后中方又与日方缔结了以长城线为界设置海关的协议。

在以上围绕实际事务交涉的过程中，华北当局接受国民政府的指示，始终拒绝关于承认满洲国的事项，虽然同意与关东军建立共识备忘录，却不承认那是协定，并回避签字²⁵。在这一点上，中方并非一味地对日本屈服。但是，多数情况是中方不得不接受日本的要求。黄郛认为，由于在《塘沽停战协定》框架下的交涉，无法摆脱对中国方面不利的限制，因此，必须废除《塘沽停战协定》，华北问题不应由华北当局与关东军进行谈判，而必须委由中央政府交涉²⁶。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将战区的交涉，几乎全委托于关东军之手。以满洲国的存在为既成事实，把作为地方的华北当地交涉作为与军事相关的问题委托给关东军，政府、外务省则准备处理与代表全体中国的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修复和稳定化等事宜²⁷。

²³ 鹿锡俊：《中国国民政府の対日政策 1931—1933》，东京大学出版会，2001 年，第 6 章、第 7 章。

²⁴ 关于塘沽停战协定的交涉，参考内田尚孝：《华北事变の研究》，汲古书院，2006 年，第 3 章。

²⁵ 光田刚：《华北「地方外交」に関する考察》，载《近代中国研究彙報》，第 22 号，2000 年，第 53-54 页。

²⁶ 光田刚：《中国国民政府期の华北政治 1928-1937 年》，御茶の之水书房，2007 年，第 206 页。

²⁷ 白井胜美：《日中外交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98 年，第 126 页。

2) 广田—重光外交

1933年9月，广田弘毅取代内田就任外相，包括他后来成为首相的时代，到1937年2月为止，一般称为广田外交时代。但是，关于对华政策，在广田的认可之下，次官（副部长—译者，下同）重光扮演了主导角色。重光打算通过与被视为亲日的蒋汪政权合作，以实现日中关系的稳定化。其时，他肆意阻挠欧美各国对中国事务的参与，甚至将欧美列强排除在外，以牺牲各国权益来拉拢中国对日合作²⁸。

1934年4月的所谓天羽声明即反映了上述的重光构想²⁹。所谓的天羽声明，是指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与报社记者会见时发表的非正式谈话，其谈话被国内外广泛报导，而造成国际问题。声明的大意如下³⁰：关于中国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和其它国家有所不同，因此才会退出国际联盟。但是，维持东亚的和平与秩序是日本的使命，日本决心与中国共同完成此项使命。对此，各国如果想对中国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经济上或技术上的，也必然不能避免带有政治意义，其结果容易造成对中国的国际管理和势力范围的划定。因此，各国这样的援助是扰乱东亚和平与秩序的，日本不得不对此表示反对。

天羽声明的主旨，是对正计划以排除日本的形式而与欧美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中国亲欧美派集团提出的直接警告。前一年，财政部长宋子文打算当日中关税协定的特例措施到期之际，即对原先税率维持不变的日本商品课以高税率关税，并在与美国达成5000万美元的信用贷款（棉麦借款）之后，计划从各国获得技术、经济援助。作为宋子文的顾问，使对华援助具体化的是原国际联盟副秘书长（其后成为欧洲统一之父）的让·莫内（Jean Monnet）³¹。

欧美媒体将天羽声明视为日本的“东亚门罗主义”、是带有侵略主义意图的声明，而加以谴责。但是各国政府接受了尊重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的广田外相的解释。在中国，媒体的反应也十分严厉，但是，政府的反应却是冷静的³²。

3) 日中合作的尝试

虽然发生了天羽声明的失败，但是广田、重光对华关系稳定化的尝试仍然继续进行。在中国，对日本方面的尝试做出回应的条件也陆续完备起来。1933年11月，移驻到福建的十九路军与反蒋势力联手建立福建人民政府，不过翌年1月，在国民政府中央军的总攻击之下，福建政府倒台。对于江西省共军的第5次剿共战役也顺利进行，1934年11月，瑞金陷落，共军以所谓“长征”的名义开始潜逃转移。由此一来，蒋汪合作政权的基础得以强化，也造就了稳定对日关系的前提。

1935年1月，蒋介石借徐道邻之名，在《外交评论》上发表了名为《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的论文。其中，蒋介石认为日中关系恶化的责任不只在日本、中国也有责任，提倡日中合作的必要性³³。同年1月22日，广田外相在帝国议会的演说上，提

²⁸ 酒井哲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体制の崩壊》，东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第58-62页。

²⁹ 关于重光与天羽声明的关系，参考富塚一彦：《1933、4年における重光外務次官の对中国外交路線》，载《外交史料館報》，第13号，1999年6月。

³⁰ 《天羽英二情報部長の非公式声明》，载島田俊彦、稲叶正夫编：《現代史資料8・日中戦争1》，みすず书房，1964年，第25-26页。

³¹ 参考滨口学：《ジャン・モネの中国建設銀公司構想》，载《外交史料館報》，第15号，2001年6月。

³² 光田刚认为，蒋介石因为天羽声明而变为将日本视为主要敌人。光田刚：《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1928-1937年》，御茶の之水书房，2007年，第202-204页。

³³ 宇野重昭：《中国の動向（1933年～1939年）》，载《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3卷，朝日新闻社，1962年，第281-282页。

出对中国不威胁、不侵略，论述了日中亲善。如同响应广田演说一般，同年2月，国民政府命令全国报社禁止刊载反日言论³⁴。3月，命令各省市教育部门禁止使用反日性质的教科书。

日中亲善的氛围达到巅峰是同年5月17日的互换大使。将对中国的常驻使节从公使升格为大使的方针，早已在1924年的内阁会议上就决定了，但直到从1934年到翌年的关系稳定化与亲善的氛围中，才终于得以走到实现的阶段。日本也动员各国(英、美、德、法)与中国交换大使，得到了各国的赞同。1935年6月，国民政府公布《敦睦邦交令》，禁止反日运动。

以亲善氛围为背景，日中经济合作也正式开展起来³⁵。同年10月，中国实业界的经济考察团来到日本，同一时期，日本实业界的经济视察团也访问了中国。1936年1月，在东京设立了日华贸易协会，在上海设立了中日贸易协会。

4) 《梅津—何应钦协定》(中国称《何梅协定》——译者，下同)

广田和重光将满洲国的存在作为既成事实，打算与推动中国统一的国民政府构筑稳定的关系，但在华北却不断发生与之背道而驰的事件。这是因为当地的关东军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对于国民政府统一中国，是持否定态度的。他们把不放弃收复失地理想的国民政府的本质视为“抗日”，因此从满洲国国防和对苏战略的观点来考虑，需要阻止国民政府的控制力深入到华北。他们担心一旦发生对苏战争，国民政府为了抗日也许会与苏联合作。驻华机构的军人们认为国民政府的“诚意”不过是一种姿态，因此他们对大使的互换持批判态度³⁶。

在此状况中，华北发生了事件。在战区(非武装地带——译者，下同)内活动的抗日反满武装集团不时侵入热河刺激关东军，1935年5月中旬，被激怒的关东军越过长城线进行讨伐，其后又撤回满洲国领地内。此时，日本方面认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在暗地里支持这个武装集团。而同年5月初，反蒋、反国民党的亲日报社社长两人在天津的日本租界被暗杀。据日本方面调查认为，犯人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成员。这件事，也引发了质问河北省当局和国民党机关责任的呼声³⁷。

5月2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向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质问这两起事件的责任，要求国民党机关撤出河北省、罢免于学忠、将于学忠军队(东北军系)与中央军移驻到河北省外等等。这是趁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不在时，酒井的独断独行³⁸。接到要求通告的事后报告后，梅津和陆军指导层虽然一时有所犹豫，但还是追认了酒井的要求³⁹。

要求发布之后，日本中国驻屯军在位于天津的河北省主席官邸前列队进行恐吓，关东

³⁴ 关于这段期间日中之间的动向，参考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98年，第133-137页。

³⁵ 家近亮子：《蒋介石と南京国民政府》，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182-185页；小林英夫：《幣制改革をめぐる日本と中国》、载野泽丰编：《中国の幣制改革と国際関係》，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第242-243页。

³⁶ 户部良一：《陸軍「支那通」と中国国民党》，载《防衛大学校紀要》，第68辑，1994年3月，第48—50页。

³⁷ 島田俊彦：《華北工作与国交調整(1933年～1937年)》，载《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3卷，第98-101页。

³⁸ 关于酒井的独断独行，参考松崎昭一：《再考「梅津・何应钦协定」》，载军事史学会编：《日中戦争の諸相》，锦正社，1997年，第35-39页。

³⁹ 《在中国若杉大使館参事官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電報(6月7日)》，载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Ⅱ第1部第4卷上》，第299文书。

军也在国境附近集中军队以施加压力。中国方面要求日本政府斡旋，但广田外相以地方性军事问题在外交交涉范围之外为由，不干涉此事。陷于苦境的何应钦，结果在6月10日，口头承诺接受酒井的要求，其后，何应钦寄送了仅记载有接受要求的信函，即所谓的《梅津—何应钦协定》。中国方面采取的立场是：执行了达成共识的内容，但此举并非根据与日本的协定，而是中国自主的行政措施。也就是说，中国方面认为，《梅津—何应钦协定》是不存在的⁴⁰。

同时，在察哈尔省的张北也发生了日本陆军特务机关人员于当地被中国兵非法监禁之事件。加上驻屯于察哈尔省的宋哲元第二十九军（西北军系）与关东军、满洲国之间时常发生纠纷。关东军遂打算利用张北事件来推动满洲国的国境防卫和内蒙古自治工作。

关东军派遣土肥原贤二（奉天特务机关长）向代宋哲元行使省主席权力的秦德纯要求第二十九军撤到长城以南、解散排日机构等，6月27日，秦德纯提交了认可关东军要求的答复文件（《土肥原—秦德纯协定》（中国称《秦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译者，下同））。结果，第二十九军移驻到河北省。以往与关东军在长城防卫战中有过激烈交锋，现在从察哈尔省被驱逐出来的第二十九军，当然就有着强烈的抗日意识。

从1934年到1935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将满洲国作为既成事实，尝试与国民政府构筑稳定关系，虽有局限，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驻华北的日本军人的阴谋活动，向这种尝试泼了冷水，而使之中断。为实现日中合作而努力的南京政府与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内的所谓亲日派人士，对日本军人旁若无人的行动以及没有限制军人行动的日本政府表示失望。依据黄郛的说法，《梅津—何应钦协定》削弱了国内对他们的支持，使他们“感到悲哀与绝望”⁴¹。

5) 广田三原则

虽然华北情况的变化为日中关系带来了困难，但是寻求两国关系整体稳定化的尝试并没有彻底被放弃。相反，有观点认为若要抑制驻华北军人的激进行为，则有必要利用公使升格为大使之机，促进日中关系整体的稳定发展。

出于上述考虑，日中外交当局之间开始了全面改善邦交的协商。1935年1月，广田外相在帝国议会上提倡日中亲善之后，担任国际法庭法官的王宠惠来到日本，提示了关于日中国交的三个原则，9月，首任大使蒋作宾对原则重新进行了说明：①应互相尊重两国的独立与对等、②两国要基于友谊交流、③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如实现上述三原则，中国可暂时搁置不问满洲国问题，同时，日方若能同意取消《上海停战协定》和《塘沽停战协定》，中日两国经济可商量提携，并可商量军事。

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提出方针的讨论，从7月左右在外务、陆军、海军三省的事务当局之间展开，10月4日，成立了相关大臣之间的谅解事项⁴²。其中，①中国须决定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不得再藉欧美势力牵制日本、②默认满洲国的独立（尽可能正式承认）、③防止赤化（防共）、须日中共商一有效之方法，即所谓的广田三原则。在谅解事项的附属文书中还加上了，对于中国的统一或分裂既不促成也不予以阻止的内容，这可以说是根据华北局势而为了牵制陆军所作的附加。

⁴⁰ 关于《梅津—何应钦协定》的成立过程，参考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98年，第141-154页。

⁴¹ 《在中国有吉大使より広田外務大臣宛電報（6月25日）》，载《日本外交文書 昭和期Ⅱ第1部第4卷上》，第245文书。

⁴² 《对支政策〔広田三原則〕決定の経緯》，载《現代史資料8・日中戦争1》，みすず书房，1964年，第102-108页。

比较日中两国的三原则可以看出，中国方面的原则还算是相互主义的，但是广田三原则显而易见完全是日本单方面的要求。因为日本方面的原则，与其说是与对方的相互妥协(give and take)，不如说是把重点放在如何调整国内相关部门的主张和要求之上。10月7日，广田外相向蒋大使提出了上述三个原则。但是根据这些原则很难推动围绕日中关系稳定化的交涉。这是因为作为交涉前提的“原则”本身就有问题。并且，1935年下半年，交涉的环境也开始逐渐恶化。

3. 华北的纠纷

1) 币制改革

国民政府在面对镇压国内敌对势力和抵抗日本等政治、军事问题之外，还面临着经济上的严重问题。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长期的剿共战和满洲事变后与日本之间的武力纠纷，使得军费开支增大，为国家预算带来了巨大压力。丧失满洲，导致了关税收入的大幅减少。而雪上加霜的是美国的白银政策。美国从国内外市场收购白银，使得银价高涨，中国流失了大量白银。由于中国实际上采用的是银本位制，因此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中国向美国要求停止购买白银及抑制银价，但未能得到美方的协助。接着，中国开始向各国要求借款。接到此要求的日本，态度消极。这是因为日本为了建设满洲国投入了大量资金，财政上已无贷出外债的余力。如果日本借款给中国，其先决条件是中国偿还债务。另外，中国为了有效使用外债，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复杂的货币制度（币制），而日本判断国民政府没有实现币制改革的能力。

英国也认为如果不改革货币制度，借款只能撑过一时。但是英国财政大臣张伯伦(A. Neville Chamberlain)希望能够通过日英的共同借款，促进日英合作，以图东亚的稳定。在财政部的推动下，为援助中国财政的重建，英国向中国派出了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Frederick W. Leith-Ross)。

1935年9月，访华前的李滋罗斯来到日本，提出受到日本方面关注的提议。他的提议是：要把中国从经济混乱中解救出来，应使其放弃银本位制，改革货币制度，而实行货币改革则必须向其提供借款，作为具体办法由日英两国借款1000万英镑给满洲国，满洲国将此借款作为丧失满洲的代价转交给中国。也就是说李滋罗斯提议的是：由经由满洲国的日英共同借款，使中国摆脱经济困境，实现日英合作，并且引导中国承认满洲国⁴³。但是，日本政府对此提议却持否定态度。日本对中国实现货币改革的可能性依然抱有怀疑，并且反对共同借款。这是因为日本认为各国借款有把中国置于国际管理之下的危险，至少也会维持或加强各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力，这是日本所不希望的。广田外相和重光次官认为，中国不应依赖一时性的借款，而应该谋求自立更生⁴⁴。

对日本反应感到失望的李滋罗斯，劝告中国政府实行货币制度改革。这与中国自己设想的改革方案几乎一致。于是，11月4日，国民政府断然实行币制改革。其改革的核心是：废除银本位制，改行管理货币制，将货币的发行限于三家银行，将白银国有化。英国并未提供单独借款，但将本国银行保有的白银移交中国方面，以协助币制改革的成功。美国与中国缔结了购买中国白银的协定(《中美白银协定》)，中国以出售白银所换得的美元或黄金为本金，从而得以摆脱银本位制。

⁴³ 木畑洋一：《リース＝ロス使節団と英中関係》，载野泽丰编：《中国の幣制改革と国際関係》，东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10页。

⁴⁴ 波多野澄雄：《幣制改革への動きと日本の対中政策》，载野泽丰编：《中国の幣制改革と国際関係》，东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第272-273页；松浦正孝：《再考・日中戦争前夜》，载《国際政治》，第122号，1999年9月，第135-137页。

与日本的预想相反，中国的币制改革走上了成功之路。国民政府借币制改革，瓦解了西南派和华北将领等地方势力的经济基础，从货币层面也推进了国家的统一⁴⁵。

2) “北支”（华北--译者，下同）工作（华北“自治”运动）

国民政府的货币制度改革，在日本陆军看来，是不受欢迎的。日本陆军把其视为是接受英国资金援助的改革，对英国影响力会随之扩大持有戒心。同时，国民政府在经济上加强了对华北的控制，也是值得日方忧虑的事情。而在华北将领之间，出于地方上的利益关系，也有人抵制币制改革。于是，在华北的日本陆军机关开始了反击。

驻华北的日军首先向从察哈尔省移到河北省的宋哲元等华北将领施加压力，防止将现银送往南方，企图阻碍币制改革。另外，《梅津—何应钦协定》成立以来，驻华北军人在暗地里进行着华北“自治”运动，币制改革以后，更急不可耐地开始强行推动这一运动。

关东军为了促使华北将领叛离国民政府，将一部份兵力集中在满洲国国境的山海关附近一带。陆军指导层惊讶于这个举动，虽然认可了兵力转移的行动，但以目前还未到为“北支”工作而行使武力的阶段为由，劝说关东军自制。外务、陆军、海军三省事务当局进行意见调整，就支持华北“自治”达成共识，他们协商认为行动上的慎重是必要的，“自治”的程度一开始应避免过大要求，应该渐进地进行。

另一方面，在当地，被土肥原要求华北“自治”的宋哲元（平津卫戍司令）、商震（河北省主席）、韩复榘（山东省主席）等人，一边躲避土肥原的压力，一边努力避免与“自治”扯上关系。结果，作为“自治”运动的成果实现的只有以战区督察专员(战区的行政首长)殷汝耕为首领、以战区为领域、于11月25日成立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改组成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国民政府把殷汝耕视为叛国者，向其发出了逮捕令。

南京国民政府在牵制、说服华北将领不向日本屈服的同时，也不得不面临以何种方式应对日本要求的处境。因此，蒋介石提出了废除北平军事分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同时派遣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大官”到华北的方案。驻中国大使有吉明很重视这个方案，他提议，也许应该抑制“自治”运动，静待蒋介石来收拾局势。但是，日本政府反对国民政府派遣大官到华北。这是由于警惕国民政府及国民党的影响力会残存于华北并得以加强。作为大官，国民政府派遣何应钦到华北，准备就自治状态和防共等事项与日本方面协商之时，但日本方面拒绝与其会面。

当地的日本陆军对华北将领进一步施加压力。特务机关等在背后操纵的“自治”运动于各地陆续展开。针对这一动向，12月9日，在北平，以大学生为中心的有数千人的示威游行活动叫喊着“抗日救国”的口号，与公安当局发生了冲突。16日，有1万人以上参加的示威游行在北平举行。华北将领成为推动与反对“自治”势力的夹板，他们从军阀的利益出发谋求自保。局势一片混乱，终于连何应钦也不得不承认无法收拾事态。

12月18日，最后作为妥协的产物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是取代8月底废除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政整会），作为国民政府的地方行政机关而设置的。但是，国民政府并未派遣如黄郛或何应钦等在华北没有地盘的大官来主持地方行政，而是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此可见，冀察政务委员会完全是以华北地区的权威人士为主体的地方机关。这是因为日本方面提出了由华北将领“自治”的要求。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与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之间，越来越疏于沟通。中央政府的考虑与地方军阀的利害关系

⁴⁵ 关于币制改革在政治层面的新解释，参考樋口秀实：《1935年中国幣制改革の政治史的意義》，载服部龙二等编《戦間期の東アジア国際政治》，中央大学出版社，2007年。

也错综复杂⁴⁶。

日本当初的目标是华北五省（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的“自治”，但是冀察政务委员会不过管辖了河北、察哈尔两省和北平、天津两市。另外，原先目标是使之脱离国民政府，但冀察政务委员会却是作为国民政府的地方行政机关而设置的。从这点意义上，当地日本陆军所策划的华北“自治”目标还没有达成。

另一方面，日本外交当局，在国民政府要求抑制“自治”运动时，将其作为中国的内政问题而不予理会，却又反对国民政府向华北派遣大官，在何应钦北上时回避与其接触。1936年1月，日本政府通过了《第一次北支处理要纲》，虽然要求当地军队避免采取急躁行动，却追认了他们推进华北“自治”的行为⁴⁷。

这样一来，因驻华北日军的“北支”工作，所谓亲日派的影响力在国民政府中减弱了。在政整会废除的数月之前，黄郛辞去了委员长之职。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随后辞去行政院长及外交部长的职务。12月，外交部副部长、主管对日外交的唐有壬被暗杀。企图通过与国民政府内的亲日派合作以推动日中关系稳定化的广田一重光外交，失去了其前提，围绕着广田三原则的交涉也基本停滞不前。

1936年2月，在东京发生了陆军过激派将校的政变（二二六事件），日本首都一时陷入瘫痪状态。镇压叛军之后，成立了以广田为首相的内阁，政府与军方都不得不暂时把注意力和努力倾注于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与国内之稳定之上。

3) 事件频发

在中国的华北和其它地区，相继发生了导致日中关系恶化的问题和事件。使两国关系恶化的问题之一是冀东特殊贸易⁴⁸。在中国看来，其就是在冀东地区的走私贸易。满洲事变以前，从关东州过渤海湾至河北省沿岸和山东半岛就有不少的走私贸易。事变之后，由于对日本商品课以高关税，以及日本方面禁止取缔走私船在战区海湾活动，经由战区的人造丝和砂糖等走私急剧增加。

冀东政权成立后，为了筹措行政经费，冀东政权对进口商品课以特别税，因为其税率仅为国民政府正规关税的四分之一左右，所以仅支付特别税的“特殊贸易”大肆横行，给国民政府的关税收入带来沉重打击的同时，也扰乱了国内经济。中国方面对此表示了抗议，但是日本将之作为中国内政问题，而不予配合。

在华北，另一个使日中关系恶化的因素是，1936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把兵力增加了3倍（约5800）。增加兵力的目的是为了对付结束长征后（1935年10月）在陕西省延安建立根据地的共军，但其中还有一个秘密的理由。即，把性急且强行策划华北“自治”运动的关东军从“北支”工作中撤出，使其专心于满洲国的建设。“北支”工作则由日本中国驻屯军主导。因此在增加兵力的同时，把驻屯军司令官提升为与关东军司令官位相同的亲补职（师团长以上等由天皇亲自补授的官阶——译者）⁴⁹。

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增兵，没有事前通告，而且作为新驻屯地的丰台也没有记载在《辛

⁴⁶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与华北将领，特别是与宋哲元的关系，参考 Marjorie Dryburgh, *North China and Japanese Expansion 1931-1937: Regional Power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Curzon Press, 2000);

光田刚：《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 1928-1937年》，御茶の之水书房，2007年。

⁴⁷ 《現代史資料 8・日中戦争 1》，みすず书房，1964年，第349-350页。

⁴⁸ 关于冀东特殊贸易，参考藤枝贤治：《冀東貿易をめぐる政策と对中国関税引下げ要求》，载军事史学会编：《日中戦争再論》，锦正社，2008年3月。

⁴⁹ 关于支那驻屯军的增强，参考松崎昭一：《支那駐屯軍増強問題》，载《國學院雜誌》，第96卷第2号、第3号，1995年2月、3月。

丑条约》之中⁵⁰，因此招致了中国方面严厉的批判。当然因为表面上不能说出其牵制关东军的内部理由，反而更增加了人们对日本增兵是为了继续策划其他事件的怀疑。

在上海，1935年11月发生了海军陆战队水兵被狙杀事件，翌年2月，查明犯人是与中国特务组织有关的人物。上海的水兵被狙杀事件强烈刺激了担任保护华中、华南权益和居留民的日本海军。1936年8月，暂时关闭的成都领事馆于再度开放之前，包括赶赴当地的新闻记者在内的日本人团队，遭到暴徒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两人重伤（成都事件）。同年9月，在广西省北海，经营药店的日本人被杀（北海事件）。日日本海军对移驻广西省的十九路军煽动排日的情形十分重视，派遣舰船到北海进行现场调查，表示出若国民政府回避责任拖延事件解决的话，则不惜行使武力的强硬姿态。北海事件之后不久，在汉口，日本领事馆警官被枪杀，在上海，又发生了水兵被杀事件，这些事件也使日本海军态度更加强硬。

不过，此时重视华北局势的日本陆军，对向北海派遣陆军的态度是消极的，而将北海事件的解决委托给为解决成都事件而开始的川越茂大使与张群外交部长的谈判。

4) 对苏战略与对华政策

此时日本政府为了应对广田三原则的僵局而修改对华政策，提出了新的方针。1936年6月，在陆海军修改国防方针之时，政府与此并行，同年8月作为国家战略，制定了“国策基准”，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帝国外交方针”、“对支实行策（对中国策略—译者，下同）”、“第二次北支处理要纲”⁵¹。

其中，“对支实行策”的内容被认为有，将国民政府诱导到反苏、对日依附的方向，使其在认识华北特殊性并承认华北“自治”的同时，缔结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聘用日本人顾问、日中航空联络、缔结互惠关税协定（废除冀东特殊贸易，以及作为交换条件，降低排日的高关税税率）、促进经济合作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缔结防共协定的方针。这里牵涉到日本对苏战略平衡的恶化。原本发动满洲事变的目的之一是为了构筑对苏战略上的有利态势，但其结果却反而使日苏间的平衡向对日本不利的方向倾斜。因为苏联虽然在外交上对日采取绥靖的态度，但在军事上却深切感到日本的威胁，而努力强化在远东领土的军备。1934年6月时，苏联在远东的兵力与日本陆军的总兵力相当，而位于对苏前线的满洲与朝鲜的日本陆军兵力则不到苏联远东陆军的30%。而且，兵力上的差距还在持续扩大⁵²。

陆军担心日苏战争发生时中国的动向，因此从华北排除具有抗日本质的国民党势力，也是由于考虑到自身处于对苏战略平衡的劣势。并且，1936年2月，陕西省的共军一度进入到山西省之事，也加强了当地和日本本土陆军的警戒。在此情况下，3月底，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与宋哲元之间秘密缔结了防共协定⁵³。另外，从前一年12月，陆军从陆续扩大的北平反对华北“自治”的示威活动之中，也察觉到了共产势力影响的增大。讽刺的是，在日本排除国民党机关之后，其特务组织的严酷镇压也消失了，共产势力

⁵⁰ 日本陆军当初考虑以通州作为新的驻屯地，但是因为通州在辛丑和约之中并未归入公认的各国“占领”地之内，可能会招致国际批判，因而作罢。丰台也没有记载在辛丑和约之中，但是从前英军曾经驻屯，而当时中国方面也没有抗议，因此，陆军将丰台选为新的驻屯地。

⁵¹ 《現代史資料8・日中戦争1》，みすず书房，1964年，第361-371页。

⁵² 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第352页。

⁵³ 白井胜美：《冀察政務委員会と日本》，载《外交史料館報》，第16号，2002年6月，第34-35页；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文出版，1993年，第68-71页。

却随之得以渗透⁵⁴。

上述对苏、防共的考虑，也贯彻于“第二次北支处理要纲”之中。该文件虽然提倡避免企图否定中国领土主权、建立独立国家或扩张满洲国等行动，但却建议促进华北“分治”、建设防共亲日满地带、进行国防资源开发与扩充交通设施，以防备苏联的进攻，同时提倡实现日本、满洲国、中国三国的“提携共助”。值得注意的是，华北“分治”作为政府的确立方针而被列举了出来。作为应开发的国防资源而被举出的有铁、焦炭用煤、盐、液化煤、棉花、羊毛等等。受关东军和日本中国驻屯军委托，已经开始了对华北经济资源的调查。1935年12月，作为满铁的分公司成立了兴中公司，开始了开发华北资源的相关事业⁵⁵。

成都事件发生之时，也正是上述调整邦交方针确定的时候。日本方面一开始侧重于要求处罚事件的犯人和责任者、取缔排日活动等等。但随后日方的要求膨胀为包含调整邦交方针在内的全体性事项。而北海事件等其后持续发生的事件，使得日方的态度更加强硬。另一方面，中国虽然回应了解决事件和取缔排运动，却对于日本要求的其它各项拒绝妥协。中方提出了，废除塘沽、上海两停战协定、解除冀东政权、停止华北自由飞行（为牵制对满洲国与华北的航路联络采取消极态度的中国，关东军以监视中国军队的名义，派军用机飞行到华北）、停止走私贸易、解散入侵内蒙古的“伪军”（傀儡军）等要求，与日本方面进行了正面交锋。

因成都事件而开始于1936年9月的川越—张群会谈（中国称张群—川越会谈——译者），也为此停滞不前。其后，发生了关东军策动的内蒙军侵入绥远省北部与中国军队冲突的事件（绥远事件），更使得会谈触礁，同年12月，双方实际上结束了交涉。

5) 内蒙工作与绥远事件

在绥远与中国军队冲突的是，在察哈尔省为内蒙古自治而活动的蒙古王族—德王的军队。南京国民政府为蒙古人的自治要求所迫，虽然设立了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但是德王并不满足于此，进而与通过土肥原·秦德纯协定把宋哲元军驱逐出察哈尔省的关东军接近。1936年4月，在察哈尔省德化，在关东军指导之下成立了以德王为主席的内蒙军政府，与满洲国缔结了互助条约。

强行推动内蒙工作的是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而东京的陆军指导层则未必支持内蒙工作。不久，德王为了强化财政基础薄弱的内蒙军政府，企图将绥远省东部置于统治之下。同年11月，田中为德王招集的无赖土匪部队叫喊着打倒蒋介石，侵入到绥远省。但是，这个土匪部队在红格尔图轻易就被击败，驻屯在百灵庙的德王内蒙军也在绥远军的攻击下溃逃⁵⁶。

在绥远事件中，中国军队的胜利作为对日军的首次胜利，并且是打败“无敌”的关东军的大胜利，被广泛报导，在中国各地得到喝彩。虽然关东军的确间接参与了入侵绥远，但实际上几乎没有参加战斗。但是，为了从一直以来所郁积的对日屈辱感中的解放，绥远事件的胜利被夸大。绥远事件使中国的抗日情绪高涨，恢复了对抗日的信心。而其后，又发生了改变历史的事件。

⁵⁴ 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文出版，1993年，第85页。

⁵⁵ 关于在华北的日本经济活动，参考中村隆英：《日本の華北經濟工作》，载《年報·近代日本研究》，第2号，1980年。

⁵⁶ 关于内蒙工作，参考森久男：《關東軍の内蒙工作と蒙疆政權の成立》，载《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1 植民地帝国日本》，岩波书店，1992年。

6) 西安事件

此即 12 月 12 日，到西安监督剿共战的蒋介石，被主张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张学良和杨虎城软禁的事件。张杨与延安的共产势力之间，以往就产生了共同抗日的合作关系。接到事件发生的报告，周恩来从延安飞到西安，最终蒋介石被释放。虽然事件解决的真相迄今未明，但因西安事件促成了其后的共同抗日和国共合作则是毫无疑问的。

原本蒋介石虽然在满洲事变后基于安内攘外方针试图与日本妥协，但是并未疏于在最后关头进行对日战争的准备⁵⁷。国民政府为了剿共从德国招聘军事顾问，在进行军事组织、战略、战术的近代化的同时，根据顾问的建议，也逐步着手防备对日战争的军事措施⁵⁸。1936 年 4 月，国民政府与德国签订了 1 亿马克的贸易协定，即从德国进口武器和向德国出口钨矿的以货易货协定。中国本来打算以与德国密切的经济、军事关系来牵制日本，但是同年 11 月，日德防共协定成立。这使中国通过亲德政策牵制日本的计划受挫。

蒋介石为了牵制日本，不仅与德国一国合作，也摸索了与苏联（1932 年 12 月恢复邦交）的合作⁵⁹。另一方面，过去敌视国民党的苏联，为维持并加强中国对日本的牵制的意义上，开始重视蒋介石的领导能力。采用反法西斯人民战线战术（1935 年 8 月）的共产国际，劝告中国共产党放弃一直以来的反蒋抗日，采用联蒋抗日路线。虽然蒋介石始终无法信任把外蒙古并为卫星国、把新疆“赤化”、并把北铁（中东铁路）卖给满洲国与日本的苏联，但是为了抵抗日本强硬的华北工作，还是向苏联探寻一旦发生对日战争是否能够获得军事援助之事⁶⁰。并且，虽然蒋介石没有停止对红军（共军）的讨伐，但也没有排除在对抗日本上与共产党进行政治妥协的可能性。而蒋介石此事也尚未放弃与日本和解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分离华北的活动进一步加强，则必须为与日本发生武力冲突的可能性做好准备。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发生了西安事变。

7) 对华政策的再检讨

西安事变也给日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事件一方面显示了中国内部分裂的深刻程度，另一方面也能看出向国内统一发展的重大转机。关东军将事件的结果分析为中苏两国在关于抗日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主张不能再像迄今为止那样以国民政府的权力委托来实现华北“自治”，而应该不管国民政府的意见，由日本主动使之实现⁶¹。对此，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指出，以西安事件为契机，在中国，反对内战和国内统一的气势增加了，并论述了抗日人民统一战线派能否转化为健全的建设新中国运动，关系到日本是否能够放弃一直以来的“帝国主义侵寇政策”⁶²。在日本舆论界，也出现了正面评价国民政府的统一之中国再认识论。而一部分实业界则批判 1936 年下半年以来的华北分离工作，提出了倡导日中经

⁵⁷ 关于中国的国防计划，参考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文出版，1993 年，第 126-135 页。

⁵⁸ 关于准备对日战争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之贡献，参考 Hsi-Huey Liang, *The Sino-German Connection: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between China and Germany 1900-1941* (Van Gorcum, 1978), chap.7-8.

⁵⁹ 关于蒋介石对德、对苏合作的构想，参考树中毅：《蒋介石の民族革命戦術と対日抵抗戦略》，载《国際政治》，第 152 号，2008 年 3 月；鹿锡俊：《日ソ相互牽制戦略の変容と蒋介石の「応戦」決定》，载军事史学会编：《日中戦争再論》，锦正社，2008 年 3 月。

⁶⁰ 关于此时的中苏关系，参考 Jonathan Haslam,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reat from the East, 1933-41*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92), chap.3.

⁶¹ 关东军参谋部：《对支蒙情勢判断（1937 年 2 月）》，收录于白井胜美：《昭和十二年「関東軍」の对中国政策について》，载《外交史料館報》，第 11 号，1997 年 6 月，第 67-70 页。

⁶² 参谋本部第二课：《帝国外交方針及对支实行策改正に関する理由並支那觀察の一端》，载《現代史資料 8・日中戦争 1》，みすず书房，1964 年，第 382 页。

济合作的主张⁶³。

于是，重新检讨对华政策的工作开始了。掌握主导权的是从战争指导课长升任为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他在考虑到将来对苏作战的可能性，认为当下应该专心建设满洲国，从而强化日满一体的军需产业基础，希望回避与中国的冲突。因此，石原也在考虑反对内蒙工作，否定华北分离，废止冀东政权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外务省也修改了对华政策。其重点是，停止华北分治工作以及实行经济政策。1937年3月，取代广田内阁的林銑十郎内阁，迎来了佐藤尚武外相，正式开始了包括陆海军两省在内的对华政策的再检讨。4月，政府决定了“对支实行策”、“北支指导方策”，决定不进行华北分治和扰乱中国内政的政治工作，否定了前一年的华北分治方针。在“对支实行策”中，对于国民政府领导的中国统一运动，基本上采取“公正的态度”，取消了缔结防共协定和军事同盟的要求，也不再提起所谓诱导国民政府反苏和对日依附的前一年的方针了。“北支指导方策”则就为达成目的，将主要力量放在以华北民众为对象的“经济工作”上，并在以此寻求国民政府合作之事上达成了共识⁶⁴。这是划时代的政策转换⁶⁵。

此时，以横滨正金银行董事长儿玉谦次为团长的企业家团体访问中国，与中国的企业家会谈。回国后，儿玉向佐藤外相提出主张解除冀东政权和废止冀东特殊贸易的意见书。儿玉访华团的成员藤山爱一郎（大日本制糖社长），将岳父结城（丰太郎）藏相的意思传达给新任外交部长王宠惠等国民政府首脑。其大意是，以日中经济合作的实效抑制驻外机构的关东军和日本中国驻屯军，以图两国关系之稳定⁶⁶。

然而，在中国当地，日本中国驻屯军认同林内阁的新方针，但关东军却采取了强烈反对的态度⁶⁷。他们认为，将重点放在经济工作而非政治上，与以往的方针相比甚为消极，向无意回应与日本协调邦交关系的国民政府寻求亲善，只会增长其“排日侮日”的态度。如果允许行使武力，给中国一击，除去对苏战争时的背后威胁，是最为有利的对策。

受到西安事件的打击，日本虽然出现了试图转变对华政策的动向，但是正如关东军那样的反对意见也依然强硬。而且，政策的转变要取得成效是需要时间的。在取得成效之前，1937年6月林内阁总辞职。而在继任的近卫内阁中出任外相的是广田弘毅。

8) 卢沟桥事件前夜

在日本的国防方针中，中国是假想敌之一。因此，陆军每年都会制定若与中国开战时的作战计划。随着中国军备的增强，1937年度（1936年9月以后的1年之间）的对华作战计划中所使用的兵力，由前一年的9个师团增加到14个师团⁶⁸。但是，对于把筹备对苏战争的军备扩充当作燃眉之急的参谋本部而言，与中国的战争无论如何是应该避免的。

日本中国驻屯军接受这个作战计划，根据参谋本部的指示制定了占领华北计划⁶⁹。此

⁶³ 关于这一点，参考伊香俊哉：《日中戦争前夜の中国論と佐藤外交》，载《日本史研究》，第345号，1991年5月。

⁶⁴ 《現代史資料8・日中戦争1》，みすず书房，1964年，第400-403页。

⁶⁵ 关于佐藤外相之下的政策转换，参考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98年，第9章；藤枝贤治：《「佐藤外交」の特質》，载《駒澤大学史学論集》，第34号，2004年4月。

⁶⁶ 松浦正孝：《再考・日中戦争前夜》，载《国際政治》，第122号，1999年9月，第142-143页。

⁶⁷ 《在満州国沢田大使館参事官より堀内外務次官宛（6月11日）》，载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5卷上》，第144号文书。

⁶⁸ 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第368-370、412-414页。

⁶⁹ 关于日本中国驻屯军的占领华北计划，参考永井和：《日中戦争から世界戦争へ》，思文阁出版，2007年，第1章。

作战计划中要求的对华北要地的“占领”不只是一时的，而要较长期的“确保”⁷⁰，因此当地军队的占领计划，虽说是以防不测事态发生的计划，其方案相对来说却比较详细。

同时，在华北，已经逐渐形成了随时有可能发生不测事态的局面。1936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郊外的丰台建设收容驻屯军增援部队的兵舍，这令中国人产生了日军是否打算建造军用机场的怀疑⁷¹。同年，在平津地区举行的日本中国驻屯军秋季大演习，也招来了中方的怀疑⁷²。

驻屯于北平近郊的中国军队第三十七师被认为是第二十九军中抗日意识最为高涨的，而共产党员也渗透进第二十九军的高级将领之中⁷³。1936年9月18日是柳条湖事件5周年纪念日，在这一天，丰台的日军与第三十七师的士兵之间发生了小摩擦。事件以中国方面的道歉和从丰台撤退而了结，但却出现了所谓日军未向中国军队要求解除武装是因为害怕第二十九军的谣言，听到此事愤怒不已的连队长牟田口廉也向部下训示：今后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决不姑息，立刻严惩中国军队，必须对侮日、抗日的观念予以打击⁷⁴。

牟田口预想的类似事件，在10个月后，于卢沟桥发生了。进行对苏战争夜间演习的日军部队和中国军队之间发生了冲突。当时，反对前内阁（林内阁）转换对华政策，憎恶中国的“增长”，试图将华北脱离于国民政府的政治控制下的对华强硬论者们，在对中国“一击”的问题上没有犹豫。

⁷⁰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大本営陸軍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第413页。

⁷¹ Edward J. Drea：《戦争前夜》，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27页。

⁷² 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文出版，1993年，第107-113页。

⁷³ 第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张克侠是共产党员、第三十七师师长何基沣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于1939年入党。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文出版，1993年，第91页。

⁷⁴ 秦郁彦：《盧溝橋事件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第67-69页；白井胜美：《冀察政務委員会と日本》，载《外交史料館報》，第16号，2002年6月，第36-38页。

第二部 第二章 日中战争—日军的侵略与中国的抗战

波多野澄雄 庄司润一郎

前言

1937年7月发生的日中两国间的冲突事件，尽管引发了全面战争，但双方避免正式宣战，而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1年的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这也是本次日中冲突的一个特征。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就是，正式宣战要接受美国中立法法的适用范围，因而可能带来需要面对与接受经济制裁同样的效果。另外在日本，人们认为如果把“冲突”升级为“战争”会为早日解决事态的发展增加障碍。从要准备与原本假想敌的苏联和美英进行对决的角度考虑，则必须避免日中纠纷的长期化。因此，日本在战争之初将此称为“北支事变”，在战火扩大后的1937年的9月以后才正式改称为“支那事变”。

另一个特征是，日本在整个日中战争期间曾无数次尝试过多种形式的和平工作（在中国称和平交涉，或和谈，本文中的工作基本上都为和平交涉活动之意—译者，下同）。这也反映了其对事件予以早日结束的期待和焦虑。但是与希望早日结束的焦虑背道而驰的却是最终战斗却超过了8年，比正式宣战而开始的战争更为激烈，并迫使两国国民承担了巨大的负担、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尤其是给成为战场的中国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我们不得不承认导致此果的大部分的原因在于日本。

第1节 卢沟桥事件（中国称卢沟桥事变或七七事变—译者，下同）的发生与扩展为全面战争

1) 卢沟桥事件的爆发和战况扩展之要因

在1937年的华北，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统括河北、察哈尔两省。因这个冀察政权是国民政府作为所谓“缓冲机构”而设置的，与冀东政权性质不同，所以日本中国驻屯军（以下：驻屯军）中为数不少的人对其亲日姿态并不信任。另一方面，驻屯军频繁进行夜间演习，这被宋哲元率领的第二十九军视为“挑衅行为”，从而过度地引发了冀察政权方面的警戒心理。

7月7日傍晚，驻扎丰台的驻屯军步兵第一连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在宛平县城北侧永定河上的卢沟桥畔进行夜间演习。晚上10点40分左右，日方两次受到来自左岸堤防阵地方向的枪击。中队长清水节郎传令将此事报告丰台的大队本部。大队长一木清直命令通过警备召集组成的500人的部队向宛平县城附近的一文字山出动。次晨3点半左右，由于到达一文字山的部队在龙王庙方向听到了枪声后，向北平的连队长牟田口汇报了情况，于是牟田口下令开战。一木大队一方面于5点发出攻击令进入战斗状态，另一方面命令第八中队前进，以包围攻击堤防阵地的中国军队。前进中的第八中队与中国军队之间的战斗一开始，一木就于5点半下达了总攻击令。此间，在两次枪击之后该中队一名士兵失踪，虽然不久便平安归队，但这一消息却拖延很久都没有向大队本部报告，造成了导致此次事态发展紧迫的原因之一。

在当地持续交战的过程中，7月8日，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石原莞尔代替正在疗养中的次长今井清向参谋总长作了汇报，为防止事件扩大以参谋总长名义向驻屯军司令官下令，“应避免继续行使武力”。9日，以参谋次长的名义提出了禁止中国军队在永定河左岸驻扎、处分负责人、谢罪、及取缔抗日团体等停战条件。停战交涉在北平特务机关与二十九军代表之间进行，7月11日，二十九军接受了①道歉和处分负责人，②不在宛平县城、龙王庙布军，③取缔抗日团体等要求。11日下午8点，于当地缔结了协定¹。

¹关于卢沟桥事件的经过，主要依据以下文献。秦郁彦：《盧溝橋事件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另一方面，近卫文磨内阁在7月8日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对于此事件虽然决定采取“不扩大”的方针，但这个“不扩大”并不意味着限制动员派兵到华北。在7月9日的临时内阁会议上，陆相杉山元提议有必要从日本本土派遣3个师团，但遭到其他阁僚的反对而取消。但是，7月10日在当地龙王庙再度发生冲突后，11日的内阁会议上，在采取不扩大、当地解决之方针的同时，还同意了陆军省部要求派遣3个师团的提议（实际上派兵被予以保留）。但在同日下午6点过后的派兵声明中，却断定“毫无疑问此次事件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装抗日”，并表示“放弃为事态不扩大的和平交涉”²。

近卫首相在11日晚召集舆论界、政界和财界的领导人，为了敦促国民政府反省，指出，“派遣关东军、日本朝鲜军以及从日本本土调派相当的兵力，目前已是不不得已之事”，从而要求全面配合派兵。虽然近卫并不希望事态扩大，但他相信如果表现出将要派兵的强硬姿态，按理说“中国方面会折服”，事件因此可以在短期内得以解决³。总而言之，在决定派兵的同时公布此一决定，是无视与此同时在当地进行的为停战所作的努力之行为，这也使得其后的交涉工作变得困难⁴。

随着中国的抗日气氛高涨，也使得中国方面对于接受妥协的停战方式的可能性变小。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发生后第二天，即8日，通电全国，要求发动“抗日自卫战争”和国共合作。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鉴于对日抗战内外体制的筹备还未完成，暂时以事件的和平解决为重点。因此，在17日的庐山谈话（19日公布）中表明其决心，即尽管寄希望以外交方式来解决，但如若到了无法解决的“最后关头”，则必须进行抗战⁵。

这期间，在天津为解决此次事件的努力仍在继续。7月19日，在当地军队之间，中国方面接受了日本方面的条件，签订了有关取缔排日言行的实施条款（停战细节协定）⁶。驻屯军于21日，给东京陆军发电报称“二十九军全面接受我军的要求，正逐渐付诸实行”，以表达其慎重派兵的论点。在此前一天的20日，应陆军省部的要求，内阁会议同意派兵华北。但又根据驻屯军的意见和参谋本部派遣人员的当地形势考察报告，参谋本部再次搁置了派兵计划。

但是，25日、26日连续发生小冲突事件（廊坊、广安门事件），以此为契机，陆军决定实施已被延期的3个师团的调兵动员，并在27日得到内阁会议的同意。于是，驻屯军28日开始全面攻击，第二天基本控制了永定河以北的北平、天津地区。随后发生的通州事件⁷，是在日本形成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的舆论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事态扩大至此，但其不扩大方针仍被坚持下来，参谋本部的派兵计划及作战范围都以只限定在北平、天津为基本方针。自7月底起，作战部长石原、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一起向外务省和海军方面做工作，以寻求由国民政府方面提出停战要求的可能性。在陆海外3

第138—211页；防卫研修所战史室：《戦史叢書 支那事变陸軍作戦（1）》，朝云新闻社，1975年（以下，略为“战史丛书”），第145—51页；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文出版，1993年，第141—257页；寺平忠辅：《盧溝橋事件》，读卖新闻社，1970年，第54—125页；外务省编：《外務省執務報告・東亞局 第三卷 昭和十二年（1）》，クレス出版，1993年，第1、2章。

²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原书房，1955年，第366页。

³ 庄司润一郎：《日中戦争の勃発と近衛文磨の対応》，载《新防衛論集》，第15卷3号，1988年，第78—81页；臼井胜美：《日中外交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98年，第212—42页。

⁴ 作为天津特务机关人员出面与第二十九军进行停战协议的今井武夫回忆道：“正因为是日华双方为局部解决而努力的这样极其微妙的时期，这次朝议决定给我们当地日本方面代表的行动造成困难，同时也惹起中国方面的连锁反应，态度变得强硬，给双方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影响。”（今井武夫：《支那事变の回想》みすず书房，1964年，第31—32页）。

⁵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编：《中国共産党史資料集・第8卷》，劲草书房，1974年，资料75（第434—35页），84（第468—71页）；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戦争史》，青木书店，1984年，第59—60页。

⁶ 香月清司司令官这样判断：“当地交涉完全统一，根据中央指示的不扩大方针而进行的当地解决在形式上成立了。”（《香月清司中将回想録》，载《現代史資料（12）》，みすず书房，1965年，第538页）。

⁷ 在北京的郊外通州，冀东政府的保安队杀害了约200余人的日本人居留民等事件。

省共同定下停战条件的基础上，又委托日本驻华纺织行会理事船津辰一郎在上海与中国方面接触（船津工作）。船津于8月7日抵达上海开始进行接触，但因上海形势紧迫而未取得进展⁸。

卢沟桥最初的枪击事件是“偶然发生的”⁹，当地也为进行局部解决付出了努力。但视这次冲突事件为良机，驻屯军（后来的北支那方面军）和关东军为打倒蒋介石政权和实现占领华北的构想，以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推动了此次事件的发展。未能抑制住当地军队行动的理由之一就是，在陆军内部存在所谓的“不扩大派”和“扩大派”的对立。作战部长石原等“不扩大派”认为，与中国的战争恐怕无法避免长期化，消耗国力造成对苏备战的障碍，从而可能招致苏联的介入，因此他们主张局部解决。而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和作战课长武藤章等“扩大派”自事件爆发后持“一击论”，主张趁机给国民政府军一次打击，迫使国民政府转换抗日的姿态，一举解决日中问题。在陆军部内主张“一击论”者超过“不扩大派”，属于多数派¹⁰。

自事件发生以来最为重要的最初的几里天，通过外交途径来进行的接触，也仅仅是南京的参事官日高信六郎和中国外交部的几次交涉，处理事件的主导权掌握在陆军手中，外交当局则显得毫无力量。事件的“扩大”，政府和舆论都有责任。如前所述，无视当地的停战努力就早早地决定派兵、与之同样论调的近卫首相和“鹰派暴支”一边倒的媒体的论调等，都是助长日军趋向于侵略华北的综合因素。近卫内阁也认为，与其抑制事态扩大，倒不如把这次事件视为打开陷入僵局的对华政策的好机会，在预测蒋介石政权会在短期内战败的基础上，容许大量派兵，使在当地解决事件的努力付之东流。

其间，蒋介石在7月29日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认为当前的事态为“最后的关头”，“局部解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没有了”，明确表明了抗战决心，着手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问题，与共产党携手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第二次国共合作）。蒋介石为了掌握在统一战线中的主导权，缔结《中苏互不侵犯条约》（8月21日），要求苏联对日参战（11月26日），将华北事态向国际联盟起诉（9月12日）等，以战争的“国际化”所带来的最后之胜利为目标¹¹。

2) 关东军的积极介入与北支那方面军（中国称华北方面军—译者，下同）的南下

事变爆发前，比起驻屯军，逼迫东京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的当属关东军。陆军省于5月底派遣柴山军务课长赴奉天，就要求停止华北分离工作的四部长会议决定的“对支执行措施”（1937年4月16日）向关东军进行了说明。但关东军不承认有必要与南京政府调整国交关系，一味主张以武力“一击”¹²。事变爆发后，关东军再三向参谋本部呈报，为配合华北作战，促进内蒙工作和防止中国军队进入热河、齐齐哈尔，要求在内蒙古用兵，而主张不扩大方针的参谋本部直到7月底也没有同意关东军的要求。但是，8月7日，面对关东军提出的强烈要求，参谋本部同意了察哈尔作战。原本察哈尔作战是应该由本来负责歼灭察哈尔省内的中国军队的驻屯军进行作战，但却转化成了由作为配角的关东军变为主角的主次颠倒

⁸ 户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支那事变和平工作の群像》，论创社，1991年，第31—35页。

⁹ 在日本的研究者中，事件缘由偶然发生的枪击的论调为主流；在中国的研究者中，日军有计划的枪击论、阴谋论则较多；秦郁彦：《盧溝橋事件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第138-82页，推断是由于二十九军士兵偶然发枪引起；安井三吉：《盧溝橋事件》，研文出版，1993年，第168、300—16页，虽也持偶然发生的论点，但质疑于事发当时日军的反应。

¹⁰ 秦郁彦：《盧溝橋事件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第282-339页；高桥久志：《日華事变初期における陸軍中枢部》，载《年報・近代日本研究(7)》，山川出版社，1985年，第188—93页；《石原莞爾中将回想応答録》，载《現代史資料(9)》，みすず书房，1964年，第305—13页。

¹¹ 树中毅：《蒋介石の民族革命戦術と対日抵抗戦略》，载《国際政治》，152号，2008年3月，第76—78页；鹿锡俊：《世界化する戦争と中国の“国際的解決”戦略》，载石田宪编著：《膨張する帝国 拡散する帝国》，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年，第211—19页。

¹² 白井胜美：《史料解題 昭和十二年“関東軍”の对中国政策について》，载《外交史料館報》，第11号，1997年6月，第64—65页。

的作战方式。派往察哈尔的蒙疆兵团进攻张家口，8月底占领该地区。其后，关东军继续南下，将察哈尔、绥远两省纳入势力范围，相继建立傀儡政权，把华北、内蒙从中国政府的影
响下分离出来，其目标在于获得重地的驻兵权、进行重要资源的优先开发。

在华北，8月31日，驻屯军被改编成北支那方面军（寺内寿一任司令官）。加上日本朝鲜军和从日本本土增派来的军队，北支那方面军成为拥有8个师团的大部队。其分成两路南下，进攻河北、山西、山东各省。9月底占领了保定，由于中国军队采取了退避战法，因此没有达到作战目的。但是，尽管北支那方面军原本的作战区域是保定—沧州附近，但他们却乘势突破了这一范围。参谋本部对此予以追认，接着扩大到石家庄—德州一线，进而北支那方面军也大大超越此限定范围。如此，在10月中旬以前占领了石家庄。本应在保定作战就结束的攻势，被北支那方面军牵着发展为石家庄作战。并且，方面军还认为，为使南京政府的抗战意志受挫，有必要进攻徐州。

3) 派兵上海

再来看看海军的动向。事变爆发后，虽然军令部和负责中国警备的第三舰队中也存在着强硬的空袭论，但海相米内光政期待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并寄希望于秘密进行的船津工作。可是，8月9日在上海发生的杀害日本海军兵将的事件（大山事件）刺激了海军内部的强硬论¹³。在佐世保待命的陆战队被紧急派出，上海陷入一触即发的危机。

8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秘密决定进入战时状态。14日拂晓，中国军队率先发起攻击，空军也对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及陆战队本部进行了轰炸。蒋介石为了固守上海而发动总反攻，是因为对苏联的介入及列强的对日制裁寄予希望，而且这也是为了分散日本兵力，使日本占领华北的计划受挫¹⁴。上海防卫战投入了国民政府军的精锐部队，其兵力超过70万人，战死者也非常之多。

8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对派兵持消极态度的作战部长石原等的意见被压制，做出了向上海派陆军部队的决定¹⁵。海相米内对于向上海派陆军部队并不积极，但旗舰“出云”遭到中国空军的轰炸，使其态度骤变，在14日为制作政府声明而召开的临时内阁会议上，主张放弃“不扩大主义”，甚至建议占领南京。但是，在8月15日的政府声明中，由于顾忌到对苏联开战的问题，也因依然主张在不扩大方针基础上应致力于早期解决中国问题的陆相杉山的意见，并没有表示要放弃不扩大方针，强调派兵并非是为了打倒南京政府而是为了“促使其反省”¹⁶。米内转向主张积极派兵，这意味着已无法制止海军向强硬姿态转变。

15日被下令出发的上海派遣军，不是作为纯粹的作战军的“战斗序列”被派遣，而是采取了临时派遣的“编组”形式。其任务也是限定在保护在上海的居留民¹⁷。但是，在上海战中，他们遭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使得事件从局部纠纷转化为实质性的全面战争。

9月底，作战部长石原被更换，其后任由少将下村定担任。下村与石原同样担心战争的长期化会招致苏联的介入，但他认为，把主战场从华北转到华中，通过积极作战来歼灭敌人主力军的短期作战方式是有必要的¹⁸。8月就任参谋次长的中将多田骏也支持他的看法。这

¹³ 相泽淳：《海軍の選択》，中央公论社，2002年，第104页；细川护贞等编：《高松宮日記 第2卷》，中央公论社，1996年，第530、533页。

¹⁴ 杨天石（陈群元译）：《1937，中国軍対日作戦の第1年》，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99、108页；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三联书店，2008年，第244页。

¹⁵ 《中支派兵の決定》，载《現代史資料(12)》，みすず书房，1965年，第364—94页。

¹⁶ 相泽淳：《海軍の選択》，中央公论社，2002年，第105—10页。战史丛书《大本營海軍部大東亜戦争開戦経緯(1)》，朝云新闻社，1979年，第214页。

¹⁷ 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陸軍作戦(1)》，朝云新闻社，1975年，第266页。正式的“战斗序列”发令于9月11日（同书，第298页。）

¹⁸ 《下村定大将回想応答録》，载《現代史資料(9)》，みすず书房，1964年，第378—81页。

个积极作战的第一步就是于 11 月 5 日实施的第十军在杭州湾的奇袭登陆。紧接着，上海派遣军与第十军合并，暂时编成中支那方面军（中国称华中方面军—译者，下同），由松井石根任司令官。他们的任务已不再是保护居留民，而是与北支那方面军一样为了挫败敌人的斗志而战。杭州湾登陆成功使上海方面的战况为之一变，中国军队开始撤退，11 月中旬，日军控制了上海全域。

但是，第十军要求继续追击，以切断敌人的退路。作战部把作战区域设定为苏州—嘉兴线（法定线）之东。方面军快速到达法定线后，立即主张应取消法定线，逼向南京¹⁹。南京从 8 月 15 日已经开始受到日本海军从海上的猛烈轰炸。而日军对南京，上海、汉口等城市的无差别轰炸，则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4) 攻占南京与南京虐杀事件（中国称南京大屠杀—译者，下同）

在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河边和参谋次长多田等人反对进一步扩大作战地区。部内就是否取消法定线及攻占南京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终，还是中支那方面军的再三要求使作战部的方针向攻占南京倾斜²⁰。

11 月 15 日，第十军决定实行“独断追击”，开始进攻南京。中支那方面军司令松井也表示赞同，给军中央施加压力。在参谋本部，参谋次长多田和作战课长河边，寄希望于正在进行的陶德曼调停，试图在攻占南京前通过和平谈判进行政治解决。但制止进攻是困难的，12 月 1 日，向中支那方面军下达了攻占南京的命令。12 月 10 日，日本军开始向南京发动总攻，先头部队于 12 日突破城墙进入城内。13 日，占领了南京。

其间，中国政府高官接连离开南京，住民也为了逃避战祸而躲到设置在市内的南京国际安全区（“难民区”）避难，此外，为了不让日本军队使用，很多的建筑物被中国军队烧毁²¹。

国民政府于 11 月中旬召开的国防最高会议上决定迁都重庆，因蒋介石对于从首都南京撤退表示为难，故而决定固守一段时间的方针。被任命为首都卫戍司令官的唐生智最初坚持死守南京，拒绝了松井司令官开城投降的劝告。但 12 月 11 日，他接到蒋介石撤退的指示后，12 日就向各处防卫指挥官下令突破包围撤退²²。但是，按计划撤退出来的部队甚少，被扬子江堵住退路，陷入混乱状态，许多残兵败将换上便衣，逃到“难民区”²³。

中支那方面军鉴于上海战役以来频发的无军纪行为，对预定作为在南京陷落后的进城部队，下达了关于“特别严肃军纪风纪”的严格的规定（“南京攻略要领”）。但是，日军还是对俘虏、残兵、便衣兵、以及部分市民进行了集体的或个别的屠杀，强奸、掠夺和放火事件也频繁发生。日军的屠杀行为导致的死亡人数，据远东国际军事裁判的裁决达 20 万人以上（对于松井司令官的判决书上是 10 万人以上），1947 年南京战犯裁判军事法庭公布为 30 万人以上。中国的见解是以后者的判决为依据的。而在日本的研究中，则以 20 万人为上限，

¹⁹ 井本熊男：《作戦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变》，芙蓉书房，1984 年，第 1621—79 页。

²⁰ 南京战史编集委员会编：《南京戦史》（增补版），偕行社，1993 年，第 17—20 页。

²¹ 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72-73、83 页；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岩波书店，1997 年，第 120 页；美国媒体的报道（南京事件調査研究会编译：《南京事件資料集 1 アメリカ関係資料編》，青木书店，1992 年，第 387-388、390、394、431-32、473-475 页等）。

²² 唐生智：《南京防衛の経過》，载南京战史编集委员会编：《南京戦史資料集 I》（增补版），偕行社，1993 年，第 623—26 页；有观点认为蒋介石决定固守南京的背景是：期待苏联的军事援助，特别是期待苏联能够参战。（笠原十九司：《国民政府軍の構造と作戦》，载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民国後期中国国民党政権の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 年，第 281-82 页；杨天石（陈群元译）：《1937，中国軍対日作戦の第 1 年》，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 年，第 116-18 页；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三联书店，2008 年，第 240-41 页）。

²³ 因唐司令命令死守，严禁擅自渡扬子江，违反者以武力镇压，于是开始自相残杀，很多士兵白白死去。（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 年，第 70-71、76、78 页；白井胜美：《新版 日中戦争》，中央公论社，2000 年，第 83-85 页）。

有 4 万人、2 万人等各种推算²⁴。对于牺牲人数的各种不同说法，其背景是由于对“虐杀”（非法杀害）的定义、所定地区、期间、埋葬记录、人口统计等资料的验证上存在差异²⁵。

日军所犯下的暴行，在被外国媒体报道的同时，通过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进行的抗议以及上海总领事馆等的报告这些途径也传到了外务省²⁶，进而也传到了陆军中央部。结果于 1938 年 1 月 4 日，以参谋总长闲院宫的名义向松井司令发了一份少有的意见书——“关于深切期望振作相关军纪、风纪”²⁷。

关于引起虐杀的主要原因，被分析指出存在如下几点原因：因没有正式宣战而停留在“事变”的程度上，日本在对待俘虏的有关方针和占领后包括保护住民在内的军政计划方面有欠缺；维护军纪的宪兵人数少；无视粮食和物资供给情况而断然攻占南京，其结果引发了掠夺行为，诱发了军纪涣散的不法行为等²⁸。战后，远东国际军事审判对司令官松井，南京战犯军事法庭对第六师团长谷寿夫，分别问责屠杀责任，判处死刑。另一方面，造成牺牲扩大的次要原因是，中国军队在南京防卫作战上的错误，以及其后放弃统一指挥、缺乏对民众的保护措施²⁹。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长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对唐司令官的“如此是否会出现无区别的士兵、甚至普通市民的牺牲呢？”的质疑，批判了毫不珍惜中国国民生命的国民政府、军队首脑之不负责的行为³⁰。

占领首都南京使“胜利者”意识在日本朝野得以推广，致使对事变的善后处理及和谈条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近卫内阁在 12 月底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的“支那事变处理大纲”也反映了这种胜利者意识，谈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要将华北和上海周边置于日本的强大影响下³¹。

5) 围绕和平的纠葛——陶德曼调停³²和九国公约会议

日本政府关于事变处理的基本立场是，完全作为日中两国间的问题来解决，排除第三国的调解和干涉。但是，进入 9 月后，出现了长期战的征兆，于是有效利用“第三国的好意调停”的和平方法也被纳入了视野，以便达到军事目的。首先自告奋勇的是英国。9 月中旬，新上任的驻日大使克莱琪（Sir Robert Craigie）向外相广田弘毅探询进行调停的可能性，广田提出了具体的和谈条件。即，在华北设定非武装地带，以取缔排日和配合防共为条件来取

²⁴ 秦郁彦：《南京事件》，中央公论社，2007 年增补版，第 317-19 页。

²⁵ 在日本刊行的最具总括性的资料集是，南京战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資料集 I、II》（增补版），偕行社，1993 年，其中收集有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的日记、步兵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的手记、中支那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阵地日记等。

²⁶ 东亚局长石射猪太郎在 1 月 6 日的日记中记述道：“上海来信，详报我军于南京之暴状。有掠夺、强奸、不忍目睹之惨状。呜呼，此皇军乎！”（伊藤隆、刘杰编：《石射猪太郎日記》，中央公论社，1993 年，第 240 页）。

²⁷ 南京战史編集委員会編：《南京戦史》（增补版），偕行社，1993 年，第 398-99 页。

²⁸ 秦郁彦：《南京事件》，中央公论社，2007 年增补版，第 103-107 页。因此，对俘虏的处置也依各部队而不同，有杀害、解放、劳役（原刚：《いわゆる『南京事件』の不法殺害》，载军事史学会编：《日中戦争再論》，锦正社，2008 年，第 139-55 页）；北博昭：《日中開戦》，中央公论社，1994 年，第 54-68 页；笠原十九司：《南京難民区の百日》，岩波书店，1995 年，第 25-54 页。

²⁹ 孙宅巍（笠原十九司译）：《南京防衛軍と唐生智》，载藤原彰等编著：《南京事件を考える》，大月书店，1987 年，第 153-58 页；杨天石（陈群元译）：《1937，中国軍対日作戦の第 1 年》，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 年，第 113-22 页；笠原十九司：《南京防衛戦と中国軍》，载洞富雄等编：《南京大虐殺の研究》，晚聲社，1992 年，第 214-41 页。

³⁰ 约翰·拉贝（John H. D. Rabe）（平野卿子译）：《南京の真実》，讲谈社，1997 年，第 83-90 页；另外，关于从日中的“建设性的对话”和“共通的理解”的观点上来对事件进行研究的还有，杨大庆：《南京アトロシテイズ》，载刘杰等编：《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 年，第 139-68 页。

³¹ 白井胜美：《日中戦争と軍部》，载三宅正树编：《昭和史の軍部と政治(2)》，第一法規出版，1983 年，第 74-5 页。

³² 关于陶德曼调停，参照戸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 -支那事变和平工作の群像》，论创社，1991 年，第 2-3 章；刘杰：《日中戦争下の外交》，吉川弘文馆，1995 年，第 2 章。

消华北政权、承认国民政府，不问满洲国（在中国称为伪满洲国—译者，下同）之事。这些条件也转达给了蒋介石，但寄希望于国际压力和制裁的蒋拒绝接受这些条件³³。这时，国际联盟接受中国政府的起诉，从9月中旬开始审议日中纠纷问题。

在国际联盟总会上，中国代表顾维钧针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呼吁采取国际性的紧急措施，但赞同的加盟国只有苏联，问题的解决最终决定委托给日华纷争咨询委员会。咨询委员会向总会提交了一份关于日本的行动违反《九国公约》的建议书，劝告召集九国公约会议。这是根据作为非加盟国参加咨询委员会的美国的要求提出的。10月6日的总会上通过了该建议书，根据国际联盟的劝告，10月15日，以主办国比利时为中心，号召召开布鲁塞尔会议（九国公约会议）。在10月5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响应国际联盟的呼吁，立即表明参加，进行了所谓谴责“无法国家”的隔离演说，美国的意图在于通过集体压力进行调停，而非采取具体的制裁行动³⁴。

另一方面，日本对欧美各国参与事件调停持警戒态度，10月22日，内阁会议上决定不参加会议。不参加声明，在主张日本的行动是“对来自中国方面的挑衅行为的自卫手段”的基础上，再次表明立场道，“唯有依靠两国间的直接交涉方可解决之”³⁵。但是，外相广田在10月27日对各国大使说明不参加理由时，则示意有意接受第三国“好意的调停”，但实际上提出和平条件的只有德国。

参谋本部热心地参与德国的和平调停，在得到作战部长石原同意的前提下，情报部人员频繁与德国大使馆方面接触。这些工作得以奏效，10月下旬，在上海向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提出了和平条件。而在东京，外相广田接受了陆军的要求，请求驻日德国大使狄克逊（Dirksen, Herbert von）向中国方面转达其要求的和平条件（10月1日由首相、陆军、海军、外务4大臣决定），而这些条件与向克莱琪提出的条件是相同的。11月上旬，陶德曼向蒋介石传达了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但由于蒋介石期待正在召开的九国条约会议会对日本进行制裁而拒绝了日方的条件。

九国公约会议上，顾维钧陈述了如经济制裁、对中国进行物资援助以继续抗战等具体措施，但参加各国各有顾虑，对实施制裁措施犹豫不决，即使对华援助，一大半的国家也都持慎重态度，认为对一方的援助可能会封闭停战的途径。结果，在11月15日的大会上，只通过了对日谴责声明就在事实上结束了。

九国公约会议没有实行具实效性的行动就于11月下旬闭幕。再加上上海战役的失败使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12月7日，蒋通过狄克逊大使转达有意以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为基础进行交涉，但广田以最近的形势变化有必要改变和平条件，避开了立即答复。这是因为当时已经开始加紧攻占南京。

但是，日本朝野洋溢着战胜的气氛，认为南京失陷将带来国民政府的崩溃，蒋政权已不再是议和的对象。特别是在当地的日本军队和关东军内部，主张如果蒋政权不答应投降，就否认其正统性，转而应扶植新的中央政府。持这种主张的势力逐渐增强。另一方面，参谋本部则认为南京失陷不会发展到蒋政权投降或崩溃，只会招来战争的长期化，应该借此机会用比较宽大的条件进行议和。这种观点支撑了陶德曼调停。对此，政府首脑的意见则主要汇总为以下两种选择：以蒋政权变弱和崩溃为前提，提出苛刻的媾和条件；干脆否认蒋政权，不承认媾和交涉本身的必要性。

围绕与日本媾和的问题，国民政府内部也出现意见分歧，最终，于1938年1月2日，蒋介石拒绝德国的调停，决定坚持抗战到底³⁶。

³³戸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 -支那事变和平工作の群像》，论创社，1991年，第67-71页。

³⁴入江昭：《太平洋戦争の起源》，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年，第65-71页；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 第20卷 日華事变(下)》，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第170-75页。

³⁵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原书房，1955年，第372-75页。

³⁶杨天石（陈群元译）：《1937，中国軍対日作戦の第1年》，载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

1月11日，根据参谋本部的要求召开自日俄战争以来长久未开过的御前会议。参谋本部就召开御前会议有告诫“战胜国强迫战败国接受苛刻条件”之意。这表明日本领导阶层被作为“战胜国”的意识所包围，其提出的和平条件对于中国已是很难接受的内容了³⁷。虽然参谋本部直到最后都主张应该通过交涉获得和平，但1月15日，政府最终决定中止交涉。

这样，就失去了南京陷落这个绝好的日中媾和之机会。根据1月11日的御前会议决定，当和平不成立时，“帝国不期待尔后以之为对手来解决事变，促进新的中国政权的成立”。同时决定策划摧毁国民政府，或是将其纳入新政权中来。1月16日，在这个方针下，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第一次近卫声明）³⁸。

第2节 战线的扩大与持久战

1) 混乱的解决事变办法

a. 徐州作战（中国称徐州会战—译者，下同）与“新兴中国政权”

占领南京后的参谋本部作战课确定了在1938年夏天以前不实施新的作战的方针（不再扩大战争面）。但是，北支那方面军坚持对徐州附近的中國主力軍實行圍殲戰，固執地訴說其必要性，因此，河邊作戰課長奔赴北京說明，出於必須加強戒備蘇聯的介入，當務之急是有必要安全地確保佔領區，但華北各軍沒有接受³⁹。1938年4月上旬日軍發動徐州作戰，5月下旬佔領了徐州。但是，中國軍隊在日軍完成包圍網之前採取了撤退戰術，其圍殲中國主力軍的目的並沒有達成。

佔領徐州後，近衛首相改組內閣，任命宇垣一成為外相、板垣征四郎為陸相。改組後的近衛內閣於6月10日設置五相會議（首相、藏相、外相、陸海相），取代處於休眠狀態的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重新審議早期解決事變的辦法。

以否認蔣政權為前提的對中政策，是在當地日本軍隊的指導下在華北、華中的佔領地陸續建立新政權（“新興中國政權”）（中國稱日偽政權—譯者，下同），並將之培養成可以取代國民政府的中央政權，另一方面，或是摧毀國民政府，或是將國民政府吸納到新政權傘下。

問題是蔣政權並沒有因南京失陷而發生變化。政府、軍部內部都有不少領導人希望避免早期成立新的中央政權，而重視與國民政府的直接交涉。外相宇垣就持如此立場。另一方面，仍舊堅持通過軍事壓力來瓦解國民政府，或期待通過陰謀活動使蔣介石下野的領導人則贊同當地日軍的主張。陸相板垣就是其代表。另外，強硬地主張否定蔣的關東軍也沒有立即贊同建立新的中央政權。關東軍主張優先建立華北、內蒙的自治政權，與其過早地糾合親日政權謀求中央集權化，更有必要“以分治達統一”⁴⁰。五相會議提出，首先，如果蔣政權“屈服”（蔣下野或轉向），則接受他成為新中央政權的成員，展現出有限定性的和平交涉的可能性，但最大的問題是“新興中國政權”的基礎過於薄弱。1938年3月，由中支那方面軍在南京建立的中華民國維新政府也同樣如此。

b. 宇垣工作與日英合作構想

其間，外務省的東亞局長石射豬太郎在1938年6月的意見書中向外相進言推進“國民

事的展開》，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6年，第118—19頁。

³⁷ 《昭和十三年一月十一日御前會議に於ける參謀總長、軍令部總長、樞府議長の説明要旨》，載《現代史資料(12)》，みすず書房，1965年，第395—98頁。

³⁸ 幾天後，就“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作補充說明道：“否認國民政府，同時抹殺之”（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原書房，1955年，第387頁）。

³⁹ 戰史叢書《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朝雲新聞社，1975年，第483-87頁。不久作戰課長河邊被調走，由於作戰課長河邊被調離，作戰部內的“不擴大思想完全被一掃而淨”（井本熊男：《作戰日誌で綴る支那事變》，芙蓉書房，1984年，第202-03頁）。

⁴⁰ 戶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 -支那事變和平工作の群像》，論創社，1991年，第168-88頁；《続・現代史資料(4)陸軍：畑俊六日誌》，みすず書房，1983年，第148-49頁。

政府对手论”，即合并新兴政权建立新中央政权的想法、把国民政府合并入临时、维新两种政府的这些方法都是以蒋下野为前提，并不具有现实意义，而应该承认国民政府为正统政府，在攻占汉口前就开始和平交涉⁴¹。

外相宇垣赞同石射的“国民政府对手论”，他于1938年6月，以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秘书乔辅三及香港总领事中村丰一的接触为契机，朝着实现与国民政府的和平谈判目标而热心地进行交涉（宇垣·孔祥熙交涉）。至7月为止，中村与乔辅三的谈判已达6次，乔辅三出示了所谓蒋与孔议定过的和平条件等，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因为日本方面以蒋下野为必须条件，因此交涉进展困难，但中村理解宇垣的意思，提出的方案实质上把蒋下野搁置起来，以灵活的态度进行处理。而宇垣也很关心其他途径，特别是让萱野长知做中间人，同样与孔进行接触。但是，9月底，宇垣突然辞职，和平交涉停顿下来。宇垣辞职的原因虽不甚清楚，但其中之一是宇垣以国民政府为交涉对象的和平交涉没有得到以近卫首相为首的国内的支持⁴²。

另外，在外相宇垣领导下，以建立针对中国的日英合作为目标的外交交涉也有所进展。日英合作路线是宇垣外相外交交涉的一环，它以入阁近卫改造内阁的藏相池田成彬为中心，得到财界及元老等“亲英势力”的支持而得以推进，主张由日英来解决悬案问题，在日本占优势的条件下逼迫中国“媾和”，战后运营也由日英合作进行。英国方面，“稳健派”把修复对日关系、进而把日中调停也纳入视野，由克莱琪大使出面与宇垣交涉。但宇垣重视日中直接交涉，对英国的居间调停态度消极，因此，交涉没有进展⁴³。

2) 向“长期持久战”发展——相持阶段的战争

a. 攻占武汉、广东与长期战争体制

继徐州战役之后，参谋本部批准了汉口战役和广东战役。这两大战役是作战部与当地军队从攻占南京后就开始研究的，徐州作战的成功促进了这次战役的决定。攻占汉口与广东可实现对中国主要地区的实质性统治，打击列国对中国的援助途径，从而达到通过军事来解决事变的目的⁴⁴。

中支那方面军从1938年8月底开始动员30万人展开攻占“蒋政权的中枢武汉三镇”的战争，10月底占领了汉口。并且，于9月下旬断然开始华南战役，几乎没有受到抵抗就占领了广东。此时投入中国战线的兵力达到100万，甚至把对苏作战所需要的兵力也抽调过来，日本的军事力量已近极限。但是蒋政权毫无屈服的迹象，而是将首都迁到重庆，采取了缩小正面作战盘踞在四川省周边展开“持久战”的作战方针。同时，大规模的武汉、广东作战，成了化学战（毒气战）的试验场，其效果也得到了验证。1938年12月，根据参谋本部的“大陆指345号”令，指示允许各军使用“特种烟”（红筒、红弹、绿筒），可以说在中国战场毒气的使用成为了普遍现象⁴⁵。

汉口、广东战役后，1938年11月中旬，陆军省与参谋本部共同决定了新的作战基本方针，12月上旬，得到天皇批准后发出命令。其目标是限定作战区域范围，节减兵力，确保占领区的安全和恢复治安，努力获取资源，向“长期持久战争体制”过渡。事变开始以来，首次改变了赋予北支那方面军和中支那方面军挫败中国军队的战斗意志，抓住结束战争的机

⁴¹ 外务省编：《外務省の百年(下)》，原书房，1967年，第315-37页。

⁴² 戸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 -支那事变和平工作の群像》，论创社，1991年，第213-52页。

⁴³ 松浦正孝：《日中戦争期における政治と経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5年，第3章；畑俊六、伊藤隆、照沼康孝编：《続・現代史資料(4)》，みすず书房，2004年，第157页；Anthony Best, Britain, Japan and Pearl Harbor: Abiding War in East Asia, 1936-1941 (London: Routledge, 1995), pp. 55-60.

⁴⁴ 战史丛书《支那事变陸軍作戦(2)》，朝云新闻社，1976年，第109-12页；战史丛书《大本營陸軍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第546-53页。

⁴⁵ 但是，1939年5月允许仅在山西省实验性的使用致命毒气（菌剂）可以说是最早的（吉见义明、松野诚也编：《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不二出版，1997年，第9-39页）。

会这样的作战目的⁴⁶。由此事变迎来了新的阶段。

在长期战争体制指导下，日军所重视的战略目的是通过飞机波浪式地轰炸重庆等重要的内陆城市与切断位于内陆的援蒋路线。以汉口机场为起点，从1938年12月开始了内地轰炸。轰炸包括重庆等重要城市的街区，给市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据说在重庆大轰炸期间中国死者达11000人⁴⁷。但是，频繁的内地轰炸也因飞机不足、缺乏致命性目标等，未能给国民政府以重大打击。

b. 中国的抵抗

日军的大规模军事攻势告一段落的时候，中国的民族主义对于蒋介石政权的对日和平、及对日屈服感到不可饶恕，其规模也逐渐扩大。占领区和作战地区的扩大成为起爆剂，之前还停留在学生、城市居民和军人层次的民族运动，也已扩大为包括几千万农民在内的大运动。蒋介石没有回应这种大众化民族主义的办法，而中国共产党则很好地回应了他们的愿望，迅速扩大了来自于农民的支持⁴⁸。

1938年秋，中国共产党确认了日军攻占武汉为抗日战争已进入“相持阶段”的标志，决定坚持国共合作，将持久战进行到底。并且，共产党决定将其主要活动放在敌人后方的方针，共产党军队进入日军后方的农村地带展开由民众武装起来的游击战，不断在各地建设起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在全国不断扩大，特别在华北的力量尤为强大。

1938年12月，参谋本部命令华北和华中的驻军确保占领地区和主要交通线。在华北，为对付共产党军队的游击活动，采用把军队细分后分散配置在市或街道的被称作“高度分散配置”的配备形态。还出现了适合于封杀游击战法、以怀柔政策博得民生安定的军队配置形式⁴⁹。另一方面，方面军从1939年初开始对抗日根据地开展“治安肃正”作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是，在华北势力大增的共产党军队（八路军）从1940年8月底起至年底的期间里，展开了可与越南战争中的新春攻势相匹敌的大攻势（“百团大战”），以石太线为中心，彻底破坏了桥梁、通信等设施而震撼了北支那方面军指挥部。方面军被攻其不备的原因是欠缺对共产党军队的情报、谍报活动⁵⁰。同时，百团大战暴露了高度分散布置的弱点，少量兵力分散驻扎的部队承受不住来自于人海战术的攻击。当时由于日军攻占宜昌之压力国民政府有所动摇，且已开始倾向于对日媾和，但可以说百团大战也起到了鼓舞国民政府的作用⁵¹。

遭受百团大战冲击的方面军，展开了报复性的肃正作战（中国称三光作战--译者，下同）（第一、二期晋中作战），1941年6月实施了大规模的为了稳定华北治安的作战即中原作战，取得了较大的战果。中原作战后的1941年7月，制定“肃正建设三年计划”，推进了将“未治安地区”（解放区）变为“准治安地区”（游击区），将“准治安地区”变为“治安区”的计划。还有，方面军从1941年3月开始在汪兆铭政府的协助下，开展作为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运动，包括新民会进行的强化反共工作等“治安强化运动”。这些强化治安作战的重点是对解放区进行经济封锁，并和军队“当地独立自给自足”的强烈要求相呼应，为对抗共产党军队的游击战，日军实行的肃正作战也极为严酷，变成了虐杀居民和掠夺的原因

⁴⁶井本熊男：《作战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变》，芙蓉书房，1984年，第306-08页。

⁴⁷包括“从中国方面看到的重庆轰炸”的最近的研究成果，参考战争空爆问题研究会编：《重慶爆撃とは何だったのか—もう一つの日中戦争》，高文研，2009年。

⁴⁸成为战场的中国，由于苛刻的人员及粮食的动员和征收，给社会带来混乱和变化。这也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扩大其支持的社会基础（笹川裕史、奥村哲：《銃後の中国社会》，岩波书店，2007年）。

⁴⁹战史丛书《北支の治安戦（1）》，朝云新闻社，1968年，第114—47页；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189-218页。

⁵⁰当时陆军能译解国民党军队密码的80%，但对共产党的密码几乎不知（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200页）；另外还有，战史丛书《北支の治安戦（1）》，朝云新闻社，1968年，第382-83页。

⁵¹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戦争史》，青木书店，1984年，第131-33页。

（中国将此称为“三光政策”）⁵²。

3) 东亚新秩序声明与承认汪兆铭政权

a. 东亚新秩序声明与汪兆铭脱离重庆

1938年11月3日，近卫内阁发表了所谓东亚新秩序声明（第二次近卫声明），将日本定义的东亚新国际秩序叫做“东亚新秩序”，把推进日满华共同建设定位为“帝国不动的方针”，宣言三国在互惠平等的立场上推进经济合作和防共政策。在此一个月前，即1938年10月上旬，美国政府在长篇备忘录中例举卢沟桥事件以来，美国人在中国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市场垄断化的现状，要求迅速改善对门户开放原则、机会均等原则（九国公约）的侵害。对此，接替宇垣上任的外相有田八郎反驳道，适用于事变前的事态的观念和原则，并不能制约东亚的现状和未来，正式否定了九国公约等国际原则⁵³。东亚新秩序声明显示其为替代欧美构建的国际秩序原则的新原则。

东亚新秩序声明讲道，如果国民政府改变原有的抗日、容共政策和人员构成，则“暂不拒绝之”，暗示修正“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但这并不是呼吁和平，而是瓦解蒋政权工作的一环⁵⁴。因应与日本共同担任东亚新秩序建设工作的中国新中央政权的成立工作越发混乱，依靠集结反蒋势力使蒋政权“屈服”依然是个难题。

但是，这一时期，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提出构想，让汪兆铭作占领区统一中央政权的首相，使和平派脱离蒋政权，在蒋政权的外部展开和平运动，迫使蒋下野和转向对日和平⁵⁵。这项高宗武交涉以陆军大佐影佐祯昭（参谋本部谋略课长）、中佐今井武夫为主，中国方面除高宗武以外，还有被认为是汪的同志的周佛海（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梅思平等人参与。

高宗武等接汪之命，从1938年11月中旬起，与日本方面代表就汪的举事计划（汪逃离重庆的计划）及和平条件出席会谈，11月20日，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12月上旬，汪一派在影佐等引导下逃出重庆，经昆明，于12月19日抵达河内。与之相呼应，日本政府于12月22日发表了近卫首相谈话（第三次近卫声明）。其内容是《日华协议记录》的重现，即日本方面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缔结防共协定，并为日军的防共驻扎、在华北和内蒙的资源开发提供便利；而日本则不要求赔偿战争费用、撤销治外法权、考虑退还租界。只是，陆军的要求当中，防共驻扎地区被定为“特定地点”，撤兵条款也被省略⁵⁶。

汪于12月29日在河内发表“艳电”，提出对日和平，期待国民党权威人士脱离蒋政权，而就和平条件则强调必须迅速从全国撤兵，并将驻兵地区“必须限制在内蒙附近”。即要求确认第三次近卫声明中被抹消的部分⁵⁷。

在参谋本部内，制定以占领汉口为前提的媾和条件的工作得以推进，1938年11月御前会议决定的“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则成为列举包括采用分治合作主义的政治形态，为维护治安对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派遣驻兵，实施将扬子江下游流域在经济上形成高度结合的地带，派遣日本顾问等，第三次近卫声明以及《日华协议记录》所没有的要求的产物。其内容成为“凌驾于二十一条的苛刻内容”⁵⁸，并且直至1939年秋也没有将其让汪过目。

⁵² 战史丛书《北支の治安戦（1）》，朝云新闻社，1968年，第494—97、528—37页。

⁵³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並主要文書（下）》，原书房，1955年，第393-99页。

⁵⁴ 戸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 -支那事变和平工作の群像》，论创社，1991年，第306-09页。

⁵⁵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記》，载《『現代史資料（13）』みすず书房，1966年，第349-98页；西义显：《悲劇の証人—日華和平工作秘史》，文献社，1962年，第195-98页。

⁵⁶ 刘杰：《日中戦争下の外交》，吉川弘文馆，1995年，第342-50页。戸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 -支那事变和平工作の群像》，论创社，1991年，第310-25页。

⁵⁷ 刘杰：《日中戦争下の外交》，吉川弘文馆，1995年，第352-53页。

⁵⁸ 戸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 -支那事变和平工作の群像》，论创社，1991年，第280-96页；白井胜美：《日中戦争と軍部》，载三宅正树编：《昭和史の軍部と政治（2）》，第一法规出版，1983年，第83页。

1939年1月，近卫首相在确认汪兆铭逃出重庆后宣布总辞职。但是，汪脱离重庆却并没有带来与之呼应的国民党权威人士和反蒋军阀的出现，因此，日本政府和军队的上层对由汪来建立中央政权变得消极，结果在陆军中一部分人提出确立以吴佩孚为首相的新中央政府的构想。但依旧没有出现解决事变的希望。

b. 英苏的牵制——日德同盟与封锁天津租界

在解决事变进入胶着局面之时，采取有效利用因德国的抬头而显得局势有变的欧洲的对外方式则成为强有力的方法。这一构想是在谋求改善对美关系的同时，通过与德意的防共协定来加强对苏、对英同盟，把被认为是推进事变和东亚新秩序建设最大妨碍者的英、苏牵制在欧洲⁵⁹。1938年夏，为了实现已成为陆军外交战略重点的此方案，日本首先试图谋求强化对德关系。

德国方面也在1938年2月由里宾特洛普（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就任外相，远东政策逐渐由亲中路线转为亲日路线。1938年5月，承认满洲国、撤走派遣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团等都说明了此情况⁶⁰。日德接近始于1938年初里宾特洛普与陆军武官大岛浩之间的接触。7月，驻德大使东乡茂德得知此事，认为日德同盟不仅对解决日华事变没有作用，反而担心会让日本卷入欧洲战争，因此要求外相宇垣中止交涉，但没有奏效。陆军以外交手段来弥补对远东苏联军队的地上兵力的劣势的想法，成为交涉防苏军事同盟的推动力。

但是，德国方面期待的同盟则是以英国为主要敌人的同盟，并不是苏联。围绕是否与苏联一起把英、法也加入同盟的防范对象这一点，日本领导层出现分歧，这也成为近卫内阁总辞职（1939年1月）的原因之一。即使在平沼骐一郎新内阁成立后，主张同盟的对象应仅限于苏联的外务省与主张也应该包括英、法的陆军之间的调整仍不如人意，其结论直到1939年8月23日的《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才得出。即，日德交涉拖延时日甚久，其背景之一就是，苏联为了避免与欧洲和远东进行东西两个正面战争的危机，一方面在远东处理在满苏国境与日军的冲突事件（诺门坎事件），另一方面在欧洲与德国接近，其成果就是《德苏条约》。《德苏条约》使得日德间进行的以苏联为目标的军事同盟交涉受挫。平沼首相讲到：“欧洲的天地复杂奇怪”，其内阁总辞职。

实现陆军的外交战略的另一个机会是，1939年6月，北支那方面军封锁天津英法租界。以亲日派要人在英国租界被暗杀事件为契机，封锁了华北的金融和经济中心天津的英法租界。封锁租界一事，从1938年夏天就开始筹划，正在逐渐强化封锁网的时候发生了此次事件，对于当地军队来说，封锁租界是通过回收租界来排除英国，而对东京的陆军而言，目的在于可以诱使英国赞同东亚新秩序政策和在解决事变方面取得统一步调⁶¹。

英国政府很重视这个事件，虽然英国政府内部对日制裁问题又被重新提起，张伯伦首相，还是选择了通过外交交涉解决的方式。在激烈的反英群众运动之中，在东京进行了有田、克莱琪会谈，于1939年7月以英国的让步和妥协而达成协议。其内容是，①英国明确中国所处的现状（战争状态），②英国不妨碍在中国的日军的生存及治安维护行为。关于①，对于英国类似“慕尼黑之绥靖”的对日绥靖姿态，遭到了中国强烈的谴责。而平沼首相则认为是对蒋政权的打击，给予高度评价。但是之后不久，美国通告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的行为，振奋了英国。日本的外交胜利被灭杀，日英在当地的交涉中英国保持强硬的立场，在东

⁵⁹ 38年5月，陆相板垣在五相会议上，阐述了“眼下援助蒋的是苏联和英国，缔结本协定是为了在欧洲牵制他们”（《现代史资料（10）》，みすず书房，1964年，第271页）。

⁶⁰ 关于1930年代德国的亲中路线，参考田嶋信雄：《解説 II —一九三〇年代のドイツ外交と中国—》，载石田勇治等编：《資料 ドイツ外交官の見た南京事件》，大月书店，2001年，第309-24页。

⁶¹ 永井和：《日中戦争と日英対立》，载古屋哲夫编：《日中戦争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第237-362页。

京的协定俨然废纸一张⁶²。英国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其选择对日协调的基础已不复存在。

4) 汪政权的建立与重庆和平交涉活动

汪脱离重庆，虽然并没有诱发动摇蒋政权的势态，但高宗武仍然推动以汪为首在南京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构想。1939年5月，汪本人向影佐等讲述了建立新中央政权的决心⁶³，建立汪政权的工作正式开始，但这并没有得到政府和军部的一致支持。

特别是参谋本部对汪的实力表示怀疑，参谋次长泽田茂到任的10月份，正处在“应支持，还是应中止之，与重庆直接交涉处理时局的分歧点”上。于是，参谋本部与政府签订协定，不妨碍建立汪政权，但陆军的战略不受之影响，在协定基础上同意建立汪政权⁶⁴。这样，1939年11月，以建立汪政权为前提的调整邦交交涉终于开始，而被作为交涉的基础的是一年前的“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汪在对日交涉中尽管也坚持了对撤兵和驻兵权的要求，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日方苛刻的和平条件，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新中央政府。

其间，参谋本部期待汪政权与蒋政权合并，通过各种途径探讨与重庆直接交涉的可能性，进入1940年以后，开拓了通过宋子良这个人物的和平途径。这项“桐工作”发展成为1940年6月约定由蒋、汪和日本的三方代表进行停战会谈的局面。将促进停战会谈作为目的之一而发动了6月中旬的宜昌战役。坚持不扩大战争面的参谋本部尽管对宜昌战役表现出踌躇不定，但以攻击后立即撤退为条件还是给予了批准。但是，进击宜昌的第十一军并没有撤退。这是因为参谋本部根据“桐工作”的进展情报，“为逼迫蒋政权做出最后决定”，以答应和平会谈，而命令占领宜昌。实际上，占领宜昌之事被认为是整个日中战争当中给重庆施加的最强烈的一次压力⁶⁵。

但是，“桐工作”是为了试图搅乱汪政权的中国方面阴谋的怀疑加重，随之，对和平停战的期待也急速萎缩。另外，在外相松冈的领导下，通过浙江财阀巨头钱永铭的和平交涉也是一味拖迟承认汪政权，虽进行了折衷，但并没有进展。这样，对与蒋政权停战已无计可施的日本政府于1940年11月最后一天，正式承认汪兆铭政权为南京国民政府，同时缔结了《日华基本关系条约》。这份基本条约以上述“日支新关系调整方针”为基础，讴歌“善邻友好”、尊重主权和领土、互惠平等，但规定日军配合在蒙疆和华北驻军防共、维持治安，对蒙疆和华北的国防资源的共同开发和对日优先提供等。同日，根据日满华共同宣言，汪政权正式承认满洲国。承认基础脆弱的汪政权与汪政权承认满洲国，不仅没有对解决事变发挥作用，反而固定了与蒋政权的对立关系，造成封锁了和平停战道路的结果。

第3节 日中战争与国际关系

1) 各国的对华援助与对日经济制裁

因卢沟桥事件的爆发而最先出面援助中国的是苏联。苏联于1937年8月与国民政府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同时约定提供为购买武器、弹药和飞机等的借款，并立即付诸实施。苏联还派遣了义勇军和军事顾问团。在1940年的英美正式对华援助之前，苏联的援助对中国至关重要⁶⁶。

⁶² 永井和：《日英關係と軍部》，载三宅正树编：《昭和史の軍部と政治(2)》，第一法規出版，1983年，第184-87页。

⁶³ 户部良一：《汪兆銘のハノイ脱出をめぐる》，外交史料館報19号，2005年9月。

⁶⁴ 沢田茂：《記憶を辿りて》，载沢田茂（森松俊夫编）：《参謀次長沢田茂回想録》，芙蓉书房，1982年，第168-69页。

⁶⁵ 波多野澄雄：《南進への旋回：1940年》，载《アジア経済》，26卷5号，1985年5月，第30-33页；沢田茂（森松俊夫编）：《参謀次長沢田茂回想録》57，芙蓉书房，1982年，第177-78页。

⁶⁶ 据 Arthur N. Young，至1939年苏联给国民政府提供的借款达到了英美的3倍以上（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 1937-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441）。

美国的对华直接援助比苏联稍晚，但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前就已经持续进行购买白银政策。当初，只限定将这笔资金用于稳定汇率，但其后取消使用条件，中国可以用出售白银得来的资金充当购买军需物资的资金。但是，由于白银购买规模渐小，需要直接援助中国，于是1938年12月，中美两国签订了2500万美元的借款（出口信用供给）协定。以此为开端，美国开始正式援助中国，1940年以后成为最大的对中援助国⁶⁷。

对日本来说，英国被视为执行事变和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最大障碍。但是，作为援蒋路线，经香港和缅甸进入中国的英国军需物资，与苏联的物资援助相比为数极少。中国再三请求英国供给武器和借款，但由于担心会刺激日本，英国的援助只停留在道义性支援的层次。英国最先着手的具体援助政策是建设缅甸路线，并于1938年12月完成。进而，应中国的要求，开始提供贷款，于1939年3月提供500万英镑的稳定法币资金，这些稳定通货资金也由于日本活跃的通货活动，而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⁶⁸。

英美从1938年末开始正式援助中国，但援助的正规化并不意味着对日方针的转变。实际上，美国的经济制裁始终是道义性地禁止日本进出口飞机和相关零件、以及禁止贷款这样轻微的措施。1939年7月取消《日美通商条约》的通告，其目的也是为了牵制在日军的天津租界封锁问题上不得已而妥协的英国，并且，还有对要求对日禁运的议会先行一步的意思。国务卿赫尔的“不与日本制造事端，不从亚洲撤退，不同意日本的行动”这些对日方针被维持下来⁶⁹。而另一方面，英国在东亚问题上逐渐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欧洲大战爆发后，本国的防卫成为他们的主要关心事宜，这种倾向也越来越强。

2) “不介入”欧洲大战与南进论

平沼内阁下台，阿部信行大将组阁不久，即1939年9月，第二次欧洲大战开始。欧洲大战的爆发使在东南亚拥有殖民地的英、法、荷兰把注意力集中到欧洲，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对日本是一个积极推进南进政策的好机会。实际上，海军中坚层中，产生了大胆的南进国策转换论，但这没能成为把解决日中战争作为最优先课题的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共识，阿部内阁通过了“不介入”欧洲大战的政策，宣言不参加欧洲交战各国中的任何一方。

在欧洲大战的爆发和不介入欧洲大战这样的条件下，截断英法苏等列国对蒋政权的物资援助途径，被认为是解决事变的有效方法。特别是占领广东，截断香港、广东途径后，法属印度支那途径被看作是拥有最大的输送量之路线⁷⁰。从越南的海防经河内到昆明路线及从河内到龙州—南宁路线中，对后者的南宁路线的封锁作战由占领广东的第二十一军为主实施。第二十一军在占领不久的海南岛上集合后，于11月下旬占领了南宁。但是，进入12月以后，由于国民政府军开始大规模冬季攻势，直到第二年，第二十一军被迫进行了苦战，确定占领南宁则是在1940年2月。南宁驻扎有南支派遣军的第五师团，即使在如此军事压力下进行的外交交涉中，法属印度支那方面也没有表态答应截断援蒋路线。

打开这一法属印度支那问题僵局的则是德军在欧洲的闪电战。1939年秋季以后，西部战线处于一种持续着几乎没有战斗的“奇怪战争”状态，但1940年春开始，德军通过闪电战占领了比利时、荷兰，6月法国投降。德国席卷欧洲，使得迟迟没有得以解决的截断援蒋途径有了进展。英国在1940年6月中旬，应日本封锁缅甸途径的要求，同意封锁3个月，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也停止了通过法属印度支那途径输送援助物资。另外，把机动部队性质的

⁶⁷ Ibid., pp.61-86. 206-07,441-42. 铃木晟：《アメリカの対応一戦争に至らざる手段の行使》，载军事史学会编：《日中戦争の諸相》，锦正社，1997年，第319-37页。

⁶⁸ 户部良一：《米英独ソ等の中国援助》，载河野收编：《近代日本戦争史 第3編》，同台经济恳话会，1995年，第340-44页。

⁶⁹ Jonathan G. Utley, *Going to war with Japan, 1937-1941* (Knoxville: The Univ. of Tennessee Press, 1985), pp.9-10.

⁷⁰ 立川京一：《第二次世界大戦とフランス領インドシナ》，彩流社，2000年，第28页。关于法属印度支那问题，主要依据此文献。

第五师团转用到中国方面，还是侵入法属印度支那领地内的问题，也伴随着法国的对德战争失败，得出了答案，9月底，日军断然决定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境内。

另一方面，在日本国内，官方和民间的“革新势力”声势浩大地主张日德同盟论和南进论，认为应与德国一同担负建设“世界新秩序”的任务。在法国荷兰均被列入德国的控制，英国也处于危机中的情况下，可以说这是进入已成真空地带的欧洲在东南亚殖民地的好机会。

但是，坚持“不介入”政策的米内内阁被认为对南进和日德同盟都持消极态度，因此遭到陆军和革新势力的激烈批判，1940年7月，米内内阁被迫总辞职。靠陆军的强力推动组成的第二次近卫内阁，在7月下旬制定的两个国策（由内阁会议决定的《基本国策要纲》，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决定的《伴随世界形式推移的时局处理要纲》）中，大幅度地吸取了革新势力的主张。即世界正临近“历史性一大转换期”，出于这样的认识，提出日本的“国策”应在于建设“大东亚新秩序”，提出全盘刷新国内政治、确立自给自足经济、确立国防国家体制等国策。8月上旬，新入阁的外相松冈洋右正式使用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说法，阐述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不仅指东亚的日满华三国，还包括东南亚地区。

一方面，《伴随世界形式推移的时局处理要纲》是从6月下旬开始，以参谋本部为主，在德国控制欧洲和以新内阁取代米内内阁为前提拟定的，其核心谋略是假设继荷兰和法国之后英国败北，继而攻占在远东的英属领地。但是，由于英国的殊死防卫，使得欧洲战线呈现长期化征兆，因此，与德国相呼应，攻击远东的香港和新加坡也就变得更加遥远。

上述《时局处理要纲》中，尽管关于武力南进政策和日中战争的解决办法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瞭，但那是因为抱着一种把德国占领欧洲和日本的武力南进联动起来，进而有利于解决事变的一种模糊的期待。比如，参谋次长泽田从1940年春天开始就在内部讲“支那事变应与欧洲战争共命运，……如能达成，果断进行南方作战难道不是一个有利于解决事变的办法吗”⁷¹。如此想法的说服力大增。事变的解决已经不再是日中之间的问题了，而是与欧洲的国际关系的变动相连了。实际上，1940年11月的《支那事变处理要纲》（御前会议决定）规定了承认汪政权后的处理措施，但它只确认了以确保占领区的安定为对中政策的基础。如此以来，做好和欧洲列国发生冲突的准备，依靠武力南进而建立自给自足圈—长期自给体制，成了陆军解决事变的一个手段。但是，随着英美的联合增强和ABCD对日包围网的形成，武力侵占东南亚已是必须要回避的了。首先，将通过对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等的外交交涉而获取资源和扩大影响力的目标置于首位。但是，通过这些和平外交手段的南进，因受英美对荷属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支援和牵制，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3) 日德意三国同盟与《日苏中立条约》⁷²

三国同盟的构想符合强化与德、意进行政治合作的《时局处理要纲》中规定的对外措施，它包含了避免德国在东南亚资源地带扩大影响力的意图，其基本内容是相互承认日本和德国分别在亚洲及欧洲的霸权。但问题在于给正在进行对英战争的德国以多大程度的配合。尤其是陆军方案约定，当德国要求参加例如攻击新加坡等对英战争时，“原则上答应之”。但是，外相松冈主张，作为同盟的敌对对象，要在英国以外加上美国，使之成为针对英美的军事同盟案。而这遇到了来自海军和外务省强烈的异议。松冈的意图在于依靠同盟的威力回避对美战争，德国对日德同盟的期待也在于抑制美国参加欧洲大战。双方相互领会到，同盟的关键在于牵制美国，使美国不介入欧洲战争和亚洲纷争。海军直到最后都反对此同盟关系，但在关于对英美参战问题上，在交换公文等时留下可以自主判断的余地的情况下，表示赞成。这

⁷¹ 沢田茂：《記憶を辿りて》，载沢田茂（森松俊夫编）：《参謀次長沢田茂回想録》，芙蓉书房，1982年，第172页。

⁷² 根据细谷千博：《三国同盟と日ソ中立条約》，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太平洋戦争への道 第5卷》，朝日新闻社，1987年新版，第159-331页，等。

样，9月下旬，达成日、德、意三国同盟，松冈就同盟的意义，极力强调其目的是为了防止日美战争。但其最终却只是带来了英美强化援蒋政策的结果。

在建立三国同盟的过程中，陆军提出诱导苏联也加入日、德、意同盟，以达成“四国同盟”的构想。外相松冈成为这一构想的积极推动者。他试图灵活运用德国的对苏影响力，谋求调整日苏邦交。原本自诺门坎事件解决（1939年9月）以来，出于抑制苏联对重庆政府支援的立场，一直有强调应该调整日苏间外交问题的呼声。到1940年夏，南进政策浮出水面，又加上确保北方安全、准备南进的立场，日苏外交问题进一步成为重要议题。

但是，对苏交涉进展却非常艰难。特别是陆军期待日苏可设定与《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相当的关系，但由于缺乏具体补偿措施，从1940年秋开始，关于互不侵犯条约的试探全部遭到苏联拒绝。于是，松冈从1941年3月起，怀抱“四国同盟建议”出访莫斯科、柏林，4月与斯大林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日苏中立条约》的签订，在松冈看来，是日、德、意、苏“四国同盟”的完成。但恰在此时，希特勒已经决定攻打苏联，德、苏关系的严峻现实，已经超越了松冈主观判断的范围。

4) 日美交涉与中国问题

a. 事变的解决与对美交涉

为了解决事变，最后所剩下的外交手段只有通过直接与美国交涉，期待美国可以从中间调停。因此从1940年秋开始，由日美的民间人士着手开始前期准备工作。陆军省军务局长武藤章、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美国国务卿赫尔等也参与了这项工作。1941年4月中旬，作为日美会谈的非正式协商的基础提案，他们向日本政府传达了《日美谅解方案》⁷³。

谅解方案一方面要求从实质上使三国同盟失效，但另一方面又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就事变的和平调停和获得东南亚资源问题上日美进行合作。因此，日本方面，不论政府还是军部都对之表示欢迎。只是，谅解方案要求日本接受“赫尔四原则”（保全领土、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机会均等、不通过和平手段以外的方式来改变太平洋的现状），以作为美国进行调停的前提，但日本方面并没有重视这些原则⁷⁴。

日美交涉中的主要争议为，三国同盟规定的参战义务的适用问题、和经美国协调解决日中战争问题。前者作为对条约的解释和实行的问题，找到了可以妥协的办法，但在日本最期待的关于和平协调日中战争问题方面，美国则不仅仅只扮演协调人的角色，而使将调停的前提规定为日本接受“赫尔四原则”，特别重视无条件地在中国适用通商上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对此日本则要求修改这一原则，通过日军继续驻兵以保证之。

特别是外相松冈欲以《日苏中立条约》及三国同盟之外交成果来推进有利的对美交涉，并将明确三国同盟中日本的义务和与结束日中战争相关的和平条件，以此大幅度地修改谅解方案。在接受了松冈意见之上日方制定的要求（5月12日对美提案）中关于日中战争的有关内容是，美国应在“承认”1940年11月日本与汪兆铭政权缔结的《日华基本条约》和《日满华共同宣言》的原则的基础上，劝告蒋政权选择和平之道路。当时已公布的一部分《日华基本条约》的内容，包括为了共同防共、维护治安，日军驻扎蒙疆、华北，配合蒙疆、华北开发国防资源等；《日满华共同宣言》也确认了中国尊重满洲国的主权和领土。

美国对此的回答（6月21日美国方案）是：否认汪政权、满洲重回中国、日军的无条件撤兵、否认防共驻兵、通商上无差别待遇等，几乎全部否认了日本的提案。在其后的交涉

⁷³ 盐崎弘明：《日米英戦争への岐路》，山川出版社，1984年，第2部第3-4章。另外，以后的日美交涉经过主要根据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書・日米交渉—1941年(上)・(下)》，外务省，1990年。

⁷⁴ 野村大使没有把“赫尔四原则”是出席会谈的前提条件一事汇报给日本政府（须藤真志：《日米開戦外交の研究》，庆应通信，1986年，第60页）。国务卿赫尔设想日本政府在承认四原则为前提的条件下，正式提出“谅解案”的话，就会以此为基础进入日美会谈。（细谷千博：《『日米交渉』及びその記録文書をめぐる若干の問題点について》，载《外交史料館報》，第2号，1989年3月）。

中，美国一直没有在这些条件上作出任何让步。松冈接到这份回答后大怒，认为（美国）把日本当作“弱国、属国对待”，主张停止交涉。近卫首相则撤换松冈以谋求继续交涉。

b. 中国驻兵问题与决裂

6月23日德苏战争爆发。这意味着苏联成为反轴心国阵营的一员，德苏开战使松冈外相持有的日、德、意、苏的“四国同盟”构想彻底破灭。美国逐渐强化对苏援助，此外，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战略也发生了变化。即中共减弱把世界大战看作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的所谓“帝国主义战争论”，恢复了反对日德意法西斯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论”，在国内变得更加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努力修复因皖南事变而恶化的国共关系，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国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也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作战⁷⁵。

同时，日本陆军部内也出现了“北进作战论”。参谋本部和外相松冈为了响应德国对苏联的进攻，主张进攻苏联。与南进论论争的结果，达成一致的意见是把“南北并进”作为国策。在德苏战争的发展对德国有利时进攻苏联，为了做准备，努力增强关东军，但由于西伯利亚的气候条件，德苏战争尽早结束的希望破灭，8月上旬该计划被中止⁷⁶。

另外，南进政策根据强化与法属印度支那的军事合作这个既定方针，于7月下旬断然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这包含了对与荷属印度尼西亚之间为了资源供给而进行的交涉不成功的威慑效果、以及在南部法属印度支那设定航空基地的目的。对于进驻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美国则采取了最严厉的经济制裁以示回应，包括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和全面禁止对日的石油进出口，英国、荷兰也随之效仿。但是，此时日美均仍没有决心开战。美国最大的威胁依然是德国，美德关系极度恶化，6月，德、意两国在美国的资产已经被冻结。美国的对日强硬措施是为了使日本不战而屈服，使其不再继续南进⁷⁷。

从日本方面来看，最严厉的经济制裁意味着美、英、荷、中四国的 ABCD 包围网在国防上已让日本难以忍耐，但是政府、军部的上层仍旧在探索避免对美开战的可能性。其一是，近卫首相与罗斯福总统的直接会谈。为了这次顶峰会谈，日方再次讨论对美提案。其制作过程中，外务省在迅速从中国撤兵的原则下，试图将有关驻兵地区和驻兵期限的规定写进去，但陆军仍固执不放弃在蒙疆、华北的驻兵。最终于9月25日确定的对美提案中，在关于通商上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问题上作出了让步，表明了以经济活动的自由为原则的方针，但在驻兵问题上却没有让步。

10月2日来自于美国的回答是否定的。美国在否定日本提案的同时，对顶峰会谈也持否定态度，原因是美国要求会谈之前提必须“可以就根本性的各项问题展开有进展的讨论”。尽管如此，近卫首相从回避战争的立场出发，希望通过进行一部分的撤兵来达成协议，但代表陆军立场的陆相东条英机坚决反对撤兵，使内阁垮台。10月18日成立的东条内阁接受天皇的指示，从零开始寻求不战的可能性。11月5日的御前会议决定，以11月底为限期，同时进行对美交涉和备战，如不能与美国达成协议，就于12月上旬动武。同时，作为最后的交涉方案，认定了“甲案”和“乙案”。“乙案”是份暂定协定方案，约定美国对日供给石油，作为交换，将在南部法属印度支那的日军迁移到北部法属印度支那，以解除当前的危机。11月20日，日本将此方案提交给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内也在探讨临时协定方案，准备了接近“乙案”内容的临时协定方案，并将其非正式地给英国、荷兰以及中国（重庆政权）看过。但是，被迫与日本进行着艰苦战争的蒋介石所期待的是美国能够参加对日作战，而通过临时协定达成日美妥协则意味着中国对日战争的进一步长期化。如此，从中方来看就认为美国在牺牲中国而对日本怀柔、媾和。英国对提出临时协定方案也是消极的，担心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让步会给中国政府和国民的士气带

⁷⁵ 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青木书店，1984年，第137页。

⁷⁶ 军事史学会编：《大本营陆军部战争指导班 机密战争日誌（上）》，锦正社，1999年，第144-45页（1941年8月9日左右）。

⁷⁷ J. Utley, *Going to war with Japan*, pp.151-55.

来影响。这是因为丘吉尔担心中国的溃败将促使日本更容易向东南亚发起进攻⁷⁸。

如此美国在拒绝“乙案”的同时，也撤消了临时协定方案。11月26日，以所谓的“赫尔照会”的形式对日本政府进行了答复。“赫尔照会”包含的要求是日本从中国全境及法属印度支那全境撤兵，否认重庆政权以外的所有政权。这等于是把日本拉回到满洲事变（在中国称为九一八事变一译者，下同）以前的状态。日本政府把这当作事实上的最后通牒，12月1日，在御前会议上，最终决定对英美开战。

据作为陆军省军务局的人员、参与对美提案中负责起草中国问题的中佐石井秋穗介绍，坚持驻兵蒙疆、华北的目的并不是希望引起对美交涉的破裂，而是期待美国会理解在华北共产化所带来的危机⁷⁹。中国的共产化和对美开战都是陆军最希望避开的情况，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固执驻兵以防止中国共产化的策略，却最终导致了对美开战的结果。

美国在日美交涉的最终阶段更鲜明地表明立场：为了太平洋的稳定，不能应允侵犯中国主权的条件，中国问题的解决需要与英荷中等多国进行协商。可见对美国而言，日军的驻兵问题已不再是两国间的问题了，而是与太平洋的稳定密不可分的问题了。

⁷⁸ U.S.Dept.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1941, IV,pp.651-54,660-61.665-67. Antony · Best（相泽淳译）：《日中戦争と日英関係、1937—1941年》，载军事史学会编：《日中戦争の諸相》，锦正社，1997年，第354页。

⁷⁹ 波多野澄雄：《幕僚たちの真珠湾》，朝日新闻社，1991年，第143页。

前言-开战与中国战线

日美开战之时，日军虽然向中国战场派出了 20 个师团和 21 个独立混合旅团，但并无积极作战的意图。临开战之前，日本政府认为在与美、英、荷开战的情况下“应尽可能避免在支那消耗兵力，以确保能够应对长期世界大战的帝国综合战斗力”¹。虽然开战初期，在驻中国军队的再三请求下，日军策划了四川攻略作战（五号作战）等，但在太平洋战争期间，除战争后半期的“一号作战”外，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军事作战。而另一方面，政府也丧失了解决事变的外交和政治手段，由于从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找不到解决之策，只得将精锐部队用于南方作战。

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重庆国民政府）于 12 月 9 日正式向日本宣战，于 1942 年 1 月作为“四大国”之一签署了《联合国共同宣言》。正如蒋介石在宣战布告中所言“此次战争必须从整体上解决”那样，中国在政治上已经成为了与美、英、苏并列的同盟国阵营“四强”之一²。而开战后中国共产党也立刻在《解放日报》上呼吁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主张加强与英、美的合作³。但是，由于蒋寄以切望的苏联拒绝对日参战⁴、在现代化武器装备不足的情况下，为有利于对日战争，蒋介石只好在经济和军事上依赖美国的援助。

对美国来讲，中国战线的意义有两点。第一，可以通过中国战线制约日军的陆地战斗力，从而有利于太平洋上的战争。第二，在重庆政府统治的地区建设对日本本土和日本占领地进行战略轰炸的空军基地。由于苏联维持与日本的中立关系，把沿海州或勘察加半岛作为空袭日本的基地提供给美国的可能很小，因而美国尤其重视第二点的在中国建设空军基地。为达成这些目的，如何有效地支持中国是当时美国的课题⁵。

第一节 太平洋战争下的中国战场

1) 重庆攻略作战构想的挫折与浙赣作战

日本中国派遣军在对英美开战的同时，进驻上海、汉口、广东、天津等租界并解除了英美军的武装、接收了其权益。以进攻香港为目的的第二十三军于 12 月 8 日突破国境，于 13 日完成了对九龙半岛的扫荡。由于英军拒绝对于香港要塞的投降劝告，18 日第二十三军占领了香港岛。

为支援香港作战，作为牵制向广东地区转移兵力的中国军队的佯动作战，武汉地区的日军第十一军实施了第二次长沙作战。日军第十一军拥有三个师团约 6 万人的兵力，自 12 月

¹ 《对米、英、蘭開戦ノ場合ニ於ケル帝国ノ对支方策》（1941 年 11 月 10 日）外务省纪录 A7.0.0.9-51《大東亜戦争關係一件 開戦關係重要事項集》。

² 家近亮子：《蒋介石と日米開戦》，载《東アジア近代史》，第 12 号，2009 年 3 月。

³ 日本国际关系问题研究所：《中国共産党資料集 第 10 卷》（资料 84、85、87）。

⁴ U. S. Dep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1*, vol. 4., p. 747.

⁵ 等松春夫：《日中戦争と太平洋戦争の戦略的關係》，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 年，第 391—92 页。

下旬起发起进攻，与第九战区拥有 22 个师团约 19 万人的中国军队展开了激烈战斗。日军虽于 1942 年 1 月上旬攻入了长沙，但不久便放弃长沙撤回了汉口。此战役，日军约 1500 人战死，4400 人负伤；中国第九战区军死伤 28000 余人⁶。蒋介石对此战颇为自负，称“各国不得不一致承认我国抗战于世界贡献之大”。该战役被宣传为在连续败北的盟国阵营中唯一一次击退日军进攻的“胜利”⁷。

日军对东南亚进攻告一段落后的 1942 年春天，参谋总部应日本中国派遣军之请求，开始着手研究在中国进行大规模的作战。4 月上旬，参谋总长杉山元指示司令官畑俊六总在适当的时机实施重庆攻略作战。

但是，由于 4 月 18 日美军战斗机空袭了日本本土并紧急降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和浙江中国的占领区。因此，日军急遽转入了浙赣作战。此举也是出于担忧本土空袭会降低国民和士兵士气的考虑。上海的日军第十三军集结了从华中华北转来的兵力，从 5 月中旬开始沿浙赣线向西进发。同时，汉口的第十一军的部分兵力向东进发。7 月上旬，两军成功汇合。但是，由于补给计划不够充分，日军在死伤 4000 余人并且未能确保沿线的情况下撤退了。优先进行重庆攻略作战的准备也是此次撤退的重要原因。浙赣作战的成果是破坏了几个飞机场，但此战之后因中国的空军基地于各地建成，所以此次作战的意义则被质疑⁸。

这期间，重庆攻略作战构想的正式准备工作起步了。9 月 3 日，参谋总长杉山指示派遣军进行“五号作战”（四川作战）的准备。其目的在于备战太平洋方面的英美联军的反攻，削减大陆方面的军备从而创造转向正面攻击英美的条件。由于苏联的关系，日军不可能削减满洲（中国东北——译者，下同）的军备，因而中国方面成为削减的对象，作为削减兵力的前提，试图通过重庆作战“覆灭重庆政权抗战力量的源泉”。另一方面，在政略上日本也希望通过对重庆政权立脚点的四川省进行军事压迫，从而达到使重庆政权走向“屈服和平”的政治效果⁹。

作战计划是从南方调派兵力 6 万，从日本本土调派兵力 12 万，从满洲和朝鲜调派兵力 18 万，主力军是从西安方面，一部分从武汉方面向四川省进攻。但是，1942 年 8 月开始的围绕瓜达尔卡纳尔岛（东南太平洋方面）的激烈争夺战消耗了五号作战所需的物质基础。五号作战需要 30 万吨级以上的船舶。虽然就此与海军进行了交涉，但重视太平洋的海军主张要全力确保南太平洋的制空权而未作让步，实际的船舶消耗也超出了预想¹⁰。这样，1942 年 11 月 9 日在内部传达了事实上中止作战的决定（1943 年内不实施）。其理由为“主要原因在

⁶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部：《戦史叢書 47 香港・長沙作戦》（以下，《戦史叢書》），朝云新闻社，1971 年，第 535 页。

⁷蒋中正：《中国之命运》，1943 年（日文翻译版），第 96 页。

⁸在作为浙赣作战一环的衢州攻略战中，第十三军司令部奖励使用化学战材料，第二十二师于 1942 年 6 月上旬，在大洲镇附近的游击战中使用了“红弹”，据说效果很大。（第十三军司令部：《セ号（浙赣）作戦經過概要》、及《支那事変ニ於ケル化学戦例証集》陆军习志野学校案；粟屋见太郎：《未決の戦争責任》，柏书房，1994 年，第 122，148 页）。吉见义明・松野诚也编：《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不二出版，1989 年，资料 56。

⁹《甲谷悦雄大佐回想録》，厚生省引扬援护局调整，1954 年；伊藤隆等编：《続・現代史資料(4)陸軍・畑俊六日誌》，みすず书房，1983 年，1942 年 9 月 6 日、11 月 15 日内容。

¹⁰《甲谷悦雄大佐回想録》，厚生省引扬援护局调整，1954 年。戦史叢書 63《大本營陸軍部(5)》，朝云新闻社，1973 年，第 76—80、185—92、419—27 页。

于缺乏充当运输用的船舶”¹¹。因此，从日本本土向中国增派兵力已不可能，遂于 12 月 10 日中止了计划。

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对国力（船舶）的消耗，及其导致的“五号作战”计划的挫折，促使大本营从根本上重新检讨日中战争的解决策略，暂时推迟大规模军事作战，开始转为重视“政治谋略”。据战争指导班长甲谷悦雄大佐回忆，“战略性的积极策略从国家战斗能力的现状来看，希望甚微；通过采取政治上的积极策略来转变战局的希望开始在政府和统帅部中浮上表面”¹²。所谓政治策略的重要一环即“对华新政策”（后述）。

2) 缅甸攻略作战与 CBI 战线

对开战之初的中国来说，与中国内陆相比，应对来自西部的威胁是当务之急。这是出于担心日军会在占领香港后，继续进攻缅甸从而封锁滇缅公路斩断缅甸运输途径，进而向昆明和重庆进攻。1942 年 1 月进驻泰国的日军为了通过攻克仰光以切断援助物资上陆，于 1 月 20 日越过国境侵入缅甸。3 月 7 日，日军占领了仰光。

由于驻缅甸英军兵力不足且缺乏战斗欲望，只得请求中国出兵。国民政府委派美军在中国最高司令官兼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中将 (Joseph W. Stilwell) 为总指挥，将云南省西部的中国军整编为远征军，与英军联合作战。3 月下旬，日军（第十五军）在同古南部与中国精锐部队第五军展开激烈交战。3 月底，日军攻陷同古，到 5 月底占领了北部缅甸，成功切断了通过滇缅公路的缅甸运输线。而中国军队则向印度和云南方面分散撤退。

日军对缅甸中北部的成功占领，不仅切断了向中国的陆路供给线，也开始对空中通道发挥一定的作用。日军在北缅的蜜支那设立了第十八师团的师团司令部和用于侦察作战的飞机场，不仅干扰中国的陆路供给运输，对空中也形成了很大程度的制约。盟军不得不选择飞越喜马拉雅山这样困难的空运路线 (Hump (驼峰) 空运)¹³。

1942 年 3 月，史迪威中将向中美两国政府提出了中国陆军近代化的计划。史迪威在提出整理缩小当时中国 300 多个师团的计划的同时，着手整编缅甸战役失败后撤到印度兰姆迦的中国军队及改编集结在云南省的中国军队。为实现这些计划以及将夺回缅甸所必需的军需物资持续运至中国，就必须确保从印度到中国的补给路线，但这条路线却被日军切断了。因此，为打通从云南和北缅到印度的陆路交通所形成的战线即 CBI(中国、缅甸、印度)战线。

夺回缅甸的任务由英国分担，但是英国也不得不优先欧洲、中东战线与印度防卫，而未能把宝贵的兵力分派到夺回缅甸上。美国则优先太平洋作战的反攻准备和对英苏的支援，把 CBI 战线（夺回缅甸）放在了次要地位。而蒋介石也对缅甸反攻战态度消极，反之支持作为蒋顾问、从事中国空军培育的美国空军少将陈纳德 (Claire L. Chennault) 的强化中国空军计划，而与史迪威之间发生冲突，两者关系从 1942 年中期开始恶化。

即便如此，史迪威还是不顾中国和英国的反对，为开辟贯通北缅的公路，于 1942 年夏天在印度兰姆迦着手建设采用美式装备和训练的中国新军。同年秋天，从云南空运过来的 3.2 万名中国军队也加入了训练。在云南省昆明，从 1943 年 4 月起在陈诚将军的指挥下着手训

¹¹伊藤隆等编：《続・現代史資料(4)陸軍・畑俊六日誌》，みすず书房，1983 年，1942 年 10 月 5 日（第 374 页），11 月 9 日（第 379 页）。

¹²《甲谷悦雄大佐回想録》，厚生省引扬援护局调整，1954 年。

¹³空运量远远超过缅甸公路运输量，直到 1945 年一直支撑着在华美国空军的活动（西泽敦：《对中軍事援助とヒラマヤ越え空輸作戰》，载军事史学会编：《日中戦争再論》，锦正社，2008 年，第 275-95 页）。

练新军，到8月为止完成了5个军15个师的改编。

这期间，美国把在中国战线的对日战略的重点由陆军近代化转向了战略轰炸，其背景是高性能波音 B29 轰炸机开始投入使用。使用高性能 B29 有组织地轰炸日本本土的生产中枢，被认为是破坏日本抵抗能力最有效率的战略。经过 1943 年 5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英联合参谋会议（Trident）的讨论及同年 11 月美英中首脑的开罗会谈，决定了把盟军在中国战线的对日战略重点放在战略轰炸上。蒋介石本来开始也是热衷于陆军近代化的，但最终被罗斯福总统说服，转而支持以中国为基地的对日轰炸战略。由于蒋与在握有在华美军的指挥权之上，进而要求中国军队指挥权的史迪威关系恶化，另外大幅度整编缩小中国陆军遭到了军阀派势力的顽强反抗，这些也成为了蒋对陆军近代化转为消极的重要原因¹⁴。

在开罗会议上，缅甸战役在对日战略上被赋予了优先权，蒋介石也承诺派兰姆迦与云南的中国远征军向北缅进攻。但是，由于在 1943 年 11 月的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答应对日参战，削弱了缅甸作战的意义。蒋介石根据来自德黑兰会议的情报，拒绝在缅甸作战中使用云南的新军，作为补偿，蒋把兰姆迦的中国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史迪威。史迪威以浙赣作战为例警告如果没有强大的中国陆军，就会存在因日军陆地攻击而丧失空军基地的危险，但是在太平洋战线苦战的日本对中国战线重新发动大规模攻势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史迪威的主张未被采纳¹⁵。

1943 年 12 月，史迪威率领中国新军从印度攻入了北缅入口胡康河谷。1944 年 5 月上旬，盟军通过发动英帕尔作战而开始了对防备薄弱的北缅、云南的总反攻。盟军以占优势的火力粉碎了日军第十八师团，到 7 月占领了胡康。另外，盟军还奇袭了北缅要地蜜支那，于 8 月夺回了蜜支那飞机场。中国军也差不多在同时，开始了强行横渡位于缅甸国境的萨尔温江（怒江）。在被美军改编为近代军队的中国军于北缅取得战果的同时，在中国本土，国民政府军在与日军的大陆打通作战（一号作战，后述）中遭遇了苦战¹⁶。

3) 华北之战

1940 年下半年的百团大战，使日军认识到了活跃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共产党军队的实力与威胁。日军在对华北的治安肃清作战中，对国民政府军令其“归顺”，但“止于警戒监视而不做攻击”，应对共军的策略则成为了重点目标¹⁷。从 1941 年 3 月到 1942 年底，北支那方面军（中国称华北方面军—译者，下同）把华北分为治安区（占领地区）、准治安区（游击区）和未治安区（抗日根据地）。在对未治安区开展有组织的“扫荡”作战的同时，方面军与以王克敏等旧军阀势力头目为首成立的华北政务委员会（1940 年 3 月成立）携手，有组织地开展“治安强化运动”。在治安区，方面军利用华北政务委员会进行宣传等清乡工作，并把游击队活动地区的居民强行移至“治安区”，挖筑隔断壕沟圈设“无人区”。对“未治安区”则实行经济封锁、切断商品流通等。在“准治安区”，方面军也进一步被强化了对共产

¹⁴等松春夫：《日中戦争と太平洋戦争の戦略的關係》，载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 年，第 396—400 页。

¹⁵ Tang Tsou, *American Failure i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 82.

¹⁶ 关于一号作战与北缅·云南作战的关系，参考浅野丰美：《北ビルマ・雲南作戦と日中戦争》，载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 年，第 297—338 页。

¹⁷ 《第 1 軍作戦経過の概要》第 1 军参谋部（1942 年 1 月 15 日），载《現代史資料(38) 太平洋戦争 4》，みすず书房，1974 年，第 177 页。马场毅：《華北における中共の軍事活動、1939—1945》，载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 年，第 232—34 页。

党控制地区的经济封锁，比如越过隔断壕沟袭击“未治安区”的市场，抢夺、没收农作物或实行强制购买等等，治安强化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

治安强化运动和扫荡作战的强化对抗日根据地造成了重大打击，根据地的规模不得不缩小了。但是，这一前所未有的根据地危机，在共产党的指导下，通过奠定农民大众经济基础的“减租减息”运动的全面展开，以及“大生产运动”等最终被克服了。1943年以后，根据地又逐渐得以恢复和扩大¹⁸。

另一方面，北支那方面军为阻止共产势力在华北的延伸，于1943年9月成立了对付游击战的专门部队北支那特别警备队（中国称华北特别警备队--译者，下同）（北特警），但最终只在城市地区取得了明显战果。根据北特警的战斗详报，1943年下半年，共产党军队也开始向“治安地区”渗透，招致了与方面军当初扩大“治安地区”的计划正相反的结果¹⁹。在此形势下，共产党军队势力重新兴起，根据地在1944年底恢复到了1940年的状态。1945年6月，共产党军队在河北省同时发起了攻势。

而1942年初，北支那方面军参谋在与政务将校会议上，强调确保粮食和物资的紧迫性，并强调“为了讨伐作战应设法采取获得大规模物资的手段，或再实施讨伐以获取物资”等，“需要有创意的努力”²⁰。随着日本对当地军队“就地自食其力”的要求的加强，为确保物资和粮食而不择手段的讨伐作战成为了被中方称之为“三光作战”的暴虐行为的背景²¹。早在1940年秋，在为报复百团大战而实施的山西省中部的反击战中，日军就已经强行实施了烧毁被认作共产党军根据地的村庄的“烧光作战”²²。“烧光”的手段之一是使用化学弹药（毒气），根据北支那方面军司令部配发给各部队的《肃正讨伐之参考》（1943年5月），化学弹药作为有效对抗共产党军队的游击战的武器而被奖励使用。这种在“未治安区”的非法行径，主要是因为为了其他战线抽调兵力及部队改编造成替补士兵的比例增加，士兵的素质下降等²³。

另外，为了向满洲和日本提供劳动力，强制性的征集劳动力从1942年起在华北开始实施。这项工作由日军与华北政务委员会统治下的华北劳工协会全权承办。超过200万人的劳工从华北被送到了满洲和蒙疆。1944年以后，华北政务委员会正式出面，日军在重要劳力紧急动员密令之下出动，逮捕征集“浮浪游民”并遣送到日本和满洲。向日本全国强制输送劳工是从1943年9月开始试行的，到1945年5月约有3.9万名中国人被送到日本，从事苛刻的劳动。其间发生了像秋田县花冈矿山事件那样的大规模的中国人劳工反抗事件²⁴。

¹⁸ 西村成雄：《20世紀中国の政治空間》，青木书店，2004年，第135-177页。

¹⁹ 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209-11页。

²⁰ 《政務關係将校会同席上方面軍參謀副長口演要旨》（1942年1月15日），载《現代史資料(13) 日中戦争5》，みすず书房，1966年，第524页。

²¹ 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204-05页。“三光”即杀光·烧光·抢光的意思。

²² 在晋中第一期作战（1940年8月30日-9月8日）中，在“彻底烧光扫荡敌人根据地，达到让敌人以后没有生存的能力”的方针下，“存在敌对性的居民中凡15岁-60岁的男子”均成为“屠杀”之对象，“有敌对性的部落”被彻底的烧毁了（独立混成第4旅团：《第一期晋中作戦戦闘詳報》，载吉见义明・松野诚也编：《毒ガス戦關係資料Ⅱ》，不二出版，1997年，资料53、54）。

²³ 例如，第36师团司令部：《昭和十七年度肃正建設計画》（1942年4月15日），载《現代史資料(13) 日中戦争5》，みすず书房，1966年，572-88页；山本昌弘《華北の対ゲリラ戦、1939-1945》，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209-11页。

²⁴ 根据各工厂的《華人勞務者就勞顛末報告書》的研究有，西成田丰的《中国人強制連行》，东京大学出版

4) 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

在东南太平洋战线消耗了大量战斗力的日军，于1943年9月试图转变战略，将连接缅甸、荷兰领印度、西新几内亚、马利阿纳群岛、千岛列岛、满洲的防卫线的内侧划定为“绝对国防圈”。为强化这一“绝对国防圈”，日军制定了从中国战场调用10个师团的兵力（1.5万人）、马1.5万匹，汽车2000辆等以强化绝对防卫圈守备的计划。但由于一号作战（“大陆打通作战”）计划的出现，使这一调用计划大幅度缩减了²⁵。

1944年4月中旬到次年2月上旬之间，派遣军出动了总兵力的8成约50万人（共20个师团）在京汉、粤汉、湘桂各沿线地区发起了被称为一号作战的日本陆军史上的最大战役。从河南省的黄河到广东、法属印度支那国境纵贯约1500公里的大作战的目的是夺取可能空袭日本本土的散布于西南地区（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阻止来自印度、缅甸、云南方面的反攻，确保向南方运输资源的从法属印度支那到中国、朝鲜的交通路线²⁶。

在一号作战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真田穰一郎少将与服部卓四郎大佐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真田在1942年12月担任作战课长，1943年10月升任作战部长。在从瓜达尔卡纳尔岛撤退的决定中起了中心作用的真田大佐认为，为弥补太平洋战线的军事劣势，构筑能够经受长期作战的战略体制，有必要让在中国大陆的中国派遣军与东南亚的南方军携手起来。服部在1941年7月作为作战课长迎来开战，成为前文所述的5号作战计划的中心人物，作战中止后一直等待着在中国进行攻势作战的机会²⁷。服部在1942年12月转任陆军大臣秘书官，1943年10月再次出任作战课长，与作战部长真田一起开始正式实施一号作战计划。“通过大陆作战弥补太平洋上的颓败之势”是两者间的共识²⁸。

作战部起草的最初的作战计划中列举了歼灭敌空军基地、确保与南方军进行陆路联络的交通、覆灭重庆政权等。陆相东条以彻底歼灭空军基地的作战目的为条件，同意了此计划。天皇也许可了把作战目的集中在歼灭敌空军基地的作战计划²⁹。

但是，在1944年1月24日参谋总长杉山向日本中国派遣军下达的“一号作战纲要”中，与南方军的联络和粉碎重庆政权的继续作战目的也被包含在其中³⁰。这反映出了真田和服部的强大意志和日本中国派遣军的积极姿态。参谋本部对一号作战计划的积极推进给士气低沉的派遣军幕僚们带来了活力³¹。

一号作战在前半部的湘桂作战阶段进展顺利。但进攻衡阳时，重庆军的顽强抵抗，且

会，2002年；白井胜美：《新版 日中戦争》，中央公论社，2000年，第207-10页。关于花冈事件见西成田丰：《中国人強制連行》，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第363-402页。

²⁵ 戦史叢書67《大本営陸軍部(7)》，朝云新闻社，1973年，第179-215页。关于从中国战线抽出的兵力参考第545-48页。

²⁶ 原刚：《一号作战—実施に至る経緯とその成果》，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283-95页。

²⁷ 戦史叢書67《大本営陸軍部(7)》，朝云新闻社，1973年，第548-49页。

²⁸ 井本熊男：《作战日誌で綴る大東亜戦争》，芙蓉书房，1978年，第498页。

²⁹ 原刚：《一号作战—実施に至る経緯とその成果》，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287-88页。

³⁰ 根据这一“纲要”，日本当时判断“近期美英进行化学战的可能性很大”，恐美英使用毒气攻击，因此在桂林、柳州等美军基地附近被命令避免对美军使用化学武器。实际上，在中国战线，从1944年下半年开始，化学武器就被禁止在实际作战中使用（吉见义明·松野诚也编：《毒ガス戦関係資料Ⅱ》，不二出版，1989年，第30-31页，虽然使用次数减少，但没有放弃使用。

³¹ 戦史叢書4《一号作战(1)河南会戦》，朝云新闻社，1967年，第12页。

供给线遭到美军空袭，日军在陷入苦战后的 8 月上旬占领了衡阳。衡阳的占领成为一号作战的重要转机。

太平洋的战局也迎来了重大的转机。1944 年 6 月底，中部太平洋的塞班岛陷落，“绝对国防圈”的一角崩溃了。日军在太平洋战线陷于劣势，而从北缅进攻印度的英帕尔作战也失败了。战局的恶化促成了国内以近卫文磨等重臣为中心的“反东条势力”的集结，这也成为了 7 月东条内阁总辞职的重要原因。

参谋本部重新检讨全方面的战略，对日本本土、冲绳、台湾、菲律宾一线加强防卫，决定了通过此防卫线迎击敌人进攻的基本战略。这被称之为“捷号”作战。问题是如何在与“捷号”作战构想的关联中定位尚在进行的一号作战。具体体现在，是把一号作战按原计划推进，实施桂林、柳州攻略，还是中止一号作战³²。

陆军省首脑部和参谋总长担忧会出现英帕尔作战时的物资供给跟不上的情况，所以持意中止对桂林和柳州进攻的意见。但作战部的方针是按原计划实施一号作战。派遣军也支持作战部的继续作战方针。特别是作战部长真田和作战课长服部主张，菲律宾作战与一号作战乃表里一体，为保障日本本土与东南亚的交通联络不被切断，继续作战是必要的³³。这其间的 1944 年 9 月，陆军次官柴山兼四郎中将代表陆军上层，向畑总司令官提出在实施完粤汉打通作战以后，中止一号作战的意见，畑虽然承诺检讨补给，但未同意中止作战的意见³⁴。

这样，一号作战继续进行，到 1944 年 11 月日军占领了桂林、柳州的空军基地，1945 年 1 月基本实现了对大陆纵贯交通的确保，但是当初的战略构想已然失去意义。因为美军重型轰炸机 B-29 在四川成都集结，开始了对九州的空袭。另外，随着马里亚纳基地的建成，从 1944 年底起，从该基地出发的战斗机开始了对东京等日本本土所有地区的战略轰炸。对美国的亚太地区战略来说中国战线的意义越来越小。但是美军指导部应担忧中国战线危机的蒋介石和史迪威之请，同意对主要城市进行空袭。1944 年 12 月 18 日，美军以 B-29 战斗机对位于华中的日军据点汉口进行了空袭，街道的九成化为灰烬，派遣军受到重大打击。

国民政府军在一号作战中的失败是由于士兵的待遇低劣、将校的腐败等造成的斗志消极，以及命令系统混乱，情报不足等。中方损失尤其严重，牺牲了 60-70 万名士兵，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各省的大部分领土。而国民政府军的失败为共产党军队的抗日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从 1944 年开始，共产党军就活跃在以华北、华中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而日军在一号作战中出动了大量兵力，使得华北的治安警备能力大幅度降低，因而助长了中共势力的反攻，中共势力得以逐步侵蚀日军的占领区³⁵。

1944 年底，新就任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向参谋本部进言，借一号作战余势进攻重庆。但由于太平洋战局的恶化而未被批准³⁶。作为替代方案被提出来的就是老河口与芷江作战。一号作战的结果，丧失空军基地的在华美国空军在老河口和芷江建造了战斗机和中型轰炸机的基地。派遣军从 1945 年 3 月到 4 月，第十二军投入了 3 个师团 6 万名兵力，成

³²井本熊男：《作战日誌で綴る大東亜戦争》，芙蓉书房，1978 年，第 570 页。

³³原刚：《一号作战—实施に至る経緯とその成果》，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 年，第 290-91 页；伊藤隆等编：《続・現代史資料(4)陸軍・畑俊六日誌》，みすず书房，1983 年，1944 年 10 月 6 日内容。

³⁴伊藤隆等编：《続・現代史資料(4)陸軍・畑俊六日誌》，みすず书房，1983 年，1944 年 9 月 13 日内容。

³⁵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戦争史》，青木书店，1983 年，第 182-85 页。

³⁶军事史学会编：《大本营陸軍部戦争指導班 機密戦争日誌(下)》，锦正社，1998 年，第 643-44 页。

功破坏了老河口基地³⁷。而进攻芷江的第二十军约 5 万兵力则遭到了中国军约 60 万和美国空军的迎击。中国军中加入了由史迪威的继任者魏德迈中将根据陆军近代化计划所训练出来的现代化师团。这一最后的大作战以日军惨败而告终，第二十军于 1945 年 5 月下旬撤退³⁸。

第2节 日本占领地区的状况

1) 汪政权下的政治与经济

脱离重庆的汪兆铭于1940年3月以从重庆迁都的形式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日本在1940年11月承认该政府为享有中国全国（除满洲国外）统治权的中央政府。但是，与汪的意志相反，大量日本人顾问在政府内就任，日本贯彻在满洲国实行的“内部指导”方式，把南京政府实质性地放在日本的统治之下，并打算在战后仍继续统治。汪在与畑总司令官会见后，担忧南京政府会“成为第二个满洲国”³⁹。结果，国民党内有力的反蒋势力没有参加这样的汪政权，汪政权缺乏基础的军事能力，参加和平阵营的军队实际上是“徒有虚名的土匪团”⁴⁰。

经济方面也由于日本对物流的管理与经济封锁而带来了产业萧条、物价暴涨。汪政权之下的华中振兴公司旗下的基础产业，形式上是中国出资 51%的日中合资企业，实权则一直为日方掌握。比如，汪向日军要求返还还包括上海、南京在内的江苏省等三省 200 余家由军队管理的工厂。日军仅同意归还小型工厂，其余则强迫中方收购或与日本合资。据周佛海所形容当时的状况是“原则上放弃了统治权，但由于无限地加以限制，实际上等于没有归还”⁴¹。与军用无关的商品也“受到严格限制，使得和平地区内的工商业疲软，物价暴涨，政府财源濒临枯竭”。1941 年 8 月，日本在中央和地方设置物资统制委员会，欲缓和对占领区内的物资移动的限制，但是没有取得效果。

2) 货币战争

日本在日中战争期间以稳定获取物资为目的，在占领区设立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央储备银行（1941 年 1 月）等，发行联银券和储备券，与国民政府的旧法币展开了货币战争。陆军还在 1939 年通过“杉机关”实行货币谋略及伪造法币以获取物资，军票则压迫国民政府的法币。由于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占领租界，上海的法币疲软，汪政权停止发行新军票，禁止旧法币流通，在 1943 年实现了统一使用储备券。储备银行成为了拥有包括东京分行在内，有 38 家支行的大银行。

但是，与旧法币急剧下跌相比，蒋政权发行的统一公债在开战后仍然在上海进行交易。1942 年 1 月时超过了开战前的市价，由于新旧法币替换，在规定使用新法币支付后，公债进一步上涨。重庆政权的公债在占领区流通，甚至以大于面额的价格交易，这显示出了中国国民没有动摇对蒋介石政权的信赖。

³⁷等松春夫：《日中戦争と太平洋戦争の戦略的關係》，载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 年，第 406—07 页；戦史叢書 64《昭和二十年の支那派遣軍(2)》，朝云新闻社，1973 年，第 379—432 页。

³⁸戦史叢書 64《昭和二十年の支那派遣軍(2)》，朝云新闻社，1973 年，第 353—78 页。

³⁹伊藤隆等编：《続・現代史資料(4)陸軍・畑俊六日誌》，みすず书房，1983 年，1941 年 4 月 19 日内容。

⁴⁰《現代史資料(13) 日中戦争 5》，みすず书房，1966 年，第 39 页。

⁴¹蔡德金编（村田忠礼译）：《周仏海日記》，みすず书房，1992 年，1940 年 5 月 5 日内容。

本来，日方货币的流通范围限于都市和铁路沿线的占领区。但是共产党军队“占领了日军驱逐出重庆军的地区，实行所谓的廉洁政治，在华北华中方面逐步巩固了地位”后，银联券和储备券的流通范围更加被缩小了。由于增发货币甚至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占领区的物价暴涨是为获取物资而乱发货币所造成的结果，这意味着军票价格的下跌。这样一来，形成了“在华 60 万日本人社会之外，存在着完全不同的价格体系”的局面⁴²。

在南京政府（中国称汪伪政府—译者，下同）所辖的华中、华北，南京政府发行的储备券（新法币）无法克服对旧法币的疲软，以及日军乱发军票等原因造成了货币混乱、物价高涨、严重物资不足，已经无法再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日本最终没有实现通过控制通货膨胀，使货币价值高于中国货币（旧法币）从而稳定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机能。

3) “对华新政策”及其破产

瓜达尔卡纳尔岛（东南太平洋方面）攻防战面临重大局面的 1942 年 12 月，御前会议决定了新的中国政策（“为完成大东亚战争的对支处理根本方针”）。其主旨在于通过促进南京政府的“自发活动”、检讨蒙疆、华北等“特殊地区化”方针、撤废治外法权和租界、修改《日华基本条约》（1940 年 11 月）、抑制在经济政策上的“日本独占”，实现“强化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⁴³。这从根本上修改了以往对汪政府的基本政策“支那事变处理要纲”（1940 年 11 月）。

“新政策”出台的背景在于，1942 年后半年在太平洋战线展开的激烈消耗战致使日本经济实力衰退，为了减轻日本在中国进行统治的负担，必须减少日本的干涉，让中国自发活动。另外一个背景是英美在双十节（1942 年 10 月 10 日）对重庆政权发表了撤废治外法权的声明。英美本来表示在战后撤废治外法权，但由于亚太地区军事形势的改善和重庆政权的强烈希望而提早实行了这一计划⁴⁴。中国共产党也把此作为中国人民一百年以来为争取独立解放而斗争的结果，当作“中英、中美之间的新关系和新团结”而表示欢迎⁴⁵。在中国“把握民心”和“强化合作”的观点上，盟国和日本都把撤废治外法权等不平等条约视为有效手段，竞相加紧了归还租界、废撤治外法权的具体行动。

但是，可能导致在中国丧失众多权益的“新政策”的决定及实施需要强大的推动力。成为中心人物的是重光葵（1942 年 1 月任汪政府大使，1943 年 4 月任外相）。对重光来说，“新政策”是通过日本对中国政策的“根本性改正”和“纠正指引错误方向的军部的谋略”，“向中国民族明确传达日本民族的公正精神”⁴⁶。重光拼命向天皇和政军领导人说明通过根本性修改日华基本条约而恢复中国主权的必要性，压下了军部的反对。

新政策决定后，在政治方面，撤废治外法权和归还租界等依次实施，1943 年 8 月代替《日华基本条约》重新缔结了《日华同盟条约》，虽然只是形式，但汪政权与日本建立了平等关系。

但是，新政策中本来就含有攫取战争所必要的物资的目标，实际上在经济方面“上层仍

⁴² 《続・現代史資料(11) 占領地通貨工作》，みすず书房，1983 年，第 937、836 页。

⁴³ 参谋本部编：《杉山メモ(下)》，原书房，1989 年，第 321-23 页。

⁴⁴ Christopher Thorne, *Allies of a Kind: The United States, 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1941-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178-179., 195-197.

⁴⁵ 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中国部会編集：《中国共産党史資料集 第 11 卷》，劲草书房，1975 年，资料 46。

⁴⁶ 重光葵：《昭和の動乱(下)》，中央公论社，1952 年，第 167、172 页。

然由日本军人控制，下面由日本商人独占，特殊化一直持续到日本战败”⁴⁷。对南京政府统治下的人民而言，解决物价高涨造成的经济压迫才是切实问题，因此在他们之中未见任何对“新政策”的欢迎气氛⁴⁸。日本为打开经济吃紧的局面，开始停止发行军票转为使用储备银行券，进而废止了通过日军的物流统制系统，1943年3月设立了南京政府独立的物资统制机关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商统总会）等。这些措施是促进南京政权自立的一环，但实际目的则是为了确保向内地输送重要物资—对日供给物资⁴⁹。

南京政府也期望成立“商统会”（全国商业统制总会），将统制权收回到中国方面，希望缓和统制以抑制物价上涨。但商统总会的机能脆弱，以上海为中心，对重要物资的隐匿开始横行，1943年夏天，物价已高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原因是，人民对南京政权与日本的信赖动摇，对储备券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南京政府公布了“关于取缔隐匿的国民政府令”（1943年4月），以作应对，但未取得成效⁵⁰。

日本政府也不能对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置之不理。1943年7月的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审议了“对支经济政策相关件”，向华中、华北输送了25万吨金块，在市场上出售以回收货币。同时决定对隐匿严重的布料采取强行收买的紧急措施。这一措施短时期内对控制物资的隐匿和物价的暴涨有一定效果，但未能持久⁵¹。

开战后，在大藏省上海财务官室任职的渡边诚在1943年12月就打开新政策的混乱局面提出了以下三点大胆建议：（1）“经济问题不依靠国民政府，而是应以中国经济人为对象”，（2）废止“官治统制”，（3）“军官不应公开干涉经济问题”。渡边认为，不应把新政策的实施寄期望于失去上海财界和中国民众信赖的汪政府，应该直接支持“上海经济人的自主活动”。渡边甚至认为，新经济政策的真正目的在于通过“日华两经济圈的融合”，“重新建设自给自足的新经济秩序”，其被用做日本调配军需物资的“省事手段”是造成混乱的真正原因。但是点明了汪政权与日本关系之本质的渡边提议未被考虑⁵²。

在抵抗日军侵略的抗战过程中，中国的民族主义渗透到了农村和内陆，为战后的国家建设奠定了社会变革与民族统一的基础。而日本则通过战争，高举日中提携合作和“新秩序建设”的目标，占领了经济发达地区，成立了新兴政权。但以军事优先的“新政策”既没有得到当地居民的信任，也没有为战时的中国建设作出贡献。

第3节 日本投降

1) 大东亚会议与联合国的战后构想

1943年11月，在日本亚洲占领地成立的“独立国”的代表（满洲国、汪兆铭政府、缅甸、菲律宾、泰国，以及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代表作为陪席）聚集东京举行了大东亚会议。东

⁴⁷陈公博（冈田西次译）：《中国国民党秘史—苦笑録・八年来の回顧》，1980年，讲谈社，第334页。

⁴⁸蔡德金编（村田忠礼译）：《周仏海日記》，みすず书房，1992年，1943年2月23日内容。

⁴⁹古厩忠夫：《日中戦争と占領地経済》，载中央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编：《日中戦争—日本・中国・アメリカ》，中央大学出版会，1993年，第344-59页。

⁵⁰冈田西次：《日中戦争裏方記》，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第261-67页。

⁵¹同上、第267-268页。

⁵²《対華新政策の経済面に関する管見》（1943年12月20日），载《続・現代史資料(11) 占領地通貨工作》，みすず书房，1983年，第829-837页。

条首相的目的在于，为预计会在当年秋天发生的同盟国军在亚太的正式反攻作准备，通过召集占领地的领导人发表共同宣言，显示亚洲诸民族的团结。但是，担任起草共同宣言的外务官员与重光外相在共同宣言中表明了新的战争目的。即，取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排他性的、强调日本盟主地位的战争目的，把自主独立、平等互惠、取消人种歧视、开放资源等普遍的国际理念写入宣言，以确保日本在战后世界的发言权。实际上，1943年8月在外务省起草共同宣言的过程中，就是边参照表明同盟国战争目的的《大西洋宪章》，边进行的⁵³。重光把这一共同宣言作为共同理念，把亚洲的独立国家在相互平等的立场上创设“大东亚组织”作为目标。但是，各国以平等立场参加组织就否定了日本在亚洲的盟主地位，该共同宣言被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认为是“包藏国际联盟思想的产物”而加以反对，未能实现⁵⁴。最终的共同宣言也是经过大东亚省、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修改，使得外务省重新定义战争目的的意图含糊不清。这对同盟国而言则成了单纯的战时宣传。

但是，对于日本来说，大东亚会议根据日菲、日缅同盟条约认可了缅甸和菲律宾的“独立”，与汪兆铭政权缔结对等的同盟条约（1943年8月），是一系列的大东亚新政策中的一环。大东亚会议是日本外交当局在关注大西洋宪章意义的同时，提出来的不同于“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日本对战后亚洲的新构想。而且，日本寄托于包含大东亚会议在内的一系列大东亚新政策的重要意图之一是，将重庆国民政府从同盟国阵营中分离，但其完全没能起到引诱蒋介石和中国人民的作用⁵⁵。

大东亚会议前后，同盟国方面的“外交攻势”也十分活跃，接连召开了莫斯科外相会议、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等会议。特别是蒋介石参加的英美中开罗会议，在讨论对日军事战略的同时，也讨论了以日本撤出占领地为前提的战后亚洲国际秩序的基本框架，并将其成果以《开罗宣言》（1943年11月27日）的形式公开。《开罗宣言》作为之后的《波茨坦公告》（宣言）的基础，交战后盟国方面首次提到了日本领土的处分问题，明确记载了向中国归还台湾和澎湖列岛，从日本剥夺1914年以来被日本占领的诸岛，朝鲜独立等内容。待命中的石射猪太郎大使注意到蒋介石在《开罗宣言》上的签字之事，哀叹道“全面和平已经走到千里之外了”⁵⁶。但是，将国策重点放在大东亚会议和对华新政策上的日本政府，将《开罗宣言》的目的视为防止逐渐丧失“抗战名义”的蒋政权从盟国阵营中叛离，而没有重视它的国际意义。但是，朝鲜和台湾的“独立”和保证从日本的“剥夺”下解放的内容，是日本最忌讳和痛恨之处，因此日本政府在针对《开罗宣言》的报道问题上，禁止提到具体的领土问题⁵⁷。

但是，媒界人士石桥湛山与清泽渊在不断关注同盟国对战后运营构想的同时，一直对基于大东亚宣言的具体的组织方案进行了讨论。大东亚会议之后不久，清泽与石桥通过大东亚相青木敦促政府以大东亚宣言为基础做出关于战后组织的具体方案，但因政府无此意愿而感

⁵³波多野澄雄：《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第161-73，278-84页；伊藤隆·渡边行雄编：《重光葵手記》，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155-56页。

⁵⁴参谋本部编：《杉山メモ(下)》，原书房，1989年，第440-41页。

⁵⁵大东亚会议与共同宣言的“意图”，参考波多野澄雄：《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及入江昭：《戦後アジアへの戦時日本の構想》，载细古千博等编：《日英関係史、1917-1949》，东京大学出版会，1982年。

⁵⁶伊藤隆等编：《石射猪太郎日記》，中央公论社，1989年，1943年12月3日内容。

⁵⁷天羽英二日記・资料集刊行会：《天羽英二日記》，第4卷，非卖品，1982年，第884-85页。

到失望⁵⁸。但两人一直到 1944 年底，始终关注着联合国方面的战后运营构想。并不停地呼吁有必要考虑以大东亚宣言的诸原则为基础的“新世界机构”⁵⁹。

2) 和平工作

日美开战以来，日本政府把对重庆政府的和平交涉工作交于南京国民政府，日本政府采取不直接参与的方针。南京政府以与重庆方面的谍报机关和特务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周佛海为中心，试图接近重庆，但没有取得进展。1944 年 8 月成立的小矶内阁在 1944 年 8 月底和 9 月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决定把对重庆工作统一到首相的主导之下，主要目的是为结束日中战争制造直接会谈的机会⁶⁰。小矶首相热心致力于重庆工作是由于听了由朝日新闻副社长进入内阁的国务相绪方竹虎的建议⁶¹。

和平条件方案是以外务省为中心制定的，9 月 5 日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在“和平条件以建立在完全平等的条件上为原则”的方针之下，决定了以下的“和平条件腹案”：(1) 完全平等的立场上的和平、(2) 关于与和平相关的重庆与美英的关系，尽量尊重中国方面的意思、(3) 汪·蒋关系视为国内问题、(4) 英美如撤兵就要全面撤兵，把香港归还中国，等等“有划时代意义的和平条件”⁶²。如果在开战前后提出这些，也许可以开辟日中和平的途径。

最终，在 9 月 9 日的“对国民政府的传达要领”中，关于承认满洲国是中国领土的外务省的新方针、以及香港、蒙疆、南方权益等具体问题，传达了“应尊重中国方面意见进行协商”的内容⁶³。

这些条件作为对重庆的和平条件传达给了南京政府。但周佛海等汪政权首脑认为归还满洲(取消满洲国)语意不清且违反素来强化汪政权的方针，因而同重庆政府交涉踌躇不前⁶⁴。在日本国内，天皇和重光外相也顾虑到汪政权的立场而对和平条件持批判态度⁶⁵。但是，1944 年 9 月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决定说明了日本陷入了不得不自行提议让蒋介石返回南京成立统一政府，日本从中国撤兵，事实上已等于战败的立场。但是，从这时到日本投降又浪费了近一年的时间。

以小矶热衷于对重庆和平为背景，受到政界关注的开拓路线工作的宇垣一成的中国之行。宇垣的构想是提出结束汪政权，承认重庆为“正统中国政府”，进行“全面和平交涉”的方案⁶⁶。宇垣在 9 月下旬到达北京，10 月上旬在上海会见了自称重庆方面派遣来的周一夫，但是最终没有完成预期的对路线的开拓，于 10 月 13 日返回了日本。重视对汪政权的国际信义的外相重光，把小矶及支持小矶的宇垣派的重庆工作视为“取消南京政府论”，一直加以批判⁶⁷。

⁵⁸清泽渊：《暗黒日記》，评论社，1979 年，1943 年 11 月 25 日内容。

⁵⁹ 波多野澄雄：《太平洋戦争とアジア外交》，东京大学出版会，1996 年，第 200-05 页。

⁶⁰ 参谋本部所藏《敗戦の記録》，原书房，1967 年，第 163 页。

⁶¹伊藤隆等编：《続・現代史資料(4)陸軍・畑俊六日記》，みすず书房，1983 年，1944 年 9 月 4 日内容。

⁶²军事史学会编：《大本営陸軍部戦争指導班 機密戦争日誌(下)》，锦正社，1998 年，1944 年 9 月 5 日内容。

⁶³参谋本部所藏《敗戦の記録》，原书房，1967 年，第 175-76 页。

⁶⁴蔡德金编(村田忠礼译)：《周仏海日記》，みすず书房，1992 年，1944 年 10 月 17 日、11 月 4 日内容。

⁶⁵军事史学会编：《大本営陸軍部戦争指導班 機密戦争日誌(下)》，锦正社，1998 年，1944 年 9 月 6 日内容；参谋本部所藏《敗戦の記録》，原书房，1967 年，第 165-66 页。

⁶⁶ 渡辺渡：《感想日誌 卷七》防卫研究所所藏，1944 年 10 月 2 日、10 月 3 日。

⁶⁷ 伊藤隆等编：《重光葵手記》，中央公论社，1990 年，第 486-87、436 页。

宇垣的中国旅行之后，为确认关于“全面和平”的日本方面的意图，南京政府考试院长江亢虎在10月中旬访日。江向日本的要人说明了如不准备取消南京政府则不可能与重庆政府达成和平。这是因为江的周围有与蒋介石亲信有联络的缪斌（考试院副院长），及与西南各将领有联络的青年党、国社党的领袖们⁶⁸。

对江的意见重光与小矶的反应不同。小矶更加坚定了江院长所言的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如果转向“全面和平”的时机成熟的话，则采取答应放弃满洲国的姿态。但是，重光一直以日本承认的南京政府为中心来考虑和平，极力避免取消南京政府的事态。

江受托带了部下缪斌（考试院副院长）写给情报局总裁绪方竹虎和书记官长田中武雄的书信（内容不明）。江回国后，小矶对通过汪政权进行的重庆工作产生怀疑，热心于聘请缪斌。缪斌曾历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江苏省民政厅厅长，但由于涉嫌贪污等逐渐脱离国民党。虽然在南京国民政府担任了立法院副院长，但由于与重庆密通一事暴露而被贬职为考试院副院长。小矶从绪方及绪方担任朝日新闻编辑局局长时代的部下，驻上海通信员田村真作、朝日新闻记者太田照彦、受小矶信赖的原陆军大佐山形初男等人那里获取情报和帮助，确信缪斌是可以联络蒋介石的路线。不顾重光等人的反对，1945年3月中旬，小矶邀请缪斌来到日本。缪斌提出的“中日全面和平实行案”如下：（1）取消南京政府、（2）组织重庆方面承认的“留守”政权、（3）通过“留守”政权开始日中停战、撤兵停战交涉⁶⁹。

但是，在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在进入审议此条件之前，重光、海相米内、陆相杉山等针对缪斌的可信赖性、缪斌派人物是以捣毁南京政府为目的等，提出了反对意见，最终和平提案未被接受。重光坚持反对的理由是，为实现取消南京政府和全面撤兵的重大政策，必须先确定“结束战争的决心”⁷⁰，如果没有终结对英美战争的决心，忽视南京政权的存在而进行的重庆和平工作是不可能实现的。小矶在1945年4月1日上奏天皇，请求继续缪斌工作。但是，天皇在确认了陆、海、外三大臣的反对意见后，命令小矶让缪斌回国⁷¹。这样，缪斌工作受到挫折，成为引发小矶内阁总辞职的原因之一。

有评价认为缪斌工作是试图离间南京政府与日本，分裂日本的首脑层的行为。从缪斌工作加深了重光与小矶间的裂痕这一事实上来说，他的目的是成功了⁷²。但是，蒋介石是否真有这一意图，为何到战争的最终阶段才要实现此意图，现在很难加以证实。与缪斌工作同时进行的是何世祯工作。在参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同时也与重庆方面的情报工作有关联的何世祯于1944年10月，把天皇亲政、处罚战争责任者、日军撤兵等重庆方面的和平条件托付给近卫文磨的弟弟水谷川忠磨等人。这份和平条件经由水谷川转达给了近卫和外相重光，但政府未予同意⁷³。

⁶⁸ 关于江亢虎访日一事，参照：《重光大臣江亢虎考試院長第一次会談要領》（10月17日），《同第二次会談要領》（10月19日），（外务省记录A7.0.0.9-61）。

⁶⁹ 田村真作：《缪斌工作》，三荣出版社，1953年，第175-76页；外务省编：《終戦史録（上）》，新闻月鉴社，1952年，第220页。

⁷⁰ 伊藤隆·渡边行雄编：《重光葵手記》，中央公论社，1986年，第470-71页。

⁷¹ 外务省编：《終戦史録（下）》，新闻月鉴社，1952年，第217-20页。

⁷² 户部良一：《日本の対中国和平工作》，载细谷千博、后藤干一、入江昭，波多野澄雄编：《太平洋戦争の終結—アジア・太平洋の戦後形成》，柏书房，1997年，第43页。

⁷³ 与缪斌工作、何世祯工作一起，以戴笠为首的蓝衣社派谍报机关（军统）参与的可能性也很高。（户部良一：《日本の対中国和平工作》，载细谷千博、后藤干一、入江昭，波多野澄雄编：《太平洋戦争の終結—アジア・太平洋の戦後形成》，柏书房，1997年，第38-42页）。另外，根据汪熙：《太平洋戦争と中国》，

3) 国民党统治的危机与《雅尔塔协定》

美国政府担忧国民政府的腐败与日军的攻势会造成中国战线的崩溃。罗斯福总统在1944年7月向蒋介石提议，为了重建中国战线，在史迪威的指挥下统一国共两军。蒋介石惧怕共产党军队会脱离国民政府的指挥最终使得国民党一党统治解体，因此拒绝了这一要求，并要求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如此一来，中美关系呈现了危机状况。10月美国参谋本部决定放弃台湾、厦门作战，改而选择从硫磺岛到冲绳的路线作为抗日路线，这使得中国战线的意义降低⁷⁴。此时，罗斯福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中美危机得以避免。面对来自共产党、民主势力和党内的批判，此次蒋介石的表现，展现出其力求团结国内、拥有领导能力的形象。罗斯福选择侧重强化蒋政权以封锁中共，而非支持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中国政策偏向支持蒋介石和反共。

1944年下半期以后，欧洲和亚洲太平洋两条战线都压倒性地转向有利于同盟国方面发展，美苏围绕战后世界势力分配的摩擦日趋激烈。欧洲的焦点在东欧，亚太地区的焦点在日本撤退后的“满洲”。斯大林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会议时已经承诺对日参战，但是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谈上，斯大林要求以大连港的国际化和苏联的优先使用权、旅顺港的租借、中东、满铁两线的中苏合资经营等作为补偿，英美也同意了其要求。罗斯福在与中国主权相关的条款上，认为有必要进行中苏交涉，斯大林也接受了。自1945年6月起中苏交涉开始了。国民党政府强烈反对将旅顺租借给苏联，而提议将旅顺作为军事基地共同使用。苏联同意了这一建议，但实际上则变为苏联把旅顺作为海军基地单独使用。8月9日的苏联对日参战加速了交涉，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国民政府认可了《雅尔塔协定》中与中国相关的大部分条款，但与苏联约定：苏联通过国民政府实施援助、苏军在日本投降后的3周以内开始从东北撤退。阻止苏联参战后支援共产党和干涉中国内政之点对中国来说是满意的⁷⁵。

这期间，共产党从1945年4月下旬到6月，召开了时隔17年之久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大），确立了毛泽东的地位和领导权。此时华南、华中的枢要地区仍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在国民党军的频繁挑衅行动下，毛泽东宣布拥有正规军91万、民兵220万的共产党军已经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批判了蒋介石国民党的消极抗日路线；提议废除国民党一党独裁，要求国民党参加“民主联合政府”。毛强烈反对国民党的一党独裁政权，试图集结多方势力以对抗国民党。另一方面，在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民众之间要求民主化和联合政府的运动，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要求也在高涨。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享受的政治地位开始出现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于5月上旬到下旬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基本上排除其他党派参加巩固国民党独裁的战后政权构想。随着日本战败的临近，国民党与中共的民主联

载细谷千博、本间长世、入江昭、波多野澄雄编：《太平洋戦争》，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日中战争期间日中双方直接间接尝试的和平接触至少达29回。中国方面的意图在于缓和日军军事攻势、收集敌人底牌的情报、从英美获取援助的交易材料等（第90—100页）。

⁷⁴加藤公一：《〈スティルウェル事件〉与重庆国民政府》，载石岛纪之·久保亨：《重慶国民政府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第147—67页。

⁷⁵石井明：《中ソ関係における旅順・大連問題》，载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際政治》，95号，1990年，第46—64页。

合政府论的对立关系逐渐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⁷⁶。

4) 日本投降

1945年5月底，日中战争最后的大作战芷江作战以日军的败北告终，参谋本部坚定了把兵力从华南撤退而集中于华北、华中的方针，派遣军从湖南、广西、江西方面的湘桂、粤汉铁路沿线的占领区域召回兵力，将这些兵力转用于华中、华北，进行撤退作战。但是，大军的撤退尚未结束之际，7月27日，英美中3国首脑发表了劝告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

《大公报》对此评论：虽然不满没有记载废除天皇制度这一点，但是对于明确表示履行《开罗宣言》等其它各项条款，则表示完全赞成。但是，日本政府拒绝了《波茨坦公告》，而在被投下原子弹，和随后的8月9日苏联参战的“外压”之下，在天皇亲临的8月9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以维持天皇制作为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12日的盟国答复是，不能明确保证维持天皇制的条件，但是，日本政府将之理解为已经得到保证，于是在14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

国共两军，在日本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8月10日以后，争相对日军进行受降。延安总司令朱德命令解放区的所有部队解除日军与伪军的武装，向各部队命令为了接受投降进军。另一方面，蒋介石于11日向日军要求暂时保持武器与装备，以维持治安和确保交通，等待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同时，蒋介石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广播演说中提到“勿以暴还暴”，并训示：虽然必须追究军阀的战争责任，但是，不能对日本人民加以报复或侮辱。

期待对日宽容的日本政府，于8月16日决定，为了“一扫日华间的关系，极力支持中国的强大，以资将来帝国的飞跃与东亚的复兴”，奖励事业者、技术者及企业的驻留，“以诚意协助中国的复兴建设，促进日华的合作”。8月21日，以重光外相的名义，将这个决定传达给各地使领馆⁷⁷。虽然该指示的效果并不明确，但是有数千的日本人滞留（留用）在中国并参与了技术援助和复兴支援却是事实。

蒋介石于15日向日本占领地指示：伪军（南京国民政府军）于驻地维持治安，努力见机赎罪。汪政权的主席陈公博报告：将36万伪军集中于南京、上海、杭州，等待国民政府军解除武装。并于次日16日宣布解散汪政府。

而共产党方面，中共军队总司令朱德一方面向美英苏三国声明，国民政府不能代表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区抗日军拥有选出参加对日和平会议代表的权限等，同时命令在解放区的日军向共军投降。其间，蒋介石赋予何应钦处理所有中国战区内敌军投降事宜的任务，并向共产党指示驻屯于现驻地等待命令，但是，共产党并未遵从。国共两军间无可避免的对立，早早地出现了。

战争结束时，在中国本土散布的日军兵力大约在105万人之上，保持着充分的士兵数量以及武器、装备、指挥命令系统，在将士的士气也还高昂的情况下迎来了投降。冈村总司令官于8月15日上报：派遣军“虽败于战争，但在作战上是呈现压倒性的胜利，有如此优势的军队，如果要由弱勢的重庆军来解除武装，是说不通的”⁷⁸。日军当时占领着华北全部和

⁷⁶ 山田辰雄：《中国近代政治史》，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第189—92页；石岛纪之：《中国抗日战争史》，青木书店，1983年，第200—02页。

⁷⁷ 江藤淳编：《占领史录(上)》，讲谈社学术文库，1995年，第524—31页。

⁷⁸ 《现代史资料(38) 太平洋战争4》，みすず书房，1974年，第403页。

长江中下游的主要都市以及与其连接的铁路沿线一带。中共的抗日根据地，存在于华北日军占领地的周围，四川、云南等内地，则是国民党的统治地区。

在这样的分布状况下，可以迅速解除日军武装的是共军。日本的投降比预期来得早，国民政府无法集合撤退到内地的军队前去受降。共军于8月16日左右以后，在华北一带、江苏北部向日军要求移交武器，但是派遣军总司令部通告：“对于不法的治安扰乱者，将视为不在蒋委员长统治下的人员，不得已时，应该断然做出自卫行动”⁷⁹。这个容许“自卫行动”的命令，在8月21日以后的投降交涉上，得到国民政府军方面的支持，形成了两军合作对共军进行“自卫战斗”的基础⁸⁰。于是，在中国本土，除了一部分被强迫解除武装的例子之外，日军没有向共军投降的，但是，在华北、江苏省北部的日军，因对于共军的攻击实行自卫战斗，造成7000人死伤。另一方面，在华中（江苏省北部除外）、华南，战争结束后几乎没有发生战斗。

使共军向日军占领地的进击产生犹豫的是《中苏同盟条约》（前述）。由苏联向国民政府约定提供支持援助的《中苏条约》，意味着共军的进击已不能期待苏联的后援。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不得不转换战略方针。8月22日，中共放弃华北大都市及主要干线的占领，转而确保小都市和农村，并把主要部队向满州移动⁸¹。

美国在对日战争胜利后，将国民党军送到上海、南京、北京等华中、华北的主要区域，支持国民政府接收主要都市，南京进驻部队从9月5日开始陆续通过空运抵达，国民党军队睽违8年之后进入首都南京。9月9日，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签署投降文书，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投降。而在台湾，于10月下旬举行投降仪式，结束了日本长达50年对台湾的统治。

但是，在中国本土的日军投降、解除武装，依国民党军队的北上时期而有所不同，其过程也绝非平坦。在华中、华南，大半的部队在1945年10月以前完成解除武装，但是在华北，因国民党军队的抵达迟缓，解除武装因而拖延，全面解除武装的完成则是1946年1月的事了。

对派遣军和国民党政府方面来说，意料之外的是发生了在山西省的日军与阎锡山军队合流，一起对共军作战之事。国民党政府对阎锡山方面发出制止日军兵申请志愿参加阎军的训令，但是，即使当国民党军队抵达当地时，仍有隶属第一军的约2600名日本官兵为了与阎军共同对共军作战，而选择留在山西省⁸²。其中的约1600名，在中共军控制山西省前的1948年回国，但还有1500多名留在山西省从事内战，而在中共统治下成为战犯⁸³。

结语

从卢沟桥事件到战争结束，包含中国东北部（满洲），在中国战死的日军、军属的人数约42万名，伤病者约92万名。其中，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后的战死者被推定为23万名（伤病者50万名），这个数字超过从卢沟桥事件到太平洋战争开战为止的数字，显示了比起进攻作战

⁷⁹ 冈村宁次：《岡村寧次大将資料（戦場回想編）》，原书房，1970年，第10页。

⁸⁰ 《現代史資料（38）太平洋戦争4》，みすず书房，1974年，第340、346-48页。

⁸¹ 门间理良：《利用された敗者—日本軍武装解除をめぐる国共両党のかけひき》，载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第67-83页。

⁸² 《現代史資料（38）太平洋戦争4》，みすず书房，1974年，第367、510-12页。

⁸³ 厚生省引扬援护局编：《続々・引揚援護の記録》，クレス出版，2000年，第327页。

时期，在后半期更是苦于与共军作战的特征。另一方面，国民政府军队的死者约 132 万名，伤者约超过 180 万名，其中，在太平洋战争开战后的战死者、伤者数字都有锐减的倾向。这个倾向显示了国民政府为了准备与共军对决而保存军队实力，以及日军持续向东南亚和太平洋方面扩展，使战斗能力下降之情况。但是，1944 年的战死者、伤者都超过 10 万名，说明了因一号作战造成的人员损伤之庞大。而共军的死伤者数(包含失踪者)，被推定为超过 58 万名⁸⁴。

而且，日中之间的全面战争，不只是双方的军人，更无端牺牲了众多的非战斗人员。如此，非战斗人员的众多牺牲，以及日军各式各样的“非法行为”，在战后的日中两国国民之中，留下了妨碍建构新关系的深刻伤痕。在实现国交恢复的 1972 年的《日中共同声明》中，虽然记载了中国政府“宣布放弃要求战争赔偿”，但是，因为使用细菌毒气问题、战场上的慰安妇问题、日军的弃置武器问题、中国劳工被强掳和强制劳动问题等等，在日中两国之间展开了跨越年代的质问日军战争犯罪、要求战后赔偿的运动，以日本政府为对象的诉讼直到今日依然持续，也正说明了深刻伤痕的存在。

⁸⁴ 日军的受害，是依据厚生省社会・援护局监修：《援護 50 年史》，ぎょうせい,1997 年、靖国神社资料(合祀数)等作成的，中国方面的受害推算，依据白井胜美：《新版 日中戦争》，中央公论社，2000 年，第 207-11 页。